# 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英] 威廉·西摩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引言

在这本书中，我汇集了 20 次重大战役。这些重大战役中都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对战役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对这些战役本身，我只作了梗概性的介绍，而对那些决定性的因素，我在各章的第二部分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些读者对这些战役很熟悉，有些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因此，我特别注意介绍这些战役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我们在评价很久以前的战役时应尽可能准确地搞清当时的特定环境，避免以“事后诸葛”的态度对指挥官的决定品头论足，或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评价他们的品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赞成或反对某项决定往往都有很多原因，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决定也是如此。

我当然不能说我在本书中所讲的假若采取或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战役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结局之类的意见都是对的。即使经过最深入的研究，要对那些遥远的事件明察秋毫，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也不是件易事。读者可作出自己的评判，但我希望，我对这些基本要素的陈述是公正的，在重现这些事件的经过时，我没有凭想象给基本事实添枝加叶。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战役的胜负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战斗的胜负首先取决于参战士兵的勇气和决心。没有勇气和决心，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天生具有无畏气概的人只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勇气的产生靠的是纪律、特别是自律。一支好的部(分)队(无论是团、营，还是炮兵连)应该是培养士兵自律、自豪、同甘共苦、克尽职守、不怕牺牲等优秀品质的学校。有了这种培养，士兵才会浑身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才会经受住残酷战斗的考验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才会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打下这样的烙印：在最后关头，宁可一死，也不临阵退缩、受人耻笑。

这一思想贯串于本书所描述的历次大会战中。本书中没有

一个因怯懦而失败的战例，相反，本书中倒是有两个上级指挥官指挥不力，而团指挥官及其部属却勇敢顽强地夺得胜利的例子。其实，战役的胜负更多地决定于其他一些因素，最明显的是双方指挥官的个人才能。指挥才能在任何战役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在古代的历次战役中，将帅们必须身先士卒，象英雄那样毫不犹豫地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必须扮演好在人们心目中的角色，甚至要做得比人们期待的更好。在以后的战争中，当好指挥官更加不易。虽然优秀的将领不必再冒不必要的危险，只是在危急时刻，他们才须挺身而出，亲临交战地域，但是，他们始终要让部属看到他们，感到他们的存在。即使得不到士兵的爱戴，他们至少也应靠自己的品行、勇气和军事才能赢得士兵的敬佩和信任。

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着战役的胜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战场心理因素。从古至今，因指挥官体质不佳(疲惫不堪、发烧、生病)而导致战役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忌妒和敌意会使计划破产，战斗失利(忌妒会人为地导致协同不力，敌意则使对立的一派或一支军队心怀敌意，大搞阴谋)。固执偏狭或傲慢轻敌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如今，高级将领叛变和不忠诚的事件并不多见，胜利或失败也很少取决于个别事件的影响，这实在是幸事。但在过去，这种现象却一再发生，并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再就是一些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了。将领们在参战前往往制定了圆满的作战计划，对战役过程作了精确的预计，对胜利充满了信心，结果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受命运的支配。总会有意外事件发生，人们不可能总交好运。不测事件可能是人为引发的：对重要命令产生误解；或从来就没有接到命令；或由于过分主动而未按原计划行动，从而使作战行动失去控制。不测事件也可能是由大自然造成的：暴雨使道路变成部队无法通过的泥潭，使河流变成无法徒涉的洪流。当然，

这些无法预见的不幸事件不一定都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但这类事件经常严重打乱预定计划，有时甚至会改变整个战役的进程。

上述这些重要规律在本书所收集的战役中均有例证，并且在每次战役的叙述之后都被简要地加以强调。本书的结尾还有简短的一章专门论述战争性质和战法。该章讨论了各种原则和谋略以及它们与战役的联系。

对于这样一本书来说，清晰的高质量的图示是必不可少的。沃森上校先前已绘制了不少高质量的地图。我们密切合作，力图在每一张作战地图上将这些因素清楚地标示出来，并尽可能将文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标上去。

我的出版社经理威廉·阿姆斯特朗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写这样一本书就是他的建议。其他许多人也向我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查尔斯·罗利爵士，他向我提供了他研究内兹比战役的大量成果；以前曾在美国国家公园署供职的哈里·帕凡兹教授，他阅读了本书的葛底斯堡战役一章，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累斯特郡财产与土地署署长迈克尔·哈里先生，他不惜花去大量时间带我到博斯沃思实地考察；理查德·拉姆先生，他让我阅读他论述林尼战役的文章。最使我感激的是伦敦与国防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辞辛苦，有求必应，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以前一样，我的秘书愉快地为我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

## 第 01 章、扎马之战(公元前 202 年)

扎马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打败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到公元前 6 世纪中叶以前，迦太基已成为西地中海的主要大国。在这以后的数世纪期间，迦太基进行了频繁的征战，并把它的商业帝国扩展到了北非、

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是，到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它和与之保持了几乎 300 年同盟关系的罗马发生了冲突。那时，罗马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它对迦太基人距自己如此之近深感不安，而且，它对西西里岛早已垂涎三尺。所以，公元前 264 年，罗马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241 年。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在陆地和海上(这场战争主要是海战)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们没有得到国内政治家的有力支持，结果，他们的舰队被歼灭，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落入敌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哈米尔卡·巴卡在西班牙大力增强迦太基人的实力。公元前 218 年罗马人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哈米尔卡·巴卡的儿子汉尼拔就是从西班牙向罗马发起陆路进攻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 16 载，取得了(特别是在初期)巨大的战果，赢得了诸如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会战的胜利。然而，他在征战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大力支持。公元前 207 年，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增援，结果却在意大利北部的梅陶罗河畔战败而死。事实上汉尼拔在被召回迦太基之前已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在其他战场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马派西庇阿两兄弟(巴布利阿斯与尼阿斯，他们分别是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和叔叔)前往西班牙摧毁迦太基的实力，并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起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当哈斯德鲁巴和他的弟弟马戈以及另一个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统帅的 3 个迦太基军团增援伊比利亚半岛后，西庇阿两兄弟随即遭到失败，并在战斗中阵亡。这场灾难后不久，罗马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理智的决定，即派遣 24 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到西班牙指挥那里的军队。西庇阿随后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战绩。

西庇阿曾跟随其父在意大利北部与汉尼拔作战，后来又在坎尼与汉尼拔交锋。然而，当他去西班牙走马上任时，他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不久，他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对各种作战原则，特别是对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机动以及节约兵力等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进行战斗。汉尼拔是他在扎马之战中的杰出对手，但论才能，汉尼拔比他要略逊一筹。尽管他的战略有时遭到非议，但从他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作战表现来看，这些诋毁之词并没有多少证据。扎马之战时，西庇阿已成为第一流的军人，因而他能够发号施令。

到公元前 205 年，经过贝库、伊利巴和埃布罗河会战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已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并已能够返回罗马。但他深知，只有在迦太基，而不是在意大利，才能彻底打败汉尼拔。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不得不攻入迦太基本土。当他还在西班牙时，他采取了一个极端冒险而又颇有勇气的行动，即到北非访问，目的是争取很有力量的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支持，结果，他如愿以偿。另一个努米底亚的王公马西尼萨，以前曾在西班牙为迦太基而战，这时也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从军事角度来看，进军非洲的通路已经扫清，但在政治上，西庇阿却有许多对手。不过，公元前 205 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委派兼管西西里省。众所周知，那里将是进攻非洲的跳板。

在西西里岛时，西庇阿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会见了努米底亚的使节。他从这位使节那里得知：西法克斯已经和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索福尼斯芭结婚，并已废止与罗马签订的和约；在今后任何战斗中，西法克斯都将站在迦太基人一边。鉴于这种情况，西庇阿立刻采取了行动。公元前 204 年的春天，他率领约 2.8 万人(其中有 2000 骑兵)的部队扬帆

起航，在非洲的法雷纳海角登陆。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内，大约在两个海角，即法雷纳角和邦角的中间。即将发生的战斗是在现在的突尼斯，即埃尔卡夫—苏塞一线以北的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虽然夏季用水是一个问题。但气候还比较宜人。

西庇阿很快得到了马西尼萨率领的200名努米底亚骑兵的援助。在乌提卡西南方向约3英里的一次战斗中，这些骑兵将汉诺将军率领下的一支迦太基军队诱入西庇阿设下的埋伏圈，使西庇阿彻底击败了这支前来对付他的军队。此后，西庇阿曾试图攻陷乌提卡，但由于那里的防御十分坚固，他采用了多种围攻方法也未能攻下。鉴于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率领的大批迦太基军队(可能有3.5万名士兵)正在逼进，同时，西法克斯正威胁着他的后方，因此，西庇阿决定在该城东部约2英里处扎寨过冬。

然而，公元前203年春，西庇阿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他派自己的舰队和2000人的兵力封锁乌提卡，自己则率兵南进，在马西尼萨的巨大帮助下，采取某种欺骗手段首先突袭了西法克斯的营地，继而又袭击了哈斯德鲁巴的营地。西庇阿用火攻摧毁了这两个营地，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大火中逃出时被砍杀。虽然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在这场杀戮中死里逃生，但1个月后，他们又在一个叫做大平原的地方惨遭失败。该地位于巴格拉达斯谷地，在迦太基西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这两个迦太基统帅又一次安全脱逃。但西庇阿在突尼斯一带攻城掠地的同时，又派出副将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前去追击西法克斯。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擒获了西法克斯。

起初，迦太基元老院在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后，仍然异常镇静。他们向西庇阿的舰队发动攻势，并险些摧毁了这支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从意大利召回了汉尼拔和马戈。但是不久，主和派在迦太基元老院里占了上风，迦太基元老院决定与西

庇阿媾和。罗马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目的是使迦太基沦为一个一蹶不振的非洲国家，只保持名誉上的独立。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派了一名使节到罗马去签署和约。但是，就在该条约报回之前，迦太基人两次违反了停战协议，西庇阿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在小莱普提斯(拉姆塔)登陆，沿海岸向哈德鲁梅(苏塞)进军。在那里他得到了从利古里亚渡海前来的马戈部队的增援。马戈因在上次战斗中负伤而死于航海途中。汉尼拔曾在哈德鲁梅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请求努米底亚的提哈乌斯王公前来协助，因此，他需要在此等待这位王公的到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汉尼拔和马戈从意大利带出来多少部队，据说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出来的“老部下”为数 1.2 万人，马戈的部队大约是 1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汉尼拔肯定得到了提哈乌斯的援助，后者带来了 2000 匹马和大量迦太基兵员。汉尼拔的总兵力约有 4 万人。如果依托迦太基的安全基地作战，这些部队本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

西庇阿采取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当汉尼拔还在哈德鲁梅时，他沿巴格拉达斯山谷向西推进，将通往他设在乌提卡的基地的交通线暴露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火速通知马西尼萨派尽可能多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前来参战。迦太基人与西庇阿媾和之后，马西尼萨已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去了，他正忙于尽可能多地掠取西法克斯的财物。西庇阿不想在没有马西尼萨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与汉尼拔交锋。通过向内地推进，他向自己的同盟者靠近了。同时，他把沿途所有的迦太基城镇无情地捣毁，从而切断了迦太基城的一个主要供给来源。

这样就出现了下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迦太基人吵闹着要汉尼拔追击西庇阿并与之决战。几天之后，汉尼拔便应迦

太基人的要求，强行向扎马推进，尽管他可能并未完全作好准备。汉尼拔在扎马作战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迷，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在距哈德鲁梅正西 8 英里的地方。

引起战斗的某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目前仍不清楚。由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叙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搞清楚这些事件帮助不大。但人们通常接受这种说法。即汉尼拔曾派 3 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 30 英里处的营地。后来这 3 名暗探被俘，但西庇阿在释放他们之前，同意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大部分营地。可以推断，西庇阿之所以这样慷慨大方，目的就在于使这 3 名暗探对西庇阿的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形成深刻印象。不管怎样说，这件事使汉尼拔欲与西庇阿会面。为此，汉尼拔派了一名传令官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位统帅在一个由西庇阿提出的地点举行了会谈。为了这次会谈，汉尼拔被迫把他的营地迁移到一片无水的山坡地，这使他的部队饱受干渴之苦。在谈判过程中，汉尼拔提出了令西庇阿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这样，两位统帅离开会场，各自展开自己的军队准备交战。

很明显，这个故事很有内容，但它也留下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马西尼萨和他的 6000 步兵及 4000 骑兵是在暗探离去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到达西庇阿的营地的？波利比奥斯说在此之前，而李维却说在此之后。为什么汉尼拔要离开原来的有利位置向前开进？难道他认为在马西尼萨与西庇阿汇合之前，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和西庇阿的会面上呢？或许，他知道马西尼萨已到，并感到胜利极无把握，因此在拿帝国的命运冒险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无法知晓。然而，正是汉尼拔军队的奇怪调动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导致了扎马之

战。

公元前 202 年的 10 月，西庇阿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了完全公平的较量。汉尼拔拥有最多的步兵(2.9 万至 3.6 万人)，而西庇阿则在骑兵上占有优势(4000 至 6000 人)。汉尼拔还有 80 头战象，其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中的数量都多，不过，这些大象可能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

西庇阿采用他惯用的作战队形，把他的大军排成三列阵式，第一列为铠甲步兵，其后是主力兵，第三列是后备兵[注：简单地说，罗马人各兵种的情况是这样的："轻散步兵"是装备有投枪、剑、盾和圆盾的散兵；"铠甲步兵"是配有同样武器穿铠甲的第一线部队；"主力兵"是重步兵，他们的任务是支援铠甲步兵；"后备兵"是由精选出来的老兵组成的第三线部队(通常一个军团中有 600 名这样的老兵)，人数相当于铠甲步兵和主力兵的一半，他们装备有刺枪、盾和胸甲；"支队"是军团的下属单位，人数在 100 至 160 人之间。]。他在西班牙已领教过迦太基人战象的厉害，所以决定避免将大量的步兵支队交错散布于整个阵位，而是把他们排成纵队直接布置在一线部队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阵式的整个纵深内留出一条相当宽的通道，以便让汉尼拔的大象在受惊奔跑时通过。为了使这种漏斗形的布阵效果更好，他缩短了铠甲步兵与主力兵之间的间隔，以避免那些大象横向冲撞。铠甲步兵支队之间的间隙由轻散步兵填补，这些矛枪手将首先参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沿各列战线相机待命。西庇阿的左翼是莱利乌斯指挥的意大利骑兵，右翼是马西尼萨指挥的努米底亚的骑兵和步兵混合部队，西庇阿可能共有罗马步兵 2.3 万人，骑兵 1500 人；马西尼萨步兵 6000 人，骑兵 4000 人；可能还有努米底亚王公达卡马斯的 600 名骑兵。

汉尼拔的军队成份复杂，这支军队远比西庇阿的军队更难指挥和控制。为了快速突破敌阵，并使第一线步兵迅速扩大

突破后的战果，汉尼拔把象群布置在部队的最前面。虽然波利比奥斯没有提到任何轻步兵，但是，汉尼拔的第一线部队是由利古利亚与高卢的雇佣兵、巴利阿里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部队组成的，而后两者通常是轻步兵，可能直接在象群后充当前锋部队。第二线部队由本地的利比亚和迦太基人组成，他们将在第一线部队被突破后独立进行战斗。距第二线约 200 码处是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老兵卫队，他们大部分是布鲁提亚人，将充当独立的预备队。部队的右翼是迦太基骑兵，左翼是努米底亚骑兵，两者加起来总数不超过 4000 人。

汉尼拔之所以组织独立预备队，并将他们部署在距二线部队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他的对手在以往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战术，对西庇阿可能采用的进攻计划有所了解。西庇阿喜欢首先扫清对方军队的两翼，然后进行向心攻击，以铠甲步兵对突出出来的中央之敌实施包围——这种战术是他在坎尼会战中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汉尼拔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留作预备队，他做好了进行各种钳形攻势的准备，一旦前两线的部队得手，汉尼拔的预备队将对西庇阿的后备兵给予最后一击。

会战的第一阶段中有可能发生了散兵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汉尼拔计划首先用象群发动冲击。汉尼拔的象群冲击进行得非常糟。罗马人的号手和旗手吹起刺耳的军乐对象群进行阻拦，许多大象——它们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作战训练——受到惊吓。象群的最大受害者是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他们同时受到马西尼萨骑兵的冲击，并很快被击溃。那些冲到对方阵前的大象确实在已冲到它们面前的罗马轻步兵中引起了一阵惊慌，但这些大象尚未突破敌阵就被不断投来的标枪所驱散，有些大象穿过西庇阿事先为它们留出的通道，消失在阵列的后方，另一些大象则向右翼逃去。莱利乌斯趁敌混乱之机向汉尼拔右翼的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将他们逐

出了战场。就这样，当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汉尼拔的大象和骑兵已被打散，他的两翼已经暴露。

第二阶段的战斗出现了某种异常混乱的局面。一旦象群和骑兵被赶出战场，双方军队都向前冲击，但汉尼拔的第三线部队仍站在原地未动，因此，他们距主力部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当汉尼拔的雇佣兵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厮杀在一起时，战场的相对寂静突然被多种语言的骇人呼喊声打破了。起初，西庇阿的铠甲步兵被机动能力较强的敌人打退，但他们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在背后主力兵的呐喊助威声中，这些铠甲步兵最后终于把高卢人和利古利亚人压了回去，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优势。

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不同，汉尼拔的雇佣兵完全未从第二线部队那里得到鼓励。这些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任凭同伴蒙受敌军的全力打击而不上前协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汉尼拔的命令，而并非由于胆怯，因为一般说来，非洲人打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管怎样，雇佣兵仍并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便退向第二线寻求保护，而第二线部队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迦太基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非洲人自己也摆脱了雇佣兵向第三线退去。但汉尼拔坚持不允许他们拥进他的老兵卫队中，他命令老兵卫队平举矛枪，将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两旁。不过，在被赶出战场之后，这些退下来的部队中的佼佼者在敌对行为中断后，似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部署在意大利老兵的两侧。

这时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受到严重削弱的西庇阿的铠甲步兵正准备扩张他们击退雇佣兵和非洲人的战果，可西庇阿却把他们撤了回来。此时。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恐怖景象，死伤者的鲜血流满战场。西庇阿需要暂停一下，以整编部队，汉尼拔竟让他得逞。罗马人在受到严重削弱的铠甲步

兵两侧增派了主力兵和后备兵，从而扩展了战斗队形。马西尼萨的步兵在会战中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如果他们这时仍在战场上的话(他们没有随他们的骑兵跟进)，西庇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如果他们不在，那么交战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可以肯定，在武器、勇气、指挥才能和决心等其他方面，双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最后，还是罗马人以稀疏的队形(这是半岛战术的萌芽)在布满血污的战场上首先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毫无疑问，西庇阿本来有希望将敌人包围，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汉尼拔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他的所有部队陷入苦战，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追赶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了战场，并向鏖战中的汉尼拔部队的背后发起了冲击。汉尼拔的部队转身迎战来敌，但他们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已无获胜的希望。他们大部战死于阵前，极少数企图逃跑的人被驰骋于战场的罗马骑兵砍杀。据说在扎马会战中，迦太基人战死 2 万人，被俘 1.5 万人。罗马方面只有 1500 人战死，4000 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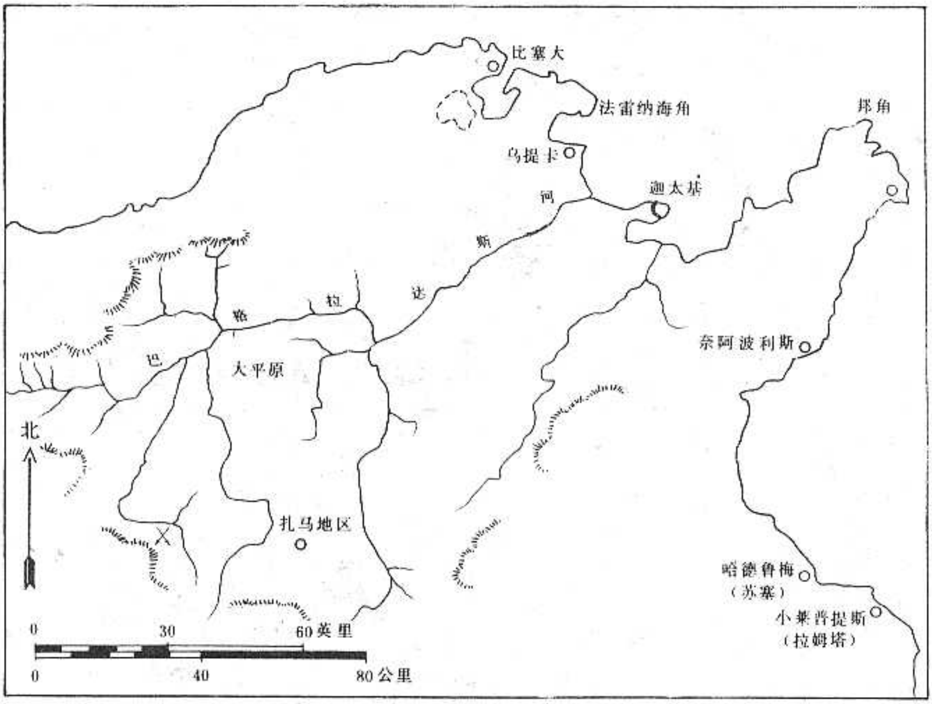
见大势已去，汉尼拔逃到了哈德鲁梅，并从那里被召到迦太基，参加与罗马军队的和平谈判。这时，迦太基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已向西庇阿投降。汉尼拔敦促元老院接受和约。事实上，迦太基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尽管西庇阿近来饱受迦太基人背信弃义之苦，但他胜利后却显得非常宽容大度。

55 年后，即扎马会战中的两位英雄被流放——他俩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则是被迫的——很久以后，很少有人还想到复仇，迦太基也被夷为平地。迦太基帝国生存了几乎 400 年，但迦太基人未能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获益。商业使这个帝国具有一种残酷而且掠夺成性的特征。它的消亡为更高一级的罗马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命运浸

淌着从扎马战场上流来的鲜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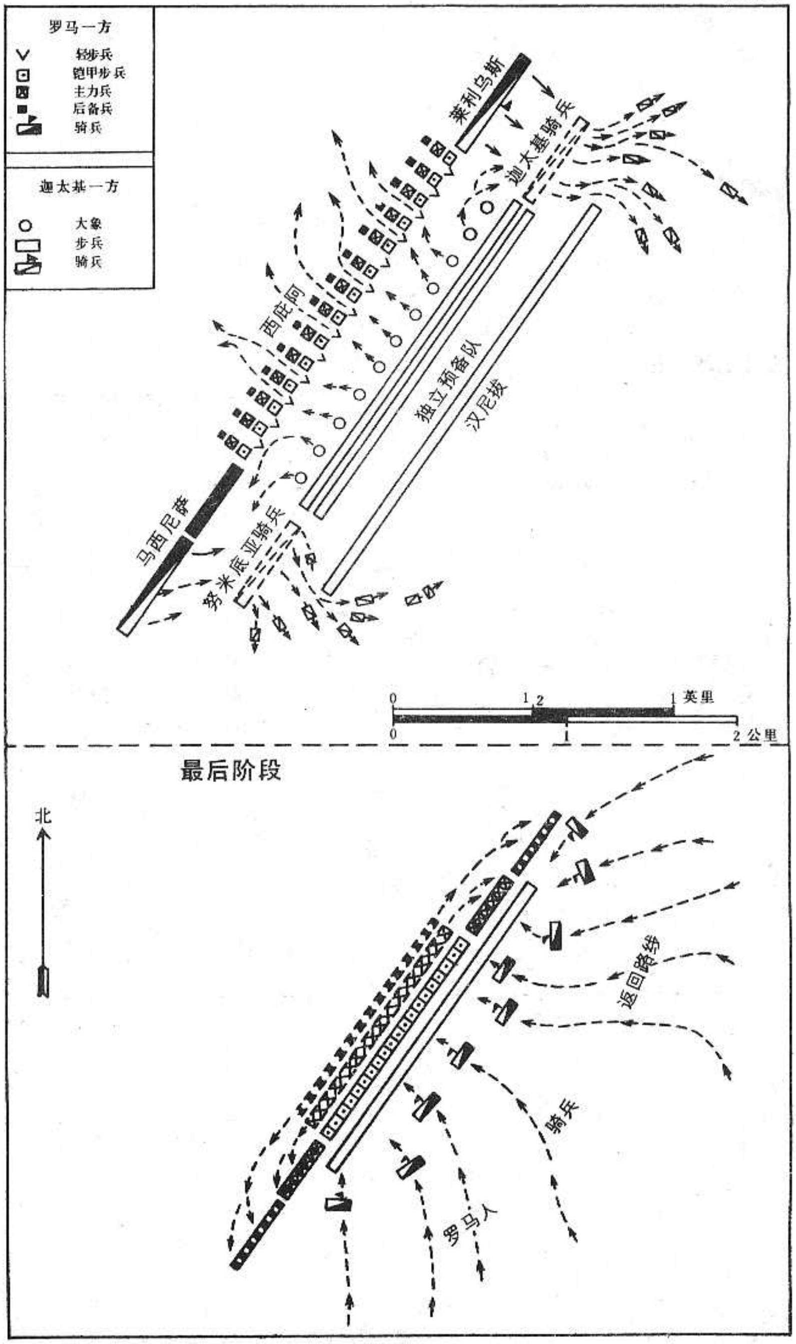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附图1



扎马之战：公元前 202 年

附图 2



扎马之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是罗马骑兵的返回。就象历史上存在着其他许多“如果”，“但是”一样，人们尽可以推测，要是没有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到来，会战的结果又将会如何。战争中的两位最伟大的统帅为了他们的未来世界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当时双方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接近的。尽管罗马军队在纪律和训练方面略胜一筹，看来更可能获胜，但汉尼拔取胜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会战的关键阶段发生了作用呢？汉尼拔的骑兵仅有西庇阿骑兵的三分之二(也许还要少，如果西庇阿得到达卡马斯率领的第二支努米底亚部队的话)，但他的步兵在战斗开始时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他的大象在战斗中与步兵们糟糕地搅在了一起，他部署在两翼的骑兵似乎也未发挥很大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迦太基人的左翼，提哈乌斯的骑兵数量只相当于马西尼萨骑兵数量的一半；而在右翼，虽然双方的骑兵数量旗鼓相当，但是，罗马骑兵几乎肯定比迦太基骑兵更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只稍作抵抗，以便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把对方的骑兵吸引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优势步兵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些他可能做到了，尽管让训练有素的步兵假装败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命令全部骑兵只进行象征性抵抗后便撤离战场对于步兵的士气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命令骑兵撤离战斗、离开战场，尽管不那么容易，但并非做不到。问题是一旦他们溜之大吉，以后的战斗结局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遗憾的是迦太基骑兵的命运未被记录下来，他们是被追上和被消灭？还是被禁止长时间离开战场的罗马人放弃了追击？搞清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很可能汉尼拔并没有发出特别的命令，因为将发生什么结果，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总是计划单独用

步兵夺取战斗的胜利。

与骑兵行动密切相关的是步兵战斗最后阶段之前的那段战斗间歇以及汉尼拔打算让他的第三线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正如德国作者莱曼所提到的那样，汉尼拔看来根本没有料到要从背后抵挡骑兵的进攻，因为这些第三线部队是汉尼拔用以决胜的部队，他们一定是被用来进攻的。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战斗是按汉尼拔的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聚歼西庇阿的后备兵以及残余的主力兵。鉴于在早期的战斗中，西庇阿的主力兵几乎未受到影响，可以想象，汉尼拔象西庇阿一样需要使战斗暂停一下。

对汉尼拔的计划来说，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汉尼拔不知道罗马骑兵会离开战场多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让西庇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把伤员向后方转移，并重新组织起战斗队形，这对汉尼拔是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汉尼拔在西庇阿召回铠甲部队之前就令部队前去与之交战，那将恰恰促使那位罗马将领实施他最拿手的战术，即用主力兵和后备兵合围迦太基的军队，这对汉尼拔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当西庇阿将铠甲步兵召回时，汉尼拔一定看到罗马的主力兵虽然参加了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将要进攻的罗马步兵几乎比汉尼拔的老兵卫队强大一倍。所以，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听任战斗暂停下来，并收容第一、第二线部队中的幸存者充实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对西庇阿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汉尼拔对他的骑兵下了什么命令，西庇阿的骑兵都会明白他们不能离开战场太久。

这样，到了第二阶段末尾，汉尼拔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在罗马骑兵不可避免地回到战场之前他还剩多长时间。波利比奥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顺应天意地到达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罗马骑兵的返回是扎马会战中的决定性事件，无论西庇阿还是汉尼拔

(他更不可能)都无力左右这件事。无论多么伟大的将领有时也需要运气。在汉尼拔的最后一次会战中，他成了弃儿——因为在扎马，命运之神捉弄了他。

> 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扎马之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在激烈的步兵战斗中，罗马人的胜利来得十分勉强，但无可争辨的事实是，在关键时刻罗马骑兵幸运地返回了战场。

## 第 02 章、黑斯廷斯之战(1066 年 10 月 14 日)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 1066 年 1 月 5 日。他死之后，贤人会议(又称咨议会)选举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为英格兰国王。然而，他登基坐殿显得很不硬气，因为他既没有王族的血统，又没有势力很大的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的支持。而且，还有两位外国王公认为自己对英格兰王冠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表示绝不退让。

1042 年哈迪卡纽特国王死后，丹麦对英国的统治遂告结束。但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却声称，根据他与哈迪卡纽特之间的协议，他应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试图从忏悔者爱德华手中夺取王冠。事实上，他的继承人哈拉尔三世正等待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格兰。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稍微充分一些。由于他姑祖母埃玛的关系，他与爱德华是嫡表兄弟。完全有理由认为爱德华流亡诺曼底时，曾允诺由威廉继承王位，虽然他无权那样做。而且，当哈罗德的船在法国海岸遇难，他本人被无耻的潘索伯爵囚禁时，威廉救了他，并十分尊重和友好地对待了他。哈罗德被诱立下誓约：在爱德华死后，不反对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以上两个王位争夺者中，首先入侵英格兰的是斯堪的纳

维亚的巨人哈拉尔三世。英格兰国王曾认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诺曼底,所以,整个夏季他都把自己的侍卫队和民军[注:侍卫队起源于丹麦，由克奴特召募来作为王室的卫队。哈罗德的侍卫队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约有 3000 人。民军是由从英格兰各郡所属的区(共有数百个区)征集的自由民组成的。每一次征召都能集结约 1.2 万名这样的非正规部队，他们配备从长矛到投石器和叉等各式各样的武器。]沿南部边界展开，严阵以待。到 9 月初，部队的薪饷和给养就耗尽了，而且，他的士兵多是自给农民，需要在收获的季节留在家乡。于是，哈罗德被迫解散民军，率舰队返回伦敦。这一行动虽然对这次战役并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却是十分不利的。然而，威廉却在长时间的等待中，使自己的封建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从而大大方便了出师任务的完成。同时，由于英国舰队在返回伦敦途中遭到了损失，威廉暂时取得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解散民军几天后，哈罗德得到消息：与哈拉尔三世联合反叛的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在斯卡伯勒抢劫烧杀之后，率领他的狭长快速战船沿着乌斯河到达李卡尔,在那里率领约 1 万人登陆，然后向约克进军。9 月 20 日，哈拉尔三世在富尔福德与莫卡伯爵和埃德温伯爵率领的军队相遇，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英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损失对黑斯廷斯战役的结局具有深刻的影响。

哈拉尔三世的入侵使哈罗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哈罗德清楚地知道威廉正等待着有利的风向，然而，他又不能坐视外敌入侵北方不管。他甚至没有时间与北方贵族联系。哈罗德开始了可载入史册的一次伟大的进军，率领他的侍卫队沿埃尔迈恩大道疾进，同时，边进军边征集各郡部队。当挪威人轻松自在地驻扎在德文特河东岸，以为他还在南方时，哈罗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 9 月 25 日的斯坦福布里奇之

战中，困乏的撒克逊人表现出不可征服的意志，经过 6 小时的苦战，他们击溃了北欧人，杀死了哈拉尔和托斯蒂格。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的侍卫队和各郡部队都受到惨重损失。两天后，风向转南，9 月 28 日，诺曼底军队毫无阻挡地在佩文西登陆了。

听到忏悔者爱德华的死讯和哈罗德继承王位的消息，威廉极为愤怒。他发出信件提醒哈罗德记住自己的誓约，但哈罗德置之不理。于是，威廉就准备进行战争了。诺曼底军队不同于撒克逊军队，它是封建体制的军队，每一位贵族和主教各有自己的封地，但他们必须供养和装备规定数量的骑士为诺曼底公爵效劳。这一次，威廉说服贵族们把他们的骑士数量增加了一倍。此外，人们很快又听到消息说，这是得到了教皇支持的神圣使命，胜利者将得到丰厚的报酬。于是，法国各地的志愿者聚集到诺曼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及被征召的士兵都是步兵，因为运输问题限制了可以渡过海峡的马匹的数量。在佩文西登陆的诺曼底军队约有 8000 人，其中 2000 名是骑士。

哈罗德可能是在约克，或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得到威廉登陆的消息的。他策马向前，超越自己的部队，沿途命令各郡集结新的部队。威廉并没有向伦敦进军的意图，在会战开始之前，他必须驻扎在他的舰队附近。他的军队从佩文西进驻到黑斯廷斯，捣毁了周围的村镇，等待哈罗德的到来。威廉没有等待很久，哈罗德就率军抵达那里了。哈罗德此时的急躁盲动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哈罗德出发迎战威廉时只有不足 5000 名士兵，但他一路上发出命令，要各郡部队加入他的行列，或者直接赶到指定的集结地。我们不知道集结地的确切位置，它可能是在科尔德贝克山上(现在巴特尔镇的北部)，也可能是在历史上称为

森拉克的山脊上。在那里哈罗德建立了防御阵地。这两个防御阵地都距伦敦约 60 英里，如果哈罗德的出发日期是 10 月 12 日(很可能如此)，他应当在 13 日晚到达防御阵地。但由于各支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开很大，加上在崎岖小路上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经过整整一夜，实际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他的部队才陆续到齐。

哈罗德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十分清楚周围的环境。他选择了一个极好的防御阵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诺曼底人。哈罗德面对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步兵和弓箭手，特别是拥有强大的骑兵，而他的军队没有骑兵，甚至没有弓箭手。他的侍卫队的主要装备是盾和双手使用的长柄战斧，他们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步兵。至于哈罗德的民军，虽然他们通常在大乡绅的有力领导下，作战异常勇敢，但他们缺乏纪律，并且既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又没有有效抗击骑兵的武器。所以，必须设法诱使诺曼底人进攻防守坚固的阵地，在诺曼底骑兵进攻受挫时，哈罗德的军队再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反攻，把诺曼底军队赶回去。

哈罗德选择的防御位置，横跨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构成了一条狭窄地带(现在的巴特尔大街占据其大部)的一部分。它的两侧十分陡峭。森拉克山脊的坡度虽然没有连接森拉克山脊与科尔德贝克山的狭窄地带的坡度大，但进攻中央阵地和山脊东部地区的军队必须爬坡攀登。防御位置的西部(撒克逊防线的右侧)是一片低地，甚至在 10 月份这里依然是一片沼泽，因为森拉克山脊和泰尔汉姆山之间的山谷中，许多小溪流和阿斯顿河纵横交错。哈罗德把军队沿山脊呈一线展开，两翼相距约 600 多码。他还在侍卫队前部署了一部分民军(装备有投石器和标枪)，这部分民军在掷完投石和标枪后将撤到侍卫队背后。这一天清晨，援军继续不断地到来，哈罗德的线式防御队伍应当相当的密集。

诺曼底军队 10 月 14 日星期六清晨 5 时 30 分离开了位于黑斯廷斯的营地。可能约在 9 时 30 分，这支长长的纵队(约 3 英里长)进入阵地，成一字形展开，准备进攻。威廉计划发动一字形进攻，他的部队分成三部分：右翼是法国和佛兰芒雇佣兵；中央是由威廉亲自指挥的诺曼底军队，兵力超过了两翼兵力之和；左翼是布列塔尼人。整个黑斯廷斯战役可以清楚地分成四个阶段。当然阶段与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短暂的停顿，因为没有一支穿着锁子甲发动仰攻的军队能在长达近 9 小时的战斗中持续不断地冲锋。第一阶段持续约 1 小时，威廉指挥弓箭手发起攻击，但在撒克逊人的“盾墙”前显得无能为力。由于哈罗德的弓箭手数量极少，诺曼底人很快就不受对方箭矢的威胁了。

在第二阶段，威廉指挥他英勇的、久经战斗锻炼的步兵发起进攻。这些步兵与哈罗德的侍卫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到处回响着兵器的撞击声。在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然而，威廉的步兵虽然在一些地区突入了撒克逊方阵，但方阵不久就得到加强，始终保持着不可突破的完整阵形。诺曼底步兵有条不紊地撤下来后，威廉把他军队的王牌——骑兵——移至前列，向撒克逊人发起了第三阶段的攻击。

这次攻击同前两次攻击一样也没有成功。撒克逊人阵地前的道路都很难走，骑兵根本无法快速前进，而且，没有铠甲保护的马极易受到撒克逊人投射兵器的攻击。这一阶段，诺曼底军队的左翼发生了一起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布列塔尼骑兵由于不如同盟者顽强，或是由于遭到了更激烈的抵抗，开始向后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又引起紧跟在他们后面准备扩大攻击成果的步兵的溃退。这样，诺曼底军队的中央被完全暴露了。

当英格兰右翼的民军反击时，诺曼底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他们全线都在溃退，混乱中，威廉也

落下了马，战场上响起了一片“威廉死了”的喊声。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它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威廉此刻显示了一位真正领袖人物的品格，他摘下头盔，以便让人们认出他，然后骑上马，驰骋于整个前线，鼓舞军队更顽强地战斗。于是，双方在侧翼的沼泽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残杀。虽然诺曼底骑兵在泥泞的沼泽地上挣扎，许多骑兵被摔下马来，但是，参加反击的撒克逊人还是被他们全歼了。这一点对哈罗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因为这件事发生时，哈罗德的全部兵力都已到齐，他有力量去补充防线中出现的缺口。

这时大概半天过去了，无疑战斗出现了暂时的停顿，因为双方都受到重创，必须重新组织和进行补充。但不久，威廉又一次指挥骑兵发起了攻击，而英格兰人又一次失算，重复使用了他们对付布列塔尼人的方法。这次事件发生在英格兰防线的左翼，英格兰的反攻部队又被彻底歼灭。

下午 4 时左右，这次会战中最具决定性和最血腥的阶段开始了，尽管撒克逊军队伤亡惨重，但其整个防线仍岿然不动。威廉决定指挥三种力量协同攻击。他命令弓箭手加大射箭角度，这样虽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但却迫使英格兰人举起盾牌，从而使那道“盾墙”不复存在。在弓箭射击的掩护下，其余诺曼底骑兵和数量依然众多的步兵冲上去与敌人搏斗。哈罗德的侍卫队在攻击面前依然顽强地抵抗着，但是，由于在第二次反击中兵力被严重削弱，撒克逊防线开始出现缺口，又没有兵力去填补。终于，诺曼底人在高地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一旦到了平地上，诺曼底的骑士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象楔子一样插入撒克逊的队伍中。

太阳落山后不久，侍卫还没有来得及向英军大旗聚拢，威廉军队的四名骑士便冲向大旗，把英格兰国王砍倒了[注：箭射中了国王眼睛的传说可能是真的，但从贝叶挂毯的绣图上

看，是一名侍卫的眼睛被射中。]。国王的两位兄弟已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战死。英格兰军队失去了指挥官，民军也已精疲力竭，于是他们四散溃逃，希望黑夜和安德雷斯威尔德森林能把他们隐藏起来。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诺曼底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开始了。然而，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天：仅存下来的侍卫向金色的韦塞克斯龙旗和带作战者图案的旗帜靠拢，与他们的国王死在了一起。

图 03、1066 年 10 月 14 日黑斯廷斯之战的战场位置(与现在的巴特尔镇图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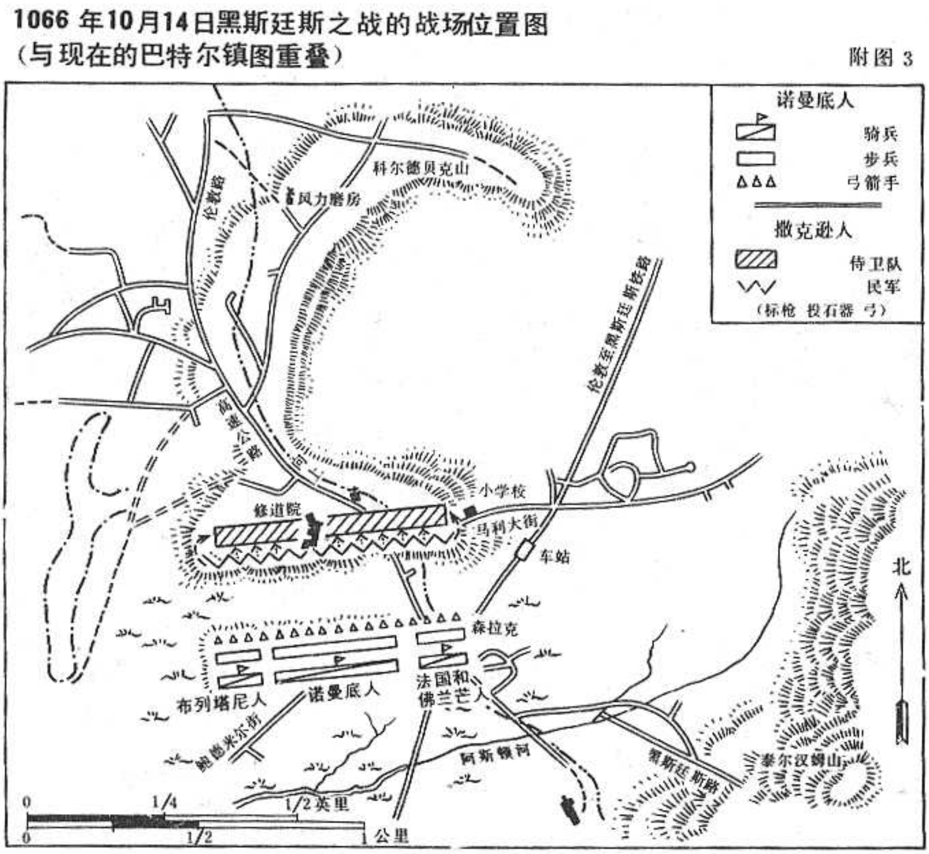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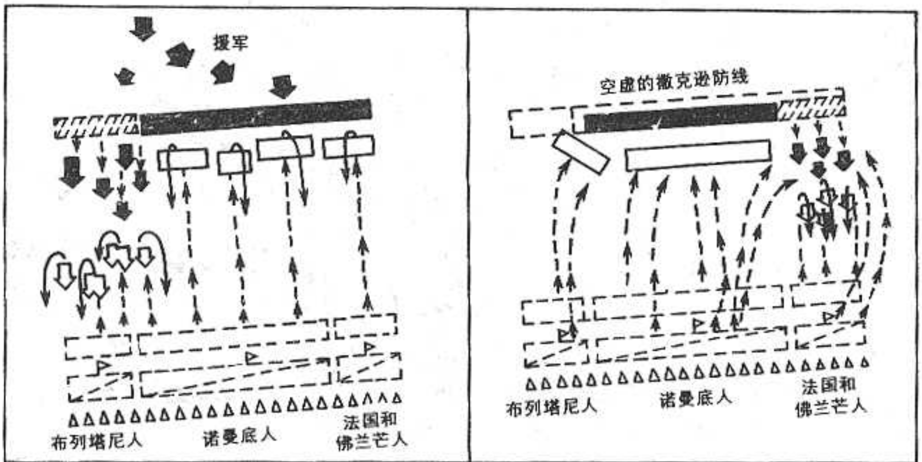



图 04、黑斯廷斯之战(1066 年 10 月 14 日)

黑斯廷斯之战： 1066年10月14日

附图 4




在诺曼底左翼的布列塔尼人被击退后，引起了支援骑兵的混乱，威廉挽救了危局，撒克逊右翼的追击部队被消灭。

诺曼底右翼的法国和佛兰芒人被击退，对撒克逊左翼的毁灭性打击。

哈罗德之所以在黑斯廷斯战败。除了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不得不两线作战外，还存在着四个重要原因：第一，在富尔福德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北方贵族的部队；第二，未做充分准备就仓卒、鲁莽地从伦敦出发了；第三(这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当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对其采取了反击行动；第四，对诺曼底防线的右翼发起了反击(它对战役的最终胜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直到 1065 年的秋天，实际上一直是戈德温家族统治着英格兰。哈罗德是握有实权的韦塞克斯伯爵，他的兄弟托斯蒂格和吉尔斯分别是诺森伯里亚伯爵和东英吉利亚伯爵，而另一位兄弟利奥弗温伯爵的采邑从白金汉郡一直延伸至肯特郡。只是有了年轻的麦西亚伯爵埃德温之后，由戈德温家族控制整个英格兰的局面才被打破。但是，由于北方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爱德华国王不得不放逐托斯蒂格，封埃德温的弟弟莫卡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样，两个年轻人控制了半个王国和北方的民军。他们受父亲艾尔福格伯爵的影响，对

哈罗德和他兄弟政治权势的上升十分不满。

有些情况表明，莫卡最初可能并未承认哈罗德的国王地位，而且北方对哈罗德国王极为不满。哈罗德不得不亲自去约克平息暴乱。而且，为了更牢靠地获得麦西亚家族的支持，哈罗德以联姻手段，与埃德温和莫卡的姐妹、圭内斯和波伊斯国王格里菲斯·阿普·卢埃林的遗孀伊迪丝结婚。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危机来临时，埃德温和莫卡不忠于或背叛英格兰。实际上，挪威人或诺曼底人获得胜利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受到指责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一支强大军队指挥不力。人们批评他们没有在北方入侵者深入内陆之前采取进攻行动。但是，他们要那样做是很困难的，并且不明智。诱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离开海洋越远，他们的处境就越危险。约克是一个很好的作战基地，但是，他们离开这个基地到野外去作战是明智的吗？当时，交通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要快：昔日那四通八达的罗马大路网虽然已是野草萋萋，但仍然可以通行。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们相信，北方的伯爵们得到了哈罗德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很可能推测哈罗德仍然在守卫南方的海岸。

约克在罗马时代曾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但这已成为过去，很可能两位伯爵认为他们的防御工事不足以抵御挪威人，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认为哈罗德即使来，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因此，他们最大的生存希望就是选择对于他们人数较少的军队稍微有利的地点进行作战。他们把船只停靠在台德卡斯特，如果哈拉尔三世愚蠢地把船队开到河上游乌斯河和沃夫河汇合处，他们就可以从台德卡斯特出发，切断哈拉尔三世的退路。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准备采取进攻战略。

假设埃德温和莫卡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哈罗德的确切消息，我们就很难再对他们的做法加以责难。但是，如果他们的防

御能坚持 3 天，那么，南北联合的撒克逊军队就能以极小的伤亡击溃挪威人。然后就会有两支军队进军与威廉作战，并很可能把他击败。实际上，这两位北方伯爵集结了一些军队，但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骑兵，因为哈罗德那样着急地赶了回去，这支队伍无法及时赶到苏塞克斯发挥任何作用。

上述这一因素直接导致了对战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因素，并且与第二个因素紧密相连。哈罗德是否在向南方进军之前应在伦敦停留较长的时间，同时，应当与威廉一样，在他与威廉之间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使诺曼底人因缺乏给养而站不稳脚根呢？

似乎可以肯定，哈罗德在 10 月 1 日得到了威廉登陆的消息。亚眠的盖伊说，这时哈罗德正在回伦敦的路上。他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当哈罗德得知威廉已经等到他们需要的风向时，他是不会再在北方停留 6 天时间的。但是，他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立刻发出命令，要求各郡集结所征的兵员。然而，大多数大乡绅无法在国王规定的时间内，即 10 月 12 日集结起所征的兵员，与哈罗德一起向南方进军。

哈罗德，当然还有他的侍卫队，可能于 10 月 5 日回到了伦敦，以后几天，在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幸存下来的民军也陆续回来了。这是一支疲惫而又零乱的军队，它需要休息，却没有得到休息。即使不是更早，那么到达伦敦时，哈罗德也应当得知了黑斯廷斯周围村镇被烧毁的消息。威廉十分了解哈罗德缺乏耐心、易于冲动的个性。针对这一弱点，他使哈罗德的部分伯爵领地上烈焰腾腾，以此逼使哈罗德急促上阵。威廉自己既等待不起，又不能远离他的舰队。

如果哈罗德等待，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离开伦敦时，只带了自己和他兄弟的侍卫队，缺乏弓箭手和步兵。虽然在进军途中，有些大乡绅和骑马的自

由民加入了他的队伍，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全部民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还有一些民军虽然及时赶到了战场，但到达时都已精疲力尽了。有些伯爵，包括北方的伯爵，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

让威廉烧毁哈罗德最忠诚的支持者居住的村镇，对哈罗德的事业当然不会有利，但哈罗德率领一支疲惫、参差不齐的队伍离开伦敦，却正中威廉的下怀。人们有时认为，哈罗德犯了一个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他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为他已经集结起来的队伍能够打败威廉，这种看法未必成立。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有些战役中，指挥官的秉性使胜利的机会明显地减少。这次战役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决定发起战役时，哈罗德本应有一支强大的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可是他的军队既不精力充沛，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那么，哈罗德在军事事务中不容置疑的清晰判断和敏捷思维，是否能帮助他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这需要时机。在战役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机(如果确实可以说它是个机会的话)。这就是在诺曼底人左翼作战的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不仅引起了步兵的退却，而且也暴露了诺曼底人的左翼，造成了诺曼底军队全线突然的溃退。

哈罗德的战略是打防御战，直到诺曼底的骑兵在盾墙前受挫后才转入进攻。威廉的战略是通过突袭和计谋击破撒克逊方阵。为此，诺曼底骑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诺曼底骑兵受到重挫之前，撒克逊方阵必须保持严整。哈罗德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

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记载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和文物有：普瓦蒂埃的威廉(他是公爵的牧师)、瑞米耶日的威廉、贝叶挂毯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从英格兰方面来讲是最可靠的记述，然而，比较粗略，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到当时在撒克逊防线右翼所发生的一

切。布列塔尼人肯定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的退却不可能是佯动；但是，哈罗德军队中的某个大乡绅或是哈罗德的某个兄弟是否发出了反击的命令，则从未有材料透露。只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溃逃的布列塔尼人发起了追击。从他们一贯缺乏纪律的情况看，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出击。

诺曼底的队伍一时大乱，这种现象直到公爵以他巨大的个人力量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才结束。因此，这段很短的时间正是哈罗德指挥撒克逊全线部队向前推进的有利时机。整个英格兰军队的强大进攻，可能压倒诺曼底弓箭手和步兵，但是，双方的伤亡都会非常惨重。有些人(包括富勒将军)认为哈罗德如果采取这样一次行动，他将取得胜利。然而，对形势的认识，在处于生死关头的英格兰国王和对此经过 900 年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后人之间可能是极其不同的。哈罗德很可能认为，进行最后搏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自己的援军正陆续到来，更重要的是诺曼底骑兵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诺曼底的骑兵重新站稳脚跟，他们就将迅速、猛烈地打击民军，而民军是骑兵极易打击的目标。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明。

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时刻，但这只是对诺曼底人而非撒克逊人而言。如果威廉没能成功地应付那种紧急情况，诺曼底侵略者就会真正陷入危机之中。在中世纪的战役中，一旦国王(这里是公爵)倒下的喊声四起，一旦王室旗帜在战场上消失，人们的战斗激情就会顿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消除的恐慌。哈罗德在战役的这个阶段中始终保持着盾墙可能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在接着出现的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事件)中，他再也找不到发起攻击的机会了。

在第二个事件中，相当一部分英格兰民军被诱出并遭到干净利落的惩罚。这比第一次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

时已经到了下午，哈罗德国王已没有任何支援力量，队伍已不那么严整，变得松散了。

在发生布列塔尼人退却事件后，战斗可能停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威廉才又一次指挥骑兵冲上山脊。普瓦蒂埃的威廉强调指出，此时，威廉已认识到他无法突破盾墙，同时想到从左翼的混乱中最终偶然赢得的胜利，决定以两次计划严密的诈退来赢得战役的胜利。倘若战斗中有较长时间的停顿，威廉也许有时间对这种最困难的作战行动进行筹划组织。但是，他的牧师当时并不在场。以后在写国王的这段经历时，这位牧师不愿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诺曼底的骑兵同他们的布列塔尼伙伴一样被击败了。尽管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说法，即那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但他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心一意向前冲击的过程中，要命令几百人改变方向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不管第二次退却是伪装的，还是偶然发生的，它都是战役的转折点。毫无疑问，中央的诺曼底骑兵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一点没有因右翼的退却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地冲向那些愚蠢地离开撒克逊防线的士兵，砍杀、分割、包围、踩踏他们。战斗很快结束了。没有一个撒克逊人逃回到当时已空虚的撒克逊盾墙中去。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这就是使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败北，从而改变了英格兰命运的四个因素。明确指出这四个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假设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能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北方民军的丧失很可能是威廉取胜的最直接的原因。

黑斯廷斯之战同扎马之战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指挥官的失败是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偶然情况。然而，这场战役也说明了控制战局的强者

如果临危不乱，则可以把偶然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对于民军两次离开防线的行动，我们不能指责哈罗德，不是他命令他们那样干的。他无力制止他们，他在这一战役中失败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自作主张所致。威廉公爵在他的士兵意外地陷入混乱、自己也掉下马来的关键时刻爬起来，骑上马，重新出现在人们都能看见他的危险地方，从而挽救了十分危急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形势，避免了使一时的挫折进一步转变成一场大溃败。

## 第 03 章、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 年 8 月)

曼齐刻尔特之战在军事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此战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轴心的变化。尽管拜占庭帝国后来又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部分领土，但曼齐刻尔特之战却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虽然此后发生的其他灾难(主要是 1176 年的密列奥塞法隆之战和 1204 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也是拜占庭帝国崩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因此，曼齐刻尔特之战的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

自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旧址建都以来，拜占庭帝国历经沧桑。它曾有过繁荣、发展和统一的年代，也曾有过内部动荡、外敌入侵、生存受到威胁的黑暗时代。在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帝国极其衰败的一段时期。巴西尔二世不仅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是个富有才干的统帅。他曾重创保加利亚王国，因此得到一个贴切而不文雅的绰号：“保加利亚人的屠夫”。当他于 1025 年去世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已元气大伤。不久，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便趁拜占庭军队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的机会对其进行侵扰。但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为严重和直接的威

胁还是来自东面的塞尔柱突厥人。这个民族勇猛剽悍，不仅傲慢而且还富有侵略性。

关于突厥人的由来我们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他们很可能于 9 世纪末来自咸海北部的某个地区。他们的首领是古兹王公的一位王子(这位王子晚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塞尔柱民族的名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在 11 世纪初叶他们就曾多次袭击拜占庭的领土，不过那时，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抢劫而已。然而到了 11 世纪中叶，由于发现对手的抵抗很弱，而且每次袭击都能掠获很多东西，突厥人的入侵变得愈加频繁和深入了。形势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原是个重要的缓冲国，经过长期不断的军事征讨和艰难的谈判，拜占庭帝国于 1045 年将它吞并。但是在 1064 年，塞尔柱人攻陷了亚美尼亚的首府和最后的要塞阿尼，终于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亚美尼亚的陷落无疑是拜占庭帝国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胜利者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勇猛的狮子)是塞尔柱王朝的缔造者塞尔柱的重孙；他生于 1029 年，1063 年成为苏丹。在贤臣尼札姆·穆勒克的得力辅佐下，他统治着一个从河间地带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人们对他的性格所知甚少，但有关他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和卓越的统帅。显然，他很强硬，很有手腕，因此很可能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都一样凶狠残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他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的抱负(和他的祖先一样)却是要直取法蒂玛王朝的所在地开罗，因为塞尔柱突厥人是逊尼派教徒，立志要扩张阿拔斯王朝的势力。令人费解且十分重要的是，拜占庭似乎从未想到过要利用伊斯兰教内部的严重不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生曼齐刻尔特会战的那个时代里，塞尔柱人在开阔地

进行的直接对阵中并不是拜占庭军队的对手。尽管拜占庭王朝晚期的几位皇帝昏庸无能，但只要管理得当，拜占庭军队仍能有所建树。然而，突厥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个个擅长弓箭，他们远比拜占庭军队机动灵活，而且还精通埋伏和诱骗之道。他们竭力避免在开阔地作战，力求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进行机动战。11 世纪上半叶，塞尔柱军队主要由土库曼人[注：土库曼人泛指 9 世纪末期河间地带的游牧部落。当时他们已成为穆斯林。]组成。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支军队也日趋职业化，成了多民族的军队。由于突厥人不断从被征服的领土上招兵买马，他们的军队中奴隶成分的士兵(即古拉姆兵和后来的马穆鲁克兵)渐渐超过了土库曼人。“奴隶”一词在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虽然那些奴隶兵可以被买卖，但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分享战利品，而且还可以靠卓著的战功晋升为埃米尔。

巴西尔二世死后，拜占庭帝国便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而又变幻莫测的年代。几代皇帝皇后都软弱无能、荒淫无耻、残暴贪婪，他们和他们的奸夫淫妇们单独或联合地统治着这个帝国。这些人不顾军事需要，任凭国内的官僚恣意妄为。但是到了 1068 年，拜占庭出现了一位皇帝，他试图弥补由这帮贪图享乐的家伙给拜占庭造成的极大损失。此人就是罗曼努斯·迪奥哲尼斯。

1067 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执政 7 年后死去，他在位的 7 年是拜占庭帝国多灾多难的 7 年。由于他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年幼，君士坦丁十世的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皇后和他的弟弟约翰·杜卡斯暂时摄政。但到 1068 中 1 月，欧多西亚背弃了她在前夫弥留之际许下的不再改嫁的诺言，嫁给了罗曼努斯。罗曼努斯后来与迈克尔七世同朝为帝，因而被后人称为罗曼努斯四世。罗曼努斯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军事世家。虽然他秉性鲁莽，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

越的统帅。他深知恢复军队士气和信心的必要性，然而，此举对于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有些部队并不信服他，特别是雇佣军和瓦朗吉禁卫军对他偏爱本地部队的行为极为不满，同时，统治阶层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杜卡斯家族也对他深恶痛绝。罗曼努斯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除掉约翰・杜卡斯。他曾想这样做，可后来又愚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罗曼努斯很快就意识到了重占亚美尼亚地区的军事意义。早在 1068 年他就准备率军出征亚美尼亚。但是，从叙利亚边界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转而开向了东南。不可否认，罗曼努斯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这些战果并不辉煌。在与突厥人的一些交战中，他的将领和士兵都暴露了许多需要克服的弱点。在 1071 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战之前，罗曼努斯还征伐了其他一些地方。两年里他接连征讨了安纳托利亚，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无论何时何地与突厥人交战，他一般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战果。因此，他收复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地。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只简单地加以说明。1070 年深秋，拜占庭皇帝和艾勒卜・艾尔斯兰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使得艾勒卜・艾尔斯兰确信他的东北翼是安全的，从而可以准备向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当苏丹的姐夫(当时他正密谋反叛苏丹)大纵深侵入安纳托利亚境内之后，罗曼努斯便认为协议已被撕毁。在此后爆发的另一场战斗中，由曼努埃尔・康尼努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败北，更多的领土被苏丹的另一位埃米尔所侵占。对此，艾勒卜・艾尔斯兰很可能了解得不多，他仍然认为或者至少希望双方都在信守协议。此时，他正在围攻南进途中遇到的敌军要塞埃泽萨城。出于保护后方的谨慎考虑，他攻占了亚美尼亚地区，其中包括曼齐刻尔特在内的某些要塞。这迫使罗曼努斯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1071 年 3 月，罗曼努斯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边行军边征集兵员，等到了塞巴斯提，他手下已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步兵、弓弩手和主要作战力量重骑兵。牛拖着火炮形成威武壮观的炮队，大队的后面是蜿蜒不断的辎重队。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人们众说纷纭。20 万至 30 万人的说法(某些穆斯林作家作此估计)显然夸张，8 万至 10 万人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支军队是由操着数种语言的雇佣兵和从各省(每个省都由一位总督管辖，该总督还负责指挥当地部队，通常为一个军团)征调来的地方部队组成的，其中包括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西徐亚人和帕齐纳克人(非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罗曼努斯的主要目的是收复亚美尼亚的各个要塞。收复失地和重建缓冲国是罗曼努斯的根本目标。当时拜占庭的政策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非坦途。曾担任过皇家禁卫军的德意志雇佣兵举行了一起小规模的兵变。尽管这次兵变很快便被平息下去了，但是从迈克尔·阿塔雷埃特斯(他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此事的作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自己的妄自尊大和专横跋扈，罗曼努斯失去了士兵的拥护。罗曼努斯的专横跋扈在他的另一次过激行动中进一步反映出来。渡过桑加瑞斯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东大约200英里处)之后不久，罗曼努斯解雇了许多他不满意的或是怀疑对他不忠的雇佣兵。在返回首都的那些人当中有位叫尼斯福鲁斯·博塔厄埃特斯的人，他曾是罗曼努斯的情敌。他被轰走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罗曼努斯的嫉恨。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的忠诚本来比任何人都值得怀疑。然而他却被留下担任了高级将领。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1071 年 7 月拜占庭军队抵达埃尔祖鲁姆后，罗曼努斯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究竟是驻守在这个边陲小镇，向该城以东扫荡，切断塞尔柱人的粮草供应；还是继续向前开进，

深入敌境。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孙子尼斯福鲁斯·布里恩尼乌斯(他与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同名)在他的著作中(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罗曼努斯似乎丝毫不知艾勒卜·艾尔斯兰的位置及其实力。由此可以断定，这点恰是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众多决定性因素之一。

其实，当罗曼努斯离开君士坦丁堡时，艾勒卜·艾尔斯兰还在埃泽萨至阿勒颇间的某地，幻想着实现推翻哈里发法蒂玛王朝的雄心壮志。直到 5 月间，他才得知罗曼努斯正向亚美尼亚地区开进。他立刻回师防守已被他征服的领土。他的行军路线和集结军队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在阿勒颇舍弃了从当地征召的士兵，带着大约 4000 名禁卫军迅速渡过幼发拉底河(据说在渡河时他的一些人马被淹死)，然后经摩苏尔直插霍伊(位于凡湖以东大约 120 英里处)。在霍伊，他如愿以偿地征集了数千人马，这些人马主要来自库尔德人。很可能在抵达霍伊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就派遣了大臣去大不里士，调集已由帝国快骑特使们召集起来的增援部队。在以后大约 6 周时间里，艾勒卜·艾尔斯兰肯定走过了约 700 英里贫瘠而干旱的地区。到 7 月底，他已在霍伊征集了一支拥有 4 万兵力的军队。这真是奇迹！

与此同时，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明智地否决了那些劝他采取守势的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破坏这片他希望很快占为己有的地区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他并不知道艾勒卜·艾尔斯兰军队的位置，他还是决定开进亚美尼亚地区。由于缺少情报，他指派法兰克雇佣军将领鲁塞尔带领一支侦察部队到凡湖西岸侦察基拉特一带的情况，罗曼努斯本人则率部准备进攻曼齐刻尔特。在此之前，他已使部队做好了穿越荒凉地区，向东南进军的准备。

罗曼努斯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曼齐刻尔特和基拉特。或许是

凭直觉，或许是因为他对当地情报的搜集方法有所改进，他相信尽管基拉特可能会有重兵把守，但曼齐刻尔特很可能是薄弱环节。虽然罗曼努斯不知道敌军的确切位置，但是他估计敌人正在乌尔米耶湖东面某地集结军队。因此，他采取了一个历来都被认为是冒险的分兵行动：派格鲁吉亚将领约瑟夫·塔查尼奥茨率领一支庞大的、几乎包括所有步兵在内的军队和鲁塞尔部一起去攻占基拉特。约瑟夫·塔查尼奥茨曾竭力主张在埃尔祖鲁姆驻守，同时他也反对分兵的做法。

罗曼努斯当时对曼齐刻尔特的估计是正确的。尽管该地战略意义重大，但它的防守力量却很薄弱。结果罗曼努斯未经战斗就轻取了该城。罗曼努斯皇帝在城中留下部分守军后，便返回他的大本营去庆贺他在此次会战中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两支部队相距 80 英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时已是 8 月中旬，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军队正从霍伊沿凡湖南岸匆忙赶来。行进在主力前面的是由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松达克指挥的一支 1 万人左右的部队。8 月 16 日或者 8 月 16 日前后(这应该是罗曼努斯进入曼齐刻尔特的日子)，这支塞尔柱先头部队在基拉特一带与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的联军遭遇。

我们并不了解交战双方的确切兵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艾勒卜·艾尔斯兰一方的人数相对少些——不过 4 至 5 万人。松达克先头部队的兵力肯定要比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少得多，然而后者却被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而且他们并没有向罗曼努斯的方向靠拢，而是朝着西面的梅利泰内方向退去。更有甚者，这些战败的将领们竟无一人把这次战斗的情况报告给罗曼努斯皇帝。的确，现在也很难说他们当时是否被击败了，有关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是即便当时拜占庭人进行了抵抗，这种抵抗也不过是最低限度的。

据我们所知，曼齐刻尔特会战是在某个星期五进行的。人们普遍的看法是 8 月 19 日的那个星期五，而不是 8 月 26 日的那个星期五。由此推断，皇帝是在 17 日(占据曼齐刻尔特后的第二天)获悉他的前哨部队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的。罗曼努斯当时估计，这股敌人不过是敌方的小部队，因此他派布里恩尼乌斯带领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前去驱赶那些“骚扰者”。然而，布里恩尼乌斯的人马却遭到从远处射来的密集而准确的弓箭的攻击。接着，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布里恩尼乌斯很快意识到，他所遇到的情况远比受到几个战斗巡逻兵的袭击严峻得多。实际上，这些突厥人(此时可能又得到了加强)正是追击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联军的敌军。然而，罗曼努斯却不相信这一事实。最初，他对于布里恩尼乌斯要求支援的报告置之不理。后来，可能是因为接到了战斗更为激烈的报告，他才派亚美尼亚将领巴西利阿库斯，一个冲动而又愚蠢的家伙，率领一个骑兵团前去支援布里恩尼乌斯这个“无能而懦弱的蠢才”，以挽回损失。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确切地点现已无人知晓，但是通过对现存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曼齐刻尔特会战显然是在平原地带进行的。这块平原一直延伸到山区。艾勒卜·艾尔斯兰从基拉特到曼齐刻尔特须翻过一座山，下了山才是位于曼齐刻尔特东南大约 8 英里的广阔平原。这块辽阔平原的背后和两侧都是起伏不定的山地。这里很可能就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主战场。在该平原的边缘地带，巴西利阿库斯落入了突厥人设置的圈套。由于违背了拜占庭最严格的军事原则，他被敌人的诈败诱入了伏击圈。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生俘。

罗曼努斯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知了这一坏消息。在并不清楚战败的程度并仍未掌握准确情报的情况下，他就命令布里恩尼乌斯率一支加强的部队去接应和掩护巴西利阿库斯撤

退。当布里恩尼乌斯驱马来到山脚下时，他才了解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很显然，布里恩尼乌斯遇到的是苏丹的部分主力部队。布里恩尼乌斯且战且退，撤出了他的大部分部队，但他自己却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三处负伤。

那天晚上，拜占庭军队的大营遭到大批突厥人的袭击。他们企图一举全歼拜军。阿塔雷埃特斯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受伤的士兵和战马在厉声嘶叫，雇佣兵因辨不清敌友而胡喊乱叫，大营外当地小贩们也在挥动手中的器皿起哄，战场内外一片混乱。拜占庭军终于守住了大营。第二天，罗曼努斯派出残存的步兵将敌人赶离军营和附近的穆拉特河两岸。

罗曼努斯仍在犹豫不决。此时，他对敌情和战况仍一无所知。大战之前，他曾派人试图召回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信使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他们很可能是被敌人杀死了，因为战斗发生时，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正由梅利泰内附近向西行进。相反，在己方领土行军作战的艾勒卜・艾尔斯兰自始至终对其对手的每步行动都了如指掌。看来，很可能是他让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于 8 月 18 日(星期四)突然来到拜军大营，试图与罗曼努斯议和。但是，罗曼努斯断然回绝。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罗曼努斯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必须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君士坦丁堡，否则他将失去一切。

次日，拜占庭皇帝纠集残存的部队准备战斗。拜占庭军右翼由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阿利亚特指挥，罗曼努斯率卫队居中，布里恩尼乌斯统领左翼。雇佣骑兵组成的强大预备队(其中包括已不再担任禁卫军的德意志人)统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指挥。安・杜卡斯无疑是位将才，但他阴险狡诈，不可信任。

奥曼在他的书中推测，开战那天塞尔柱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拜占庭军的兵力，可是，人们却普遍认为，罗曼努斯开战

时的兵力要比艾勒卜·艾尔斯兰所能征集到的兵力多得多。其实，由于拜占庭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背叛，许多人被杀，双方在曼齐刻尔特战场上的兵力相差并不悬殊。据说在当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将调度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宦官将军塔劳格，而他自己则亲临最前线指挥。塔劳格采用了惯用的突厥阵法，这种阵法使塞尔柱军队在必要时可掩护中军撤退到崎岖的山地，而山地作战正是突厥人的拿手好戏。为防意外，苏丹采取了预防措施：首先，他让埃米尔们起誓，如果他战死，他们将效忠他的儿子马里克沙；其次，他穿上白色的战袍，并以剑和权杖代替弓箭。他的这些做法均表示他将血战到底。但是，这些做法有时也会被人认为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确实如此！然而，苏丹并不希望因此而降低士气。大概中古时期的君主们战前都要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吧。

在这天的战斗中，罗曼努斯违背了“智者”利奥在《战术学》中规定的与突厥人作战的原则，因而注定要失败。诚然，罗曼努斯尽力按第一个原则，即要尽快从正面与敌交战的原则去做了，然而，未等罗曼努斯赶到，塞尔柱人早已乘快骑撤退到几英里以外。与此同时，他们以骚扰战术猛击罗曼努斯的两翼。由于罗曼努斯的大部分步兵已被塔查尼奥茨带走，因此他的两翼失去了保护。苦苦拚杀的骑兵被冰雹似的箭矢激怒了，他们纷纷追赶敌军，结果大部分陷入了敌军的伏击圈。

拜占庭军的大部分人马逐步越过苏丹遗弃的军营，朝着崎岖的山地逼近。毫无疑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和两翼部队同样的命运。罗曼努斯一心想抓住这股敌军，直到天黑他才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撤回，他那堆满粮草但却无重兵把守的军营将被洗劫一空。他别无选择，只好下令撤退。就整体而言，拜军的进攻组织得井然有序，然而撤退却是另一回事了！撤退从来就是很难组织的行动，如果指挥控制不当，撤

退的目的很容易被曲解。由于与侧翼部队缺乏配合，拜占庭军阵营开始出现裂痕。这正是突厥人所期待的时机！他们的轻骑兵飞快地冲入拜占庭军，使其乱成一团。罗曼努斯急令部队转身迎敌。这一招本来可能挽回局势，但是，后卫部队指挥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却拒不服从命令，反而带着部队向营地退去，从而使拜占庭军的殿后部队遭到敌骑兵的疯狂砍杀。

当夜幕降临时，失去希望和凝聚力的拜占庭军两翼部队开始崩溃瓦解。中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罗曼努斯仍在竭尽全力勇敢地拚杀，直到胯下的战马倒下，他本人受伤被俘。这是突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俘获拜占庭皇帝！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深夜，皇帝的军营被洗劫一空。次日，整个拜占庭大军已溃不成军了。

罗曼努斯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对他非常宽宏大度。让这位威信丧失殆尽的皇帝保住皇冠，完全符合苏丹的利益。于是，拜突双方签订了和约，内容有：拜占庭交付巨额赎金，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将拜占庭占领的某些重要地区归还突厥人。此后，苏丹释放了罗曼努斯。为了表示尊重，苏丹还派一支小部队护送他回去。

但是，拜占庭帝国决不会允许一位蒙受了象曼齐刻尔特惨败这样耻辱的皇帝继续留在帝位上。趁罗曼努斯外出之际，杜卡斯一伙儿把欧多西亚皇后贬到修道院，并宣布懦弱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为唯一的合法皇帝。罗曼努斯设法重新纠集了一支军队。1071 年秋，他踏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试图夺回王位，结果却在多西亚被君士坦丁·杜卡斯击败。罗曼努斯从战场上悄悄溜出，向东面的西利西亚逃去。随后，他再次纠集起一支军队出征，结果又遭失败。这次他是被叛将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打败的，并不幸被俘。不久，他遭到当时常见的一种酷刑，被人用拇指挖去双眼，悲惨地死去。

塞尔柱人逐渐主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农舍。虽然那里的许多城镇以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曾向拜占庭提供过最佳兵源的省份已不复存在，拜占庭军队从此再也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安纳托利亚了。虽然后来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斯一世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结局却预示了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统治的终结。随着十字军的长年征战，拜占庭帝国终于迅速地没落了。尽管曼齐刻尔特会战进行了不过几个小时，但它对欧洲的影响却持续了许多年。

图 05、曼齐刻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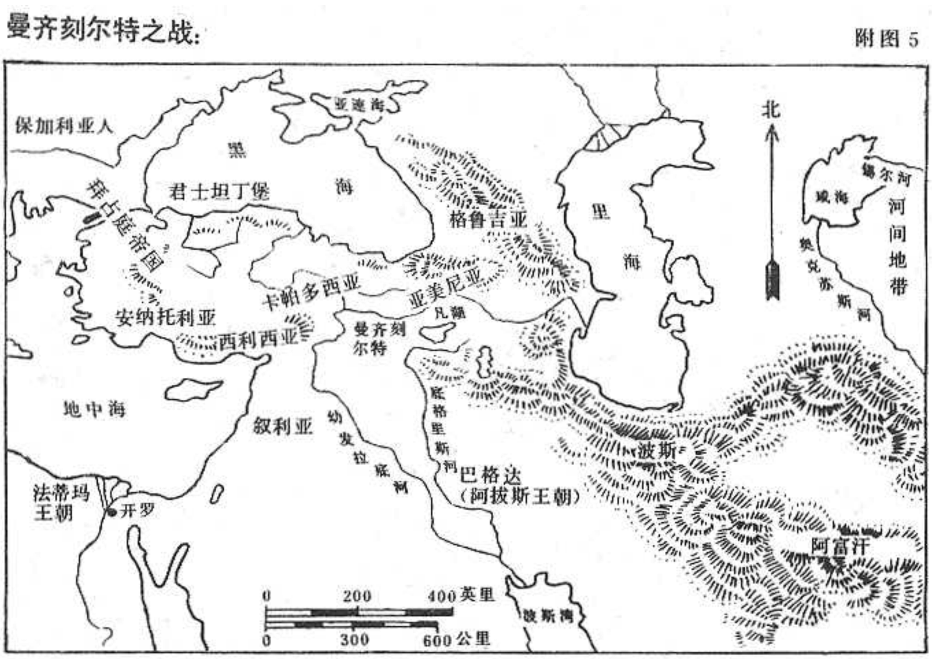



图 06、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 年双方行军路线图)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 年双方行军路线图

附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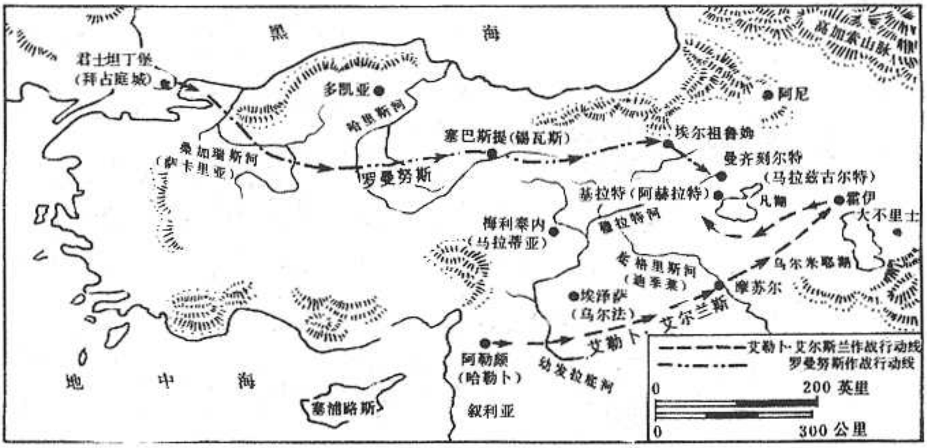



图 07、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 年 8 月)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 年 8 月

附图 7




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军队遭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惨败。有四个重大因素对这场灾难产生了直接影响：罗曼努斯即位时拜占庭军队的状况，11 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地区的丧失，会战中对敌情的一无所知以及将军们的叛变。

有人认为，其实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庭军队就已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与此相反，奥曼说：“尽管自从巴西尔二世死后(1024 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内政管理就已逐渐地腐败了，但是还不能说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就已衰败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它太偏向另一边了。也许富勒的评论最为中肯：

“可以肯定，1071 年时，这个军事组织(战斗序列和进攻方法)几乎和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一样完善。但是由于朝廷 40 年来管理失当，加之克扣军饷，军队的士气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虽然拜占庭军队仍很强大，但是已经衰落了。它并非缺乏勇敢的精神、完整的组织和战术技能，而是缺乏纪律性、士气和信心。”除了富勒列举的上述三点外，高级将领缺乏忠诚也是一个问题。

拜占庭军队的基础是 6 世纪末期至 7 世纪中期各省总督建立的军队。当时，帝国的各个行省都驻有一定数量的职业兵，他们都能得到足够的土地，以此来维持富裕的生活。一旦接到总督的命令，他们便可自备干粮和武器参加战斗。这些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主体(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总还有些雇佣兵和皇帝卫队)，他们可以免交所有税款及土地税。这支军队的军官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尽管士兵们从土地方面获得利益是与他们的军事义务相联系的，但是严格地讲，这支军队并不完全是支封建军队，因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军事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如何保持经济的繁荣、内部的稳定以及农民士兵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拜占庭的兵役制度是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军队的编制和军事训练是根据两部著名的军事条令制订的。第一部条令称作《战略学》，它是由莫里斯皇帝于 579 年编辑而成的，当时莫里斯还只是个将军。300 年以后，“智者”利奥六世编写了另一部条令《战术学》。这两部条令全面地论述了各项军事原则，并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和严格挑选士兵、高标准训练以及严明纪律等措施共同保证了军队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不幸的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 50 年里，先后执政的几个皇帝都忽视了军队建设对帝国利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由于大地主的贪婪，“自由士兵—农民”阶层这一军队

的骨干力量被逐渐削弱，并被最终取缔了。尽管有些明智的皇帝试图阻止这种趋势，但是从 9 世纪起，这种情形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不仅对军队组织是个致命打击，而且还危及到土地和财政政策。

随着 1057 年君士坦丁五世杜卡斯的即位，军队的衰落达到了极点。这个一味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昏君以前曾是前任皇帝的财政大臣，他与教会和官僚狼狈为奸，疏远军界，因此，国家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充斥国库，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结果导致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士兵纷纷破产，国家的主要兵源日益枯竭。这意味着来自本土的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辅助士兵[注：系指在其首领的带领下服役于拜占庭帝国的野蛮人部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形形色色的雇佣兵，而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素质很差。到 1067 年君士坦丁皇帝驾崩时，这支军队已日暮途穷。对于那些名门贵族来说，从军已不再是什么富有吸引力的职业了。由于国内文官当政，将军们备受冷遇，加之军费减少，国家安全赖以依靠的整个军事机器正在逐步地崩溃。

1068 中 1 月罗曼努斯登基时，他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他竭尽全力想使这支备受冷落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但是，阻力太大，而且时间也太短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军队多年形成的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是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军队衰败密切相关，并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 11 世纪后半时亚美尼亚落入突厥人之手。大约从希拉克略(他本人也是亚美尼亚人)时代(610—641)起，亚美尼亚人就在拜占庭帝国军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帝国最精锐的骑兵是亚美尼亚人，许多将领和皇帝都是亚美尼亚血统，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危也掌握在亚美尼亚人手中，后来

大量吞并小农土地的军事贵族大多数也是亚美尼亚人。

谁都不会对亚美尼亚置若罔闻，拜占庭人当然也不例外。亚美尼亚问题历来困扰着人们。这个基督教国家海拔 5000 英尺，四周几乎都是高山，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它是往来东西南北的商业要道的交汇点，又是御敌的理想屏障和进攻的有力跳板：拜占庭人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必须经过一条海拔约 3000 英尺的峡谷；而对于塞尔柱人来说，通往安纳托利亚的路却一直是下坡路。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土地非常肥沃，早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两个世纪，拜占庭对亚美尼亚就已垂涎三尺。它不满足于自己只享有宗主权，而要一点一点地将亚美尼亚完全吞并。

该政策出笼的时候，甚至到 11 世纪中叶该政策终结时，拜占庭还没有受到来自东面的直接威胁。内部动荡使亚美尼亚作为一个缓冲国的作用减小了，但是如果不是拜占庭几代皇帝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犯下种种愚蠢而荒谬的错误，拜占庭所宣称的亚美尼亚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尽管拜占庭吞并亚美尼亚更可能是出于扩张领土的野心)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很久以前，能吃苦耐劳的亚美尼亚居民就已开始大量移民，他们有的是出于自愿，有的是被动员去的。名门贵族们在拜占庭的其他地方定居还可得到大块土地。这种做法有助于削弱亚美尼亚的世俗和教会(那里的教会存在着明显的教派之争)势力。为了进一步向该目标努力，拜占庭还废除了当地长期存在的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这一过程在君士坦丁十世时又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这位皇帝取缔了对该地的防卫发挥着关键作用的 5 万当地军队，并代之以不堪一击的驻防军，这使得亚美尼亚根本无法抵御日益猛烈的塞尔柱人的袭击。

毫无疑问，亚美尼亚人憎恨这样对待他们。拜占庭的上述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衰落的深渊，因此他们越来越忿恨不平，

根本没有抗击侵略者的愿望。如果亚美尼亚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缓冲国的作用，曼齐刻尔特会战完全有可能避免，罗曼努斯四世也会有充裕的时间重整军备。把屈辱强加于亚美尼亚人头上以及完全剥夺该国的防御能力，导致了 1064 年亚美尼亚的沦陷，而这对 1071 年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永久丧失；并最终对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罗曼努斯在 1071 年的失败作出了种种解释，但是很少有人——如果说有的话——着重分析他根本不掌握情报这个因素，而这一点(除去将领背叛的因素外)恰恰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与艾勒卜·艾尔斯兰不同，罗曼努斯的绝大多数作战行动是在敌方领土上进行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他不了解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事实很简单，即使罗曼努斯果真有情报部门的话，那么该部门的工作也是极其糟糕的。不错，出征地区广阔无垠，但罗曼努斯有的是骑兵，在多民族地区，经过认真挑选的侦察人员可以渗入任何地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和情报系统。但是，罗曼努斯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使他在战前和会战中犹豫不决，并且连连作出错误的决定。

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优柔寡断就是因为缺少情报。因此，罗曼努斯派鲁塞尔前去侦察。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鲁塞尔从来没有送回过情报。也许罗曼努斯命令鲁塞尔回来时再汇报情况，但是这无疑太晚了。这使得罗曼努斯没有听从一位高级将领的劝告，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罗曼努斯之所以作此决定乃是因为，他认为艾勒卜·艾尔斯兰当时正在乌尔米耶湖一带活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这种冒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该决断是错误的。即使塔查尼奥茨不临阵脱逃，这也仍旧是个错误的决定。会战之初，

罗曼努斯除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到过点滴消息外，似乎从未从前线得到过情报。一位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制定出制胜的决策的。毫无疑问，在会战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完全不掌握准确的情报，罗曼努斯始终未能使其军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会战的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约瑟夫·塔查尼奥茨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这两位高级将领以及雇佣兵首领鲁塞尔的行动。塔查尼奥茨指挥着相当一部分军队(具体兵力尚不清楚)，但他似乎一箭未发就率部逃离了战场。如果他进行过战斗而被打败(如某些穆斯林作家所述)的话，他定会向主力部队求援，或者至少会派信使捎个口信。

虽然鲁塞尔是个雇佣兵，把流血拚杀视为职业，但是一旦塔查尼奥茨逃离战场，鲁塞尔很可能想到他也不妨溜之大吉，另投新主。然而，塔查尼奥茨的行动就令人费解了。一般的看法是，塔查尼奥茨叛逃了，而且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有三种推测可以解释他叛逃的原因，其中一种推测排除了他的行为是故意叛变，但此三种推测均无充分的证据。塔查尼奥茨曾两次与罗曼努斯当面发生冲突，一次是在是否应该离开埃尔祖鲁姆的问题上，另一次是在是否分兵的问题上。决定这两个问题时，罗曼努斯均未采纳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因为憎恨上级这种傲慢态度而叛逃呢？因情感受到伤害就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这种想法似乎过于离奇了。莫非他是反罗曼努斯的杜卡斯集团中的一名成员，早就与杜卡斯策划好，在时机成熟时一同造反？目前我们对塔查尼奥茨的政治倾向毫无所知，但是据布里恩尼乌斯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从其竭力反对分兵的情况来看，他不象是要阴谋反叛。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即拜占庭军士气非常低落，时常有违抗命令的现象发生，鉴于当时形势严峻，而且又有逃跑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拜占庭军发生兵变并胁迫塔查尼奥

茨逃走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部下允许，他也不太想回到皇帝的身边。由于现存的资料太少，这个谜还无法解开。但是，他的行为对罗曼努斯的失败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我们目前所知，罗曼努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塔查尼奥茨不忠——即使他真的不忠。但是，安德罗尼卡却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约翰·杜卡斯已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但他是罗曼努斯的死敌，是留下来的危险人物。杜卡斯家族的效忠宣誓是毫无意义的。如前所述，罗曼努斯早应除掉此人。让杜卡斯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参战更是个致命的错误，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罗曼努斯是想将安德罗尼卡作为人质来约束他父亲的行为，使其循规蹈矩。安德罗尼卡被认为是帝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但罗曼努斯却委任他指挥后卫部队，这或许说明罗曼努斯希望他自始至终地远离战场。

用阿塔雷埃特斯的话说，“安德罗尼卡早已图谋不轨，阴谋推翻皇帝”。当拜占庭军开始撤退，罗曼努斯下令后卫部队迎战并击退突厥人的进攻时，安德罗尼卡认为实现其阴谋的时机已到。当时拜占庭军阵中已经出现了空隙，突厥人已开始渗透进来。军旗反向通常是撤退的信号，但是在混乱中可能会被误解，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安德罗尼卡不但没去攻击渗入的敌人，反而火上浇油，到处散布罗曼努斯已被打败的消息，并带领后卫部队撤向军营，使拜占庭军失去了后卫保护。这是精心策划的早有预谋的叛逆行为，它必然导致拜占庭军的迅速溃败。

以上就是直接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并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罗曼努斯因部下叛变而在会战中遭到失败。变节行为往往是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假如指挥官因此而失败，那么他是极其不幸的。然而有趣的是，

罗曼努斯明明知道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有可能带领他的部队叛变(塔查尼奥茨可能也是个叛将，但这点至今查无实据)，却仍然把相当一部分兵力交给他。罗曼努斯这样做定有原因，而且一定是出于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罗曼努斯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遭到失败的，他只不过是个不走运的指挥官。他这类将军常常要吃败仗。

## 第04章、耶路撒冷王国——哈丁之战的前奏

1081 年，康尼努斯家族的阿列克塞一世登上拜占庭的皇位，使这个处于绝望中的帝国出现了生机。阿列克塞一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应付土耳其的威胁，便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提供雇佣军。教皇欣然同意，但他提供的援军规模比阿列克塞所要求的大得多。1096 年夏到 1097 年春，教皇提供的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不是几千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军，而是一支既有战斗人员、又有非战斗人员的大军。他们各有自己的统领，都要求吃好住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时，政治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一个由塞尔柱苏丹领导的统一的穆斯林帝国的威胁尚未形成；鲁姆苏丹国已经独立；一个新的王朝——达尼什曼德王朝——业已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的埃米尔有好几个；巴勒斯坦则由以开罗为中心的强盛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管辖。因此，十字军面对的是一群四分五裂、相互猜疑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可谓万幸，因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敌人，他们决不会取胜。

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两者有时彼此合作、有时互不干涉、有时相互对立。只要利益需要，他们还与周边的穆斯林结成秘密同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初期合作很顺利(阿列克塞一世巴不得十字军离开他的国土)。1097 年

夏秋，这种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尽管基督徒的伤亡很大，但双方的军队还是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两次战役(尼西亚和多利留姆)的胜利。10 月底，布洛涅的鲍德温已占领了埃泽萨及其附近地区，拜占庭与十字军的主力部队则已开到了安条克。

然而，就在叙利亚北部的这座重镇面前，十字军遇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十字军首领之间出现了不和(这种不和再也没有止息)。首批十字军参战的动力无疑是出自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以及去耶路撒冷朝圣和把圣城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真切愿望。遗憾的是，这种高尚的理想很快便淡漠了，代之而来的是争夺领土的欲望。名利取代了神圣的誓言。

十字军围困安条克达 7 个多月之久。虽然城内军民历尽艰辛顽强抵抗，但由于叛徒出卖，该城终于 1098 年 6 月被攻陷。经过一番争执，塔兰托的博希蒙德被封为安条克的公爵，并奉命留守该城，其他十字军部队在图卢兹的雷蒙德率领下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圣城耶路撒冷比安条克还要坚固，十字军十分缺乏攻城的器械和木材。恰在这时，一支基督徒船队将一些材料运到未被占领的雅法，于是这些材料便被武装押送到耶路撒冷。炎热和缺水使战场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直到 1099 年 7 月 15 日，十字军才攻下圣城。随后的大屠杀骇人听闻，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之惊恐：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所有居民均遭杀戮。即使在那个凶恶残暴的时代，这场大屠杀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甚至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十字军内部就已对由谁和怎样治理该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非神职的候选人只剩下图卢兹的雷蒙德和布永的戈弗雷，但这两人都拒绝在这座基督曾被加冕的圣城称王。最后，戈弗雷接受了推举，成为“圣墓卫士”，乔克斯的阿诺尔德被推举为主教。

戈弗雷虽然在后来的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善战，但其性格有

些懦弱。他在拉姆勒打败了埃及人，但由于嫉妒和不信任雷蒙德，他失去了夺取重镇阿什凯隆的良机。一年之后他即去世，随即，接班人的问题又引起一场争论。雷蒙德是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首领中仍然效忠于阿列克塞皇帝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当时远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已被土耳其人俘获；于是埃泽萨的鲍德温成了戈弗雷的继任者。1100年圣诞节，加冕仪式在“圣诞教堂”举行。当新主教、比萨的戴姆伯特把王冠戴在鲍德温的头上时，后者看上去坦然无愧。这样，参加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仅四年半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宏愿。

自从攻取尼西亚以来，法兰克人(对十字军的通称，包括拉丁人在内)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几乎每前进1英里都要经过战斗，后来的40年间情况依然如此。收复基督教圣地和就地安家落户不仅需要打仗，而且还需要使用外交手腕，即挑拨穆斯林与穆斯林(间或穆斯林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相互制约。法兰克人要随时准备根据当时的最大利益与他们之中的某一方站在一起。

后来耶路撒冷王国形成了四个主要国家：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黎波里于1109年8月向法兰克人投降。和以往一样，围绕如何瓜分战利品的问题出现了一番争执，结果图卢兹的雷蒙德之子伯特伦伯爵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101年，伯爵曾再次率十字军(大部分由伦巴人组成)东征，但不甚成功。他死于1105年，死前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攻取的黎波里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伯爵虽然常常独立行事，但名义上还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属臣，而安条克的公爵则从未向国王称臣。不过，在国家危难之际，这四个国家一般(并不总是)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为了保住并扩张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法兰克人连年征战。12世纪前半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巴格达塞尔柱苏丹的

埃米尔[注：埃米尔是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贵族、王公。]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埃及部队。法兰克人的战略是不让这些强大的敌人联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占领阿勒颇、霍姆斯和大马士革这几个中间要地。他们未能夺取这些城市，但他们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和多年的艰苦征战成功地挫败了敌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任何努力。

另一方面，法兰克人要想生存就必须占据沿海平原的港口，以便接收源源不断从欧洲运来的人员与物资，便利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为此，他们 1099 年占领了雅法，1101 年占领了艾尔苏夫和凯撒里亚，1110 年占领了西顿，1124 年占领了提尔，1153 年占领了阿什凯隆。约旦以东地区和豪兰山的部分地区主要是靠撒马利亚和加利利两封地的统治者发动大规模袭击取得的。

1118 年发生了对耶路撒冷王国意义重大的三个事件。4 月 7 日，鲍德温国王在与埃及人作战时死去。他是位政绩卓著的统治者。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一个北起贝鲁特、南至死海的生机勃勃的王国。他膝下无子。稍事迟疑之后，宫廷会议选举他的堂弟、埃泽萨伯爵布尔格的鲍德温为继承人。4 个月后，阿列克塞皇帝驾崩。尽管他对经常挑起争端的十字军总的说来表现得十分忍耐，但他一直与安条克不和。也就在这一年，“军事教团”诞生了。

自 1070 年以来，耶路撒冷一直为贫穷的朝圣者提供食宿，那里的僧侣向本笃会派效忠；到了 1118 年，他们获准建立自己的教团，称作“救护骑士团”，听命于教皇。他们的首领决定：一部分教友继续为饥饿和染病的朝圣者从事慈善工作，但教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骑士军，其鲜明的标志是外衣上配戴一枚白色的十字章。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佩恩斯的休”的骑士说服了国王鲍德温，获准组建另一支军事和宗教教团，取名为“圣殿骑士团”，因为它的

总部一开始设在靠近所罗门圣殿的皇宫一侧。这个独立的教团内分三个等级：骑士、军士和教士。他们的徽记是一枚红十字章，骑士配戴在白色外衣上，军士配戴在黑色外衣上。

这两个教团的最初任务是保持朝圣路线的畅通，但他们不久便发展为精锐的职业军，能够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交手。他们在欧洲大规模招兵募捐，终于强大起来。起初，封建骑士是拉丁军队的中流砥柱，但不久之后骑士队伍即显得人数不足，难以履行他们应履行的众多职责；虽然雇佣军是支被广泛使用的力量，但它的开支太大。于是，“军事教团”便成了拉丁军最主要的成份。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又坚持独立性，前者的益处往往被后者所抵销。他们不是以部属而是以伙伴的身份参战，因此拉丁王公们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必须对付叙利亚和伊拉克埃米尔中的许多劲敌，但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无疑是伊马德丁·赞吉和他的儿子努尔丁和撒拉丁·优素福(史称撒拉丁，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伊马德丁早在 1127 年就已名声显赫，但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征服穆斯林中的对手，因此未立即使法兰克人感到不安；然而，当他于 1129 年实际控制了内陆的叙利亚后，他便在大马士革城外大战法兰克军(他差一点诈取了该城)，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直到 1144 年，伊马德丁才占领埃泽萨，给了耶路撒冷王国最沉重的一击。此时国王鲍德温二世及其继承人、他的女婿富尔克均已去世，治理王国的是幼王鲍德温三世的母后梅利森德女王。此时，精明强干的埃泽萨伯爵科特尼的乔斯林也已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爵位的继承者)是个软弱无能的浪荡公子。

不过，即使统治者再能干，他们也很难保住埃泽萨。此地极易被夺取，因为它既无天然屏障，又无充足的兵力。在周

围皆是敌国的情况下，埃泽萨要想生存只能依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安条克)进行合作。此时安条克的统治者是普瓦捷的雷蒙德，他一个时期以来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及其继承人曼努埃尔兵戎相见，因此，当埃泽萨伯爵请求援助时，雷蒙德拒绝了；梅利森德女王虽然派出援兵，但为时已晚。

埃泽萨失陷的消息使欧洲大为惊恐，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事促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8 年到达圣地的十字军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率领的。此次东征的情况与 50 年前第一次东征时大不相同。土耳其人的抵抗更加顽强、组织得更好，德法联军途经小亚细亚时伤亡惨重；拜占庭皇帝的热情大不如前；东方的法兰克人失去了旧日的宗教狂热，与穆斯林邻国的生活方式已趋于一致。对此，这些新朝圣者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宽恕。

路易七世率法军从爱琴海岸的阿塔利亚乘船过海，在安条克登陆。他几乎立即与雷蒙德伯爵产生了意见分歧。伯爵打算用新来的军队收复埃泽萨、攻占阿勒颇，以此加强王国的北部——这毕竟是十字军东征的根本目的。但是，新来的军队一方面表示完全乐于消灭异教徒，另一方面又表示他们首先是作为朝圣者前来洗涤自己的灵魂的，无疑路易本人(可能还有许多法军)期望先去享受赤足步入圣墓教堂的殊荣。这样，路易便领着人马直奔耶路撒冷，并在那里与在阿卡登陆并先期到达圣城的康拉德会合了。

不久(1148 年 6 月)，在阿卡举行的东西法兰克首领协商会议决定放弃任何收复埃泽萨的企图，转而攻打大马士革。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因为大马士革是叙利亚诸城中防御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而且其统治者多年来愿与法兰克人友好相处。7 月 24 日，基督徒军队兵临大马士革城下，但 5 天之后，他们便败退到加利利。领导分裂、指挥不力、内部不和、猜疑背叛等都是导致这次大失败的因素。康拉德和其他许多

十字军随即离去，几个月后路易也走了。此战使拉丁王国伤筋动骨，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拉丁王国与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伟大的战士和寻常百姓一样，最终也要入土安息，遗下的子孙未必伟大或更伟大。不过也有例外：赞吉 1146 年遇刺身亡，其子努尔丁却以同样的魄力和才干继承了父业，他联合各酋长国打击法兰克人。如果当初安条克的雷蒙德能说服路易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们是很有可能阻止住努尔丁发展的，因为在 1148 年初努尔丁还不够强大，难以抗拒德法两军的进攻。实际上，在那一年年底，雷蒙德曾小胜努尔丁。但到了 1149 年 6 月，努尔丁便报仇雪恨，击败并打死了雷蒙德以及前来援助他的阿萨辛[注：阿萨辛是由波斯人哈桑·萨巴赫于 1090 年建立的团体。萨巴赫是一个虔诚的什叶派教徒，与阿拔斯哈里发及其追随者誓不两立。作为他亲手创建的教团的大头领，他要求手下的人在政治性暗杀活动中必要时应自我牺牲。]的首领。安条克公国虽然保住了，但努尔丁攻克了奥龙特斯河谷中的大部分城堡，大大缩小了这个公国的领地。

安条克的雷蒙德阵亡两年之后，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又被暗杀，这给鲍德温三世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德温三世虽年仅 20 岁，但已很有胆识，他不仅抓住机会掌握了这两个公国的命运，而且还在 1153 年攻占了阿什凯隆这一要地。1154 年，通过改朝换代的办法，努尔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马士革，使原来不肯听命于他的叙利亚各埃米尔们从此对他俯首称臣。如今拉丁王国的整个东部地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先前对拉丁人极为有利的各埃米尔之间的松散邦联而今有了统一的首领。

1155 年，鲍德温认为，与努尔丁签订和约是明智的。但两年后他愚蠢地撕毁了和约。结果，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太巴列湖正北一战中遭到惨败。1159 年，鲍德温三世的王国

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一年，曼努埃尔皇帝很想与努尔丁签订休战条约，因为他认为，在拜占庭与法兰克人的关系中，撒拉逊[注：撒拉逊人是欧洲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他们多为叙利亚及其附近沙漠地区的游牧民。]人是有用的政治法码。

1162 年，年仅 32 岁的鲍德温三世死去，他的兄弟阿马尔里克继位。阿马尔里克在位期间最主要的作为是 6 年之中 5 次进犯埃及，其中最后一次是 1169 年与曼努埃尔的帝国军队协同实施的大规模两栖作战。征服埃及所能带来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是很多的，因为努尔丁也很想占有法蒂玛王国，以便完成对拉丁人的包围。努尔丁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因为在派骁将阿萨德丁·谢尔库赫率兵南进的同时，他还能在法兰克王国的北部边境实施牵制性军事行动，迫使阿马尔里克急忙赶回来保卫他的王国。

当然，阿马尔里克也是有所成就的。拉丁军与法蒂玛的大臣沙瓦尔相配合，曾一度占领过开罗。但阿马尔里克的整个计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1169 年，谢尔库赫终于作为努尔丁的代理人在开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同年春，谢尔库赫去世，他的侄儿撒拉丁继位。撒拉丁不失时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征服了整个埃及。

在基督徒的对手中，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撒拉丁。他一心一意地要灭绝他们。从 1170 年起，直到 1192 年他与理查一世签约为止，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基督徒。撒拉丁 1138 年生于亚美尼亚的特克里特，在巴勒贝克和大马士革度过大部分的青年时代。他的父亲先后侍从于赞吉和努尔丁。如果不是他的叔叔谢尔库赫 1160 年带他去参加埃及战役，并把他造就成一个为伊斯兰而战的征服者，他可能会在大马士革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不过，他之所以名留青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还由于他的宽宏大量、远见卓识和刚

直不阿。必要时，他也可以冷酷无情，但总的看来，他的行动准则是正义、真理和信义。

对拉丁王国来说幸运的是：撒拉丁在把全部力量集结起来之前经过了多年的挫折。努尔丁在世期间，撒拉丁发现自己没有自由，他的宗主国对他在埃及的扩张行动疑虑重重(他在那里废除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之后便成了那里的最高统治者)。1174 年努尔丁去世后，撒拉丁立即着手夺取对叙利亚的宗主权，然而在这 10 多年里，他不得不与赞吉王朝打打谈谈，因为赞吉王朝为了捍卫他们的后继国王，自然少不了与其先王的属臣之子较量。

撒拉丁一方面努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经常与法兰克人交战。1177 年，他在拉姆勒附近遭到惨败。虽然一年之后他报了仇，但总的说，他在与拉丁王国的交手中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后者的政策是保住自己城池，尽量避免大规模交战。

此时，拉丁王国正进入最危险的时期，最后一个实际起作用的国王阿马尔里克于 1174 年去世，其子鲍德温四世继位，时年仅 13 岁，且患有麻疯病。虽然鲍德温在忍受那折磨人的顽疾和对付撒拉丁的屡屡挑战中很快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勇气，但同往常一样，围绕摄政问题，拉丁王国陷入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穆斯林一年比一年团结，而拉丁王国却日益分裂。

赞吉王朝的王公们想取得作为后盾的法兰克军队的援助，但广大士兵对他们没有好感。撒拉丁通过武力征服和谈判缔约逐步确立了对这些邑地的统治地位。1183 年夏，他以缔约方式取得阿勒颇，这样他的政敌就只剩下摩苏尔的顽固不化的努尔丁的侄子伊兹丁了。两年之后，勇敢而不幸的麻疯病患者鲍德温国王终于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此之前的最后两年中，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一直是摄政王，他在众贵族的

一致支持下，与撒拉丁谈判签订了为期 4 年的和约。

解脱了后顾之忧后，撒拉丁便全力以赴降服伊兹丁，后者终于在 1186 年初俯首称臣，至此，撒拉丁的帝国伟业遂告完成。从昔兰尼加到美索不达米亚，撒拉丁实现了众多埃米尔的大联合。在北方，拜占庭帝国自 1176 年在密列奥塞法隆全军覆没后已无力他顾，胜利的塞尔柱苏丹主动向撒拉丁表示友好。撒拉丁要收复耶路撒冷，只剩下法兰克人与和约这两个障碍了。

## 第 05 章、哈丁之战(1187 年 7 月 4 日)

国王鲍德温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鲍德温)，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 年威廉去世，3 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马尔里克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鲍德温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纳尔德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怀敌意。

1185 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鲍德温四世病入膏肓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鲍德温未成年期间。1162 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 8 年之久。如今他 45 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

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蒂永的雷纳尔德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纳尔德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 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 16 年之久。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卡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 1173 年到达的黎被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 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 年，鲍德温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鲍德温五世夭亡。鲍德温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

西比拉(鲍德温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凯隆送到耶路撒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纳尔德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恪守和约。不料沙蒂永的雷纳尔德为他代劳了。1187 年初，雷纳尔德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丁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纳尔德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纳尔德照办。雷纳尔德再次拒绝，竟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知道，撒拉丁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

兰克人之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纭，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注：撒拉丁的同时代人传记作者贝哈丁称：当时并无突击队，消灭斡旋团的部队是撒拉丁之子阿夫达尔率领的主力军一部，正开往战斗阵地。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 4 月 30 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骚勒以北 10 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 7000 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骚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愧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

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团结的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 年 6 月底在阿卡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 1200 名骑士、1 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 2000 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 400 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纳尔德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勒颇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 2 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圆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

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 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塔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 月 26 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 5 日。侦察队向撒拉丁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骚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注：很可能是“克雷森泉”。那些突击队员被派到此处侦察。但即使是武力侦察，7000 人也未免多了一点。]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 15 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 年和 1184 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 月 2 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方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奸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 月 3 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注：这枚小巧玲珑的十字架存放在镶着珠宝的盒子里，基督徒打仗时带着它，其他重大场合也展示它。作为神圣的标志，它就象后来军队中的国旗或军旗差不多。阿拉伯传记家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象征。]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王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救护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 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土耳其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里有一条山脉，高达 1100 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 600 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 600 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伯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

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 月 4 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西亚，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滑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

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 200 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拼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诋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用想了，因为 3 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注：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救护骑士团”的大头领已在哈丁阵亡。]这唯一的例外是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掺，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 200 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 14 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在阿卡下令屠杀 2000 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

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凯隆。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 年 10 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 1099 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 100 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撒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图 08、哈丁之战(1187 年 7 月 4 日巴勒斯坦)

哈丁之战：1187 年 7 月 4 日，巴勒斯坦

附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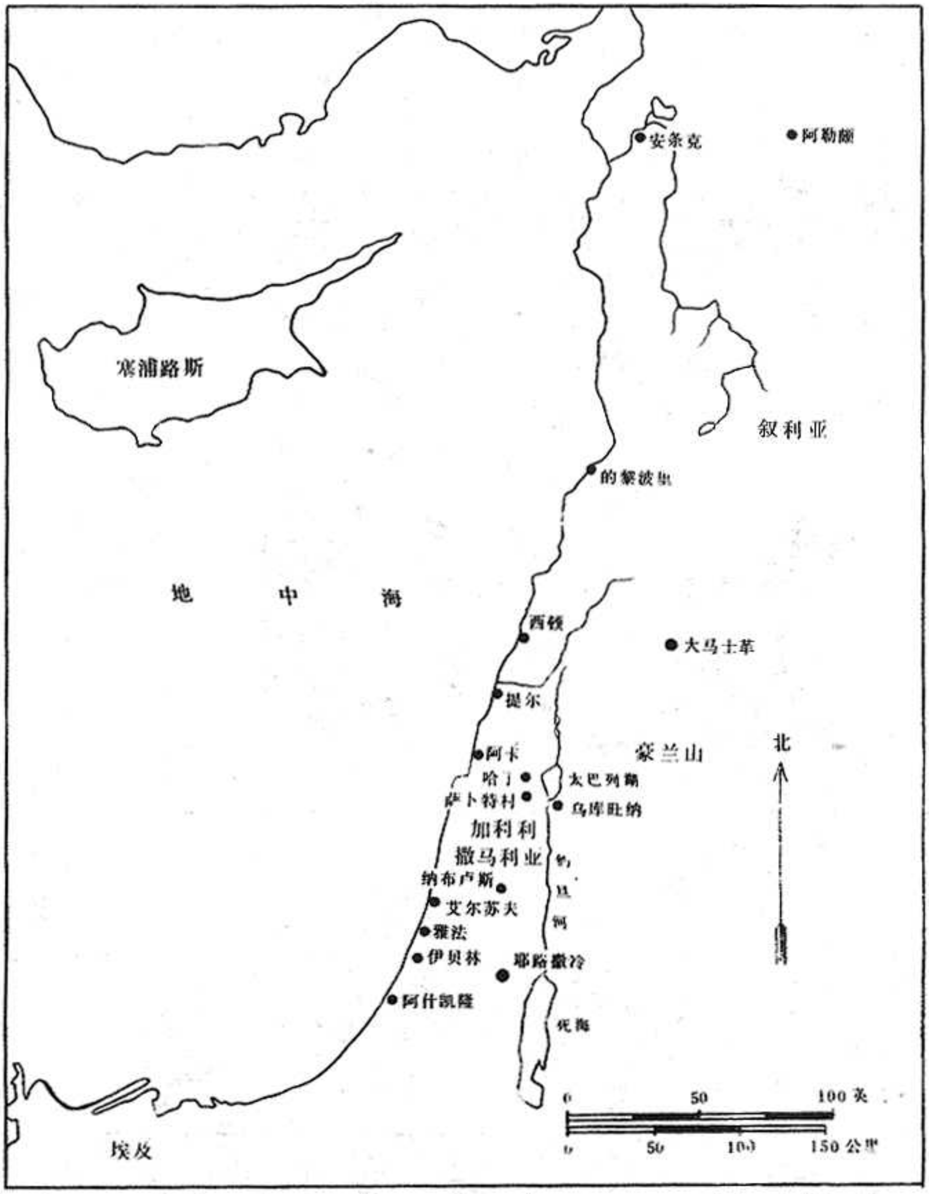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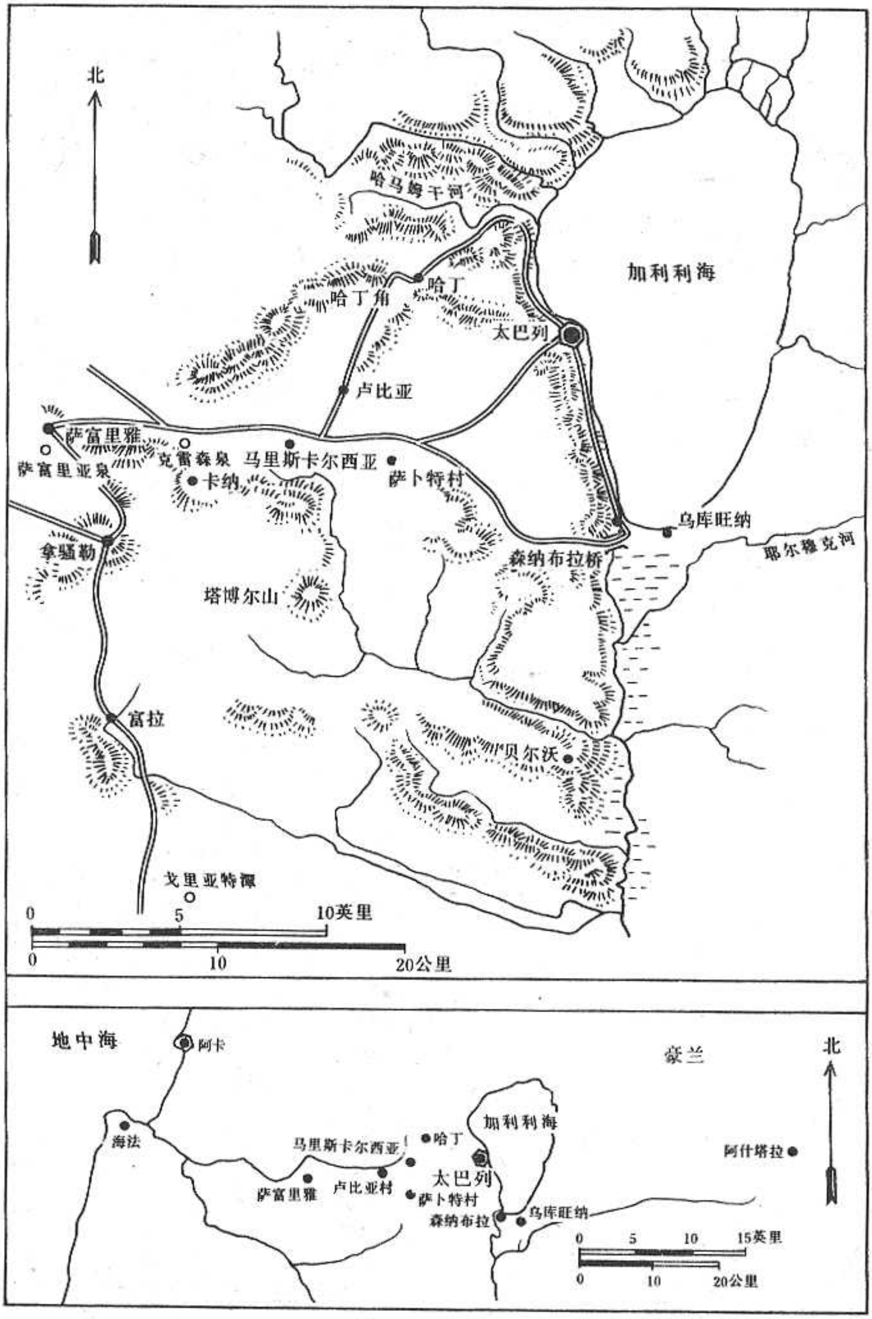



图 09、哈丁之战(1187 年 7 月 4 日)

哈丁之战:1187 年 7 月 4 日

附图 9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 7 年前，即在 1180 年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丁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 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 1 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 15 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 2 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

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注：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

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 1183 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 5 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 1187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

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 4 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

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 15 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

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济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

## 第 06 章、博斯沃思之战(1485 年 8 月 22 日)

爱德华四世 1483 年 4 月 9 日去世时，他的儿子爱德华年仅 12 岁，不过此前他已指定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作为小国王未成年时期的摄政官。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正住在拉德洛，与他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安东尼在一起，而格洛斯特公爵则在英格兰的北部。当时爱德华已经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为妻，但伍德维尔家族声誉不佳，已经很难控制伦敦的咨议会。伍德维尔家族无法阻止理查摄政，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来辖制摄政官的行动。他们很快就把新国王从拉德洛送回到伦敦。

几乎在新国王离开拉德洛的同时，理查离开约克郡，于 4 月 29 日在诺丁汉与他的骑兵队汇合。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们常常带有偏见地将理查描写成一个邪恶残忍的怪物，而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他对他的兄弟非常忠诚，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勇敢的战士。他精明强干，只是在利益面前太好冲动。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雄心勃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他的这一特点在与侄子在米德兰相遇时充分暴露出来：他解散了新国王的威尔士卫队，逮捕了

新国王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同父异母哥哥理查德·格雷爵士以及新国王的侍从托马斯·沃恩爵士(这些人以后均被处死)。在去伦敦的路上，他一再向这位不知所措的孩子表示效忠。他们于5月4日到达伦敦。

理查也许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加冕，但他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在新国王未成年期间的摄政统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一些仇视伍德维尔家族的贵族效忠于他。白金汉公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五个儿子的直系后裔，其野心不亚于理查。起初白金汉公爵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当6月中旬理查开始考虑自登王位时，白金汉公爵设法让年幼的国王“更舒适地住进”伦敦塔。爱德华王后及其一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时，他又陪同理查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说服爱德华王后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她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让他随同他的哥哥住进了伦敦塔。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死在了那里，被害的时间很可能是1483年的秋天。

与此同时，白金汉公爵积极在伦敦为理查登基制造舆论，6月23日他甚至率领一个代表团晋见理查，对他表示效忠，希望他作为理查三世登上王位。新国王如期于7月6日加冕。但是3个月之后，白金汉公爵不知因何缘故(据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强烈的野心)改变主意倒向了伍德维尔家族。他们与玛格丽特·博福特(那时已与斯坦利勋爵结婚)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她为她被流放的儿子亨利·都铎[注：亨利继承王位的希望微乎其微，因为他的血统有点私生的味道。他母亲是爱德华三世之子冈特的约翰(理查二世批准其姓博福特)的重孙女，他的父亲埃德蒙·都铎是欧文·都铎和亨利五世的遗孀凯瑟琳的儿子。]在布列塔尼公爵的支持下率军入侵英国作了准备。他们计划在亨利入侵的同时由白金汉公爵在国内西部地区策动暴乱。亨利确实航行过海了(只是有些延误)，但是他

到达普尔时只剩下了两只船，而且国内暴动已经失败，白金汉公爵已被处决。亨利的入侵计划虽告失败，然而它却告诉理查，与他争夺王位的大有人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的王位变得更加不稳，他到处面临着叛乱。1484 年 4 月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离开了人世，而且据说他的妻子再也不能生育。许多人都赞成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与亨利·都铎的拟议中的婚姻，他们把这看成是结束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争斗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争斗太令人厌烦了。当在法国绑架亨利并把他交给理查的图谋失败后，亨利在英国的追随者更多了。也许当理查获悉长期威胁他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入侵肯定要到 1485 年夏天才会进行时，他多少感到轻松了一些。这一年的 6 月他住进了诺丁汉堡。他在主要公路上每隔 20 英里设一个驿站。通过这驿站他能与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亨利于 8 月 1 日从阿夫勒尔起航。随他同行的有他的叔父牛津勋爵贾斯泊·都铎和一些与他共同流放的骑士，他的舰队满载着大约 2000 名法国雇佣兵。他于 8 月 7 日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的米尔贝登陆，这里是他童年时就了如指掌的地方，好象他的伟大冒险注定要从这里开始似的。他首先向哈弗福德韦斯特、继而又向阿伯里斯特威斯挺进，并于 8 月 10 日到达那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他继续向东部和东北进军，攻下威尔士浦，并于 8 月 15 日占领了什鲁斯伯里。这之后他又占领了纽波特、斯塔福德、利奇菲尔德、塔姆沃思和阿瑟斯通。8 月 20 日他在阿瑟斯通宿营。

亨利离开法国在威尔士登陆，以及他通过威尔士进入英格兰的日期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于两军的作战准备，战斗部署和战斗进程人们却知之不全，甚至对战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人们最近还在争论。目前，这些未知因素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解答，大部分的问题需要靠我们通过对现有

证据的仔细研究和对古战场的缜密考证作出推测。

使大多数人较能接受的两种说法是《克罗伊兰编年史》和波利多尔·弗吉尔的描述。《克罗伊兰编年史》的后续作者(其身份不详)很可能参加了那场战役，但是从他的描写极其简短来判断，他可能所见不多。波利多尔·弗吉尔(一位意大利学者，1510 年加入英国籍)的描述是现存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但此书是 1506 年之后应亨利七世的请求写的，距那次战斗的实际发生有一个时代上的间隔，或许有点偏见。然而尽管弗吉尔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些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的。

在途经威尔士向前进军的过程中，亨利无疑吸收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南方的沃尔特·赫伯特爵士，还是北方的威廉·斯坦利爵士，都没有阻挡他。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内弗尔家族的里斯·阿普·托马斯，他是卡马森郡、彭布罗克郡及卡迪根郡中一个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里斯是一个著名的兰开斯特派的同情者，虽然直到 8 月 13 日亨利到达威尔士浦时，他才带着他的大部队与亨利的部队会合，但几乎可以断定，亨利在远征前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给亨利计划了能防止南面侧攻的进军路线。在什鲁斯伯里，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率领 500 名士兵加入了亨利的队伍。此后，亨利的进军路线主要是服从他争取斯坦利兄弟——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和他的兄弟威廉爵士——的需要。

与此同时，理查的情况如何呢？理查是于 8 月 11 日得知亨利登陆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诺丁汉，更确切地说是在诺丁汉附近的贝斯克伍德洛奇。看来在威尔士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依然忠于他的，因为虽然当时英国有很好的驿站网(不过内地威尔士驿站很可能不这样发达)，但要在 4 天之内骑马跑 200 英里仍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他不久便得知，除了其他人之外，威廉·斯坦利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对其兄弟托马斯

仍抱有一线希望。

理查对亨利轻易而迅速地通过威尔士既吃惊又气恼。在亨利抵达什鲁斯伯里时，他尚未集结起他的全部人马。斯坦利勋爵一直在兰开夏视察他的庄园，东区的诺森伯兰伯爵也行动迟缓。但是，当理查的快速行动部队(骑马侦察兵)向他报告，亨利已到达利奇菲尔德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再在诺丁汉呆下去了，因为叛乱者可能决定直奔伦敦。8 月 19 日，保王派军队(包括那天率领部队刚刚到达的诺森伯兰伯爵)离开诺丁汉开往莱斯特。

亨利从什鲁斯伯里推进到斯塔福德，然后折向东南，经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向阿瑟斯通推进。在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他收集了一些大炮，这些辎重影响了军队的推进速度，而在此之前，他的军队的进军速度本来一直是很快的。在阿瑟斯通，亨利会见了斯坦利兄弟，但此次会晤没有结果。8 月 21 日，理查和亨利的军队都到达了接敌位置。亨利从阿瑟斯通推进到一个叫怀特穆尔斯的地方，这里位于罗马大道以北，距阿瑟斯通 5 英里；而理查则从莱斯特向西开进到了萨顿切尼西北的高地。

国王的营址很可能位于向申顿方向延伸约 1 英里的一个山梁的东北端。这里是山梁的最高点，高达 417 英尺，因此可以使理查对周围大部分地区看得清清楚楚。制高点安比昂山南面的那块地方叫作雷德莫平原(这场战斗最初就叫雷德莫之战)，这场战斗发生时，这里还是一片崎岖不平未曾开垦的土地。山的东面和南面是一大片沼泽地，关于这片沼泽地的大小，多少年来人们的描述有许许多多。它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亨利想要与理查军队厮杀就必须避开的地方；二是斯坦利勋爵及其随从的阵地就设在这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这片地区为东西走向，从萨顿切尼南面不远的地方延伸至安比昂山的西南面，从北到南的平均宽度为 600

码，因此它是保护理查左翼的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

安比昂山的西端距国王设营的地方 1 英里，这里是这片地区最好的作战场所。8 月 22 日早晨，保王派军队很早就拨营向这一阵地进发。部队很可能是成战斗纵队前进和战斗的，诺福克公爵指挥前卫部队走在最前，国王率主力部队紧跟其后，无精打采的诺森伯兰伯爵率领后卫走在最后。关于理查军队的人数，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最高的估计认为有大约 1.2 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太高了，即使加上叛变者和逃兵，国王的军队也到不了 1 万人。诺福克的前卫部队大约有 1200 名弓箭手，他的儿子萨雷勋爵率 200 名胸甲骑兵构成其侧翼。国王的主力部队由钩镰枪手和长矛兵组成，以重骑兵为其两翼。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着大约 2000 名钩镰枪手。理查的大炮可能分配给了诺福克部队南面的左翼部队。

亨利·都铎的军队从法国扬帆过海的时候只有 2000 名法国雇佣兵和少量的流亡伙伴，而他到达怀特穆尔斯的时候，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在开战前不久，由于约翰·萨维奇爵士(威廉·斯坦利的女婿)以及其他重要叛逃者赶来投奔，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即使如此，除斯坦利兄弟外，他的军队总数也不超过 5000 人(斯坦利兄弟大约掌握有 4000 人，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们站到他这一边)。亨利要想获胜就必须得到斯坦利兄弟的合作，然而自从阿瑟斯通会晤之后，直到战役胜利，亨利一直无法与斯坦利兄弟再次会见，每次亨利请求合作，他俩都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他们一直是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

亨利向安比昂山开进的情况大概和理查差不多，也是以骑兵为两翼成战斗纵队前进，牛津勋爵指挥前卫部队，亨利和彭布罗克勋爵(贾斯珀·都铎)率主力跟进。牛津勋爵沿着沼泽地边缘前进，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安比昂山脚下，与在他上面的诺福克公爵的弓箭手相距仅几百码。这样的时

刻一定令人非常不安，但他以令人赞叹的沉着，把他的前卫部队展开成弓箭手在前，钩镰手在后的战斗队形。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在右翼指挥从什罗普郡征来的士兵，约翰·萨维奇爵士在左翼指挥威尔士人。都铎的右侧有沼泽地掩护，但左侧极易受到攻击。

亨利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看来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入侵者一方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牛津勋爵。牛津勋爵打算将手下人全部投入战斗，因此，当战斗刚一开始，牛津勋爵便用大炮猛轰对方。而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一方的弓箭也雨点般地射向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一般说来，先打炮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鼓舞先头部队，激励他们尽量接近敌人，使他们敢于以较为适当的方式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拼杀。然而这次炮击刚开始不久便奇怪地中断了。牛津勋爵害怕在他的整个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被敌包围，便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向前超过他的军旗 10 英尺。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踌躇，起初使诺福克公爵的士兵为之一惊，他们怀疑其中有诈。结果在两军发起进攻之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

战斗持续了大约 2 个小时，它对理查来说是一场背信弃义和损失惨重的悲剧。当诺福克公爵和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进入肉博战，士兵们在挥舞的钢刀、长矛和钩镰下纷纷倒下的时候，双方的主力部队都很快派出了援兵。诺福克公爵是第一个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死对理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两军阵线都开始出现宽大的缺口，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三个人——站在旁边隔岸观火的两个人和近在咫尺的一个人。

诺森伯兰伯爵是第一个表现出背叛意向的人。他率兵前往莱斯特时就极为拖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只要能不参战，他就不参战。当理查在战役的紧要关头急令他

率部参战时，他拒绝执行命令，说他最好留在后面，以防斯坦利兄弟捣乱。事实上，他是在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

然而他不是唯一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的人，理查和亨利・都铎都明白，现在谁胜谁负全掌握在斯坦利兄弟手里。这两位指挥官都知道打不起消耗战，因为，没有斯坦利兄弟的军队，亨利想在兵力上占优势是不可能的；理查则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效仿诺森伯兰伯爵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亨利似乎曾经采取过一系列积极的行动争取斯坦利兄弟参加战斗。威廉・斯坦利的部队离亨利部队的左翼不远，亨利曾在卫士的陪同下打着军旗骑马来到部队左翼，希望这样更容易使威廉・斯坦利集合到他的麾下支持他的事业。

据说理查国王看到亨利的马队在左翼很显眼，易于攻击，便认定不能象他的随从恳求的那样以逃跑求生存，而是应该抓住战机，给这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结束战斗。于是这位高傲而易冲动的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骑着他高大的白马，迅速集合起他的王室成员和卫队（大约不超过 100 人），经过威廉・斯坦利的正前方向安比昂山的西北坡冲击，以期砍倒这位威尔士的篡权者。

这场厮杀真是威武雄壮，在最初的几秒钟里，理查便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将以勇力过人而著称的勇士约翰・切尼爵士砍下了马。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眼看就要达到其既定目标了，可就在此时，亨利的支持者（此时威廉・斯坦利的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进来）把亨利围在了中间保护起来。红色的龙旗又飘扬起来，理查国王被施下马，死于乱刀之下。

理查就这样以传统的中世纪骑士的气概战死在沙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战死沙场的国王。不过，尽管上述描述最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说国王是在讨伐斯坦利

勋爵的背叛时，在他部队的左翼(即现在被称为理查国王井的地方)，落马陷入泥沼而死的。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结果都一样：国王一死，他的追随者便没有理由，或者说再无意志继续战斗，他们似乎已四散逃窜。如果保王派军队死了 1000 人的说法准确的话，那么许多人肯定是死于沼泽地或死于短暂的追杀，因为对于一场仅仅持续了 2 个小时的战斗来说，1000 人的伤亡数字实在太高了。胜利者一方损失最多不超过 2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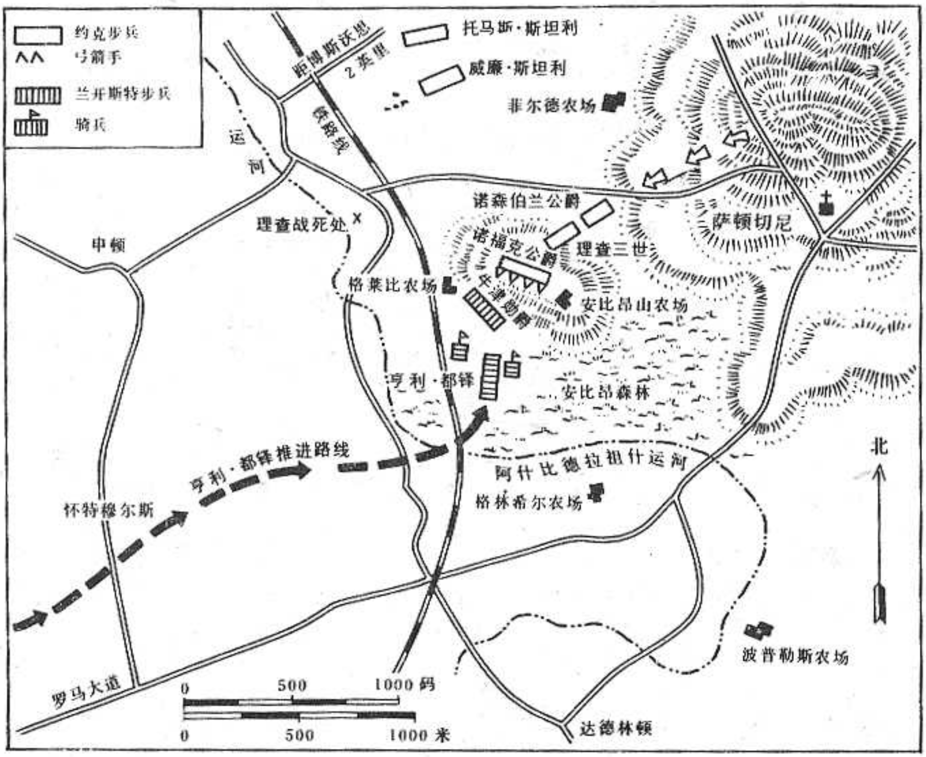
看来斯坦利勋爵没有参战，但他恭维地将理查戴过的王冠戴在了新国王的头上。王冠原戴主的尸体被胜利者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挂在马上，运到了莱斯特，并在这里曝尸两天示众。经过这番羞辱之后，这位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被埋在了方济各会教派的教堂。但即使在那里，他也没有得到永久的安息，因为当博斯沃思之战得胜者的儿子解散修道会的时候，方济各会的教堂遭到了劫掠，理查的坟墓被毁坏，他的尸首被扔进了索尔河。

玫瑰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博斯沃思之战两年后，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的人发动了叛乱，而实际操纵这场叛乱的人是曾经被理查指定为继承人，并且可能参加了博斯沃思之战的林肯伯爵。亨利不得不在 1487 年 6 月 16 日发动斯托克之战镇压这次叛乱。至此玫瑰战争才告结束。但是，正是博斯沃思之战才使英国君主政治史上最辉煌的都铎王朝得以诞生。

图 10、博斯沃思之战(1485 年 8 月 22 日)

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

附图10




军队的背叛是博斯沃思之战中的决定性因素。理查也许没有抓住战机在战役初期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战术打击。如果国王在牛津勋爵心绪不安地将其前卫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和突然停止炮击之时命令他的主力部队全线出击，他很可能迅速取得胜利。当然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容易的，因为敌军就在几百码以外，而且还是在一个小山头上，占有有利的地形。但是战机稍纵即逝。由于我们对战斗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能说采取某个具体行动，或不采取某个具体行动肯定具有决定意义。

亨利的最终胜利是斯坦利兄弟的行为，而不是诺森伯兰伯爵的行为造成的，因为不管斯坦利兄弟倒向哪边，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都会紧跟的。托马斯·斯坦利娶了玛格丽特·博

福特为第二个妻子。博福特原先嫁的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泰迪，即埃德蒙·都铎，她是亨利·都铎的母亲。她与斯坦利的婚姻是纯洁的婚姻，它给了四分五裂的英国人民弥合裂痕的机会，虽然玛格丽特曾参与了与在法国的亨利的秘密谈判，但尚无托马斯·斯坦利参与了谈判的记载。恰恰相反，经过一阵动摇（到伦敦塔的短暂拜访反映了这种动摇）之后，他更加依附于理查，并且作为宫廷总管和王室总务官，经常伺候国王；即使在白金汉暴乱时，尽管玛格丽特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他的忠诚也没有动摇过。

1483 年加冕之后，理查一定认为，既然几乎全国的贵族都表示赞成，他的地位肯定是稳固的。斯坦利也完全有理由为他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国王感到庆幸。但是到了 1485 年春天，理查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这年 3 月，他失去了他忠实的妻子安妮·内维尔的支持，而且一年前，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已离开了人世。这使人们对理查王朝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在威尔士，人们非常同情亨利·都铎，支持他推翻理查。许多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事业而奔走。

按理说，理查应该时刻提防那些从经历上看就很可能会出事的人对他的背叛。他一定清楚这些人中的头一个便是托马斯·斯坦利。诚然，他跟他的兄弟威廉不同，自从爱德华四世在蒂克斯伯里获胜后，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环境，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约克家族。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看风使舵的人，从布卢尔希思到巴尼特，他都是拖拉、搪塞，总是表现得慎之又慎，先赞成这一边，然后又支持另一方。的确，谨慎是托马斯的特点，正象急躁是威廉的特点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托马斯来说，直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斯坦利兄弟靠谨慎、狡诈甚至很不老实的处世方法，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得到发迹。他们总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而且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又总能逃脱背叛的坏名声。

既然理查很清楚斯坦利兄弟不可靠，而且威廉比托马斯更不可靠，他在 1485 年 1 月还让托马斯掌握一支军队就很令人奇怪了。其实他别无他择，在英国，除诺福克家族和诺森伯兰家族之外，最有权势的便是斯坦利家族，没有斯坦利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牢牢地控制往西北部地区。斯坦利勋爵把控制西北部地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和他的兄弟威廉·斯坦利，前者负责兰开夏郡，后者负责柴郡。这样在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威廉·斯坦利就负责守卫英国这片最敏感的地区，以防亨利·都铎可能的入侵。几乎可以肯定，在亨利登陆前不久，威廉·斯坦利便掌握了入侵的详细计划，但是他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行动。

然而，此时理查并没有发觉威廉有意背叛，托马斯表面上也非常忠实于国王。但是到了 7 月，当御前会议在诺丁汉举行时，托马斯请求理查允许他去北部巡视他的庄园，借口是这个地方他几乎有两年没有去了。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请求，毫无疑问其他人强烈要求理查拒绝此请求，因为托马斯蛰居一地闭门不出，他的不忠确定无疑。但是那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儿子将统率他的军队，重要的是理查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显然理查所给予的信任程度太小了，他提出只有托马斯把他的儿子送来顶替他，他才允许他离开。斯坦利这样做了，斯特兰奇勋爵在理查出发前一周到达了北安普敦。

当托马斯请求允许离开国王时，也许他们双方都知道亨利即将入侵，但与亨利顺利到达博斯沃思最有牵连的人是威廉。理查一听到亨利登陆的消息，便向许多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到莱斯特与他会合。但威廉不在此之列(虽然托马斯是其中之一)，因为国王知道他完全明白他在北威尔士应该做些什么。但不幸的是威廉并没有恪尽职守阻截亨利，而是将他的部队带到了临近什鲁斯伯里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军队离亨利的

军队很近，虽然这两人直到 8 月 17 日才在斯塔福德会晤。会晤是简短的，而且就亨利而言是不满意的，因为威廉不准备这么早就作出承诺。

与此同时，托马斯一接到国王要他去莱斯特的命令(此时他可能正在向什鲁斯伯里前进)，便提出了一个不成其为借口的借口，说他正在患盗汗症，而通常患这种病的人是很难启口请假的。大约就在此时，斯特兰奇勋爵因试图逃离诺丁汉城堡而被捕；经审问，他供认其叔父和约翰·萨维奇爵士与此事有牵连，但他拒绝承认其父有背叛的图谋。现在理查至少已对兄弟两人中的一人了解清楚，他立即将其斥责为叛逆，但他对另一人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其儿子就在他的掌握之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波利多尔·弗吉尔记载，8 月 20 日亨利在阿瑟斯通会见了威廉·斯坦利和托马斯·斯坦利，“他们商讨了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如何与理查国王决战的问题……。”这次会晤是友好的，但亨利对会晤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斯坦利兄弟继续支吾搪塞不表示态度。对于托马斯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威廉来说，此时仍犹豫不决是不合情理的。

会晤结束后，亨利仍然留在阿瑟斯通直到他的军队到达，第二天他继续向怀特穆尔斯前进。斯坦利兄弟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过程中的确切位置难以确定。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战斗前夜威廉将他的营帐设在安比昂山北部偏西大约 1 英里处，这个地方距一个叫尼尔科顿的小村庄很近；但是托马斯的营帐设在哪里则不得而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营帐设在战场南部的斯托克戈尔丁—达德林顿地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想参加战斗，沼泽地也使他难以参加战斗。很可能他也在战场的北部地区，距他的兄弟很近。他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何处无关紧要，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他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

假如威廉·斯坦利的军队与托马斯的军队靠得很近的话，从理查的阵地上一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并且他们离亨利的军队也不会很远。战斗打响的那天早晨，理查在离开营地之前给斯坦利勋爵送去最后一道命令，要他立刻与他一起参加战斗，否则他的儿子将被处死。据说斯坦利的回答是他还有别的儿子，他将不与国王一起作战。这也许是真的，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斯特兰奇勋爵并没有死。

在战斗快要打响之前，亨利也给他的继父送去了一封急信，并且据信他得到了多少有点令人鼓舞的回答：他将作好部署等到时机成熟时参加战斗。波利多尔·弗吉尔说亨利“非常焦急”。对托马斯来说时机一直没有成熟。但是就在理查奋力厮杀企图砍倒亨利的时候，或者稍晚一点点的时候，威廉的军队毫无疑问参加了战斗。

托马斯·斯坦利并没有参与把他的继子推上王位的战斗，但他却因等待观望而得到了丰厚的奖赏，他的爵位上升到了伯爵。在亨利加冕时，德比伯爵穿着昂贵的黑貂皮长袍，把国王剑从伦敦塔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是贡献比他大得多的威廉却没有得到如此高的奖赏，他的鲁莽终于使他走向了灭亡。他愚蠢地参与了珀金·沃贝克事件，于 1495 年 2 月被处死。

关于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背叛行径前面已经简要地讲过，这里没有多少要说了。克罗伊兰编年史家写得非常生动和简洁，他写到：“诺森伯兰伯爵带着规模和素质与其身份相符的军队据守在哪里，哪里就看不见敌方的部队，也没有愤怒的交战。”

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部难以使约克家族相信这位伯爵的可靠性的历史，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曾为兰开斯特族作战，分别阵亡在圣奥尔本斯和陶顿。战前理查就很清楚诺森伯兰的忠诚是很靠不住的，因此他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

问题。当国王召唤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说眼下时疫流行，无法从东区召集人马(毫无疑问东区的这些人肯定会忠实地为理查而战)。可见他很可能已经与亨利·都铎有了背叛性的往来。珀西家族在英国东北部很有权势，但是在亨利登陆之前，理查把诺森伯兰伯爵干掉很可能，或者说肯定，是比较明智的。从实际情况看，理查可能十分乐意让他的2000名士兵担任后卫，正象诺森伯兰伯爵天真地所说，这样可以防止斯坦利进攻勤王派军队的翼侧，因为在前方背叛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诺森伯兰伯爵和斯坦利兄弟的背叛对博斯沃思之战的结局有多大影响呢？如果波利多尔·弗吉尔的叙述是确实的，即威廉·斯坦利的军队及时介入搭救亨利，使他未在理查及跟随他疯狂冲击亨利军队翼侧的士兵的刀下丧命，那么无疑是威廉的积极支持和托马斯的消极支持使亨利赢得了胜利。假如理查在威廉的军队参战之前就已被杀死，那么威廉的介入自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在中世纪的战争中，一旦国王或首领被打死，部队通常会树倒猢狲散，正如理查在博斯沃思战死后的情形一样。但是如果理查胜利了，威廉求生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看来可以肯定，当看到战斗的发展不太妙时，威廉及时介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始至终，斯坦利兄弟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因为如果他们与理查一起作战，亨利必败无疑。如果同意这个观点，这就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亨利在登陆之前从斯坦利兄弟那里得到了某种保证的话，那么这种保证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要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和里斯·阿普·托马斯的合作，亨利的冒险行动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一般的看法是，虽然里斯很可能事先作出了许诺，但斯坦利兄弟事先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是也许下面的看法是饶有趣味的：亨利通过玛格丽特·博福特和其他支持者得知，通过威尔士进

军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取得胜利，他还得知斯坦利兄弟对他有好感，并且他们讲道义，乐意为他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诺森伯兰伯爵的背叛一定使理查感到非常恼怒，因为他的背叛彻底破坏了他对战场的指挥。最初的半小时过去之后，战斗处于相持状态。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诺森伯兰伯爵能够奉理查之命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理查完全有可能在斯坦利兄弟还在踌躇之时把亨利的军队彻底打败。勤王派军队有兵多将广和地形有利的良好条件，只有军队内部的背叛才能使他们失败，而诺森伯兰伯爵恰恰在战场上作出了背叛之举。

> 理查国王可能错过了一个战术上击败亨利·都铎的机会，不过这是个一闪而过的机会。博斯沃思之战是一位将领在不了解部下是否忠诚的情况下被迫与敌作战的典型战例。
>
> 战争从来都是失败于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利情况：部队训练差，组织不得力，对高级指挥官缺乏信任，内部有人对统治者怀有敌意，等等。可以说博斯沃思之战失败于这些原因中的最后一个。不过理查统治得并不坏，虽然他害怕背叛，但他又无能为力。出于亨利和理查均无法控制的因素，亨利取得了胜利。

## 第 07 章、内兹比战役(1645 年 4 月至 6 月)

英国内战的爆发有一个漫长曲折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到都铎王朝末年。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方面通货急速膨胀，宗教方面改革很不彻底。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咎于查理国王。但是，他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使形势日趋恶化。从 1629 年起，他抛弃议会，实行独裁统治达 11 年之久。当他最终于 1642 年恢复议会时，又顽固地坚持原有立场，丝毫不肯同议会中的政敌妥协。

1641 年 11 月，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关头，议会以微弱多数

通过了“大抗议书”——一份令查理声誉扫地的诉状。接着，议会又通过了民军法，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权。英国政界逐渐形成两源：保王派和议会派，俗称“骑士党”和“圆颅党”。但在当时，英国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内战非打不可的地步，尽管查理本人竭力想挑起战争。1642 年 1 月，查理亲率 300 名士兵，闯入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企图逮捕带头弹劾王后的 5 名下院议员。由于事先有人通风报信，他们几位乘船从河上逃走。这件事弄得查理狼狈不堪，而他的政敌却因此威望剧增。1 月 10 日，国王偕同王后悄悄溜出了伦敦。

当年夏天，约翰·皮姆促使议会通过了 19 点建议。这些建议经过大量压缩修改，行文简洁，措辞委婉，从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向国王提出了种种要求，实际上是想让国王充当议会的傀儡。查理认为，国王的绝对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决无妥协可言，他不能屈服于议会的压力，答应这样的要求。于是双方只好兵戎相见。1642 年 8 月 22 日，国王在诺丁汉竖起战旗，向议会宣战。国家从此陷入一场令人深恶痛绝的内战之中。

在 1642 年，英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最初，王国的防务主要靠海军(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海军官兵站在议会一边)。国家一旦遭到入侵，就由各要塞守备队和各郡民军出面抵御。民军直接隶属于各郡军事长官，大多数是步兵——滑膛枪手和长矛兵，顾名思义，他们是调来集训的，并非已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中间，除伦敦和康沃尔的民军素质明显较高之外，绝大多数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伦敦的 8000 多名民军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是议会的一支现成的强大力量。此外，他们在伦敦塔附近拥有一座大型军械库。保王派要想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就得夺取一些重要港口以及设防城镇中的武器弹药。但是，他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因为海军已为议会夺取了赫尔港，保王派驻守的多佛堡也已失

守，布里斯托尔和普利茅斯两地均已宣布支持议会。

起初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志愿人员。双方都有现成的兵源，尽管他们多数没有作战经验。不久，国王的侄子鲁珀特亲王和莫里斯亲王带着一些部队和武器弹药从荷兰回到英国，加入了国王的行列。鲁珀特很快成了一名无所畏惧、性情暴烈的骑兵领袖。他血气方刚，恃才傲物，喜欢炫耀自己，甚至连查理身边的一些老顾问和指挥官都不太放在眼里。他很自负，倒也通晓军事，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国王常常以他的意见为基础制定战略。

起初，国王军队的力量非常薄弱，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然而，负责指挥议会军的埃塞克斯伯爵却在伦敦按兵不动，一直等到查理提出挑战差不多 3 个星期后才出来应战。埃塞克斯将军办事慢条斯理，优柔寡断，情报工作也搞得一团糟(虽然后来议会军的侦察工作远远超过了王党军)。结果，他未能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把部队部署到国王盘据的什鲁斯伯里与伦敦的中间地带。10 月 12 日，正当他在伍斯特策划加强英国中部西南两侧的防务时，国王却离开什鲁斯伯里，从他身边溜了过去。内战的头一仗是场小规模的骑兵战，发生在伍斯特南边的波伊克布里奇。鲁珀特亲王击败了埃塞克斯主力的先头骑兵部队。

1642 年 10 月 23 日，双方在埃奇丘陵打了第一场大仗。两军鏖战 3 个多小时未决出胜负。然而，王党军终于迫使议会军撤退，让出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在这次战斗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首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发动了毫无控制的骑兵冲锋，它既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又带有极大的危险性。

查理优柔寡断的个性这时典型地显露出来。鲁珀特曾请求查理允准他率领 3000 轻骑直捣伦敦，有理由相信，他这样做是会成功的。然而，国王对于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还是设法与议会寻求和解，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埃塞克斯勋爵率部回

到首都后才决定向伦敦进军。到 11 月份，王党军在特思哈姆格林发现通往伦敦的道路已被 2.4 万议会军封锁。于是查理不得不把部队撤到雷丁。从此他再也未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到达离伦敦这样近的地方。

1643 年，在英国西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发生过一些战斗，相比之下规模都不大。在西南部，王党军表现出色，捷报频传：1 月在康沃尔地区赢得了布拉多克高地的胜利，5 月在斯特拉顿又打了一次胜仗。2 个月后王党军的两位将军，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比维尔·格林维尔爵士，在巴思附近的兰斯当击败了议会军中的一流将军威廉·沃勒爵士。但是，在这场战斗中王党军伤亡惨重。骁勇善战的比维尔爵士在临近胜利时阵亡。他的牺牲对国王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不久，霍普顿也在一次炮弹爆炸中被炸成重伤。尽管如此，王党军在莫里斯亲王和威尔莫特勋爵指挥下，还是取得了节节胜利。7 月 13 日，王党军在朗德威高地一仗中获胜。月底，莫里斯亲王攻占了布里斯托尔。9 月，埃克塞特向莫里斯亲王投降。

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以及稍远的北部地区，王党军也取得了累累战果。尤其是 6 月份在阿德瓦尔顿荒原，纽卡斯尔勋爵大败费尔法克斯勋爵及其儿子托马斯爵士，使王党军占据了整个西赖丁地区。因此，1643 年他们的士兵在纽伯里摆开阵势准备迎战埃塞克斯勋爵时，显得非常自信。这是 1643 年中规模最大的一仗。只要他们能把埃塞克斯的部队彻底歼灭，最后胜利恐怕就属于他们了。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在城西的那场混战中，炮兵扮演了重要角色。炮兵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比在内战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斗中都大。最后双方谁也没有取得明显胜利。但是埃塞克斯迫使国王退出了战场，打开了通往伦敦之路。所以桂冠主要归埃塞克斯。

1644 年是以王党军在南特威奇的失败开始的。随后在 3 月份“圆颅党”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沃勒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切

里顿击败了福思勋爵和霍普顿勋爵共同指挥的部队。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但是1644年，最重要的一次战斗发生在马斯顿荒原。7月2日晚，鲁珀特亲王向曼彻斯特伯爵和利文伯爵指挥的议会—苏格兰联军发起进攻。当时联军把约克城围得水泄不通。战斗中一会儿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会儿是天空晴朗，一轮明月。结果王党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丢掉了北方。

马斯顿荒原之战使王党军遭受了重大挫折。然而，在9月份，国王和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在康沃尔的洛斯特威西尔智胜埃塞克斯勋爵，使其部队遭到惨败。他们从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国王在回师牛津途中，走到纽伯里时，发现一支部队挡住了去路。这是曼彻斯特勋爵指挥的部队，人数大大超过国王的部队。但是第二次纽伯里战斗。双方打了个平手。最后王党军还是穿过该地到了牛津。

在1645年6月之前(即内兹比战役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主要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在苏格兰，蒙特罗斯伯爵取得显赫的战绩；二是在英格兰，议会派创建了新模范军。到1644年底，蒙特罗斯击溃了三支盟约军中的两支。1645年2月，他在弗洛奇打败了坎贝尔的宗族部队，接着又连胜两仗(5月9日在奥尔德恩，6月2日在奥尔福德)。从战术上讲，这两仗打得都非常漂亮。新模范军是我们正规军的前身。它是为把分散的力量组合成高效率的作战机器所作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议会派靠它打赢了内兹比战役。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这一点也值得在此对新模范军特别提几句。

新模范军最后确定的编制为：11个骑兵团(每团600人)，12个步兵团(每团1200人)和1000名龙骑兵；此外还配有一支强大的炮队，装备有德米卡弗林中型火炮和萨克小炮。起初，这支部队打算用埃塞克斯、沃勒和曼彻斯特的部队改编。可是他们力量不足，提供不了那么多兵员。骑兵问题不大，

因为志愿参加骑兵的人很多。但是步兵尚缺 7000 多人。在伦敦和东南各郡也没有征够所要求的数额。到 4 月份，这支部队投入战斗时，编制上尚缺 4000 人。虽说一两个月后补足了缺额，但补上的这些人既未受过军事训练，又不懂纪律。

当时议会两院曾就由谁来指挥这支精锐部队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上院倾向于从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两人中选择，而下院则提名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来担任统帅。费尔法克斯是一名职业军人，战功卓著，而且从不介入政治斗争。1645 年 1 月 21 日，费尔法克斯终于被正式任命为该军统帅，然而几乎过了 6 个月之后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才允许他在战场上实施全权指挥，不受节制。菲利普·斯基庞被任命为步兵少将兼参谋长。

此时各项职务基本任命完毕，唯独骑兵中将一职暂时空缺。到这支军队参战时，议会颁布了“自我约束法”[注：它是议会在 1645 年 4 月通过的一项措施，即不允许上、下两院中任何一名议员担任政府公职或军事指挥官，旨在撤换不称职的高级官员。]。这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任命造成了麻烦。克伦威尔显然是最佳人选。不过议会还是很快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使这位最杰出的战士摆脱了羁绊。到 6 月份，议会正式任命他为骑兵中将。

到 4 月底，新模范军仍未满员，但议会认为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行动了。议会把马西将军、波因茨将军和利文伯爵的 3 支部队分别派到西部、北部和边境地区。可是苏格兰人不愿朝南走得太远，因为蒙特罗斯正在他们的家乡大肆骚扰盟约军。国王在牛津驻有一支部队，他本人在牛津一直住到 5 月初。国王另有一支部队在西南地区，由戈林勋爵和雷普顿勋爵指挥。查理·杰勒德爵士指挥的是一支由可以召之即来的威尔士人组成的庞大队伍。这样，第一次内战的决定性战役的舞台已经搭好。这是一场迪格比勋爵称之为“成败在此

一举”的战斗。

当时新模范军仍然缺编，而且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然而议会还是决定派费尔法克斯率领 1.1 万名官兵前去救援汤顿。国王那时由于得到了来自西部的戈林勋爵骑兵的增援，力量顿时大增，于是在 5 月 7 日离开了牛津。这使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惊恐万状。他们急忙命令尚在布兰福德的费尔法克斯派 5 个团去汤顿，他本人赶紧带领其余人马返回。这可是天赐良机。王党军可以在费尔法克斯与驻扎在牛律地区的克伦威尔部会师之前切断前者的退路，随后再将他们各个击破。

5 月 8 日，国王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会上讨论了两项建议：一是挥师西进，进攻费尔法克斯；二是设法救援(受到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围攻的)切斯特，然后打败苏格兰人，夺回整个北部地区。开会时他们还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奉命分兵，所以要西进就得出动大量部队。另外他们了解到苏格兰军队已陷入困境，而切斯特因有海路可通爱尔兰，地位极其重要。于是鲁珀特亲王和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强烈主张挥师北上，尽管他俩出发点各不相同。其他人则赞成进攻费尔法克斯，趁新模范军尚未部署停当打它个措手不及。最后国王采取了折中办法：由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挥师北上，由戈林率领其骑兵返回西部——这正中戈林下怀，他本不愿意受制于人。这种折中方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戈林走后，国王身边仅留下大约 3000 名骑兵和 5000 名步兵。他在向北挺进时把所有能集中的守备部队都集中起来，以加强他那薄弱的力量。议会方面决定包围牛津。但是查理国王并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拨转马头返回牛津。国王认为牛津城粮秣充足，固若金汤，不用担心。然而，他对失去戈林开始感到后悔。他意识到，没有戈林几乎就没有可能击败费尔法克斯。于是他命令戈林立即率领他“能动员的所有

人马”向马基特哈伯勒进发。戈林根本不打算服从国王的命令，找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加以推托。查尔斯·杰勒德爵士也接到了国王要他把部队带往马基特哈伯勒的命令。

王党军抵达马基特德雷顿时听到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布里尔顿已经撤走了包围切斯特的军队。现已不必匆忙北上。国王决定转向东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一起夺取莱斯特。攻打莱斯特是在夜间。经过短时间的激战，鲁珀特亲王攻克该城，然后无端地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卑鄙的屠杀。攻占莱斯特后，王党军内部再次出现意见分歧。迪格比勋爵和一些人主张向牛津进发，击败费尔法克斯。而鲁珀特认为，目前兵力不足，等增援部队来后再说，而且费尔法克斯肯定会尾随而来。在这两点上，鲁珀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最后决定向达文特里进军。6 月 7 日，王党军抵达该地，并在此停留 6 天，目的是搜罗大批牛羊送往牛律。为了护送这些牛羊，他们出动 1200 名骑兵。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那时国王和鲁珀特亲王想必都已获悉牛津城已经解围，他们绝不应花那么多时间和兵力干这种事情。他们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天，结果主动权落到了费尔法克斯手里。费尔法克斯终于在杰勒德的威尔士士兵和其他援军尚未到来之前紧紧咬住了王党军。

6 月 5 日，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前去袭击博斯塔尔豪斯，但没有成功，转而向纽波特伯格内尔以北推进，到达斯托尼斯特拉福特。途中，弗默依登团与他会合，使其实力增加到 1.3 万人左右。因此，与国王相比，他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费尔法克斯在斯托尼斯特拉福特一直停留到 6 月 11 日。在此期间，他把团改编成旅并让指挥官熟悉战斗序列。他还紧急派人去克伦威尔处，令他率领骑兵前来会合。当时克伦威尔正忙着为东部联盟招兵买马。随后，费尔法克斯率部朝北安普敦方向机动。在快接近北安普敦时，部队折向西行，朝基

斯林波里进发。他知道王党军目前正在达文特里地区。

在内兹比战役打响之前那段时间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议会军的情报保障工作做得比王党军好得多。议会军的指挥官和伦敦的两王国联合委员会能够迅速得知王党军的调动情况(虽然他们并不总是能正确解释那些调动)，而查理国王和鲁珀特亲王却常常不知道费尔法克斯的位置。王党军在巴勒山遭到偷袭一事就是明证。当时情况确实很危险。查理正在福斯莱公园狩猎，鲁珀特也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其巡逻队竟然同他的前哨接上了火，王党军分散在各处毫无准备。幸好天色已晚，费尔法克斯无法再对王党军发动进攻。

鲁珀特亲王希望在援军到来之前避免交战，国王也赞同这个意见。因此他们从巴勒出发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去向严加保密。他们向马基特哈伯勒前进，准备进军贝尔沃堡，但是没有成功。6 月 13 日凌晨，议会军侦察队总负责人沃森送来了有关王党军撤退的消息。与此同时，戈林的一封信被截获。费尔法克斯从中得知戈林的军队还在汤顿城前，因此不必担心这支部队。6 月 13 日夜，费尔法克斯在吉尔德斯伯勒扎营驻宿并派出巡逻队前去盯住敌人。巡逻队在内兹比抓了对方几名后卫人员。

13 日午夜，国王在马基特哈伯勒召开御前会议。大家担心，敌人已近在眼前，如果进一步撤退，势必会影响士气，于是决定战斗。鲁珀特对此虽持保留态度(他仍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现在作战为时尚早)，但是决定既已作出，他只好在 14 日凌晨把部队沿着从东法恩登到大奥克桑登的高地一线展开。这里居高临下，在此地实施防御，等着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前来进攻，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当天日出时，“圆颅党”军队抵达内兹比岭。上午 8 时左右，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策马前去侦察地形，想选择一处最佳阵地。当时还不能肯定王党军是否会停下来进行战斗、

两位将军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选择一处可能促使王党军冒险发动攻击的阵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克伦威尔建议选择米尔山一带的高地，他认为这块高地似乎比他们目前所占据的内兹比东北的有利地形更为合适，因为后者前面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沼泽地。费尔法克斯表示同意。他令军队开进阵地，开始将他们部署在前山坡上，但后来又把他们撤到背面的山坡上，或许是考虑到新兵处在敌人视野之外心里会踏实一些。直到王党军向前推进时，议会军才从山背后冲出迎战。

上午 7 时 30 分在东法恩登岭，鲁珀特亲王派侦察队长去侦察敌人阵地。但是鲁斯回来说没有新情况，其原因难以理解(尽管它可能反映出王党军的侦察工作十分薄弱)。鲁珀特只好亲自出马。他很快发现了敌军此时正向最后阵地机动，当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不会认为敌人是在撤退。但是他又是一位进攻精神极强的人，难以抗拒机会的诱惑，他想趁此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一面派传令官向国王汇报，要求国王火速把兵调上来；一面继续骑马勘察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鲁珀特选择的阵地在杜斯特山的山梁上。军队进入阵地后分三线部署。第一线，久经沙场的名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率步兵居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居右，兰代尔的部队居左。第二线是霍华德上校的步兵，骑兵中队夹在步兵团中间。第三线为预备队，共 1300 人，由国王的近卫骑兵、鲁珀特亲王的步兵和国王的骑兵卫队组成。总共有骑兵 4280 人，步兵 3900 人。

在杜斯特山以南半英里处平行驻扎着费尔法克斯的部队，共计 1.46 万人，其中骑兵 7200 人，步兵 6400 人，奥凯上校指挥的龙骑兵 1000 人。他们成二线配置，中央为斯基庞少将的步兵，右翼为克伦威尔的骑兵，左翼为艾尔顿上校的骑兵。最左翼是一片称为萨尔比树篱的茂密的灌木丛，克伦威尔将

它选为左翼屏障，并令奥凯的龙骑兵下马沿树篱布防。

上午 11 时左右，战斗开始了；王党军稳步向前推进。整个战线几乎同时打响。在东侧，克伦威尔挥兵迎战正朝这边冲来的兰代尔部。北方骑兵只有 1700 人，数量上居于劣势，根本不是克伦威尔骑兵的对手，何况克伦威尔的部队还占了下坡的便宜。北方骑兵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被驱赶到鲁珀特的预备队的位置。当对方败局已定时，克伦威尔非常明智地命令手下的 2 个团钳制兰代尔的部队，防止他们重新集结，同时调集其余兵力，准备迎接最后阶段的决战。克伦威尔这一指挥策略与鲁珀特那种一味冲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路，阿斯特利的部队与“圆颅党”的步兵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前者作战经验丰富，后者新兵居多。阿斯特利部队经过艰苦的白刃战之后，冲破对方第一道防线，迫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后来又未得到骑兵支援，他们自己反倒成了瓮中之鳖。对王党军右翼采取的作战行动也许至关重要，它可能对战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至少可以肯定它对阿斯特利步兵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鲁珀特亲王实际上是王党军的统帅，尽管他发现国王越来越相信自身的军事才能，并且很想亲自掌握战场指挥权。尽管如此，作为统帅的鲁珀特亲王无论如何不该亲自带领骑兵冲锋，应该把骑兵交给莫里斯亲王去指挥，自己掌管战役的全局。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如果骑兵要发起冲锋，他是非亲自参加不可的。他率领两路骑兵去迎战艾尔顿部，混战一场后，穷追不舍，结果跑出了战场范围。

鲁珀特的部队向前推进，必然会遭到埋伏在萨尔比树篱内的奥凯部队交叉火力的射击，从而可能稍微加快了向前推进的速度。实际上奥凯的龙骑兵并没有击中对方多少骑兵。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一翼，双方骑兵在距离对方不远的地方都

收住了脚步。相视一两分钟后，鲁珀特首先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激战了半个小时。刚开始艾尔顿略占上风，他右翼的两个骑兵中队突破了正面的王党军骑兵部队，可是中路的骑兵中队未能发起冲锋。最左翼的“圆颅党”骑兵则被对方打得落荒而逃。

这时，鲁珀特带着他能聚集起来的全部骑兵飞奔着离开了战场，去追赶艾尔顿的部队，一直追到距内兹比 1 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收住缰绳。在那里他们与“圆颅党”辎重部队遭遇，受到了该部护卫队的猛烈攻击，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待鲁珀特把打散的骑兵收拢来，拨转马头返回战场时，他的马队已无力投入战斗，而且无论如何现在也为时太晚了。留在战场上的王党军步兵遭到了克伦威尔骑兵和艾尔顿余部的左右夹攻，同时奥凯的龙骑兵现在也重新跃上战马。王党军步兵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在庞大的俘虏队伍中数他们的人最多。

鲁珀特亲王回到国王和预备队那里(预备队多数没有投入战斗，如果鲁珀特在场全面指挥的话，他们是应当投入战斗的)。鲁珀特与国王作了部署，准备应付正在重新组织以便发起最后冲击夺取胜利的敌人。但是议会军并没有发起最后冲击，因为只需奥凯的龙骑兵一阵排枪就足以解决问题了。虽然王党军的军官仍竭尽全力企图稳住阵脚，但士兵们再也招架不住，纷纷逃离战场。追击大体上是有节制的，但仍追出了 12 英里。追击中杀死了不少人。在这次战役中，议会军方面损失不大，约有 180 人阵亡。王党军方面在战斗中损失了大约 450 人，后来遭议会军追击时又有 350 人丧生。另外，所有的给养都落到了胜利者之手。议会军还缴获了装有国王私人书信的文件箱，其中有国王与王后之间的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一些信件。

第一次国内战争在内兹比战役之后又拖了一年。然而内兹

比战役已敲响了国王军事机器的丧钟。因为王党军虽然被打死的不多，但是有 5000 名官兵被俘，其中有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军官。国王再也无力征集一支部队到战场上与新模范军一决雌雄了。被一支人数比自己几乎多一倍的军队打败或许不算丢脸，况且，敌人赢得也并不轻松。但是必然会有许多王党分子在悲怆之中认真地思考那些对他们的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图 11、内兹比战役(1645 年 4 月至 6 月)

内兹比战役：1645年4月至6月

附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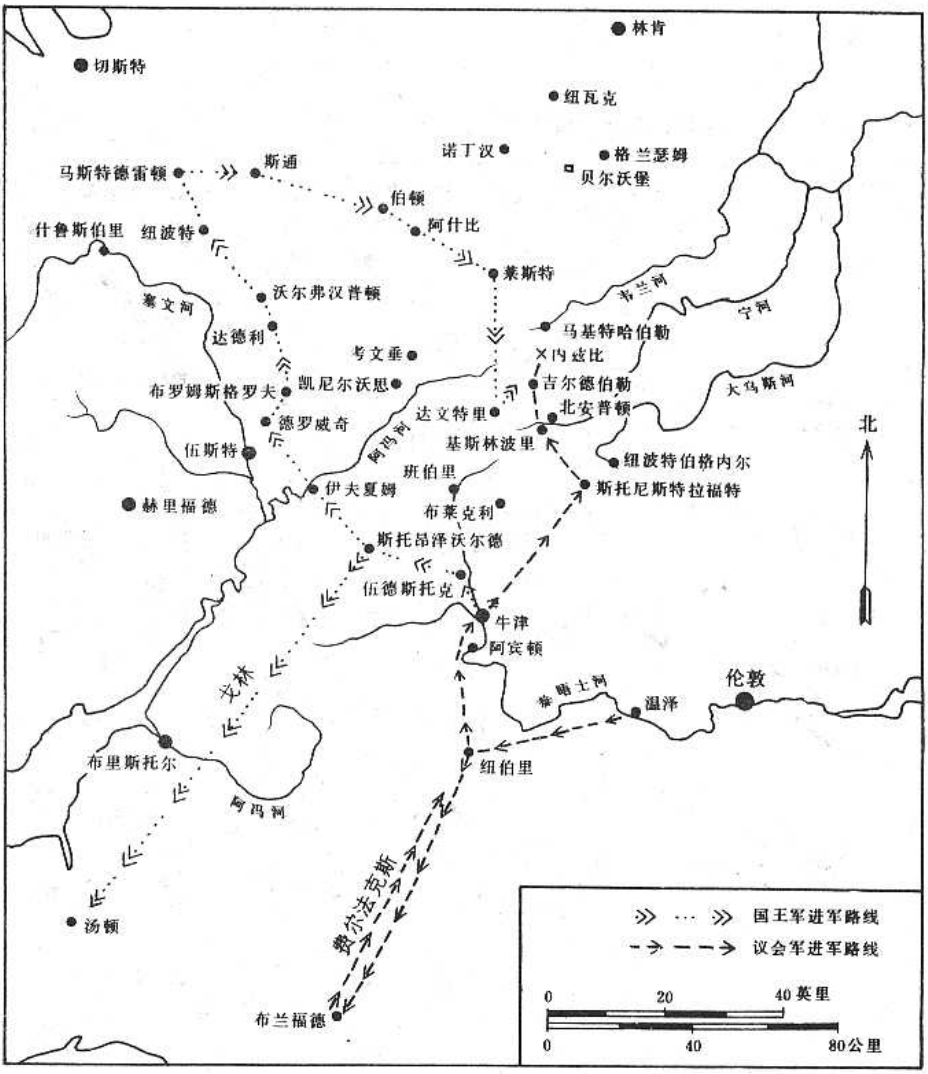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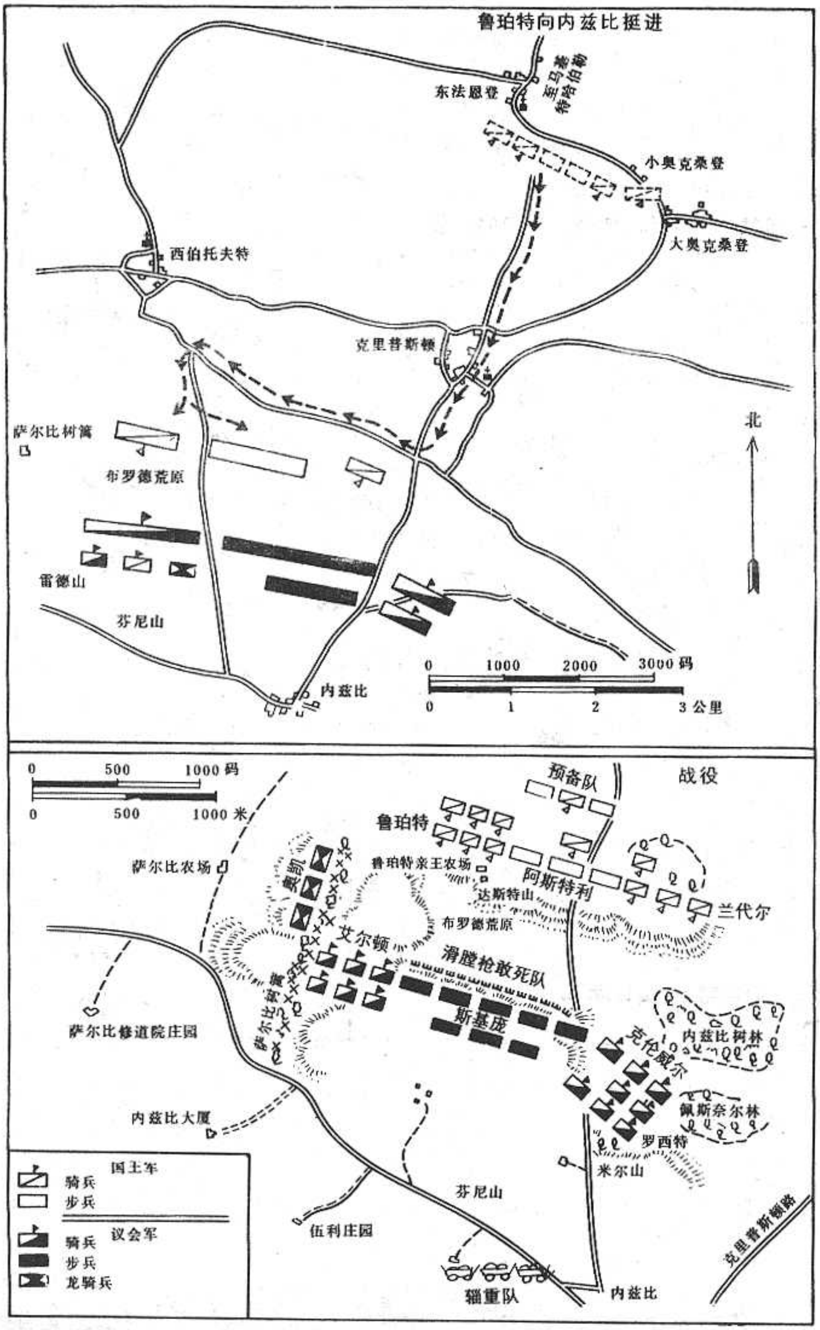



图12、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4日)

内兹比战役：1645年6月14日

附图12



有些仗本来是决不应该打的，内兹比战役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党军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优柔寡断，办事拖沓，盲目调和，这不可能不导致一场灾难。在1645年4月，或许保王派可以迫使议会向查理国王提出能为他所接受的条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戈林是取得立即成功的关键，倘若他到牛津与国王会合，他们必定能把新模范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模范军有一半正在西部来回运动，而且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如果国王把戈林的部队置于自己指挥之下，以后再将杰勒德的部队也纳入统一指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夺回整个北部地区是不成问题的。那样的话，国王的境遇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在斯托昂泽沃尔德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又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徒劳地迂回运动，最后查理不得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决战。

双方一旦交战，兵力较强，指挥得力的一方，可能获胜。费尔法克斯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官，克伦威尔指挥骑兵的艺术非常高超(仅克伦威尔亲临战场这一点所起的作用就等于把他带到战场上的600名骑兵的作用提高一倍)。阿斯特利的步兵虽然英勇善战，但由于没有骑兵支援，无法与斯基庞的人马抗衡。鲁珀特亲王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导致国王失败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鲁珀特的错误在于决定放弃东法思登—大奥克桑登这块易守难攻的防御阵地；此外在战斗紧要关头，他的骑兵离开了战场，这也是他的责任。

6月13日夜，王党军正在马基特哈伯勒。国王对是否应当向北进发又犹豫不决起来(虽然鲁珀特仍主张北上)。当时立即执行的计划是向贝尔沃进军，把兵力从纽瓦克收回来。但在当天夜里他们又得到消息，说费尔法克斯的军队离他们只有 6 英里。正在附近的卢伯纳姆睡觉的国王被人叫了起来。

在随即举行的会议上，迪格比和其他一些人竭力敦促国王命令部队停下来迎战。他们的论点是：敌人已近在咫尺，进一步后撤必然会给人以败退的印象，这样会挫伤士气。鲁珀特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劣势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无疑是极不明智的。可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马基特哈伯勒周围的地势起伏不平，几乎没有树林，但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山岭之间的地带有些即使在夏季也是沼泽地。在马基特哈伯勒以南大约 2 英里的地方(正好在东法恩登南边)有一山梁，它向东延伸，恰好穿过小奥克桑登。这是一处很好的天然防御阵地。雅各布·阿斯特利非常欣赏这块地方，选它作为步兵阵地。部队在这里待命等待敌人越过泥泞难行的地段朝这里进攻。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兵力的不足。诚然，侧翼都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可是若想迂回包抄这一阵地，就得沿相当陡峭的山坡朝上冲。

前面已经提到，6 月 14 日上午 8 时左右，鲁珀特亲自策马前去侦察，他看到敌人正朝着他们最后选定的阵地运动。当初他对用劣势兵力去对付强大的敌人颇有顾虑，但这时他似乎象一匹身经百战的老马嗅到了战斗气息后急不可耐地四蹄乱扒一样，一切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马上派人回去传令，命令部队开往他新选择的阵地。这阵地恰好与“圆颅党”部队在米尔山地区选择的阵地相一致。

鲁珀特在作这个决定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推测而已。他对防御战历来不屑一顾，或许他认为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在他认为不适当的时间开战，那么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应是敌人立足未稳之时(他本人绝不会认为议会军当时是在后撤)。如果是这样，他心里必然清楚，他至少要用 2 个小时才能使部队进入作战阵地，而费尔法克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能把一切准备就绪。

令人费解的是王党军居然决定孤注一掷，向明显占优势的

敌人发动进攻。鲁珀特或许打不赢防御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可以把部队基本完整地带离战场，相机再战。后来的情况更是糟糕。发起进攻后，如果能及时得到骑兵的适当支援，他那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还是有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可是，由于鲁珀特的骑兵轻举妄动，而克伦威尔的骑兵则沉着坚定，这就使王党军步兵在勇气、训练和纪律方面的长处未能发挥作用。

王党军在穿越布罗德荒原时是稳步推进的，右翼的骑兵略微在前。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战斗几乎是同时打响的。鲁珀特手下有两名主要指挥官，一位是他的兄弟莫里斯亲王，另一位是北安普敦伯爵。他在一线部署了约 850 名骑兵，在二线(或者说预备队)部署了 880 名骑兵(分为 5 队，每队约 100 至 200 人)。鲁珀特共拥有骑兵 1730 人，大大少于亨利·艾尔顿用来对付他的 5 个团的兵力。

有些材料说，骑兵战开始时，鲁珀特的骑兵是一溜小跑向前推进的，由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们的推进很快就变成了轻松的追杀。但事实上，战斗只是在开始时停顿了一下(当时艾尔顿的某些骑兵团表现出短暂的迟疑)，然后两军便激烈地厮杀起来。艾尔顿是一名骁勇的军人，但不是杰出的指挥官。作为骑兵指挥官，他与鲁珀特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他本人率领的那个团在抗击两位亲王的猛烈进攻时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他犯了一个错误，掉转马头去支援步兵，使议会军左翼的巴特勒上校完全失去保护。当鲁珀特命令北安普敦勋爵把二线部队调上来后，巴特勒上校的团就招架不住了，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与艾尔顿部的一些骑兵一起被逐出了战场。鲁珀特差不多出动了手下所有骑兵对其穷追不舍。另外，据从战场发给下院议长的报告称，同艾尔顿的骑兵一起溃逃的还有 1000 多名步兵。

步兵战斗对鲁珀特在右翼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战斗打

响前，费尔法克斯把部队(敢死队除外)撤往后山坡阵地。当王党军逼近时，他们刚爬过山顶，时间只允许他们在投掷长矛之前用滑膛枪齐射一次。议会军虽然占有人多地利的优势，可是他们的一些部队，尤其是斯基庞手下的某些团，缺乏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圆颅党”军队右翼的费尔法克斯团坚守了阵地(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激战)，但斯基庞的人马很快乱作一团。艾尔顿部剩下的部分骑兵临时来支援他们。但是当战斗正激烈进行，斯基庞试图稳住部队时，他自己被对方击中。他的部下因此失去了斗志。不久王党军把他们赶到了预备队所在处。还有不少胆怯者纷纷逃命。虽然他们的军官身先士卒并竭力维持部队，但也无济于事。形势十分危急，艾尔顿本人也挂了彩，还一度成了对方的俘虏。费尔法克斯的左翼被突破了，中央也陷入混乱。双方人员后来都曾公开说，如果鲁珀特的骑兵当时在场的话，王党军必定会赢得胜利。

在“圆颅党”军队的右翼，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对抗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的骑兵的作战中指挥若定。克伦威尔人马所在的山坡遍地都是野兔洞穴，骑兵下山十分不便。首先与敌人交锋的是左边的惠利团。双方在近距离用手枪对射一阵之后，便拔刀拼杀起来。克伦威尔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于是便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击兰代尔的左侧。王党军的中路和右侧都遭到强大的压力，左侧则被对方包围，不得不向后撤退，整支部队立即成鸟兽散。克伦威尔牢牢控制着手下人马，他留下 4 支骑兵去追击敌人，命令其余部队攻向阿斯特利暴露的侧翼。就在此时，奥凯从萨尔比树篱那边出现，他的龙骑兵跨上战马从另一侧向王党军发动了攻击。

王党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而且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那时国王还掌握着预备队。他依然象往常那样勇武，准备冲在近卫骑兵的前面，率领预备队决一死战。可是苏格

兰的卡恩沃思伯爵把他的坐骑朝后一拉，大喊一声："你想去送死吗？"光荣的机会就此丧失。与此同时，国王的步兵已被对方压垮，大多弃械投降，虽然也有一些部队，如乔治·莱尔爵士的"蓝衣团"，仍在坚持战斗，直至阵亡。

在上述情况发生时，鲁珀特部队的具体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离开战场所造成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他手下的部分骑兵或许在追击艾尔顿部时追出了内兹比。无疑，他们在路上进行了抢劫，结果耽误了集结。他们还与"圆颅党"的辎重护卫队发生过短暂冲突。然而，关键是当他们最后回到战场时，王党军的败局已定。这时鲁珀特已无能为力，只好去与遭到惨败的国王会合了。

把克伦威尔与鲁珀特二人的表现作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首先，很难再找到象他们那样截然不同的人物。但是作为骑兵指挥官，鲁珀特确实比克伦威尔逊色多了。克伦威尔象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骑兵统帅古斯塔夫二世一样深深懂得，对于打仗来说，冷静筹划和掌握好战斗进程是最可贵的用兵之道，不能象鲁珀特——或者说后来的卡迪根——那样只知道一味冲杀。一味冲杀虽然使战争惊心动魄，但很少能使战争获得胜利。

或许把鲁珀特的用兵方法与克伦威尔的用兵方法相比较同样有点不大公平，因为后者在兵力上占有优势(3600 对 1700)，在攻击中有兵可分，而鲁珀特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鲁珀特在击溃了议会军左翼后，假若没有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本可以留下 2 个团去追击敌人，用其余人马来对付当时没有骑兵掩护又受到强大压力濒于崩溃的"圆颅党"步兵。如果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打赢这一仗。

在这次战役中存在着许多决定性因素，如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御前会议上决定分兵，此后戈林不服从命令．鲁珀特放弃有利防线，后来又长时间离开战场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

个因素反其道而行之，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内兹比战役不同于博斯沃思战役。博斯沃思战役的胜负在战前难以完全预料，而内兹比战役则不同，在战前就可以完全肯定。实际上，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但是，两军交战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指挥。王党军中没有一人能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相匹敌，他们的指挥是分散的。鲁珀特亲王实际上从国王手中接管了指挥大权。然而国王是统帅，而且绝不仅仅是挂名统帅。指挥分散常常会酿成灾难。这次战役中，鲁珀特试图指挥一半骑兵和整个战役，这种现象或许就是因为缺乏集中指挥所造成的。他本人不是一位称职的将军，这一点在内兹比或许比在其他战役中暴露得更加充分。

第 08 章、洛伊滕战役(1757 年 12 月 5 日)

1740 年 5 月 31 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普鲁士王位。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提高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位，使之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德意志诸侯。老国王给儿子留下了一支 8 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他的忠臣和密友，德绍的利奥彼德亲王(陆军元帅)的严格监督下，在波茨坦练兵场上训练出来的。但是，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给普鲁士军队注入了充满生机的、不朽的精神。他身处逆境时的勇气、他旺盛的精力和他对战略战术的精通，使他锻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欧洲第一流的军队。

弗里德里希能在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肯向自己的错误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进攻心理最强的将领之一。他十分信赖火炮，同时又重视机动性，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使用马挽炮的人。他的意图是，通过快速机动的火炮，随时掌握有压制敌人炮兵连的火炮，并以近距离火力支援，为冲锋铺平道路。当然，他不可能总是如愿以

偿，但是，在洛伊滕，机动炮兵连在普鲁士步兵向村庄发起进攻时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援。

然而，弗里德里希之所以在与他同时代乃至历代的将领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是一位骑兵指挥官。他对骑兵的装备、战术和骑术进行了广泛而重大的改革。他所继承的骑兵部队由骑重装马匹的重装骑手组成，他们以笨重的小跑接敌，成一线展开发射武器。他很快地改变了这一切。

他首次指挥作战是 1741 年在莫尔维茨。在那次会战中，他的步兵把部队从失败中解救出来。会战后，他清楚地认识到，骑兵与步兵紧密混编是无益的。他禁止将火器安置在马上使用(侧卫和骑哨除外)，主张以骑兵手持马刀有控制地冲锋。他期望他的骑兵能够在崎岖地段冲锋 1 英里，最后 800 码疾速飞驰。个人和编队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训练是弗里德里希成功的奥秘。他拥有一批一流的骑兵指挥官，赛德利茨将军和德里森将军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在弗里德里希或他的将军指挥的 22 次主要战役中，可以说其中的 15 次是骑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制约着弗里德里希的战略战术。尽管他极大地扩充了其父传给他的军队，但是在战争中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几乎总是劣于对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的士兵有许多是外国人(在 1750 年，他有 13.2 万人，其中 5 万名是外国人)，这就难以避免开小差的现象。然而，他往往能够以高超的战术克服人数的不足。弗里德里希在《军事教令》中有一条著名的格言："使你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安全，尽力破坏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战争准则。"他经常调整战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正是在努力寻找破坏强敌侧翼的新方法的过程中，他发明了著名的"斜击"战术。在洛伊滕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斜击"战术的艺术已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这位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克服的其他制约因素是：财政困难，(这不允许他的军队长时间在战场作战)、情报不足(直到骑兵部队合理改编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后勤问题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高贵的普鲁士军官们习惯于在作战行动中携带大量辎重以及粮秣运输困难。这使普军不能远离基地作战)。因此，普鲁士军队很少远距离追击敌人。弗里德里希的战略通常是短促地突入敌方领土，把敌人打垮和破坏敌交通线。

1740 年 12 月，弗里德里希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入侵西里西亚。根据 5 年以后的《德累斯顿条约》，他似乎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但是，他终生卷进了一场与奥地利王室的战斗中，而且得到了一个无耻的阴谋家和残忍的侵略者的恶名。玛利亚·特里莎对丢失西里西亚十分沮丧，整个欧洲以极大的畏惧注视着这个来自柏林的身如闪电的人物。弗里德里希实现自己的野心只是个时机问题。当 1756 年“七年战争”席卷大半个欧洲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就绪。他率领 6 万军队侵入中立的萨克森(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很快就打垮了奥古斯特选帝侯的军队。战败的士兵后来穿上普鲁士军服，为弗里德里希打仗。

整个 1757 年，即实施洛伊滕战役的这一年，普鲁士军队连连陷入困境。除了能从指挥汉诺威军队的坎伯兰公爵那里得到一点靠不住的援助外，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单独与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和瑞典的军队战斗。的确，他能够内线作战，但是，由于至多只有大约 20 万人，而所面临的是由 50 多万人形成的钢铁般的包围圈，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拿出他所有的军事才华，否则普鲁士将被从地图上抹掉。然而，弗里德里希不能无处不在，他或他的指挥官们很少能集中 4 万人以上的部队去对抗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军队难免会有挫折。在布拉格血战

中，弗里德里希勉强躲过了失败，而科林一仗，普鲁士人却没有逃脱灾难，贝沃恩公爵没能解救施韦德尼茨之围，结果，那里拥有 6000 人和 180 门炮的驻军被迫投降。接着，贝沃恩公爵又在布雷斯劳打了败仗。但在罗斯巴赫，弗里德里希于 11 月 5 日赢得了对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他在罗斯巴赫稍事休整后便又继续前进。他率领 1.4 万人从莱比锡开到帕尔西维茨，其间 170 英里，用了 15 天时间。

11 月 28 日，弗里德里希到达帕尔西维茨。得知贝沃恩公爵的军队在布雷斯劳战败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这支部队的余部到帕尔西维茨与自己会合，并把它交由齐滕将军指挥。但即使在两军会合后，弗里德里希也只能集中 2.4 万名步兵(48 个营)，1.2 万名骑兵(128 个中队)和 167 门炮(其中重炮 71 门)。弗里德里希知道奥军兵力很可能两倍于已，但在洛伊滕战役中他几乎没使用任何外国雇佣兵。在普鲁士士兵中间，他有一群坚定、果敢的人作后盾，他们绝不亚于其他的欧洲人。尽管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取得了胜利，但形势对普鲁士人仍很不利。然而，弗里德里希从不绝望，他召集其部将，用激动人心的演说激励士气。12 月 4 日，普军继续向诺伊马克特开进。

在这个小镇，弗里德里希发现了 1000 名克罗地亚士兵，他们挡住了他的前卫部队，后又企图沿这个小镇靠近布雷斯劳的一侧逃跑。普鲁士骑兵冲入他们当中，杀死了 300 人，俘获 600 人。更为重要的是，一座完整的战地面包房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是奥地利人难以承受的损失。普军从那里得到了许多必需的食品。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从俘虏口中获得了有关敌军位置的重要情报。

奥地利军队有 84 个步兵营，144 个骑兵中队和 210 门炮；奥军的准确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会比 8 万人的数字相差很远。洛林的查尔斯亲王，即玛利亚·特里莎的小叔子，任

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在战场上的纪录不佳，因而不可能建立起自信。1742 年在乔图西茨、1745 年在霍恩弗里德贝格和索尔、1757 中在布拉格，他都战败了。他只在布雷斯劳对付一个弱小的对手时才部分地洗刷了自己的耻辱。查尔斯身边有科林战役的胜利者道恩元帅，但是他宁愿听鲁齐兹将军的奉承，也不听从这位元帅的忠告。他率领奥军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出发，去占领一个新的阵地。虽然这个新的阵地很坚固，但奥军的行动却使弗里德里希的进攻行动变得容易多了。过了不久，当弗里德里希眺望奥军阵地时，他对布伦兹维克的弗朗西斯说："狐狸爬出了洞穴，看我怎么教训它。"尽管普军数量上居于劣势，他的将军们也还有疑虑，但他仍决定出击。

奥地利人由从布雷斯劳西面渡过的罗赫河的后面出发，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前去占领可控制这一地区的主要道路(该道路从诺伊马克特通往布雷斯劳)的阵地。他们的右翼是位于道路以北大约 2 英里的尼培恩村。在那里，鲁齐兹伯爵统领 8 个营在无法通行的泥炭沼泽地后面扎营坚守。他们的左翼原来只延伸到尼培恩以南约 4 英里处的洛伊滕，但是在战斗开始前，查尔斯亲王命令纳达斯提将军把他的部队南移至撒格舒兹村。这一侧尽管不如鲁齐兹的那一侧安全，但也被沼泽地保护起来。奥军阵地前方的地形微起伏，有一两个小高地和一个较大的高地，这个较大的高地位于波尔诺村，奥军的诺斯蒂茨将军指挥的 5 个团战前曾占领了这一高地。弗里德里希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因为这里是他在和平时期最喜欢用于进行军事演习的地方。拿下波尔诺村后，他又占有了一个甚至更大的优势，因为拿下这个前沿阵地后，普军的接敌行动受到了地形的掩护。

12 月 5 日凌晨 5 时，普鲁士军队从诺伊马克特以四路纵队

行进。当他们到达波尔诺村时，天依然未放亮，此外，冷雾也遮敝了他们的行动。部署在大道两边的诺斯蒂茨将军的 3 个萨克森龙骑兵团和 2 个轻骑兵团遭到普军的突然袭击。在寒冷、暗淡的黎明，普鲁士骑兵冲向奥军正面和翼侧。敌方骑兵旋风般的冲击使萨克森人魂飞魄散，他们跟着自己的指挥官诺斯蒂茨仓皇败退到尼培恩村。诺斯蒂茨受了致命伤，600 名奥军士兵落人了普军之手。弗里德里希命令他的骑兵进行了有限的追击。

当他的其他部队逼近波尔诺时，弗里德里希策马登上那个主要高地。由于晨雾已经消散，从那里他能够看到奥军的整个部署。奥军现在成两线配置。因为纳达斯提的军队虽在此之前曾形成了第三条防线，但这时他的部队已调整其左翼，使之从洛伊腾延伸到撒格舒兹附近的骑兵驻防地。在这一翼支援骑兵的步兵团是符腾堡、匈牙利、巴伐利亚的军队——他们中没有一个团是可以信赖的。弗里德里希十分清楚，险情难测的沼泽地使得敌人的右翼难以攻破，但其左翼却有被迂回包抄的某种机会，尽管敌左翼防线位于令人讨厌的泥淖地。因此他判定，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对敌人左翼和左翼中心实施攻击，尤其要猛击左翼末端和撒格舒兹与洛伊滕之间的要点。

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普军计划从波尔诺以 4 路纵队前进，随时准备冲击敌人的防线。前卫部队的 3 个营和拥有 10 门 12 磅重炮的 1 个炮连，由韦德尔将军指挥；右翼部队(稍稍提前行动)的 43 个骑兵中队和德绍的莫里斯亲王率领的 6 个营由齐腾指挥；其余的步兵部队为左翼，由雷佐夫将军指挥，其翼侧由德里森将军统辖的 40 个骑兵中队掩护；后卫部队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普军的南下行动未被奥军察觉。道恩显然对形势缺乏了解，他认定弗里德里希的目标是要切断奥军在波希米亚的交

通线，所以普军已经溜走了。但是右翼的鲁齐兹没有这种错觉，因为他能够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一些骑兵。这些骑兵是弗里德里希为了欺骗对方而留在波尔诺的山丘上的。鲁齐兹不但认为普军肯定会发动进攻，而且认为进攻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他立即请求增援。起初这一要求被拒绝，但是经再三请求，查尔斯亲王终于同意从战线中部抽调一些预备队，从左翼抽调一些骑兵去增援他。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准备展开一个典型的“斜击”队形攻击查尔斯亲王的左翼时，奥军左翼的一部分和预备队的很大一部分却远在 4 英里之外。

普鲁士军队能够在他们的意图被发现以前充分地接近攻击目标。午后不久，韦德尔的几个营在骑兵和 10 门 12 磅重炮支援下，成梯队前进到罗贝亭兹和撒格舒兹之间。这时轮到纳达斯提发出救援的叫喊了，但为时已晚，因为下午 1 时，韦德尔的部队正在分割其左翼。作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韦德尔的主力营向纳达斯提的防线右翼迂回。为穿过沼泽和森林，他们不仅绕过他的翼侧，而且绕到防线上被“放弃”的一翼的背后。在那里，他们冲入一个炮兵阵地，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军队赶往洛伊滕，并抓了 2000 名俘虏。

同时，莫里斯亲王迅速占领了撒格费兹那边的坡地，朝普军前卫部队方向驱赶敌人。而齐滕则指挥他的骑兵设法通过沼泽地，进攻纳达斯提。纳达斯提的部队被击溃，纷纷逃往战线后面约 2 英里的拉特纳尔森林。奥军左翼防线被攻破，但由于炮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得到右翼的增援，奥军又试图在葛特劳后面重整旗鼓，建立新防线。但是形势的发展迫使查尔斯逐步放弃新防线。他很快被敌人包围(在这一局部，奥军在数量上远少于普军)，整个防线再次被迫后移。大炮被安全撤至洛伊滕。少量德意志军队仍然不顾倾泄而来的弹丸和铁片勇敢冲锋，但是他们很快被淹没在战场的硝烟和残杀之中。

这一切更多地是偶然结果而非事先计划，因为奥地利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现在混乱不堪，使得下达命令和接受指令都极其困难。整个战线横转 75 度，形成了新的态势。战线的支点在洛伊滕的中央。鲁齐兹朝西南方向转，而纳达斯提被迫北移。由于洛伊滕提供了坚固的天然屏障，奥军炮兵又配置良好，两军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分胜负。

正是在这个时刻，弗里德里希调来了他的左翼部队。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怎么同敌人交火。他们行进到洛伊滕后遭到奥地利炮兵的猛烈射击。尽管洛伊滕拥挤不堪，尸横遍地，但奥军仍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弗里德里希配置在布特贝格高地的重炮的炮火准确有效，近卫军异常勇敢地向洛伊滕发起猛攻．以操练时一样的准确性打击防守的奥军。普军重炮的配合和近卫军的坚决进击在此时此地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胜利还未到来。

这时仍未与敌交火的鲁齐兹的部队，如果包抄普军战线的翼侧，奥军本来是可以围歼普军的。下午 4 时许，鲁齐兹率部发起进攻，但地形再次欺骗了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从他的左翼抽调 4 个骑兵中队防备奥军的翼侧包围，并把它交由德里森将军指挥。而拉达克斯多夫和洛伊滕之间较高的地势使奥军没能发现德里森的这支骑兵部队。德里森在来自布特贝格高地的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攻击。拜罗伊特龙骑兵冲击正面和翼侧，普特卡默尔的轻骑兵冲向后方，鲁齐兹的部队大部被歼，他本人也被击毙。接着，德里森迂回攻击敌后方的步兵。

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奥地利军队受到重创，趋于瓦解，但还没有彻底溃败。他们企图在萨拉—里萨轴线上建立第二条防线，顶住普鲁士人的猛烈进攻，进行最后一搏。但是这条战线还没形成就扭曲、崩溃了。在普鲁士骑兵的追击下，整个奥军部队仓皇后退，经施韦德尼茨河上的 4 座桥溃逃。洛

伊滕之战，奥军伤亡约 1 万人，2.1 万人被俘，116 门大炮被缴。普军共伤亡 6250 人，其中阵亡 1141 人。这是普军的一个巨大胜利。弗里德里希后来曾说，要是白昼再延长两个小时，洛伊滕战役就可能成为那个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普军在这场漫长而悲惨的战争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 1760 年的利格尼茨和托尔高之战的胜利，但无疑，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运用战术和计谋最为成功的一次。拿破仑曾说过："这次战役是运动、机动的决断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伟大将领的行列。"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洛伊滕之战的胜利确保了普鲁士的生存，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在拿破仑入侵的黑暗岁月中，当国土被恐惧和凶兆笼罩的时候，正是这种民族的统一增强了人民的力量。

图 13、洛伊滕战役(1757 年 12 月 5 日的东欧)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的东欧 附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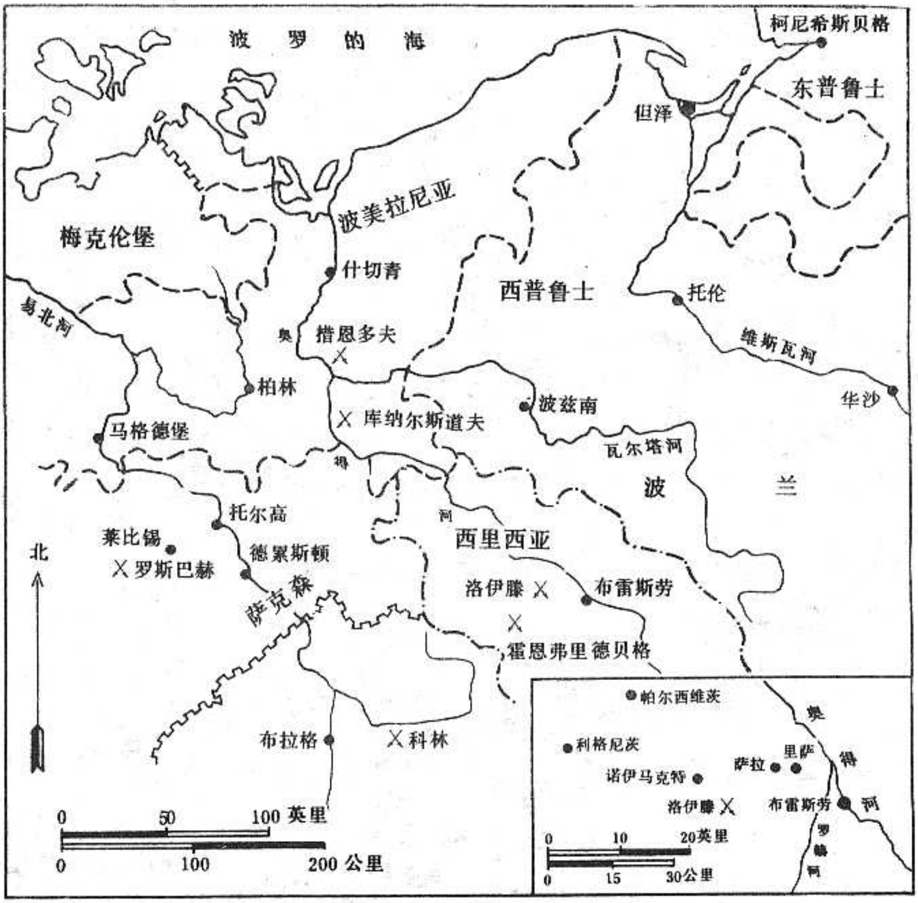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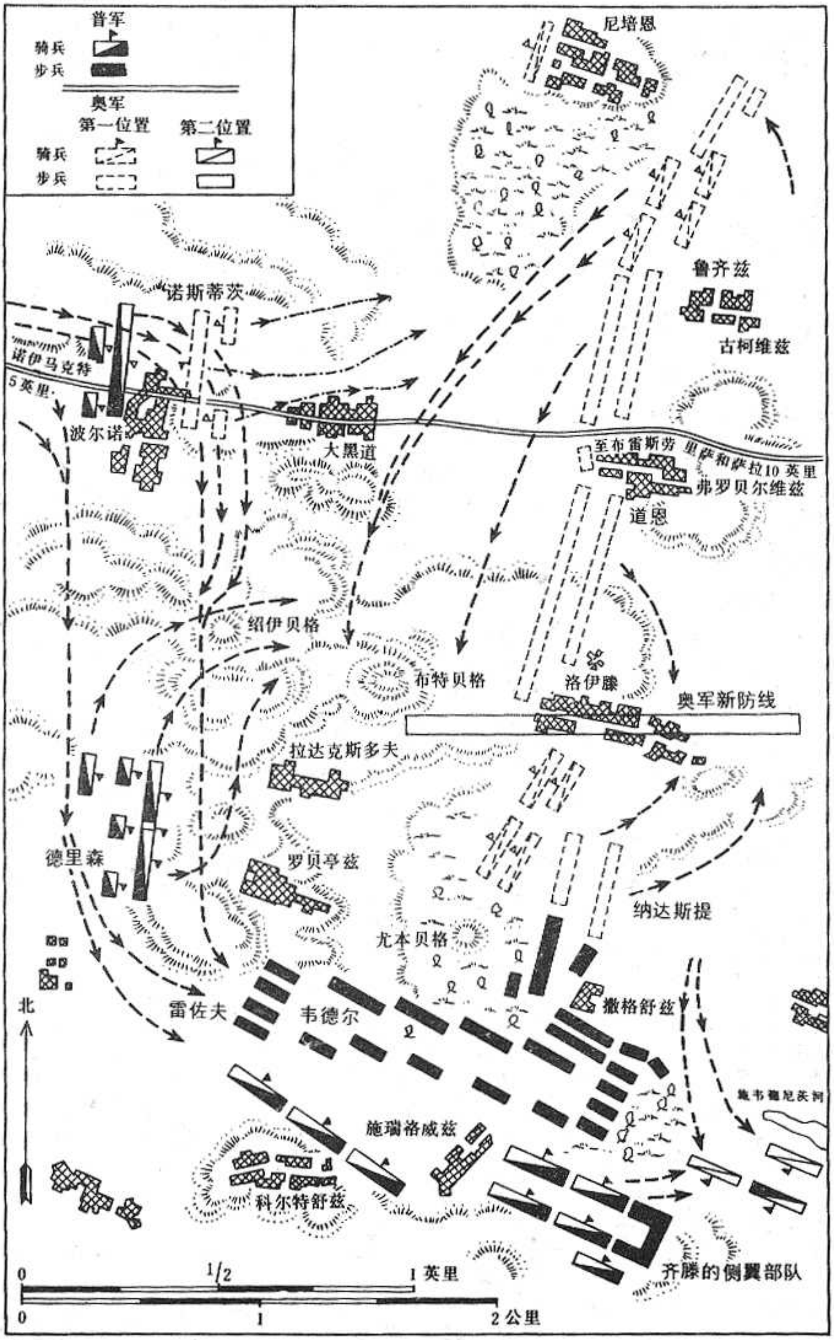



图 14、洛伊滕战役(1757 年 12 月 5 日)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　　附图14



在这场十分重要的战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对“斜击”战术的出色运用。由于查尔斯亲王的无能，弗里德里希的成功来得更为容易。查尔斯亲王在这次战役中犯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错误。

查尔斯亲王在布雷斯劳打败贝沃恩公爵之前，就知道普鲁士国王将率领大约 1.4 万人的部队进犯西里西亚。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帕尔西维茨和利格尼茨一线截住弗里德里希，因为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普军(至少占 6 比 1 的优势)。而且，他还可以凭借人员和火炮的压倒优势，在他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作战。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弗里德里希与贝沃恩兵合一处。查尔斯亲王为什么要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它虽是一条小河，但是有些河段两岸十分陡峭，而且它周围的土地在 12 月份呈沼泽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凭借着数量上的优势，查尔斯亲王本来应当派遣一支部队从上游越过小河，在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试图渡河时，对普军的翼侧构成巨大的威胁。

假若弗里德里希真的决心冒险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打一仗的话，查尔斯选择上述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他自己取胜，然而他忽视了这两个明显的选择。查尔斯为什么不再前进得远一些，去牢牢占领罗贝亭兹、撒格舒兹和波尔诺地区的所有山坡地呢？那样不是可以使弗里德里希丧失在隐蔽条件下实施机动所需的广阔空间吗？在查尔斯忽视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策略，使弗里德里希能够实施他的翼侧攻击之后，他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调动自己的整个右翼去攻击普军的左翼。奥军如果迅速果断地这样做，就有可能严重破坏“斜击”战术的完美实施。

普军 1742 年 3 月的《军事教令》涉及到了骑兵，从中可以看到“斜击”战术的雏形。但是，人们不知道弗里德里希

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把它用于实战，也不知这一思想是否真的出自这位普鲁士君主。有人说它是公元前 4 世纪埃帕米农达特别喜爱的战术，后被历代伟大将领模仿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这种策略使 18 世纪的线式战术达到了顶锋。他在洛伊滕战役之前至少有 3 次运用过“斜击”战术(也许 1745 年在霍思弗里德贝格是第一次)，但是只有洛伊滕战役这一次被认为是最完美的。

“斜击”战术的原则十分简单，但是只有在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官卓有才干时才能实行。甚至作战计划也必须是灵活的，指挥官要准备在最后一刻随机应变。弗里德里希设计的这种战术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脆弱的翼侧或后方，这样就使他那支相对弱小的军队在局部取得优势；其次要能够尽最大可能控制整个作战行动。在 18 世纪的战争中，后者是不易达到的。由于展开成斜形攻击队形，一旦部队投入战斗，统帅就会失去对进攻部队的直接控制。但是“被放弃的”一翼的骑兵(缺乏机动力的步兵是另一回事)却能够在必要时对命令的任何变化作出反应。

由于总是比敌人弱小，能展开的正面也较小，普鲁士军队易受翼侧攻击，并难以对敌实施翼侧攻击。“斜击”战术旨在克服这个弱点。为了使这种战法取得成功，必须以夜行军或精心的欺骗，或通过隐蔽的途径，掩盖作战企图，然后依靠气势和速度实现意图，否则，敌人就有时间去增援受威胁的一翼，整个作战行动就可能归于失败。

为了对攻击点施加最大的压力，加强进攻一翼(在洛伊滕战役中为右翼)是必要的。然而，另一翼会遇到困难，因为开始时它是“被放弃的”一翼，它希望得到成梯形展开的进攻一翼的支援。这一翼通常展开成一条长而浅的作战线，主要任务是把敌人吸引在固定的阵地上。假如这一翼在战斗中不起作用，敌人就能够把兵力转移到受威胁的一翼。但是另一

方面，如果这一翼打得过狠，战役的总目标也无法实现。

很明显，进攻角度的正确、作战时机与阶段的恰当，要求有很高的技巧，而且难以把握。进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而且确实需要对攻击目标进行细微调整。但是，假如主攻方向的首次攻击失利，那么再组织和发起攻击常常是不可能的。对“斜形攻击队形”可以视情况作一些调整，例如在洛伊滕，对敌攻击线为对角线，而在库纳尔斯道夫(两年以后的一场灾难)攻击线是垂直的；但是把一翼“放弃”给敌人和加强进攻一翼的原则仍然不能违反。

“斜击”战术看上去很简单，但假如忽视其原则，它很容易误入歧途。在洛伊滕战役之前 6 个月的科林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科林战役中，普军的接敌运动完全暴露在敌面前，进攻一翼的指挥官没有得到有力的加强，而“被遗弃的”一翼的指挥官却以过大的力量与敌交战，结果导致进攻的失败。但是在洛伊滕，快速运动、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和坚决打击这些成功的诀窍被严格坚持，整个作战行动得到完美的实施，这使弗里德里希取得了大捷。

> 洛伊滕战役是本书所例举的战争胜负仅仅由是否谙熟军事技巧来决定的唯一战例。弗里德里希完全能够被一个有能力的对手(不必是一个卓越的对手)击败，但是，一旦脱离危险，他的无可置疑的军事才华便使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 第 09 章、萨拉托加战役(1777 年)

七年战争于 1763 年结束。这场战争使大英帝国扩大了海外商业市场和领土。但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愿仅仅成为一个海外投资场所，他们开始要求实行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对于这种愿望乔治三世及其英国议会既不同情，也不理解。他们认为，帝制就意味着效忠和服从。在以后的 12 年里，由于几任英国首席财政大臣浑噩昏庸，实行错误的财政

立法，某些善意又被殖民地人民误解，加之英国政府极其愚蠢地企图用高压手段扭转历史车轮，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人民怨声载道。

当时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总督的盖奇将军，曾经警告过国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将会导致战争，但是政府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新英格兰人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盖奇奉命于 1775 年 4 月派兵前往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艾兰镇压暴乱。在列克星敦，叛乱者——这是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重创了他的部队。虽然盖奇将军 6 月在邦克山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部队(总共不过 6000 人)损失了 1000 多人，而美洲人损失不到 500 人。1776 年 3 月，英国人感到坚守不住阵地，因而不得不撤出波士顿。殖民地人民对取得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不再抱希望，于是在这年 7 月 4 日宣布独立。

早在 1775 年 5 月，一些美洲人在富有感召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的领导下，就曾袭击过提康德罗加的英国驻军，并且攻占了城堡，缴获了一批重炮。这年冬天，斯凯勒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道攻打驻加拿大的卡尔顿将军的部队，差点儿占领了魁北克。1776 年 5 月，约翰·伯戈因将军率英国和德国雇佣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加拿大，他同时带来了沿哈得孙河南下与沿哈得孙河北上的威廉·豪将军(那时他已经接替盖奇的职务)的部队会合的计划。那年秋天，卡尔顿曾试图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他只到达尚普兰湖边的克朗波因特。他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提康德罗加。

伯戈因(他于 1776 年 12 月返回英国)认为卡尔顿的行为是怯懦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于次年 2 月向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从加拿大出兵作战的考虑》的文件。简单地说，这份文件建议在克朗波因特集中 8000 英军、

2000 加拿大人和 1000 多“野蛮人”(即红印第安人)以及一支炮兵辎重部队和水兵部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先到提康德罗加，然后沿哈得孙河南下到奥尔巴尼，而豪将军将派一支部队沿哈得孙河北上。与此同时，一支牵制部队从奥斯威戈出发，然后沿莫霍克河而下，到奥尔巴尼与主力部队会合。

伯戈因在他的《考虑》中说得十分明白，加拿大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与豪将军的部队会合，这样，在攻下奥尔巴尼并打通通往纽约的交通线后，豪将军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他的部队全部投向南方作战。鉴于豪将军未予合作，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得到国王和杰曼批准的这一计划，从战略上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占领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一线后，英军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与其他各殖民地的联系，遏制并进而征服他们，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南方各殖民地——如果那时他们仍然掌握有武装的话。这一计划还充分利用了几乎畅通无阻的水路(只在乔治堡中断一小段距离)，以解决从提康德罗加到奥尔巴尼的运输问题。

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豪将军也从美洲向杰曼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计划。杰曼于 1776 年 11 月 30 日收到了他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分三路，从加拿大、纽约和罗得艾兰，向前推进，为此豪将军需要 1.5 万多人的部队。但是 3 个星期后，当豪将军感到他不可能得到这么多部队时，他便把计划改成了给北路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但主攻方向指向费城。杰曼 1777 年 2 月 23 日收到这一改变了的计划。后来豪再次改变计划，说“除了向南进攻，和偶尔向哈得孙河方向派点牵制部队以外”，他已经放弃了一切远征的想法，还说他将通过海路运兵，从南面向费城进攻。

直到 5 月 8 日，伦敦才收到豪将军的最后计划，而此时伯戈因(他已受命指挥北方军队)已经带着他自己的经过批准的计划到达加拿大。豪的最后计划是最糟的选择，因为它意味

着豪的部队要从华盛顿和哈得孙河下游之间撤走。尽管如此，国王和殖民大臣杰曼还是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不管豪如何考虑，“都要及时与奉命从加拿大出发南下的军队合作”。这是豪所接到的关于援助北方军队的最明确的命令。可是直到 8 月 25 日他才收到这封信，而此时伯戈因已经驻扎在靠近萨拉托加的哈得孙河一带，等待豪对他的支援。

伯戈因是在蒙特利尔集中部队的。他是个文雅、风趣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极为勇敢。他在欧洲服役 7 年，职衔颇高，表现甚佳。他非常注重对官兵的训练，一直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指挥官。在战役之初，他统辖英军 7 个团和德国雇佣军 8 个团，后者由巴龙·冯·里德泽尔少将直接指挥。英军总兵力，包括 411 名炮兵在内，共 4488 人；德国雇佣军共 4699 人。在斯基恩斯博罗还有 148 名加拿大人、500 名印第安人和 682 名托利党人(效忠派分子)加入了这支军队。另外，还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以上各团中抽出投弹手和轻步兵连，组成一支精锐部队。从留在加拿大作卫戍部队的 3 个团中抽出来的轻步兵连也加入了这支精锐部队。印第安人就是爱寻衅滋事，否则他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总共约有 9000 名印第安人士兵，其中有些是坚韧顽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正规兵。另外还有一支由 30 条火力强大的武装船只组成的舰队和一些陆路运输用的马车。

由圣莱杰上校指挥的牵制部队启程前往莫霍克河谷不几天，6 月 20 日，伯戈因的军队及其舰队便向提康德罗加进发。提康德罗加要塞由圣克莱尔将军指挥，守军兵力不足，大约只有 2500 人。伯戈因预计一定会有一场令人生畏的攻坚战，因此，带去了一个数量可观的炮兵辎重队(提康德罗加之战后，许多大炮都丢下了[注：人们批评伯戈因带着那么多的火炮行军，但是，参加这次战役的那些人的大量证词说明，带走的大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口径上讲都是必要的。])。但

是他遇到的抵抗不大。7 月 6 日，英军就攻克了这一要塞。

攻克提康德罗加，意义并不重大，但是提康德罗加在伯戈因的后方，伯戈因不能让对方占据它。伯戈因不失时机地命令追击。不知什么原因，圣克莱尔在撤退时在哈伯德顿留下 2 个团等待他的后卫部队。这两个团遭到迅速赶来的西蒙·弗雷泽将军的投弹手和轻步兵营以及随后赶到的里德泽尔的德国雇佣军的袭击。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伯戈因的部队伤亡 174 人，美国部队则伤亡 166 人，被俘 228 人。美国人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善战，给伯戈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以前，他一直错误地低估了他们。

8 月 16 日在佛蒙特州(该州新设立不久)的一个小地方本宁顿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伯戈因更深切地感到了美国人的英勇善战。哈伯德顿之战结束后，圣克莱尔的部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该部退而加入了驻扎在爱德华堡的斯凯勒将军(他指挥美国军队的北方军)的部队。伯戈因为等给养，不得不在斯基恩斯搏罗耽搁两个星期——他的整个战役就是输在给养问题上——但是，他还是于 7 月 24 日出发，在全部被美国人设置了路障的小路上向爱德华堡前进了 23 英里。他把重炮和物资首先运到提康德罗加，然后再用船将它们沿乔治湖运到他所在的乔治堡[注：人们常常批评伯戈因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运送他的全部军队，但是他决定军队步行也是有充分理由的。]。7 月 30 日，他的军队到达爱德华堡，此时，斯凯勒已放弃了这个地方，撤到斯蒂尔沃特的防御阵地。伯戈因虽然在部队数量和士气上仍占有优势，但他的时间紧迫，因为他的给养已非常短缺。正因为如此，伯戈因产生了袭击佛蒙特州的想法。然而，这一想法却招致了灾难。

一段时期以来，冯·里德泽尔将军一直在催促伯戈因购买马匹。装备他的龙骑兵。由于穿着马靴行军，他的龙骑兵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因为如此，当一惯乐观的菲利普·斯基

恩(效忠派头子，伯戈因的政治谋士，家住斯基恩斯博罗)对伯戈因说，在康涅狄格河谷能收罗到效忠分子、马匹和给养，而且可能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时，伯戈因便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鲍姆中校带领的小部队。不过，进行这样一种冒险活动，这支部队人数太少了。

鲍姆很快了解到，本宁顿(据说在那儿可以找到马匹)并不象告诉他的那样由 400 名民兵把守，而是由一支 1500 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把守，其指挥官名叫约翰·斯塔克，是一位极其能干的新英格兰人。鲍姆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伯戈因于 8 月 15 日派布雷曼中校率增援部队前去支援。但是增援部队尚未到达，鲍姆的部队已被击败，鲍姆本人也已阵亡。斯塔克接着又打败了布雷曼。布雷曼的部队行动迟缓(当然路也确实难走)，而且撤退时队伍混乱。若不是夜幕降临，他们难逃覆灭的下场。本宁顿一仗使伯戈因损失 527 名德国雇佣兵(其中有 28 名军官)和 37 名巡逻骑兵。美国部队仅仅伤 40 人，亡 30 人，而且还缴获了 4 门大炮。自这场败仗后，伯戈因的军队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元气。

至 8 月底，伯戈因的处境已非常不妙。他获悉豪打算进军费城，但是他自己的部队中能够打仗的人已减少到 6974 名，其中正规军士兵仅 4646 人;前进即意味着切断自己的交通线，因此，他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储备，而这又需要时间，同时他不知道圣莱杰在干什么[注：实际上，圣莱杰已被阿诺德机智地打败，印第安人也背弃了他。8 月 22 日，他已经踏上去奥斯威戈的归程。]。而且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件：他所属部队中难以管束的印第安人剥了一位当地神职人员女儿的头皮。由于这一不幸的事件，他和他的部队在整个美国都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要撤退，机会仍然是有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是不会有人责难他的。但是他决定继续前进。他命令英军在萨拉托加以北的哈得孙河上架设浮桥，9 月 13

日英军通过浮桥渡过哈得孙河，第二天德国雇佣军也过了河。伯戈因的部队分三路沿河的西岸向下开进。由于过河前招募了一些新兵，此时这支军队已经增加到了 7702 人。

与此同时，美国北方军更换了指挥官：霍雷肖·盖茨少将接替了斯凯勒。盖茨曾在英军中当过步兵军官，由于无钱购买团长的官阶，他弃官退出英国军队。在与权势集团不和的处境下，他返回了他青年时代服役过的美洲。他是一个谨慎和多少有点缺乏想象力的指挥官，遇事总愿躲在后面。他接任后不久，便把部队从莫霍克河口带到哈得孙河上游的一个名叫比米斯高地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坚固防御阵地，经过一位名叫柯斯丘什科的波兰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该阵地变得更加坚固。盖茨共有 28 个步兵团、200 名轻骑兵和 22 门火炮。他的大陆军[注：费城大陆会议于 1776 年 7 月 4 日宣布美国独立后，着手建立了大陆军。大陆军是联邦军队，服役期二至三年。短期服役(一、二个月)的民兵仍由各殖民地掌握。]和丹尼尔·摩根上校的 500 名火枪手都是一流的，但是新近从新英格兰招来的民兵却非常缺乏训练，不过，盖茨的部队比伯戈因的部队人数多，并且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时间也对盖茨有利。

美军的防御阵地长 1.25 英里，纵深 0.75 英里。土木工事和胸墙从鸟瞰哈得孙河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左侧的尼尔森(当地的一个农场主)住宅。由于正前方有一条深峡谷，阵地变得更加坚固。这条防线主要由大陆军各旅把守。在防线的右侧，美军的大炮控制着道路和河流。在防线的中央，美军的防御工事沿西北走向，一直通到尼尔森的谷仓。这里也布置了炮群。谷仓的西面是一座小山丘，这里，美军只修建了部分防御工事，但是主阵地沿西南方向一直通到盖茨的总部。

伯戈因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 9 月 17 日，地点在索德住宅地区。这里距盖茨的阵地大约 5 英里。当时伯戈因正

在通过一片树木茂密的地区。他缺乏可靠的侦察人员，因为此时最好的印第安人都已离开了他。另一方面，盖茨对伯戈因部队里发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因为他的副官长詹姆斯·威尔金森中校对伯戈因的军队几乎是跟踪侦察的，而且一些德国雇佣兵开小差投靠到美军。然而，伯戈因知道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已被封锁，而且得知敌人阵地的左侧有一座未被占领的小山丘。因此，他决定不再沿着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开进，与盖茨的部队正面接触，而是绕到敌人阵地的左侧，迂回包抄，把战线从悬崖推向河岸。

9 月 19 日上午 8 时，伯戈因的军队在浓雾和毛毛雨中从索德住宅出发。他们兵分三路：弗雷泽指挥右路，汉密尔顿将军指挥中路，菲利普斯将军在里德泽尔的支援下率左路沿河边的道路前进。弗雷泽这一路向西横扫，伯戈因率领中路沿一条大车道穿过大谷河，然后继续向西，从弗里曼农场的北面穿过(弗里曼是一个效忠派分子，不久前已放弃了这个农场，将要发生的战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三路纵队间隔很远，中路和左路更是如此。大约上午 9 点，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英军士兵的身上，使他们的红色外衣显得格外鲜艳，刺刀闪闪发光。此时他们正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他们很不习惯的灌木和森林地带曲折前进。

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停下，以便让弗雷泽那一路到达进攻发起地域，因为他们的接敌行军路线最长。下午 1 点钟刚过，伯戈因估计弗雷泽已经准备好，便按预先的约定鸣炮发出信号，通知各路英军立即前进接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军的先头侦察部队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盖茨其实是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的，他原计划留在防御工事里，让英国部队进攻他。但是，在左翼指挥官阿诺德少将的催促下，他作了让步，允许摩根的来福枪手在迪尔伯恩步兵的支援下出击。正是这些人与福布斯指挥的英军中路先头部队接上了火，并且

几乎把他们歼灭。

这场战斗成了一场残酷的火力比赛，它一直持续到黄昏。摩根的来福枪手得到普尔将军所部 2 个团的增援，但是，由于遭到弗雷泽先头部队强大的侧射火力的压制，美军包围英军右路的企图未能成功。汉密尔顿指挥的中路英军是主攻部队，在这里作战的 4 个英军团中，第 62 团吃的苦头最大。他们打得非常英勇，得到了伯戈因的特别嘉奖。“干得好，我勇敢的弟兄们!”伯戈因喊声盖过了战场上的冲杀声。夜幕降临时，下午投入进攻的 250 名英军只剩下大约 70 人。

弗雷泽给了汉密尔顿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摩根的步兵一直咬着他的部队不放。在这场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国人的炮火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的炮手伤亡很大。不过，美国人也未能利用他们缴获的火炮，因为那些幸存的炮手总是把火绳杆取下来。对伯戈因极为不利的是，他损失了许多军官。他们穿着鲜艳漂亮的服装，因此很容易被美国狙击手瞄准击中。伯戈因总是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但是他怎么也左右不了战局。不知为什么，他长时间不与他左侧的里德泽尔取得联系，其实最后为英军挽救局面的恰恰是里德泽尔那一路部队。

大陆军左翼阿诺德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他们还是全力投入战斗。只要再作最后一次冲击，他们就可能突破英军防线并取得胜利。但是，盖茨担心阿诺德轻举妄动，不愿给他增派部队。此时，里德泽尔的部队正好赶到。菲利普斯将军首先从河边赶来，看到形势非常危急，他立即从里德泽尔那里调来 4 门大炮，并亲自带队冲锋，为第 62 团解除了压力。与此同时，里德泽尔本人也终于从伯戈因那里接到了命令(已是下午 5 点)，带着他自己的团、布龙斯威克·冯·雷茨团的 2 个连以及 2 门发射 6 磅重炮弹的大炮投入了战斗。由于德国雇佣兵猛打猛冲，他们的炮手几乎以平射角度向敌发射霰弹，

再加上夜幕迅速降临，伯戈因的中路英军得救了。阿诺德所部撤回到堑壕里。这场战斗使双方部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伯戈因的部队伤亡 600 人(包括 35 名军官)，占实际参战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损失 283 名各级官兵，另有 33 人失踪。

这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国人虽然仍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们的士气仍然是高昂的，但这丝毫不能使伯戈因感到轻松。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不仅要对这场战役负责(许多人仍对这场战役的胜利抱有希望)，而且要对伤员和不知疲倦地照料他们的妇女们负责。给养和士兵都在减少。退却的道路是暗淡的和难以预测的；前进的道路也是十分危险的。

到弗里曼农场之战开始时，约翰·斯塔克和林肯将军已经夺取了爱德华堡；在提康德罗加吃过败仗的约翰·布朗上校此时也已攻占了乔治堡，并在尚普兰湖上缴获了伯戈因的许多给养船只。所以在打过这一仗之后，伯戈因的后路实际上已被切断，尽管一两天后伯戈因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伯戈因早已定下了决不后退的决心，而且如果不是接到克林顿将军从纽约寄来的信，他会在 9 月 21 日再次发起进攻。克林顿答应向奥尔巴尼进军，因此，伯戈因决定等待克林顿开始行动的确切消息。在此同时，他准备加固从哈得孙河一直延伸到弗里曼农场西北高地的防线，修筑一系列的多面堡和据点。

9 月底至 10 月初，通信兵冒着极大的危险，频繁往来于萨拉托加和纽约之间，给伯戈因和克林顿传送信息。克林顿非常不赞成豪进军费城的决定，所以他一得到增援，便立即按照豪的指示尽一切可能去支援伯戈因。10 月 3 日，他派 3000 人分乘 60 条船，沿哈得孙河北上执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任务。他们攻占了皮克斯希尔以北扼守着通往哈得孙河上游通道的两座城堡——蒙哥马利和克林顿，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

他们到达了距奥尔巴尼不到 40 英里的地方，由于河流领航员拒绝继续领船前进才停下来。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这一尝试已为时太晚，已经援助不了伯戈因。无论如何，克林顿已通过通信兵通知伯戈因，他的兵力不足，他无法突破重重障碍到达伯戈因那里。

与此同时，英国人知道另一场战斗不可避免，于是竭力设法修筑一道当时当地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好防线。这道防线的主要支撑点是由长栅栏和土木工事保护的多面碉堡。最坚固的多面碉堡名叫巴尔卡雷斯堡，它是以坚守这块阵地的轻步兵和投弹手部队指挥官的名字命名的。在它后面与之形成梯形配置的是布雷曼堡。布雷曼堡不大，是个建有多个出击口的方形土木工事。第三个据点名叫格里特堡，它鸟瞰哈得孙河和沿河公路。在整个防线上都尽可能利用天然障碍物。至 10 月 4 日，英军已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但是地面很不平坦，树木又很稠密，许多地方没有好的射界。而且此刻作为军队眼睛的印第安人已全部开了小差。

10 月 4 日和 5 日，伯戈因召开军事会议。当时他真是忧心如焚：他的给养维持不到月底，兵员不减少就算不错，而盖茨的兵员却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在即将开始的这一仗中，盖茨有 6444 名大陆军和 6621 名民兵可以投入战斗，这个数字是伯戈因所能集中起来的人数的两倍多。在军事会议上，里德泽尔和弗雷泽将军赞成撤退，或者退到他们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并且由此渡过哈得孙河的菲什基尔一线，在此设防固守；或者渡过哈得孙河去巴腾基尔，设法恢复交通线。

伯戈因不同意撤退，主张留下一支 800 人的小部队看守营地把其余军队都调去攻打美军阵地的左翼和后方。让部队冒冒失失地通过没有进行过侦察的地段，绕到美军左翼去进攻实力不明的防御部队，这一主张实在太冒险，将军们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当部队侧敌行军时，盖茨可以毫不费力地消

灭留下的 800 人，毁掉架在两条岔河上的桥梁，威胁英军的退路。

最后达成妥协：派出一支大约 1500 人的侦察部队，绕到敌军左翼，观察敌军阵地的实力，以便第二天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发现敌军阵地的力量太强，则军队就撤退到菲什基尔。[注：从伯戈因后来向议会提供的证词看．似乎他的意图一直是在条件有利时，用这 1500 人去发动进攻。]与伯戈因原来的建议相比，这个计划肯定是较为理智的，但是如果真的仅仅是一次侦察行动，应该由一支人数少得多的部队去执行。一支大部队向敌人的侧翼运动，很容易被误解为一次大的进攻，敌人会以同样规模的部队，或者可能以更多数量的部队来对付它。在以后人们称之为比米斯高地之战的军事行动中，情况正是这样。

这支部队在机动性和火力方面都经过精心挑选。他们当中有轻步兵和投弹手连，巡逻骑兵和法国狙击手，以及加拿大人和效忠派分子，并配有 2 门发射 12 磅重炮弹的大炮，6 门发射 6 磅重炮弹的大炮和 2 门 8 英寸榴弹炮。最后总人数超过了 1500 人，接近 2000 人。部队于 10 月 7 日中午分三路离开防御阵地。弗雷泽指挥右翼；里德泽尔指挥中路，伯戈因及其参谋人员骑马随中路前进；第 20 团的约翰·阿克兰少校指挥左翼和英国投弹手连。

大约行军 45 分钟，前卫队抵达巴伯农场的西面，这里地处碉堡防线以外，中谷河以北。队伍在这里的两块林间小空地上停下来休息，同时派出 150 名非正规作战人员去侦察盖茨左翼阵地的边沿地带。威尔金森看到此时停下的这支队伍，便对盖茨说，他认为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这一次盖茨赞成主动出击——虽然战斗打响后他没有再做什么对战局有影响的事。他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围攻英军的右翼，普尔进攻左翼，勒尼德准备突破中路。他的作战方案象其他一切好的

作战方案一样，非常简单，同时由于有四比一的兵力优势，成功是相当有把握的。

普尔部队从美军阵地出发路线最短，英国人在巴伯农场休息。刚结束，其左翼便遭到普尔部队的攻击。阿克兰少校的投弹手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投入了战斗，但由于与对方相比数量悬殊太大，他们只好丢下身受重伤的指挥官作俘虏，被迫撤退。在普尔向阿克兰指挥的英军发起攻击后不久，摩根和迪尔伯恩也向弗雷泽指挥的右翼英军猛烈开火。弗雷泽的部队同样也打得很勇猛。尽管弗雷泽奋不顾身地鼓舞部队的士气，但是他的部队还是被迫撤退了。弗雷泽总是骑在他的白马上，很显眼，所以便成了美国射手的一个明显目标。他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在当天晚上死去。他的死对伯戈因是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弗雷泽不仅是他的好朋友，而且无疑是他的一位最优秀的军官。

英军两翼的撤退，使其中路完全处于暴露状态。这里 300 多名德国雇佣兵抵抗着勒尼德旅和坦恩·布罗克将军的民兵(共约 3000 名美国人)的进攻。在赫西—哈诺大炮的全力支援下，他们英勇奋战，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但是，到下午后半时，伯戈因(他的外套满是弹洞，这证明了他在火线上的勇敢)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把整个防线撤到防御工事后面。至此，英军已经伤亡大约 400 人，损失 8 门火炮。可以理解，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但是伯戈因仍然有希望先守住防御阵地，然后再把军队安全撤出。

要不是因为一个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伯戈因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阿诺德是一名难以驾驭的战士，但又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与盖茨争吵，被剥夺了指挥权，但是战斗一打响，他在兵营里就坐不住了。谁都来不及阻拦，他便冲出兵营，象着了魔似地在战场上来回奔驰吼叫，组织起那些被打散了的部队，整饬好一个旅又去整饬

另一个旅。但是他的行动既充满了激情和勇敢，又是有理智的。他很快意识到巴尔卡雷斯堡(大部分英国人已经撤进此堡)防守严密，无法一举攻占。于是他便绕到它的后面，先肃清几名在孤立小木屋里的加拿大人，然后去解决布雷曼堡。

布雷曼是一个很不得人心的军官，他手下的士兵对他忍无可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士兵们对指挥官的畏惧增加了他们惯常的勇气，但是他一死(不知是谁把他打死的)，他们就立刻放弃了阵地。在这次攻击中，阿诺德的马中弹倒下，压住并蹩断了他的腿。不过这时战斗几乎已经结束了。由于现在英军残部的侧面和后方均受到威胁，伯戈因中止了战斗。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英军撤入格里特堡。在实际参战的大约 2000 人中，有 176 人身亡，200 人受伤，240 人被俘。

比米斯高地之战 10 天后，伯戈因将军才投降。盖茨用大炮猛轰格里特堡营地，使得英军无处安身，因此这支疲惫、沮丧、给养又快断绝的军队，只好同妇女们一起——虽然不得不把伤员丢下——向菲什基尔小溪原有阵地转移。盖茨不慌不忙地尾随其后：他无需着急，因为捕鼠的笼子实际上已经关死。出人意料的是，他竟主动对英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以为要攻打的只是一支英军后卫部队。幸亏他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止了攻击，不然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此后，他采取饥饿战术并不断地猛轰英军阵地。

在忍受 4 天这样的惩罚之后，伯戈因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乘黑夜偷偷地离开阵地——同时放弃大炮和车辆。但是，在天黑之前侦察兵报告，退路已被完全切断。10 月 14 日，伯戈因在高级军官一致同意下，向盖茨求和。最初伯戈因不同意议和，但是盖茨由于不知道克林顿现在何处，又急于解决伯戈因的问题，因此同意放宽议和条件。10 月 16 日，萨拉托加条约签字；10 月 17 日，伯戈因正式投降。

战争又延续了 4 年，但是萨拉托加战役是整个战争的转折

点。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上游的高地——实际上除罗得艾兰之外，从纽约到加拿大边界的一切地方——现在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1778 年 2 月，法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成了美国积极的盟友。但是这首先应归功于美国士兵，是他们打败了英国军队并迫使其投降的。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增强了对军官的信心，增强了对他们自己和事业的信心。

图 15、萨拉托加战役(1777 年)

萨拉托加战役：1777年

附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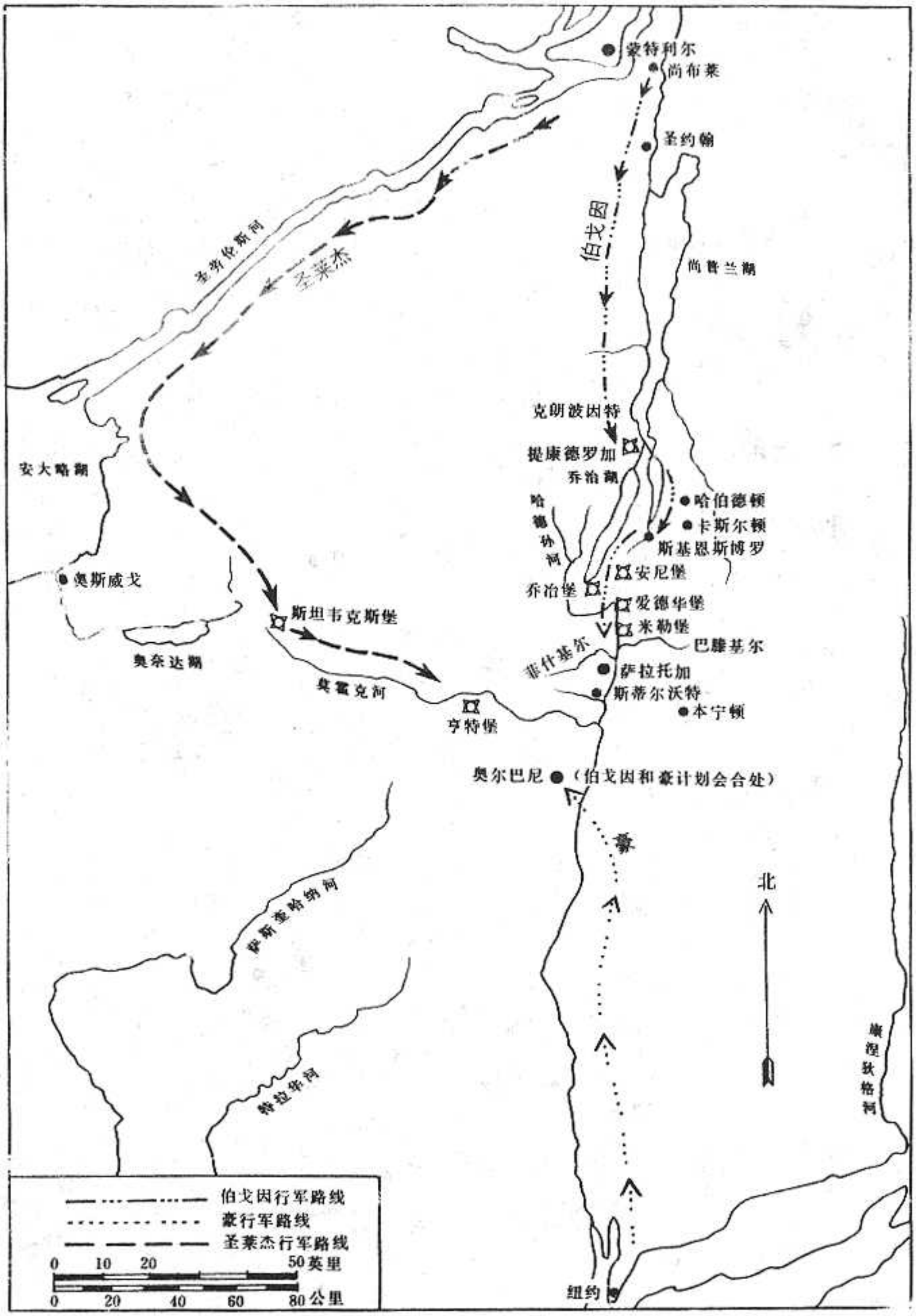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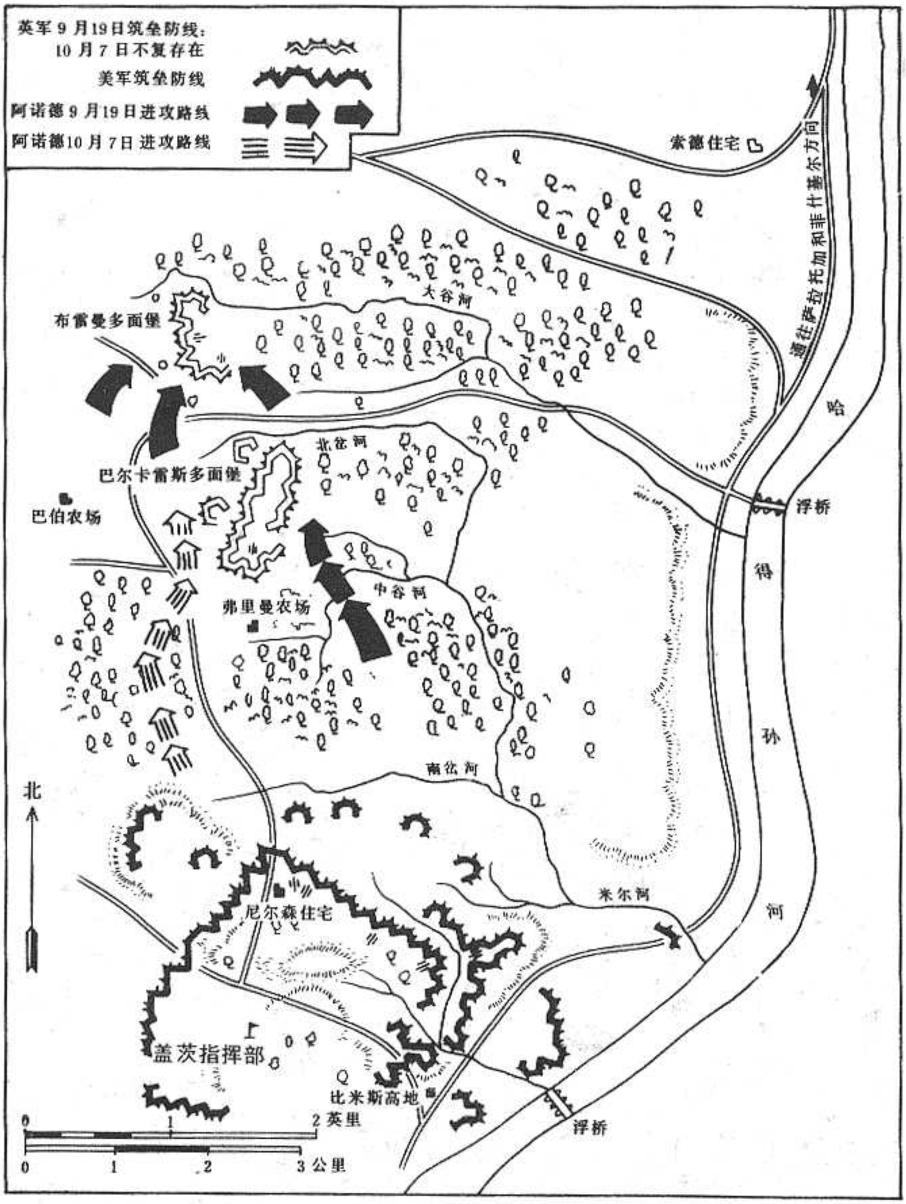


图 16、1777 年 9 月 19 日弗里曼农场之战与 1777 年 10 月 7 日比米斯高地之战

1777 年 9 月19日弗里曼农场之战和10月 7 日比米斯高地之战　附图16



对于萨拉托加战役的组织，伦敦一开始就搞得很糟糕：作战计划相互抵触，交通阻断，乔治·杰曼勋爵没有考虑到在美国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远征费城和奥尔巴尼两个地方。然后是豪坚持进军费城，留给克林顿的部队太少，充其量只能占领哈得孙河下游的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伯戈因几乎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

仔细研究有关这次战投的许多记述以及伯戈因和一些军官向下院一个委员会所作的详细证词，很难证明——尽管一些历史学家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与此相反的看法——在长途进军中，伯戈因曾采取过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使其免遭失败的军事行动和决定(撤退决定除外)。但是，战斗在萨拉托加附近树木茂密、起伏不平的土地上打响后，导致伯戈因最终失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在盖茨兵营里有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二是弗里曼农场之战后伯戈因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美国 200 年的军事历史中，出现过一些充满活力、勇于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具有必胜精神的战士——人们自然会想起“杰布”·斯图尔特、卡斯特和巴顿——在这些优秀的勇士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不幸的是，阿诺德犯了万难饶恕的叛国罪，毁坏了他富于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的传奇式的经历，正因如此，当代和近代人在写他的时候往往贬低他，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他在独立战争中为他的国家所作的贡献。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阿诺德对打败伯戈因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最后的两次战斗中。但是，在使斯坦韦克斯堡解围和迫使圣莱杰离开莫霍克河谷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他是一个很有自尊心、很敏感、充满强烈自信的人。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勇敢精神或指挥才能提出指责。但是，他的急躁性格常常给他带来麻烦。他常因脾气暴躁而信口开河，言辞尖刻。可以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象一堆流抄，而不是一块岩石。

9 月 1 日他带着 1200 人在莫霍克河口加入盖茨的军队，负责指挥左翼。他对盖茨从来不象对斯凯勒那样尊敬。但是，1776 年他们是在一起作战的，尽管阿诺德在瓦尔库尔岛违背盖茨的命令，丧失了美国舰队，他们还是非常友好地相处。据阿诺德的传记作者所述，盖茨派他去察看比米斯高地的阵地，并协助波兰工程师柯斯丘什科修建防御工事。同时他还积极率领小股部队骚扰从菲什基尔方向开来的英国部队。

阿诺德的左翼由 2 个旅组成：一个是伊诺克·普尔准将指挥的旅，由新罕布什尔第 1 团、第 2 团、第 3 团和纽约第 2 团、第 4 团以及康涅狄格 2 个民兵团组成，共约 2116 人；另一个是埃比尼泽·勒尼德准将指挥的旅，由马萨诸塞第 2 团、第 8 团、第 9 团和 1 个纽约团组成，共 1243 人。不能肯定丹尼尔·摩根上校的来福枪手和亨利·迪尔伯恩少校的轻步兵(总共 674 人)是否也归他指挥，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由他指挥的。另外，阿诺德还有 200 名康涅狄格轻骑兵和 22 门火炮。阿诺德阵地的正面比其他地方开阔，但是左翼没有右翼和中央阵地前那样的峡谷保护。伯戈因的进攻就是对其左翼发起的。

盖茨本来决定在防御工事里等待英军进攻，要不是阿诺德激烈反对这种战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阿诺德正确地指出，英军善于打围攻战，如果让他们进入大炮射程以内，他们的炮火就会给美军以重大杀伤；另一方面，英军既缺乏打丛林战的训练，又缺乏打丛林战的装备。阿诺德强调指出，进攻肯定是对的，因为一旦需要，美军可以再退守防御工事；而一味等待，有可能被从防御工事里赶出来；这样就会造成溃败。盖茨接受了这一保证战斗胜利的意见——仅仅是有限的接受——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的来福枪手出击。战斗的第一阶段从上午 9 时许一直持续到中午 12 时 30 分。在这一阶段中，美军方面只有摩根和迪尔伯恩的部队参战。12 时 30 分，

威尔金森上校向盖茨送去报告，要求增派部队。因此盖茨立即派出普尔旅的 2 个团，稍后又派去了勒尼德旅的全部人马。这样，至下午 4 时，阿诺德师的大部都投入了战斗。

阿诺德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的个人表现，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参战人员所作的记述中没有提到他在战场上露面的事，而另一些人则断言他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大部分对战争的个人记述都受到自身参战的局限，因此，某些军官没有注意到一些高级指挥官参战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象迪尔伯恩轻骑兵中的韦克菲尔德上尉和勒尼德旅中的马歇尔上校所说的话是凭空捏造的。韦克菲尔德上尉说，他看到阿诺德参加了最初的战斗；马歇尔上校说，“大约 4 点钟，阿诺德带着大陆军 9 个团及摩根的部队与整个英国军队的右翼混战在一起。”威尔金森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勒尼德奉命出击之前没有一位将官参战，不过他承认他是被盖茨派去叫阿诺德回来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阿诺德就跨上战马朝枪响的方向飞奔而去了。威尔金森是盖茨的副官长，他对战斗情况比大多数参战人员了解得更全面，但是他的回忆有点儿令人怀疑，因为甚至在阿诺德叛国之前，威尔金森就非常憎恶他。

任何研究过阿诺德性格特点的人，一定感到难以置信，他指挥的师在战斗，而他自己会心安理得地呆在军营里。虽然韦克菲尔德也许会把时间弄错，但是多种证据有力地证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至少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参加了战斗。不管他是否亲自参加了战斗，他对战斗的结果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可能恰恰由于他提出了进攻的建议，盖茨才免遭失败，而且如果他得到增援，美军肯定能大获全胜，因为最后战斗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谁能派出增援部队——盖茨能，而伯戈因不能——谁就能获胜。

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行动，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谁都认为他在 9 月 22 日与盖茨大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是盖茨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大大贬低了阿诺德师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无疑非常出色的战绩。阿诺德大发雷霆，言辞失当。任凭他怎么骂，盖茨始终十分镇静，但是他解除了阿诺德的指挥权。阿诺德一再扬言要离开北方军，盖茨也巴不得他离开。但是阿诺德可能根本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在战斗开始前的几天里，他只是呆在自己的帐篷里生气。

谁都不否认，当战斗进入高潮时，阿诺德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为了追求荣耀，他不顾一切危险，发现哪里的指挥缺乏激情和生气，就接过那里的指挥权。问题是，他个人的表现对把伯戈因赶出碉堡工事，并把他逐出战场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诚然，盖茨有足够的力量把英军赶进哈得孙河，但是如果指挥不力，纵然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是无济于事的。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证词中这样说：要不是阿诺德介入，他“几小时后就可站稳脚跟使敌人听任我的摆布，他们人数再多也没有用。”这当然是伯戈因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夸张说法。那时，奥尔巴尼已经是一个破灭的梦，军队的前途充其量只是有点渺茫的希望。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但是，这种决定性作用只表现在使伯戈因未能挽救军队覆灭的命运。

如果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之战后，在看来很有可能突破美军防线的时候，决定立即发起进攻，阿诺德完全有可能应召在比米斯高地作出更大的贡献。9 月 19 日弗里曼农场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可以想像，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双方的军队都已精疲力竭。然而英军的士气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看到美军缩回到堑壕里，英军仍然控制着战场。另一方面，盖茨还有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可供使用，而伯戈因的军队已全部投入了战斗。9 月 19 日至 20 日的这个夜里，双方军队都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接对方的进攻。

关于 20 日早晨美军阵地上的情况，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威尔金森上校的证词。根据他的描写，美军营地上是一片混乱和困窘不堪的景象。那天清晨，英军第 62 团一名逃兵给美军提供了一个似乎确实可信的情报——英军马上就要发动进攻。威尔金森说，他们已无法抵挡这再一次的进攻，因为部队疲惫不堪，弹药非常短缺，他们“每 3 支滑膛枪上最多只有一把刺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完全相信了这个逃兵的话，在整个阵地上部署了部队，使每个人都在漫天大雾中度过了“提心吊胆、揣揣不安的一个小时”。

众所周知，英军最后一次进攻并没有发生。但是威尔金森断言，这个逃兵的情报并非杜撰，因为在伯戈因的部队投降后，他曾经有机会与菲利普斯少将谈过此事。菲利普斯少将说，伯戈因曾决定在 20 日早晨在对美军防线的右翼和中央采取牵制性行动的同时，派重兵进攻其左翼。据菲利普斯说，由于弗雷泽的阻止，他才没有这样做。弗雷泽要求他推迟 24 小时，因为他的投弹手和轻步兵尚未完全从前一天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首先在前一天战斗中弗雷泽的部队没有象其他部队那样受到很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从迪格比中尉的证词中得知，“菲利普斯将军和弗雷泽的意见是，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在那天早晨攻打他们的营地。”“那天早晨”就是指 20 日的早晨。看来威尔金森对他与菲利普斯谈话的回忆有一些是不对的，但是要说他已经记不得或者夸大了当时美军营地中的困窘景况，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没有提及他发出过立即进攻的命令。事实上他强调说，任何进攻的想法都是非常愚蠢的。他说，“我认为，在军队经过长时间恶战已经精疲力竭并且损失了一大批军官的情况下，任何有职业判断能力的军人都不可能提出在第二天早晨对敌人发起进攻的问题。”巴尔卡雷斯伯爵、哈林顿伯爵、金斯顿上佼、福布斯少校和莫尼

上尉等人在作证时，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了这一点，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司令官的说法。金斯顿上校说，据俘虏和逃兵报告，美军可以利用的兵力相当于英军的 4 倍，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这对伯戈因的观点是个有力的支持。

伯戈因和目击者向议会所作的陈述和证词，与当时对该战役和后续事件的记述有许多矛盾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鉴于对某些事件事后再来分析也许会更清楚一些，加上在受审查时往往需要把事情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说，伯戈因和目击者在国会上的证词有可能是经过加工的。尽管伯戈因是那样向议会说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曾经打算在 9 月 20 日早晨发起进攻(如果没有考虑，那是不对的，他应当考虑)，只是由于指挥官们的忠告，或者出于他自己的观察思考——这种可能性更大些——他才最后决定让士兵们休息 24 小时，把进攻时间推迟 1 天。

然而，9 月 21 日那天，伯戈因接到了纽约克林顿将军的一封来信。克林顿在信中说，他打算派 2000 人(他所能抽出来的全部人马)攻打纽约以北大约 40 英里高地上的蒙哥马利堡，但是他同时又说，如果侧翼受到攻击，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此举。伯戈因立即派人选去回信，表示欢迎这一牵制性行动。伯戈因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在谈到克林顿打算进攻蒙哥马利堡一事时说："经过前一次战斗，一段时间里我的军队十分虚弱，正期待着强有力的牵制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冒险对敌人发起进攻，我想那真是发疯了。"他还想等待轻伤员重返战斗岗位，并且仍然有得到圣莱杰增援的可能——起码他是这样想的。因此，他决定用碉堡工事加固他的阵地，然后见机行事。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伯戈因不得不作出许多困难的决定。要想弄清这些很久以前的行动的来龙去脉，困难之一是要猜测这些行动后面的动机。而事后有些人为了替这些行动辩护，

所写的东西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所以常常是一些事实很清楚，而另一些却无法弄清楚。在斯基恩斯博罗和本宁顿，伯戈因的判断也许是很稳妥的，他拒绝撤退几乎肯定是对的，因为正如福蒂斯丘所说，“其他行动都取决于他的前进”。但是在萨拉托加，伯戈因的问题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可以说，他无疑失去了完成其使命的最后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果 9 月 20 日早晨，伯戈因将他显然曾经考虑过的、菲利普斯将军后来向威尔金森所描述的计划付诸行动，在对美军防线的中央和右翼采取牵制行动的同时，派一支部队全力攻打美军的左翼，他就可以发现美军阵地上是一片混乱。但是，他的军队那天确实没有真正作好再大打一场的准备，因此他把进攻推迟 24 小时也是不无道理的，尽管这样做使美军得到了更多的喘息时间，使英军成功的机会明显地减少了。

然而，到 21 日还推迟进攻，那就没有道理了。伯戈因完全知道，克林顿打算要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行动，而且他会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还不一定；另外由于通信很费时间，大约两周后克林顿才有可能发起进攻。盖茨的兵力与日俱增，不久就会是英军的数倍；而且伯戈因的给养很快就要耗尽。消极等待，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无法实现的期望中，肯定是错误的；在退路被彻底封锁之前，冒死对敌人的要害部位发起冲击，或许可为避免彻底失败带来一线希望。这也许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象伯戈因这样有献身精神的赌棍，按常理本应去冒险试一试。

这两次战斗是整个战役的高潮，此战役在第一次战斗打响之前约 3 个月就已经开始了。为了分析胜败的原因，必须把这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一个由于政治上的无能和干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虽然本书仅举此一例，但类似战例并非历

史上绝无仅有。伯戈因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但是计划的实现必须完全依赖豪的充分合作。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企图在 3000 英里之外，控制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国家里的作战行动。他给伯戈因下达了毫无灵活性的命令，同时又批准了豪的计划，从而使下达给伯戈因的命令只能产生灾难性的结局。

第 10 章、博罗季诺会战(1812 年 9 月 7 日)

1807 年 6 月，拿破仑在涅曼河上的一条木筏上会晤了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双方签署了条约，建立了脆弱而短暂的友好关系。但这个联盟并不稳固，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轻易地瓦解了。1809 年，拿破仑提出娶沙皇的妹妹为妻，亚历山大对此反应冷淡(他无疑会回绝这桩婚事，因为傲慢的罗曼诺夫王朝根本不屑同科西嘉的一个暴发户联姻，不管他如何才华出众)。不过，拿破仑在协商过程中就宣布和一位奥国公主订婚，这至少是不明智的。

两国关系由此日渐冷淡。俄国人对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任何解放波兰的行动都会立即引起俄国人的警觉)和大肆兼并领土(有些兼并行动违背了提尔西特条约)的恐惧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冷淡。不过，两国关系是在俄国采取行动以缓解“大陆封锁”给它带来的严峻形势后才最后破裂的。所谓“大陆封锁”是指 1806 年拿破仑签署《柏林法令》禁止一切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后，欧洲大陆对英国的经济封锁。一旦俄国(实际上任何一个缔约国)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整个封锁便会失败。

到 1811 年，“大陆封锁”已破绽百出，连法国也偶尔与英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拿破仑以俄国违约为借口，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彻底征服这个国家。现在看来，还不能肯定攻占莫斯科是拿破仑的最初想法，因为他本来极想在

斯摩棱斯克以西围歼俄军，况且法军的补给虽然经过周密安排，但充其量只能维持一场激烈的速决战。1812 年 6 月 23 日夜间，侵俄法军的先头部队越过了涅曼河。

博罗季诺会战始于 1812 年 9 月 7 日，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一可怕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看，法军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俄军退出了战场，但俄军并未被歼灭，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唯一目的因此落空了。在交战中双方伤亡惨重，但俄军仍拥有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而且后勤补给安然无恙；而拿破仑的运输线太长，难以维持其现有部队的补给。结果，几个星期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法军，而不是俄军。

包括驻守在奥德河以东的预备队在内，拿破仑共征集了 60 多万部队和大约 1400 门火炮。在这支几乎来自欧洲各国的部队中，法国人只有 27 万，其中包括从法国占领的领土上征召来的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奥地利和普鲁士派来了军队，意大利总督欧仁亲王也率领 4.5 万名士兵加入了这支大军。拿破仑还从被困于伊比利亚半岛的 24.3 万部队中(其中也有许多不是法国人)抽调了 2.7 万人。只有拿破仑从前的元帅，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拒绝派兵。在下级军官的出色指挥下，这些外国士兵几乎人人勇猛善战。

这支对胜利寄予厚望的浩浩荡荡的东进大军分成 5 支主要力量。中央是由拿破仑亲自指挥的主力突击部队，并辅之以欧仁亲王的意大利军和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国王(他因行动缓慢而受到审查，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前便离去了)的一支部队。中央部队大约有 38 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支侧翼部队。麦克唐纳元帅率兵向北守卫波罗的海沿岸，陆军元帅施瓦岑堡的奥地利军队负责掩护拿破仑的南侧，这两支部队各有 3.4 万人。虽然拿破仑一直在不断征募新兵，但这支“大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很强。

正如人们所料，拿破仑为入侵俄国制定了宏伟的战略计划。但不幸的是，这项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拿破仑没有估计到，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深入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国家作战，在补给上将遇到重重困难。一过涅曼河，法军的进展就不再象预想的那么快了，被分割的俄军因此逃脱了法军的攻击。拿破仑和热罗姆分别在科夫诺和格罗德诺以南约60 英里外渡过涅曼河，企图以钳形运动将两支分离甚远的俄军各个击破。假如不是由于热罗姆行动迟缓，巴格拉季昂王子指挥的第 2 西集团军很可能被围歼。面对拿破仑的正面攻击，巴克莱·德·托利率领第 1 西集团军迅速后撤，退至德里萨河畔的坚固设防营地。根据沙皇的普鲁士顾问恩斯特·冯·富尔上校制定的计划，巴克莱·德·托利应坚守营地，并在巴格拉季昂从侧翼进攻法军时牵制拿破仑。

可是富尔的作战计划只能使俄军更加分散。巴克莱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危险，他立即转向东南，赶到维捷布斯克，并在那里迟滞法军的进攻。但当他得知巴格拉季昂(此人与他的关系异常紧张)无法与他在那里会合时，他又后撤到斯摩棱斯克。8 月的第一周，两军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帅，并由巴克莱(他是沙皇军队的总司令)负责全权指挥。

俄军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急于和法军交战，唯独谨小慎微的巴克莱例外。当发现自己左翼有危险时，他便命令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得以袭击他强大的后卫部队。紧接着，两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及东面的高地上展开了激战，结果双方伤亡惨重。不过这次战斗却使巴克莱彻底摆脱了法军，并沿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退却。巴克莱的逃跑战术激起了强烈不满，沙皇被迫任命库图佐夫亲王接替巴克莱任俄军总司令(不过巴克莱仍保留了第 1 西集团军司令之职)。

67 岁的库图佐夫由于一生酷爱美酒佳肴(这两样东西在他的博罗季诺大本营里应有尽有)，已垂垂老矣，连马都不能骑

了。不过年轻时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曾多次负伤，并有两次头部中弹，但他居然活了下来。他曾和伟大的苏沃洛夫并肩作战，还在沙皇手下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指挥过俄军。他是个受人喜爱的指挥官，但由于年老体弱不再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他的错误是任命莱温·本尼格森将军为参谋长。本尼格森是高级将领，1807 年曾指挥过俄军，但没什么才干。此人狂妄自大，几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还和第 1 西集团军司令关系紧张。

8 月 29 日，求战心切的俄军官兵热烈欢迎库图佐夫的到来，他们相信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斯摩棱斯克的伤亡和疲惫不堪的撤退并未挫败俄军的士气，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俄军有一支英勇善战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但是装备差，仅配备了许多口径不同的滑膛枪，火力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坚信苏沃洛夫的名言：刺刀比子弹更有用。

俄军骑兵包括通常的轻骑兵团、重骑兵团和龙骑兵，其装备比刚到博罗季诺时的法军精良得多。此外，俄军还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哥萨克骑兵，他们虽然不善交战，但善于追击、警戒和伏击。俄军炮兵新近进行了整编，配备了一批新武器。它规模庞大，包括 44 个重炮连和 58 个野炮连。俄军还拥有一支精干的先头部队，但其救护手段却(和法军一样)极其原始，很难应付巨大的伤亡。

正当巴克莱(当时他尚未被库图佐夫接替)一面向莫斯科撤退，一面寻找立足之地时，拿破仑也在考虑是否在斯摩棱斯克安营扎寨，等到 1813 年再战。这不仅对部队给养有利(虽然法军严重减员，但给养仍十分紧张)，而且还会给法军带来其他好处。然而，这场会战的目的尚未达到，亚历山大拥有强大的民军，时间对他有利。于是，拿破仑决定冒一次险。8 月 29 日，他率军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碎石路前进，一路烧杀掠抢，最后遭到毁灭。

据说，博罗季诺是本尼格森在率军加入主力部队的途中选定的阵地，俄军因此放弃了先前由巴克莱的参谋人员选定的地点。情况也许确是如此，因为在米拉拉迪维奇将军率领的1.8万民军到达之前，库图佐夫并不急于交战；况且在俄国人目前选定并迅速加强的阵地以西，肯定还有即便不比博罗季诺更理想，也和它同样不错的阵地。博罗季诺村位于科洛查河北岸，地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科洛查河与另一条小河沃伊纳河汇合于此。这里还有另外两条支流，在大道以南与其平行的是斯托尼茨河，在沃伊纳河上游一点汇入科洛查河的是谢苗诺夫卡河。科洛查河从博罗季诺向北流入汹涌的莫斯科河，这一流域内两岸陡峭险峻。

俄军阵地的最右翼部署在科洛查河与莫斯科河之间的一环形地带，左翼驻守在位于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乌季察村周围的丛林中。斯托尼茨河和谢苗诺夫卡河的夹角地带是一道低矮的山梁，其北端是一座小土丘，极适于作战。俄军在这里修筑了工事，并以守卫这里的军长的名字命名为拉耶夫斯基棱堡[注：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是沙皇亚历山大手下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这次会战中，他亲自带领16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对法军的一个炮兵连发动了一次突击。]。棱堡以南主要是平地和沼泽，有的地方有丛林。这里的一些小村庄易守难攻(至少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是这样)，注定会成为法军摧毁的目标。但其附近的三个小工事(称为“巴格拉季昂棱堡”)构成了左翼中央的中心枢纽。位于丛林地带的最左翼阵地是乌季察村附近的另一个高地。主防御阵地中心以西近1英里处，是舍瓦尔季诺棱堡，库图佐夫派1个师在这里防守，并得到骑兵和炮兵的支援。

巴克莱的第1西集团军构成俄军右翼。库图佐夫认为法军会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推进，因而在这一地段部署了重兵，但他忽视了中央和左翼阵地。由于战线过长，守卫在那里的

巴格拉季昂的第 2 西集团军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库图佐夫未占据乌季察高地，而准备让巴格拉季昂的第 3 军在最左翼的丛林中打一场极有可能成功的大规模伏击战。不幸的是，本尼格森在视察阵地时却给第 3 军军长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使其部队暴露在旷野中。虽然大体上讲俄军占据着坚固的天然阵地，并抓紧时间尽量对其进行了加固，但俄军左翼仍有可能被包抄。不过，后来的情况表明，库图佐夫还算幸运。

当俄军忙于构筑防御阵地时，拿破仑正在慢慢集结军队，准备向俄军左翼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在驱马观察地形时，一眼便看出法军在向俄军主阵地发起进攻之前，必须先摧毁舍瓦尔季诺棱堡。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第 1 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 5 师(由孔潘将军指挥)，并派两支骑兵部队给予支援。9 月 5 日傍晚日落前，战斗打响了，双方激战到将近午夜才收兵。俄军损失了大约 5000 人，法军的伤亡略少一些。

尽管俄军在戈尔恰科夫亲王指挥下英勇作战(实际上法军也是如此)，但库图佐夫根本不该同意本尼格森的方案，即防守舍瓦尔季诺棱堡，因为它不仅不在俄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而且毫无战略价值。俄军却为此损失了许多精兵强将和 3 门火炮。俄军左翼主要依托巴格拉季昂棱堡，这场战斗并未改变左翼易受攻击的形势。翌日，9 月 6 日，整个战场平静得出奇。双方都在为一场重大战役做最后准备；俄军正全力以赴巩固阵地，拿破仑也渴望更细致地观察地形，准备其作战计划。

于是，拿破仑把指挥部移到舍瓦尔季诺棱堡北面的平坦地带，并多次对俄军阵地进行侦察。当时，他正患重感冒和膀胱炎，身体欠佳，法军的临战状态也不能令他满意。除兵力上稍占优势(约 13 万：12.2 万)外，法军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俄军更占优势。自从越过涅曼河以来，法军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 25 万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食品短缺无法提

高法军的士气。法军骑兵的处境尤其不利，它丧失了大量马匹，剩下的马匹也羸弱不堪。相反，俄军却兵强马壮。此外，俄军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占有优势。

9 月 6 日，拿破仑正在侦察阵地，达武走上前去，要求允许他率领自己的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第 5 波兰军，从侧翼进攻俄军左翼和后方。达武认为，他只需 4 万人便可以闪击俄军的这一薄弱防区，并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术本该受到拿破仑的青睐，但他在稍事考虑后拒绝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主张采用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案。朗斯特里特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也打算采用同样的战术，但同样被断然拒绝了，而且理由更少。

最后制定的作战方案是：达武率第 1 军进攻巴格拉季昂棱堡(在拿破仑的印象中，那里只有两个而不是 3 个筑垒阵地)；在达武左翼，内伊的第 3 军在朱诺的第 8 军的紧密配合下，以近卫军为后方部队，从拉耶夫斯基棱堡北面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攻击俄军防线。这样，法军的整个进攻重心是在约 1.5 英里的战线上打击俄军左翼和中央。欧仁的第 4 军和第 1 军第 3 师在科洛查河北岸作战，其任务是摧毁博罗季诺村，然后利用三座特制的浮桥渡河，向拉耶夫斯基棱堡进军。骑兵由缪拉全权指挥，他在达武的后方集结了 3 个骑兵军(第 1、2、4 军)。从右翼迂回攻击俄军的唯一措施是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 5 军沿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从侧翼包抄俄军左翼。

法军炮兵(共有 587 门火炮，但配备到各炮兵连的火炮数量仍显不足)的任务是，战斗一打响就对敌实施大规模炮轰。战斗开始的前一夜；法军已将 2 个炮兵连部署在舍瓦尔季诺东北面的高地上，准备炮轰巴格拉季昂棱堡。这 2 个连各有 24 门火炮。第 1 军炮兵司令佩内蒂将军又从近卫军、德赛师、孔潘师和弗里昂师抽调 62 门火炮，增援这 2 个连。这些火炮主要用来压制俄军的炮火，而索尔比耶将军(指挥近卫军的后

备炮兵)则利用近卫军的榴弹炮猛轰俄军堑壕。一旦法军右翼和俄军交火，第3军的40门火炮将一齐向拉耶夫斯基棱堡开火。炮兵在作战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9月7日凌晨6时，佩内蒂所部率先向敌开炮，战斗由此开始。法军的进攻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些，因为那2个在夜间部署的炮兵连因火炮射程不足，不得不调动位置。俄军炮兵迅速还击。炮战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小时，整个战场硝烟弥漫，能见度下降，这给双方的近战增加了困难。

拿破仑的第1、3军一开炮，法军先头师便开始进攻。欧仁亲王率兵向博罗季诺村的巴克莱部队发动攻击，俄军被击退，未来得及拆毁科洛查河桥；但他们很快夺回了博罗季诺村。接着，俄军接到退回主阵地的命令，这一次他们拆毁了科洛查河桥。欧仁亲王在村中留了一个师的兵力和部分骑兵。大约上午9时30分他率余部渡过浮桥，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

与此同时，孔潘所率的第1军第5师在德赛的第4师的密切配合下，正向巴格拉季昂棱堡挺进。拿破仑希望法军所向披靡，但是俄军炮兵巧妙设防，向法军射出一排排炮弹，使法军纷纷倒下。更为不幸的是，此时俄军步兵也投入了战斗，将无情的子弹射向挺进中的法军。孔潘中弹负伤。达武的坐骑被击中，他本人也被震伤，只得离开战场，将指挥权交给德赛。双方大部分部队都投入到肉搏战中，战斗异常激烈。法军一度攻占了俄军阵地。但巴格拉季昂从图奇科夫将军的第3军调来2个旅组织反攻，终于把法军强行赶出了阵地。这时大约是8时30分。

坚守在指挥所的库图佐夫此时意识到，他的兵力部署太偏重右翼，而左翼兵力不足。于是他命令巴戈武特将军率领第2军绕道俄军后方，支援左翼中央。但就在这支部队准备行动之际，法军又向巴格拉季昂棱堡发动了猛攻。战斗相当激烈，法军先后攻占了两座棱堡，但在进攻第三座棱堡时受挫。在

关键时刻，英勇善战的缪拉亲自上阵指挥，基本稳住了阵势。

棱堡争夺战至少还要持续两个小时，此时它已成了各兵种参加的大混战。双方炮兵继续使成千上万人丧生；双方骑兵相互拼杀，淹没在马蹄飞扬、子弹呼啸的混战中；双方步兵刺刀相向，满脸是汗，浑身是血迹和泥土。俄军高级指挥官伤亡最为惨重。最为不幸的是，英勇善战的第 2 西集团军司令巴格拉季昂亲王也在战斗中负伤，并于两周后死去。

在这个血腥的早晨，两翼战场的情况怎样呢？在法军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行动缓慢，几乎到 8 时才和俄军投弹兵完全接上火。这支俄军担负着为第 3 军提供掩护的任务。由于俄军第 3 军已抽调部分人马去保护棱堡，加之前一天俄军参谋长拒不执行俄军总司令的伏击计划而使俄军暴露在危险的阵地上，法军的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

经过一场激战，俄军停止了抵抗，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乌季察村，而且还可能继续夺取村后那座具有重要战术价值的小山，严重威胁俄军左翼。为此，库图佐夫命令第 2 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这支部队的及时到达阻止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后续攻击，保住了高地。但是俄军军长图奇科夫却在战斗中阵亡。该翼的战斗平息下来。

如前所述，欧仁亲王夺取博罗季诺之后便率大军南渡科洛查河，准备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他在博罗季诺地区保留了一些炮兵，其炮火足以覆盖棱堡北侧。他还在科洛查河南岸部署了增援部队，企图在步兵进攻前以猛烈的炮火削弱敌方的防御。坚固的棱堡为俄军炮兵提供了较好的保护(步兵没有藏身之处)，而部署在棱堡后方、奉命坚守到底的第 3 骑兵军却遭受了巨大损失。

上午 9 时 30 分，欧仁亲王的步兵发起进攻，战斗同样很激烈。拉耶夫斯基的第 7 军因不得不派兵增援俄军左翼而兵力不足，无力控制谢苗诺夫斯卡娅的防线。尽管如此，法军

的第一次进攻还是被俄军击退了，而且伤亡巨大。但法军以莫朗的第 1 师(配属于第 4 军)和博纳米将军的第 30 步兵旅为先头部队，很快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些部队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战斗终于攻入棱堡，与高大健壮的俄军炮手展开了面对面的殊死搏斗。法军一度占领过阵地，但俄军很快又夺回了阵地，并最终通过白刃战将法军赶出了阵地。

棱堡周围的战斗异常激烈，此时格鲁希的第 3 预备骑兵军也投入了战斗，企图突破俄军仓促形成的方阵，但不仅没有得逞，反而遭到巨大损失。这时俄军又痛失一些高级将领，其中第 1 西集团军参谋长负伤，杰出的年轻炮兵指挥官阵亡。到 11 时 30 分，这些顽强抵抗的俄军士兵仍坚守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周围。拿破仑下令再次发动进攻，一支俄军突然向法军左翼发动袭击，迟滞了法军的进攻。

大约 10 时 30 分，库图佐夫得知法军没有在科洛查河的一个渡口设防，便命令乌瓦洛夫将军的第 1 骑兵军(约 2500 名骑兵)和普拉托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部队进攻留在北岸的法军。在阳光的映照下，这支阵容严整的俄军刀光闪烁。俄军约 8000 名骑兵击退了奥尔奈诺伯爵的胸甲骑兵和轻骑兵中队(其任务是保护拿破仑“大军”的左翼)，但未能攻破留守博罗季诺的法军 1 个师的方阵。当法军骑兵从南岸渡过河时，俄军经过较为激烈的交战后便撤走了。库图佐夫对两位骑兵指挥官行动拖沓，作战不力极为不满。但这支骑兵的出现(其哥萨克人活动在法军侧翼和后方)完全打乱了法军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前的计划和进展。

除上述左右两翼的进攻外，拿破仑在战斗打响后 1 小时左右发动了第三路进攻。这是在被摧毁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南面某处到拉耶夫斯基棱堡地区之间对俄军左翼中央发动的一次进攻。达武和内伊的部队联合实施了这次行动，并得到了在左翼进攻的拉图尔·摩布尔的骑兵和在右翼作战的南苏蒂

的骑兵的大力支援。和在其他地方的战斗中一样，双方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都投入了此次战斗。战斗开始时，法军照例先对俄军实施炮轰，俄军炮兵迅速还击，不断将实心弹、葡萄弹和榴霰弹射向仓促形成一道红蓝长墙的法军步兵纵队。不过这场战斗首先还是一场骑兵战。身穿艳丽服装的法军骑兵肩并肩排成一列列横队，步伐整齐地向俄军开来，继而便转入和俄军刀光剑影的拼杀中。

俄军虽然在作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果敢，但无论在殊死激烈的马战、步战还是谢苗诺夫卡河两岸的炮战中，它最终还是被法军击退了，这一重要战场开始陷落。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其所需要的只是抓紧时机，重新部署兵力，组织部队，恢复元气。由于拿破仑不在场，一直坚守在阵地最前沿的内伊和缪拉向拿破仑皇帝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破俄军的防线，这样便很可能赢得这场战役。然而，拿破仑犹豫片刻后拒绝动用他的预备队，从而坐失了良机。

于是，这场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又要打到下午乃至夜晚了。法军仍需攻克拉耶夫斯基棱堡。因为中午时分，俄军收复了拉耶夫斯基棱堡。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的骑兵对法军侧翼的威胁，迟滞了拿破仑命令欧仁亲王发动的下一次进攻。这对第 4 骑兵军无疑极为不利，因为就在欧仁亲王的部队准备阻止哥萨克人的威胁时，第 4 骑兵军也已前进至谢苗诺夫斯卡娅前沿。于是它不得不任凭棱堡中的俄军炮火轰击长达 2 个多小时，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将近下午 3 时，欧仁亲王已为另一次大规模进攻做好了准备。为配合欧仁亲王的进攻，位于谢苗诺夫斯卡娅和博罗季诺的炮兵连集中优势炮火对拉耶夫斯基棱堡实施了交叉火力封锁。

这主要又是一场骑兵的混战以及和往常一样的步兵的阵地争夺战。一个中队接着一个中队的骑兵投入到殊死的恶战

中。法军第 2 骑兵军军长蒙布兰将军不幸阵亡，战场上那刺耳、尖厉的刀枪撞击声一时间大作。拿破仑的一个随从参谋奥古斯特·德·科兰古将军接替了蒙布兰的职务。但他也在率第 5 胸甲骑兵团攻入棱堡时阵亡了。棱堡内的俄军炮手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西夫里准将率领的第 9 步兵团赶到后，俄军才被制服。棱堡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伤势严重的士兵倚靠在扭曲的火炮架上奄奄一息。

法军终于拿下拉耶夫斯基棱堡，但战斗又持续了 2 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几千骑兵卷入的大混战。欧仁亲王为达到突破俄军防线的目的，在棱堡后的高地上集结了所有可动用的骑兵。然后这一队队勇猛的法军士兵向集结在阵地上准备应战的俄军骑兵中队和紧随其后的步兵纵队发起了进攻。很快，俄法两军混战在一起。巴克莱·德·托利一直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指挥着他的轻骑兵和长矛骑兵冲杀，他的坐骑被击毙，他也险些丧命。正当骑兵混战时，双方的步兵和炮兵也都参加了战斗。战马在滑膛枪的呼啸中纷纷倒毙，轰鸣的炮声宣告了大批人的末日。这是一天中最后一场恶仗，简直可以和史诗相提并论。

到下午 5 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在法军右翼作战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向乌季察高地发动过一次猛攻。俄军的巴戈武特将军(早些时候他率第 2 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发现在中央和右翼的俄军主力已开始后退，自己已处于不利境地。为了行动上的一致，他也主动后撤，把阵地让给了波兰人。

战斗即将结束，和这一天中其他重大、激烈的战斗相比，此时相当平静。俄国人还在垂死挣扎，有人想如果这时拿破仑将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俄军必将全军覆没。但这位皇帝又一次没有这么做，而且这次包括贝尔蒂埃(拿破仑的参谋长)和缪拉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支持拿破仑的主张。库图佐夫在夜间决定第二天清晨把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他仍坚信

自己赢得了这场防御战。

双方的伤亡异常惨重，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死伤人数更为惊人。看来很可能有大约30%的参战人员负伤，但谁也不清楚确切的伤亡数字。据西尔·罗伯特·威尔逊将军说，俄军伤亡3.6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然而他并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整个战斗期间都在沙皇的大本营里。他提供的法军伤亡数字有可能是准确的(尽管他宣称法军只有26名将领伤亡，这个数字显然太低了，实际上是38人)，但俄军很可能损失了4万人。在这场会战中，尽管双方的总司令都没有立下卓著战功，但是双方下级指挥官却以他们的勇气，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发了部队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热情。

库图佐夫从容不迫地从博罗季诺撤下来，拿破仑并没有追赶他。9月13日，这位俄军司令在莫斯科城郊重新部署部队，打算在此抗击法军，但最终又被众人说服放弃了这个计划。于是他率俄军穿过莫斯科城继续后撤。9月14日下午，缪拉率领的第一支法国军队进入了莫斯科城。不多久，只见城中火光冲天，房屋倒塌，莫斯科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即便如此，9.5万人的“大军”余部仍有充足的房屋宿营。

和在战场上一样，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中同样表现出厌战的情绪，这是他的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看上去他再也无法打起精神，或对目前的窘境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向亚历山大发出了一连串和解信号。但亚历山大却坚持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个法国士兵，他就决不坐到谈判桌前。正当拿破仑举棋不定，行动迟缓时，俄军却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俄军招募了大批新兵，使它由进入塔鲁季诺时的8.5万人增至现在的12万人。直到10月19日，欧仁亲王才率领法军先头部队撤离莫斯科。拿破仑撤离得太晚了。这支“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所经受的艰难、恐惧和打击是举世闻名的。当内伊于12月14日率领七零八落的法军余部跨过俄国边界时，拿破仑

发动的这场最艰难、最残酷、伤亡最惨重的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图 17、博罗季诺会战(通往俄国西部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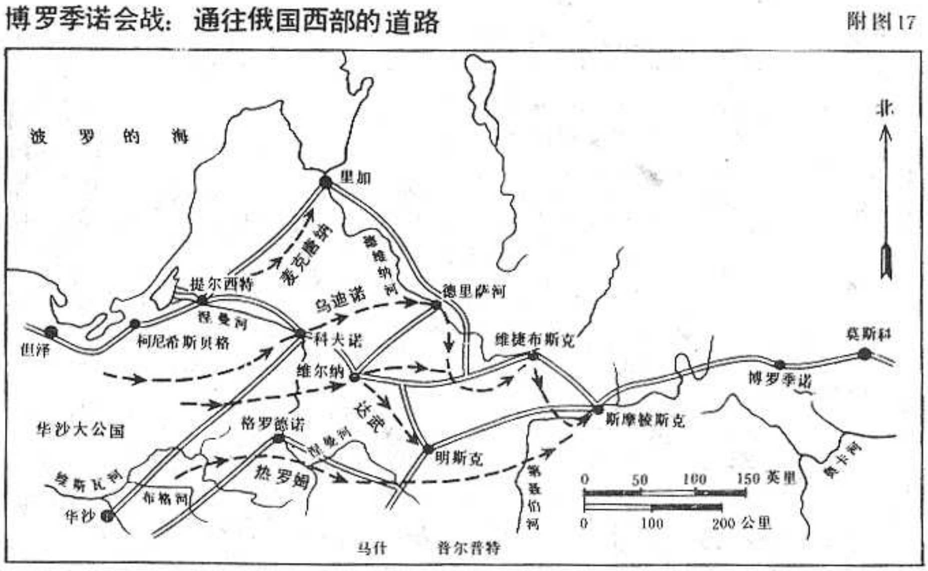



图 18、1812 年 9 月 7 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上午)

1812 年 9 月 7 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上午） 附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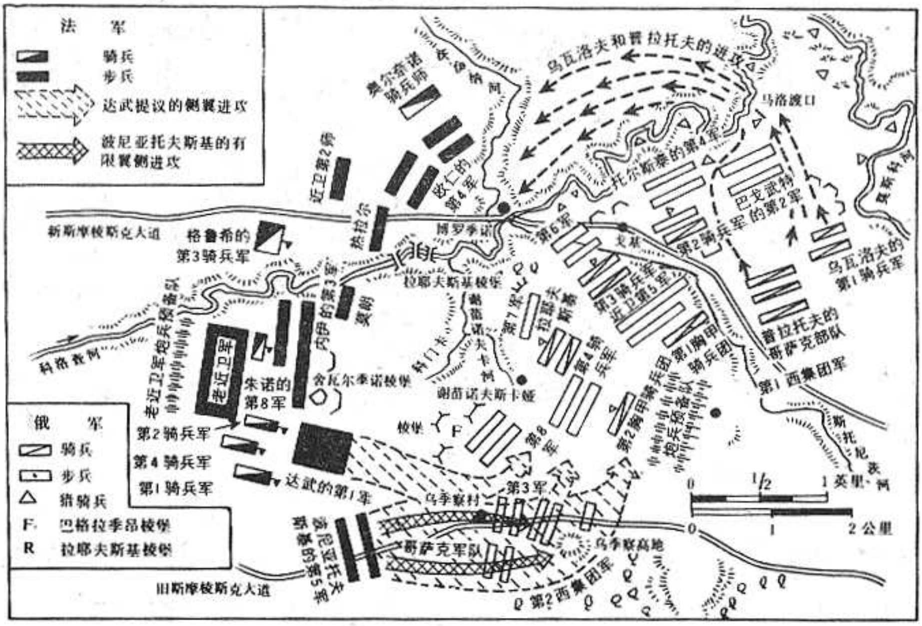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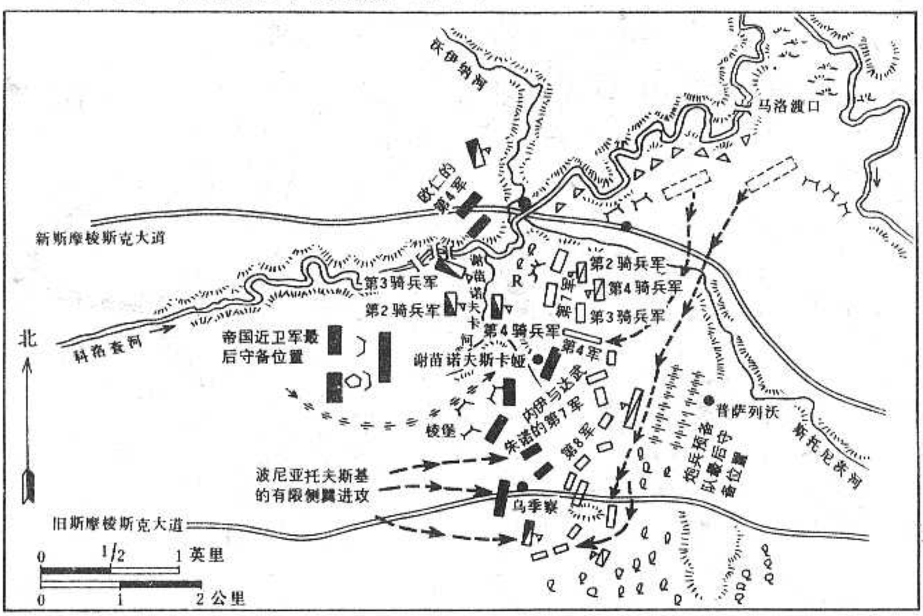



图 19、1812 年 9 月 7 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下午)

1812 年 9 月 7 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下午） 附图 19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能够影响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第一，达武提出的对俄军实施大规模侧翼进攻的方案；第二，俄军骑兵在法军左翼采取的行动；第三，拿破仑拒绝将其近卫军投入战斗的决定。此外还有两个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并且影响着整个会战的进程的因素，即给养问题和离开斯摩棱斯克的决定。

首先就这两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因素而言，给养问题又是最为关键的。可以说它是整个会战成败的基础。不过这不能归咎于拿破仑没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他对此曾有过很多考虑；但由于法军战线过长(300 英里)，部队成份复杂，交通困难，地形不利，特别是由于法军未能达到进行这场会战所要求的速战速决的目的，给养问题才显得格外重要。

拿破仑对入侵俄国一事已考虑数月之久，因此在进攻俄国的过程中，谈不上临时决断和仓促安排。法军在俄国边境以西建立了 9 座兵站，每座兵站都粮草充足，足够法军消耗多日。将这些粮草运送到前线的是由 5424 辆马车和 2400 辆牛车组成的辎重队(分成 26 支运输队)。这支运输队伍需要 20 万头挽畜(此外还有 11 万匹战马)，每头挽畜每天要消耗近 20 磅饲料。据计算，近 1/3 的随军粮草都被挽畜消耗了，这就显然难以长久维持一支远离兵站或给养地的前方部队了。

此外，一进入俄国，即使运输这些有限的粮草也变得十分棘手。虽然时值夏季，但除少数轻型车队外，绝大多数车队几乎无法在大路和乡间通行(主要是由于道路泥泞)，而且也没有适合放牧的牧场。于是法军不得不丢弃和就地消耗大批粮草。到达维尔纳之前，法军已损失 2 万匹战马(无疑这些马匹都被食用了，只是它们那皮包骨的尸体不可能成为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得不到很快的补充。以往，法军打一场胜仗后，往往都能就地得到粮草补充。但 1812 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军经过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都早被摧毁和烧毁了。当他们四

处掠夺时才发现整个乡村早已坚壁清野，俄国人把所有没烧毁的东西全部带走了。

面对如此不屈不挠的俄军和如此顽强的俄国村民，这位法国皇帝为保障他那支“大军”所需的大量供给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后勤保障计划都落空了。他早该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进行重大决断时就把给养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拿破仑在他精心安排的、旨在歼灭俄军的两次钳形攻势均告失败后，便决定对斯摩棱斯克发动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此时，俄军的第 1 和第 2 西集团军已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这场战斗在 8 月 16 日和 17 日两天进行。由于拉耶夫斯基的第 7 军在后方的猛烈进攻，也由于朱诺的行动缓慢，巴克莱·德·托利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瓦鲁季诺发动了一次较为顺利的进攻，俄军因而避免了在莫斯科大道与法军交火。拿破仑退回斯摩棱斯克，考虑下一步计划。

此时，他一定已经意识到整个会战将导致一场灾难。他已无可挽回地错误估计了亚历山大和俄国人。他虽曾试图以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使沙皇就范，但到目前为止，他没能达到这一目的。即使他胜利了，俄国人也会继续后撤到更远的地方，恢复实力，继续和他抗争。拿破仑此时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收兵回国，但这是拿破仑永远也不会考虑的；第二，在冬季坚守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以便等到来年春天再重整大军进攻俄军；第三，立即前进，以迫使俄军与法军决战。

就以上三种可能性而言，在斯摩棱斯克过冬的理由最具说服力。法军经过长途行军已减少到约 15.5 万人，他们有的病倒了，有的开了小差，有的被派去驻守兵站、补给点和交通线上的桥梁，还有的则在战斗中伤亡了。诚然，拿破仑仍占有数量优势，而且新补充的兵员也正源源不断地到达，但这

些人中大部分是需要花时间训练的新兵。由于大量马匹损失，他的骑兵威力大减，驮载炮兵也缺少补充马匹。食品越来越短缺，给养也已经消耗殆尽。另外，拿破仑虽然在两支增援部队的策应下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俄军也许只是在中央退却了，而在法军的侧翼仍十分活跃。此外，拿破仑统率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对他至多也只是三心二意罢了。

法军之所以急于继续前进，是想在冬季来陆前取得迅速的决定性胜利。这简直是一场赌博，因为拿破仑根本不知道俄军会不会停下来与法军决战。俄军很可能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的后勤给养更加恶化。另外，即使俄军真的停下来与法军决战，法军也会因损失严重，战斗力大减而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事实上，法军只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才有出路)。另一方面，假如拿破仑停止前进，给亚历山大 6 个月的喘息机会，沙皇就会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动员和训练新军，并从英国得到物质上的援助。现在人们会聪明而轻松地说拿破仑当时继续前进完全是个错误。不过人们也可能会说，假如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能象他先前那样指挥有方，他就很可能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这样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了。

拿破仑还是继续前进。也许他也有疑虑，因为 8 月 28 日当法军到达维亚兹玛时，正好天降大雨。30 日这位皇帝宣布：“如果明天继续下雨，我们就撤回斯摩棱斯克。”到了 31 日，天气放晴，于是法军又沿着通向毁灭的道路前进了 15 英里。据说，在博罗季诺的那天清晨，拿破仑面对破雾而出的朝阳，不禁转身对他的参谋惊呼：“这就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假如他在 8 月 31 日返回斯摩棱斯克，情况或许会更好，他也许会说：“多亏了维亚兹玛的大雨。”无论怎样，在踏上通往莫斯科的吉凶难卜的 280 英里长的路途前，在那个城市进行一个阶段的整编是十分明智的。

自渡过涅曼河到最终从莫斯科撤退，拿破仑身上除了他那

些过去的辉煌战绩还耀眼一时外，已明显地表现出异常的倦怠情绪。他那驰骋疆场，胆识超人的岁月正悄然逝去，他那坚定的信心和准确的判断力也丧失殆尽，他的威力已日薄西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未能出色地赢得博罗季诺这场会战。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拿破仑才拒绝考虑达武提出的将他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合并起来以及另派一支 4 万人的部队从后方卷击俄军左翼的建议。不过，这也许并不全是他的错。

达武的建议是在 9 月 6 日下午(战斗打响前一天)提出的。他的意图是想利用夜行军实施这一大规模迂回作战。拿破仑接到这个请求后，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两个难题：第一，俄军一旦得知这次合围行动之后，肯定会继续后撤，这是拿破仑一直担心的；第二，在丛林密布的乡间夜行军，不仅很难辨别方向，还会给人员和马匹造成不必要的疲劳，这势必会削弱部队进攻时的战斗力。此外还有第三点因素要考虑(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即长距离的侧敌行军将占用时间和抽出大量部队。如果时间上出了差错，俄军趁达武尚在途中就向法军发起进攻，那样就会出现最为严重的局面。

达武的想法与拿破仑面临困难时经常采取的做法非常相似，然而拿破仑可能(虽然不一定)不愿意让达武提醒他该做些什么，因为当时他和达武的关系并不很融洽。更大的可能性是，拿破仑当时对时间和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达武的行动建议太野心勃勃了。不管怎样，从右翼进攻巴格拉季昂的防守薄弱的左翼是有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 5 军还没有强大到能发动这样的进攻，他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得到增援后，他有可能采取虽不象达武深入敌后的夜行军那么惊天动地，但却更为保险的行动包抄俄军左翼。

库图佐夫个人对这场会战的影响甚微。但如果动用诸兵

种，并派更为果断的指挥官指挥作战，那么，他派骑兵对法军左翼实施的进攻就很可能对整个会战产生重大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个既有成功又有教训的极好例证。俄军骑兵极大地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假如俄军步兵协同作战，战果将会更大。

俄军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将军从马洛渡口渡过科洛查河后，很快便和守卫法军左翼的奥尔奈诺伯爵将军的意大利和巴伐利亚轻骑兵展开了战斗。结果，法军被击退，俄军还缴获了 3 门火炮。随后，普拉托夫率领 5000 名哥萨克骑兵跨过沃伊纳河，直插法军第 4 军德尔宗将军的第 13 师的后方，而乌瓦洛夫则从正面进攻该师。德尔宗一面慌忙命令部队迎战，一面派人紧急求援。于是法军第 3 骑兵师的第 6 和第 8 轻骑兵团迅速过河参战。在法军的进攻下，俄军骑兵丢下刚刚缴获的火炮撤走了。

乌瓦洛夫的进攻则拖拖拉拉，三心二意。他虽拥有 2 个驮载炮兵连，却没有步兵的支援，也没有充分利用这 2 个炮连的优势。如此少的兵力是不可能实施成功的迂回作战的。库图佐夫的意图也许是仅用佯攻来减轻中央阵地的压力。就此而言，他是完全成功了。法军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大约 3 个小时，俄军赢得了重新设防的时间，并用炮火沉重打击了在法军第 4 军渡河后接替其阵地的法军骑兵。

即使俄军从右翼调出了一部分部队去支援左翼，它也完全可以动用各兵种对欧仁亲王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将对法军造成严重后果。

无法断言，假如库图佐夫对欧仁亲王的侧翼发动强大的迂回进攻，他就能赢得这场会战。但是在谢苗诺夫斯卡娅村附近的战斗中，假如拿破仑把近卫军投入战斗，突破俄军防线，他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比实际战果更为卓著的成功。因此，有趣的是，拿破仑当时拒绝动用后备力量的原因之一，无疑是

不清楚在科洛查河北岸的欧仁亲王左翼的形势。

当中央战场、谢苗诺夫卡河两岸和巴格拉季昂棱堡周围的战斗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内伊也正受到第 2 西集团军的猛烈反攻，并火速求援。拿破仑犹豫了片刻，便命令指挥帝国近卫军维斯瓦波兰军团的克拉帕雷德将军前去增援。但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改派弗里昂将军的第 1 军第 2 师。这是这位皇帝第一次拒绝使用预备队。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一次)是在不久之后。弗里昂的部队以迪富尔旅长的轻骑兵团为先头部队，沉重打击了俄军，并最终在俄军最关键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缺口。

拿破仑是在舍瓦尔季诺附近的指挥所里(通常坐在椅子上)通过望远镜观察战斗进程的。他的身边几个团的近卫军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很想投入战斗。这时还在考虑下一步作战的缪拉和内伊派传令官来向拿破仑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时，给它以致命打击。拿破仑命令青年近卫军出击。然而这支部队刚出发，这位皇帝便取消了命令，而且未作解释。就在这时，拿破仑又接到第二次紧急求援，并得知俄军已派兵稳住了防线。于是他转向求援的贝利亚尔将军说："在我还无法看清整个战场形势之前，我决不使用预备队。"这样，近卫军步兵便一直按兵不动，一个看起来能以迅速果断的全体出击赢得这场会战的天赐良机就这样丧失了。

然而，这真的是个天赐良机吗？如果拿破仑尚处在壮年时期，而且又靠近本国作战，他或许真的会利用这个机会。但是现在由于年龄或许还有经验上的缘故，他变得谨慎了，另外远离本国无疑使他产生了不安全感。法军还没有达到这场会战的目的，近卫军又是拿破仑最忠实的家仆，因此是不能有任何不必要的牺牲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战场形势依然不明朗。如前所述，法军左翼的形势很危险，而拿破仑又得不到有关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 5 军作战情况的准确消息。最

后，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立于不败之地而又坚强无比的俄军。至于拿破仑当时是否应该派近卫军参战，现在还没有肯定的答案。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谨慎从事却很可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俄军迅速利用法军延缓进攻的时机，加快了增援的速度。

当晚，当这场可怕的会战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皇帝起身上马，来到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战场，察看俄军退出后的防线。但俄军仍坚守在从右翼的戈基到位于乌季察以东约 1 英里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一线。如果说这场会战有胜利者的话，那就应该是法军，它对俄军的最后一击很可能(尽管任何情况都不能肯定)将一次勉强的成功变成赢得这场会战的彻底胜利。

此时似乎还有人(虽然并不清楚是谁，因为那些先前叫嚷着采取行动的人，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希望看到拿破仑将近卫军投入战斗，以取得整个会战的胜利。据说拿破仑对这些人宣称："我不会让我的近卫军蒙受损失。当你在远离法国 800 里格[注：法国旧长度单位，1 里格约等于 4.5 公里。]之外时，你是不会拿住最后的预备队来冒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新生力量虽然无疑会给俄军以沉重打击，并将其击退，但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经过激战，近卫军面临的将是许多战斗。此外，法军骑兵也无法对俄军实施重大打击，而没有这样的行动，就无法全歼俄军。这样近卫军就会为很小的目的而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又有谁能在通往贝里斯纳的漫漫长路上保护这位法国皇帝呢？

尽管俄法双方都宣称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但是双方又都不敢说这所谓的胜利是出自他们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会战中确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以下指挥官，而且两军作战勇猛无比。尽管如此，这场会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互相猛攻的游戏，

无论是库图佐夫还是拿破仑都没有明确的会战目的。

库图佐夫由于年老体弱已无法有效地指挥战斗；而拿破仑那显赫一时的威力也已经开始衰退，这一点在这场重大会战中第一次暴露无遗。从博罗季诺到他退位之前，他偶尔显示出他那卓著的才干，然而遗憾的是，此时他原先的那些才华却不见了。而且有趣的是，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一切表现，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滑铁卢会战中。在这两次会战中，他都采取了正面进攻而不是侧翼进攻，而且两次会战中内伊在紧急关头提出的增援请求都遭到他的拒绝。他这种反常的优柔寡断和一定程度上的倦怠情绪在滑铁卢会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因素是他在滑铁卢失利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未能取得博罗季诺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的症结所在。

## 第 11 章、林尼之战(1815 年 6 月 16 日)

对于英国人来说，滑铁卢战役很可能要比其他战役更为著名。在滑铁卢，非同凡响的拿破仑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如此惨重，以致于 180 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常说某人“遇上了他的滑铁卢”[译者注：意即遭受重大挫折]。确如威灵顿公爵所说，这是“你平生所见到的最接近成功，而又功亏一篑的事件。”的确，如果布吕歇尔所率领的普军受到阻止，不能与英荷联军汇合，拿破仑就很可能踏上通向布鲁塞尔的坦途。

林尼之战是拿破仑赢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是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两天进行的。这一胜利原本可以使拿破仑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 6 月 16 日和 17 日出现的拖延和偏差，拿破仑功败垂成。

1815 年 2 月底，拿破仑决定结束他在厄尔巴岛的流放生活，重返法兰西，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王朝”由此开始。这是一

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冒险行动，路易十八对拿破仑的报复性作法迫使拿破仑作出了这样的决策。对于拿破仑来说，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同样由于国王的蠢行，整个法兰西相当动荡。3 月 1 日，拿破仑和容许他保留的，由 1000 名官兵和 4 门火炮组成的部队，在戛纳附近登陆。当拿破仑前进到格勒诺布尔南面时，一个军团封锁了他的去路。然而，拿破仑以他的沉着冷静和大智大勇赢得了这个军团的拥戴。躲过了进军途中这次唯一的真正的危机之后，这位皇帝于 20 日抵达巴黎，并胜利地进入杜伊勒里宫。

拿破仑对同盟国政府允许他保留帝位几乎不存任何幻想，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友好的试探。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国内和平势力。然而，即使拿破仑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没有愚蠢而仓促地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意大利北部败北，拿破仑也丝毫没有成功的希望。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已签订盟约。不久，法国皇帝就会发现，法国已几乎被人数超过 66 万人的庞大军队所包围。年底以前，这些军队的人数还会大大增加。面对这种威胁，1815 年法国军队只有 14.92 万官兵可以立即投入战争。但是，很多退役老兵很快就志愿重新入伍，1813 年度的应征士兵，也被从预备役中召回，虽然装备这些人还需要一定时间。此外，为了保卫漫长的边界，还需要动员 200 个营(每个营由 560 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当时，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要么坐等挨打，要么对离他最近的同盟国军队主动出击。如果选择前者的话，尽管同盟国在大约 3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攻破巴黎的防御，拿破仑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动员和训练新兵，但是法国大部将被同盟国占领。如果选择后者，拿破仑就要对威灵顿公爵的 11 万人的英荷联军(其中有 1.7 万人执行卫戍任务)以及冯·布吕歇尔亲王的 11.7 万普鲁士人发动进攻。

当时，作为同盟国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部队正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列日开来，准备进攻。5月，拿破仑选择了后者。很显然，只有主动出击，拿破仑才最有获胜的希望。若能迅速取胜，拿破仑就会大有所获。但是，由于当时有 2 万人被派往旺代去镇压那里发生的叛乱；同时，许多要塞和据点也要派人扼守，因此，北方军团仅有12.27 万人和 366 门火炮。这意味着，拿破仑必须将对手分割开来，各个歼灭；否则，他将处于劣势。

拿破仑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便把法国推向战争，从如此浩繁的工作中一点儿也看不出皇帝有什么病痛，虽然他很快就要受到病痛的折磨。到 6 月份，已有 56 万人武装了起来。其中有 19.6 万人编成了有建制的战斗部队。然而，装备和武装这些新兵比招募这些人困难更大。不过军火库还是相当充实的。概略地说，前线士兵的装备与武器均达到了欧洲的标准水平。此外，虽然北方军团里有许多新兵(由 1.85 万人组成的精锐的近卫军中有 4000 名新兵)，但是，退伍老兵占了大部分。因而，总体来说，这支军队的素质比英荷联军和普军都高出一筹。当时，英荷联军和普军中有许多新组建的民兵营，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矛盾。

在拿破仑的队伍中，也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低级军官对拿破仑极为忠实，但是对他们的高级军官却极不信任，心怀猜忌。这些高级军官在拿破仑流放期间，曾拥戴波旁王朝，在波旁王朝的宫廷中耀武扬威。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拿破仑对于将领的挑选，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拿破仑确实在人员的任免上，犯下了某些灾难性的导致战役失败的错误。

拿被仑任命苏尔特元帅为参谋长，因为他没能劝说贝尔蒂埃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贝尔蒂埃曾经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他于 6 月 1 日自杀)。苏尔特虽然是一位骁勇的将军，但他从未

任过参谋。更令人痛苦的是，他缺乏贝尔蒂埃那种清晰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他常在战斗中发出混乱的消息与命令，致使下级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无法作出决定。如果贝尔蒂埃在的话，这些命令和消息会清楚得多，准确得多。实际上，叙歇元帅任参谋长，要比苏尔特更为合适，而苏尔特则是比内伊更好的侧翼指挥官。

一开始，法国的骑兵归格鲁希指挥；尔后，克勒曼接替了格鲁希。其实，当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却非缪拉莫属。然而，由于他惹恼了皇帝，因而受到了冷落。如果缪拉在滑铁卢出战，他决不会让骑兵作出那种自我毁灭的举动。

格鲁希被从骑兵调离后，受命指挥右翼法军。由于在法国南部表现出色，他刚刚被提升为元帅。格鲁希的确是一位能干的骑兵指挥官。然而，在指挥大规模各兵种作战方面，他却没有一点经验。起用达武为侧翼指挥官远比任命格鲁希更为妥当。然而达武却被派到巴黎任行政长官，他的才能被白白浪费掉了。格鲁希应该还去指挥阿尔卑斯军团，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留给他的。

内伊是直到最后才被召来指挥法军左翼的。起用内伊虽然在政治上有些益处，可是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素有“最勇敢的勇士”之称的内伊，是一位受士兵尊敬的出色军人，然而，他脾气暴躁，变化无常，缺乏担任重要指挥工作的才智。他可以去指挥预备队或取代生病的莫蒂埃指挥近卫军。这两支部队都是准备用来给敌人以最后重创，并直捣敌人心脏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某些人事安排极其糟糕。有太多的优秀将军遭到冷遇。拿破仑马上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暴露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部队从各要塞和卫戍地——有些距比利时边境1000多英里—

—向比利时边境的集结进行得格外迅捷。为了保密，部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拿破仑还进行了一些欺骗敌人的部署，佯装有可能取道蒙斯，切断英荷联军的海路。拿破仑十分了解出兵神速，出敌不意的必要性。到 6 月 4 日时，所有各部队都已开始行动，整个大军小心翼翼，巧妙高明地向桑布尔河方向推进。6 月 12 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拉昂。此时，法军已接近比利时边境，而同盟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尚一无所知。

14 日晚，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已到达博蒙附近，战争的车轮移到了那里。位于博蒙城前不远处的是第 6 军(洛博指挥)和第 3 军(旺达姆指挥)。由 4 个骑兵军组成的格鲁希的骑兵预备队还在博蒙以东 10 英里处，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苏尔特忘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第 2 军(雷耶指挥)的前锋在蒂安露营过夜。该部队的后面是戴尔隆的第 1 军，该军位于索拉斯桑布尔附近；而这时热拉尔的第 4 军则稍稍有些掉队，还在菲利普维尔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整个大军都集结到了不到 20 英里长的战线上，并做好了于 15 日清晨靠近并渡过桑布尔河的准备。

拿破仑的总体计划极为简单。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胜利是十拿九稳的。拿破仑打算在两支同盟国的军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将他们分割开来，各个歼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部队在渡过桑布尔河之后将被分成两翼和一个预备队。拿破仑将根据实际情况，将预备队投入战斗。以沙勒罗瓦为三角形的顶点，两翼部队将分别沿着该三角形的两边向北推进，与同盟国的两支部队交战。其中的一翼，在预备队的支援下，将彻底消灭兵力较弱的那路敌军(假设为普军)，而另一翼则要牵制人数较少的那部分敌军，或者受命去增援主要战斗。一旦敌人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法军便将集中兵力，以压倒优势向余下的同盟国军队发动进攻。

内伊元帅直到 15 日傍晚才报到，他受命指挥左翼部队。左翼部队包括第 1 军、第 2 军、2 个轻骑兵师以及骑兵军中的 2 个师，总兵力约为 4 万到 4.5 万人。指挥法军右翼部队的是格鲁希元帅，该部队包括第 3 军和第 4 军，人数与左翼大体相当。近卫军、洛博的第 6 军以及骑兵军中尚未分派战斗任务的骑兵组成了预备队。当时，法军的每个军都是由 3 个兵种组成的独立单位，因为拿破仑坚信各炮兵团应成为各个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法军中永久配有炮兵的最小作战单位是师。

这时候，同盟国军队的状况又如何呢？威灵顿原本就一直担心自己的右翼，拿破仑的欺骗措施使威灵顿更加确信，敌人将从蒙斯方向实施进攻。6 月中旬，第 1 军(奥伦治亲王指挥)各师分散部署在昂吉安、尼维尔和苏瓦尼，军部设在布赖纳孔特。第 2 军(黑尔将军指挥)部署在阿特、格拉蒙和奥登纳德，军部设在阿特。预备队(2 个英军师和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军)驻扎在布鲁塞尔附近。骑兵(伯爵阿克斯布里奇将军指挥)主要部署在格拉蒙、尼诺弗和唐德河沿线。布伦瑞克的分遣队则驻扎在布鲁塞尔。此外，在蒙斯前方的附近地域，还驻有 3 个旅，以支援警戒部队。如果遭到突然进攻，如此分散的英荷联军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在同盟国军队看来，发生这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拿破仑迅速集结起部队，跨过桑布尔河，在沙勒罗瓦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威灵顿是否大吃了一惊？对这一问题，人们多年来进行了许多议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威灵顿的确吃惊不小，而且由于部队部署分散，联络不畅，他们很难遵照 5 月 3 日与布吕歇尔达成的协议，在遭到法军进攻时向松布雷夫地区的普军靠拢。不过，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同盟国并未同法国正式开战，因此，派遣侦巡队越过边境是不允许的。然而，极力为威灵顿辩护的代表人

物西博尔纳断言，前哨部队传来的消息足以使威灵顿对拿破仑的进攻预有准备，而且从一旦知道了拿破仑的进军路线(无论法军从那个方向进攻)就能做出反应这个方面来看，他的部署和集结方案是很恰当的。

就算西博尔纳可能是对的，但不管怎样说，似乎直到 6 月 15 日下午 3 点钟，威灵顿才接到普军在蒂安遭到法军进攻的确切消息。由于没有从布吕歇尔那里得到任何音讯(同盟国之间这种缺乏联络的现象，差点导致灭顶之灾)，威灵顿还在认为敌人有可能从西面进军，切断自己的海路。因而，在前两次下达的命令中他把部队先期集结的重心主要放在了西面而不是内侧。在里奇门德夫人的庆祝舞会上，威灵顿才终于从各种情报中了解到了真情。他马上发布了第三道命令。这次，他命令部队向内侧的四臂村方向集结。要不是康斯坦·勒贝克将军(奥伦治亲王的参谋长)急中生智，没有听从威灵顿的命令，先后派出了 2 个旅去阻截法军，即使威灵顿下达了上述命令，也为时过晚了。

然而，先与法军接仗的还是普鲁士人。3 月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已下令实行总动员。在陆军元帅冯·布吕歇尔未到之前，他的强干的参谋长伯爵冯·格奈森诺中特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要组建 7 个军，困难是相当多的。甚至直到 6 月份，尽管已经费了九年二虎之力，准备在滑铁卢投入战斗的 4 个军仍未全部满员。这种情况在炮兵中尤为突出。这支新建的部队包括许多民兵团和一些来自德国西部，曾在拿破仑麾下打过仗的士兵。他们在训练、装备和经验各方面都无法与他们将要对抗的敌人相比。

由于当时普鲁士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因而布吕歇尔的 11.7 万人的部队在扎营、补给方面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战争恰在此时爆发了。6 月中旬，普军的部署情况如下：第 1 军(齐坦指挥)的总部设在沙勒罗瓦，其各旅均部署在边

境沿线，以便在敌军发起进攻时，及早发出警报，并为其他 3 个军的集结提供掩护。第 2 军(皮尔希一世指挥)部署在那慕尔—惠伊一线。第 3 军(蒂勒曼指挥)总部设在迪南，有 2 个旅分别驻在锡奈和惠伊。第 4 军(比洛指挥)部署在更靠后的列日地区。骑兵预备队驻松布雷夫。炮兵预备队驻藏布卢。军团总部设在那慕尔。普鲁士的每个军下面不设师，而是由 4 个旅组成，每个旅下辖 3 个团，每个团则下设 3 个营。每个军至少配有 2 个骑兵旅，12 个炮兵群，96 门火炮。这样，包括轻工兵、工兵和部队的一般保障人员，普军的 1 个军通常由 2.5 万到 3 万名官兵组成。

6 月 15 日凌晨 3 时，北方军团开始横渡桑布尔河。左路纵队从蒂安向马希埃纳进军；中路直指沙勒罗瓦；右路纵队从热尔皮纳向夏特莱挺进。整个计划本身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两件意外事故。由于命令传递过程中的差错，加之旺达姆的疏忽，第 1 军和第 3 军的出发时间晚了。第 4 军热拉尔部直到早上 7 点钟才完成集结任务；而后热拉尔部先头师的指挥官布尔蒙带着 5 个参谋人员，投靠了敌方。在旺代的暴乱发生后，布尔蒙的家属曾遭到报复。尽管有此不幸，正象布吕歇尔十分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心怀不满的将军的卑鄙的叛国行径。当天晚上，热拉尔军之所以没能全部渡过桑布尔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叛逃行动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布尔蒙提供给敌人的情报没有多少价值，然而他的背叛使整个部队的士气受到了影响。

齐坦的普军第 1 军的前哨线，从迪南向西一直延伸到班什南面，长约 50 英里。齐坦果断地与法军展开了阻滞战，这为布吕歇尔完成在弗勒吕地区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但是，在撤退中，他们却没有摧毁位于桑布尔河上的马希埃纳、沙勒罗瓦和夏特莱三处桥梁。拿破仑原本希望在早上 9 时以前拿下

前两座桥，然而由于旺达姆动身太晚，帕若的骑兵(第 1 骑兵预备军)在沙勒罗瓦城前没能得到任何增援，直到中午法军才攻克该城。由于施泰因梅茨将军率其旅殊死抵抗，马希埃纳方面的法军也出现了延误。在右翼，虽然普军已经被迫后撤，但是热拉尔也只有 1 个师渡过了桑布尔河。

尽管如此，刚过中午，拿破仑的部队便扫清了桑布尔河一线的敌人。至此，拿破仑的进军还是较为顺利的。此时，普鲁士人正在戈塞利和吉里城前严阵以待，在这两个地方将要有两场恶仗。内伊和他的部队一赶到，拿破仑就将左翼的指挥权交给了内伊。拿破仑给内伊下达的任务是，将敌人赶出戈塞利，并沿着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北上，向英荷联军所在的四臂村进军。但是，在这一口头命令中，拿破仑很可能没有提出内伊要在 15 日拿下四臂村。

几乎同时，格鲁希受命指挥右翼。皇帝亲临右翼，与格鲁希一起商讨进攻计划，准备将敌人逐出吉里和弗勒吕。然而，不幸的是，旺达姆作为右翼的一部分，本应听从格鲁希的指挥，但他却认为，格鲁希只不过是一个骑兵指挥官罢了。两个指挥官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争吵了整整 2 个小时。直到下午 5 时 30 分，拿破仑赶上来，进攻才开始。吉里不久就被拿了下来，然而，进攻弗勒吕的时间却被延误了。

当天夜里，左翼的法军也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宿营的。为了保卫戈塞利，施泰因梅茨的部队再度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下午 3 时，普军已承受了惨重伤亡之后，法军才攻克该城。此时，尽管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已被打开，然而，佩尔蓬谢将军的第 2 荷兰—比利时师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该师的 2 个旅很快就进入了四臂村至弗拉斯内一线的阵地。当天晚上，雷耶军的 1 个师攻占了弗拉斯内，但是，皮尔将军的轻骑兵在向四臂村推进时，却在博斯伍德地区遇到了萨克森—魏玛亲王伯思哈特率领的拿骚团的顽强抵抗，

被迫撤了回来。这时，四臂村的普军又得到了增援。鉴于部队在经过19个小时的行军作战后已精疲力竭，内伊决定在弗拉斯内城及其附近宿营。

布吕歇尔一接到法军向桑布尔河进军的消息，便马上命令齐坦边撤边与敌人展开战斗，以便掩护其他各军进行集结。如上所述，齐坦以超人的技巧与勇气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普军也损失了1200人。在此之后，齐坦军撤到了林尼的预定阵地。该军是那天夜里普鲁士的4个军中唯一到达指定地点的军。

皮尔希一世率领的军是在距林尼约6英里的马济露营的。蒂勒曼则在15英里以外的那慕尔。最远的要算奉命前往阿尼的比洛了，然而身在列日的比洛却根本不知发生了战事，他不慌不忙地行动，并传信说，他将在16日中午以前到达阿尼。这一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布吕歇尔总部，并且布吕歇尔给比洛的进一步的命令又传错了方向。在这份命令中布吕歇尔曾要比洛向松布雷夫进军。这样，第4军于16日在林尼投入战斗的计划，已成泡影。如果第4军能赶到林尼，整个战局或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6月16日清晨，当拿破仑对近来部队的机动及作战情况进行审度的时候，他感到心满意足。部队接敌行动的隐蔽和巧妙再度反映了他昔日的才能。当时所取得的成果，已使拿破仑控制了直指同盟军心脏的两条道路。而且，拿破仑已沿着这两条路向前推进了很远。同盟国军队只得后撤，否则他们将很难汇合。拿破仑觉得是实施此次行动的基本方针(即把部队分成两翼和预备队作战)的时候了，这一点在他给内伊的手谕中有详细的阐述。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不幸事件。拿破仑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受到了影响，不再是那么清晰，那么具有连贯性。在博罗季诺之战中，这种迹象就已经隐约出现了。拿破仑已

不再象从前一样精力充沛，头脑敏锐。衰老正悄悄地走向拿破仑。此时，老拿破仑本应将其极其分散的后方部队迅速集中起来，而他却沉浸在毫无根据，充满希望的想象当中。皇帝确信，普鲁士人决不会据守林尼。由于拿破仑过份低估了布吕歇尔的人数和意志力，由于他认为威灵顿会撤至布鲁塞尔，因而，16 日拿破仑给内伊和格鲁希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乐观得近乎荒谬。他指示内伊攻下四臂村，向布鲁塞尔挺进。皇帝希望，他本人当天就能到达布鲁塞尔。格鲁希的行动要与此并举，将普鲁士人推至藏布卢以至更远的地域。

直到上午 11 时，拿破仑到达先头部队时才发现，普鲁士人还在坚守林尼。虽然拿破仑仍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一支顽强的后卫部队，但他还是立即更改了计划。此时，克勒曼的第 3 骑兵军已归内伊指挥。拿破仑命令内伊攻占四臂村，牵制住威灵顿。向普军实施主要攻击的任务将由右翼集团担任，必要时，内伊也可能受命对右翼法军进行增援。然而不久，拿破仑便意识到，格鲁希率领的右翼 4.5 万法军几乎是在与所有的普鲁士军队交战。

普鲁士军队占据的阵地，是经过事先选择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该阵地屏护着通往比利时北部和德国的各条道路。普军阵地沿那慕尔—尼维尔路展开，从布里城北面的罗马古道与那慕尔—尼维尔路的交汇点，向东一直延伸到至冬克林尼小村北面的十字路口。战斗主要是在几个谷地中的小村庄及其周围进行的，这些小村庄均坐落在西起圣阿芒东到巴拉特，以林尼为中心的、周围低丘环抱的一个盆地之中。林尼被一条小溪分成两半，街道狭窄，然而，该地的许多房屋都筑有坚固的墙壁和围墙，可以作为很理想的坚固支撑点。林尼四周是一片湿地，生长着高高的黑麦。

齐坦军是唯一能在 16 日清晨进入阵地的普军部队，该军的各个旅分别占领了布里、圣阿芒、圣阿芒拉耶以及林尼。

普军是以各营混合编组的形式驻守在这些村镇的。这给他们控制街道和村落周围的战斗造成了很大困难。皮尔希二世指挥的旅在布里和林尼之间构成了第二道防线。骑兵预备军占据了后方和左侧的阵地。皮尔希一世的第 2 军于中午时分从马济赶到，并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尼维尔—那慕尔路罗马古道至松布雷夫一段。蒂勒曼的第 3 军直到下午将近 3 时才从那慕尔赶来。他的 4 个旅在松布雷夫东面的岔路口至巴拉特的三角地带，扼守战线左翼。布吕歇尔试图用 8.4 万人的部队和 224 门火炮占领长达 7 英里的阵地，这种部队人数与防御正面的比例远远低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平均水平。这很可能说明，布吕歇尔当时预计他定能得到比洛或威灵顿的增援，或许他还能同时得到两者的支援。

10 时 30 分左右，威灵顿到达了四臂村。在接管了那里的指挥权，并下达了必要的命令之后，威灵顿策马穿过阵地，前去会见布吕歇尔。在布里和林尼之间的比西磨坊，他见到了布吕歇尔。当时，普鲁士的军队已被部署在前斜坡的阵地上，普军预备队也被部署在斜坡上，而且预备队距离前方一线部队太远，根本无法给予及时的支援。对此情形，威灵顿只瞟了一眼，就忍不住对布吕歇尔和格奈森诺说，尽管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部队，但是，如果他的军队如此布阵的话，定会遭到敌人的打击。然而，普鲁士人把这一明智的劝告当成了耳旁风。格奈森诺原本就不相信，威灵顿是一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战斗进行到底的有才干的将军，这下，他更不信任威灵顿了，威灵顿与普军将领一起讨论了作战计划，但在威灵顿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援普鲁士人的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公爵甩下这么一句话，“好吧，如果我没遭到进攻的话，我就来，”然后便策马而去。

此时，拿破仑正急于趁布吕歇尔还在集结各军的时候，加紧对普军进攻。但是，在此之前，拿破仑必须对以下两点十

拿九稳：其一，内伊在四臂村已牵制住了英—荷部队；其二，热拉尔必须赶到，在进攻中充当法军的右翼。他的计划是，以格鲁希的骑兵为主要力量，消灭普军的右翼。与此同时，法军主力将在内伊的支援下向普军的中央和右翼发起进攻。拿破仑要阻止溃败的普军与威灵顿汇合，确保同盟军无法集结。在林尼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成了这场战争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加上迟迟才奉命从沙勒罗瓦北上的洛博军，拿破仑共动用了 7.12 万人(包括 1.3 万名骑兵)和 242 门火炮，与共有 8.34 万人(包括 8150 名骑兵和 224 门火炮)的布吕歇尔展开了激战。然而，如果拿破仑能消灭蒂勒曼军，他就能在中路和右翼同时作战。

在 11 时和 12 时之间的这段时间，法军的轻骑兵已经挺进到弗勒吕，并很快将普鲁士人的前哨部队——第 6 枪骑队击溃。当时，勃兰登堡龙骑兵(齐坦骑兵预备队的一部分)正在林尼墓地之前据守。这些溃败的部队在撤退中占领了勃兰登堡龙骑兵左侧的阵地。下午 1 时，热拉尔赶到。至此，拿破仑已完成了他的作战部署。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旺达姆军将在左侧向圣阿芒的普军阵地率先发起进攻，该军得到了正与内伊并肩作战的雷耶军的吉拉尔将军所率领的 1 个师的加强。吉拉尔将军的师组成了旺达姆军的左翼；它的左侧是多芒将军的第 3 骑兵师。热拉尔军一到，便奉命沿弗勒吕路北上，占领从林尼墓地至蓬得里奥山南麓一线朝向左侧的阵地(与旺达姆军的进军路线正好相交成直角)。格鲁希所率骑兵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普军左翼，为使他完成这一任务，拿破仑将帕若的第 1 骑兵军和埃克塞尔曼斯的第 2 骑兵军以及热拉尔的两个步兵营交他指挥。近卫军和米约的第 4 骑兵军被部署在弗勒吕附近。洛博的第 6 军还在从沙勒曼瓦北上的途中。

内伊一上午接到了拿破仑的好几份指令，被弄得有些晕头

转向。这也是内伊没能掌握主动权的部分原因。下午 2 时，苏尔特给内伊发出了另一份指令。然而这份指令直到下午 4 时才到内伊手中。苏尔特在这份指令中告知内伊元帅，皇帝准备在 2 时 30 分同普军开战，内伊的任务是，攻击其正面的敌军，并在将敌人逐退后，即刻回师林尼，包抄布吕歇尔的左翼和后方。1 个小时后，苏尔特又发出了进一步的指示，其目的是增加内伊的紧迫感，促使内伊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些指示纰漏百出，内伊根本没能搞清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尼之战终于在下午 2 时拉开了战幕。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从在当日彻底打败普军，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方向的战役目标上看，这场战斗已开始得太晚了。由于法军上午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中强调迫切性不够，两翼的法军部队均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纵使这些延误没有完全葬送拿破仑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大大减少了。

最先与敌人交手的是旺达姆的先头师。他们向圣阿芒的守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整个下午和晚上，圣阿芒和华格里尼附近的战斗格外强烈，村庄几次易手。双方的枪弹象暴风中的雨点洒向对方的冲击步兵。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先后向对方发起攻击，又先后被对方的弹雨击退。拿破仑决意迫使布吕歇尔投入预备队，以便支援受到强大压力的中路与右翼。布吕歇尔的预备队排列在一个前斜坡上，又远在支援距离之外，所以当法军火炮群开火时，这些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旺达姆命令在左翼的吉拉尔师向北推进，在左侧多芒骑兵的支援下，攻取圣阿芒拉耶。该师执行了这一命令。但齐坦动用预备队猛烈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小村四次易手。吉拉尔损失了 2 个旅的兵力，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布吕歇尔离开了他的指挥所，亲自指挥普军向仍在试图攻占并坚守圣阿芒拉耶的左翼法军又发起一次新的粉碎性的攻击。直到下午 5 时，普鲁士人仍占据着圣阿芒、圣阿芒

拉耶以及华格里尼。

与此同时，热拉尔军向驻守林尼的普军展开了攻势。这里的战斗恐怕是这场恶战中最艰苦的战斗，民房、教堂、城堡以及小溪两岸均成了厮杀的战场。两军官兵在殊死的搏斗中杀得难解难分，一方刚刚占据优势，另一方又马上将优势夺回。防御工事和据点被炸得粉碎，阵地上到处横躺着死伤的士兵。这些士兵的伤口上爬满了苍蝇。鲜血将小溪染得殷红。

在法军的右翼，格鲁希的部队出色地牵制着蒂勒曼的第 3 军。尽管从热拉尔军调来的 2 个营对冬尔林赖纳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右翼的法军还是将普鲁士人赶出了布瓦涅。冯·德·马威茨上校的骑兵旅奉命前去增援普军右翼后，蒂勒曼所统辖的左翼普军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几乎同时，布吕歇尔命令皮尔希将军率领他那实力相对保存完整的部队参加正在林尼与圣阿芒拉耶之间进行的战斗。

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战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尽管洛博的第 5 军尚未到达拿破仑的指挥部，但是洛博已掌握了近卫军的 1.8 万人以及米约军的 8 个胸甲骑兵团。当洛博正准备命令这些部队向已大为削弱的普军右翼和中央开进的时候，旺达姆向他发来了紧急通报，这使他不得不推迟行动时间。旺达姆告知，有一支各兵种组成的庞大纵队，正向法军的左后方和弗勒吕方向移动。旺达姆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因而已抽调了 1 个师的兵力保卫弗勒吕。拿破仑被弄糊涂了(布吕歇尔当然也一样)。尽管拿破仑正期望着内伊的增援，但是，内伊的增援部队不应来自这一方向。他担心，这可能是威灵顿在四臂村战胜内伊后派出的部队。最后法国人终于搞清楚，这支部队原来是戴尔隆军，然而这时，大好的进攻时机已被错过。戴尔隆的部队在梅赖北部与敌军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骑兵战，然后便在战场西面消失了，这一情况越发使人摸不着头脑，戴尔隆的确留下了 1 个师和一些骑兵作为联络部队，

但是，由于他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苏尔特，因而这些部队基本上没派上任何用场。

截至下午 7 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然而，拿破仑手中还有一支庞大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45 分钟以后，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在隆隆的雷声与法军炮火的轰鸣声中，近卫军和胸甲骑兵发起进攻了。尽管普鲁士人这时已疲惫不堪，但在那些身材高大，头戴熊皮帽的士兵们的新的、强大攻势面前，他们的意志与勇气却丝毫没有减退。普军仍坚守着林尼以及其他村落。但是，米约伯爵的骑兵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普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布吕歇尔派了一个随从参谋告知威灵顿，他不得不后撤了[注：温特菲尔德少校虽然负了伤，但还是找到了英荷联军。然而由于发生了一系列误解，他的口信最终还是没有传给威灵顿。]。然后，他身先士卒，亲率一队骑兵，孤注一掷地向法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冲击。然而，事与愿违，这位勇武王子的坐骑中弹仆地。幸亏运气好，也幸亏随从参谋诺斯蒂茨伯爵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布吕歇尔才没被法军发现并俘获。这位陆军元帅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被从战场上一直转移到较为安全的让蒂纳接受治疗。

当大雨滂沱，昏暗的天空被炮火的曳光映红之时，普鲁士人在蒂勒曼军的攻势掩护下，从容有序地撤出了阵地。在蓬得里奥山周围的凹地上，蒂勒曼军对法军发动了进攻，并把法军牵制在那里。这一进攻给了撤退的普军以极大的帮助。法军对撤退的普军没有进行追击。拿破仑赢得了他最后一次胜利。然而，在这仅约 2 平方英里的相对封闭的战场上，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多达 2.7 万具。在这场战斗中，普鲁士人阵亡 1.6 万人，并损失了 21 门火炮。

在林尼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内伊元帅率左翼法军在四臂村与威灵顿的部队也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于晚上 9 时停息下来，双方除了各自损失约 4000 人以外，均未取得决定性的

战果。在戴尔隆的支援下，倘若内伊命令雷耶军投入战斗，他定已取得胜利。即使到下午 2 时 30 分时，面对雷耶的 2 万人，英荷联军也只有的 8000 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英荷联军的阵地周围布满了树丛和高高的作物，十分有利于防御，加之法军指挥官过份谨慎小心，因此，佩尔蓬谢将军守住了阵地。下午，英荷联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对于内伊而言，早上是取胜的黄金时机，下午机会也不错，但是到下午 6 时 30 分后，所有机会都已丧失掉了。威灵顿已拥有 3.6 万人，在人数和火炮数量上都占据了优势。当战斗结束时，英军仍牢牢地控制着原来的阵地。内伊本来应有更出色的表现，但苏尔特元帅发来的相互矛盾的命令却把他弄得烦燥不安，无所适从。因此，左翼法军痛失良机的责任不应全部加在他的身上。

6 月 16 日的战斗结束时，拿破仑还略微占有一些优势。他击败了布吕歇尔，并牵制住了威灵顿。以后的一切将取决于他在 17 日如何动作了。但在此之前，他需要首先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在 16 日至 17 日的夜晚，搞清楚普鲁士人退向了哪里。但是，拿破仑太自信了，他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去考虑那些普鲁士人，反法同盟的军队已被彻底分割开来。直到 17 日早上，拿破仑才下达追击命令。于是帕若的骑兵出发了。早上 7 时，法军总司令部接到消息(这个消息是 3 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大批普军正狼狈地沿那慕尔至列日的大路溃退。这使拿破仑确信，他预先估计的布吕歇尔的撤退情况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溃逃的部队却是 6000 名西德意志人。林尼之战，他们认为自己受够了，便开了小差。附带说一句：这些部队的逃离对普鲁士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没有这些人，普鲁士人的仗反而会打得更好。

在布吕歇尔不在的情况下，格奈森诺仓促决定(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十分关键)，普军途经蒂伊向瓦弗撤退。由于下达命

令和集结各军的工作进行得十分仓促，普军未能向威灵顿通报情况。威灵顿次日早晨派出以戈登上校为首的巡逻队后，才得知普军已经撤退。格奈森诺极不相信威灵顿有决心在布鲁塞尔城前与敌决战(但这并不能成为格奈森诺不与威灵顿联络的借口)。他决定向瓦弗转移似乎是为了确保通过卢万的普军后方交通线，因为这时普军已向尼维尔—那慕尔路以北走得太远，不可能再奔向列日。

对于同盟国军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布吕歇尔的确是条硬汉。当天深夜他一重返部队，便在梅尔里的临时总部与他的军需官格勒尔曼一道体出明确决定——部队从瓦弗掉头向西，支援威灵顿。普军的撤退行动在列日持续了一整天(比洛的第 4 军也经科尔拜和迪戎勒蒙与主力汇合)。傍晚，部队在瓦弗附近集结完毕。

再看法军这方面。实际上，整个 17 日上午，法军几乎没有任何举动。拿破仑还认为普鲁士人已被彻底击败。直到 11 时，在读过内伊传来的信件后，他才终于意识到，如果将洛博军和近卫军调往马尔拜，那么在内伊对四臂村发动正面进攻的同时，他可以从侧翼进攻威灵顿的部队。然而，掌握着 4 万人马，并且一上午没有发起任何进攻的内伊，此时似乎仍不想挪动。当拿破仑于下午 1 时到达马尔拜时，内伊的部属们正准备他们的午餐呢。直到下午 2 时，法军才开始进攻，然而，法国人已丧失了痛击英荷联军的绝好时机，因为威灵顿终于在上午 9 时接到了布吕歇尔传来的消息，并在 4 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向圣让山方向撤退了。借助暴雨的帮助，威灵顿逃脱了。

拿破仑的右翼情况也不是很妙。格鲁希奉命率领 3.3 万人的联合部队追击布吕歇尔，他想极早动身，然而拿破仑却使他在林尼战场耽搁了很久。他接到的命令是由拿破仑口授给贝特朗将军发出的(当时，苏尔特还在后方的弗勒吕)，命令

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该命令的主要精神是，格鲁希应向藏布卢推进，因为藏布卢是发现普鲁士人去向的最佳位置。格鲁希一方面要紧紧咬住这些普鲁士人，另一方面还要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为拿破仑提供情报。格鲁希只完成了头一项任务，原因是他到达藏布卢后，既没有得到普鲁士人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与拿破仑取得任何联系，便扎营过夜了。

以上就是滑铁卢战役前两天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它们为滑铁卢之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众多的战斗中有胜仗，有败仗，也有平局。在同盟军方面，他们表现了团结精神和坚强决心；而法军的胜利却孕育着失败。在需要当机立断和迅速行动的时刻，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却六神无主，迟缓倦怠。然而，时间却不允许他们优柔寡断，模棱两可。“如果号角不吹，谁能作好战斗准备呢？”

图 20、林尼之战(1815 年 6 月 16 日拿破仑向比利时进军的路线)

林尼之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向比利时进军的路线 附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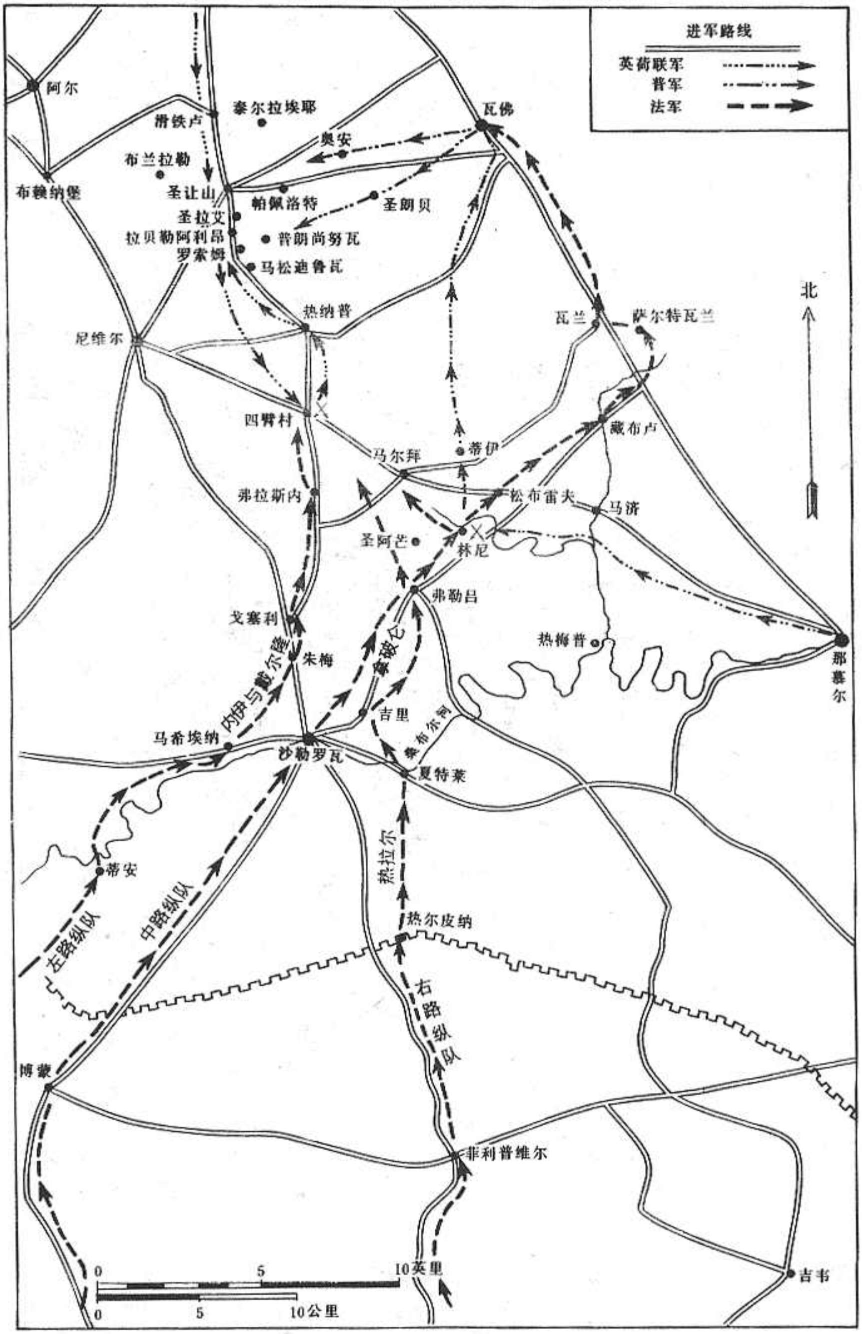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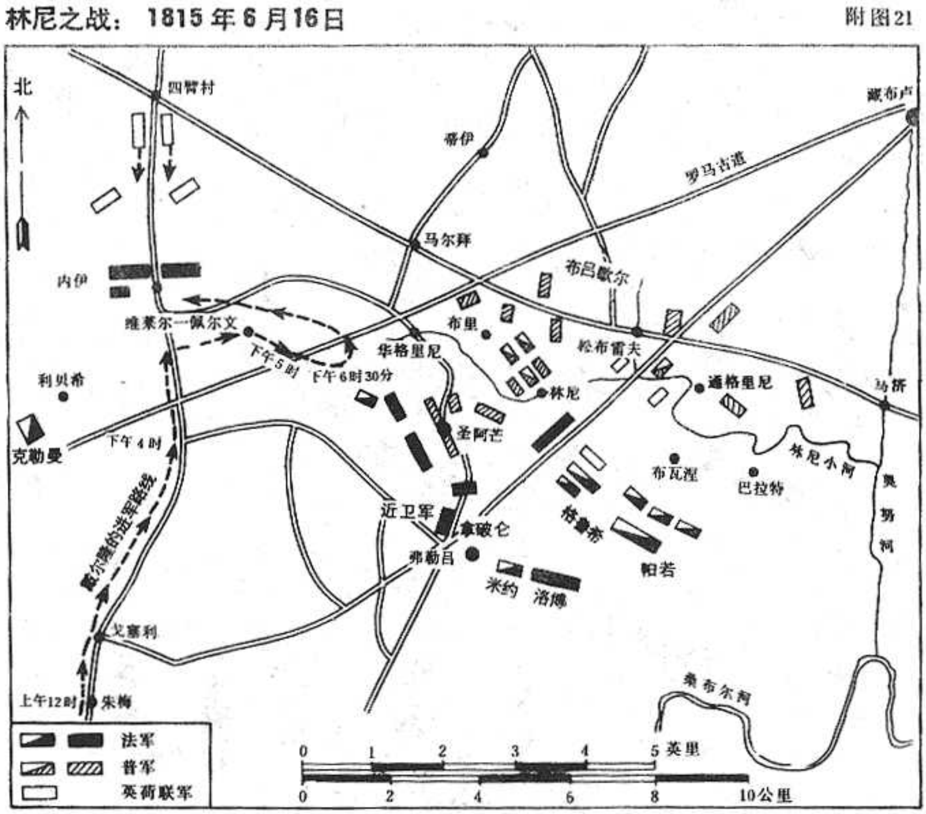


图 21、林尼之战(1815 年 6 月 16 日)




6 月 16 日和 17 日是富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天，在这两天中，发生了许多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也许就是 16 日戴尔隆造成的混乱以及 17 日上午的严重的时间浪费。倘若这两件事是另一种结果的话，拿破仑在 17 日或 18 日定已坐在布鲁塞尔城中了。

伯爵戴尔隆中将指挥着内伊率领的左翼法军的第 1 军。6 月 15 日的夜晚，第 1 军是在马希埃纳渡过的。16 日早晨，内伊仍旧不慌不忙，似乎根本不了解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因此早上 8 时，第 1 军的后卫部队仍滞留在桑布尔河。将近中午时分，位于朱梅的戴尔隆接到内伊要他向弗拉斯内开进，并派出 1 个师前往马尔拜的命令。但此时，戈塞利地区的雷

耶军出现了混乱，当法军开始越过罗马古道的时候，时间已接近下午 4 时了，几乎就在此时此地，麻烦出现了。

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下午 4 时刚过，正在全军前部遂行侦察任务的戴尔隆见到了一张以拿破仑的名义签发给内伊的书面命令，内容是要戴尔隆军立即前往林尼。书面命令的传送者是拿破仑的副官拉贝多瓦埃将军(而不是象西博尔纳所说是洛朗上校)，这一点也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引起争论的是，这张便条究竟真是拿破仑亲笔所写，还是象贝克所认为的那样，拉贝多瓦埃在驰马传送更早一份命令的过程中，知道拿破仑心中所想，摹仿拿破仑的手笔，命令戴尔隆掉转方向，然后骑马找到戴尔隆，将这张伪造的手令交给了戴尔隆本人。虽然贝克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拿破仑对戴尔隆从错误的方向出现大感惊讶)，然而，这张匆忙写成的便条似乎更有可能是真的。不管怎样)这件事本身是利益攸关的：无论命令是谁发布的，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相同的。

见到手令后，戴尔隆便急忙返回部队，并率部经维莱尔—佩尔文到了法军战线的最左端。下午 2 时和 3 时 15 分，拿破仑给内伊连下两道命令，指示他包抄普军的右翼，并对普军后方实施攻击。直到发出第二道命令之后，拿破仑才得知，内伊至少面对 2 万英荷部队。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匆忙签发了那张手令，让戴尔隆的部队前来投入战斗。当时他估计戴尔隆军是唯一尚未投入战斗的队伍(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拿破仑的命令是攻击普鲁士人的后方，从南面偏东方向的弗拉斯内开过来的第 1 军当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便有了法军在林尼的困惑和战斗的间歇。由于时间的延误，拿破仑未能在那场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戴尔隆后来的举动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当他匆匆赶往林尼的时候，他派参谋长德尔康尔将军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内伊。性格乖戾的内伊听到这一情况后火冒三丈，因为他正准

备让戴尔隆的部队投入他即将组织的新的进攻。于是内伊命德尔康尔通知戴尔隆返回，不得违抗。下午 6 时 30 分刚过，德尔康尔追上了戴尔隆。这时拿破仑给戴尔隆的命令也正在途中。拿破仑的命令是，戴尔隆军向华格里尼方向前进，完成预定的包围敌军的任务。但是，在拿破仑的命令到达之前，戴尔隆已经开始往回撤退。尽管戴尔隆留下了迪吕特师和 3 个骑兵团，但是由于戴尔隆指示迪吕特要“谨慎”，而迪吕特“谨慎”得近乎胆怯无用，因此，这些部队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戴尔隆的确接到了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和指示，因而有些不知所措。然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官应有的足够的智慧与主动性。即便他不知道当天的主战场就是林尼，但他毕竟已经到了距战场不到两英里的地方，而返回去的路程将是这个距离的两倍，而且当时天色已晚。对于戴尔隆而言，更聪明的做法是攻取左翼阵地，等候皇帝指示(实际上皇帝的指示已经在路上)，而不是返回弗拉斯内，参加那场他根本赶不上的四臂村的战斗。由于戴尔隆举措失当，左翼法军的一半部队没有派上用场。本来，无论参加四臂村的战斗还是林尼的战斗，这些部队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无疑，在 6 月 16 日和 17 日这两天，拿破仑的 3 个高级助手表现极为不佳。或许拿破仑已对这 3 个人的任命追悔莫及。苏尔特是个不称职的参谋长，内伊既无想象力，又缺乏智慧，而格鲁希作为一翼的指挥官则显得力不从心。在稍低一层的将领中，还有一个戴尔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法军坐失良机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整个战役的作战方案，体现了拿破仑的一贯智慧，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拿破仑却失去了往日的精力、生气与活力。由于病魔缠身，拿破仑似乎难于集中精神。

从 16 日的情况看，法军的最大过失也许就是对洛博军的

疏忽。法军总部未能将其从沙勒罗瓦调来。等到该军投入林尼之战时，时间已太晚了。如果洛博参加了林尼之战，普鲁士人也许会遭到灭顶之灾。然而，由于17日早上拿破仑的延误，加之其左翼指挥官的无所作为，赢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已成黄粱之梦。那天早上，正常发出的命令不知传向了何处；法军与普鲁士人也失去了任何接触，直到早上7时，帕若才送来一份报告，而这报告还使拿破仑产生了错觉。拿破仑没做任何努力向内伊了解四臂村的战况，同时，拿破仑也没有把林尼之战告捷的消息通知内伊。两个指挥部都对情况掌握得模模糊糊。

尽管如此，上午8时，弗拉奥将军到达了位于弗勒吕的法军指挥部，并把威灵顿的军队仍坚守着四臂村的消息告诉了拿破仑。这个消息虽使拿破仑感到意外，但并没有使他坐卧不宁，因为拿破仑仍掌握着部分生力军，如果威灵顿决定据守阵地(而拿破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部分军队能很快赶到那里，与内伊联合夹击威灵顿。基于这种想法，拿破仑只派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到四臂村一带进行侦察，同时口授了一份通报给内伊。这份通报的内容简直模糊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拿破仑在通报的一开始便告知内伊，普鲁士人已被击溃，这表明了拿破仑对普军的情况是多么缺乏了解！在责备了内伊前一天犯下的各种错误之后，该通报告知内伊，皇帝将前往布里磨坊，万一英军在内伊阵前有所行动，皇帝将沿四臂村路向英军直接发起攻击。拿破仑本应在信中强调发动进攻的紧迫性，然而他却没这么做。

此时，拿破仑有三种做法可以供自己选择。其一，他可以命内伊将威灵顿牵制在原地，同时，他率领其余的法军与布吕歇尔作战，确保普鲁士人不再对法军构成威胁。其二，拿破仑可以派一支轻骑兵，以及2个步兵师，与普鲁士人保持接融，而他自己则率领其余的右翼部队以及预备队，于17日

同内伊一道与英荷联军展开决战。其三，拿破仑可以派右翼对付布吕歇尔，自己率领生力军(洛博的第6军，德鲁奥的近卫军和米约的骑兵)对本已受到内伊正面打击的英荷联军实施进攻(对此行动，拿破仑在给内伊的信中已作过部分暗示)。拿破仑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这一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很可能是最佳选择。其实，如果拿破仑行动迅速，任何一种方案都可以使他获胜。

不幸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如此行事。更多的宝贵时间被他们浪费掉了。格鲁希急于追歼普鲁士人，而拿破仑却坚持要他陪自己在林尼战场作一次巡视。据说，当时拿破仑身体欠佳，疼痛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服用一剂鸦片酊来止痛。不过，尽管战场上的可怕场景使他的心头掠过一丝痛苦，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部队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大约在上午11时，正当拿破仑与格鲁希以及其他将领漫步闲谈之时，从四臂村传来了英荷联军仍在坚守阵地的消息。直到这时，拿破仑才终于又抖擞起精神，发布了迅速采取行动的命令。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格鲁希率第3军、第4军、第5军的1个师、4350名骑兵，并携带96门火炮——总计约3.3万人的兵力——奉命追击和消灭普鲁士人。然而，主要由于对普军撤退的确切方向缺乏了解，拿破仑随后签发给格鲁希的书面命令不令人满意，也不够完整。与此同时，拿破仑还给内伊签发了一道简短而紧急的命令，命他与拿破仑派往马尔拜的部队协同动作，立即发起攻击。

以上这些都很值得称道，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晚了。上午10时刚过，威灵顿便已巧妙地开始撤退了。而当拿破仑于下午1时到达马尔拜的时候，内伊仍未发起进攻。即使在那时，在拿破仑的亲自督察下，法军仍有可能赶上并消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恰在这时，一场持续不断的大雨把郊外变成了一片水泽，道路被堵塞了。历史竟这样具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说

过“我也许会失去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我绝不失去一分钟”的人，竟会白白失去 5 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从而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拿破仑赢得了林尼之战的胜利，但是，为了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拿破仑需要彻底歼灭普鲁士人的军队，而拿破仑没能做到这一点。导致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破仑的参谋长不得力；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过分低估了对手的力量与意志力；由于不必要的误解，拿破仑的一个军没有发挥作用。本来，这些不幸与失误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致使法军在这场战斗中失利。然而，尽管同时出现了这些问题，由于法国士兵勇敢、顽强，加上近 1.2 万名法军士兵献身沙场，法国人还是得以将普鲁士人赶出了战场。

普军的失败具有多种原因：普军没有时间对士兵进行适当的训练与装备；部队成分复杂，很大一部分士兵都不可靠。此外，由于指挥上的混乱，普鲁士人也有一个军没能投入战斗。布吕歇尔的战斗部署也有一定的问题。与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统帅对阵，仅这些缺陷就足以导致作战的失败了。

第 12 章、滑铁卢之战(1815 年 6 月 18 日)

6 月 17 日下午，浓云密布，遮天蔽日，不久，雷声滚滚，大雨倾盆而下，条条土路都变成了泥沼。无论是撤退的英荷联军，还是穷追不舍的法军，都被困在石子路上，其他地方寸步难行。拿破仑皇帝在追击部队中一马当先，默瑟上尉写道，当拿破仑带着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出现在一块高地上时，他第一次“在阴雨茫茫中”看到这位“战争巨人”。不久，默瑟就和他的炮兵一起，在热纳普唯一的一条狭窄街道上与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时，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正率骑兵掩

护部队从四臂村撤退。英王近卫军和第 7 轻骑兵团正与雅基诺的第 3 和第 4 枪骑兵团展开激战。

拿破仑企图在当天追上并歼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是，当时脚下恶劣的道路条件使拿破仑的种种努力未能奏效。热纳普之战过后，拿破仑的追击速度慢了下来，因此，疲惫不堪的英荷联军向预设的圣让山阵地逃去，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然而，法军并没有被威灵顿远远地甩在身后。近黄昏时分，法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拉贝勒阿利昂农庄近旁的山脊。皇帝急于证实威灵顿要在圣让山据守的企图，使命令米约用马拉炮兵对英荷联军的阵地连续轰击，敌人的反应似乎使拿破仑很放心，尔后他便回到设在凯尤小农庄的指挥部。但是，由于担心敌人会在夜里溜走，18 日凌晨，他又策马赶到前沿。黎明时分透过阴霾他终于看到了浸泡在泥水里的英荷联军的宿营地，顿感放心。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 17 日正朝瓦弗方向撤退，他们对自己未遇到任何阻碍感到惊奇。黄昏时分，整个部队都集中在瓦弗城周围。如何为前方部队补充弹药，曾使普军颇感棘手。现在这一问题也得到解决。18 日凌晨 3 时，布吕歇尔给在威灵顿总部担任联络官的冯·米夫林将军送了一封信，告知第 4 军准备在黎明出发，对法军右翼发动进攻；第 2 军将紧随其后。这样，威灵顿要求增派的 2 个军的兵力很快就可到达。同时，第 1 军和第 3 军也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这一消息肯定使威灵顿深感欣慰。但是，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17 日夜晚各军的部署以及 18 日的进军命令，使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化为乌有。

6 月 18 日是星期日，清晨 6 时，威灵顿离开了在滑铁卢作为总部的客栈，策马 2 英里到达圣让山。此时，雨终于停了。士兵们渡过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凄惨夜晚。当公爵身穿下雨时常穿的那套朴素而整洁的服装——蓝色便服外套，白色鹿皮

马裤，膝前带有饰缝的长靴，白色领巾，蓝色斗篷——在队列前骑马而过时，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放松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部队中没有欢呼声，因为他们知道，威灵顿不喜欢公开流露感情。的确，士兵们并不爱戴威灵顿，而威灵顿也并不热爱这些士兵；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尊重与理解。

圣让山村的南面是圣让农庄，离农庄不远有一道低矮的山脊，呈东西走向，与布鲁塞尔至沙勒罗瓦的道路垂直相交。几乎就在山脊的顶部，有条相当宽的道路与一条乡间土路相交，那条小土路西起布鲁塞尔—尼维尔路，向东通往奥安和瓦弗。英荷联军的大部都部署在这条道路沿线，以及紧邻的路北区域，呈新月形。新月形防线的右翼弯向乌古蒙庄园，左翼延伸到拥有低矮建筑物的帕佩洛特和泰尔拉埃农庄周围。在大路正东，乡间小路的两旁有两行冬青树篱。树篱到处都有残缺之处。树篱和相当平缓的北山坡，对山坡背面的部队起到了良好的掩蔽作用，对部队的横向联系也十分有利。

南山坡有些地方十分陡峻，特别是向南通往沙勒罗瓦的大路快到圣拉艾农庄时要通过一处陡峭的山壁。圣拉艾农庄位于大路的西侧，离圣让山山脊约有 200 码的距离，从这里开始，大路将战场一分为二，并沿着一条平缓而低浅的谷地向前延伸，直至与另一条山脊相遇。这条山脊呈东西走向，横卧在大路上。这一高地几乎与圣让山高地平行。山脊上，路的正东面矗立着拉贝勒阿利昂农庄。两座山脊上分别聚集着敌对双方的部队。约 1500 码宽的起伏的谷地将两座山脊分隔开来。当时，这块地上长满了高杆庄稼，雨水和行军士兵把一部分庄稼压平。

圣拉艾以及乌古蒙两座农庄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设防地区。圣拉艾是任何正面进攻的重点，只要它不被攻克，守卫它的部队便可以向任何发起进攻的纵队实施猛烈的纵深射击，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令人奇怪的是，威灵顿只派遣少量部队

守卫圣拉艾。农庄北面不远的大路东侧是一个采沙场。它不太象一个采沙场，而是一个挖空的半圆形坑，靠大路的一侧有一道树篱，北面是一座土丘。

当时，乌古蒙农庄是吕内维拉先生消闲的乡间农舍。农庄里有一座乡间别墅，那是一座正方形的砖房，与砖房连在一起的是一座小教堂，别墅西北有一座农舍。农庄西边有一座谷仓，南边是花匠的住房。农庄里有两个院子，对着北大门的是一个场院，当中有口水井。场院向前延伸，便是一个庭院，除了北边院墙牢固的大木门之外，南边还有一个门可以进入高墙建筑。此外，还有一个小门开向院墙西侧的一条小巷。

花园的南面和东面有砖围墙，北面是一道树篱。还有两个果园，较大的果园在花园的东面，较小的位于花园的北面。大果园的南边是一道颇宽的树篱。树篱中间有一个缺口。一小片矮树丛在缺口处与树篱相接，并向南延伸约 300 码。树篱将花园的砖墙完全掩盖。紧接着北面围墙，有一条凹形道，由一条小路以及两边的树篱构成。这条凹形道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有一条谷地始于拉贝勒阿利昂农庄附近，绕乌古蒙农庄西侧而过，伸向梅贝布雷纳。圣让山山脊将该谷地完全隐藏在山脚下。因此，假如英荷联军没有控制乌古蒙，拿破仑便可以此为掩护，沿该谷地接敌，从左翼发起攻击，实施翼侧迂回，包围敌阵地。因此乌古蒙对威灵顿挑选的防御阵地来说非常重要，只要右翼不受威胁，威灵顿的防御阵地是十分坚固的。而威灵顿也一直把右翼看得最为重要。

英荷联军的阵地，从左翼到右翼，全长约 3.5 英里，但只有不到 2 英里的阵地有防御纵深。在这一区域内，威灵顿公爵投入了 4.96 万名步兵，1.24 万名骑兵，5645 名炮兵以及 156 门火炮。总计 6.766 万人。根据当时的计算，要坚守阵地，

每英里的正面需要部署 2 万人的部队。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留在阿尔的荷兰王子弗里德里希手下的 1.7 万人以及 30 门火炮不参战，公爵麾下的部队也足够用了。

为了便于指挥，战线被分成三个主要区域。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由黑尔勋爵指挥；尼维尔路和沙勒罗瓦路之间的中段归奥伦治亲王指挥；皮克顿将军负责战线的东段。在上述部署中，威灵顿打乱了军的建制，还拆开了一些师一级的单位。这可能是威灵顿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最精锐的部队分散部署在战线上，以加强整个战线的力量，特别是增强右翼的力量。

威灵顿将夏塞中将指挥的荷兰—比利时师部署在战线的最右翼，充当连接主力部队和在阿尔的弗里德里希王子与科维尔将军的部队之间的桥梁，而最右翼后来并没有成为战场。在实际发生战斗的战线右端，即圣让山山脊向下滑向山谷的地段，部署着克林顿将军的第 2 英国师。一旦翼侧遭到进攻，这支部队便如同放置在那里的路障一样，可以起到进一步的防护作用。如果侧翼攻击没有发生，它还可以做为战术预备队。威灵顿是颇具洞察力的，他马上就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命令第 1 和第 2 近卫旅的轻装连于 17 日晚上连夜赶到乌古蒙。他们的到达非常及时，当时正有一支法国部队也想占领这一战术要地，于是，他们赶走了法国人。18 日早晨，公爵视察农庄之后，又增强了这里的防御力量。乌古蒙庄园的正北面是库克将军的第 1 近卫师的余部。该师的大部都在黑尔勋爵的指挥之下。皇家近卫军所处地段名义上由奥伦治亲王指挥，但当战斗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威灵顿便亲临该段指挥部队。

从皇家近卫军第 1 师向北到十字路口一线，由英军第 3 师防守。十字路口以东是皮克顿的英军第 5 师，该师在四臂村曾遭到重创。该师前方是拜兰将军的荷兰—比利时旅，他们

的防御阵地与英军第 5 师 2 个旅的防御阵地相重叠。荷兰—比利时旅所处的阵地是一个危险的暴露的前斜坡。维维安将军的第 6 骑兵旅处在同盟军战线的最左端。在普鲁士人赶来之前，他们担任着左翼巡逻任务。他们的前方是驻守在帕佩洛特和圣拉艾之间的拿骚第 2 旅。而在乌古蒙却只有不到 1 个营的兵力。从战线中央向前突出的是圣拉艾农庄和采沙扬构成的防守据点。占据着圣拉艾的是巴林少校的第 2 轻装营，该营隶属奥普特德上校指挥的英王德国军团(只有约 360 人)。部署在采沙场的是英军第 8 旅第 95 步枪营的 2 个连。

整个骑兵，除了在两翼末端的各团之外，都密集地部署在步兵的后面。按理讲，应有 6 支马拉炮兵队配属给骑兵旅，但这些部队在天黑之际抵达时十分混乱，便尽可能地将自己隐蔽起来。战斗中，威灵顿将把他们用作机动的预备队。他将野战炮兵的绝大部分部署在步兵的正前方，以便向进犯的步兵和骑兵开火。

这一庞大的防御阵地的部署有两个特点：一、它可以对进攻之敌实施强大的火力打击；二、它右翼的兵力极为强大。埋伏在前斜坡上的散兵及步兵几乎完全隐蔽在高高的庄稼之中。敌人首先必须躲过这些士兵的准确射击，接着还必须躲过炮兵的葡萄弹和圆形炮弹的轰击，最后等待敌人的还有布朗贝丝枪连续发出的排射，以及骑兵手中 2 英尺长的利器。威灵顿格外注意增强其右翼的力量，部分原因在于，他预计敌人会向其右翼发动猛烈的进攻。另一原因在于，威灵顿已于凌晨接到消息：普鲁士人将赶来增援他的左翼。

在拉贝勒阿利昂山脊背后的平原上，北方军团正厉兵秣马，准备投入战斗。拿破仑正在用早餐(大约 8 时左右)。他想让参谋人员感觉马上要进行的战斗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说道：“我们有 90%的获胜机会，而失败的可能性还不到 10%。”拿破仑本想于上午 9 时开始战斗，但是近卫炮兵的

德鲁奥将军说服了他，理由是地面过于泥泞，火炮无法操作。于是，拿破仑决定把发动主攻的时间延至下午 1 时，然而，对于普鲁士人(拿破仑仍没有把他们考虑进去)来说，每一个小时都黄金般的宝贵。对威灵顿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拿破仑铸成了一个大错。

部队终于部署就绪，当拿破仑骑马从队前经过时，战鼓激越，乐队奏起乐曲，“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回荡。进攻队列场面庞大壮观，令人终生难忘。但是，如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吓住敌人，法国人则未能达到月的。处在第一线的是戴尔隆军和雷耶军。前者位于通往布鲁塞尔道路的右侧，后者在路的左侧；轻骑兵分别位于他们的外侧。第二线在雷耶部队身后约 200 码处，为克勒曼军(24 个骑兵中队)以及居约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预备队；戴尔隆军身后，相隔不到 100 码处，为米约的 24 个骑兵中队和勒费比尔—德斯诺蒂的近卫军轻骑兵。在中央，横跨布鲁塞尔路，部署着洛博第 6 军的 1 万人，在他们的后面相隔 200 码处，部署着皇家近卫军各师。马拉炮兵群和他们各自的骑兵编队在一起，野战炮兵排列在各师的前方。这些部队加在一起，拿破仑共有 48，950 名步兵、15，765 名骑兵和 7，232 名炮兵以及 246 门火炮——总计 71，947 人。[注：其中未包括格鲁希的 3.3 万人。战斗打响时，他们正试图拦截普军，但未获成功。]

从当时的情况看，对威灵顿的左翼发动进攻似乎更为有利，但是拿破仑采用了博罗季诺式的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式，拒绝了上述方案。于是，密集部署的部队在 2 英里多宽的狭窄的正面上对敌人发起攻击。

上午 11 时 30 分，拿破仑命令雷耶对乌古蒙发动声东击西的进攻，他希望威灵顿会因此从中路撤出部分兵力，而他将在大约 1 小时后对威灵顿的中路发动主攻。雷耶用重炮轰击一阵之后，命令热罗姆亲王率领的师在皮尔将军第 2 骑兵师

的支援下进攻别墅南侧的小树林。控制乌古蒙对整个战役的结局意义重大，下面将对那里的战斗进行详细描述。热罗姆贪图虚荣，竟毫不理会参谋长的劝阻，甚至当情况已经十分不妙的时候，他不但拒不撤退，反而还请求增援，因此，虽然战斗高潮在下午 2 时就过去了，但战斗却整整持续了一天。尽管此举迫使威灵顿增援了庄园的守卫部队，而且在法军的进攻最为壮烈的时刻，这座别墅几乎被法军攻下(这本来可以对整个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斗代价太大。虽然雷耶的大部分部队都投入了战斗，但是威灵顿的整体防御计划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热罗姆一次又一次对乌古蒙防御工事发起猛攻。在他发出主攻命令前不久，拿破仑接到派往弗里斯舍蒙的巡逻队传回的有关普鲁士军队的确切消息，得知至少有 1 个军的普鲁士人正在途中准备对自己脆弱的右翼发动进攻。拿破仑获胜的机会顿时减少了。然而，拿破仑仍然坚信他能在普鲁士军队赶到之前打败威灵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通知了格鲁希这一消息，并催促他火速前来增援。然而，这已为时太晚。格鲁希已是鞭长莫及，无法在战役中发挥有效作用。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拿破仑还派出絮贝维埃和多芒的骑兵师，接着又增派了洛博各师。

下午 1 时后，受命前往增援戴尔隆进攻的 78 门火炮在距圣拉艾农庄 250 码的横岭上准备就绪，并投入战斗。45 分钟后，内伊带领戴尔隆军向前方的农场和采沙场发起了疾风骤雨式的攻击。从布鲁塞尔路往东至英荷联军的左翼末端，在 1300 码宽的烟幕笼罩的开阔地上，4 个师列成梯队。出于某种原因，只有右翼的 1 个师以营纵队前进，正面为 2 个连；其他部队都以一个展开的营正面向前推进，正面前排为 200 百人，后续各营紧紧跟进。这样，再要组成方阵抵抗骑兵进攻就不可能了。而英荷联军的炮手则可以将一排排的法军士

兵送上西天。更为严重的是，法军一反常态。部队只得到了米约胸甲骑兵(杜布瓦和特拉韦)的有限支援。

不管这种阵式多么脆弱，勇猛的士兵们已决意为皇帝，为自豪地飘扬着的鹰旗，为各自部队的旗帜而献身。他们组成的密集列阵着实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由于威灵顿把部队部署在山坡背面，潮湿的地面又影响了法军火炮的轰击效果，严阵以待的英荷联军的士兵躲过了最猛烈的炮击，只有前斜坡上的拜兰旅遭到重创。

戴尔隆所率各营表现出色，但是敌人的霰弹在他们的队列中到处开花，因而法军伤亡惨重。然而，几乎没有人留意到所受的挫折。不久，圣拉艾和采沙场就被成群愤怒而坚决的士兵包围了起来。圣拉艾农场里的守军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更糟的是，农庄的一扇大门还被拆下来做柴烧了。尽管英王德国军团的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但他们还是被逐出了果园，退入农庄的建筑物中，虽然英王德国军团的 1 个营增援了采沙场，但对这样一个没有设防的阵地来说，所遇到的进攻太猛烈了，第 95 步兵营的士兵穿过篱笆，撤回到营部驻地。

几乎同时，遭到猛攻的拜兰荷—比联军迅速溃退，但即使该段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他们的溃退在精神和力量上并没有给皮克顿单薄的防线带来多大影响。在当天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皮克顿的 2 个旅(肯普特旅和帕克旅)面临着占绝对优势的 8000 名法军的攻击。但是，他们排成两列横队，在不到 50 码的距离内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射出雨点般的铅弹。一颗子弹射穿了皮克顿的头颅，勇敢的皮克顿倒下了。战斗也发展成激烈的刺刀肉搏战。在布鲁塞尔路西侧进行的战斗也毫不逊色。在这里，阿利克斯将军所属师的左翼旅在胸甲骑兵的密切支援下，已经突破了敌军防线。威灵顿命令德国旅在压过来的骑兵面前组成方阵。此时，在整个防线上，威

灵顿的步兵只有招架之力了。法军骑兵原本是可以突破防线的，但却没有这么做。不久，威灵顿的援兵就要到达。

在这一最紧要的关头，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或是发挥主动性(象他后来自称的那样)，或是奉威灵顿的命令，投入了重骑兵。威廉·庞森比爵士的联合旅(第 1 和第 2 皇家龙骑兵团，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和伊尼斯基林龙骑兵团——总计 900 名骑兵)与皇家近卫旅(第 1 和第 2 近卫骑兵团，皇家骑兵团和英王第 1 龙骑兵团——总计 1220 名骑兵)并肩投入战斗。他们的参战立即对战斗产生了影响，使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作战场面蔚为壮观。法国胸甲骑兵的战马在泥泞的道路上左冲右突，皇家近卫旅的骑兵中队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胸甲骑兵遭到重骑兵冷不防的袭击后，大惊失色，立刻处于被动地位，不久就被打得四处奔逃，踩踏了自己的步兵。道路这一侧的其他法军正忙于展开，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路东侧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联合旅向东泽洛和马尔孔内的密集部队猛扑过去，但法军仍以根本不适用于抗击骑兵进攻的编队作战。当时，伤亡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不久，这 2 个旅便汇合到一处，狂奔向前，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们穿过硝烟弥漫的山谷，咆哮着冲入法军阵地，捣毁法军的火炮，挥舞着马刀将敌炮手杀得落花流水。但是，复仇女神却来进行干预了，一支 3 万人的法军生力军参加了战斗。这 2 个重骑兵旅遭到了枪骑兵和胸甲骑兵的攻击，若不是约翰·范德勒勋爵率轻型龙骑兵及时赶到，他们很可能全军覆没。事实上，这两支出色的骑兵旅差不多损失了一半人。尽管如此，戴尔隆军的进攻被击退了，而且伤亡惨重。在这场骑兵冲锋中，法军有两支部队被缴械，还损失了 25 门火炮。

这时，已是下午 3 时左右，战役的第二阶段结束了。极其疲惫的威灵顿的步兵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圣让山山脊上已看不见法军(除了阵亡者)的踪影。乌古蒙与圣拉艾仍牢牢

掌握在威灵顿手中。帕佩洛特的守军不太多，迪律特将军曾一度从拿骚军团手中夺得了帕佩洛特，但是伯恩哈德王子又把它夺了回来。公爵开始重新组织和加强防线。圣拉艾农庄又得到了增援；采沙场被重新占领了；兰勃特将军的第10旅从预备队中调入防线。由于右翼遭受进攻的威胁已经减小，原来部署在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被抽调到路的另一侧，组成一支近距离的预备队。2个营的兵力(隶属于布伦瑞克和普拉特的英王德国军团)被源往乌古蒙北面，接替宾所指挥的旅。宾旅则被派去加强乌古蒙的守备力量。

下午3时30分左右，戴尔隆将七零八落的各营重新组织起来。在罗索姆的拿破仑命令内伊重新向圣拉艾农庆发起进攻。战役的第三阶段拉开了战幕。拿破仑重新部署了炮兵，并令炮兵率先开火。这是当天最猛烈的炮击，如同暴风雨一般，弹片在空中横飞。默瑟上尉形容说，“伸一伸胳膊都非常危险，一伸就会被弹片打飞。”炮击过后，5000名骑兵出现了。他们分作43个骑兵中队，排成井然有序的方阵，从右翼向敌人逼近——速度缓慢，仪态威严，而且完全没有步兵的协同。这使威灵顿和同盟军富有经验的指挥官非常吃惊。原来，内伊把英荷联军步兵为向新阵地转移而做的部分撤退误认为是敌人全面溃退的开始，自己只使用骑兵就可以取得迅速胜利。在其后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当中，内伊都一马当先，但由于情绪激动，他把雷耶的6000人忘到了脑后，致使这些士兵在全天的战斗中几乎一弹未发。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这群骑兵迈着十分稳健的步伐压过来。原因是他们的编队过于严密使战马几乎膝碰膝，速度根本快不起来。不过，他们也向来都是这样从容不迫地投入战斗的。在前面打头阵的是米约的胸甲骑兵，他们的胸铠甲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其后是近卫骑兵(掷弹骑兵)，他们身着朴素的制服，但是头上都

戴着硕大的熊皮帽。红色枪骑兵戴着高高的白色羽毛，猎骑兵身穿绿色制服，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轻骑兵、龙骑兵和枪骑兵跟在他们的身后。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一场面既庞大又可怕。但是英荷联军的部队并没有张惶失措，威灵顿下令做好对付这些骑兵的准备。各营编成了方阵，方阵与方阵之间交错开来，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单独作战，又留出了机动的余地。炮手奉命坚持开炮，直至最后一刻，然后跑到方阵中去寻求掩护。

当法国骑兵距英荷联军不到 100 码时，炮声大作，炮弹在密集的骑兵群中爆炸，整排骑兵被炸的血肉横飞。但是，他们仍然前进着，英荷联军的炮手刚躲避，内伊的骑兵便开始在方阵的周围打转转，用尽了除自杀性冲杀以外的一切办法，试图冲出一个缺口来。这样，英荷联军的方阵也难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格鲁诺上尉当时处在一个方阵中，他说，烟尘与弹药的焦味，几乎使人窒息，“每移动一码，都要踩着负伤的同伴或尸体。”然而，前两排中的人一旦倒下，后面两排就立即会有人补上去。前两排的刺刀与后两排的步枪火力使敌人伤亡惨重。英荷联军的骑兵也使法国骑兵在近战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内伊将伤亡惨重的各中队撤到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外，重新组织。没人能数得清内伊向方阵冲锋了多少次，有人说是 15 次，然而，每一次的队形都是相同的。由于法军从未想到要压制敌军的炮火，因此，英荷联军的炮手在敌人每一次冲锋过后，都发现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损。

拿破仑见内伊如此浪费骑兵，非常气愤，然而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派更多的骑兵中队增援内伊。至下午 5 时，拿破仑的骑兵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9000 名骑兵仍在英荷联军的方阵中冲杀着。此时，英荷联军的骑兵也几乎损失殆尽，步兵预备队也已全部投入战斗。下午 6 时过后不久，内伊终于采用了适当的战术：用 3 个兵种，对圣拉艾发动协同进攻，结

果大获全胜。巴林少校的英王德国军团以非凡的勇气，与敌人战至弹药用尽，幸存者才逃了出来。

内伊立刻将一个炮兵群部署在距英军已削弱的防线中央不到 300 码的地方，向敌人实施集中而猛烈的炮击。虽然觉得胜利在握，但他却缺乏足够的兵力抓住胜利。于是，他派人请求紧急援助。皇帝的回答却是："部队？你让我到哪里给你派部队？难道叫我变出部队来吗？"内伊在博罗季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请求，那时和现在一样，他也遭到了拒绝。在博罗季诺拿破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此时拿破仑派出近卫军，他也许会打赢这次战役。然而，在滑铁卢有许许多多的"假如"，而拿破仑没有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下午 6 时 30 分左右，法军攻下圣拉艾农庄。然而，2 个多小时以前，普军已对瓦弗和拿破仑的右翼发动了进攻。此时及其后普军的参战，成为这次战役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下文将对此加以评述。这里只需说明格鲁希未能将部队插在普军与法军之间，此时，他正在瓦弗与蒂勒曼的第 3 军交战。为了履行向威灵顿许下的诺言，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的第 4 军，经圣拉勃赫对拿破仑的右翼发动攻击，皮尔希的第 2 军紧跟其后。如上所述，拿破仑在当天清晨就对这一举动有所察觉，并且派出 2 个骑兵师和洛博第 6 军前去拦截普军。同时，拿破仑也在加紧行动，想尽早打败威灵顿。从下午 4 时 30 分开始，在弗舍尔蒙和帕佩洛特周围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战役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拿破仑的直觉告诉他，在遭到连续炮击和冲锋之后，威灵顿的英荷联军已危在旦夕。这种感觉没有错。然而，他也清楚，普军就要向他进攻了。现在，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或是在近卫军的掩护下，就此撤退；或是为了夺取胜利，用这部分最精锐的部队向威灵顿越来越薄弱的防线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可以预料，拿破仑选

择了后者。

圣拉艾失守后，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威灵顿抓住时机调整部队，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遭受沉重打击的防线上。他特意将维维安和范德勒的骑兵旅从左翼调至防线中央，这里正急需这些部队。这样部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齐坦军虽然由于误会略微损失了些时间，但也终于到达并担当起防守左翼的任务。面对拿破仑孤注一掷的进攻，威灵顿也许只有不足 3.5 万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两翼是安全的(乌古蒙虽然大火熊熊，但仍未失守)，他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从大路到乌古蒙这一防线上的最关键地段。此时，威灵顿部署在这里的旅的数量是上午的两倍。

晚上 7 点多，皇家近卫军的 6000 多名士兵在皇帝面前列队最后一次接受检阅。傍晚的斜阳，忽明忽暗，映照得刺刀闪闪发亮。法国炮兵加快了炮击速度。雷耶正准备对乌古蒙再次发动进攻；戴尔隆的部队虽精疲力竭，但也在战线中央再度集结；迪律特对联军左侧的拿骚军团和普军感到深深的忧虑。

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最后一幕，有许多不同的论述。经过 8 个小时的激战后，人们的大脑变得迟钝，记忆变得模糊不清，这也不足为怪。因此，后来的回忆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虽然当时有许多关于法军和同盟军的论述，但由于上述原因，有关近卫军的战败情况，没有一种叙述是可靠的。然而，下述情况看来是肯定的。这些英勇的官兵身穿兰色长衣，头戴插着高高的红色羽毛的熊皮帽，肩扛步枪，刺刀闪闪发光，成纵队投入战斗。纵队的正面是 2 个连，因此每个营的正面都有 70 至 75 人，纵深至少有 9 列。威灵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也许他还看到了位于 7 个营(也有人说是 10 个营)前列的拿破仑。每个营之间都部署了两门火炮，似乎还有数不清的散兵在前沿展开，形成一个保护面。

在圣拉艾农庄南面的路口上，拿被仑将指挥权交给了内伊。不久，内伊便做出了蠢事。布鲁塞尔路的两旁都是斜坡，可以用作掩护。内伊本应沿着这条路的中心继续向北推进部队，但他却掉转纵队的方向，转向地面起伏不平的路左侧，踏着成堆的尸体，向威灵顿防线中力量最强的一段冲击。威灵顿部署在此的炮手们已经为这送上门来的打击目标做好了准备。刚一离开大路，整个纵队便四分五裂了，各营成梯队从右侧向英军冲击。但是，他们在烟幕和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当他们爬向圣让山山脊时，则变成了 2 个纵队。虽然英荷联军的许多大炮失灵，而且缺少弹药，但是仍有足够的火炮向敌人的正面进行毁灭性射击。或用炮火轰击纵队暴露的侧翼，向其发射榴散弹，葡萄弹和散弹。

英荷联军用这种方法对法军密集队形的射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法军象收割者镰刀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倒下。内伊跨下的战马又一次中弹毙命，这已是第 5 匹了，但他丝毫未被吓倒，仍继续徒步指挥部队。威灵顿早已命令步兵成四列趴在山顶的背后。最后与皇家近卫军交锋的荣誉落在了梅特兰的第 1 近卫旅头上。当第 1 排敌人距乡间小路不到 50 码时，总司令的一声命令划破了山脊背后的寂静。他喊道：“梅特兰，看你的了！”在激动中，威灵顿直接向士兵下达了命令：“近卫军，起立！”于是 600 支步枪同时向法军开火。法军的掷弹骑兵和猎骑兵毫无准备，大惊失色。

在梅特兰左翼的第 69 和 33 团(霍尔基特旅)立即迂回过来，支援梅特兰。但是该旅左翼的营却遭到了法军第 2 支纵队的袭击。布伦瑞克和拿骚部队开始退却。情况一度又变得紧张起来。然而，公爵到处激励和鼓舞着军心有些动摇的连队。不久，梅特兰就在德特默的荷—比旅的协助下，将敌人赶下了山坡。但是，近卫军又迅速集结起来。在胸甲骑兵的支援下，第 4 猎骑兵也前来救援。联军第 23 龙骑兵与法军胸

甲骑兵展开激战，以掩护联军步兵退到山顶。山脊该段的战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最残酷的阶段。为了将威灵顿赶下山脊，近卫军各营进行了多次冲击，然而，每一次冲击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英荷联军猛烈的炮火，非凡的勇气和杰出的指挥艺术逐渐发挥了作用。而出色的法国部队的士气和勇猛却开始减退。战斗的结束十分突然而又富有戏剧性。

亚当将军的旅部署在梅特兰的右侧，该旅的右翼为科尔伯恩上校的第52步兵团。他们一直埋伏在山坡背后。此时，科尔伯恩估计总司令会下达同样的命令，于是主动采取了行动。他精确地按照操练手册中的规定，让部队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向进攻中的法近卫军实施侧翼反击。当第52步兵团停止前进时，前两排士兵先向近卫军的侧翼进行猛烈的排射，然后后两排士兵上来接着射击。亚当对科尔伯恩的行动意图心领神会，他命令余下的2个团(第71和95团)也如此效法。虽然近卫军已经集结，并重创科尔伯恩的部队，但是，这支生力军穿过硝烟突然出现在侧翼，引起了法军的慌恐。当科尔伯恩在另外2个团的密切支援下再次发起冲锋时，法军掷弹骑兵和猎骑兵已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战场上响起了“近卫军撤退啦！”的喊叫声。这种声音非常可怕，而且从来没有人听到过。

晚上8时多一点，威灵顿认为下令全面出击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扬起帽子，向法军方向挥了三挥，以此做为出击信号。很快，联军中所有还能行动的人都冲下山坡，追击溃退的敌人。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光荣时刻。威灵顿胜利了。然而，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双方共死伤4万余人，其中威灵顿指挥的联军损失了近1.5万人。

图22、滑铁卢之战(法军对乌古蒙的进攻)

滑铁卢之战：法军对乌古蒙的进攻　附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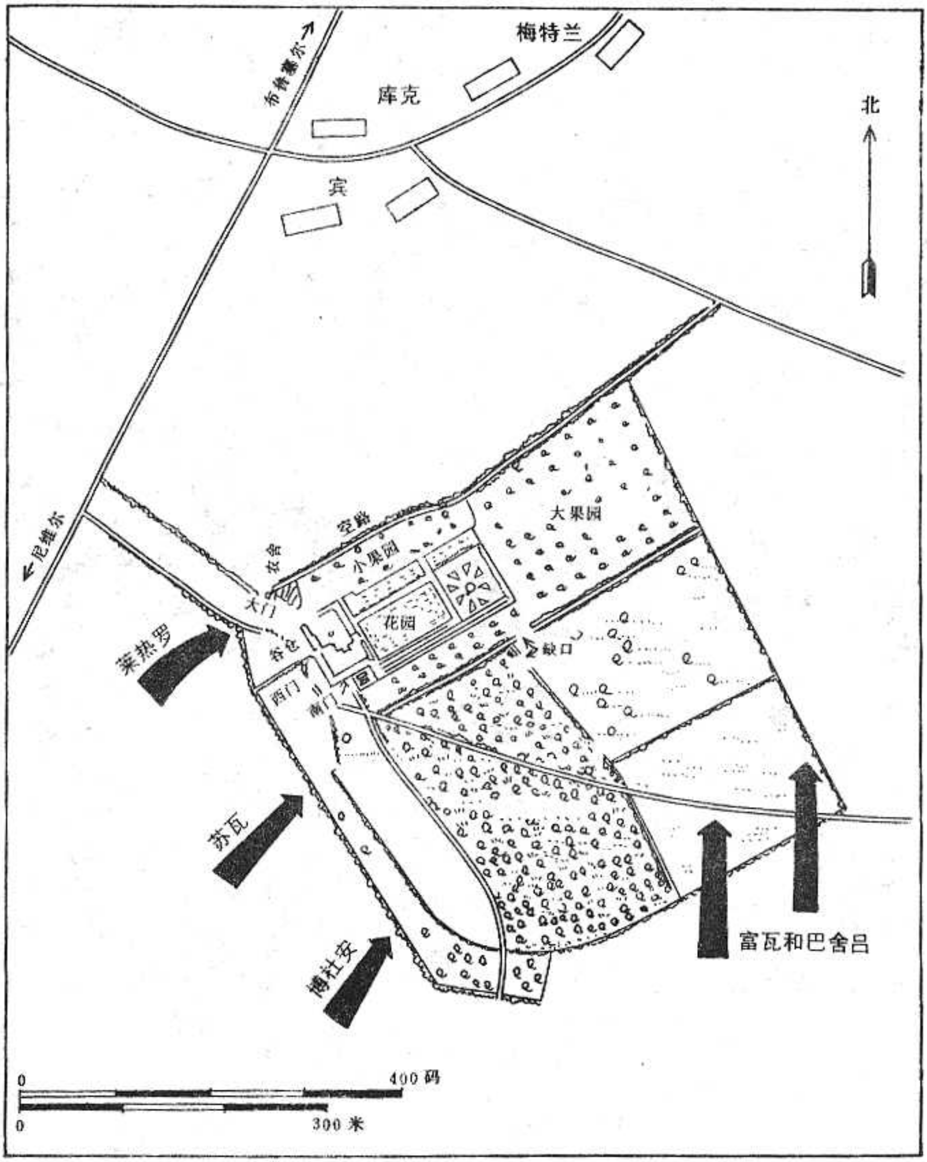



图23、滑铁卢之战(1815年6月18日)

滑铁卢之战：1815年6月18日　　附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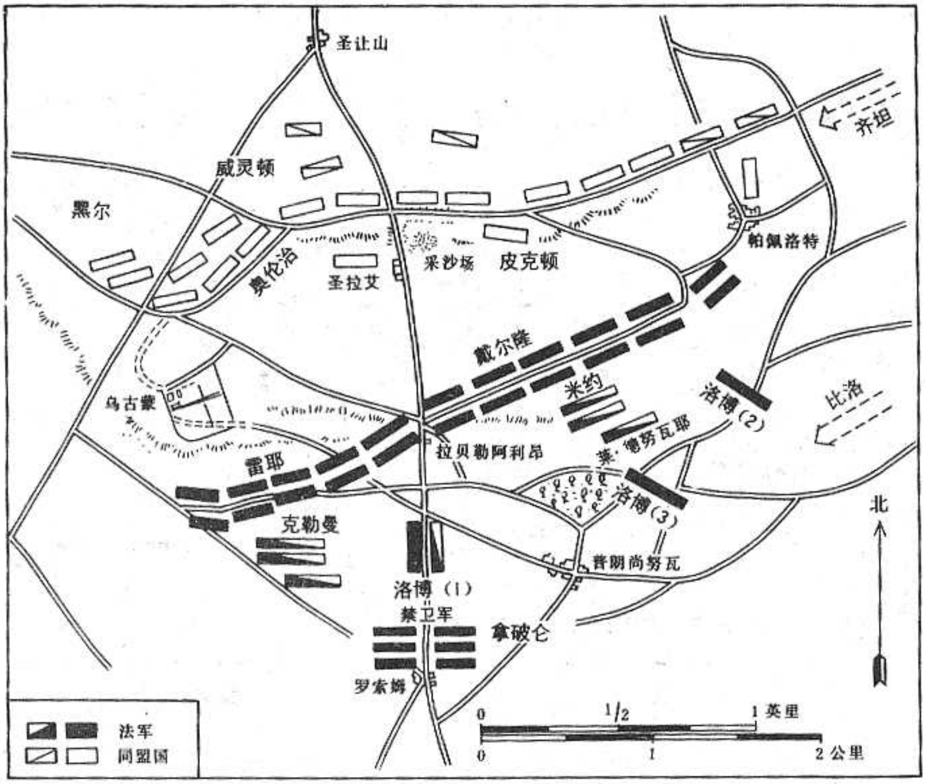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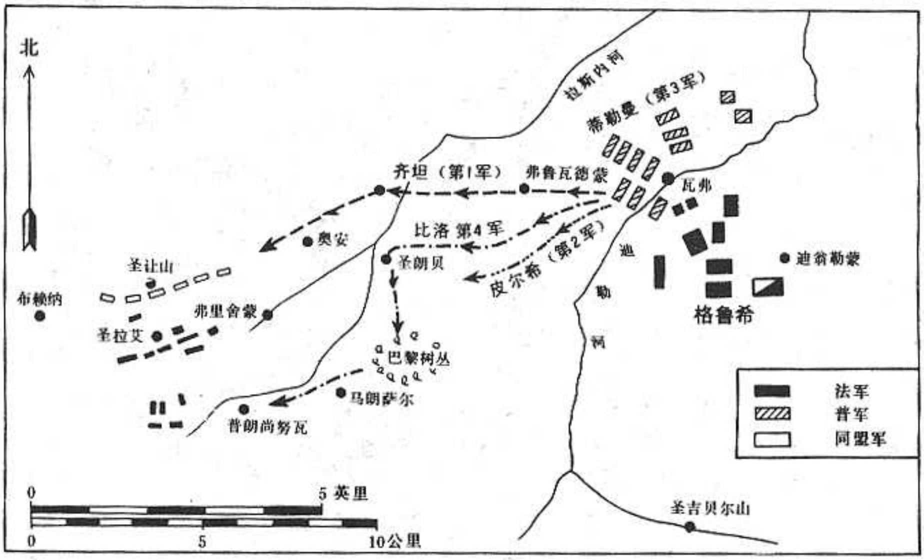



图 24、滑铁卢(普军的接敌行军)

滑铁卢：普军的接敌行动　　附图24




在这场大会战中，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对那一天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或本应产生直接的影响，拿破仑的进攻路线和开战时间的推迟，格鲁希的拖延，内伊在无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对骑兵的使用，以及拿破仑的拒绝增援就是其中的 4 个重要事件。但是，这些及其他一些行动往往都有情可原，甚至不采取行动也可以找到借口。诚然，所有这些错误似乎都对法军的失败起了作用，但却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另一方面，有两个积极因素无疑在那天拯救了威灵顿：对乌古蒙农庄的坚守和普军的及时到来。

威灵顿一下子便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他派遣索尔顿勋爵带领第 1 近卫旅(梅特兰)的各轻装连，同麦克唐纳上校率领的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第 2 营和第 3 近卫团的第 2 营(皆隶属于宾的第 2 近卫旅)一道前往乌古蒙。索尔顿的任务是防守果园，麦克唐纳要防守别墅和其他建筑物。夜间，他们都尽其所能加固了防御工事。18 日上午，威灵顿视察了乌古蒙之后，又增派萨克森—魏玛王子贝尔纳德的拿骚部队的第 2

旅第 1 营，以及汉诺威部队 1 个连的步兵和基尔曼伯爵第 1 汉诺威旅的 100 人。这些增援部队都部署在树林之中。

雷耶将军把进攻乌古蒙的任务交给了热罗姆亲王，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树林。上午 11 时 30 分刚过，在炮兵的猛烈火力和皮尔将军枪骑兵的支援下，先头旅便发动了进攻。该旅旅长博杜安将军在第一次攻击中便阵亡。法军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拿骚和汉诺威的部队赶出树林。当法军向别墅发起进攻时，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原来，威灵顿已命令奥古斯特·弗雷泽爵士加入布尔少校的榴弹炮队，命他们越过联军的头顶向敌人射击，这是一项需要高超技巧的任务。热罗姆还遭到从建筑物和果园中发射的炮火的袭击。亲王的参谋长吉耶米诺将军劝说他撤退，但热罗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又将他的第 2 个旅(苏瓦旅)立即投入了战斗。他还派人请求富瓦将军所属师的紧急支援。接着，他又穿过树林，并从树林侧面向偏西和偏西南方向继续进攻。

这时，索尔顿的各轻装连控制着果园，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 2 营的一个轻装连控制着花园南面的围墙，他们的右翼部署在主建筑物中。第 3 近团的轻装连控制着通向围墙西侧的巷道。轻装连与德国人组织的反击仅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当法军试图越过树林周围厚厚的树篱，并穿越树林与花园之间 50 码的开阔地时，遭到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从花园墙上以及建筑物的枪眼中射出的凶猛火力的痛击。他们虽英勇无畏地前进，但由于伤亡惨重，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树林之中。

刚过正午，整个局势——特别是防线左翼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守卫巷道的第 3 近卫团的部队由于巷子南端的干草堆火焰熊熊，苏瓦的部队又从西面逼了上来，被迫向大门后撤。这是仍敞开着的唯一的一扇大门，从侧翼攻上来的法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占据并控制住大门，乌古蒙

农庄就会失守。

第3近卫团的人成功地撤入庭院中，并与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人会合在一起，关上了大门。但是法军近在咫尺，冲在最前面的是第1轻装团的莱热罗少尉，他身材魁伟，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大力士”。他手持一把坑道工兵用的斧头，击碎了一块门板冲了进来，几个人也紧跟着他进入了庭院。这些人立即投入了激烈的肉搏战，并在战斗中全部阵亡，莱热罗倒在教堂的门旁，手里仍握着斧头。麦克唐纳上校(也是一个彪形大汉)见此情形，召集了一小部分人员，其中包括科德斯特里姆部队魁伟强壮的格雷厄姆中士。他们从花园冲到大门口，那里正进行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很快就被击退，麦克唐纳与格雷厄姆设法修理了沉重的门闩。

滑铁卢之战结束后不久，有人捐赠500英镑，要求威灵顿奖给“滑铁卢战役中最勇敢的英国军人”。威灵顿写道：“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取决于乌古蒙庄园的大门能否关闭。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在关健时刻以极其勇敢的方式关闭了那扇大门。”于是，威灵顿把奖金颁发给麦克唐纳，而麦克唐纳又将这笔钱转赠给格雷厄姆中士。

虽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消失了，但法军仍然冒着防守者的枪弹，忍受着惨重的伤亡，对大门猛攻。由于双方交战距离太近，布尔的火炮已不能提供火力支援。但是，伍德福德上校带着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剩下的不足2个连的兵力，及时赶到，赶走了大门旁的法军。然后，伍德福德的部队从围墙西侧的小门进入农庄，在关键时刻加强了农庄的防御力量。那时富瓦正准备投入最后1个旅(戈蒂埃旅)。这些部队对果园发起了正面和侧翼攻击。索尔顿的左翼受到法军的威胁，不得不退到凹形路上。但是，第3近卫团的霍姆中校带领2个轻装连对侧翼进攻的法军的侧翼进行了迂回包抄，将法军赶出果园，消除了危险。于是索尔顿的部队又沿南面的树篱重

建了自己的阵地。

至此，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第1近卫旅的轻装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已经精疲力竭，非常需要休整一下。第3近卫团余下的各连与汉诺威的部队进入凹形路，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2营则负责坚守别墅。下午1时30分，整个第2近卫旅的部队都部署在乌古蒙庄园内外，法军对这一防御要地的压力已有所缓解。虽然拿破仑的精锐部队在2小时的残酷战斗中一直试图夺占乌古蒙，但约2000名近卫队士兵及汉诺威部队却使1万名拿破仑精锐部队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但是，更多的战斗还在后面，那一天，乌古蒙的战斗还将继续进行，联军部队还将与法军多次交锋。此外，这一地域的战斗使法军无法获得成功地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空间。

6月17日晚上7时左右，格鲁希和他的2个军不慌不忙地行军至藏布卢。当天清晨，格鲁希曾接到前方埃格泽尔芒的消息，报告说他们正在藏布卢地区严密监视着普军(蒂勒曼)的行动。但当格鲁希到达藏布卢时，普军已乘埃格泽尔芒不备溜走。于是，格鲁希又派出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巡逻队传回消息说，普军似乎正朝瓦弗方向撤退。晚上10时，格鲁希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拿破仑，指出普军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显然正向瓦弗开进，另一路很可能开向列日。18日凌晨2时，这封急信到达凯尤农庄，但拿破仑直到4时才见到急信。直到上午10时，拿破仑仍未采取任何对策。即使这时法军采取对策，也已为时过晚。格鲁希因为不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便开往萨赫阿瓦兰，远远地离开了拿破仑和前进中的普军。布吕歇尔躲过了格鲁希之后，在17日晚将部队集结在瓦弗周围。在林尼战役中冲锋在前的第1和第2军，中午就已到达。当晚他们分别驻扎在比埃热和埃斯蒙。撤退中殿后的第3军越过迪莱后，在拉巴韦特宿营。未参加林尼战役的第4军，经瓦兰赶到，在瓦弗东南2英里的迪翁勒蒙扎下营地。

普军 6 月 18 日的行军顾序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格奈森诺发布了命令。他命令原本在最后的 1 个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调上来充当先锋，他仍不相信威灵顿在当天进行决战的决心，因此不愿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投入普军。也许，格奈森诺确有此种想法，但认为这就是普军行动迟缓的原因未免有些牵强。普军参谋长虽然是命令的发布者，但是布吕歇尔是整个计划的制定者。他已承诺且愿意给威灵顿以最大支援。毫无疑问，他希望比洛精力充沛的部队在进攻中担任先锋，但是他似乎对地形以及其他危险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

比洛的第 4 军于清晨 4 时奉命出发，经瓦弗向夏佩尔圣朗贝进军。如果战斗已经打响，他的任务是进攻敌军右翼；如果战斗没有打响，就不采取行动。第 2 军紧随其后，经弗鲁瓦德蒙和奥安加入威灵顿的左翼，其后再派出第 1 军。如果在瓦弗没有法军出现，第 3 军也将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普军的指挥官们清楚地意识到，战役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能否及时到达。然而，遗憾的是，精力最充沛的部队要走最远的路程。第 4 军和第 2 军都要越过迪莱，第 4 军还不得不越过第 2 军，再通过瓦弗这一隘道。比洛使他的先头部队较为顺利地通过了瓦弗，于上午 10 时到达圣朗贝。他们刚过瓦弗，那里就发生了一场火灾，小镇变得更加混乱。道路情况也十分糟糕，影响部队的前进速度。当时，一条大路也没有，小径也很少。暴雨过后，这些道路及周围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泥沼。因此，比洛的主力部队在中午前没能到达圣朗贝，最后一个旅到达的时间更晚。而且第 2 军在第 4 军没有全部超过它之前不能前进，直到中午第 2 军才出发。

下午 1 时 30 分，拿破仑从一个普鲁士俘虏那里证实了他所看到的圣朗贝高地的部队是比洛军的一部分。这是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拿破仑还没有把威胁看得十分严重(他仍指望格鲁希的支援)，但他还是派出了多芒和絮贝维埃的骑

兵师以及洛博的 2 个步兵师前去阻截普军。然而，这些部队并不够用，不久就不得不派近卫军各营给予支援。当天傍晚，普军第 1 军赶到了威灵顿的左翼。他们的到达太及时了，相比之下，他们在随后的战斗中所作出的贡献反而显得逊色。

中午时分，布吕歇尔在圣朗贝加入第 4 军，和他们一道进行了穿越泥泞的拉斯纳盆地的艰难行军，到达巴黎树林。从树林的边缘可以看到大部分战场。布吕歇尔从来不喜欢将部队分散投入战斗。但是，下午 4 时许，当情况已十分明朗，拿破仑的强大攻势有可能突破英荷联军的防线时，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率第 15 旅和第 16 旅发起进攻，不再等侯第 13 和 14 旅的到达。洛博没有占据巴黎树林，对普军来讲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否则他们的前进速度将大大减慢。然而，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比洛一直到另外 2 个旅赶到后，才迫使法军穿过普朗尚努瓦村后撤。

普朗尚努瓦村后来成为一场恶仗的中心点，它距法军的后撤路线太近，使拿破仑感到十分不安。此外，普军占领普朗尚努瓦也会影响法军的士气。下午 6 时左右，普军第 4 军的第 16 旅攻入普朗尚努瓦，但很快又被青年近卫军赶出。这 8 个营的青年近卫军和 24 门火炮是拿破仑刚刚派来的。普军第 14 旅的增援部队火速赶来，又将青年近卫军击退。拿破仑又命令老近卫军的 2 个营从拉贝勒阿利昂前去增援。经过一番激战，法军又将普军赶回原阵地，普朗尚努瓦村第三次易手。那时已是晚上 7 时，比洛虽然没能攻占普朗尚努瓦，但却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一半兵力。第 2 军很快就要到达，第 1 军也将在北面 2 英里处加入战斗。

齐坦约在上午 11 时 30 分接到布吕歇尔的命令，要他加入威灵顿的左翼。由于第 2 军挡住了前往弗鲁瓦德蒙的道路，直到下午 2 时他才能够行动。数小时之后，仅仅由于冯·米夫林将军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齐坦又敢于违抗布吕歇尔

的命令，一场灾难才得以避免。布吕歇尔当时急于攻占普朗尚努瓦，于是命令齐坦向南推进，支援第 4 军。齐坦接到命令时大约是下午 6 时 30 分，他的第 1 旅已经通过奥安，主力部队也即将赶到。米夫林带着命令策马赶到威灵顿的左翼，命令范德勒和维维安的部队向中央移动，并命令齐坦参加该地域的作战。

米夫林赶到时，齐坦正命令第 2 旅掉头向南(第 1 旅已经过了弗里舍蒙的转弯处)。这时，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冯·米夫林将军知道法军刚刚攻下帕佩洛特和圣拉艾，威灵顿左翼的防御已岌岌可危。他确信，没有齐坦的增援，这场战役就会失败。另一方面，布吕歇尔的信使又描述了普军在普朗尚努瓦的危险境况。或许是由于米夫林有力的说服，或许是由于聚拢部队掉头向南过于浪费时间，齐坦认为他有理由不服从布吕歇尔的命令。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决定。如果齐坦掉头向南，便可能重蹈戴尔隆在林尼战役中的覆辙——在 2 个战场之间无所作为。事实上，普军是在关键时刻赶到战场的。皇家近卫军在圣让山山坡组织进攻的时候，齐坦把法军赶出了帕佩洛特和圣拉艾。然后，他们又转而越过西莫安谷地，在拉贝勒阿利昂和普朗尚努瓦周围猛烈攻击了迪律特和洛博的部队，并与第 4 军一道在该段战场粉碎了法军的抵抗。

许多法军都以为右翼出现的是格鲁希的部队，当发现原来是普军赶来时，法军倍加紧张。实际上，格鲁希的作用从始至终都十分有限，而且总是为时过晚，虽然拿破仑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格鲁希直到 6 月 18 日晚上 11 时才在瓦弗进行战斗，并且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因为除阻止普军 1 个军占领瓦弗外，这一战斗对主要事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战斗中引人注目的反倒是格鲁希拙劣的战术和蒂勒曼第 3 军顶住 2 倍于己的法军反复进攻的能力。这也是普军坚强意

志的体现，他们在 3 天的战斗中，为同盟军赢得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拿破仑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它使拿破仑指挥进攻作战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威灵顿指挥防御作战的技巧相匹敌。这正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值得人们思索。

格鲁希在 6 月 17 和 18 日的表现，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下级指挥官的过失如何导致战役的失败。17 日上午 10 时，拿破仑传递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信，至今仍是未解之迷。格鲁希后来否认接到过这个口信，而拿破仑则认为格鲁希无视自己的命令，使自己打了败仗。但是，如果普军被牵制在瓦弗，拿破仑是否会取胜呢？这种情况可以设想，但却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格鲁希的失职和违背命令很可能断送了法军的胜利。

要不是那场出人意料之外的暴雨，拿破仑也许会追上从四臂村溃退的威灵顿，而这也许能对第二天的战斗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滑铁卢战役中没有什么决定性因素是双方指挥官无法控制的。

## 第 13 章、阿尔马河之战(1854 年 9 月 20 日)

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宗教纠纷，但是所谓“东方问题”(主要指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则由来已久。几代俄国沙皇都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企图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因而不断与土耳其发生磨擦。英国虽然很想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但也深感有必要保护日益衰败的土耳其帝国，因为在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前，一直是土耳其控制着从陆路通向东印度群岛的交通要道。

从 1812 年起，俄国一直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现属罗

马尼亚)这两个土耳其省的天主教正教徒拥有保护权，这使其得以对土耳其内政施加影响。1850 年，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要求土耳其也给他保护巴勒斯坦罗马天主教徒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宗教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但就此事向土耳其苏丹提出抗议，而且紧接着又以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相威胁，要求得到对土耳其全境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雷德克利夫的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鼓动下，苏丹拒绝了沙皇的要求，于是俄国出兵了。

1853 年 10 月 23 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原以为摆出强硬的姿态就会使沙皇撤军，因此在土耳其宣战前一天，便派出联合舰队驶入黑海。不料事与愿违，联合舰队刚刚驶离君士坦丁堡，俄国海军紧接着就出海了，于 11 月 30 日在黑海南岸锡诺普海域全歼了土耳其的一个海军分舰队，并使该城居民饱受劫难。这种所谓的“大屠杀”在战争中虽属合法行为，但英国公众为之哗然，首相阿伯丁勋爵也变得忍无可忍。1854 年 3 月 27 日，大英帝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已在前一天采取了同一步骤。

2 月底和 3 月初，约有 2.5 万名英军驶离本土。第一个停靠的港口是马耳他的瓦莱塔。英军在此地要逗留两三个星期，等到用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再继续开赴土耳其。法军早已从法国地中海沿岸各港驶出，于 4 月初在加利波里登陆。英军到达时，发现瓦莱塔城不仅很脏，而且人满为患，于是便驶往斯库台，此城也不清洁，但不十分拥挤。

英军有 5 个步兵师：轻步兵师，以及第 1、2、3、4 步兵师，每师下辖 2 个旅。骑兵师(由卢肯勋爵指挥)下辖重骑兵旅和轻骑兵旅，师属炮兵部队包括 9 个野战炮兵连和 3 个马拉炮兵连(共 60 门火炮)。步兵和炮兵共计 2.44 万人，骑兵 1000 人。法军只有 4 个师，但法军师的规模比英军大，共有近 4 万人和 8 个野战炮兵连参战。它没有骑兵。土耳其的部

队（由苏里曼帕夏统率）共有 7000 人。法军士兵几乎全部使用新式“米尼”步枪，但这种先进武器只在部分英军中使用，很多英军士兵还使用可靠的老式步枪。俄军使用的滑膛枪及其刺刀劣于联军。

联军一方的行政管理和医疗保障状况不佳。部队在缺乏很多生活日用品的情况下就奔赴战场，这在英军的漫长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在 40 年的和平时期英军只重视海军建设，而对陆军不管不问。拿破仑战争后，英国解散了“皇家辎重车队”和“参谋团”，现在看来，此举副作用甚多。维持一支纯属本土防御性质的陆军这一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战备状态和领导素质。但是，纪律尚未受到冲击，因为虽然野战训练不多，礼仪和阅兵操练却是经常不断的。只不过，军官中只有极少数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曾在印度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其他人均无实战经验。

英军司令拉格伦勋爵曾在滑铁卢之战中失去一臂，时任威灵顿公爵的参谋。如今他已 66 岁，虽然曾在最高统帅部任职，但做的大都是行政管理工作，始终没有亲任过指挥官。他总是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而且英勇过人。在整个战争中，哪里最艰苦，他就带领参谋人员在哪里出现。在危急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在阿尔马河之战一线作战的师长中，乔治·布朗爵士和乔治·德莱西·埃文斯爵士两人曾参加过半岛战争。布朗这位轻步兵师师长，或许是和平时期陆军中最不讨人喜欢的军官，因为他对军纪的理解非同一般（从各方面说，军纪本身已经够苛刻的了），还酷爱体罚。但是，他在战斗中英勇无比，令人可敬（如果说“不可亲”的话）。第 1 师师长坎布里奇公爵是乔治三世之孙，此前没有实战经验，但具备一个优秀指挥宫的许多素质。法军司令是圣阿尔诺元帅，因辅佐路易·拿破仑登上皇位而青云直上。他健康状况欠佳［注：此战之后几天，

圣阿尔诺即去世，由资深的师长康罗贝尔将军继任。]，虽有实战经验，但不适于任高级指挥官。

联军在土耳其期间，俄军已经侵占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正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联军决定移师瓦尔纳。瓦尔纳是黑海西南岸的港口城市，距当时被俄军围困的锡利斯特拉 60 英里左右。在 5 月底 6 月初采取这一行动时，可怕的霍乱流行起来，受害的英法官兵达几千名。由于土耳其守军在锡利斯特拉的英勇抵抗，再加上奥地利重兵压境的威胁，俄军被迫撤回本土。敌对行动本应到此为止，然而英国公众不肯罢休，一定要夺回塞瓦斯托波尔和消灭俄国舰队。这种侵略主义情绪对野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在 9 月初，英法联军便开赴克里米亚。

拉格伦勋爵选择的卸载地点十分理想，它是位于尤帕托利亚以南约 20 英里、塞瓦斯托波尔以北 30 英里的卡拉米塔湾内的一处海滩。英、法、土三国军队从 9 月 14 日上午开始上陆，历时 5 天，未遇到任何抵抗。海滩上一片混乱，人马混杂[注：所有的马匹都是从英国用船运来的，旅途的艰辛与缺水使它们吃尽了苦头。]，毫无秩序；第一夜没有帐篷，恰逢大雨倾盆。此外，联军还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不过，在 19 日晨部队出发之前，总算从当地强征来一些破烂不堪的马车，运载了 3 天的干粮和备用弹药，但帐篷和重装备只好留下。

土军在最右翼沿海岸行进，然后是法军。英军的 2 个先头师成两路纵队行进，右路为第 2 师，在法军拿破仑亲王所率师的左侧；左路为轻步兵师。第 2 师之后是第 3 师，轻步兵师之后坎布里奇公爵统率的“近卫和高原第 1 师”。第 4 师的 1 个旅(另 1 个旅留在了卡拉米塔湾)殿后，行进在第 1 师的左侧。因此，步兵各师(第 4 师除外)成两路纵队齐头并进，留有适当间隔，可随时转换成线形部署，且正面和两翼均为来福枪手。卡迪根勋爵指挥的轻骑兵旅(重骑兵旅留在了瓦尔纳)

的几个团在步兵的前面，打头阵的是第 13 轻骑兵团和第 11 轻骑兵团(外加 1 个马拉炮连)。骑兵旅的另外 2 个团(第 8 轻骑兵团和第 17 枪骑兵团)在行军纵队的左侧。

这是一支雄纠纠的军队，军衣鲜红，刺刀闪亮，军旗高举，战鼓铿锵。然而，将士们的脸色不佳，霍乱还在军中流行。天气变热，部队因疾病和缺水(咸肉口粮更使人口干舌燥)而掉队的甚多。

下午 2 时左右，部队到达巴尔干纳克河。拉格伦勋爵派骑兵去侦察在河对岸来回巡逻的一支哥萨克部队的情况。不久即发现，这支哥萨克部队由骑兵和步兵组成，是一支侦察部队。拉格伦急令那 4 支侦察队撤回，因为众寡悬殊，出击必遭惨败。实际上两军确曾交火，但英军伤亡不大。尽管卢肯勋爵与其内弟卡迪根勋爵之间意见不和(虽与其身份不符，但时有发生)，骑兵部队还是秩序井然地撤出了战斗。当夜，英军在河南岸严阵以待，但出乎意料，俄军并未出击。

20 日晨，联军继续前进，土军和法军走在英军各师的前面。前一天晚上，圣阿尔诺元帅拟定了一个根本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博斯凯将军率领的右翼师和土军卷击俄军的左翼，英军卷击俄军的右翼。此时，联军指挥官对战区地形、俄军部署及其兵力知之甚少，只是看到了敌舰沿海岸航行。拉格伦勋爵并不打算让英军实施圣阿尔诺的作战方案，但出于礼貌而未明确表态。

上午 11 时许，联军的官兵开始看到设在俯视阿尔马河的高地上的俄军阵地，于是便停止了前进。这时，联军的指挥官们可以再向前走一点，仔细观察一番了。河的北岸地势渐低，而且到处是茂密的葡萄园和五彩纷呈的花园。在北岸，有两个小村庄，一个叫阿尔马塔马克，离海 1 英里远，位于法军前沿的中央；另一个叫乌尔留克，位于河上游约 1.5 英里处，在英军前沿的右翼。尤帕托利亚—塞瓦斯托波尔公路

在乌尔留克村以北通过阿尔马河上的木桥。在此役期间，阿尔马河只是一条河道狭窄、水流缓慢的小溪，有几处成潭，且潭深难涉。河岸陡峭，左岸尤甚，但除河口外各处都能徒涉。

河南岸地势陡升。河口处几乎成90度的陡坡，被称作“西崖”崖高 350 英尺，顶上是一片平地。这一令人望面生畏的陡壁从河口几乎延伸到阿尔马塔马克村。此后，坡度渐缓，并为谷川与沟壑所截断。离“西崖”3 英里是“电报高地”(因高地上有座电报塔而得名)，该高地与上述“平地”相连。越往河上游走地势越高，走过 1 英里后便是本地区制高点库甘内山。这座山从东到西绵延 1 英里，主峰高 450 英尺。主峰东面地势平缓，有几处可攀缘而上，但炮兵能通行的路不多。可供法军利用的道路不多，只有一条通往阿尔马塔马克渡口的象样子的大车路。不过，在乌尔图克地区有两条小路可供炮兵通行，穿过“电报高地”和库甘内山之间隘口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也可利用。

俄军由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亲王统率，包括 42 个步兵营、16 个轻骑兵中队、11 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和 48 门火炮，共有 3.8 万人和几千名水兵。这些士兵从前大都是憨厚的农民，虽缺乏想象力，但十分勇猛。俄军为维持纪律而采用的措施比英军要严厉得多。缅希科夫决定前出到阿尔马河迎敌，而不愿留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敌围困。他认为很有希望在那里打败联军。但在此之前，他必须牵制联军数天，以等待援兵到达。

缅希科夫率部于 9 月 14 日来到阿尔马河南岸各高地，那里的地形条件对防御十分有利。但是，他没有亲自察看地形。他听说“西崖”极难突破，于是只在一个名叫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小村庄里配置了 1 个步兵营和 4 门火炮，而在阿尔马塔马克以西未放一兵一卒——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在战斗打响前的 5 天内，俄军几乎没有修筑工事，只是在库甘内山的

西北坡筑起了一道齐胸高的土墙，作为一个有 12 门火炮的野战炮兵连的掩体。此外，他们在该山主峰的右方和后部也构筑了一道类似的、但更矮的土墙。英军把这两处火炮工事戏称为“大棱堡”与“小棱堡”。俄军以密集的连纵队投入战斗，这种队形很不灵活，难以调整，不利于部队实施机动和发扬火力。

缅希科夫虽然开始犯了西线未设防的错误，但他在阿尔马塔马克以南到库首内山以东却布设了坚固的防线。在靠近“电报高地”的河岸，他部署了 8 个营；在“电报高地”他部署了 4 个营。另外 2 个炮兵连配置在射界开阔、可掩护前沿部队的地形上。在通向高原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两旁，他配置了拥有 16 门火炮的 2 个轻炮兵连和 4 个步兵营。沿公路再向前行，还有 7 个营和 2 个炮连作为战术预备队，但它们离前沿部队太近。共有 16 个步兵营分散配置在库甘内山周围，包括防守“大棱堡”侧翼的喀山团的 4 个营。除了部署在大、小“棱堡”的火炮之外，在库甘内山的南坡还有一个顿河—哥萨克炮兵连。俄军骑兵集中部署在右翼。

英法联军的两位指挥官虽然对阵地看得一清二楚，却无法制定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作战方案。中午 1 时，英军继续向阿尔马河开进。与此同时，俄军的一门火炮开火，阿尔马河之战开始了。虽然这门火炮没有打到英军，拉格伦勋爵却认为，这是展开 2 个先头师的时候了。调动大量军队本来就决非易事，此时则更为困难，因为 2 个师在行进中都有些迷失了方向。第 2 师被法军挤向左方，轻步兵师也未按预定路线行进。结果是这 2 个师的部队混在了一起。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这 2 个师未能以旅为单位进行交战。

英军继续行进，后卫各师依然成纵队队形行军。但很快，炮弹就象巨大的板球一样掠过坚硬的地面向他们袭来。第 1 师奉命展开。第 3 师仍保持纵队队形，并退到缺编的第 4 师

翼侧；第 1 师的战斗队形延伸到 2 个先头师的后卫。

拉格伦勋爵对法军的意图仍然一无所知，但他估计，已接近河岸的博斯凯部将依照圣阿尔诺的预定方案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其余法军仍将保持纵队队形，大致与英军齐头并进。因此，他决定在法军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之后，再渡河进击俄军右翼和中部。英军进入俄军火炮射程之内后，便奉命卧倒了。

阿尔马河定战虽然只持续了几小时，但三言两语还讲不清楚。这次战役不是根据任何具体作战方案实施的。实际上，英军渡河之后总指挥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虽然拉格伦勋爵在一处的个人干预起了关键作用)。此次战役还不是因克尔曼战役那样的士兵之战，因为师旅指挥官在某些阶段影响了作战的进程。尽管如此，营自为战占了此役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概括起来讲，此战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又互相交叉重迭)，即法军攻击俄军左翼，英军攻占“大棱堡”，英军被击退，以及“近卫和高原”部队的总攻。

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所起的作用不大，可以一笔带过，因为缅希科夫亲王在部署兵力时没有顾及法军的存在。按预定方案，博斯凯将军的第 2 师进攻敌军左翼。他让布特将军的旅和土耳其军在河口一带绕过河堤强行渡河后，自己便随另一个旅在阿尔马塔马克徒涉场过河了。布特的部队在渡河时用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要沿着羊肠小道艰难地攀登陡峭的山崖。他们不得不把火炮送到阿尔马塔马克对面的小路上。待全旅爬上台地时，战斗已接近尾声。

然而，奥特马雷将军的旅向上攀登时却相当顺利，同布特的部队一样，也未遇到任何抵抗。他们以争强好胜的轻步兵为先锋，在敌人未赶到之前便占领了台地。俄军指挥官发现之后，命令在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部队前出，他们的四门

火炮使法军遭受一些伤亡。后来，俄军第 17 师师长基里阿科夫将军又将几门火炮带上台地，但此时奥特马雷的火炮已作好准备，压制了俄军炮火。缅希科夫一陈惊慌之后，亲自骑马赶到现场，并命令各预备队营随后跟进。当他们到达时，缅希科夫又认为法军的威胁不及英军，于是令其折回。奥特马雷的旅仍留在台地上。

圣阿尔诺事先命令：一旦布特的旅出现在台地之上，由康罗贝尔率领的第 1 师和由拿破仑亲王指挥的第 3 师立即渡河。康罗贝尔在阿尔马塔马克上方 1 英里处徒涉，然后沿一条便于通行的小路攀上悬崖；拿破仑亲王的部队则在乌尔留克下方不远处渡河。康罗贝尔发现，无法使火炮沿小路上崖，只好将其送回阿尔马塔马克，又因奥待马雷的一门火炮堵塞了道路而耽搁多时。法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没有炮兵的支援，就不发起进攻。于是，康罗贝尔命令部队在河谷两侧停止前进。在那里，配置在“电报高地”的敌军火炮打不着他们，而正是这些火炮在他们渡河时曾对其造成一些伤亡。拿破仑亲王的那个师在这一阶段未能渡河。由于受到猛烈炮击，他的部队纷纷到河北岸的花园和葡萄园中进行隐蔽。

当下午 3 时许英军的 2 个先头师正在与俄军中部和右翼的部队激战时，法军却按兵不动，只是在台地与敌相互炮击。圣阿尔诺本应命令康罗贝尔无论是否能带上火炮都要爬上台地，但他认为，从第 4 师抽调 1 个旅就可以很好地支援博斯凯。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使渡口与道路更加拥挤。拿破仑亲王的 4 个营总算过了河，但康罗贝尔的人还在河谷中等待炮兵爬上高地。

尤帕托利亚公路两侧台地上的最后战斗使法国人颇为满意，尽管他们自己的描述有些与众不同。在战斗打得最激烈之际，基里阿科夫将军带领 8 个营将康罗贝尔的部队赶回到阿尔马河北岸。康罗贝尔避而不战，率部沿小路向河岸走去。

但就在此时，他的炮兵爬上了崖顶，而敌我双方均未发现。炮兵指挥官看到俄军队形密集，便连发炮弹向敌军射击。俄军 8 个营由于没有炮火支援，便仓皇后撤，成为俄军总撤退的先导。

康罗贝尔师的官兵得知炮兵大显神威后，便一窝蜂似地拥进河谷，一向打先锋的轻步兵很快就在电报塔上洋洋得意地插上了自己的战旗。法军宣称，他们实际上并未被赶出河谷；恰恰相反，他们的 8 个营始终在与敌进行近战。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他们死伤了很多人才消灭了敌军。不过，官方公报的伤亡数字可不是这样。

拉格伦勋爵看到法军没有什么进展，便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冒险孤军独进。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他命令第 2 师和轻步兵师向前推进。在前面巡逻的步兵旅已与敌散兵交火。这些散兵占领了乌尔留克村，他们烧毁了该村，但未来得及破坏桥梁就被步兵旅赶过了河。英军中负责操练的军士为数不少，他们很注重队形的整齐，但由于第 2 师的右翼旅(旅长是亚当斯将军)在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面前不得不绕道而过，所以队形有些混乱。2 个营来到村西，第 3 个营(第 47 营)进至村东，靠近了彭尼法瑟将军的旅，该旅的 4 个营还集拢在一起。

英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夺占河的左岸，由于对更远的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英军尚无法制定出更进一步的作战方案。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英军稳步前进，其队形长达 2 英里。俄军炮兵见状迅速采取行动，英军第 2 师的左翼旅成了他们极好的攻击目标。隆隆的炮声在山间回荡，炮弹落在花园围墙附近。很快，队形中就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和杂乱的人群。俄军向英军猛烈炮击和英军难以穿过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意味着，当时还未与敌激烈交火的轻步兵师将首先过河，并投入战斗。轻步兵师拥有 5000 人，其指挥官在南岸宽阔的礁石

地带整理队伍，有一段时间他们未受到炮火的袭扰，只有纵射的滑膛枪弹断断续续地打来，造成一些伤亡。

在轻步兵师的左侧，布勒将军的旅发现了一片更大的开阔地和坡度低缓的丘陵地。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他便自作主张地将部队摆成方阵，保卫轻步兵师暴露的翼侧，抗御敌骑兵的突击。因此，他的 2 个营就没有随师前进，而他的第 3 个营在混乱中也失去了联系，如今已加入科德林顿将军的旅。不久，科德林顿也与第 7 营失去了联系。该营营长是“血雷上校”莱西·约，他率领这支失散的队伍独立作战，打得十分勇敢。在战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科德林顿的旅又收容了第 2 师的第 95 营。

科德林顿是位英勇善战的军人，不管什么人，什么部队，只要跟随他，他都欢迎。他飞身上马跃上河堤，率领全旅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向“大棱堡”冲去。在“大棱堡”这一要点两侧，各有俄军喀山团的 2 个营防守，这 4 个营成纵队队形展开，组成了 1 个大漏斗，等待进攻者落入圈套。俄军的炮兵有段时间保持沉默，但当科德林顿的人马逼近时，他们便猛烈开火。俄军众炮齐鸣，持续了好几分钟。与此同时，喀山团的滑膛枪手也在不断射击。但是，横队队形比纵队队形更能充分发扬火力。喀山团的左路纵队的翼侧有英军诺克特少校的步枪手，正面有科德林顿的旅，在三面攻击之下只好撤退。与此同时，莱西·约的营与喀山团的右路纵队也在激战。

科德林顿的旅伤亡惨重，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向目标推进。此时目标几乎被硝烟尘埃所掩蔽。烟尘消散之后，英军发现满面汗尘的俄军炮手正在把火炮系在拖车上准备逃离，因为他们知道，沙皇决不允许丢弃任何一门火炮。科德林顿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纵马跃上胸墙。第 23 团的一名旗手冲了上去，将该团的女王战旗插在胸墙上。他不幸中弹身亡，但

“大棱堡”拿下来了。

俄军受到挫折，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不久便向英军左翼大举反攻。与此同时，莱西·约上校的营也遭到右路的喀山团纵队的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火炮也阻碍着英军第 2 师登上台地。第 1 师无法实施近距离支援，这意味着，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大棱堡”的轻步兵师的 5 个营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不能抵御敌军大规模反击。

轻步兵师未能及时得到支援的原因是缺乏经验和指挥失误。拉格伦勋爵命令 2 个先头师向阿尔马河前进，命令坎布里奇公爵去支援轻步兵师。这是他在这场战役中下达的最后两道命令。坎布里奇公爵没有实战经验，他的师渡过河去，他觉得有必要先等命令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此时拉格伦勋爵已远离交战地区，他和参谋人员在英军右翼和法军左翼之间过了河，然后走进河谷，不知不觉地正向俄军防线走去。人们看到，这位总司令站在一块奇形怪状的岩石上，从容不迫地观察战场，并命令副官叫人把火炮推到这个偶然发现的有利地形上来。但是，幸运的是，他的军需官艾雷将军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机立断，以拉格伦勋爵的名义，指示公爵立即前进。

然而，此刻已为时过晚，科德林顿的旅和原属布勒旅后加入他们行列的 1 个营终于被俄军赶出了“大棱堡”。英军占领“大棱堡”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混乱，官兵们穿来穿去寻找自己的部队，挤进棱堡以避炮击。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在小棱堡和库甘内山上的俄军炮兵很快地瞄准了他们，此外还有新到战场的 16 个营已做好反击准备。当弗拉基米尔各团的先头分队在库甘内山山坡上出现时，英军还以为他们是法军(其实穿戴并不相同)，下令不得开火。当英军意识到自己看错了时，一位号兵又奉命吹起“撤退”号，其他号兵也竞相响应，英军顿时大乱。英军开始还是有秩序地撤退，

受到敌滑膛枪火力的猛烈打击后，英军部队便乱了，争先恐后地向山下逃去。科德林顿将军看到情况严重，即派人送信催促第 1 师加速起来。但赶来的第 1 批部队，又被撤退的大潮卷了回去。

此时(下午 3 时许)，战局对联军不利。法军在俄军左翼，尚未与敌人交火；英军第 2 师的部分官兵受到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炮兵牵制，失去了机动能力；轻步兵师的进攻被击退，一时又妨碍了“苏格兰卫队”的进攻。此外，还有至少 5000 名俄军正准备发起进攻。只有皇家卫队的士兵仍在顽强奋战。

战斗进入关键时刻，第 1 师重任在肩，要在稳定战局、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第 1 师向前推进了，本廷克将军指挥的“近卫旅”在右，科林·坎贝尔爵士率领的“高原旅”在左。“苏格兰卫队”在“近卫旅”的中央，该营比其他 2 个营提前登上了河堤顶部。但是，该营的左翼连同科德斯特里姆部在一起，由于碰到 S 形河道，不得不三渡阿尔马河。他们响应科德林顿将军的号召，加速前进，但赶到离“大棱堡”不到 50 码时，受到猛烈火力的阻击，又被上面撤下来的人群所阻。他们有的被卷回来，但不久又回到了部队。

与此同时，另两支英军部队也赶来了，格雷纳德部队在右，科德斯特里姆部在左。他们队形整齐、斗志高昂地向敌军逼近。在科德斯特里姆部后不远的左侧是“高原旅”的 3 个营——第 42 营居右，第 79 营居左，第 93 营居中。同那一天参战的所有士兵一样，这几个营的士兵也表现得英勇顽强。这两支近卫部队之间的缺口很快被其他部队补上了——一部分是迅速集结起来的苏格兰卫队的几个连，另一部分是科德林顿集中起来的轻步兵师的约 300 人。在第 95 营的支援下，第 7 营攻歼喀山团 2 个营的这场意义重大的战斗以胜利告终。莱

西·约很想乘胜追击，但乔治·布朗爵士(他骑着伤马，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命令他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退到一边，让近卫部队通过。

接下去便是俄军大败。联军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横队队形优于纵队队形，因为这场战斗不是肉搏战，而是火力战。俄军比英军第 1 师多几千人，但该师的 2 个旅同时投入战斗，火力之猛一开始就把俄军阻于路途上，俄军士兵一群一群地趴在地上，不久就陷入混乱，仓皇后撤。在左翼，俄军与英军第 2 师的 2 个旅短暂交火之后也慌忙撤退。康罗贝尔率领的法军也终于占领了各高地。

但是，战斗并未完全结束。在库甘内山的东端，俄军还有新到达的乌格利茨团的 4 个营。该团团长在其他部队向后撤退时，却将本团带了上来。在乌格利茨团的两侧，还有 3500 名骑兵跃跃欲试地等待出战。同俄军的骑兵一样，英军的骑兵旅至今也未与敌交火。现在，卢肯勋爵自作主张，命令该骑兵旅和左翼的 1 个马拉炮兵连前出。该炮兵连的火炮很快作出了反应，对准聚集在一起的 1 万名俄军开火。如果俄军指挥官有时间将这些人排成适当的队形投入战斗，那么联军要取得胜利还需要一番苦战，因为整个下午俄军都在英勇顽强地实施抗击。但是，由于两侧的英军炮兵不断地把炮弹射向俄军，使俄军官兵受到极大震撼，他们这才不顾纪律的约束潮水般地向塞瓦斯托波尔溃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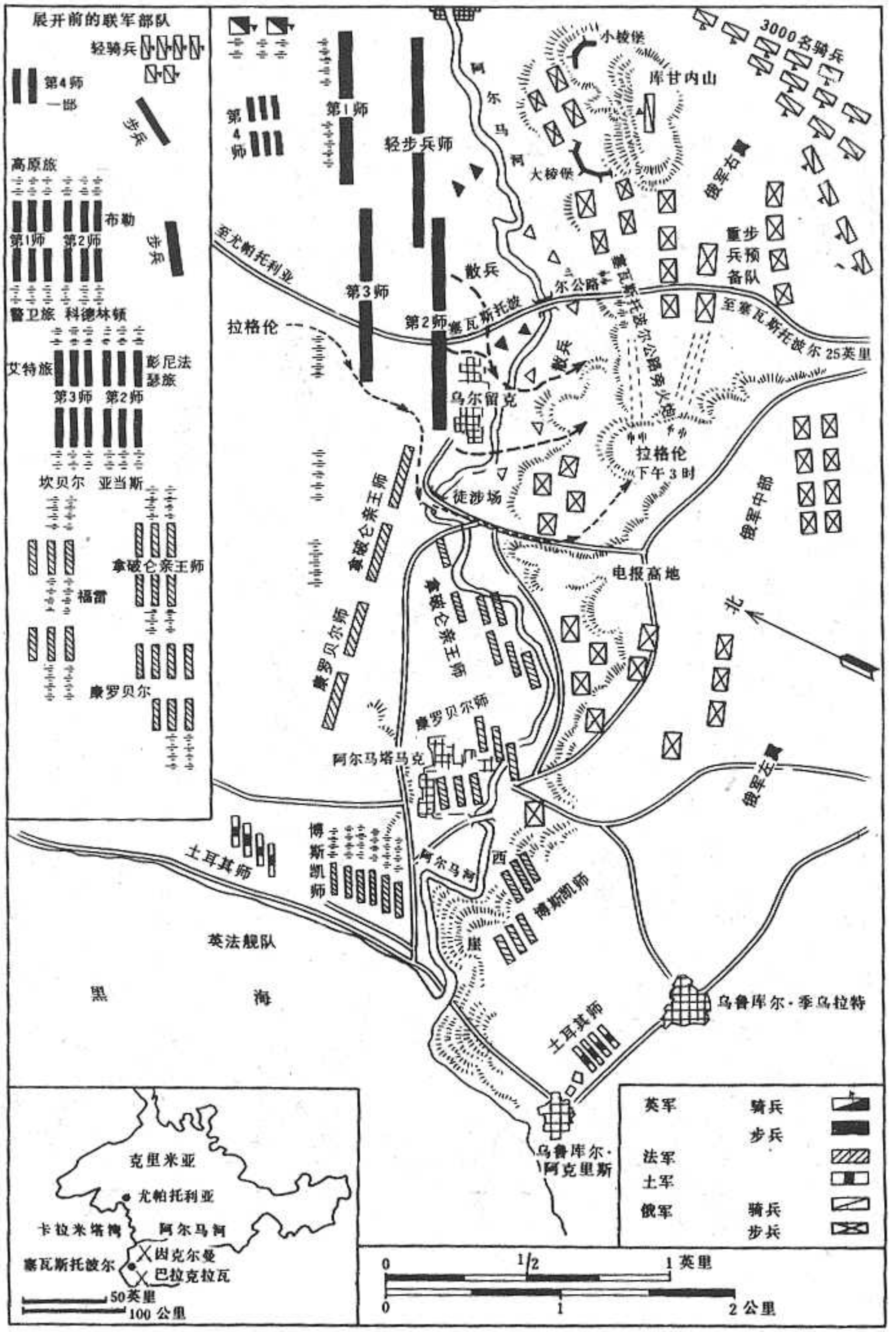
俄军炮手发射最后一发炮弹后，高夫·卡尔索普上校看了看表，此时是下午 3 时 40 分。战地记者 W·H·罗素则说战斗刚好在下午 5 时以前结束。对时间的这种不同说法无关紧要，重要的事实是，非常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俄国人讲，他们伤亡 5709 人；法军死 60 人，伤 500 人；英军伤亡 2002 人，其中死者为 362 人。伤员的情况十分可怜，外科医生和医疗设备奇缺，多数重伤员只好等死。有些俄国伤员躺

在战场一天一夜之后才有人前来护理。

此次战役没有追击阶段。英骑兵旅完全可以追击仓皇逃窜的俄军，新到的第 3 师和第 4 师也跃跃欲试。但是，拉格伦勋爵不准备用自己的骑兵冒险去对付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国部队(卢肯对此十分恼火)，圣阿尔诺元帅也拒绝参加任何大规模的追击行动。法军在过河之前就已经卸下驮包，圣阿尔诺说，部队没有驮包，不能继续前进。拉格伦勋爵力求协同作战，他担心如英军独占鳌头可能产生不良政治后果。

图 25、阿尔马河之战(1854 年 9 月 29 日)

阿尔马河之战：1854 年 9 月20日　　附图25



联军如果在阿尔马河之战中失利，就会被赶出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马河战役才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考虑决定这次战役胜负的因素时，应当分析俄军指挥官的表现。缅希科夫亲王决定不在塞瓦斯托波尔静候联军，而是前出到阿尔马河建立防线，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如果主动进攻巴尔干纳克，会不会打胜仗呢？武装侦察的结果想必已经向他表明，如果使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出击，同时以步兵攻击敌左翼，英军是无力抗拒的。他对法军的情况了解得较少，但只要卷击其左翼，就能使整个英、法、土三国联军陷入困境，无论舰队炮火还是载运船只都难以使其转危为安。

这样做对俄军来说当然有风险，但如果换一个更大胆、更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很可能冒此风险，并获得成功。但是，在此役的关键时刻，俄军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当英军轻步兵师被迫后撤，第 1 师正在艰难徒涉之际，如果俄军用大量骑兵进攻联军的左翼，用库甘内山上尚未投入战斗的众多步兵营进攻敌正面，缅希科夫很可能转败为胜。

这些很多都是推测。但是，在这次战役中，要提及两个因素，一个是决定性的，另一个对胜负也起了很大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英军各师采用了横队队形，第二个因素是拉格伦勋爵命令将火炮推上向外突出的岩石（他就是在那里观察战场的）。

俄军从未以横队队形打过仗，缅希科夫把防御作战计划建立在纵队反攻的基础上，而不是挖壕固守、不是依靠步枪火力。虽然俄军火炮起了重要作用，但俄军主要还是采用拼刺刀的人海战术。俄军仍然恪守苏沃洛夫的信条：“依靠子弹者是傻瓜，依靠刺刀者是好汉。”俄军的作战计划未能阻止敌军过河，而后又被傻瓜的子弹所击败。评述此战的乔达谢维奇少校谈及英军的战斗队形时写道，“以前我们从未见过军队成

长长的两列横队打仗。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不好的队形，用这种队形不可能使部队保持顽强的斗志来进攻俄军密集的纵队队形”。

横队队形优于纵队队形用简单的计算即可表明。如果拥有1000 人的团排成两列横队，就有 500 支步枪对准敌纵队；如果排成 8 路纵队前进，向翼侧只能同时发射 125 发子弹，向前方只能发射 8 发。正是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使英军步兵第 7 营能同两倍于己的俄军喀山团较量，并且战胜。在英军第 1 师前进过程中，相隔不远的 2 个近卫营在战斗中在火力方面比 4 个弗拉基米尔营以及喀山团的残部占优势。

当然，横队队形也有某些局限性。它只能用于开阔地带，要把队形排列得很好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广阔的射界。因此，英军在徒涉阿尔马河时，师长们坚持要停下来整理队形，一方面是为了好看，另一方面也为了发挥横队队形的优越性。当轻步兵师从“大棱堡”被赶下来时，横队队形的另一缺点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行进中，横队队形比纵队队形更容易陷入混乱，纵队队形有较大的弹性。尽管如此，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横队队形对纵队队形的巨大优越性。

拉格伦勋爵决定带领随从在部队前面率先渡河，法军散兵见状大惊。格拉伦一行遭到敌密集炮火的袭击，两名参谋受伤。如果不是炮弹弹道偏高，他们可能会全部阵亡。然而他们沿越来越陡的小路继续前进，突然发现山边伸出一块岩石。此处不久前曾被敌军占领，而今空无一人，敌军的炮弹看来也打不到这里。从此处能俯瞰大部战场。这块岩石很平很大，可放几门火炮。拉格伦即刻发现，从这个制高点英军火炮至少可以攻击 2 个俄军炮兵连。

拉格伦勋爵急令亚当斯旅派炮兵来。途中，由于 1 门炮翻车，1 匹马摔死，堵塞了道路，因而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特纳上尉的发射 9 磅重炮弹的 2 门火炮终于到达指定位置。

不知什么原因，来的炮手不够，但在皇家炮兵司令官的参谋迪克森上校的指挥下，火炮投入了战斗。第一个目标是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敌炮兵连。头两发炮弹打得不够远，尔后迪克森和他的助手调整了射程，使一发炮弹命中了一辆二轮弹药车，打死两匹马，接着另一发炮弹又直接命中敌炮兵连阵地。这一阵纵向射击虽然短暂，但完全出乎俄军意料，致使其指挥官下令将火炮系于拖车之后。于是，俄军 16 门火炮秩序井然地转移到另一处较高的阵地上。

此时，特纳上尉本人带着 2 门火炮及其全部炮手赶到，他们首先帮助赶走了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敌炮连，然后便把炮口转向 7 个重步兵营，即缅希科夫的战术预备队。这些步兵营位于尤帕托利亚公路的两侧，完全在火炮射程之内，由于成密集的纵队队形，故受重创后才被迫撤离。但是，在“大棱堡”内外的敌炮连和步兵则在发射 9 磅重炮弹的火炮射程之外。不过，在英军轻步兵师被击退，第 1 师投入战斗之际，英军炮手们不停地发射炮弹和霰弹，迫使俄军右翼指挥官克韦钦斯基将军在此次战役的关键时刻，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

一直有人批评拉格伦勋爵，说他不该留在那个阵地上，因为那里既危险，又不便于下达命令。但毫无疑问，如果他留在传统的指挥所里，他对战役进程的影响是不会这样大的，尽管众所周知这件事出于偶然。德莱西·埃文斯只要赶走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炮兵，就能带领该师的 3 个团(第 20、第 47 和第 55 团)渡河参战。此前，他的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牵制而无法投入交战。另外，预备队第 3 师的师长英格兰将军把自己的炮兵交给了埃文斯。这样，埃文斯就有约 30 门火炮攻击俄军中央的左翼了(英第 7 营正在那里与敌激战)。特纳的炮兵不仅使缅希科夫的预备队无法发挥作用，而且还为第 1 师准备最后总攻赢得了时间。

不谈别的，单单就这一点来说，拉格伦勋爵对取得战役胜利的贡献就不容忽视。他的指挥才能多年来颇受一些纸上谈兵者的非议。例如，有人指出，他完全不必实施正面进攻，只要卷击俄军右翼，将其赶至严阵以待的法军阵地前即可取得胜利。但是，那样做要实施远程迂回，而且迂回路线没有勘察，部队又因疾病、缺水、少粮而疲惫不堪。对这样一支部队，缅希科夫很可能用他为数众多的骑兵实施攻击。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拉格伦勋爵打赢了这次战役。他的胜利应首先归功于全体士兵的英勇和顽强，归功于军士与军官的杰出领导才能。

>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双方部队都显示出英勇和坚韧。拉格伦勋爵表现平平，缅希科夫亲王缺乏才智。因此可以这样说，英军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士兵勇敢、战术高超；俄军之所以失败，则由于指挥无能。

第 14 章、美国内战——七天战役的背景(1861 年至 1865 年)

萨姆特堡是一座建筑在浅滩之上，扼守查尔斯顿港口的要塞。1861 年 4 月 12 日凌晨，南部同盟[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脱离联邦的南方 11 个州组成的政府。]的炮兵向这座要塞发起了攻击，美国内战——美国人更多地称它为“州际战争”——由此而引发。次日，联邦军队的要塞指挥官投降。14 日，他和他那支为数很少的守备部队在受到降军特殊礼遇[注：降军特殊礼遇是指为了对被打败的军队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表示赞赏，允许他们投降时带着武器和举着军旗，从而使他们保留一定程度的尊严。]的情况下走出了要塞。一场漫长、艰苦并损失惨重的内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美国南部各州起初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后又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推选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杰斐逊·戴维斯作为他们的总统。在萨姆特堡事件前一个

月，共和党政府的首脑林肯总统刚刚在华盛顿就职。林肯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保存联邦。南方的 11 个蓄奴州不久前退出联邦的表面理由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侵犯，但实质上，害怕废除奴隶制才是他们迈出这一步的真正原因。

当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开战的时候，哪一方都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多久，将有多么残酷。联邦军当时只有 1.3 万多名官兵，各州民兵装备之差，堪称笑料。这些官兵面临的情况与 1947 年印巴分治时印度军队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1947 年印巴分治时，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军官们发现他们因不同的信仰而各投一方，而对美国的大约 300 名陆军军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珍视联邦，但他们还是决定首先效忠于自己所属的州。

双方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双方军队都不得不靠全民动员(起初通过志愿兵制，后来通过征兵制)获得兵员。征召新兵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装备和武装他们。对于南方来说这点尤其突出，因为南方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与北方相比。训练对于南方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许多军士长是德国或爱尔兰血统，与南方各州没有什么乡土联系，仍忠于联邦，而那些“叛逃”到南方的技术和参谋军官的数量不能满足南军的需要。

当战争爆发时，联邦军的总司令是年迈体弱的 75 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他一直是位优秀的将领，并且极为敏锐地看出，尽管联邦军可能会在东线失利(几乎如此)，但在西线，联邦军终究会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然而，林肯在联邦军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后不久就将他解除职务的做法仍然是正确的。北方军队一直苦于高级将领意见不一，这种状况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才结束。统帅机关意图不明确常常导致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

南方(或许也是双方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是罗伯特·李，

他是那些辞去对自己的任命而为自己的出生地弗吉尼亚州而战的正规军军人中的一员。尽管他在西弗吉尼亚的战绩不佳，但戴维斯知道他不是平庸之辈，把他任命为总统的军事顾问，结果，他干得非常出色。约瑟夫·约翰斯顿受伤后，他被任命为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司令官。他是位从不丧失进攻精神的将军，一再证明自己是位机动作战的大师。此外，他还具有一位成功的指挥官所必须具备的两项优点：取胜的意志和激发信心的能力。他的主要错误也许就在于，他过分相信部下的能力和意愿，这使他有时在下达命令时不够严谨。南部同盟的各野战部队以前一直是由各位指挥官独立指挥的，直到 1865 年 2 月，李被任命为最高司令官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第一次重要战斗发生在 1861 年 7 月 21 日。当时斯科特将军派遣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率领 5 个师夺取华盛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马纳萨斯。南部同盟军的指挥官是博雷加德将军。斯科特原来希望麦克道尔在约翰斯顿的军队从谢南多亚河谷赶来之前击败博雷加德。但在实际的战斗中，约翰斯顿与博雷加德汇合到了一起，并且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双方的士兵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这种情况下，防御一方占有优势。联邦军队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又遭到了重大失败。

11 月，年轻(35 岁)而广受欢迎的乔治·麦克莱伦接替了斯科特的职务。麦克莱伦曾经受美国政府的派遣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并没有使他很受教益)，他在对墨西哥的战争中表现突出，并且刚刚在西弗吉尼亚打了胜仗。他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可是他却总是辜负人们的希望。很快，他便丧失了总统和陆军部长对他的信任。人们对他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波托马克军团的训练、组织和鼓励士气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而不是他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他是

个非常精明的人，但却缺乏洞察力和活力。他的计划很大胆，但在实施过程中，他总是畏首畏尾，致使战役失败。如果换上其他更有决心的将军，仗本来是可以打赢的。

整整一冬天，麦克莱伦都按兵不动。由于情报系统十分糟糕，他非常错误地认为，仍在马纳萨斯据壕坚守的约翰斯顿的部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占据优势。林肯对麦克莱伦的按兵不动很快就变得不耐烦了，到了 1862 中的 2 月底，他命令麦克莱伦采取行动。因此，麦克莱伦制定了一项取道厄巴纳进攻里士满的计划。厄巴纳是拉帕汉诺克河口处的一座城镇，此地距南方同盟的首都只有 60 英里，麦克莱伦确信，约翰斯顿一定会从森特维尔地区赶来应付这种威胁，届时，他的撤退路线将被阻断。可是约翰斯顿却主动撤到拉皮丹一带的阵地，从而使麦克莱伦的计划无法实现。不过，麦克莱伦费了很大劲终于说服林肯同意发动一次两栖作战行动。联邦海军的铁甲舰，“班长”号前不久已把南方同盟的著名战舰“梅里马克”号打得失去了作战能力，海军报告汉普顿路是安全的。因此，联邦军队决定在门罗堡登陆，在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向里士满推进。

4 月初登陆行动开始时，麦克莱伦有大约 5.8 万人的兵力，他们分属于萨姆纳、海因策尔曼和凯斯将军的第 1、第 2 和第 4 这 3 个军。此外，麦克莱伦还拥有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以及大约 100 门大炮。他知道南军占据着约克敦，但他既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又没有可靠的地图，他的情报官员还经常交给他一些错误的情报。尽管没有根据，但他却估计，通过快速行军，他可以迂回包抄南军的阵地，在约翰斯顿赶来增援之前击败敌军。因此，他没有等其余部队赶来汇合就于 4 日 4 日向约克敦进发。

事实上，马格鲁德将军的 3 万名南军士兵正部署在横贯半岛的约 13 英里长的野战工事里面，他的阵地自然是无法迂回

的。看到敌方防御如此强大，麦克莱伦决定采取围困战略。尽管海军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仍忙于对付“梅里马克”号敌舰，无暇给地面部队以任何援助，但麦克莱伦想调他的第 1 军(由麦克道尔将军率领)占领约克河北岸的格洛斯特。然而，他刚刚离开门罗堡，华盛顿就通知他，麦克道尔的第 1 军将留在华盛顿以确保该城的安全。结果麦克莱伦与陆军部长斯坦顿就第 1 军的去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有时是言辞激烈的交涉。麦克莱伦确信，正因为华盛顿方面留下了第 1 军，他才没有拿下里士满。他的看法很可能是非常正确的，

麦克莱伦不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不能指望斯坦顿会很快让麦克道尔的第 1 军前来参战，他也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沿詹姆斯河面上的进攻路线，而只能伸展他的右翼，以便与麦克道尔取得联系。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分兵渡过 40 英尺宽，与泥狞的森林地带相毗邻的奇卡霍明尼河。然而，在他渡过奇卡霍明尼河之前，南北双方的军队在威廉斯堡发生了一场战斗。4 月 17 日，约翰斯顿到达约克敦接过了南军部队的指挥权。他从未打算让部队在长期围困的形势下坚守该城，因为“梅里马克”号打开通海阀使船沉没后，联邦海军的舰船可轰击约克敦的防御阵地。因此，5 月 3 日夜晚，南部同盟的军队悄悄撤离了他们的防线。北军得到了南军遗弃的大约 77 门大炮和大量弹药。

在麦克莱伦的一再要求下，林肯终于允诺将麦克道尔军的弗兰克林师派到麦克莱伦那里。当时，麦克莱伦在威廉斯堡已同南军接上了火(至少是他的军队与南军接上了火，因为麦克莱伦似乎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即在战斗发生时总不在场，尽管没有人可以指责他勇气不足)。在麦克莱伦因去指挥更多的部队而不在场的情况下，萨姆纳将军代替他指挥联邦军队(主要是胡克的师)进行了一场没有计划和协调的战斗。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联邦军队减员

2228 人，南军死伤 1500 人。南军的指挥官朗斯特里特于 5 月 5 日晚率部撤出战斗，继续向里士满方向撤退。联邦军队不紧不慢地追在后面。

5 月 17 日，麦克莱伦在帕芒基河岸边的怀特豪斯设立了司令部。在这里，他把增援部队新编成 2 个军，即菲茨—约翰 •波特将军的第 5 军和弗兰克林将军的第 6 军。南部同盟的军队已从诺福克和格洛斯特要塞撤走。“梅里马克”号沉没之后，北军在詹姆斯河畅行无阻，一直可以到达距里士满不到 6 英里的地方。麦克莱伦仍希望麦克道尔与他汇合，他满有信心地认为，南部同盟的首都很快就要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然而，他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以实现他的目标。与此同时，约翰斯顿率 4 个师的强大部队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里士满周围构筑了工事。5 月 20 日和 25 日，麦克莱伦分别将 2 个军派遣到河对岸，其余的部队仍留在北岸。在他的右翼，即在他与麦克道尔之间，南部同盟有 2 个旅(安德森旅和布兰奇旅)部署在汉诺威地区。即使麦克莱伦已得知他不可能得到麦克道尔军的其他部队，南部同盟的这 2 个旅的部队也必须肃清。波特军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此举解除了南军对麦克莱伦右翼的直接威胁。但是，麦克莱伦的右翼仍很薄弱，他的整个军队很不牢靠地驻扎在奇卡霍明尼河的两岸。

约翰斯顿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有利形势，他决定发起攻击。起初，他计划向联邦军全线进攻，以便在麦克道尔赶来之前击败麦克莱伦。可当他通过骑兵侦查队得知麦克道尔正在沿相反的方向运动时，他便决定立即攻击联邦军在河南岸的 2 个军。发生在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的七棵松战斗，或称“金橡树”战斗，成了这次战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

这次战斗(实际上包括这场战役的大部分战斗)的战场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奇卡霍明尼河地区经常河水猛涨。风雨交加，河上的桥梁被水冲垮，河流无法渡过的情况时常发生。

这里有大片的矮树林和灌木丛，当然还有大片的沼泽地。河谷地区到处是水流缓慢的小溪和腐烂的植物，使得该地瘴气四溢，很不利于军队宿营，下雨时尤其如此。这里的道路淤泥很深。这里的野战工事是建筑起来的，而不是挖出来的，因为这里有的是木材。将要受到攻击的联邦军的 2 个军正在这里严阵以待。

如果对地形有所了解，如果制定好计划，如果以朗斯特里特为首的指挥部不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话，南军本来是可以赢得七棵松战斗的胜利的。战斗的最后结果很难分清谁胜谁负，虽然联邦军队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战斗爆发的头天晚上，大面倾盆，奇卡霍明尼河几乎(但不是绝对)无法通过。在右翼，南军部队终于将联邦军的防线推向后边。如果朗斯特里特能正确理解给他的命令，如果他的参谋人员工作得好些，南军在右翼的进攻很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实际上，赫格的师和朗斯特里特指挥下的 6 个旅从未投入战斗。在左翼，南军开始也获得了成功，但经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一场苦斗，萨姆纳所率的联邦军终于渡过了奇卡霍明尼河，于下午 5 时左右投入了战斗，并在天黑时将南军赶回了他们进攻前所在的阵地。因此说，双方分别各在一翼取得了某些成功。第二天，朗斯特里特没有正确地执行下达给他的进攻命令，联邦军也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一仗南军伤亡了 6000 人左右，联邦军的损失大约为 5000 人。

南军司令官约翰斯顿将军在 5 月 31 日深夜负了重伤，史密斯将军接过了他的指挥权，当约翰斯顿被人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时候，对前线深有感情的戴维斯总统正与李将军视察战场情况。亲自与史密斯谈话并亲眼看到同盟军指挥官的糟糕表现后，戴维斯总统决定将这支已被称为北弗吉尼亚军团的部队交给李来指挥。从此，在这位备受拥戴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北弗吉尼亚军团在与对手波托马克军团的战斗中创造了

辉煌的战绩。

李打算发动进攻。七棵松战役之后，麦克莱伦已将除波特军以外的所有其他部队都调到了奇卡霍明尼河的南岸，李特别注意到麦克莱伦右翼的薄弱。不过，李首先需要搞清波特右翼以外的确切形势，并需要知道联邦军队如何以及从哪里得到给养。他对托托波托莫伊河(帕芒基河的一条支流)也很感兴趣，因为他打算让增援部队从这里渡河。他还需要对总的情况有所了解，以便指导未来的作战。李的骑兵指挥官是年轻漂亮、爱浮夸炫耀，但却极为能干的“杰布”·斯图尔特准将。李将侦察敌情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鉴于他以求战心过切而闻名，临行前，李将军给了他很多告诫。

6 月 12 日，兴高采烈的斯图尔特率领 3 个团的 1200 名骑兵以及一部分马拉炮兵出发了。在 4 天的时间里，他们从联邦军队的眼皮底下擦过，在距博顿桥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下游渡过奇卡霍明尼河，前后走完了 150 英里的路程，击毁了联邦军队的一个辎重车队，带回了一些俘虏和大量的情报。6 月 15 日他回到里士满时整个部队只伤亡一人。不过，斯图尔特也有些过分鲁莽，若不是联邦军的骑兵过于分散，他很可能被切断退路，吃了大亏。实际上，他曾请求李采取牵制行动以防上述情况发生。不仅如此，他还使身在怀特豪斯的麦克莱伦清楚地意识到了从怀特豪斯到前线的交通线的薄弱。这位统帅将他的大本营迁至詹姆斯河岸边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但李却很乐于原谅他的骑兵指挥官的小小过失——他还通令嘉奖了这次勇敢的出征——因为这位骑兵指挥官给他带来了有关敌军位置、实力以及弱点的显然很精确的报告。通过斯图尔特的侦察，李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可以将杰克逊将军的部队从谢南多亚河谷调来，稳操胜券地发动对联邦军队的进攻。“七天战役”即将开始。

第 15 章、七天战役(186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

6 月 22 日至 7 月 2 日，南北双方的军队进行了 4 次大规模战斗和一两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七天战役”。李拟定了一项计划，为这次战役拉开了帷幕。这项计划旨在从右翼包围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波特军(大约 3 万人左右)，在麦克莱伦从南岸赶来增援波特军之前将其歼灭。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因为尽管从战术上讲，李所掌握的部队有可能使他实现该计划的战略意图，但这样做会把里士满置于麦克莱伦的威胁之下。南部同盟的军队除马格鲁德指挥下的 2.7 万人以外都将部署到河的北岸，而留下来守卫里士满的马格鲁德的部队在人数上只有麦克莱伦部队的三分之一左右。初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很轻率，但实际上，由于李对麦克莱伦十分了解(这也许是南军在内战中的唯一的优势所在)，知道麦克莱伦在右翼遭到袭击时是不敢在左翼和中央推进的，因此，李对胜利是很有把握的。

作为该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将把托马斯(“石壁”)·杰克逊将军的军从谢南多亚河谷调来参战。该军在河谷地区的作战中战绩辉煌，杰克逊将军也因此而声名显赫。这位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阵亡的将军后来成为这次战争中涌现出的在民间广受赞扬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确是个神奇人物，身高 6 英尺，身材魁梧，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脸上显示出勇士所具有的那种骄傲而刚毅的神情。他是个执行纪律极严的人，笃信宗教，他给自己挑选的参谋长竟是位长老会的牧师。不难想象杰克逊会用《旧约全书》中具有威吓性的一些语言激励他的部队。近代历史上的奥德·温盖特将军可能与之相同。与温盖特一样，杰克逊生活节俭，寡言少语，不修边幅。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杰克逊将要起到一种重要而神秘的作用。

李首先采取欺骗行动使敌人摸不清他的意图，然后于 6 月

8 日给杰克逊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撤离河谷地区，到里士满城前与李的部队汇合。在 6 月 16 日的信中，李进一步将口气由建议改为命令，要求杰克逊快速行动，并反复申述整个行动务必隐蔽。为了加强欺骗效果，李还将惠廷的师和劳顿的旅派到河谷地区增加杰克逊的力量，这两位指挥官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调头返回。6 月 23 日，经过长途跋涉，杰克逊在弗雷德里克斯大厅见到了李，杰克逊没有按预定的会面时间准时到达，他因严格遵守星期日做礼拜的宗教习俗而耽搁了时间。此时，他的部队正乘坐 20 节货车沿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南下。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安布罗斯·希尔，丹尼尔·希尔以及朗斯特里特。

李向这些将军解释说，里士满不可能经受住长期的围困，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他必须主动进攻。联邦军队的主要防线太强，且炮兵火力太猛，因此有必要首先向波特军发动进攻。消灭波特的军队将严重威胁麦克莱伦的交通线，并会迫使他的部队或者走出堑壕，转移到河的北岸(这样他的部队就更容易对付)，或者撤回。如果是后者的话，李猜想麦克莱伦将顺着他来时的路，向半岛方向撤退，他已据此作了相应的安排。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李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杰克逊将是这次进攻的关键人物，他的部队将要包抄波特的右翼并威胁他的后方。他要从阿什兰出发，过金橡树教堂，渡过托托波托莫伊河直奔亨德利角和科尔德港。他在未来战斗中的任务是进攻比弗达姆河，打击波特防线的右翼；斯图尔特的骑兵将警戒他的左翼。安布罗斯·希尔将派 1 个旅(布兰奇旅)沿奇卡霍明尼河而上，在温斯顿桥过河，然后直取梅卡尼克斯维尔。布兰奇将与杰克逊取得联系，在前进中，他要占领敌人的前哨阵地，打通梅多桥。一旦此举完成，安布罗斯·希尔师的其余部队将从该桥渡河，肃清城内的敌军，为丹尼尔·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部队打通梅卡尼克斯维尔地

区的各座桥梁。丹尼尔·希尔的部队跟随安布罗斯·希尔的师渡河之后将支援杰克逊。朗斯特里特的师将在最后渡河，支援安布罗斯·希尔。

除了杰克逊以外，所有的人对李的口头命令都非常清楚(李还在 6 月 24 日的信中用比较含混的语言重申了这些命令)，而杰克逊恰恰是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与其他人不同，杰克逊对这片地区一无所知。尽管这片地区不如奇卡霍明尼河谷那样潮湿，但却森林密布，多条道路向不同的方向伸延，军队很容易在这里迷路。杰克逊起初说，他可于 6 月 25 日投入进攻，但在朗斯特里特劝极力劝说下，听别人讲了该地区的一些情况后，他明智地把日期改到了 6 月 26 日。因此，李在给杰克逊的书面命令中指示他在 26 日清晨穿过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与布兰奇将军取得联系。布兰奇将军届时将按预定计划渡过奇卡霍明尼河。

李的兵力近来又得到了加强，当七天战役的第一次战斗，即梅卡尼克斯维尔战斗打响时，李的部队总人数约已达到 8.5 万人。这些部队中包括杰克逊的部队(与惠廷的师和劳顿的旅加在一起，人数达 1.85 万人)、霍姆斯和怀斯将军的部队(8000 人和 10 个炮兵连，詹姆斯河沿岸的防御部队也包括在内)。李计划用包括斯图尔特的骑兵部队在内的大约 5.6 万人来对付波特的 3 万人。他进攻的日期如果再晚一些就糟了，因为 6 月 25 日，麦克莱伦已经将他的防线向前推进，准备以他三分之二的兵力向里士满攻击。

与此同时，麦克莱伦已通过一名逃兵得知了杰克逊的行动，他及时向波特发出警告，让他注意右翼可能发生的危险。波特的主阵地是非常坚固的，它的前面是比弗达姆河的左岸，左面毗邻奇卡霍明尼河，右面有梅卡尼克斯维尔前面密林的遮护。来犯之敌的正面和两翼将会受到部署在精心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的炮群的打击。战斗开始后，南部同盟的军队发现

了这一点，而且杰克逊也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包抄行动。

杰克逊的部队发现行军条件简直糟糕透顶。经过一场大雨，各条小河都河水暴满，河上的桥梁被冲垮，各条道路全都是一片泥泞。6 月 26 日上午 9 时，杰克逊终于到达了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但比李规定的时间晚了 6 个小时。他在托托波托莫伊河遇到了抵抗，北军在撤退时破坏了那里的桥梁。直到下午 5 时，即在原定期限的几个小时之后，杰克逊才赶到他预定目的地附近的亨德利角。这里，他已能听到南面传来的激战声，但根本看不到应当已经在他右侧的友邻部队的影子，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于是杰克逊决定让部队露营过夜。就这样，这支突破敌军防御的关键性力量根本没有投入战斗。

杰克逊没能在比弗达姆河包抄波特的侧翼使李失去了取胜的机会，但南军随后的溃败和重大伤亡却是各指挥官之间联络混乱，参谋人员素质差，特别是安布罗斯·希尔不听命令造成的。布兰奇在上午 9 时已同杰克逊的部队取得联系，但这之后，他就再没有杰克逊部队的消息了。他猜想杰克逊的部队正顺利地向亨德利角开进，于是便率领他的旅于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渡过了奇卡霍明尼河。他迅速南下向艾特利车站进发，并在前进途中与联邦军进行了零星的战斗，并很快将他们打垮。在艾特利车站，他的旅再次投入了战斗。因此，他与自己的师指挥官失去了联系，尽管曾有一度，他们同在一条道路上，彼此相距仅 1 英里。不过，傍晚时分，他曾与尤厄尔将军取得了联系，然而尤厄尔(渡过比弗达姆河后，他离开了杰克逊)本身也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此外，安布罗斯·希尔对杰克逊、尤厄尔和布兰奇的情况也毫无了解。友邻之间情况如此不明，这只能导致混乱。

下午 3 时左右，位于梅多桥的安布罗斯·希尔等得不耐烦了。他认为，如果要让李的计划获得成功，现在就必须发起

进攻，即使是孤军奋战也在所不惜。他在梅多桥强行渡河，向梅卡尼克斯维尔推进，在那里，他的先头部队受到了敌方炮火的袭击。在他那个师的其余部队赶来后，他击溃了正面的敌人。下午 4 时刚过，他已占领了梅卡尼克斯维尔，为丹尼尔·希尔和朗斯特里特打通了梅卡尼克斯维尔的过桥通道。但是，这些部队的过桥时间被延误了，因为桥梁需要修理，轻工兵一时找不到。

现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旷野上的敌人已经肃清，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迎着从波特军强大阵地上倾泻而来的弹雨，在 1 英里宽的正面上向前推进。下午 5 时，李陪同他那位令人敬畏的总统策马登上桥头，他被眼前的可怕情景惊呆了。他急令希尔停止这场向坚不可摧的敌方阵地发动的强攻，直到杰克逊赶到敌军的侧翼发起攻击。然而，由于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的，安布罗斯·希尔的师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夜幕很快降临。在南军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李试图在最右翼发动一次攻击，以便弥补南军的损失，因为那里的地形向河道方向倾斜，对进攻稍有利些。丹尼尔·希尔的师花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渡过了河(朗斯特里特的先头旅直到晚 10 时才渡过河)，在夜幕中，他的 2 个先头旅(里普利旅和彭德旅)因不熟悉地形而失去了时间，并且轻而易举地被占据良好地形的北军用密集火力拦阻住。战斗于晚间 9 时结束，李将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联邦军队彻底歼灭的计划破产了。按他的计划应渡河参战的 5.6 万南军中只有 1.4 万人实际投入了战斗。南部同盟军损失了 1350 人(包括 14 名校官)，而联邦军队的伤亡不到 400 人。

李曾预言，一旦波特遭到攻击，麦克莱伦决不会让他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大部队进攻里士满。事实证明，李的预言是正确的。现在联邦军队的司令官陷入了进退唯谷的境地，

由于杰克逊猛扑他的后方交通线，马格鲁德又以积极的欺骗行动使他对里士满方向南军的实力产生了错觉，他被迫采取了守势。大概在 6 月 18 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由怀特豪斯迁到詹姆斯河边的哈里森登陆场。现在，右翼出现的压力促使他决定立即行动。

麦克莱伦命令波特退到盖思斯米尔以南博茨韦思河后面的坚固阵地上去。波特将在这里迎击敌人，同时他的辎重车队开始从这里启程。他的防线呈半圆形，约 2 英里长，左面再次毗邻奇卡霍明尼河，右面依托着非常茂密的灌木丛。由于防御阵地的周围尽是灌木丛、沼泽和泥水，防御阵地的后面是块高地，高地上部署着波特的炮兵，因此，南军更难接近北军的阵地。波特有 3 个步兵师、6 个骑兵团和 80 门大炮，他的 3 万人的总兵力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战斗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整个防线只有最右翼较为薄弱，他知道杰克逊很可能想在这里突破。

南军的进攻方式与一天前大同小异。杰克逊(他现在已与丹尼尔·希尔的部队汇合[注：杰克逊指挥下的部队现已包括惠廷的部队、他自己的部队、尤厄尔的部队以及丹尼尔·希尔的师。])的部队将进攻联邦军的右翼和背后。李估计波特在退路受到威胁后将削弱自己的中央和左翼，这将使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有可能在波特的中央阵地打开一个缺口。安布罗斯·希尔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再一次充当了主力。朗斯特里特将进攻联邦军的左翼，但在杰克逊的进攻取得预期效果，即把敌军吸引开以前，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将暂时留作预备队。

同上次一样，由于缺乏协调和参谋工作不力，南军的进攻受到了挫折。部队又是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直到那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南军才沿全线发动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正面进攻。杰克逊再一次姗姗来迟，从沃尔纳特格罗夫教堂

到科尔德港的行军途中，他的部队一再受到放倒的树木和敌军袭击的阻扰。他最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 2 时。这真是“战时名将难守时”。丹尼尔·希尔的师一直为杰克逊的大部队冲锋开道，他曾派 1 个炮兵连投入战斗，但这个炮兵连很快就被敌方的炮火打垮了。杰克逊到达后便命令希尔的师撤到后面的树林中去。这样，杰克逊所辖的各个师一直无所作为。尽管波特非常清楚杰克逊的部队已到，但他并没有削弱自己的中央和左翼以应付杰克逊的威胁。

安布罗斯·希尔是在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将他的部队投入战斗的。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这支部队仍以极大的勇气穿过灌木丛，冲下河谷，进入沼泽，通过沿河岸匆匆竖起的鹿砦，向前冲击。可是，他们再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尸体枕藉。骄阳晒着潮湿的地面，殷满土地的鲜血在阳光下蒸发。杰克逊这时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说他正等希尔和朗斯特里特把敌人赶到他这边来，他已经为敌人选择了一块极好的葬身之地。

下午 4 时左右，杰克逊认识到战斗并没有按原定的计划进行，他终于让他的部队进攻了。可是丹尼尔·希尔的师所取得的进展微不足道，希尔右翼的尤厄尔的师进展更小，而惠廷师的 2 个旅因参谋军官的失误未能与其他的部队同时出击。就在这时，朗斯特里特也奉命在右翼展开攻势以支援安布罗斯·希尔。这样，当李亲自指挥下的惠廷的各个旅于晚上 7 时左右投入进攻后，南部同盟的军队第一次实现了全线统一进攻。可恰在这时，一直不愿削弱南岸部队的麦克莱伦终于派出了弗兰克林军的斯洛克姆师赶来支援波特。战场出现了两军相持不下的局面，一会儿对南方军队有利，一会儿对北方军队有利。

波特的部队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自己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当南军向北军的中央阵地再次发起拼死冲击后，北军

的防线被断为两截。波特的部队在夜幕和仍在战斗的炮兵部队的掩护下非常有序地撤到了河的对岸，并随后毁掉了河上的桥梁。盖思斯米尔战斗的结果是李赢得了胜利，尽管麦克莱伦倘若派出不只 1 个师的兵力援助波特的话，胜利很可能属于北军。但这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并不值得炫耀。南部同盟军伤亡了 8358 人，而联邦军的损失为 6837 人和 22 门大炮。

通过盖思斯米尔战斗，联邦军的庞大辎重车队、后备火炮和 2500 头挽畜摆脱了被杰克逊截获的危险。但倘若麦克莱伦提早 2 小时将它们转移走的话，他很可能不必经过两次小规模交战和一次大规模战斗就能到达他在詹姆斯河岸边新设的大本营。大量的给养、攻城炮炮弹以及各种无法装运的装备不得不遗弃。不过，从 6 月 28 日开始的整个大军沿条件恶劣地区回撤的工作却组织得井井有条，因为麦克莱伦非常善于组织管理。

盖恩斯米尔战斗后的那天晚上，麦克莱伦告诉手下各军指挥官，他决定撤至詹姆斯河。他命令凯斯将军的第 4 军随炮兵队和辎重队一道穿过白橡树沼泽地，并掩护其他部队和运输队安全通过。到 28 日中午时分，凯斯已执行了这一命令。同一天，波特军也穿过沼泽地，进入了封锁通往里士满的各条道路的阵地。

李仍抱着麦克莱伦向半岛方向撤退的可能性不放，他令尤厄尔的师沿奇卡霍明尼河北岸下行约 7 英里，到达迪斯帕奇车站，又令斯图尔特的骑兵支援尤厄尔，并沿河开往博顿桥。实际上，斯图尔特的部队却一直开到了怀特豪斯。在那里，斯图尔特和他的部队兴高采烈地搜索麦克莱伦遗弃的物资，因此，直到马尔文山战役结束之后李才用上这支骑兵部队。28 日对于南军来说是光阴虚度的一天，而对于麦克莱伦来说却是个良好的开端。直到当天晚上，李才最后搞清楚，联邦

军正向詹姆斯河运动。南军必须在联邦军到达某个易守难攻的落脚点之前赶上并消灭他们。

李即刻下令全速追击。但追击行动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出于种种原因，在格雷普瓦恩桥过河的杰克逊在渡过奇卡霍明尼河的时候行动慢得出奇，因此，当马格鲁德在萨维奇车站附近的威廉斯堡路与联邦军的后卫部队遭遇时，杰克逊没能帮助马格鲁德。马格鲁德觉得有必要求得在查尔斯城路与他平行前进的赫格的援助。赫格使部队停下来，并派 4 个旅过去援助马格鲁德与联邦军进行了两次不分胜负的交战。这种时间浪费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杰克逊的误时尤其应受到遣责，因为他的路程最短，如果抓紧时间，他很可能在联邦军穿过白橡树沼泽之前将其一部截住。

当时的情况是，麦克莱伦和他的整个部队于 6 月 30 日上午 1 时穿过了沼泽地。现在，他距相对比较安全的马尔文山只有 6 英里左右的路程了。再有一天，他的部队将靠拢在一起，不再有翼侧暴露给敌人，他的军用运输车队也将非常安全。因此说，6 月 30 日是极为重要的一天，李要取得胜利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到目前为止，由于意外事故、误解和某种程度的指挥失当，李一直与胜利无缘。

李的计划是，沿着与麦克莱伦的撤退路线相平行的一条线集，中部队，把大部分南军集中起来，一字摆开向东进攻，同时令杰克逊的 2.5 万人(丹尼尔·希尔的部队这时仍归杰克逊指挥)由北向南打击联邦军的后方。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它能使各个师沿不同的道路集中到一起，但它需要高水平的联络与合作。

霍姆斯将军将率他的师渡过詹姆斯河，沿新市场路前进。这样，他就是南军的最右翼。朗斯特里特将与安布罗斯·希尔的师一道沿达比敦路(他们上一夜就在那里露营)向长桥路进发。马格鲁德的 6 个旅将从萨维奇车站撤出，沿达比敦路

进发，支援朗斯特里特。赫格将成为东进部队的左翼，他的部队将沿查尔斯城路进到该道路与长桥路的交汇处。在敌人的后方，杰克逊的部队将从白橡树桥穿过沼泽。他要行军 7 英里左右，并且很可能在穿过沼泽地时遇到敌军的抵抗。

李现在约有 7 万人，他要依靠这 7 万人挽救南部同盟的命运。现在，他的敌人正明显地占据着上风。可是他精心制定的计划在执行中再一次出了岔子。这支庞大的军队实际参战的只有 2 万人(2 个师)，甚至这 2 万人也不是一起投入战斗，而是一个师接一个师地投入进攻的。

在 6 月 30 日的弗雷泽农场(有时也称为格伦戴尔)战斗中，霍姆斯、马格鲁德、赫格和杰克逊的部队实际未起任何作用。霍姆斯渡河后沿新市场路而下，当时马尔文山已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在前方不远处发现了联邦军的大批辎重车辆。这个目标诱人，霍姆斯不愿放过，他命令部队架起 6 门大炮轰击这些辎重车，但此举却招来了联邦军炮火的猛烈还击。向霍姆斯开炮轰击的有詹姆斯河上的联邦军炮舰、联邦军的野战炮兵预备队以及刚刚赶到高地的波特军的炮兵。霍姆斯的师很快被打散，到处找掩护的地方。李一直与霍姆斯保持着联系，是他批准霍姆斯发动炮击的。他命令马格鲁德率领他的 6 个旅前去援助霍姆斯，但在发现马格鲁德的部队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后，他又撤回了命令。就这样，李的大约 1.8 万人在战线的右翼团团打转，没起到什么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6 月 29 日，赫格的师在沿查尔斯城路东进时因停下来派部援助在萨维奇车站进行战斗的马格鲁德部而延误了时间。在 29 日的其余时间里以及整个 30 日里，他进军的速度慢得惊人。路上他与联邦军发生了一些战斗，因此他的部队有 25 人丧命，53 人受伤。在通往沼泽地的途中，不断有联邦军在撤退时砍倒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赫格曾一度派 1 个旅(赖特的旅)与杰克逊取得联系，结果这个旅在 30 日的大

部分时间里只是在沼泽地里徘徊。李这时距赫格只有几英里远，但似乎从未设法与赫格取得联系，而赫格也从未向李报告他行进缓慢的情况。

杰克逊应该是从北向南进攻的。他的表现——毋宁说他没什么表现——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有人批评他，有人为他辩护。我在后面还会详细加以评论。简单地说，他大约在中午时分赶到白橡树桥，但发现桥已被破坏，河南岸就是敌军和敌军的炮兵部队。到 1 时 45 分，他的炮兵指挥官克拉奇菲尔德上校用28门大炮轰击敌军,迫使敌军撤出了阵地。但当杰克逊的骑兵渡河之后，另一股敌人的炮兵开了火，又将杰克逊的骑兵赶了回来。杰克逊部队的滑膛枪不是联邦军线膛枪的对手，联邦军的线膛枪封锁了白橡树桥和通往该桥的通道。结果，杰克逊的 14 个旅一直被阻在沼泽地以北，一整天没有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朗斯特里特和安布罗斯·希尔的 2 个师正焦急地等待着进攻的信号(即赫格或杰克逊部队的步枪齐射)。李与他俩在一起。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但杰克逊和赫格那里始终没有动静。朗斯特里特终于不耐烦了，快到下午 4 时的时候，他命令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击，以迫使一支联邦军炮兵部队停止炮击。这次攻击引发了当日的最主要的战斗。南军的 2 个师向海因策尔曼的第 3 军以及波特军的麦考尔师相继发动了进攻。这次战斗一直被认为是整个内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安布罗斯·希尔的师最初没有参加攻击，按照原来的计划该师应养精蓄锐，等敌军溃退时投入追击。海因策尔曼的第 3 军以及麦考尔的师则得到了第二条防线上联邦军的另 2 个师的支持。南军的 2 个师冒着敌军从有利阵地上射出的强大炮火，异常英勇地向敌军发起持续不断的进攻，并在战线中央突破了麦考尔的防线。但在两翼，联邦军仍坚守着阵地。入夜后，联邦军重建了防线。朗斯特里特损

失了大约 2600 人，希尔伤亡了大约 1700 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惨烈。

麦克莱伦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但他本人当时并未在场。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危急的一天里，他竟决定去马尔文山地区进行一次勘察。李无疑失去了给麦克莱伦以决定性打击的几乎最后一次机会，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战斗未按原计划进行的时候不肯对他的下级进行干预。就在那天夜里(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在弗雷泽农场战斗的联邦军队从那里撤出来，在马尔文山的坚固阵地上与凯斯和波特的 2 个军汇合了。

马尔文山——更准确地说是马尔文丘陵——高出詹姆斯河谷 100 英尺。丘陵的顶端有一片高地，高地的北面和东北面是一个长满庄稼的缓坡，坡下连接着森林和水草地。联邦军的两侧阵地都有部分森林屏护，且联邦军阵地的右翼还受到一条被称为西渠的水道的保护。向这样的阵地发起冲击是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的，因为占领该阵地需要通过水草地和树林，这使南部同盟的炮兵很难有效地提供支援，而麦克莱伦在居高临下的阵地上的 300 门大炮却可向在开阔地带上实施攻击的敌方步兵猛烈轰击。

然而，李却执意要攻这个阵地。他很清楚，战斗将极为激烈，伤亡将极为惨重，但如能取得胜利，以前所有的损失都能得到弥补。朗斯特里特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他劝李说，可以在水草地之外的开阔地部署 100 门大地。这样做可以从左翼到中央形成交叉火力，压制联邦军的炮兵，使南军步兵完成一次成功的进攻。

马尔文山战斗在 7 月 1 日几乎打了一整天，它很快就演成了一场拼死冲杀，血流成河的悲剧。南军伤亡惨重，却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里，我不打算详细描述战斗的经过，因为从这场战斗中，无论从集体看还是从个人看，我们都发掘不

出任何如果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则有可能影响战斗结果的有决定意义的活动。诚然，这次战斗之后，“杰布”·斯图尔特使李失去了在最后一刻取胜的机会，但是，这位勇猛的骑兵指挥官经常是这样鲁莽，他此次的失误不能单独列为一个特殊因素。

朗斯特里特根本没能提供他所说的炮火支援。实际上，南军炮兵无法及时穿过矮木丛和沼泽地发起一次协调一致的炮击，许多大炮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各师的炮兵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陆陆续续地把大炮架到预定位置(同一时刻同时开火的大炮从未超过 20 门)，但这些炮很快就被联邦军队的密集炮火炸成了碎片。进攻的道路根本没有扫清，南军打头阵的那个旅只是驱散了联邦军的前哨部队和排枪手。第一阶段的进攻就这样在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结束了，南军连联邦军的一兵一卒都没有接触到。

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在敌军强大炮火下发动正面进攻是非常不利的，李决定从侧翼发动进攻。但正当进攻即将开始时，他得到消息(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说，首次发动进攻的先头旅至少已取得了某些进展。于是，他撤回了侧翼进攻的命令，决定扩大首次进攻的战果。因此，他命令马格鲁德将军的所有部队向前推进。

马格鲁德因向导带错了路，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马尔文山，且他的炮兵也尚未到达。但感觉到情况紧急，他决定在没有充分的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他的 9 个旅以不顾一切的勇敢精神，冒着敌人冰雹似的枪弹和炮火向前冲锋。但这些部队的进攻并不协调，每个旅一旦进入暴露的阵地后便立即遭到无情的杀伤。这时，马格鲁德右翼的丹尼尔·希尔在听到大炮的轰鸣后也命令他的各个旅冲上坡地。但与其他部队的进攻一样，这次进攻也是在没有炮火支援和没有相互协调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希尔的部队遭到了联邦军炮火

的大量杀伤。大炮在这次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很快，南部同盟的这 2 个师只能紧紧守候在泥泞和沾满血污的山头周围，一筹莫展，于是安布罗斯·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前来援助，稍后，当丹尼尔·希尔在中路的进攻已失去势头的时候，杰克逊派来 4 个旅帮助他。但尽管南军部队英勇奋战，联邦军的阵地仍岿然不动。当暮霭沉沉，阵地的形势更加混乱的时候，看到胜利希望的联邦军士兵勇敢地冲出阵地，将残余的南军驱逐到了树林之中。在那里，南军很难重新集结。当马格鲁德的精疲力竭的最后几个旅最终从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当夜幕降临于这块尸横遍野的战场的时候，联邦军的炮口喷出了最后一道桔红色的火焰，战斗随之结束了。南军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超过 5000 人(大多数是被敌军的炮火杀伤)，而他们的敌人伤亡不过 1500 人或 1600 人。

那天晚上，暴雨下了整整一夜。7 月 2 日清晨，当随身泥水的南军将士向战场望去时，他们看到的是僵冷的尸体，濒死的伤员和离散掉队的士兵。尽管手下的将军们曾极力主张发起攻击，但麦克莱伦拒绝向南军发动新的进攻，他的部队连夜向哈里森登陆场方向退去。他的士兵尽管近两天获胜，但却由于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不停地后撤和伤亡而情绪低落。他们向哈里森登陆场的撤退简直象溃不成军的败退：士兵频频掉队，装备和物资遗弃得到处都是。

杰克逊急于跟踪追击，但是李对麦克莱伦会从哪条路线撤退没有把握。这时候，戴维斯总统又与李在一起。李认为，部队在沿没膝深的泥路进行一次长途跋涉之前需要休整一天。斯图尔特这时终于与大队汇合了，李派他尾随联邦军队。李计划第二天开始追击，并准备让精力比较充沛的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的部队充当先锋。

结果，由于耽搁了一天，李失去了打败联邦军的最后一次

机会。到达哈里森登陆场的时候，麦克莱伦的军队竟如此的疲惫和混乱，以至于连叫作埃维灵顿高地的制高点都未加以驻防。斯图尔特追上联邦军后，立即派人向李汇报情况。可是，他不是在远处悄悄地监视敌人，而是匆忙占领了那个制高点，并用唯一的一门榴弹炮把仅有的几放炮弹射向敌营，鲁莽性格一如既往。这几炮不但没对联邦军造成什么危害，反而使联邦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战术错误。被激怒的联邦军迅速将斯图尔特的人逐出了埃维灵顿高地，并牢牢地占领了这块阵地。李随后视察了这块阵地，发现它坚不可摧，甚至比马尔文山更为坚固。3 天后，他留下斯图尔特监视联邦军，自己带领北弗吉尼亚军团撤回到了里士满。

8 月底，麦克莱伦率领他的波托马克军团登船离开了约克敦和门罗堡。他发动的攻势以失败而告终。联邦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 1.6 万人，另有 6000 人被俘。李曾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尽管未能打垮敌人，但他至少使里士满未落入敌军之手。但南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 2 万人的惨重代价。也许，这些战斗的最可悲的后果在于，迅速结束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希望已非常渺茫。

图 26、七天战役(186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

七天战役：1862 年 6 月26日至 7 月 2 日　　附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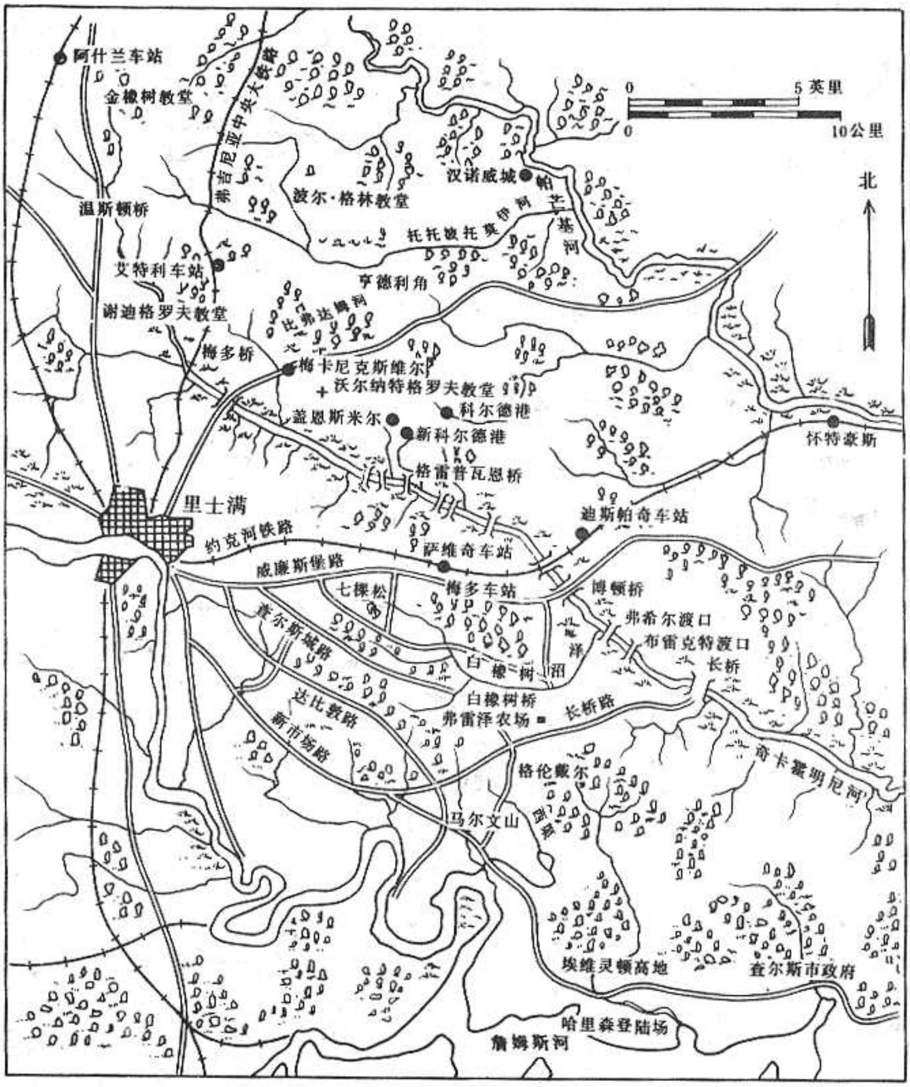



图 27、七天战役(186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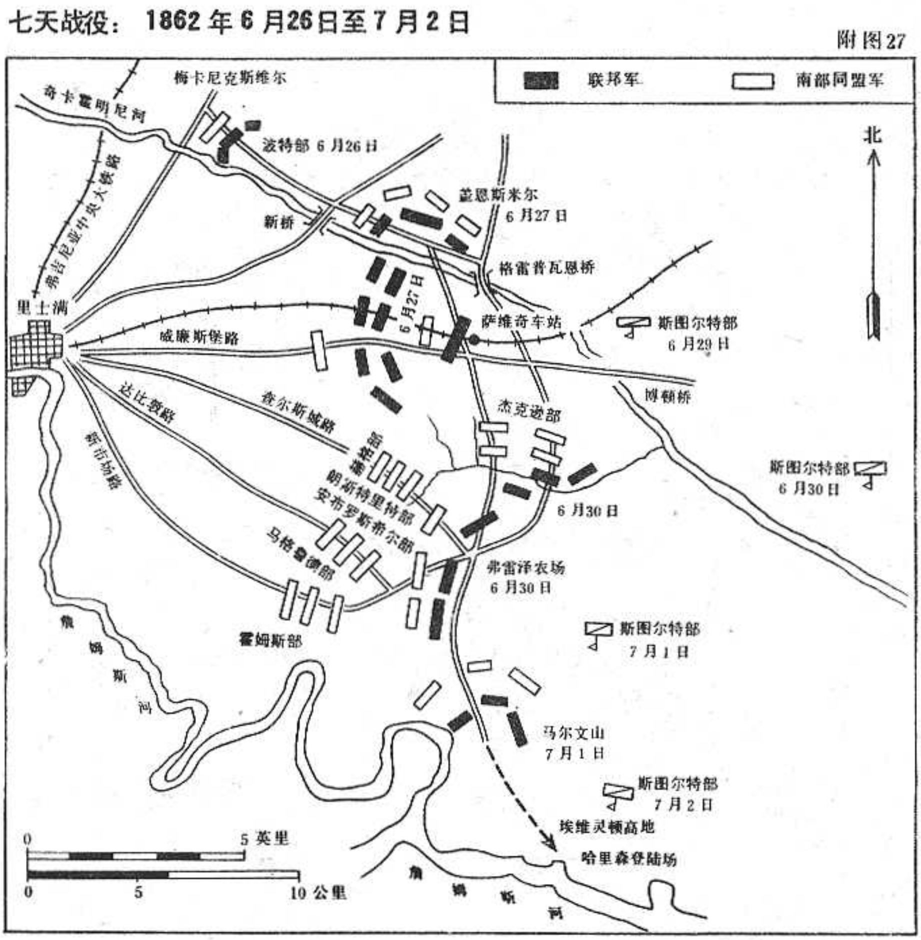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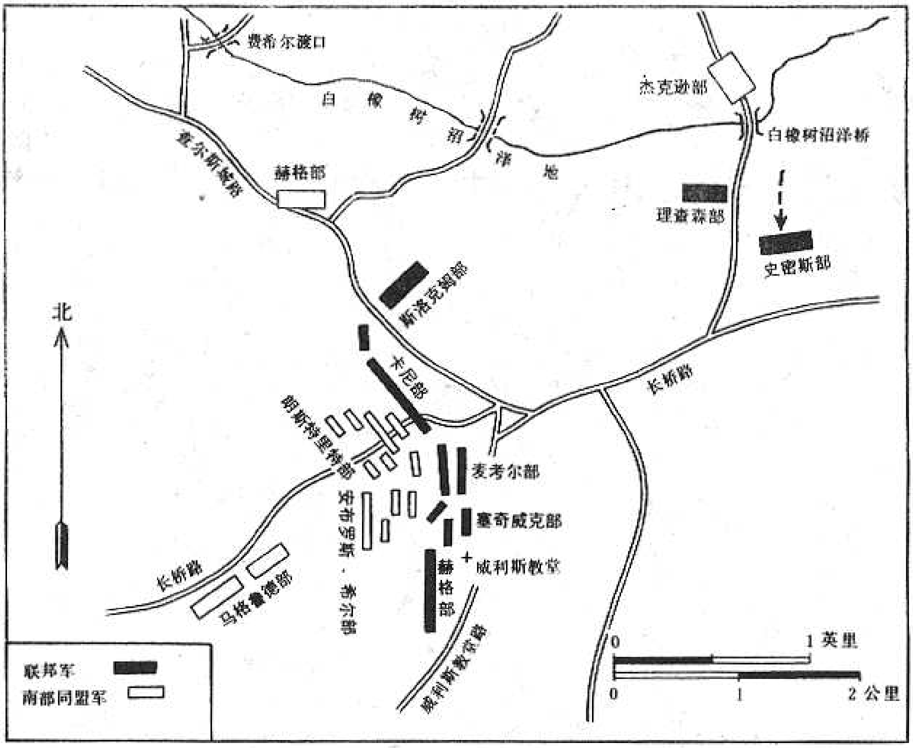



图28、七天战役(1862年6月30日的弗雷泽农场战斗)

七天战役：1862年6月30日的弗雷泽农场战斗

附图28




在这次战役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意外事件，发生了数次丧失战机的情况。如果得到华盛顿更多的帮助，同时他自己更果断一些的话，麦克莱伦几乎肯定会拿下里士满。他最初的设想表现出了一种进攻精神，可是，当他沿半岛推进后，这种进攻精神便被一种令人失望的畏首畏尾、按兵不动的惰性所取代了，最终，他把这场进攻导演成了一场精采的撤退。李的大胆计划应取得更大成功，应得到下级指挥官们的更有力的支持。他的战略是出色的，但他的战术却有缺点。

双方都因缺乏可靠的地图和参谋人员工作不力而受到影响。战前绘制国家各地区的地图的工作做得很少，测绘人员极其缺乏。李的确搞到了一份地图，但他很快发现，这份地图错误百出。如能得到较好的地图，或者对道路情况比较了

解，部队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时便可节省许多时间，甚至可能避免某些战斗。

麦克莱伦的参谋人员比李的参谋人员经验略微丰富一些，但他们的工作也很不理想。麦克莱伦经常因战术情报不准确，或者有时完全没有情报而无所适从。他的情报机构使他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未攻下里士满，他的情报机关负有责任。李身边的一些参谋人员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李本人也不善于使用他们。李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骑兵派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这对他也非常不利。

除了上述这些总的印象外，还有三个因素值得提及。麦克道尔未能参加这次战役以及麦克莱伦未能在 6 月 27 日向马格鲁德进攻这两个因素几乎无疑使里士满逃避了厄运；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三个因素，即“石壁”杰克逊在整个战役中的反常表现。如果杰克逊不是这样一反常态，波托马克军团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欧文·麦克道尔统帅的陆军第 1 军本应在 3 月底与麦克莱伦一起登船前往门罗堡。然而，杰克逊在谢南多亚河谷发动的出色战役使林肯总统大受震动，因此，林肯决定暂时把麦克道尔的部队留下保卫华盛顿，尽管华盛顿城内外有 1.8 万人的部队，且华盛顿附近地区另有 5.5 万人驻守。林肯根本不懂，向里士满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比把部队闲置于首都周围更能使华盛顿得到安全。

登陆后不久，麦克莱伦就制定了夺取约克敦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使用拥有 3 万人的麦克道尔军夺取格洛斯特。麦克莱伦知道，麦克道尔军正准备从亚历山德里亚启程。可是，4 月 6 日，麦克莱伦收到了陆军部长斯坦顿的来信，信中告诉他，总统仍不愿意让麦克道尔军前去参战。这意味着，联邦军的船队仍不能在约克河航行。不过，到了 5 月初的时候，杰克逊已从拉皮丹撤走，麦克莱伦已经扫清了约克敦一线的

进军道路，南军已经放弃了格洛斯特，林肯觉得敌军对华盛顿的直接威胁减轻了。这样，在麦克莱伦的进一步紧急呼吁下，斯坦顿于5月18日写信通知麦克莱伦，麦克道尔的部队将前去与他汇合(这时麦克道尔军的实力已增加到3.5万人至4万人之间)，麦克莱伦应向里士满以北的方向伸展其右翼，以便与麦克道尔的左翼取得联系。

如果这些部队按麦克莱伦原先的设想从海路运来，麦克莱伦便可能完成他非常珍视的由詹姆斯河一线向里士满推进的计划。实际上，他不得不实行分兵，因为为夺取里士满，一部分军队不得不越过奇卡霍明尼河到达该河南岸，而另一部分军队则必须留在北岸以便与麦克道尔取得联系。这种做法势必会把联邦部队的右翼暴露出来，给李一个至少歼其1个军的良机。麦克莱伦后来说道："该战役的失利盖源于此。"

麦克莱伦在帕芒基河岸边的怀特豪斯建立了他的指挥部。为便于麦克道尔军南下，他命令波特军扫清汉诺威地区的布兰奇准将所辖的南军部队。波特军的1.2万人于5月27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时，麦克道尔的先头部队与麦克莱伦部队的右翼相距仅20英里左右。然而，李深知麦克道尔的逼近对里士满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他早已安排部下通过增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区的杰克逊，牵制联邦军，迫使林肯将麦克道尔的部队再次抽调回去。

这一招果然灵验。5月23日，杰克逊在斯特拉斯堡击败了班克斯将军，第二天，华盛顿方面便命令麦克道尔放弃向里士满推进的计划，并迅速抽调2万人进入谢南多亚河谷。就这样，尽管离麦克莱伦已如此之近，麦克道尔不得不将他的4万人调走。菲茨—约翰·波特将军写道："如果那时麦克道尔与麦克莱伦汇合，里士满将会被占领。"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任何政府都不应该从一支正在实施经过精心策划的作战行动的军团中调走1个军。

6 月 25 日，也就是盖恩斯米尔战斗发生前两天，联邦军的左翼和中路在七棵松北部与南部同盟军的前卫部队遭遇，经过奥克格罗夫的小型战斗之后，麦克莱伦已把战线推进到距里士满大约不到 4 英里的地方。这时，他的三分之二的兵力都聚集在这里，他所面对的敌人是马格鲁德师的 1.3 万人和赫格师的 9000 人。此外，南部同盟在奇卡霍明尼河南岸的兵力还有 5 个骑兵团(2000 名骑兵)和一支 3000 人的炮兵预备队。霍姆斯师的 6500 人当时正在远离此地的詹姆斯河对岸一带。这 2.7 万名南军的对面是麦克莱伦的弗兰克林军、萨姆纳军和海因策尔曼军，他们从右到左排列，后面有凯斯军作为他们的预备队。这些军每个军都有 2 个师(弗兰克林军的斯洛克姆师后来被派到奇卡霍明尼河北岸增援波特军)，全军共有 6.2 万名战斗人员。除了兵力占优势以外，北军的大炮和轻武器无论在射程上还是在准确性上都远远胜过南军。

因此可以看出，如果麦克莱伦让波特顶住南部同盟军在其后翼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而他在中央和左翼发起猛烈进攻的话，他一定会拿下里士满。马格鲁德在其正式报告中谈到他所受到的威胁时说："如果麦克莱伦集中他的全部力量向我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发动进攻……他肯定会获得成功。"问题是，麦克莱伦真的错了吗？他真的没有抓住实现自己目标的大好时机吗？

为了替自己未发动进攻辩护，麦克莱伦提出了三点理由：他的背后有大量的敌军(可能是指杰克逊的部队)，这些敌军可以切断他的部队与在怀特豪斯的补给基地的联系，他的弹药不足，无法满足进攻的需要；如果他占领了里士满，南部同盟军便可进入到他的陆路运输线和河道运输线之间，这样，他的胜利便会变为一场灾难，此外，他认为时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的敌人可能集中全部力量打败他的军队，在他重新得到詹姆斯河上的船队帮助之前切断他与供应车队的联

系。

这些都可能被人看作是似是而非的借口，不过供应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里士满是一个重要目标，占领它定会大大缩短战争的进程，联邦政府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波托马克军团，而且不管怎么说，波托马克军团的兵力比敌军多出 2 万多人，它可击退敌军的任何反攻。李会发现他很难率部渡河南下，重新夺回首都，因为麦克道尔和他的 4 万人定会紧紧追在后面。但在盖恩斯米尔打败波特之后，他很可能会追上并摧毁联邦军的辎重车队。这很可能使联邦军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未必就是一场灾难)，因为除非被攻占的首都里有足够的军需品可一直供应到联邦军扫清陆路或水上运输线上的敌人并得到新的补给，联邦军的后勤供应将相当吃紧。

因此，对里士满发动进攻的确有些冒险，而麦克莱伦是一个谨镇的将军。不过公正地看，麦克莱伦在中央和左翼之所以未有所行动，很可能还有一个他难以启齿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认为，马格鲁德拥有一支人数大大超过 2.7 万人的庞大军队。军团情报部的头目阿伦·平克顿(在军团司令部里被称为阿伦少校)在部队登陆之前告诉麦克莱伦，他要对付的南军足有 20 万人。从盖恩斯米尔方面来的情报说，攻打波特的敌军是这 20 万人(这是个被大大夸大了的数字)中的 7 万人，这样，除去伤亡的人数，李留下来守卫里士满的军队约有 12 万人的样子(这个估计很大程度上是由马格鲁德的欺骗行动造成的，他让同一部分人在丛林周围出出进进)，麦克莱伦的情报官是个很好的侦探，但作为情报官却很不称职，他过于丰富的想象把麦克莱伦搞得十分气馁，在 3 个月的过程中，他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所提供的情报加以核实。

若是换上另一位更勇敢一点的统帅，他定会冲向里士满，攻下它，并很可能守住它，从而使战争的进程缩短。但麦克莱伦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之前就已决定“转移基地”——这是

他撤退的委婉说法。这样，他就失去了主动权，将他的军队置于危险之中，并实际上放弃了实现预定目标的任何希望。

杰克逊曾在谢南多亚河谷表现非凡，可是按照李的命令离开河谷之后，他的表现成了此次战争中的一个不解之谜。他自己选择6月26日作为到达目的地的日期，可那一天他却没有赶到。在比弗达姆河的战斗中，他本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可那天晚上，他却在闻听到枪炮声的情况下停了下来，根本没有参加那次战斗。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中姗姗来迟，并且，当他终于到达战场后，他又在战斗最最关键的时刻把丹尼尔·希尔的师撤了下来。等到他的军队开始投入战斗时，时间已经太晚了。他的部队没有参加萨维奇车站的战斗。弗雷泽农场战斗时，他越过白橡树沼泽的行动很不积极，而且很不得力。最后，在马尔文山的战斗中，用亚历山大的话讲，“他毫不主动”。

在这么多一反常态的现象发生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梅卡尼克斯维尔和弗雷泽农场战斗中，几乎完全是由于杰克逊未能实施上级指挥官的计划才使波托马克军团逃脱了覆灭的命运。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李给杰克逊的命令是，杰克逊应在6月24日行军近20英里，于当夜到达阿什兰。25日，他应向阿什兰以东前进6英里，在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以西的金橡树教堂宿营，并于26日凌晨3时离开营地，向波尔·格林教堂方向前进。他应于该日上午与布兰奇将军取得联系。那时，布兰奇的旅应渡过奇卡霍明尼河，向梅卡尼克斯维尔进发。安布罗斯·希尔将军的师应在“发现”(这是个模糊和不太标准的字眼)杰克逊和布兰奇的部队后立即渡河。朗斯特里特和丹尼尔·希尔应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方向的敌军被肃清后渡过河去。杰克逊的部队应在距其他部队较远的左翼与其他部队成梯队配置，渡过比弗达姆河，然后向科尔德港进发，到达波特军的背后。

杰克逊在 6 月 23 日与李会面后便于当日上午返回了他在比弗达姆车站的部队。向阿什兰的进军是在道路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进行的，杰克逊对这些地区一无所知。这仅仅是他所遇到的一大堆麻烦的开始，而从这以后，他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直到 25 日晚上，他那精疲力竭的部队才勉强到达阿什兰，这里离他们当天的目的地金橡树教堂还差 6 英里。杰克逊为他失去了时间而大为沮丧，他命令部队在 26 日凌晨 2 时 30 分开拔。但从管理的角度上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给养车尚未跟上，水不够用等困难。杰克逊的部队到达弗吉尼亚中央大铁路时已是上午 9 时，比李规定的时间晚了 6 个小时。部队直到上午 10 时才越过铁路，因为驱散联邦军队的一队骑兵又花了 1 个小时。就在这个阶段，尤厄尔离开了杰克逊的大队，带领他的师向南面的谢迪格罗夫教堂地区前进，并在那里与布兰奇的旅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很快又沿不同的路线走散了。

下午 3 时，杰克逊的部队到达了托托波托莫伊河，并在那里遇到了另一股敌军。这股敌军虽然被击溃了，但在撤退之前，他们破坏了桥梁。不过，架桥工兵很快将桥修好了。下午 4 时，杰克逊的大部队渡过了河，这时，南部方向大炮的轰鸣声和步枪子弹的呼啸声已能够听到。杰克逊的部队继续向亨德利角方向前进，前锋部队于下午 5 时左右到达那里。在亨德利角，尤厄尔与杰克逊的大部队汇合了，但他无法向杰克逊提供有关两位希尔的任何消息(安布罗斯・希尔此时应该在杰克逊的右翼，由丹尼尔・希尔给予支援)。这时枪炮声虽已非常清晰，但杰克逊对战场情况一无所知，如果向比弗达姆河进发，他的右翼缺少掩护，因此，他决定当天夜里让部队露营。

有关杰克逊的任务以及杰克逊如何执行任务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多少年来，有人攻击杰克逊，也有人为他辩护。

无可否认，他的部队在 6 月 23 日至 26 日的长途行军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 6 月 23 日的会议上，在朗斯特里特的极力劝说下，杰克逊把做好战前准备并投入战斗的时间由 6 月 25 日改到了 26 日。人们一直批评他过于乐观，这的确不假，因为他对那片地区毫不了解，也没有可靠的地图。从当时的情况看，杰克逊过高地估计了他的部队的能力——他的部队的确有相当的能力——以及那片地区的地理条件，但是他非常了解争取时间的必要性。在波特得到麦克莱伦的增援之前将其击败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向波特通报杰克逊的部队在逼近的情报正在途中。李对该地区的了解比杰克逊也多不了多少，正因为如此，他也许把杰克逊到达阿什兰的期限规定得太不留余地了。在到达阿什兰之前和之后，杰克逊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以求按照李的时间表行动，但结果证明，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他的错误是未把他行进缓慢的情况及时向李报告。

杰克逊在亨德利角的表现就不那么容易得到开脱了。也许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很好地领会李的命令。李的书面命令与口头命令略有区别，书面命令要求杰克逊比原计划向东前进得更远些。这样做便于他的迂回行动，并使他仍能与其他前往比弗达姆河的各个师保持梯次配置。也许杰克逊并不清楚(尽管他搞不清楚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李虽然派他向东前进得更远些，但李仍希望他进攻波特的右翼，而不只是让他向科尔德港进发，从后面袭击波特军。如果确实有些误解，澄清这些误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自 25 日以来电报线路中断了，而杰克逊距李有很大一段距离。

前面已经提到，到下午 3 时(此时杰克逊的部队刚刚到达托托波托莫伊河)，安布罗斯・希尔已等得不耐烦了，他终于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单独发动了进攻。丹尼尔・希尔与朗斯特里特直到很晚才渡过河，因此当杰克逊终于到达亨德利角

时，他的右翼自然没有任何掩护部队出现。这当然是他自己行进迟缓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布兰奇与杰克逊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取得联络所造成的。到下午 5 时，李想要停止这场在杰克逊赶到战场之前本不该发动的进攻。按理讲，安布罗斯·希尔一定非常清楚李给他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服从命令。进攻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当杰克逊的部队在亨德利角清楚地听到远处战场的枪声时，杰克逊手下的一些军官曾力劝杰克逊向枪炮声响起的地方前进。杰克逊后来说，他当时想到的是，枪炮声也许并不意味着战斗的全面展开，他的任务是与其他部队协同前进，而他当时并没发现其他各师的踪影。他决定严格服从命令，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有些人指责杰克逊不喜欢屈居人下，听人指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需要花时间履行宗教仪式也不是这次行军迟缓的原因。不过，在明知某种战斗正在进行却不援助同伴这一点上，杰克逊很难为自己开脱。这不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所做所为，也不符合杰克逊的性格。他手下的 1.85 万名将士或许并不一定能够挽回安布罗斯·希尔的重大失误，但如果他们早些赶到，比如说在下午 7 时以前赶到战场，他们挽回安布罗斯·希尔重大失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谈到 6 月 30 日(这一天是七天战役中的关键一天)的弗雷泽农场战斗，人们遣责杰克逊的主要之点是，他没有真正尽力使他的部队穿过白橡树沼泽地，按照李的计划进攻麦克莱伦的后方。经过对各种材料进行仔细研究——尽管有些材料相互矛盾，并不绝对可信——我们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

在盖恩斯米尔战斗之后的追击战中，杰克逊的部队(不包括尤厄尔的师)应在格雷普瓦恩桥渡过奇卡霍明尼河，然后向南经过萨维奇车站，向白橡树桥进发。其余的部队将进攻正在撤退的联邦军的翼侧。李希望追击行动在 29 日就开始，然

而，杰克逊直到 29 日—30 日那一夜的午夜之后才渡过奇卡霍明尼河，而且，由于抓了许多俘虏和需要清扫道路，尽管从河岸到白橡树这段行程只有 7 英里，可他的行动却如此之慢，以至于他的部队到达白橡树桥时已是中午时分。如果他能提前 3 个小时赶到，他便可咬住一部分正在穿过沼泽地的联邦军。

因为 6 月 29 日是个星期天，而杰克逊又以在星期天休息和做礼拜而闻名，因此，人们一直指责他故意放慢进军速度。他自己的解释是修理桥梁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与他的工兵指挥官对马格鲁德所说的话相矛盾。无论如何，河的上游方向 3 英里和 4 英里的地方还有两座桥可以使用，而杰克逊甚至根本没有去侦察一下。因此，严格遵守星期日宗教仪式可能就是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

当杰克逊于 30 日凌晨开始出发时，一场特大暴雨骤然降下，待黎明的曙光穿透黑沉沉的云层时，附近地区到处是很深的烂泥。通往白橡树沼泽地的原野上长满蓬乱密集的杂草，这些杂草与灌木丛缠结在一起，一直延伸到白橡树小溪。每当这样的大雨过后，白橡树河总是洪水汹涌。这是一片由泥塘、荆棘和矮树林所构成的原始地区，河上只有几座摇摇晃晃的小桥和几处渡口。这是片没有生命存在的沼泽地，一片充满恐怖气氛的死寂地区。

当杰克逊赶到时，河上的桥梁已被拆除，联邦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支援下，正警戒着渡口。并控制了通向该地的道路。弗兰克林将军在这里指挥着包括 2 个整师和从其他各师调来的另外 3 个旅以及 3 个炮兵连在内的 2.2 万人的联邦军队，以对付杰克逊。原在奇卡霍明尼河北岸的尤厄尔的部队于下午 4 时左右与杰克逊的部队重新汇合后，杰克逊的部队增加到了 2.5 万多人。

下午 1 时 45 分，克拉奇菲尔德上校的 28 门大炮开始炮击。

在这股炮火的集中打击下，联邦军的炮火被压制住了。杰克逊命令手下人带一门炮上前驱散了桥头附近的联邦军的狙击手。然后，他命令芒福德上校和他的弗吉尼亚第 2 骑兵队越过小溪，冲击联邦军的阵地。杰克逊带领一些参谋人员随后跟上，但没有让步兵渡河。芒福德上校的骑兵遇到了转移到路东侧的联邦军炮兵的打击，被迫仓皇撤退。整个下午，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炮战。双方在盲目轰击中消耗了大量的炮弹，但除了联邦军在炮火的掩护下重新建立了散兵线以外，双方都未取得可嘉的战果。杰克逊认为，北军对渡口的把守太严，而他根本不可能使自己的炮兵越过沼泽地来掩护任何进攻，因而一直消极等待，束手无策。在他的南面，朗斯特里特部队进攻的拼杀声清晰可辨。

毫无疑问，杰克逊的无所作为导致了李的失败，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杰克逊完全可以来取一些行动。他完全可以派他的步兵渡河，既使不能在正前方渡河(事实上，丹尼尔·希尔使自己的一些部队在正前方过了河)，他也可以在河的上游或下游方向渡河。赫格师的赖特部曾已穿过沼泽，赖特返回来向杰克逊回报情况。杰克逊派他再次返回沼泽地。赖特确实又这样做了，但他不是从布雷克特渡口返回的——他发现那里敌军把守很严——而是从距杰克逊的阵地只有 3 英里远的费希尔渡口返回的。然而，杰克逊没有指示赖特回报情况，他也没想了解赖特部队的进展情况。也许，杰克逊难以把大量炮兵运过去，但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本身就可以对弗兰克林的后方造成严重的威胁。

有人争辩说，杰克逊没有在河的上游渡河是对的，因为李给他的命令非常明确：攻下白橡树桥，保护李的左翼，在白橡树桥待命，直到接到新的命令。同时杰克逊是个绝对执行命令的人。然而，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杰克逊在白橡树桥边一定接到了李催促他火速支援朗斯特里特的新命令。即使

不是这样，他也应该抓住机会，在战斗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战场离白橡树桥如此之近，任何人说他不遵守上级指示都是没有道理的。

在炮战期间，杰克逊的一位旅长韦德·汉普顿在观察地形时发现沼泽地的边缘有一块容易渡河的地区。该地区的河底比较坚实，且河面只有大约 15 英尺宽。那里有一片空地，从空地上可以看到联邦军的阵地，联邦军防阵地非常有利于打退来自正面的进攻，但极容易受到来自侧面的进攻。汉普顿报告说，这是个发动进攻的理想地点。在回答杰克逊的询问时，汉普顿说，他可以很快架好一座供步兵渡河用的桥，但如果为炮兵建一座更大的桥，进攻的突然性便会失去。杰克逊似乎很感兴趣，他命令汉普顿架起一座步兵桥。但当汉普顿告诉杰克逊桥已架好，并请求让他的旅率先渡河时，杰克逊却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就这样，2.5 万名士兵被阻在了那里，未能参战。这些部队本来定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多少年来，人们就杰克逊在白橡树沼泽的一反常态的表现提出了种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令人满意。由于杰克逊是一个伟大的军人，许多解释是善意的。最善意的解释出自杰克逊的参谋长达布尼少校，他坚信，杰克逊的失误完全是出于他身体的过度疲劳。当时杰克逊已两三天没有睡觉，不断的焦虑和身上的重大责任更加剧了他的疲劳。

> 在这场战役中，可以说许多因素对胜负都有影响。但是，最突出的因素也许有三个。政府方面胆怯，情报工作很差是其中的两个。第三个是南军指挥官无力把握的因素。
>
>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政治干预与伯戈因当年所受到的来自白厅的干预还不是一回事。尽管这种干预没有造成失败，但它却毁掉了取胜的机会。如果政治家怕冒风险，并且为对付想象中的威胁而从一位

军事指挥官那里夺走很大一部分军队。那么战役是不太可能打赢的。

在沿半岛前进的过程中，麦克莱伦所得到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他没有攻下里士满，没有取得战役胜利的首要原因。情报工作的好坏对战役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距今更近一些的情况看，1939 年至 1945 年盟军的“埃尼格玛”密码机所发挥的作用更突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杰克逊将军是李的最有才干、最受信赖的部下之一，但是他在比弗达姆河、盖恩斯米尔和弗雷泽农场战斗中远不象他往日那样骁勇善战，使李失去了彻底打败联邦军队的机会。李在敦促杰克逊方面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往往有时出于指挥官无力把握的因素，胜利在几乎就要到来的时候却又从身边溜掉了。李遇到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 第 16 章、葛底斯堡战役(1863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

在马尔文山之战和葛底斯堡战役之间的 12 个月中，不仅发生了数次激烈战斗，而且联邦军指挥官更换频繁。李将军仍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指挥官，对于他来说，这十几个月中最可喜的事情无疑是“石壁”杰克逊在“七天战役”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来的才干又开始锋芒毕露。杰克逊的首次胜利是在 1862 年 8 月 9 日取得的，他在戈登斯维尔以北的塞达山打败了他的宿敌班克斯将军率领的一支联邦军队。

当麦克莱伦仍在半岛的时候，林肯便任命约翰·波普少将统率麦克道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的 3 个军保卫华盛顿。8 月底，李再次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分兵进击计划。他打算在拉帕汉诺克河一线牵制波普，同时让杰克逊绕到波普的后方，摧毁他的基地。但是波普发觉杰克逊的行动后便撤至马纳萨斯枢纽站。李跟踪追击，与杰克逊的部队一道，在 8 月 29 日

至 30 日第二次马纳萨斯战斗中，打败了波普。但这是一次收获甚微的胜利，李损失了近 20%的兵力。同时，李在近期内也无法向前推进，因为麦克莱伦已从半岛赶到，他的数量占优势的部队正在向李逼近。

9 月初，李由于急需给养和被服，遂率部向储有大量物资的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发。他再次冒险分兵两路，一方面派杰克逊消灭哈珀斯渡口和马丁斯堡一带的敌军，另一方面派朗斯特里特进军黑格斯敦。该计划的副本落入麦克莱伦之手。他如果利用这一情报肯定会彻底打败北弗吉尼亚军团。然而，麦克莱伦对此不屑一顾，这使李有时间重新集结他的部队，于 9 月 17 日实施沙普斯堡之战(即安提坦之战)。这次战斗没决出胜负。李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 1.3 万人。麦克莱伦暂时制止了南军的入侵。

几天后，北弗吉尼亚军团再次渡过波托马克河，首先退到欧佩奎恩河，后又退到库尔佩珀县府所在地。麦克莱伦不慌不忙地向沃伦顿运动，11 月 7 日，他在那里得知，博恩塞德将军已经接替了他的职位。博恩赛德原打算在阿奎亚河附近建立营地，尔后经弗雷德里克斯堡向里士满推进。可是，博恩赛德与麦克莱伦一样慢慢腾腾，这使李得以集中兵力，在俯瞰弗雷德里克斯堡这座小镇的高地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博恩赛德于 12 月 11 日和 12 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他这支约 12 万人的部队在 12 日向南军进攻了一整天，但南军阵地固若金汤，北军一再被打退，损失惨重。李的胜利已垂手可得，但位于斯塔福德高地上的联邦军炮兵阵地对南军造成了很大威胁，李无法将成功的防御转为进攻。

1862 年至 1863 年的冬天比较平静。博恩赛德于 1862 年 12 月 15 日再次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次年 1 月，他的职位由胡克少将接替。北弗吉尼亚军团在罗亚尔堡和美国堡之间建立防线，准备迎击拉帕汉诺克河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4 月底，

胡克试图包抄李的左翼，从而引发了 5 月 1 日至 4 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虽然南军赢得了这场激战的胜利，但李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因失去了杰克逊而悲痛万分。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李对自己能够狠揍联邦军的盲目自信更趋膨胀。他对联邦军士兵一贯持藐视态度。事实上，波托马克军团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后不久便恢复了士气，李认不清谁是坏士兵，谁又是坏将领领导下的好士兵。

在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李没有派部队前往密西西比河流域支援受到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严重威胁的南部同盟的部队，反而率北弗吉尼亚军团进犯宾夕法尼亚。李出此举自有妙算。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的阵地易守难攻，如将该军团诱至波托马克河以北，李可能会找到更有利的机会与其决战，并使在冬季占领谢南多亚河谷南部地区的南军部队从那里脱身。南军急需各类补给品，向北方各州进军可以得到大量储存物资。此外，李决定这样做还有一些更深的谋算，如给北方主和派以口实，鼓励外强站在南方一边干涉美国内政，等等。然而，入侵北方不但不会加剧北方各州的分裂，反而会使它们更加团结。而且，划时代的《解放宣言》的发表(1863 年 1 月 1 日)将使原来或许存在的欧洲国家对南方的同情转向北方。《解放宣言》宣布，所有奴隶即日起获得自由。

出于上述考虑，李于 6 月 3 日开始从拉帕汉诺克河向北机动。在北进之前，他将军团的所有步兵编成了 3 个军，每个军下辖 3 个师，第 1 军由朗斯特里特将军指挥，第 2 军由尤厄尔将军指挥，第 3 军由安布罗斯·希尔将军指挥。军团的野战炮兵编成了 15 个炮兵营，每营下辖 4 个炮兵连。“杰布”·斯图尔特将军指挥 6 个骑兵旅和 1 个马拉炮兵营。从李的侧翼冒进和他在敌方领土使部队疏开几英里的做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胡克的蔑视。希尔的 1 个军暂时留下监视拉

帕汉诺克河一线胡克的部队，朗斯特里特和尤厄尔的 2 个军则向库尔佩珀，进而向蓝山进发。胡克可轻而易举地抢占蓝山山口，将南军割裂开来，彻底击败之，但他没能抓住这个时机。

胡克确实曾命令第 6 军指挥官塞奇威克将军派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进行侦察，这次行动引发了布兰迪车站的那场骑兵战。尽管这次战斗是一次遭遇战，但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第一次表明，北军的骑兵比南军骑兵毫不逊色。这次战斗发生在 6 月 9 日，它使北军的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得到了李的部队正在北上的确切情报(因为尤厄尔的军正沿谢南多亚河谷向温切斯特进发)。因此，胡克于 6 月 13 日离开了弗雷德里克斯堡，他的北上路线正好与李的进军路线平行。

6 月 14 日，尤厄尔的第 2 军在温切斯特击败了米尔罗伊将军的北军。鉴于胡克正从右翼赶来，李直扑波托马克河。朗斯特里特沿蓝岭东侧进军，尤厄尔部和希尔部(此时已归队)则沿谢南多亚河谷前进。6 月 15 日至 22 日，尤厄尔的军在谢泼兹敦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希尔的军也于 24 日至 26 日在同一地方渡过了该河。6 月 24 日至 26 日，朗斯特里特也在威廉斯波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骑兵分散使用，他的这一决定成了影响葛底斯堡战役的进程，甚至很可能是该次战役结局的五大因素之一。李让斯图尔特的 2 个骑兵旅留下来严密护卫自己的本队，派詹金斯的骑兵旅随尤厄尔的军担任前卫，命令斯图尔特率余下的 3 个骑兵旅在联邦军的右翼行动。斯图尔特的任务是保护先头部队(尤厄尔的军)的侧翼和传递情报。直到葛底斯堡战役开始，李才又重新得到斯图尔特的消息。

胡克于 6 月 25 日至 26 日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

次日，他向哈勒克将军(联邦军总司令)呈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但遭到了哈勒克的否决。这种事情的发生已不是第一次了，胡克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6 月 28 日，米德将军接过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这时，尤厄尔的先头师已经到达卡什镇，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部队也已分别进至钱伯斯堡和费耶特维尔。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李对米德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但好在一位名叫哈里森的朗斯特里特的私人情报员向李提供了情报，李才得知米德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才认识到一次战役迫在眉睫。因此，李急忙命令在广大地域行动的各师部队向葛底斯堡以西 8 英里的卡什镇集中。至此，南北双方的各路大军都与葛底斯堡距离不等地集中在该城的周围，但任何人都没想到一场恶战即将在那里发生。

6 月 30 日，希尔军的一位师长赫思将军派下辖的一个旅到葛底斯堡城来采购皮鞋，此举决定了这次会战的地点。这个旅的士兵遇到了前来堵截南军的一支联邦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返回汇报情况。第二天，希尔(李尚未到达卡什镇)命令赫思与彭德的 2 个师向葛底斯堡前进。当这 2 个师行至该城以西 1 英里的麦克弗森岭时，该战役的第一次战斗打响了。这 2 个师的部队，特别是赫思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可是，一旦密执安州第 24 团和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另外 2 个团溃逃后，其他的北军部队便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葛底斯堡城外。

在这次初战中，进攻麦克弗森岭的南军被赶了回去，但北军也因失去了一名最优秀的将军(约翰·雷诺兹)而遭到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南军和北军的各个师都在火速向葛底斯堡集中。最早赶来的是联邦军的第 1 军和第 11 军，它们占领了葛底斯堡城西和城北的阵地。李早已命令尤厄尔率领他的师由卡什镇向葛底斯堡推进。到 7 月 1 日中午，罗兹的师已占领橡树岭，但联邦军第 11 军很快赶至，与其形成严重对峙态

势。赫思的师——该师后来得到希尔军的另一个师的加强——则咬住了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大部分联邦军是道布尔戴将军的第 1 军)。

现在,谁先得到增援关系重大,因为双方都在拼命抢时间。结果,沿哈里斯堡路而来的尤厄尔部的厄尔利将军首先率部赶到,联邦军的阵地因而变得岌岌可危。李来得很及时,正好亲眼目睹了联邦军的狼狈景象:第 11 军正穿过葛底斯堡向公墓山地区行进,正遭受沉重打击的第 1 军在塞米纳里岭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穿过中间的空旷地,向公墓岭逃去。

李巧妙地迅速集中了兵力。现在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敌军赶回到尚未到达战场的各个军的营地,他就会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事情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因为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 5 个因素之中的第 2 个因素。卡尔普山是战场北部的一个关键地物,但南军却未将它占领。那天晚上,南军本来可以占领它,并卷击北军的整个防线,但尤厄尔将军觉得那不是他的任务。到第二天上午他想这样做时,已经太迟了。实际上,在那天的战斗中,联邦军至少有 1 万人伤亡或失踪,另有 5000 人被俘。

7 月 1 日至 2 日夜间,联邦军抓紧时间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凌晨 1 时,米德将军和他的指挥所人员从托尼敦赶到。借助黎明的曙光,他骑马巡视了北军坚固的阵地:第 11 军在公墓山的半圆形阵地一直延伸到卡尔普山(该地物本来应该在南军的手里);防守卡尔普山的是第 1 军的沃兹沃思师,该师的当面是第一天未能及时参加战斗的尤厄尔的 1 个师。第二天接近中午时,第 12 军占领了沃兹沃思师右边的阵地。第 1 军位于公墓山之后,第 2 军的海斯师配置在齐格勒斯格罗夫,第 2 军余部和第 3 军部署在从齐格勒斯格罗夫到小圆顶的公墓岭一线。在第 6 军到达之前,先来的第 5 军担任预备队。

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配系，尽管有些人认为，第 3 军的指挥官西克尔斯将军擅自派部队前出占领高地上的一个突出部危及了联邦军的整个防御体系。

在一次非正式的，并且多少有些仓促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南军将领们发表了很多极不相同的意见，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在米德的部队完全集中起来之前向北军的阵地发起攻击。经过第一天的战斗，李的自负心理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支深入敌境，靠就地取粮的军队当然需要主动出击，然而，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身边，李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为冒险的。

南军的进攻出发线显然是塞米纳里岭，该地物比公墓岭要长，距东面的浅谷只有约 1 英里。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充当主攻部队的尤厄尔和希尔的 2 个军扼守在塞米纳里岭北端和葛底斯堡地区的阵地。尤厄尔的部队面对北军的右翼，希尔的当面是北军防线的中央。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到达较晚，尽管暂缺皮克特的师，仍担任南军的右翼。

李决定以朗斯特里特的军向联邦军防线的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并命令在朗斯特里特打响后，希尔立即突击在敌防线中央的公墓岭，尤厄尔采取配合行动，攻击敌右翼。这时，此次战役中的第三个关键事件发生了。由于种种原因，朗斯特里特(他本来就不赞同这个计划，曾强烈要求包抄敌军的侧翼)把进攻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并在发现自己正处于敌军监视之下后，进行了不必要的长距离反向行军。这不仅使米德得到了向前调动预备队的宝贵时间，而且还使下午 2 时左右到达的联邦军第 6 军正好赶上参加战斗。

西克尔斯的前出阵地从皮奇果园一直延伸到一片裸露的岩层，他的左翼就紧紧依托这片被恰当地称为“鬼穴”的岩石断层上。为了攻下这一相当坚固，但却暴露的前出阵地，朗斯特里特最终(大约下午 4 时)动用了 1.2 万人。他的 2 个

师从赫尔岭出发后成一路纵队前进，前卫由麦克劳斯的师担任。麦克劳斯的师行至皮奇果园的当面后，便向左展开，让胡德的师从它的后面赶上，与它的右翼相接。这次战斗，特别是“鬼穴”一带的战斗，打得格外激烈，足足持续了 2 个多小时。渐渐地，联邦军被赶出了阵地，他们一面后撤，一面英勇还击。

就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之前，米德曾骑马来见西克尔斯，并表示他不赞同这位将军将部队朝前部署的决定。他一眼就看出西克尔斯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是守不住这一突出部的。而现在，鉴于南军的压力很大，他便策马离去，命令赛克斯的第 5 军前来增援，并派他的工兵指挥官沃伦准将观察并向他报告左翼似乎正在出现的危险情况。此举引发了此次战役中第四个决定这次战役结局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沃伦为确保小圆顶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小圆顶失守，米德的左翼将被包抄，并受到南军火力的纵向打击。

米德的左翼虽然得以免遭攻击，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因为联邦军防线中部出现了多处缺口，而从右翼调来的部队只堵住了部分缺口。这为尤厄尔提供了卷击被削弱了的北军右翼的机会。尤厄尔得到的命令是协同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他的行动构成了对此次战役进程具有极大影响的五大因素中的最后一个因素。他在第一次进攻中没有与朗斯特里特协调行动，发动得实在太晚了，而第二次进攻又被取消了。就这样，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卷击联邦军右翼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天夜里，米德就把调走的几个团又调回到卡尔普山地区。

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天，双方士兵都英勇作战，但指挥官却多次失误。南军在右翼占领了一些阵地，双方都蒙受了重大伤亡，但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在 7 月 2 日至 3 日夜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米德决定继续进行防御作战。但是，李却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他一门心思地想实施

进攻作战。现在，李又得到了3个旅(皮克特的师已经赶到)，斯图尔特的骑兵也终于回来了，李还在米德的两翼各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尽管这两个立足点都很不稳固)。

李没有采纳朗斯特里特提出的实施翼侧进攻的建议，决定对敌中部防线(现在北军的中部防线比两翼都要脆弱)实施正面攻击，并派他的骑兵在联邦军的东侧和后方巡逻，以袭扰撤退的北军。这一天，双方进行了直接交锋，不象前两天那样机动迂回很多，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皮克特师发起的场面壮观，但效果不大的冲锋。

7月3日凌晨，尤厄尔在卡尔普山的前沿部队遭到联邦军第12军的攻击，战斗从凌晨4时一直进行到上午11时，结果尤厄尔的部队被击败，因此，他们对当日南军发动的主攻已经起不到多大支援作用了。南军的主攻是下午1时打响的，南军的138门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下午2时40分炮击停止后，朗斯特里特命令皮克特师发起进攻。1.1万名南军士兵(包括皮克特师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军所有3个师的部分人员)跨过河谷，问公墓岭的敌军，向着他们的“地狱之门”冲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数百名士兵在炮弹和枪弹的打击下象割草机下的杂草一样纷纷倒下，但仍未决出胜负。到黄昏时分，皮克特只得发出撤退的信号，那时，他的冲锋部队的伤亡率已高达67%。葛底斯堡战役就此结束。米德没有进行反击。第二天(7月4日)傍晚，李开始有秩序地向南方撤退。

几乎就在皮克特的部队蒙受巨大伤亡的同时，在战场东面大约3英里的地方发生了另一次作战行动。大约8000名联邦军骑兵迫使斯图尔特离开阵地，在非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战斗。这是一次用传统方式打的大规模战斗，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因此，斯图尔特只得远离战场，无法对南军步兵实施增援。

在一篇论述这次战役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温斯顿·邱吉尔这样写道：“他(指李将军)与他的伤兵和战俘走在一起。他损失了两门大炮，也输掉了这场战争。”。有些人争辩说，维克斯堡之役才是这场漫长而残酷的南北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可是，如果李在葛底斯堡消灭了米德的军队，南方很可能获得(即便是暂时的)独立。反之，由于李在这次战役中元气大伤，他再也无力入侵北方，无力凭借北弗吉尼亚军团再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了。

图 29、葛底斯堡战役(1863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斯图尔特骑兵的行动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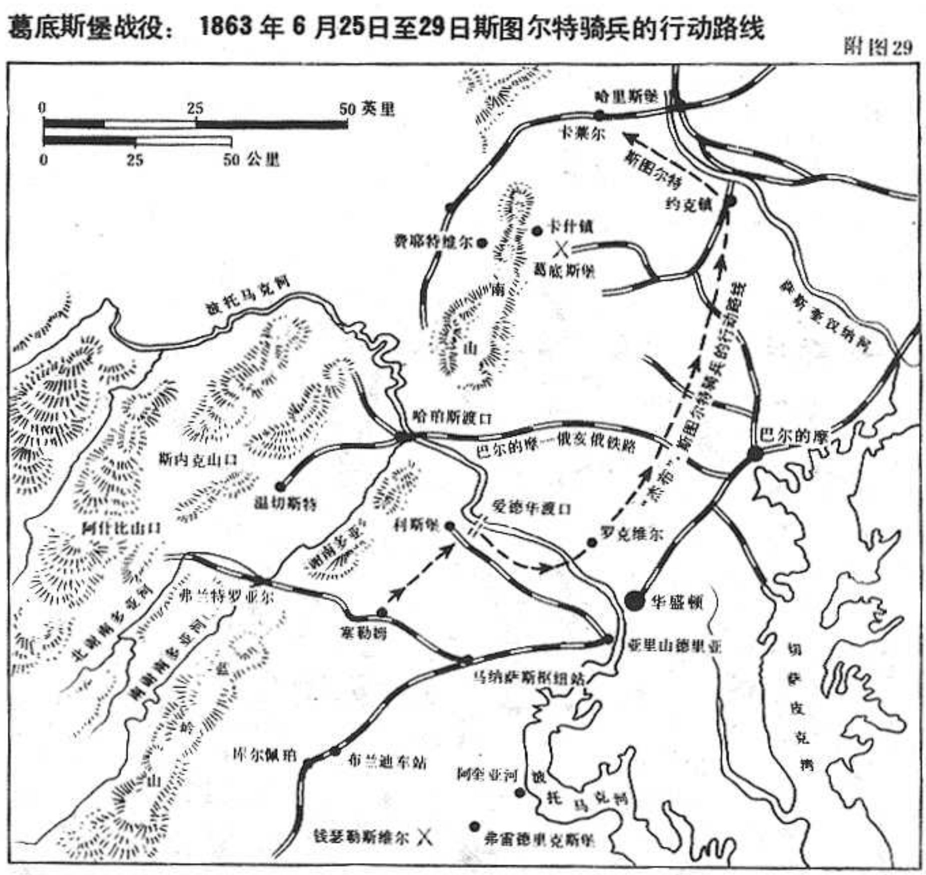



图 30、葛底斯堡战役(7 月 1 日下午作战态势)

葛底斯堡战役:7月1日下午作战态势

附图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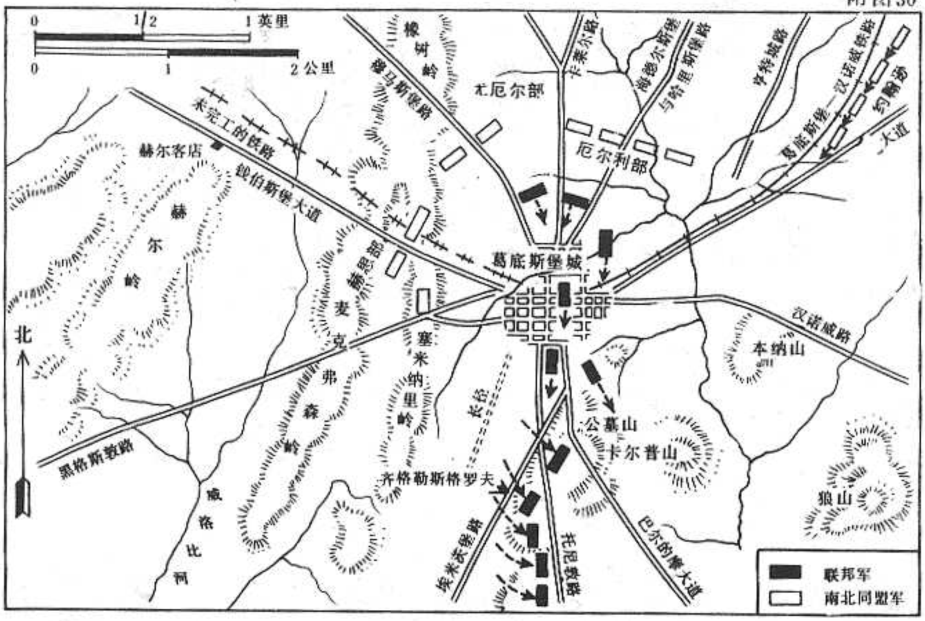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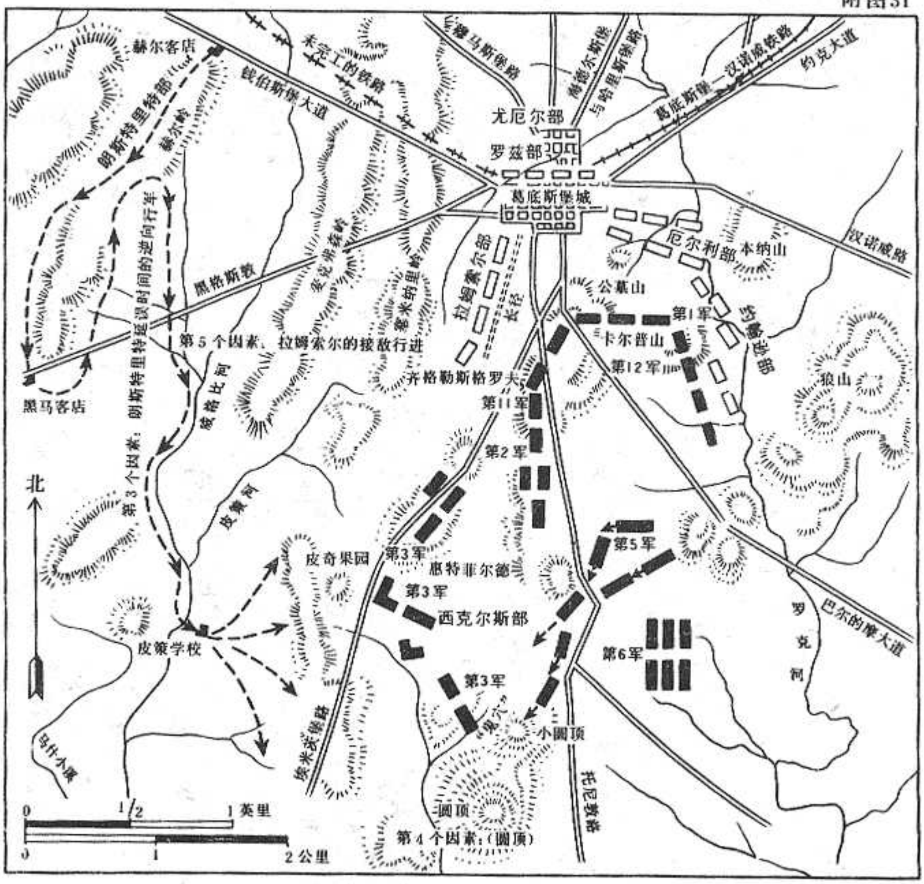



图31、葛底斯堡战役(1862年7月1日至2日作战态势)

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7月1日至2日作战态势

附图31




　　在这次战役中有五大重要事件，倘若其中任何一件以不同方法处理，李都可能赢得胜利。不过，在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李本人的品行，因为胜也好，负也罢，他对这次战役的结果都要负全面责任。

　　无疑，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与任何人一样，他也有错误，尽管总的来说，他的才能大于他的缺点。他不是一个好军需官，至少要对自己的部队经常衣衫褴褛，装备低劣和给养不足承担部分责任。有时，他对部下的要求迁就过多，对部下过分信任。这就导致了他的命令缺乏权威性，他的部下

接到命令后往往自行其事。李的这些缺点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和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毋庸置疑，他的一些高级将领的表现也令他失望——这些在以后还会提到——但是，他自己也要对此承担一部分责任。

斯图尔特之所以铸成大错，根源在于他的性格。正如一位联邦军将领所说，他是“北美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他在双方军队中衣着最漂亮，并且总是在歌声中骑马投入战场，有时身边还有一个人弹奏班卓琴。他不仅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还勇敢机智。他是位侦察敌情的高手，具有成为一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所需的一切素质。他的一大缺点是追求荣誉的欲望过强。遗憾的是，这往往源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深思。

自从斯图尔特担任南军骑兵指挥官以后，他的部队一直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印象。但到 1863 年 6 月 9 日李开始入侵北方时，南军骑兵的这种战无不胜的形象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以后的数日中，掩护李前进的斯图尔特的各骑兵旅不断受到联邦军新任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的袭扰。

有人指责斯图尔特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表现不佳。在那次交战中，南军骑兵伤亡 523 人。《里士满调查者报》载文写道：“如果这次战斗是为少数自负而愚蠢的军官取乐而举行的一次锦标赛，那么，出现这一灾难也许情有可原。”这话也许有点不太公正，但它却大大刺伤了斯图尔特的自尊心，并且无疑成了他要求在华盛顿以北渡过波托马克河直驱联邦军后方的主要动因。在一年以前的“七天战役”中，他曾成功地实施过这样一次行动，把麦克莱伦打得狼狈不堪。现在，他又有了一次进行光荣的敌后奔袭并恢复他稍稍受损的名誉的机会。

李需要得到情报，并认为斯图尔特的建议有可取之处。但

他也知道，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尤厄尔的第 2 军的翼侧。尤厄尔的第 2 军是南军的先头部队，首先沿谢南多亚山谷行进，尔后于 6 月 22 日渡过波托马克河，向钱伯斯堡挺进。鉴于自己的军团已成一线展开，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 5 个骑兵旅(詹金斯的旅已经派出)分散使用，以便得到更多的情报和掩护更多的部队。为此，他直接或通过朗斯特里特，多次向斯图尔特发出了措辞含糊并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的指示(说指示是因为它们简直不能称为命令)。李要斯图尔特用 2 个骑兵旅保卫蓝岭山的斯内克和阿什比山口，监视胡克的波托马克军团(李对于该军团的行踪尚不清楚)，让其他 3 个旅进入马里兰州，以保护尤厄尔的翼侧，为李不间断地侦察敌军的动向。

朗斯特里特向斯图尔特传达李的这一指示时，又加上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你认为能够办到，你就应该穿插到敌人的后方。"第二天，即 6 月 23 日，斯图尔特又接到了李的指示。李用下述至关重要的语言重申了朗斯特里特讲过的意思："不过，你可自己判断是否能不受阻挠地绕到敌后，尽可能多地消灭敌军，并渡过山东侧的河流"。这正中斯图尔特的下怀，他迫不急待地采取了行动。6 月 25 日拂晓，他便率 3 个旅从塞勒姆出发了。

此时仍是联邦军主帅的胡克正准备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斯图尔特与汉考克将军的第 2 军不期而遇。斯图尔特立即派人向李汇报此事。这是斯图尔特送出的唯一情报。此情报本来可以使南军统帅对敌军的意图有所了解，可是，它却根本没有传到李那里，与北军的这次遭遇迫使斯图尔特掉头向南，在华盛顿以北仅几英里的地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这次绕道行进所造成的后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李正在敌方领土作战，迫切希望斯图尔特尽早与尤厄尔会合。然而，与北军遭遇并不是斯图尔特迟迟未与尤厄尔会合的唯一原

因。李在给斯图尔特的指示中写了一段从当时的情况看很不明智的话，这段话要求斯图尔特利用一切机会为北弗吉尼亚军团搜集补给品。斯图尔特的部队在罗克维尔休息时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他的一支巡逻队发现了联邦军的一列共有150节车厢的运输列车。南军士兵为追赶这一列车几乎到达华盛顿近郊，但始终没有追上。斯图尔特司令部的布莱克福德上校写道，南军士兵“象追狐狸一样兴奋地追了好几英里”。在切断电报线，破坏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线以及对敌实施其他快速袭击等行动中，斯图尔特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些行动当然很有趣，但不是斯图尔特原计划应干的事情。他的骑兵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眼睛，没有他们，李实际上就成了瞎子。不仅如此，斯图尔特还应该保护先头军的右翼。然而，由于进行了这么多节外生枝的活动，他已经来不及于6月27日在约克镇与尤厄尔军的先头师会合了。他不仅没有给李送去任何情报，而且为自己搜集的情报也不多。他在各路大军之间东奔西跑，盲目行动，从未与李取得联系。直到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李才终于在卡莱尔找到了他。

斯图尔特未能及时参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次战役的结局？对实际作战可能影响并不很大。直到战役开始后的第3天上午，斯图尔特才赶到战场，李命令他去攻占敌防线左翼的阵地。如前所述，斯图尔特的骑兵在当天傍晚与联邦军骑兵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斗。如果不是因为长途奔袭使他的部队人困马乏，他或许能够突破格雷格将军的骑兵防线，并给波托马克军团的后方防卫造成很多麻烦。但即便如此，这也很难造成决定性影响。

无疑，最使李感到尴尬的是，他对米德的情况毫无所知，直到朗斯特里特的密探穿过敌人的防线前来汇报，李才得知联邦军的全部部队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正向南山挺进。可是，李对联邦军的行军路线以及行军序列仍不清楚。李所知道的

只是，他的交通线很可能已被切断，他不得不放弃向哈里斯堡和巴尔的摩进军的原定方案，召回前方的部队，集中兵力，决心一战。

但更糟的是，李在决心交战后，在头两天的战斗里，竟然对米德的相当一部分部队的配置地域一无所知，这使他制定了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进攻计划。战斗的第二天，他命令数量占劣势的南军向严阵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攻击。绕过敌军左翼从后方打击敌人是一个大胆的主意，这样做可能遭到联邦军的攻击和分割，但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对米德“失踪”的各军缺乏确切的了解的情况下，在敌人的翼侧活动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斯图尔特钻了李的指示措词含糊不清的空子，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斯图尔特是位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骑兵指挥官，当时他一定知道他的统帅最需要什么，可是，他却将个人的考虑放在了首位。李的总参谋长想把斯图尔特送交军事法庭，然而李却不主张对他加以惩罚，这也许是因为李感到自己没下达非执行不可的命令。然而，不管怎么说，斯图尔特的玩忽职守很可能对战役的结局造成了不利影响。富勒将军甚至这样说：“这也是导致李在葛底斯堡失败的重大错误之一”。

如果说李制定错误的进攻计划是由于斯图尔特没有向他提供情报的话，那么，开战的第一天下午米德仍能留在阵地上并最终赢得胜利，则应说是尤厄尔缺乏主动精神的结果。一个将领之所以犯下严重的，甚至可能是导致作战失败的错误（尤厄尔在葛底斯堡所犯的错误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无可挽回的），往往有战场以外的个人原因。就斯图尔特而言，这种个人原因至少部分地表现为他过于自负；对尤厄尔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则是他没有强健的体魄（因为即使在上一个世纪消耗体力较少的作战中，一位将领着想很好地发挥作用，

也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对于朗斯特里特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很可能是他度量太小。

尤厄尔将军是在杰克逊将军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阵亡后继任南军第 2 军指挥官的。除了在半岛战役中表现失常外，总的看来杰克逊是一位出类拔萃、令同辈望尘莫及的指挥官。李一直很仰仗他，这不仅由于杰克逊是位杰出的将领，还因为他能够使有时优柔寡断的李变得坚毅果敢。李在临终前不久曾对威廉·琼斯牧师谈到过葛底斯堡战役的某些情况。他一边挥拳击案，一边大声叫道："如果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我有杰克逊，我定会赢得胜利。即使我们不能占领费城，我们也会攻占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使南部同盟获得独立。"李说这番话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尤厄尔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一天的晚上未向敌军发起攻击。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7 月 1 日下午，联邦军的第 1 军和第 11 军遭到了尤厄尔的 2 个先头师——从橡树岭方向赶来的罗兹师和从哈里斯堡路赶来的厄尔利师——的猛烈攻击。尤厄尔的这 2 个师得到了希尔的 2 个师的支援。很明显，联邦军即将崩溃。尤厄尔部队先头旅当面的敌军正在翼侧被俘，那些尚未撤走的敌军也放下了武器。及时赶来观看赫思进攻的李，现在又亲眼看到敌军络绎不绝地逃向葛底斯堡城的狼狈景象。他马上就看出了公墓山的重要价值。鉴于尤厄尔和厄尔利都不在附近，他派人向尤厄尔下达了紧急命令，令他抢占这一关键地物。但与惯常的做法一样，他在命令的末尾又加上了"如果切实可行"这几个字。

这时，尤厄尔究竟在什么位置仍是个谜。他可能在罗兹的师指挥所里，但他似乎并不了解当时的战况。这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尽管尤厄尔历来行为古怪，但他还不至于放弃从敌后攻击敌军。相反，以往的战斗表明，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官。在葛底斯堡之战的 3 天里，他几乎完全变成了

另一个人。据说，他患有慢性消化不良症，也许当时他正在受到此病的折磨。他在过去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刚刚学会用木质假腿(7 月 1 日晚，他骑马经过葛底斯堡城时，竟用他的假腿挡开了一发滑膛枪弹！)走路。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军。这些都可能是他染上倔强症的因素。

尤厄尔没有亲自到前沿了解情况，而是派厄尔利(厄尔利似乎也不了解前沿的情况)前去查看部队的状况。尤厄尔觉得，部队经过一天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并遭受重大伤亡后，一定极度疲惫。他接到李的命令时，他的第 3 师(约翰逊将军的师)尚在 2 英里之外的地区，因此，尤厄尔断定，在约翰逊的新锐部队赶到之前，任何新的进攻都是不可行的。就在他等待约翰逊的这段时间里，北军不仅占领了卡尔普山，而且还加固了公墓山的阵地。

如果那天傍晚尤厄尔趁敌人惊慌混乱之机，在敌人能进行有组织的防御之前，哪怕使用疲惫之师再向敌军发动一次进攻，他也大有获胜的希望。如果换上杰克逊，他肯定会这样做。我们不能说此举定会使李获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从事后的分析看，他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纵然此举没有决定性意义，厄尔利的师也应该占领战术位置极其重要且无敌军防守的卡尔普山。第二天夜间，尤厄尔的军在攻打此山时伤亡惨重。

1863 年 8 月 18 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劳雷)从战地发出的一篇快讯，这篇优秀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认为，如果将敌人驱赶 4 英里并逐出葛底斯堡，尤厄尔将军没有根据上级命令在葛底斯堡城内停止追击，7 月 1 日夜里，他的胜利的部队肯定可以在公墓岭上扎营。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南部同盟的军队费尽了力气也未能攻下这一高地。"除了"根据上级命令"这几个字以外，这段话是绝对正确的。根据谁的命令？当然不是李的，因为他当时远离尤厄

尔。决定停止追击的正是尤厄尔自己。

7 月 1 日至 2 日夜间，那些已经到达战场并勉强躲过一场大难的北军部队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阵地。北军第 5 军和第 6 军(特别是第 6 军)仍远在数英里之外。尽管李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于 7 月 1 日夜里作出决定，让朗斯特里特的部队第二天上午向米德的左翼实施正面攻击。在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凌晨 3 点的军事会议上，朗斯特里特强烈要求李允许他向敌军侧翼发动进攻，夺取“小圆顶”这一显著地貌。他不主张向敌军的坚固防御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尤其不主张在皮克特师尚未到达的情况下这样做。然而，李却坚持己见，因为他不想在缺乏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冒侧翼运动的风险。所以，在骑马前去与尤厄尔就以后的作战交换过意见之后，他明确命令朗斯特里特于第二天上午发动正面进攻。

李以前真没有发现朗斯特里特(老皮特)竟这样刺头。朗斯特里特固执己见，好争辩，并时常不听命令，但他仍是个出色的军人。在葛底斯堡，朗斯特里特格外令人头痛。7 月 2 日早晨，他的部队扎营在钱伯斯堡路，李命令他占领埃米茨堡路的阵地，并进攻皮奇果园。李误认为皮奇果园一带便是联邦军防线的左翼。李希望进攻于中午以前打响，可是朗斯特里特后来说，他在上午 11 点以前根本没有接到命令。这种说法在朗斯特里特的第 1 师的指挥官胡德将军那里并未得到证实。

大约中午时分，朗斯特里特终于向前开进了。胡德与麦克劳斯的 2 个师沿赫尔岭西麓向黑格斯顿路边的黑马客店方向推进。正当部队越过黑格斯顿路向高处攀登时，朗斯特里特感到他的大队人马很可能已被小圆顶上的敌军哨兵发现。于是他作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朗斯特里特的进攻行动本来已比预定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他非但没有沿通向皮策学校的道路继续前进(如果那样做，他在一段时间内将处于

小圆顶上敌军哨兵的监视下)，反而掉头返回赫尔岭，然后沿威洛比河西岸敌哨兵看不到的道路前进。他这样做看来不仅没有达到突然性，而且还无疑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联邦军的第 5 军赶来占领了阵地，第 6 军也及时赶到担任了联邦军的预备队。

对于朗斯特里特在 7 月 2 日为什么有那种表现，人们一直找不到满意的解释。种种迹象表明，朗斯特里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赌气的缘故，因为李没有采纳他的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方案确实更好一些)。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他的一再抗命(第二天他又顶撞了李)使李输掉了这次战役(虽然李至死都坚信这一点)，但是他的固执己见和拖拉作风使他将进攻推迟了 4 个小时，再加上另一件要事(这件事与联邦军有关)，肯定大大减少了李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皮奇果园的阵地是由西克尔斯的军固守的，那里发生的战斗大概是 3 天激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搏斗中，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一支险些被打败的军队居然转危为安。一位将领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让他的军在防御前沿前占领了阵地。他的上司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后果严重，命令预备队前出。然后，他又选派了一位参谋军官去察看暴露的翼侧。由于得到了预备队，这位参谋军官才得以在关键时刻将这一要地保全了下来。

当皮奇果园的战斗正激烈进行并向“鬼穴”方向发展时，米德正与西克尔斯(他在尔后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在一起。米德看到，第 3 军溃散在即；由于西克尔斯前出，汉考克的第 2 军的左翼不仅已暴露无遗，而且有被敌军包抄的危险。幸好，由于朗斯特里特行动迟缓，米德才有可能命令担任预备队的赛克斯将军的第 5 军前出，由刚刚赶到的第 6 军接任预备队。当米德前去安排此事时，他又命令沃伦将军到其防线左端去看一看，因为他十分担心那里的情况。

沃伦登上了配置有一个信号分排的小圆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要点是对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貌。站在小圆顶的岩壁上，他看到了南军部队正在埃米茨堡以西的树林中整队集合，准备向联邦军防线的最左翼发动进攻。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一发现令我异常惊讶和激动”。他立即派人向米德送去紧急报告，要求速派 1 个师来。但在米德接到报告以前，敌军对小圆顶地区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因此沃伦采取了紧急措施。“我骑马跑下山去，找到了我原先所在的那个旅，”他写道，“该旅旅长已经阵亡，于是我接过指挥权，派奥罗克上校的那个团迅速占领了小圆顶山顶。”很快，又有 1 个膛线炮连赶到了那里。尽管南北军部队在小圆顶顶部的巨型圆周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但由于沃伦行动迅速，南军没能登上小圆顶，联邦军的左翼安然无恙。

沃伦将军在报告的结尾写道：“我在与黑兹利特中尉(炮兵军官，在尔后的战斗中阵亡)谈话时被枪弹击中，负了轻伤。尽管我右侧和前方的防线在敌人的攻击下正在崩溃，但我看到小圆顶一带的阵地固若金汤，便离开了那座小山，来到防线中部，回到米德将军身边。在北军防线中部，一场新危机即将发生。”正是这场新危机才导致了这次战役中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因为它迫使米德不得不削弱他的右翼以加强他的中部防线。这使尤厄尔得到了卷击米德右翼，甚至赢得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朗斯特里特发起攻击时，尤厄尔在葛底斯堡的西部和东部各有 1 个师(罗兹的师和厄尔利的师)，他的第 3 个师，即约翰逊的师在城的更东边一些。7 月 2 日凌晨，尤厄尔接到了对敌军防线的右翼实施佯攻的命令。李希望他的进攻与朗斯特里特的进攻同时进行。然而，李再次给了尤厄尔很大的自由处置权，他让尤厄尔自己判断何时将部队投入战斗最为合适，这个失误是极其严重的。看来，尤厄尔下属的各师指挥

官并没有利用充分的时间很好地进行战地勘察。的确，联邦军的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树林和警戒部队的屏护。然而，如果认真勘察，尤厄尔的部队完全可以找到进攻路线和实施密切协同。此外，南军部队参谋人员的工作也不得力。尤厄尔军的各师之间以及尤厄尔部与希尔左翼各旅之间联系也很少。直到下午 5 时 30 分本纳山上的南军炮兵被打哑时，尤厄尔才决定发动进攻。由于他命令 3 个师同时出击，而约翰逊的师距进攻目标(卡尔普山)仍有 1 英里，即使把通往进攻出发线的接近路分配得十分得当(何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进攻也注定要进一步延迟。

在预备队已经全部用上，而朗斯特里特在希尔的支援下就要达成突破的情况下，米德只得从右翼抽调部队，以加强中部防线。吉尔里师的 2 个旅撤离卡尔普山(那里只剩下格林的旅)，经巴尔的摩大道来到罗克河一带。威廉的师、第 2 军考德威尔的师和该军其他 2 个师的部分部队则从防线中部调到了左翼。然而，整个第 11 军仍然留在公墓山。现在南军能否取胜，尤厄尔是关键，他的军应该全力攻击联邦军从公墓山至卡尔普山的钩状阵地。然而，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尤厄尔及其右翼师指挥官罗兹似乎都未及时抓住战机，罗兹甚至仍远离交战地域。

罗兹打算从一条与埃米茨堡路平行的进攻出发线发起进攻。但行动开始后，他便把实际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斯蒂芬·拉姆索尔准将。拉姆索尔到达进攻出发线以前的行军路线最长，当其他 2 个师于下午 7 时 30 分终于投入战斗时，拉姆索尔尚未做好进攻准备。厄尔利与约翰逊的 2 个师在太阳迅速落山之时在未经勘察的地形上与敌激战了 1 个多小时，试图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夺取一个立脚点。这时，罗兹的师尚未从葛底斯堡赶到。尽管尤厄尔的部队终于与第 3 军的左翼旅建立了联系，但这一情况从未传到尤厄尔那里。尤厄尔

一直认为，他的右翼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

当拉姆索尔的师做好进攻公墓山的准备时，天几乎完全黑了，拉姆索尔只能隐约地看到联邦军的炮兵阵地和坚固胸墙之后的两道步兵防线。在与友邻部队的一位旅长协商后，拉姆索尔认为，敌军阵地太坚固，时间已晚，不宜再发动进攻。拉姆索尔向罗兹提出了取消进攻的建议，罗兹下令照此办理，尤厄尔表示首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尽管那种情况本不应该出现。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7 月 2 日夜间发生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周围的，代价高昂且结局悲惨的战斗是不是整个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本应使李赢得胜利的作战行动是有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持教条主义的看法是危险的。许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段战斗也许比任何其他阶段的战斗模拟的次数都要多。尽管——也许恰恰是因为——对葛底斯堡战役的所有细节都进行了研究，人们对联邦军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后和援军到来前在卡尔普山及公墓山的实力的估计分歧仍然很大。多数人认为，到下午 6 时许，联邦军在那里至少有 6000 名士兵和 38 门火炮，他们已渡过危机阶段，南军再发动进攻已为时过晚。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对尤厄尔来说，战机真是稍纵即逝，过了下午 6 时，无论他的攻势多么猛烈，也不可能将公墓山上的敌军赶走并占领那一地区。但是，在没有得到绝对可靠的材料说明联邦军增援的人数和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此下肯定的结论。而且，不管怎样说，在尤厄尔为什么没能将进攻的时间大大提前，在南军的炮兵未被消灭之前就实施进攻的问题上，我们仍有许多疑问尚未得到澄清，看来，这主要是由于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但为什么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呢？众所周知，前一天晚上约翰逊的师距卡尔普山只有 2 英里。为什么象战地勘察这样重要的事

情都被忽略了？为什么罗兹没有亲自指挥进攻作战，而将很大一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军官？

既然对上述问题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尤厄尔错过了一次突破北军防线，大获全胜的大好机会。如果他取得了胜利，南军第二天便没有必要发动那次勇猛顽强但却毫无获胜希望的攻击了。

如果仅让我们找出导致南军在这次战役中失败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选择的因素很可能是斯图尔特在关键时刻不在交战地域。但是要找出导致北军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就更加困难，除了小圆顶一带的作战行动以外，也许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单个行动格外引人注目了。因而，胜利的奖章应该授予善于指挥防御作战的米德。

如果我们同意是斯图尔特的越轨行为致使李因情况不明而输掉了这次战役，那么，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准确的情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的品格——过于自负——也会给战役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有时也听到这样的言论，说米德是他的两位军长——霍华德将军和汉考克将军——的傀儡。这种看法不太公正。不要忘记，米德是在非他选择的地域，在一次重大战役开始前仅一个星期出任波托马克军团指挥官的，而且，在战役的最初阶段他就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将领。不仅如此，经过第二天的战斗之后，联邦军应该坚决固守而不是(象过去经常所做的那样)撤退的决定，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由米德作出的。他指挥各军(有时甚至各师)坚守受进攻之敌威胁地段的方法也是无懈可击的。

第 17 章、维克斯堡战役(1863 年 1 月至 7 月)

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东岸(或左岸)，距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市约 400 英里。密西西比河不论对北方联邦还是南部同盟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水路。对于北方联邦来说，密西西比河是一条主要运输干道。藉此干道，缺少公路的北方可将他们的工业品运往更广阔的消费市场。通过密西西比河各条可通航的支流，北方还可以将部队和给养输送到南部同盟的腹地。对南部同盟来说，丧失密西西比河意味着失去西部的相当一片领土，从而无法再经红河(该河在哈得孙港以北汇入密西西比河)获得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几个州的大量食品、军需和人员。

鉴于北方拥有巨大的工业潜力，在包括装甲舰在内的造船业上占有优势，南部同盟一直试图封锁水路。他们在北至哥伦布南到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沿岸设置不少坚固的据点。1862 年上半年，北方联邦的军队逐一占领了这些据点，但唯有维克斯堡攻而不克。戴维·法拉格特将军率北方舰队击败南军舰队后曾试图攻克该城，但南军设在河边悬崖上的炮兵阵地火力凶猛，北军舰队久攻不克，无计可施，只好于 7 月撤离。南军再度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维克斯堡至哈得孙港段，并很快经由红河获得了大批军需品。

林肯总统说,“只有钥匙[译者注：英语中“钥匙”一词(key)亦有“关键”、“重要”之意。林肯使用这一双关词意在说明只有占领要地才能赢得战争。]在手”才能赢得战争。维克斯堡就是打开密西西比河的钥匙，北军必须将其拿下。1862 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少将受命指挥田纳西军团，攻克维克斯堡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一年的年初，他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进攻，攻克了亨利堡和多纳尔森堡，并击退了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的南方守军。格兰特其貌不扬，但却是名出类拔萃的战将。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中，他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胆识远远超过他的对手。他马上就要指挥并赢得历史上少有的一场

伟大战役。

1862 年 11 月，约瑟夫·约翰斯顿上将受命指挥南方在西部的所有部队。彭伯顿中将担任了密西西比军团的司令官，该军团主要负责维克斯堡的防卫。彭伯顿工作勤奋努力，是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但他却不是个称职的将领。在实际上没有任何骑兵支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防守相当宽阔的一片地区，这本来就已很麻烦了，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约翰斯顿和总统兼南军总司令戴维斯又给他发来了相互矛盾的命令，使他的任务难上加难。到 1863 年 4 月格兰特开始从后方出兵攻打维克斯堡的时候，彭伯顿手下已有 5 万人左右的军队，然而，这些军队却分散部署在北至孟菲斯，南至哈得孙港的广大地区内。

1863 年 12 月，格兰特兵分两路向维克斯堡发动了首次进攻。彭伯顿的主力部队由范·多恩将军率领，守卫格林纳达附近的亚洛布沙河防线。格兰特打算箝制住范·多恩的守军，同时派谢尔曼少将率 3.2 万人分乘 6 艘运输船沿亚洛布沙河顺流而下，在亚祖河口登陆，进攻维克斯堡。这一大胆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南军成功地绕到格兰特军的背后，摧毁了北军营地的大量装备和给养。供给中断后，格兰特被迫撤退。彭伯顿趁机抽调了 1.2 万人转而对付谢尔曼。谢尔曼的部队虽然顺利登陆，但由于登陆场选择失当，北军在 12 月 29 日的奇克索崖战斗中失利，并损失了约 2000 人。

从陆路进攻维克斯堡的计划失败后，联邦军总司令哈勒克上将认定，北军的下次进攻应在海军配合下经由水路进行。格兰特的部队被编为 4 个军，这 4 个军的部署是：其中的 1 个军，即 16 军，由赫尔伯特将军指挥，留守孟菲斯，负责保护北军后方交通线，其余 3 个军则在满是沼泽、溪流、沟渠和牛轭湖的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选择地面较干的地方扎营。麦

克勒南将军所辖第 13 军和谢尔曼将军所辖第 15 军驻扎在米利肯斯本德。麦克弗森将军的第 17 军部署在莱克普罗维登斯。格兰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部队与波特上将的舰队一道包抄维克斯堡防线的翼侧。为达到这一目的，在 1863 年 1 月的部分时间以及 2 月和 3 月的全部时间里，格兰特的部队不停地开河修路，并进行了一些战斗。

北军前后共实施了 4 套方案，这一过程相当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一套方案是修一条 1 英里长的运河横穿维克斯堡对面的三角洲地区，使北军的非武装船只避开维克斯堡守军的炮火，将部队运送到维克斯堡城前的密西西比河左岸登陆。起初，该计划进行顺利，但到 3 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部队赶出了该地区；同时沃伦顿附近的敌军炮火也开始使北军遭到损失，因此，这一工程不得不放弃。

第二套方案是由麦克弗森所部在沼泽地带开辟出一条由莱克普罗维登斯经一些牛轭湖直达红河的水路，以达到由红河进入密西西比河，从左翼进攻维克斯堡的目的。此项工程难度极大，既要扫除水面上的树木障碍，还要清除水中障碍。一旦完工，该工程将为北军开辟出一条约 400 英里的安全通道。到了 3 月底，气候逐渐干燥，该项工程已取得很大进展。但这时，格兰特又想出了新的作战方案。

另外两套方案的目的都是包抄维克斯堡守军的右翼。其一是开通一条长达 700 英里水路的宏伟计划，即亚祖关计划。该方案要求采用爆破法炸掉造成湖水蓄积的亚祖关的土垒，开通密河支流到亚祖河的水上运输线，进而在海恩斯崖包抄南军右翼。彭伯顿得知北军这一行动后，立即命令驻格林纳达的南军守卫维克斯堡以北 90 英里处的亚洛布沙河防线，从而轻而易举地阻止了北军的这一企图。在亚洛布沙防线，洛林将军率领 1500 多南军凭借用棉包匆忙修筑的防御工事，阻住了企图从这里通过的所有北军炮船。

第四套也是最后一套进攻方案是由谢尔曼上将和波特海军上将共同实施的。他们派部队分乘 11 条船通过斯蒂尔牛轭湖进入森弗劳尔河和亚祖河，到达海恩斯崖，总航程约 200 英里。彭伯顿再次很快获悉了这一方案，他采取措施，堵住了北军的去路。在北军舰队的退路被南军截断，且各河水位突然下降的情况下，北军这次冒险活动几乎导致全军覆没。谢尔曼的士兵经过苦战击溃了南军，并用了 3 天的时间返回了安全地带。

格兰特事后曾说，他从未指望那些沿运河和牛扼湖进军的方案会获得成功，但在雨季，实施这些行动可使部队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长备不懈，同时，他自己也可以仔细考虑各种方案，不论这些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如何。然而，格兰特的这一想法并不为北方众多批评他的人所理解，他们或是出于妒忌，或是出于不信任，挖空心思，有时甚至幸灾乐祸地夸大这几次行动的失败，强烈要求撤换格兰特。但林肯总统仍对格兰特寄予厚望，他说，“我认为我们考验他的时间应再长一点”，这就为北军在西部打一场漂亮的胜仗铺平了道路。

冬季，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公路往往被河水覆盖，水深数尺。然而到了 4 月份，河水开始退去，这些道路又重新出现，这使格兰特得以实施策划已久的方案：派海军和运输船队趁黑夜闯过维克斯堡炮火群的交叉火力，随时准备运送北军部队在格兰德加尔夫或下游地区登陆。按照原计划，北军过河之后，麦克勒南率前锋部队协助班克斯将军攻打哈得孙港。然后，班克斯所部与格兰特所部汇合，一同从背后进攻维克斯堡。谢尔曼将留在维克斯堡地区，以 1 个师的兵力在河上游 150 英里处进行佯攻。为了进一步迷惑彭伯顿，同时给敌方造成最大损失，格里尔森上校将率 3 个骑兵团袭击彭伯顿的后方。这次骑兵出击最终在巴吞鲁日结束，它堪与杰布·斯图尔特最出色的骑兵奔袭相媲美。

4 月 16 日至 17 日夜晚，波特的舰队成功地闯过了维克斯堡的炮火网，仅损失了一艘船。几天后的另一个夜晚，北军的 6 艘运输船和 12 条驳船载着供给物资再次从维克斯堡城下穿过，这次，北军损失了一艘运输船，6 艘驳船。与此同时，北军试图开辟水道，用木排向下游运送部队，但实践证明此法行不通。北军不得不徒步越过一片非常难走的荒地，以便到达格兰德加尔夫对面的，被恰当地取名为哈德泰姆斯[译者注：英文 Hard Times 意为“艰难时期”。]的地方。先期抵达的北军炮艇未能压制住南军守军的炮火，因此，北军只好再向南运动 6 英里，在南军没有设防的布鲁因斯堡对面渡过密西西比河。

彭伯顿的部队兵力相当分散，格兰特的佯攻十分成功。南军的鲍恩将军在格兰德加尔夫的8000名守军显然无力阻挡麦克勒南的 1 个军和麦克弗森的 2 个师；[注：格兰特投入此战役的兵力约 6 万人，但其中一部执行其他任务，包围维克斯堡之前，在维克斯堡后方作战的兵力在 4 万至 4.5 万人之间。]不过，南军 4 个旅凭借有利的防御阵地，顽强顶住了北军对吉布森港的两路进攻。但是，南军毕竟寡不敌众，麦克勒南的部队终于在 5 月 12 日上午攻占了吉布森港。吉布森港失守后，格兰德加尔夫也难以保住，鲍恩的南军部队撤出格兰德加尔夫，经大布莱克河于 5 月 3 日退至汉金森渡口。那天，北军的麦克勒南部队则是在威洛斯普林斯宿营的。格兰特从设在格兰德加尔夫的司令部发出命令，要谢尔曼率 2 个师以及运输车队与其汇合，北军部队直到 5 月 7 日才继续前进。

这时，格兰特遇到了战役中最严峻的时刻。他获悉南军的约翰斯顿将军所率领的一支部队得到各要塞的南军增援后，正向杰克逊挺进。格兰特还得知，班克斯将军不会与他合作[注：尽管格兰特在回忆录(第 410 页)中说，直到 5 月 3 日接到班克斯来信，得知班克斯在 5 月 10 日以前无法抵达哈得孙

港后，他才作出不派兵支援班克斯的决定，但情况似乎是，早在 4 月 19 日，格兰特就放弃了派兵支援班克斯的原定计划。]。现在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行动。格兰特决定脱离后方基地，挺进杰克逊，边开进边从作战地区补充给养(在这一地区是有可能办到的)，争取在约翰斯顿部队与彭伯顿部队汇合之前消灭约翰斯顿所部。

彭伯顿的处境此时也极为不妙。由于缺少骑兵，他无法掌握格兰特的动向。他一方面感到必须守住维克斯堡，另一方面又为维克斯堡至杰克逊铁路交通线的安全提心吊胆，因此，他只好多路分兵，将他的几个旅分散部署在几个方向。这样一来，他很容易被格兰特各个击破，并且使格兰特能很从容地对付来自约翰斯顿的任何威胁。

5 月 7 日，格兰特率部向东北方向挺进，旨在控制维克斯堡至杰克逊铁路沿线。麦克弗森军构成北军的右翼，比其他两路北军稍稍领先，向杰克逊运动。谢尔曼军随后路进，构成北军的中路。而麦克勒南军则充当了北军的左翼，并派出了 1 个师的兵力警戒大布莱克河方向。5 月 12 日，北军渡过了“十四英里河”。在雷蒙德郊外，麦克弗森军的洛根师与奉彭伯顿之命从杰克逊开出来的格里格准将率领的一个南军旅遭遇。双方激战了两三个小时，最后南军终于抵挡不住，向杰克逊方向撤去。此役，南军伤亡 505 人，其中 73 人阵亡，洛根的部队阵亡 65 人，负伤或失踪 367 人。

大约就在格里格的部队七零八落地逃回杰克逊的时候，约翰斯顿将军抵达战场，并在那里实施战场指挥。他现在拥有 1.2 万人，并且知道格兰特的军队就在他和彭伯顿部之间，且彭伯顿部主力正在爱德华车站地区。约翰斯顿向彭伯顿发出紧急命令，敦促彭伯顿从克林顿进攻谢尔曼的后方(实际上他指的是麦克弗森的后方)。然后，他又给总统发了份电报，最后一句电文是：“我来晚了，”其用意似乎是为州府的可能丢

失而推卸责任。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防守杰克逊，但他确实为将贵重物资经坎顿铁路转移出去作过安排。

14 日，格兰特的前锋部队逼近杰克逊，谢尔曼居右，从雷蒙德顺密西西比斯普林斯而下，麦克弗森则从雷蒙德向克林顿继而向杰克逊挺进。在爱德华车站，麦克勒南顺利地将其部队从南军彭伯顿的部队面前撤离，并使他的各师部署就位，以便为北军两支前锋部队提供支援。13 日晚和 14 日清晨，大雨倾盆。为了避免火药受潮，进攻杰克逊的时间推至上午 11 时。麦克弗森军，特别是克罗克将军率领的先头师的 3 个旅，是这次进攻的主攻部队，但谢尔曼军的塔特尔师在右翼的出击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该师在进攻中缴获了 10 门大炮。谢尔曼部在进攻正面堑壕里的南军时只遇到了微不足道的抵抗(该方向的南军大部分是雷蒙德的残兵败将)，但在左翼，麦克弗森部所遇到的抵抗却稍为顽强一些。不过，到下午 4 时，北军的麦克弗森和谢尔曼 2 个军都攻进了杰克逊。北军伤亡了 300 人，南军损失了 845 人和 17 门大炮。

杰克逊失守后，南军的约翰斯顿部北撤几英里向坎顿转移，南军陷入混乱状态。彭伯顿无视约翰斯顿令其进攻麦克弗森的命令，反而插向东南，进攻根本就不存在的格兰特的运输线[注：当时，谢尔曼的布莱尔师已经参战，运来 200 车军粮(这是北军围攻维克斯堡前所得到的唯一给养)。这些粮食存放在奥本，受到重兵保护。]。与此同时，约翰斯顿率残兵败将向北退去。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南军的 4.5 万名将士分散在 3 个不同的区域(维克斯堡、爱德华车站以南和杰克逊以北)，各自面临着数量相当，但却能够相互接应的北军部队。

约翰斯顿 5 月 13 日的紧急命令是由 3 个传令兵送出的，这 3 个传令兵中有 1 人是北军的内线，因此，格兰特 14 日就知道了命令的内容，尽管他并不知道彭伯顿没有执行命令。

格兰特当即命令麦克弗森和麦克勒南两军调头西进，同时命谢尔曼留守杰克逊，摧毁全部军事和生产设施，破坏铁路。

5 月 14 日，约翰斯顿在杰克逊以北 6 英里处向彭伯顿发出另一份急件，通知他州府已经失守，并令他以最快速度前来会合。这次彭伯顿执行了命令，率部返回爱德华车站，企图夺路开向北边的布朗斯维尔。格兰特虽然不知道约翰斯顿最新命令的内容，但他知道两支南军部队的大概位置。他具有一个优秀指挥官明察秋毫，判断敌方意图的天赋。他确信，南军的两支部队一旦联合在一起，便会渡过大布莱克河，阻止北军向维克斯堡挺进。于是，他立即采取措施，以期在彭伯顿与约翰斯顿会师之前消灭彭伯顿。

与敌人不同，格兰特部队是内线作战，那一地区的环境使他的部队便于集中。通往爱德华车站的路有 3 条，北面的一条从杰克逊起始，经克林顿，在铁路以南与铁路平行。另外两条路是在距雷蒙德 1 英里处的地方由一条路分开而形成的，两条路间隔 2.5 英里，彼此平行。格兰特于 14 日得到约翰斯顿的急件的副本时，麦克弗森部正奉命向博尔顿进军，因此，麦克弗森军使用北面的那条道路。但是，麦克勒南手下的几个师部署得较分散，其中霍维的师也在北面那条道路上，该师位于麦克弗森的先头部队之前 4 英里处。在麦克勒南的另外 3 个师中，奥斯特豪斯和卡尔的 2 个师走中路，史密斯的师在谢尔曼军的布莱尔师的支援下走南路，即下雷蒙德路。

由于下雨，河水猛涨，彭伯顿的部队在向东南方向前进越过贝克河时，有些混乱。他们是 15 日接到返回杰克逊的命令的。第二天一早，格兰特从铁路工人那里得知，彭伯顿正率大约 2.5 万人向东挺进。格兰特当即命令谢尔曼从杰克逊出发，构成全军的最右翼；麦克勒南奋力前进接敌，布莱尔师配属给麦克勒南指挥；麦克弗森亦向前运动，支援霍维师。

彭伯顿在钱皮恩山之战(有时亦称贝克河之战)中占据的

阵地是极为坚固的，但这一阵地很可能不是南军有意选择的。南军在行进中与北军遭遇，彭伯顿不得不就近占领防御阵地。南军在 3 条道路上的前哨部队都迅速被北军击溃，第一场激战发生在北路。这条路在到达钱皮恩山后便折向南方，经过一道约 1 英里长的小山梁后与中路汇合。钱皮恩山虽然仅有 80 英尺高，但它却是个有利的制高点。它的东侧有一道长满树木的深沟，沿西北走向一直延伸到贝克河。彭伯顿的部队所占阵地能够掩护所有 3 条道路，史蒂文森师在左翼扼守那道山梁的北段，鲍恩师居中，洛林师位于右翼。由于北军麦克勒南部行动迟缓，南军右翼的洛林师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南军阵地的左侧和中央。

战斗约 11 时打响，在左翼的南军被击垮以前，双方进行了约 4 个小时的苦战。位于北路的霍维师率先发起进攻，为保护其右翼，麦克弗森军的洛根师向南军史蒂文森部位于钱皮恩山北侧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洛根的各旅打得十分漂亮，他们首先以包抄行动越过南军防线，进而又打到南军阵地背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然而，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格兰特没有充分认识到洛根的成功在战术上的极大价值。当霍维的部队经过顽强战斗终于在敌军占领的山梁上夺得一块阵地，并要求得到增援以巩固这块阵地时，格兰特竟命令洛根放弃有利的位置，前去援助霍维。

在洛根的部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前，霍维的部队曾一度占领了山梁的最高点并缴获了 11 门大炮。然而彭伯顿命令鲍恩增援史蒂文森。经过一番鏖战，霍维的部队又被赶回到了钱皮恩庄园，缴获的大炮除 2 门之外又都丢失掉了。如前所述，霍维要求其他北军给以支援。在麦克弗森军克罗克师的帮助下，北军成功地向钱皮恩山重新发起了进攻。史蒂文森师终于被击溃。鲍恩无计可施，只好撤退。

鉴于南军右翼的洛林部队未与敌军发生大规模的交战，彭

伯顿命令该部队派 2 个旅前去增援左翼和中央的南军。然而，这 2 个旅未能在左翼和中央的南军败退之前及时赶到，因此，他们只能占领一块阵地，以掩护南军的撤退行动。史蒂文森和鲍恩的部队未能为洛林部队守住渡河口，洛林的部队也没能在河的下游另找一个渡口，因此只好向南突围，绕远与约翰斯顿的部队会合。这场战斗是维克斯堡战役中的最大一场战斗。彭伯顿损失了 3839 人(阵亡 380 人)，24 门大炮，此外，洛林师丧失了战斗能力。格兰特的军队伤亡了 2408 人(阵亡 397 人)，霍维师伤亡的人数正好是格兰特部队伤亡总数的一半。

从得知格兰特正向格兰德加尔夫推进，企图进攻他的后方那一刻起，彭伯顿就决定坚守大布莱克河，为此，他已修筑了许多用于防御的桥头堡工事。现在，他撤退到布莱克河桥(有条铁路从这里穿过)对面的桥头堡，准备在这里阻止格兰特的进一步推进。不幸的是，彭伯顿并不知道洛林的部队已丧失战斗力，他还以为洛林能守住河对岸的有利阵地，因此，他阻止格兰特的努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已从维克斯堡要塞调来 2 个旅，1 个旅部署在博维纳，另 1 个旅与鲍恩师一道坚守大布莱克河以东的预设阵地。

谢尔曼军的大部分部队没有参加钱皮恩山的战斗。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军全速开往大布莱克河上游几英里处的布里奇波特，并从那里与乘趸船过河同他会师的布莱尔的第 5 师一道，包抄敌军的翼侧。格兰特非常肯定地认为，彭伯顿将试图坚守大布莱克河一线。实际上，此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北军仅在正面进攻中就把南军击溃了。

现在，麦克勒南军的士气非常饱满，该军充当了北军的先锋队。17 日早上 8 时，卡尔师与南军接上了火，卡尔立即将部队沿大路右侧展开。奥斯特豪斯部进入了道路左侧的阵地，而史密斯师则位于奥斯特豪斯的左侧。麦克弗森军成纵队队

形开到北军的中央阵地背后，以便随时向需要增援的地方派出增援部队。这里的地势非常开阔，只有道路右侧有一片树林地。卡尔师就利用这片林地向南军的沃恩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获得了全胜。鲍恩师起初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但沃思的部队溃逃之后，河西的高地上再无南军支援他们了。他们认为守住阵地已经无望，于是便向大桥方向逃去。由于河面上只有1座桥梁，且河水很深，鲍恩手下的5000名将士中只有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没有携带武器——逃到了河对岸。许多南军士兵溺水身亡。这次战斗中，南军有1751人被俘，18门大炮被缴。格兰特的部队伤亡276人。其中亡39人。

上午9时许，战斗全部结束。联邦军利用这天的剩余时间在河面上架设桥梁。鲍恩的部队临危受命，在一次自杀性的冲锋中终于摧毁了河桥，为南军立了一功。然而，北军士兵挑灯夜战，在午夜时分终于架好了3座桥梁，谢尔曼的部队也在河上游架起了浮桥。就在北军重新架桥之际，南军将驻守海恩斯崖(该地在谢尔曼的进攻下已不可能守住)的1个旅的兵力撤了出来，并使整个部队比较有序地撤到了维克斯堡的预设防区之内。现在，格兰特只有作围攻维克斯堡的打算了。不过，格兰特仍然希望，敌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他的部队能一鼓作气地攻破维克斯堡的城防工事。

尽管这次战役尚未结束，维克斯堡尚未攻克，然而，回顾过去18天里所取得的战绩，格兰特应该相当满意了。在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联邦军行进了约180英里，连打了5个胜仗，总计俘虏、毙伤敌军约1.2万人，自己仅损失了4379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格兰特的战略战术要比约翰斯顿和彭伯顿高出一筹。约翰斯顿和彭伯顿的军队尽管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他们却在运动中被格兰特分隔阻断，各个击破。

维克斯堡周围的地势非常有利于防守。维克斯堡城坐落在一片高地之上，它的下面是一片丘陵叠障、沟壑纵横的低地。对于任何部队来说，这里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而维克斯堡恰恰俯临从低地到高地的入径。彭伯顿的部队在高地上构筑了由碉堡和火炮阵地(共有 128 门大炮，其中包括 36 门要塞炮)组成的坚固防线。这条防线由规模庞大的土木工事加以防护，整个阵地由散兵壕联成一片。只要敌人从明路上进攻，他们就会遭到强大的纵射火力的杀伤。南军这道强大的防线从维克斯堡以北 2 英里处的河边启始，由东向南到格拉斯牛轭湖(这是一道两壁陡峭的深壑)，再到杰克逊大道，然后沿西南走向的阿伦顿山岭折回到维克斯堡以南 3 英里处的河边。整个防线形成了一条约 9 英里长的弧形线。

南军防御线上的总兵力为 2 万人。彭伯顿将史密斯将军的师部署在防线的北端，将福米将军的部队置于史密斯的右侧，然后再将史蒂文森将军的师部署在福米将军的右侧。在前些日子表现颇佳的鲍恩的部队被留作预备队。到 19 日上午，格兰特的 3 个军已部署就位，其中谢尔曼军最靠近南军的阵地。谢尔曼军位于北军右翼，该军占领了俯瞰亚祖关的一片高地。在其左侧，麦克弗森的部队部署在杰克逊大道两边。麦克勒南的 2 个师位于北军左翼，他们最大限度地向沃伦顿方向延伸部署。

由于谢尔曼与南军左翼部队十分接近，他们与南军的零星战斗几乎持续了一个上午，然而直到下午 2 时格兰特下令发动全面进攻时，麦克弗森和麦克勒南的部队仍距南军防线有段距离。格兰特原来希望一举成功，但南军并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士气低落，相反，他们在坚固的防御阵地后恢复了常态，斗志昂扬。谢尔曼军虽尽了全力，但还是被全线击溃，他们没有得到另外 2 个军的任何支援，因为这 2 个军离战线太远。这次进攻的唯一收获是麦克弗森与麦克勒南的部队抵

近了南军的防线。

格兰特仍然不相信南军防线坚不可摧，他于 22 日上午 10 时再次命令发起攻击。他作出这一决定是有许多理由的：北军渴望战斗，不想掘壕筑垒；他们身后还有约翰斯顿的部队；围城作战必然是场持久战，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的部队，而在目前，格兰特兵力不足，从麦克勒南左翼到河边，北军防线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然而，尽管进攻者斗志可嘉，可事实证明，南军的防线实在坚固，防守者的意志也极为坚强。这次北军的伤亡极为惨重。格兰特的部队一次次地逼进南军堑壕，冲击南军所占据的高地，北军的旗帜曾被插上南军阵地的胸墙，然而，北军终未达成突破。北军这次在 3 英里长的地段里以 3.5 万人的兵力向实际上不足 1.3 万人的南军发动的攻势，最终以伤亡 3000 人，且全线退却而告终。假如不是麦克勒南没完没了地要求其他北军部队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以支持他那毫无希望的进攻，北军的损失本来不会这么惨重。[注：麦克勒南事后很快就被撤职了，所依据的理由不是瞎指挥，而是破坏军纪。虽然如此，对他的处分还是太迟了，因为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尤为令人失望。]

事已至此，北军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重操铁锹，挖掘堑壕、单兵掩体和火炮掩体，因为围城战已势在必行。北军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达到了目的。由于弹药充足，他们的炮手和狙击手们打得南军始终抬不起头来，从而保证了掘壕任务的顺利进行。5 月 25 日，格兰特向哈勒克报告说：“维克斯堡已陷入重围”。

在这场围困战中，南军经历了被围困者通常都要经受的一切可怕之事——食品、饮水、弹药、药品的缺乏以及烈日曝晒下的劳苦等待。北军的日子尽管也不容易，但毕竟好过一些。他们有充足的食品和弹药(尽管饮水是个问题)。到最后阶段，他们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共 7 万多人和近 250 门大

炮。然而，在最初阶段，北军非常担心约翰斯顿会从他们的背后发起进攻，因为当时，约翰斯顿正在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为对付这一威胁，格兰特不得不同时修筑围城工事和外围防御工事。为了部署这道防线，格兰特从孟菲斯调来几乎整个赫尔伯特军，哈勒克也从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派来援军。

格兰特这一步走对了。维克斯堡的确已是四面楚歌。联邦海军已将密西西比河严密封锁。彭伯顿也无法指望约翰斯顿会给予很大支持，因为约翰斯顿根本就不相信维克斯堡能够保住，他的救援行动完全是漫不经心的。北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在 6 月 25 日和 7 月 1 日这两天，南军防区内发生地雷爆炸，工事破坏严重。格兰特断定南军已陷入绝望之中，因而下令于 7 月 6 日发起总攻。然而未等北军发起进攻，格兰特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7 月 3 日，南军要求谈判。开始，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北军放宽了要求。1863 年 7 月 4 日，3.1 万名南军将士走出防御阵地，将军旗覆盖在他们交出的成堆的枪械上，然后回到维克斯堡城内，开始由北军供应粮秣。

维克斯堡战役对格兰特个人来说是次了不起的胜利，它改变了自一年前攻克多纳尔森堡以来格兰特一直不佳的运气。在维克斯堡，格兰特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杰出才能。南军在维克斯堡地区的部队被一扫而光，格兰特以伤亡和失踪仅 8873 人的代价消灭了至少 4.5 万人的南军密西西比军团。此外，格兰特还攻占了密西西比州的州府，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就在彭伯顿在维克斯堡向格兰特请求投降的那一天，李将军在葛底斯堡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南军的这两次失败以及半年后在查塔努加的失败是这场血腥内战的转折点。尽管以后还有更多的战斗，联邦军的将士们还要为格兰特(这位毫不吝惜士兵鲜血的将军 1864 年 3 月 9 日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承受各种残酷的磨难，但到现在，南部各州中认为南方将取

得战争胜利的人已寥寥无几。

哈得孙港的南军自 5 月 23 日以来一直处于北军的包围之中，在听到维克斯堡失守的消息后，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于 7 月 9 日率部投降。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最后一支南军部队就这样被解决了，用林肯的名言来说，“父亲之河无忧无虑地奔向大海”。

图 32、维克斯堡战役(1863 年 1 月至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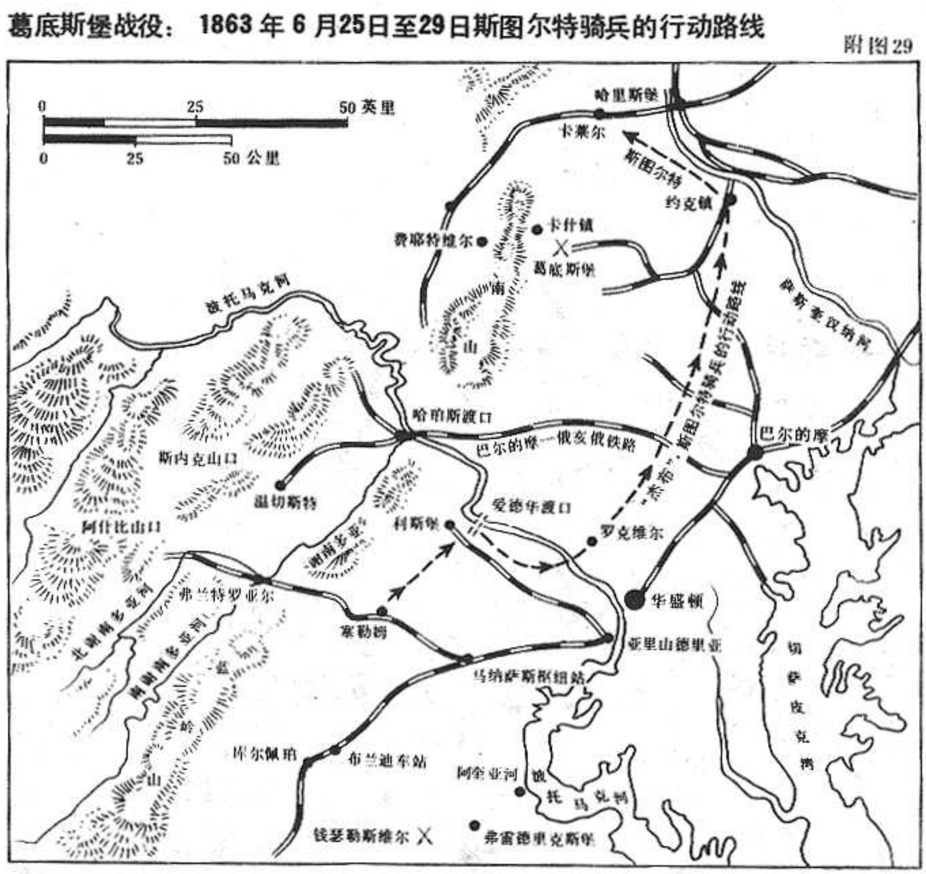



图 33、维克斯堡战役(格兰特的进军)

**维克斯堡战役：格兰特的进军**

附图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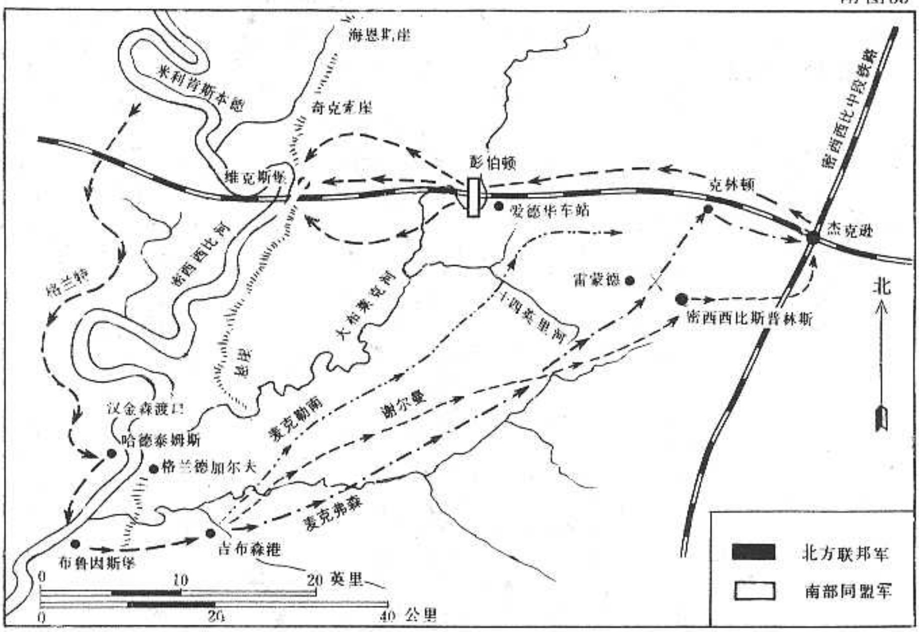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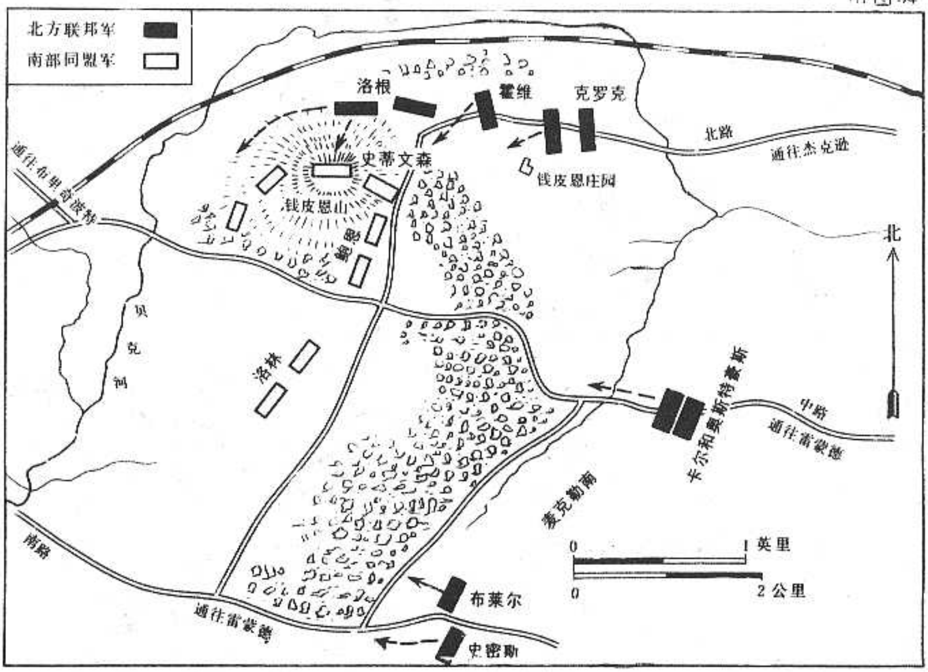



图 34、维克斯堡战役(1863 年 5 月 16 日)

维克斯堡战役：1863 年 5 月16日

附图 34




在维克斯堡战役的最后 2 个月，即在格兰特发起攻势，试图从背后进攻维克斯堡这段时间里，如果不算 5 月 13 日南军错过的歼灭麦克勒南军的可能的机会，共有五个主要因素对战役结局产生了，或者说本应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南军失败主要是由于里士满最高当局缺乏权威性，这种现象导致了战场指挥的极度混乱。

其实早在战役开始之前，南军指挥就出现了问题，当时掌握着 2.5 万军队的密西西比战区司令霍姆斯将军置戴维斯总统、陆军部长以及约翰斯顿的紧急呼吁于不顾，拒不派兵援助彭伯顿。战役开始之后，约翰斯顿和彭伯顿之间不明确的关系更造成了指挥混乱和违令现象。彭伯顿坚定不移地认为，在保卫维克斯堡的问题上，他直接向戴维斯负责(戴维斯似乎没作任何努力来纠正彭伯顿的这一想法)，而不是向约翰斯顿负责。而约翰斯顿所关心的似乎不是为取得胜利而确立自己

的权威，相反，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推卸失败的责任。

彭伯顿违抗军令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格兰特部队渡过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从 4 月 28 日起，位于杰克逊的彭伯顿部，位于格兰德加尔夫的鲍恩部，位于塔拉霍马的约翰斯顿部以及位于里士满的戴维斯总统之间的电信联络非常繁忙，彭伯顿同戴维斯的电报联络与同约翰斯顿的电报联络一样频繁，而且他显然没有把同某一个人的通报内容转发给另一个人，因此，约翰斯顿对形势的发展并非随时都很了解。尽管如此，彭伯顿还是于 4 月 29 日将北军舰炮轰击格兰德加尔夫的情报通知了约翰斯顿，但是，关于吉布森港发生激战的情况，彭伯顿仅在 5 月 1 日向戴维斯作了汇报，而约翰斯顿并不知道北军已经登陆。约翰斯顿在 5 月 1 日发给彭伯顿的电报中写道：“如果格兰特渡过河，集中你的兵力打退他。胜利将会补偿你所放弃的一切东西。”

彭伯顿一直因未执行约翰斯顿的这一命令而受到人们的非议，但彭伯顿始终认为，约翰斯顿的来电只不过是某种建议[注：这或许可以理解，因为约翰斯顿在命令或指示中常使用“是否这样做更好”等诸如此类的模糊词句。]，他作为战地指挥官，应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他当时的判断是，南军应不借一切代价扼守维克斯堡。实际上，到 5 月 1 日，彭伯顿已来不及集中足够的部队将北军赶回河对岸，这件事要是早几天做就好了。不过，彭伯顿是于 4 月 17 日得知格兰特打算渡河并从后面进攻维克斯堡的，难道他真的能够在约翰斯顿下达命令之前，也就是说在北军在陆地上集结 1 个军的兵力之前，就集中足够的兵力将其击败吗？

在 4 月初的时候，彭伯顿手下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足 5 万人，这 5 万人中包括驻守在哈得孙港的 1.6 万人。在从海恩斯崖经维克斯堡到格兰德加尔夫的这条防线上，南军共部署 2.2 万人，其中鲍恩指挥的驻格兰德加尔夫的部队有 2500 人。彭

伯顿堡的兵力有 7000 人。彭伯顿以北还有 4000 至 5000 人负责监视赫尔伯特军以及孟菲斯—科林斯铁路沿线的动向。直到 4 月 10 日，彭伯顿还确信他的左翼没有威胁，格兰特的部队已经开向田纳西州。他将这一判断电告给约翰斯顿，约翰斯顿命令他派兵支援布雷格将军。彭伯顿命令刚从哈得孙港调来的 4000 南军、维克斯堡的 1 个旅以及彭伯顿堡的 1 个旅开往查塔努加。然而，彭伯顿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立即将这些部队从途中调了回来。与此同时，他还采取措施，派驻守在爱德华车站的格林旅驰援驻格兰德加尔夫的鲍恩部队。

由于缺少骑兵部队，彭伯顿无法掌握敌军的意图和确切位置。他有理由相信北军会从北向南袭击维克斯堡至杰克逊的南军交通线。格里尔森上校在南军后方发动的规模巨大且破坏力极强的骑兵突袭，迫使彭伯顿从维克斯堡至哈得孙港一线的各个南军营地中派出部队拦截北军的骑兵。

4 月 20 日，各营地派出的部队在杰克逊集结，以便对付北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彭伯顿命令维克斯堡守军司令史蒂文森调集 5000 名士兵随时准备向格兰德加尔夫或沃伦顿进军。史蒂文森部的特蕾西旅果真于 4 月 30 日开到了格兰德加尔夫，但彭伯顿命令鲍恩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再请求其余的部队前来增援。彭伯顿清楚地意识到格兰特登陆的危险性，但他仍然担心自己的右翼，因为他确信北军谢尔曼部将发动进攻。谢尔曼将军的佯攻是格兰特整个行动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当时正率领 10 个团乘船沿亚祖河北上。肩负维克斯堡防御重任的彭伯顿不敢过多地将城里的守备部队抽调出去，否则，谢尔曼将会攻下维克斯堡。

在北军麦克弗森军 2 个师的密切支援下，格兰特手下的麦克勒南军（1.8 万人）很快渡过了密西西比河。即使占有地形和战术上的优势，彭伯顿要想在北军立足未稳之前将其击溃也

需要拥有 3 万人的兵力。彭伯顿有时间、有兵力，即使他不能断定北军登陆地点是格兰德加尔夫还是在沃伦顿，他也可以将部队集结于两地之间，随时准备对任何一地实施突袭。现在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在当时，彭伯顿的大多数行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伯顿并不是个天才将领，同时应付两套相互矛盾的命令，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把守多个据点，这是他力不能及的事情。他的确过分分散了南军兵力，而且从 4 万左右的兵力中仅抽调出 8000 人对付格兰特的登陆行动的确是非常错误的。然而，维克斯堡当时仍是安全的，彭伯顿自信地认为，如果格兰特继续率兵前进，其后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将被迫在不利的情况下与南军作战。尽管在格兰特已经登陆的情况下，彭伯顿要集中起自己的全部兵力并不容易，甚至很冒险，但维克斯堡不再受到威胁将为彭伯顿提供取胜的最好机会。不幸的是，彭伯顿缺乏采取冒险行动的胆量。显然，未能阻止北军过河并不算什么大错，未能大胆地集中兵力与格兰特作战才是彭伯顿的真正错误。

维克斯堡战役一开始，格兰特就倾向于从背后攻占维克斯堡，而不是沿各个河汊进行远征作战。不过，在北军渡过密西西比河，打完五次战斗的第一次战斗，并抵达格兰德加尔夫之后，格兰特不得不作出一项重要的，事实证明是决定战役胜利的决定。哈勒克将军一直向格兰特强调与哈得孙港的班克斯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为贯彻这一意图，格兰特曾命令麦克勒南军向南进军。但由于消息传递不及时，班克斯得知该计划时已抵达红河。格兰特在格兰德加尔夫收到班克斯的来信后得知，班克斯要等到 5 月 10 日左右才能返回。

格兰特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计划，而时间恰恰是这一计划的关键。格兰特不愿为求稳而等待，而且派兵到哈得孙港等待班克斯返回需要时间太长，他也等不起。他必须利

用吉布森港一战所造成的有利局势，立即发起攻击。按道理北军应该北上直取维克斯堡，因为维克斯堡毕竟是北军的首要目标。但是格兰特当时并不了解敌军的实力，他知道南军正从东面调来援军，而且根据铁路线的情况，杰克逊定会成为南军的集结地。格兰特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使南军的两路部队汇合，在数量上形成优势。北军应向东北机动，在这两支南军部队中间打个楔子，先攻占杰克逊，使维克斯堡的守军孤立起来，然后再将两地的南军部队各个歼灭。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然而，格兰特手下干将谢尔曼却竭力主张格兰特放弃该计划(谢尔曼后来也从事过同样的冒险行动)，理由是后勤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格兰特告诉谢尔曼：“我并不指望在格兰德加尔夫解决部队的全部给养……我所希望的是，我们自己带去干粮、咖啡和盐，能带什么就先带什么，不足部分在战场周围解决。”情况发展果然如此。北军5月7日从格兰德加尔夫出发时只随身携带了三天的干粮，但是，只要部队不停地前进，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将向部队提供一切军需品。

然而，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作战，最冒险的事情并不是军需问题。一旦格兰特率部离开沿河的基地，他的撤退路线就会暴露给敌人，而当时格兰特相信，北军左翼方面有一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他没有足够的部队防守撤退路线，万一南军运动到北军的后方，格兰特要么彻底消灭杰克逊—维克斯堡一线的南军，要么全军覆没。这是一项孤注一掷的计划，要么彻底获胜，要么彻底失败。实施这种计划的指挥官应该是智慧过人，生气勃勃，勇于冒险的人，他应能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并要有一点运气。

格兰特十分清楚，既使在最佳条件下，处世谨慎，非常正统的总司令也不会同意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更何况目前北军的军事形势十分危急。5 月 3 日，胡克将军在钱瑟勒斯

维尔遭到李将军的痛击。格兰特提议北军在没有补给线的情况下攻入敌人心脏地区，这必然会在北军总司令部内造成震荡，打乱总统办公室温文尔雅的工作作风。

值得庆幸的是，华盛顿的电报系统向南只延伸到开罗(伊利诺伊州)，否则，维克斯堡战役可能永远不会开始。5 月 3 日，格兰特给哈勒克发了一封很长的紧急电报，详细叙述了他的进攻计划。后来他一直不断地向上级通报行动的进展情况。但 5 月 11 日以前，哈勒克一直未能收到格兰特的这些电报。5 月 11 日，哈勒克经孟菲斯致函格兰特："如有可能，你部应在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之间与班克斯将军会合，并集中兵力将两地分别攻克。此意已转告班克斯将军。"格兰特接到此信时，正准备进攻布莱克河桥，他既没有执行，也没有回信，而是策马前去监督北军的进攻了。布莱克河桥战斗之后，北军已兵临维克斯堡城下。

彭伯顿第二次违背约翰斯顿的指示是在杰克逊失守前后。当时彭伯顿在爱德华车站驻有 3 个师(约 2.3 万人)，而约翰斯顿(当时在杰克逊)知道谢尔曼(实际上是麦克弗森)的 4 个师正处于他和彭伯顿之间。5 月 13 日夜，约翰斯顿向驻守在博维纳的彭伯顿发去一封电报(格兰特 5 月 14 日得到了电报的副本)，指示他"如有可能，立即开到格兰特的后方；打击北军后方分队的意义极为重大。我部将与你部协同"。彭伯顿回电说："我将立即全部出动……"电报结尾说："我认为你并未充分认识到维克斯堡将成为一座空城。但我会执行你的命令。"

然而，事后不久，彭伯顿又产生了另一个念头。他召开了一个由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公布了约翰斯顿的命令。大部分军官同意执行命令，但以 2 名高级将领为首的少数军官则主张向雷蒙德地区进军，攻击根本就不存在的北军运输线。彭伯顿本人主张以逸待劳，等待敌人来攻，无

疑他认为自己的部队太少，无法前去与麦克弗森作战，但为了满足手下军官的强烈愿望，彭伯顿同意向南进军。这真是一个领导艺术中多数服从少数的杰出范例！

因此，彭伯顿于当天(5 月 14 日)电告约翰斯顿："我将尽力争取于明日上午率 1.7 万士兵开赴狄龙，此行的目的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迫使敌人向我进攻。"尤其有趣的是，本来已于 5 月 13 日命令彭伯顿向谢尔曼(实际是麦克弗森)进攻的约翰斯顿此时的想法却与彭伯顿的少数派军官的想法十分相似，他在 14 日的来电中问："他(指格兰特)能在密西西比地区得到补给吗？你不能切断格兰特的补给线，并且在他因缺少给养而被迫撤退的情况下打击他吗？"

但是，15 日约翰斯顿告诉彭伯顿："由于我们被迫离开杰克逊，因此，你的计划(向狄龙进军)已不切实际。我们会师的唯一办法就是你直接开赴克林顿……"彭伯顿的确执行了这项命令，但此时已为时过晚。彭伯顿在钱皮恩山与北军遭遇并被击败。如此严重的指挥混乱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而彭伯顿 5 月 19 日致电戴维斯时所进行的诡辩更是古今少有。他在电文中说："在得到上级指示，并且部下军官一致支持这一指示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判断，被迫推进到爱德华车站以外的位置，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与敌作战。"

7 月 4 日，经过漫长的、代价高昂的围城战之后，格兰特的北军获得了胜利。但是，如果麦克勒南将军具有一点主动精神，或能迅速执行上级命令的话，彭伯顿所部定会在 5 月 16 日的钱皮恩山战斗中被全部歼灭。北军无需进行围城战就能攻克维克斯堡。

前面已经讲过，北军是沿三条道路从雷蒙德和杰克逊经爱德华车站抵达战场的。麦克勒南军的 4 个师都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不过这 4 个师中有 1 个师，即霍维师，是与麦克弗森军一道沿由杰克逊通往战场的北路前进的，霍维师走在麦

克弗森军的前面。刚刚到达不久的谢尔曼军的布莱尔师被划归给麦克勒南指挥，这样，麦克勒南所指挥的部队共有 1.5 万人。麦克勒南命令布莱尔师和史密斯师经南路前进(此路与中路平行，距中路 2 英里)，卡尔师和奥斯特豪斯师则沿中路前进。

15 日晚和 16 日早晨，格兰特两次命令麦克勒南(麦克勒南的指挥部居于中路,距格兰特的司令部 2 至 3 英里)谨慎前进，除非确有胜利把握，不得发起全面进攻。麦克勒南执行这一命令时似乎有些生搬硬套，因为他在 16 日的所有行动中都表现得过于谨慎。当然，必须承认，当地丛林密布、沟壑纵横、山岭陡峭，不利于部队展开，且在此拦击北军的南军部队(主要是洛林师)达 7000 人。但是，麦克勒南的兵力是南军部队的两倍多。

16 日清晨，彭伯顿的部队为执行约翰斯顿的命令，反方向行军，准备在杰克逊路以北与约翰斯顿汇合。北军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首先与敌遭遇，他们迫使南军前哨部队穿过丛林，重新与主力部队汇合。南军主力部队匆忙在钱皮恩山建立起防御阵地。尽管先与南军接触的北军部队是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但首先向南军发起进攻的北军部队却是北路的霍维师，该师在麦克弗森军的支援下迅速打响了战斗。彭伯顿将部队分散部署在三条道路上，史蒂文森师居左，鲍恩师居中，洛林师居右。整个战斗在钱皮恩山周围几乎全面展开，北军参战的部队有霍维师、洛根师和克罗克师，南军参战的部队是史蒂文森师和鲍恩师。

格兰特本打算等麦克勒南的部队(该部队的行军路线比麦克弗森的行军路线要短)全部靠拢过来并做好战斗准备之后再全面展开战斗。然而尽管麦克勒南的 2 个先头师已与彭伯顿的前哨部队接上了火，但似乎直到上午 9 时，北军主力部队仍距南军战线 2 英里之遥。格兰特通过参谋人员连续几次

发出电报，敦促麦克勒南火速前进，全力进攻。最后一份电报是 12 时 35 分发出的，但直到下午 2 时，麦克勒南才收到这份电报。收到电报后，麦克勒南立即命令史密斯师和奥斯特豪斯师“勇猛进攻，夺取胜利”。出于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史密斯和奥斯特豪斯接到命令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直到战斗快结束时，奥斯特豪斯才与掩护南军撤退的洛林师进行了交战。

就在麦克勒南的大部队迟迟不动的时候，北军右翼的小规模战斗已持续了 2 个多小时，并且在上午 11 时转变成为全面战斗。洛根师很快便机动到能够阻止南军撤向贝克河上唯一渡桥的位置。然而，由于南军的右翼和中路均未受到北军的任何压力，彭伯顿得以派兵增援处境危险的左翼。格兰特忽视了洛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反而将该师撤出去支援霍维和克罗克。不久，史蒂文森师全线溃逃，鲍恩师被迫仓皇撤退。北军既无法阻止南军从桥上撤走，也无法阻止南军从河的下游涉水逃过河。

毫无疑问(格兰特自己也对此确信不疑)，假若麦克勒南象麦克弗森那样积极主动，亲自督促下级指挥官迅速行动，洛根就能守住他夺取的阵地并切断通往大桥的道路，麦克勒南的先头部队就能及时赶到贝克河阻止彭伯顿的一大部分部队涉水过河，彭伯顿完全有可能彻底投降。麦克勒南军的伤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此次战斗中，他手下的 4 个师仅死亡 15 人，受伤 100 人，失踪 26 人。

最后一次决定维克斯堡命运的时刻是该城被包围的时候。大布莱克桥战斗之后，格兰特派谢尔曼军在布里奇波特渡河，南军因此不得不放弃海恩斯崖的阵地。彭伯顿命令海恩斯崖的南军撤回维克斯堡，与此同时，他还于 17 日从博维纳发出信函，向约翰斯顿通报情况。

17 日当晚，约翰斯顿在向布朗斯维尔前进的路上，在他的

指挥部里收到彭伯顿写给他的信。他立即答复:"如果海恩斯崖保不住，维克斯堡就失去了价值，并也无法保住。如果你在维克斯堡被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投降。鉴于这种形势，与其人地两失，不如在可能的情况下挽救部队。如果为时还不算太晚，撤出维克斯堡……向东北方向运动。"彭伯顿 18 日下午收到此电，他显然对弃城的想法感到震惊，因为他仍认为维克斯堡是南军在西部战区所有作战行动的中枢环节。

彭伯顿采取惯用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开会讨论。这次他手下的军官们一致认为"就目前部队的士气和物质条件来看，撤离并不会给南部邦联带来更多的益处。"彭伯顿向约翰斯顿汇报了会议的结果并告诉他说:"我已决定尽可能长时间地扼守维克斯堡，我坚信政府仍支持我守住这一阻止敌军在密西西比河自由来往的屏障。我仍然坚信维克斯堡是南部邦联最重要的阵地。"

也许在格兰德加尔夫和爱德华车站的问题上彭伯顿是错误的，不坚定的，但他现在执拗地拒绝放弃维克斯堡却是正确的。格兰特已迅速封锁了一切陆上通路，联邦海军还控制了密西西比河航道。彭伯顿手下军官的判断是正确的，南军部队虽然在进入设施完备的防御阵地之后士气迅速回升，但他们经受不住另一场损失惨重的混战，即使突围能取得部分成功也是如此，更何况部分取胜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南军有坚固的阵地，有至少 2 万可以作战的人员(南军最后投降时人数为 3.1 万人左右)，有足够使用 1 个月的粮草和弹药。彭伯顿相信，用不了 1 个月，他们就能得救。

总之，南军的策略是打防御性的消耗战，损耗北军的武器装备，消磨北方佬进行持久战的意志，从而使北军要求妥协。维克斯堡不仅本身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还是南军坚持上述策略的标志。彭伯顿这样认识维克斯堡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斯顿完全应该采取决定性的行

动。6 月初的时候，约翰斯顿在坎顿附近拥有 3 万军队，里士满方面向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出兵解维克斯堡之围。如果与彭伯顿相配合，约翰斯顿完全有机会在格兰特的庞大援军集结并赶来之前打破北军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是，约翰斯顿是名防御型的将领，他不愿冒险，因此，他从未进行这种尝试。

> 维克斯堡战役是指挥混乱导效战役失败的极好战例。也许北军无论如何会赢得战役的胜利，因为北军除拥有海军优势外，他们的指挥官格兰特也比南军的指挥官彭伯顿更为出色。可是彭伯顿的指挥失误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发给他的命令与他的直接上司发给他的命令相互矛盾所造成的。这种现象造成了南军部队发令与受令程序的彻底混乱，而格兰特别明智地利用了南军的这一混乱。这种导致战斗或战役失败的现象并不一定经常出现，但是，在国家元首兼任军队总司令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位高级人物曾经是名出色军人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偶尔也会发生。

## 第 18 章、奇克莫加—查塔努加战役(1863 年 6 月至 11 月)

联邦军在维克斯堡获胜后不久，格兰特将军便将他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去占领新的地区，另一部分则去对付孤守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南军。西部地区的主要战场现已转移到田纳西州，在那里进行角逐的是罗斯克兰斯少将指挥的联邦军坎伯兰军团与布雷格中将指挥的同盟军田纳西军团。1862 年 12 月 31 日至 1863 年 1 月 2 日，罗斯克兰斯在默夫里斯伯勒之战(或称斯通斯河之战)中击败了布雷格。布雷格撤退到谢尔比维尔—沃特雷斯一线，并在更远的后方城镇塔拉霍马构筑了预备阵地。南军与北军这两个军团相距约 25 英里。在 1863 年头 6 个月的作战中，双方采用

的主要作战形式是骑兵突袭，布雷格的骑兵占有明显的优势。

尽管联邦军总司令哈勒克将军多次催促罗斯克兰斯采取行动，但直到 6 月 23 日罗斯克兰斯才开始向前推进，他的目标是要夺取查塔努加。查塔努加虽然只是一座小镇，但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因为一旦同盟军失去了这个铁路枢纽及其周围富饶肥沃的农田，战争结束的日期定会大大提前。罗斯克兰斯的 3 个军，共有步兵 40746 人，骑兵 6806 人，炮兵 3065 人。此外，罗斯克兰斯还拥有应急预备军 12575 人。布雷格的部队共有步兵 30449 人，骑兵 13962 人，炮兵 22541 人。在罗斯克兰斯准备进攻查塔努加的同时，伯恩赛德将军率领的俄亥俄军团奉命开赴位于查塔努加东北 100 英里处的田纳西至弗吉尼亚铁路线上的诺克斯维尔镇。

罗斯克兰斯在进军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翼侧机动行动。由于这些行动，加上巧妙的欺骗手段，他终于迫使布雷格于 6 月 27 日从第一道防御阵地后退到塔拉霍马防线。由于地势崎岖，大雨如注，加上南军顽强抵抗，联邦军的进展非常缓慢。但由于联邦军骑马步兵发动突袭，扒掉了铁轨，摧毁了塔拉霍马南面的一座南军补给站，联邦军的 2 个步兵旅也实施了大范围的侧翼运动，因此，布雷格再次后退，被迫在查塔努加掘壕坚守。

8 天中，联邦军以出色的机动战占领了同盟军两道坚固设防的阵地，俘敌 1600 名，缴获大炮 11 门而罗斯克兰斯自己仅伤亡 560 人。如果不是遇上恶劣的天气(此因素常常决定着战斗或战役的成败)和地理条件，布雷格的军队在田纳西河西岸很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克兰斯把敌军赶过田纳西河后并不打算马上追击(尽管哈勒克催促他这么做)，因为他要修复前线和后方的铁路线，要收割大量的庄稼。直到 8 月 16 日他才从温切斯特—麦克明维尔一线前进，准备渡过田纳西河。

罗斯克兰斯将要进入的地区山脉纵横，这些山脉分布于田纳西河的东岸，从查塔努加向西南倾斜，穿过佐治亚州的西北角，一直延伸到亚拉巴马州，奇克莫加—查塔努加战役就要在这里进行。位于最西端的是拉孔山(与田纳西河平行)，稍向南面和东面便是桑德山，然后是卢考特山(海拔 2200 英尺)，此山绵延 100 英里，一直到达查塔努加以南 1 至 2 英里处的田纳西河畔，使各个渡口远远地隔开。拉孔山和桑德山之间是一道山谷，卢考特河从中穿流而过。在山谷的东面，地势陡峻，形成另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叫米申纳里岭(海拔约 400 英尺)，此岭距查塔努加城正北的田纳西河 40 英里。在此岭的东面，地势逐渐向奇克莫加河方向倾斜。奇克莫加河是一条相当宽的溪流，它蜿蜒穿过荆棘和灌木丛生的荒凉地区，从它的名字——据说意思是“死亡之河”——可以看出，在印第安时代，这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8 月 29 日，罗斯克兰斯率领 3 个军，即第 14、20、21 军开始渡河。3 个军的司令官分别是托马斯将军、麦库克将军和克里腾登将军。罗斯克兰斯为诱使布雷格错误地判断他会在查塔努加以北渡河，派出 2 个步兵旅和一些骑兵以及骑马步兵，沿查塔努加以北河道向有敌军防守的渡口发动佯攻。此计果然奏效，布雷格把他的部队全部集中到这一地区，使下游几个渡口毫无戒备。到 9 月 4 日，罗斯克兰斯的 3 个军在宽阔的战线上全部渡过了河：克里腾登在谢尔蒙德渡河，托马斯在布里奇波特附近渡河，麦库克从凯伯顿渡口渡河。布雷格一发现联邦军在查塔努加南面渡河，就立即撤出该城以便保护其到亚特兰大的重要补给线。

这种匆忙撤退使罗斯克兰斯确信他已迫使布雷格仓皇逃窜。于是，他于 9 月 9 日下达命令：麦库克从位于查塔努加南面约 46 英里的温斯顿山口越过卢考特山向阿尔派恩挺进，以便切断布雷格的退路；驻在特伦顿附近的托马斯从库珀山

口越过此山，向麦克莱莫尔山谷(卢考特山和皮金山之间的一个山谷)挺进；克里腾登以其军的 1 个旅留守查塔努加，其余部队沿灵戈尔德公路追击南军。这样，罗斯克兰斯的 3 支部队就完全分开了，并且左右两翼相距 40 英里。如果同盟军并未完全撤退，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他的彼此相距很远的 3 个军只会成为同盟军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不能相互支援。

实际上布雷格只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查塔努加以南 22 英里的拉斐特。在这里，他集结了他的军队(3 倍于罗斯克兰斯已经分开的 3 个军中的任何一个军)。他完全意识到联邦军已经落入了圈套，然而他却未能采取得力的措施将联邦军一网打尽。尽管布雷格极力责怪他的几位军司令官没有执行命令，但他自己绝非无可指责。

当时，布雷格有 3 个军，分别由波尔克将军、希尔将军和巴克纳将军(他最近才从诺克斯维尔到达)指挥，他同时还得到了约瑟夫·约翰斯顿军团 2 个师的支援。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朗斯特里特军本来打算很快与布雷格会合，但由于伯恩赛德占领了诺克斯维尔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该军不得不绕道而行(约 900 英里)，因而大大延误了会合的时间。9 月 10 日至 11 日同盟军失去了在麦克莱莫尔山谷击败联邦军 2 个师的机会，9 月 13 日进攻一分为二的克里腾登军的命令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布雷格未能在此时将分散的联邦军各个击破乃是他在奇克莫加战役中未获全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点将在以后讨论。

直到 9 月 18 日，罗斯克兰斯才把他的部队重新集结在奇克莫加山谷，集结延误的原因是麦库克的部队从阿尔派恩出发后走了许多弯路。这时罗斯克兰斯的部署是：克里腾登的部队作为左翼配置在“李与戈登”磨坊的前面，托马斯的部队部署在庞德斯普林；麦库克的部队在史蒂文森山口作为右翼；预备部队(由格兰杰指挥)驻扎在罗斯维尔。布雷格计划

集中强大的兵力进攻联邦军左翼，将联邦军赶回到麦克莱莫尔山谷中心地区，切断联邦军到查塔努加的通路，并重新占领该城。

18 日上午，朗斯特里特军的 3 个先遣旅在胡德将军率领下首先到达，其中 1 个旅当即奉命加入巴克纳军的约翰逊师，该师准备在里德桥越过奇克莫加河。这些部队将构成迂回部队的右翼，并在下游寻找渡河点。沃克军和巴克纳军(缺约翰逊师)将分别在亚历山大桥和特尔福特浅滩过河。希尔军将守卫左翼以防可能来自麦克莱莫尔山谷的侧翼进攻。南军在前往奇克莫加的崎岖山路上进军速度缓慢，在里德桥和亚历山大桥，他们又遇到联邦军明蒂上校的骑兵和怀尔德上校的骑马步兵的顽强抵抗。虽然这些守军终被击退，但是亚历山大桥已遭破坏，沃克被迫在下游的兰伯特浅滩渡河。不过，到 19 日凌晨，布雷格的部队(欠 3 个师)已全部过河。

这时，罗斯克兰斯已察觉到布雷格的意图，他在当天晚上便调托马斯军保护联邦军的防线翼侧；并保卫通往查塔努加的道路，该军的防线一直延伸到“李与戈登”磨坊稍前的克里腾登军阵地的侧后。麦库克军仍留在麦克莱莫尔山谷的最右侧，没有调动。这样，到 9 月 19 日上午，双方部队便在长达 6 英里的防线上形成了对峙状态，在有些地方，双方相距只有几百码。这个地区树木茂密，双方司令官简直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当然也不知道敌人的阵地在何处。

南军的右翼首先采取行动，福雷斯特将军是位出色的骑兵军官，他和他的部下都徒步作战。正在河岸进行搜索的布兰南师(属托马斯军)的 2 个旅经过激战，把福雷斯特的部队击退，但南军很快得到沃克军的增援，他们反过来将布兰南的部队击退，又将联邦军的援军贝尔德师击退。罗斯克兰斯的左翼吃紧，麦库克军奉命火速增援托马斯。同盟军不了解联邦军的左翼已大大地扩展，一直在摸索寻找联邦军的极左翼。

这一侧的战斗非常激烈。布雷格命令其左翼各师(来自希尔军和波尔克军)立即渡过奇克莫加河参加战斗。此时，战斗演变成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南军作战非常勇敢，但行动不协调，以致失去了许多机会(例如在托马斯军与克里腾登军之间有将近 2 英里宽的空隙，同盟军本来是可以乘虚而入的)。

到这天中午，除联邦军的预备队格兰杰军和南军的 3 个师外，双方兵力全部投入了这场残酷而激烈的争夺战。下午 2 时 30 分刚过，在中路作战的胡德部迫使联邦军的雷诺兹师和范克利夫师后退，并在拉斐特至查塔努加的公路上占据了一个立足点。但当这场几乎持续到天黑的战斗结束时，他们又被迫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立足点。血淋淋的一天结束了，交战双方对战斗的结果都不满意。不过，罗斯克兰斯的部队至少已挫败了同盟军迂回包抄其左翼的一切企图，而且仍占据着查塔努加公路。

当天夜里，朗斯特里特率几个旅加入了布雷格的军队，但该军的其他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在这种情况下，布雷格整编了他的部队，将其分为左右两翼，任命波尔克(他是投笔从戎的基督教主教)指挥右翼，朗斯特里特指挥左翼。波尔克统率希尔军和沃克军以及自己军的奇塔姆师，共有步兵 18794 人及福雷斯特的骑兵 3500 人；朗斯特里特统率胡德军和巴克纳军及波尔克军的欣德曼师，共计步兵 22849 人及惠勒将军的骑兵 4000 人，成为兵力较多的一翼。

布雷格决心执行他头天的计划，主攻联邦军的左翼，迫使他们离开查塔努加公路，并在难以行动的地带将其击溃。波尔克奉命率 19 日未参战的布雷肯里奇师在黎明时发动进攻。但是布雷格的计划在执行中再次出岔。他的命令究竟有什么问题？应在 19 日至 20 日夜里接到这一命令的 2 个军的司令官究竟在哪里？对这些问题迄今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这些问题也一直是三位主要当事人相互指责，或别人替他们

辩护的主题。反正直到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布雷肯里奇才发起战斗。

是夜，罗斯克兰斯改变了战斗部署，一面增加兵力，一面匆忙用木头和石头修建临时胸墙，以加强其左翼。根据他新下达的作战命令，各师不论原属哪个军，均混合配置，因为在随后的战斗中，所有的阵地都非常重要，需分兵把守。联邦军首先投入战斗的是控制防线左翼的贝尔德师，接下来是约翰逊师、帕尔默师、雷诺兹师、布兰南师、尼格利师、戴维斯师和谢里登师。伍德师和范克利夫师作为预备部队，格兰杰的部队仍在罗斯维尔附近。托马斯在防线左翼指挥 6 个师，麦库克在右翼指挥 2 个师，克里腾登的 2 个师作为预备部队，以备增援左翼或右翼。这一天开始时，联邦军的防线是：最左端沿着紧靠拉斐特公路的凯利菲尔德的东北角面北排列，然后向东转小半圈越过斐特公路，再向西南伸展到威多·格伦住宅。

战斗开始不久，托马斯的部队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布雷肯里奇的部队已经包围了他的左翼部队。他紧急要求 1 个师的增援，罗斯克兰斯当即命令伍德的预备师替换出防线上的尼格利师，由尼格利师去增援托马斯。但是尼格利师在森林茂密地区一时迷了路，因此托马斯还是一个劲地要求增援，罗斯克兰斯只得进一步削弱其右翼，以加强左翼。上午 11 时左右，斯图尔特师对处在阵地中心的雷诺兹师和布兰南师发动攻击，并且一度迫使这些部队后退到拉斐特公路后面。但南军部队最终被击退；联邦军的防线遂得以重建。接着，沃克军对受到强大压力的托马斯部队发起攻击，联邦军旋即遭受重大伤亡。

布雷格原计划当联邦军左翼部队被迫后退时，朗斯特里特部才投入战斗，然后，同盟军将集中力量打击联邦军最左翼的那个师，将其彻底击溃。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一直在阵地上

等待执行这一计划，但战斗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正当成千上万的军队你死我活地拼杀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一股黄色的火药烟雾和尘埃遮天蔽日地刮起来，给双方司令官指挥战斗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一地区茂密的森林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由于不幸的误解，加上对战场情况不甚了解，罗斯克兰斯将军命令伍德率部增援雷诺兹师，因为据说该师的右翼告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伍德不得不把他的师撤出防线开到布兰南师的背后。麦库克准备派戴维斯师接管伍德的阵地。

朗斯特里特抓住战机将 8 个旅投入伍德撤走后留下的缺口，这给联邦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谢里登的整个师，戴维斯的 2 个师，范克利夫的 1 个旅全被赶出了战场(虽然其中的 2 个旅为掩护部队撤退下午 7 时许又重新投入了战斗)。由于右翼防线的瓦解以及罗斯克兰斯和 2 个军司令官麦库克和克里腾登的撤离，联邦军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这时只有托马斯仍在指挥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但他是个沉着冷静、令人信赖的将军。作为托马斯在墨西哥战争中的朋友和同志(这是内战的悲剧)，朗斯特里特准备向右翼横扫托马斯军，以期将其彻底击溃，但托马斯采取了迅速而积极的措施对抗即将来临的打击。

在布兰南师和雷诺兹师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如果没有伍德以最快的速度移师填补，朗斯特里特肯定已经突入，并绕到正在左翼防线抵抗波尔克军进攻的联邦军的背后。伍德师的坚决抵抗为托马斯建立新的防线赢得了时间。这条防线与向外突出的防线成 90 度角，沿农场主斯诺德格拉斯住宅以南霍斯舒岭主峰面南排列。托马斯凭借此防线挡住了朗斯特里特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直到罗斯克兰斯命令他撤退为止。联邦军左翼在托马斯领导下的战斗行动是挽救罗斯克兰斯军团的主要因素。该部队的部署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大约在这时或稍晚一些，朗斯特里特向布雷格作了汇报，并请求他坚守住右翼，同时抽出力量加强左翼，以便切断托马斯的退路。但据朗斯特里特说，他发现布雷格根本不了解战局，竟然认为他的部队正面临着失败。他说右翼抽不出增援部队来。因此，朗斯特里特再次以 3 个师的兵力攻击这个山梁，可是倾刻之间，他的部队便被扫射得尸横遍野，而联邦军的防线仍未被突破。经过长时间连续激烈的战斗，联邦军的武器弹药开始匮乏，甚至连滑膛枪都变得太热而无法上子弹。托马斯到处给将士们鼓劲，喊着："使用刺刀……阵地必须守住。"他率领人数远少于敌军且几乎被包围的 3 万将士坚守阵地达 5 个多小时。天黑时分，托马斯及时地撤走了他的部队。他带回的是一支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部队，但正是他们的英勇抵抗挽救了联邦军，使之免遭灭顶之灾。

罗斯克兰斯在罗斯维尔山口周围的阵地坚守到 21 日，于 22 日撤到查塔努加。布雷格接到上级命令，催促他于 21 日追赶联邦军，趁其张皇失措之时狠狠打击他们。南军取得了奇克莫加战役的胜利，但并未实现夺取查塔努加这一原定目标。然而，布雷格不愿按上级命令立即驱兵追赶，他似乎已被部队的伤亡所吓倒。确实他的部队伤亡十分惨重。21 日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埋葬死者，收集武器和补给品。作为个人的看法，希尔将军后来写道，奇克莫加战役后，南方将士的那股锐气已不复存在了，"布雷格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但自奇克莫加战役以后，他却悲观失望，心灰意冷。正是这次'徒劳无益的胜利'决定了南部同盟的失败命运。"

撤退到查塔努加周围的防线后，罗斯克兰斯决定放弃卢考特山和把该山与拉孔山分开的卢考特山谷。他认为继续占领这些地方将无法维持与前哨部队的交通联络。但这是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因为布雷格立即占领了从米申纳里岭到卢考特山之间的各个阵地，沿线都修筑了土木工事，并派遣一支

强有力的部队开进卢考特山谷。这样，他就控制了联邦军从布里奇波特到查塔努加的供应线，死死地卡住了罗斯克兰斯的脖子。他一方面巩固阵地，另一方面派骑兵袭击骚扰联邦军。他十分乐观地相信，饥饿将很快迫使罗斯克兰斯投降。

但是华盛顿方面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谢尔曼率领的密西西比军团及胡克率领的拉帕汉诺克军团被迅速地派往这个被围困的要塞。10 月 3 日格兰特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军区(包括俄亥俄、坎伯兰和田纳西三个军区)的总指挥；托马斯接替罗斯克兰斯指挥查塔努加的部队。麦库克和克里腾登被解除职务，他们的部队进行了合并，由格兰杰统一指挥。

对于被围困的要塞来说，当务之急是开辟一条通往布里奇波特的供应线，因为坎伯兰军团从 19 月中旬起已实行减半供应，许多马匹死亡，弹药奇缺。胡克的部队于 10 月底到达布里奇波特后，与托马斯的部队相互配合，对布朗渡口及卢考特山谷的南军成功地进行了联合作战。一旦这里的敌军被清除，卢考特山上的敌人也就无碍大局了，因为现在穿过拉孔山的道路已经打通。从此，联邦军能从著名的“饼干运输线”获取给养。该线从布里奇波特经水路到凯利渡口，从那里穿过拉孔山到布朗渡口(这里修建了一座浮桥)，再从渡口经莫卡辛波因特到查塔努加。至此，南军对查塔努加的围困已告解除。

南军方面，布雷格对波尔克在奇克莫加战役的表现感到失望，便以密西西比军团的哈登将军取而代之，希尔也被解除了司令官职务。人们对布雷格本人也很不满意，他经常与手下发生争执，毫无威信可言，但他的职位却保住了。11 月初，他派遣朗斯特里特军远征 100 英里去夺取被伯恩赛德占领的诺克斯维尔。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为之花了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大代价的查塔努加战役很快就要决出胜负了。

由于谢尔曼的部队尚未到达，敌军此举着实使格兰特有些

不安。伯恩赛德只好孤军奋战。尽管布雷格恰好在格兰特预备发起进攻的前一天给朗斯特里特增派了巴克纳军，但伯恩赛德仍能应付裕如。查塔努加战役于 11 月 23 日至 25 日进行；格兰特分三路发起进攻：谢尔曼攻击米申纳里岭的北端；托马斯在中部采取牵制性行动；胡克率军从卢考特山谷赶赴查塔努加河，对同盟军左翼进行突袭。

23 日基本未发生战斗，但到 24 日，胡克军在卢考特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一仗是在浓雾和细雨中打的，故被称为“云头之战”；胡克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史蒂文森将军的同盟军部队，史蒂文森只好趁夜色撤至主阵地。11 月 25 日，胡克军向布雷格曾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米申纳里岭阵地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击。这是南北战争中唯一在卵石遍布的陡峭山坡上成功地突破几道坚固防线的战例。

按预定计划，在胡克猛攻同盟军左翼的同时，谢里登应继续强攻米申纳里岭的北端；与此同时，托马斯的坎伯兰军团应对米申纳里岭中部敌军较低的堑壕阵地发动牵制性进攻，以防布雷格增援其侧翼。但是命中注定谢尔曼和胡克只能当配角。坎伯兰军团无疑想洗刷最近在奇克莫加失败的耻辱，决心要给同盟军以沉重的打击，一举把他们赶出战场。这些勇敢的士兵们冒着山顶敌军的猛烈炮火，冲破了敌军一道又一道防线。他们使敌人溃不成军，充分体现了进攻意识，连他们的将军们都看得目瞪口呆。此战双方伤亡人数远少于奇克莫加之战。同盟军伤亡 6667 人，联邦军伤亡 5824 人。

此役同盟军不仅丢掉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查塔努加和几乎整个田纳西州，而且还使联邦军很快打开了通往佐治亚州的道路。格兰特取得的胜利值得称赞，但奇克莫加之战是关键的一仗，如果不是布雷格贻误战机，如果不是托马斯将军在奇克莫加战役中表现出色，联邦军是不可能在查塔努加获得胜利的。

图 35、奇克莫加战役(1863 年 6 月至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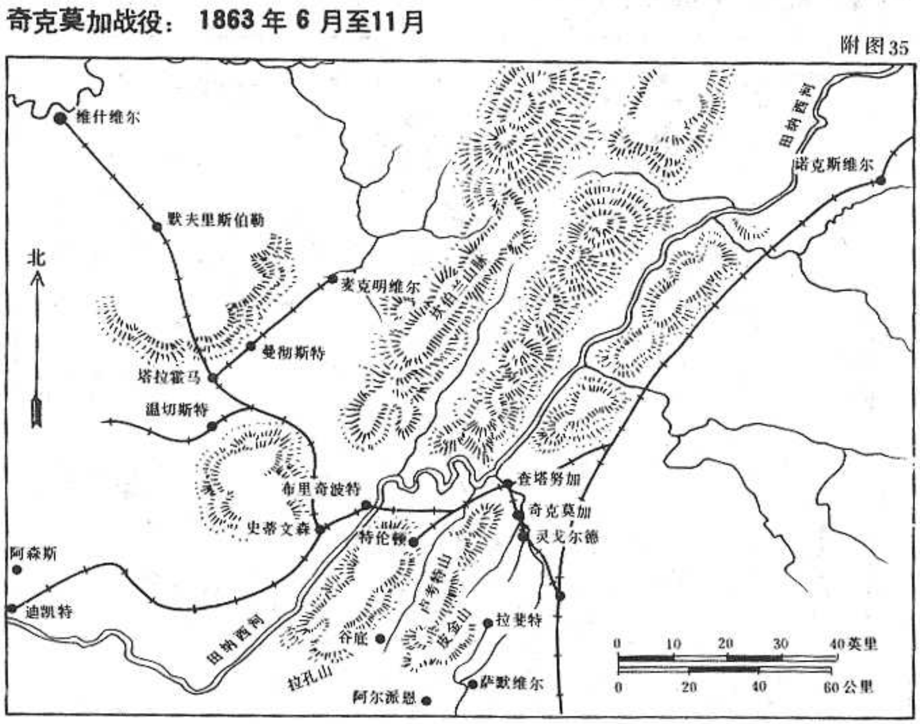



图 36、奇克莫加战役(罗斯克兰斯 9 月 9 日的三路推进)

奇克莫加战役：罗斯克兰斯 9 月 9 日的三路推进

附图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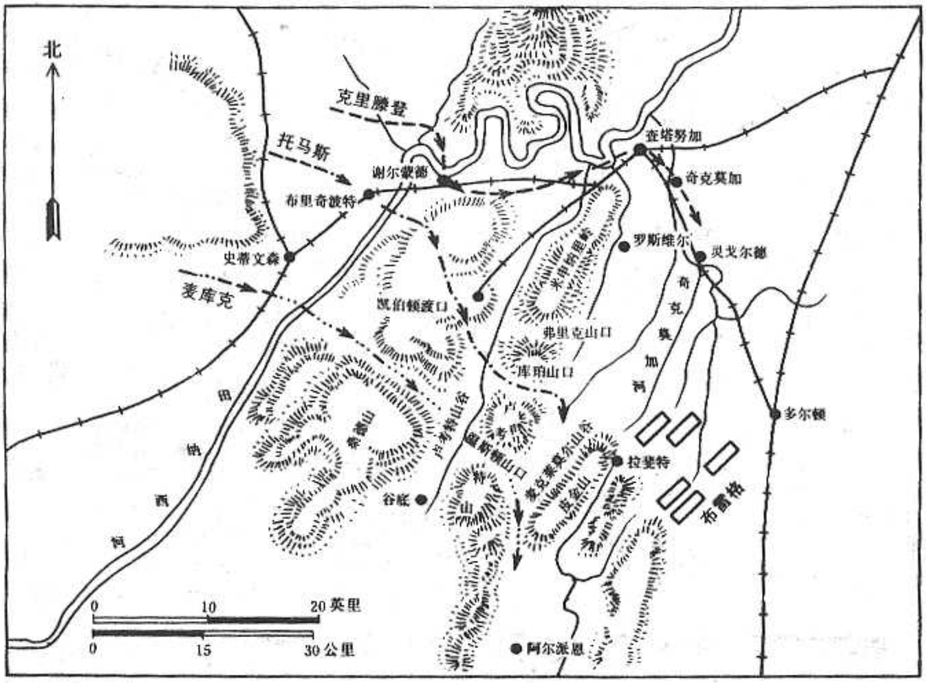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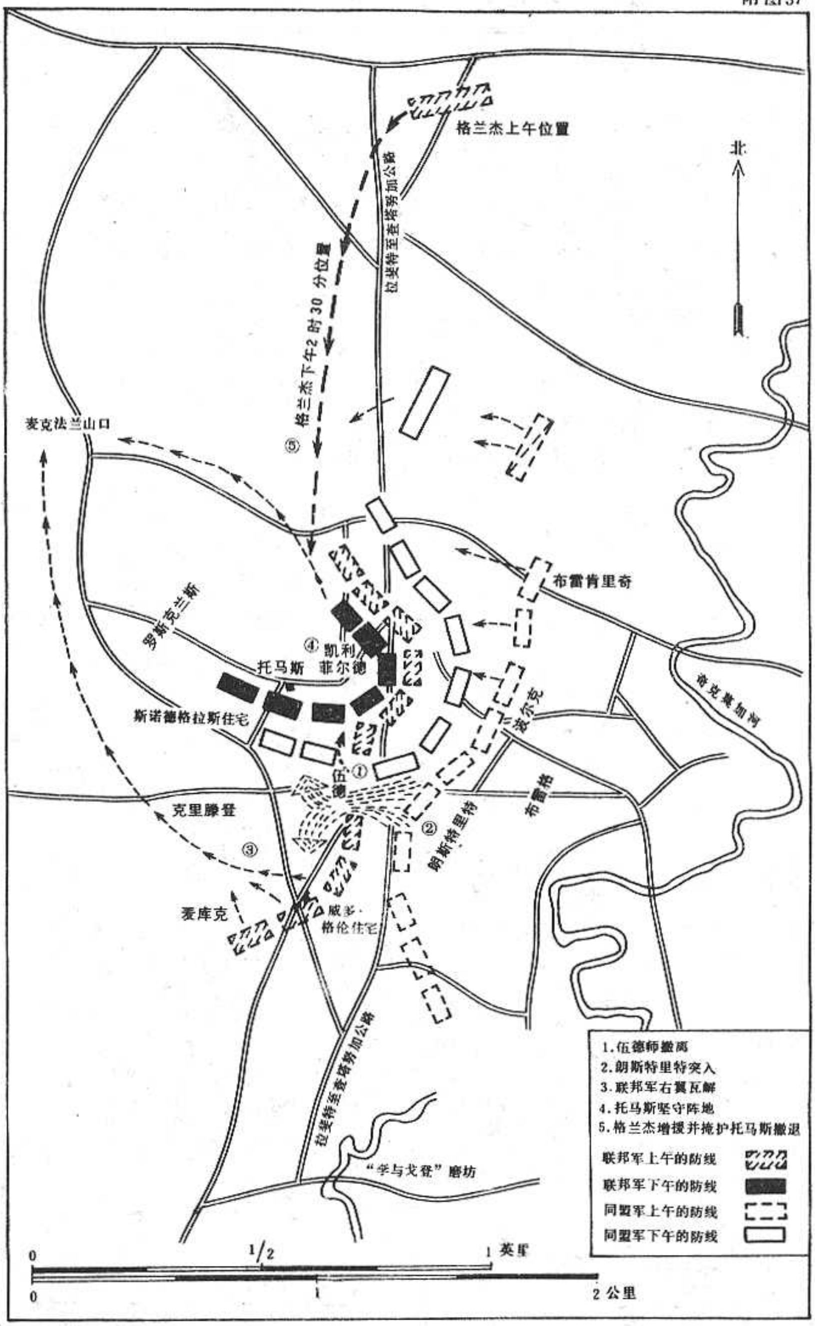



图 37、奇克莫加战役(1863 年 9 月 20 日)

奇克莫加战役：1863年9月20日

附图37



查塔努加之战是直截了当地发起强攻的战例，除了联邦军将士的勇敢和锐气以外，很难找出任何其他特殊的导致战役胜利的因素。但就奇克莫加役(该战役的结果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却是两个战役中较为决定性的战役)而言，有三个因素肯定与役的成败有关：布雷格未能将联邦军各个击破；伍德师于 9 月 20 日撤离防线；托马斯军于同一天晚些时候进行了英勇抵抗。

当罗斯克兰斯成功地率领他的 3 个军越过田纳西河并接近布雷格翼侧时，布雷格断定查塔努加难以防守，于是下令后撤以保护其在佐治亚州北部的交通线。但这并非如罗斯克兰斯判断的那样，是仓皇逃跑，而是有计划地撤退到拉斐特。布雷格巧妙地集结了他自己以及来自东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队，并进一步撒下诱饵，派遣一些“逃兵”到查塔努加散布同盟军士气低落、灰心丧气的消息，诱使这位联邦军司令落入圈套。

当罗斯克兰斯于 9 月 9 日获悉布雷格已放弃查塔努加南撤后，他立即命令他的 3 个军的司令官率部追击。麦库克的所有骑兵(欠 1 个旅)和怀尔德的骑马步兵从右路直扑阿尔派恩和萨默维尔。托马斯率领他的 2 个先头师(尼格利师及贝尔德师)翻越卢考特山从中路向麦克莱莫尔山谷进发，现在他们正沿特伦顿至拉斐特公路向前开进。克里腾登在占领查塔努加后奉命留下 1 个旅守城，其余部队从左路沿罗斯维尔—灵戈尔德—多尔顿公路追击敌人。这样，罗斯克兰斯的两翼部队相距 40 英里之遥，而且每一路都是完全孤立的。麦库克在率领他的 3 个师于 9 月 10 日赶到阿尔派恩后发现，由于敌军处于他和托马斯军之间，他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布雷格象蜘蛛等待猎物一样，一直在虎视眈地期待着这 3 路纵队自投罗网，他于 9 月 9 日前已将部队密集部署在从“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到拉斐特之间的关键地带，同时派希尔军

的克利伯恩师占领皮金山各山口。他决定先打罗斯克兰斯的中路部队(托马斯军)，然后再收拾两翼。9 月 9 日晚布雷格下令于次日兵分两路向位于麦克莱莫尔山谷的托马斯军的先头师发起进攻。按计划，波尔克军的欣德曼师从东北方向向前推进；希尔派遣或亲率克利伯恩师穿过皮金山口向西进发。但希尔接到命令后当即答复无法执行，因为他的师长病了，而且两个山口被倒伏的树木阻塞，24 小时内无法清除干净。

与此同时，欣德曼在 9 日夜里前进了约 10 英里，次日凌晨到达了可以对尼格利师和贝尔德师发动进攻的区域。因此，布雷格于 10 日下午决定继续实施原定计划，并派巴克纳军驰援欣德曼。但这两位司令官见面后一致认为布雷格的计划并非最佳方案，于是向布雷格提出了他们的方案。等待回复耗费了大量时间，而等来的回复却是他们必须遵原令发动进攻。接着布雷格又命令波尔克派其所剩的那个师掩护进攻部队的后方，沃克军立即驰援达格山口的克利伯恩师。按计划，欣德曼师一发起进攻，克利伯恩师就要立即投入战斗。布雷格于 11 日早晨亲自赶到克利伯恩的师部，此时克利伯恩的病情已明显好转。他们在一起一直等到中午过后好久，才听到欣德曼打响第一枪。由于达格山口及卡特利特山口的障碍已事先扫清，克利伯恩随即率兵冲出山口，结果他们发现托马斯的先头部队早已撤出对其不利的阵地。

我们始终不知道欣德曼和巴克纳的部队为什么没在中午之前发起进攻，但原因似乎是，他们因未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案行事而愤愤不平，而且他们也根本不喜欢布雷格。但他们和希尔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布雷格在阵地上集结了约 3 万军队，足以打垮托马斯三分之二的部队，但由于其下属的傲慢抗令，他的计划未取得预期效果。

攻击敌军中路未成，布雷格便试图各个击破克里腾登的部队。为此，他于 12 日晚 6 时向波尔克下达了命令。直到此时，

克里腾登军仍然是一分为二的：2 个师位于奇克莫加河东岸，1 个师位于“李与戈登”磨坊附近。这些部队徒劳地来回移动，试图摸清同盟军的阵地，全然不知自己所面临的危境。但到 12 日下午，克里腾登全军在“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完成了集结。

布雷格从约 10 英里之外的地方给波尔克下达了最坚决但却又不很明确的命令。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位军团指挥官不知道克里腾登军的行踪。布雷格认为奇克莫加河东岸仅有敌军 1 个师，因此他命令波尔克军在皮瓦恩河边的灵戈尔德西南与之交战。而实际情况是，该处有 2 个师的敌军，并且在波尔克接到命令时，克里腾登全军已经会合，部署在河的对面。因此，波尔克向布雷格报告说，面对数量大大超过自己的敌军，他没有进攻，而是构筑了防御阵地，并请求增援。波尔克被告知，他的部队在数量上超过敌军，应在 13 日黎明发起进攻。但当 13 日晨晚些时候布雷格亲赴准备增援波尔克的巴克纳军的前沿阵地时，他亲眼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克里腾登已逃出陷阱。

直到此刻，罗斯克兰斯才充分认识到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他的部队左翼在“李与戈登”磨坊附近，右翼在阿尔派恩，彼此相距 30 英里，难以呼应。于是他命令麦库克立即向托马斯靠拢，托马斯与克里腾登原地等待麦库克。布雷格未抓住敌军尚未靠拢的战机发起进攻。眼看自己制订的天才的战略计划已告流产，布雷格决定在发起精心策划的进攻之前，等待弗吉尼亚的援军赶到。

丹尼尔·希尔将军事后描述这场战役时对布雷格颇多微辞。虽然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话含有个人的偏见。的确，布雷格经常脱离现实，过分依赖他优秀的骑兵，而他的骑兵却存在许多问题；他很少采取措施改进其情报系统，也很少采取措施监督其命令的执行情况。这些都是他未能消

灭克里腾登的主要原因。但是，那种认为他是被自己所制订的所谓巧妙的战略计划所带来的几个良好战机弄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最初制订诱敌计划时，布雷格对整个战役的演变进程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如果此计划被忠实地执行，同盟军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布雷格与下属间未能达到灵犀相通的地步，而且他是个不走运的将军，这两个因素使他与成功无缘。

9 月 20 日早晨，布雷格终于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向联邦军左翼发起猛攻，托马斯立即请求增援。罗斯克兰斯命令扼守右翼中央阵地的尼格利师撤离防线驰援托马斯。防线出现的缺口由与范克利夫师共同作为预备部队的伍德师填补。不一会儿，由于托马斯再次紧急求援，罗斯克兰斯又从右翼调兵增援，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右翼的力量。他似乎不知道朗斯特里特率领的 8 个旅对其空虚的右翼已构成严重的威胁(尽管他只需快速派人侦察就可了解真情)。

上午 11 时刚过，托马斯军的参谋冯·施拉德中校在勘察防御工事时未能发现布兰南师虽已稍向后撤，隐匿于丛林之中，但仍处于雷诺兹与伍德阵地间的防线上。他认为这是个危险的缺口，便向罗斯克兰斯报告了这个情况。罗斯克兰斯在未获确证的情况下即命令伍德师向左翼靠拢，以加强其左翼雷诺兹的防线；同时麦库克奉命派遣戴维斯师填补由于伍德师移动所留下的缺口；作为预备队的范克利夫师和原扼守防线最右端的谢里登部也忙于向左运动以加强左翼防线。如此复杂的调动给朗斯特里特提供了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良好战机。

这是一个人员、时间、地点都赶得很巧的例子，就在伍德师的撤出造成防线出现缺口的一瞬间，朗斯特里特及时乘隙而入。麦库克手头仅有戴维斯师的 2 个旅和谢里登师留下的 1 个旅可以用来抵挡敌军的猛烈攻势，其他部队都已奉命变换

阵地，构筑新的防线去了。伍德师已经走到完全将布兰南部暴露在外的地步，这 2 个师的侧翼均受到朗斯特里特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而戴维斯师还未及进入伍德师撤离时所留下的缺口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了。谢里登师及怀尔德旅均被切断退路，只好撤离战场。实际上联邦军从布兰南师防线的中部到威多·格伦住宅外侧的整个防线已陷入混乱之中。据同盟军丹尼尔·希尔将军称，在这次战斗令联邦军右翼被俘 1100 人，损失大炮 27 门及无数辎重车辆。

以上就是联邦军在奇克莫加遭到大败的实际情况。如果布雷格抽出朗斯特里特的兵力切断托马斯军的退路，并沿德赖山谷路追击逃窜的联邦军的话，联邦军可能败得更惨，罗斯克兰斯可能全军覆没。尽管布雷格急切地希望突破联邦军右翼防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他还有 1 个师(奇塔姆师)未投入使用。由于未能派出增援部队扩大战果，他完全可能放过了大获全胜的良机。

尽管如此，联邦军右翼防线的崩溃使布雷格最终获得了赢得此次战役胜利的保证，无论剩余的联邦军如何骁勇善战——他们的骁勇异常——他们也无法抵御布雷格全军的进攻。因此，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伍德为什么要执行招致全军损兵过半这种灾难性的调动命令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他接到的命令不准确；二是他从防线上撤离是他对罗斯克兰斯心怀不满的一种表现。该命令称：“总司令指示你部尽快向雷诺兹靠拢，增援他们”。此令似乎并无模棱两可之处，因此只剩下伍德怀有报复心理这一种原因。

这天清晨，显然是由于托马斯军频频告急使罗斯克兰斯感到压力很重，罗斯克兰斯对伍德部替换防线中的尼格利部行动迟缓进行了指责。因此，有人认为，为了让罗斯克兰斯难堪，伍德故意执行了一道明知执行不得的命令。据说伍德曾要求将行动命令写下来，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他心怀叵测。确

实，在这次战役中已发生过几次联邦军将官们按自己的好恶行事使最高指挥官的计划破产的情况，而这次的情况也许又是同类事件的又一例证。但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竟会因为受到一点批评而有意使成千上万的战友遭到危险。特别是，伍德在晚些时候为了阻止朗斯特里特横扫联邦军后卫部队，曾在霍斯舒岭进行了约 1 个小时的殊死战斗，人们想起这一点后就更难相信伍德撤出防御阵地是出于报复心理。

当然，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伍德对其左右两翼的情况很了解，对此命令可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对全局情况并不了解，加之其他部队正匆匆向左翼运动，他可能更摸不着头脑了，因此他觉得，不管对错，他应遵令行事。导致联邦军失败的责任应由罗斯克兰斯而非伍德承担。

尽管联邦军战败，但军队尚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朗斯特里特对联邦军阵地突施第一次毁灭性的突击时，正匆忙向右调动的布兰南师与雷诺兹师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宽的缺口。前面已经说过，伍德是如何及时填补了此缺口并顽强死守的。他所赢得的短暂战斗间歇使当时唯一留在阵地上的高级指挥官托马斯得以重新部署部队对付敌人新的进攻。

在联邦军的左翼防线上抵抗波尔克军不断进攻的联邦军部队，依次是贝尔德师、约翰逊师、帕尔默师和雷诺兹师。这条防线以下是一道与原防线几乎成 90 度角的新防线，位于斯诺德格拉斯住宅正南人称霍斯舒岭的顶峰上。此防线由伍德师哈克旅的 1200 人、尼格利师斯坦利旅的 2 个步兵团(第 19 伊利诺伊团及第 11 密歇根团)、布兰南师(欠 1 个旅)以及位于最右翼的尼格利师西尔韦尔旅防守。这些部队面北朝南，正对着朗斯特里特前进的方向。

这种新部署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朗斯特里特部队从托马斯阵地右翼迂回包抄，断其辙向罗斯维尔山口的退路。在这天的剩余时间里，朗斯特里特部队反复进攻，试图突破防线，

并且几乎成功。下午 2 时左右，欣德曼师的安德森旅和麦克劳师的克肖旅为争夺山头拼命地进攻，并一度夺取了山头，但马上又被联邦军击退。第 21 俄亥俄团用科尔特旋转式来复枪给了敌军以重大杀伤。此时，形势十分危急，因为朗斯特里特还有好几个旅未投入战斗，他们随时都会加入进攻。

格兰杰的预备军一直驻扎在灵戈尔德路上。当他听到拉斐特和德赖山谷各条道路之间传来的密集枪炮声时，他觉得该是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他置原命令于不顾，派遣斯蒂德曼师的 2 个旅(惠特克旅及米歇尔旅)向托马斯报到，并命令其第 3 个旅(丹·麦库克旅)掩护灵戈尔德至拉斐特的道路。经过 3.5 英里的行军，斯蒂德曼率军于下午 3 时到达霍斯舒岭。这时他发现托马斯正在指挥部队抵抗已得到了欣德曼师及约翰逊师增援助朗斯特里特军的进攻，以阻止他们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米歇尔及惠特克随即率部投入了右翼的战斗。

在斯蒂德曼的 2 个旅到达的同时，布兰南师的范迪维尔旅也向托马斯报到，并紧靠着该师的另外 2 个已经精疲力竭，弹药将尽的旅进入了阵地。斯蒂德曼不仅给托马斯带来了生力军，而且还带来了 9.5 万发备用子弹，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些最宝贵的支援，托马斯才能抵抗住朗斯特里特的连续猛攻。然而，连续作战的托马斯不仅要抗击敌军对霍斯舒岭阵地的攻击，中午时分他的左翼阵地也遭到了布雷格亲自指挥的同盟军的猛烈进攻。希尔军的布雷肯里奇师试图迂回包围查塔努加路上的托马斯的左翼，从背后袭击贝尔德师。但该师碰上了联邦军的几个预备旅(其中包括还未派往霍斯舒岭的范迪维尔旅)，被迫退却。此时，波尔克军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了联邦军左翼以很大压力，联邦军的贝尔德师，帕尔默师及约翰逊师都投入了正面作战。

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这次著名战役出现了转折。朗斯特里特为了全线突破和全歼联邦军，请求布雷格从右翼调兵增

援，但遭到拒绝。于是朗斯特里特动用了他的预备师(普雷斯顿师)，并将其战线一直拉到联邦军右翼外侧。托马斯防线的两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宽的空当，但朗斯特里特却未加利用，而是又发起了一次正面攻击(此举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由于这次近距离争夺战非常混乱，朗斯特里特也许看不清敌军阵地存在一个空当，但奇怪的是——鉴于他对布雷格提出了增援请求——在此关键时刻，他并未将普雷斯顿师全部投入进攻，而是留下了一个旅准备对付子虚乌有的敌军骑兵的威胁。

对托马斯部队的聚歼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战斗进行得极为残酷。朗斯特里特将欣德曼师与约翰逊师布置于左翼以对付斯蒂德曼师，这 2 个师将斯蒂德曼师赶至后面的一个山头上，同时夺取了布兰南师右翼的一个阵地，但他们再也没能前进一步了。在右翼，朗斯特里特让普雷斯顿师的凯利旅和格雷西旅拉到已经苦战了一段时间的安德森旅和克肖旅的阵地上。但这 2 个旅却被哈克、黑曾和范迪维尔的部队顽强地牵制在主峰上，并在受到重创后被迫撤退。与此同时，下午 4 时至 6 时，希尔军在沃克师、奇塔姆师以及利德尔师的支援下对联邦军左翼发动攻击，并一度切断了罗斯维尔路，但正要开始撤退的雷诺兹师将他们赶回了路的东边。

夕阳西下时，托马斯的疲惫之师虽然弹药再次告罄，只好用刺刀拼杀，但他们仍屹立在他们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顽强坚守了 5 个多小时的阵地上。不过此刻，他们也该撤退了。当天下午，罗斯克兰斯命令托马斯经麦克法兰山口撤退到罗斯维尔山口，与麦库克和克里腾登一起驻守在那里；托马斯于下午 4 时 30 分许接到了这一命令，并迅速加以执行。他当即命令雷诺兹师首先撤退。如前所述，由于联邦军左翼几乎被同盟军右翼部队所包围，该师不得不且战且退，贝尔德师与约翰逊师也不得不边打边撤；不过，据守霍斯舒岭的部队

是趁着夜色，从碧血沙场井然有序地，平静地撤离的。

9 月 20 日夜间，托马斯的部队通过了麦克法兰山口，并于 21 日在罗斯维尔山口及沿米申纳里岭到卢考特山的山梁构筑了阵地。21 日夜，托马斯的部队撤到了查塔努加。在此之后的 2 个月，联邦军在该地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胜利。托马斯，这块“奇克莫加磐石”，被当之无愧地赞誉为拯救全军的英雄，但格兰杰将军也应该为人们所铭记，是他违令率部向有枪炮声的地方开进，及时解救了布兰南师，使其免遭围困。假如该师被围，整个阵地就难保了。

布雷格赢得了奇克莫加战役的胜利，但却未能完成解救查塔努加的主要任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追溯到 6 月 10 日至 13 日麦克莱莫尔山谷及其附近发生的失误。本书中列举了几个由于下级指挥官的无能，包括由于下级指挥官的自负而险些打败仗的战例。而此战役的情况则是一些将军傲慢无礼，几乎达到拒不执行其最高指挥官的作战计划的程度，同时最高指挥官本人又离战场太远，以致无法有效地指挥战斗。尽管如此，同盟军仍然取得了胜利，这的确令人惊奇。不过，由于布雷格不受下属拥戴(至少有两位将军对其不恭并经常脱离其指挥)，同盟军失去了全胜的机会。如此不协调的将帅关系是不可能创造伟大的战绩的。

然而，这次战役与已经提到过的一些战役完全不同，战役的最终胜利是由于一位下级指挥官的行动而赢得的。假如托马斯军在奇克莫加未能守住阵地，联邦军肯定会被同盟军从查塔努加赶出去。

## 第 19 章、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背景

1879 年 1 月，一支英国部队遭到勇猛顽强，计谋过人的祖鲁人的袭击，寡不敌众，大败而逃。这是一场灾难，全国上

下为之震惊。这个事件正好同 3 年前的美国小比格霍恩河谷发生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美国第 7 骑兵队的 5 个骑兵连被苏族印第安人所消灭。在这两种场合下，战斗都是针对一个骄傲好斗、竭力要保卫自己家园的民族，白人都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而且他们又都轻率地分兵出击。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程度的不称职和判断失误都因为部下的英勇大胆而得到部分的补偿。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灾难本来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伊散德尔瓦纳发生的战斗并不大，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它也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但是，它却是一首被后人大加赞美，引以为荣的史诗。数以百计年轻的英国人和数以千计年轻的祖鲁人，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却壮烈地战死在那肃穆的山丘脚下布满石块的平原上。

祖鲁人本来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班图人部族，直到 19 世纪初，一位名叫沙卡的特别残忍凶恶的酋长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主要以迷信和黩武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他自己便成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精明强悍，行动敏捷，守纪律，同时又异常英勇，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能攻善战的战士。他们实行的是普遍义务兵役制，青年男子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要应征入伍，住在有栅栏防护的军事村落里。在那里，他们未经国王的同意不准结婚，所以，男人们常到 40 岁的时候才结婚。男人们按年龄大小分组，编入各团。各团常常有一小部分(通常不到 10%)年纪很大的武士，例如，在沙卡的尤西克塞皮团，有 2000 人年龄在 30 到 80 岁之间。

尽管人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了解参加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士兵和团队的数量，但是，当时这个王国部队的总兵力却缺乏可靠的记载。人们通常认为，由年龄在 60 岁以下的武士组成团有 26 个，共约 4 万人，另有由年龄较大的士兵组成的 7 个团，尽管少数几个团是由不同年龄组的武士组成的。他们

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细长木柄标枪。短柄标枪是用来作近距离刺杀的。士兵们左手拿着一支(有时是两支)大一些的标枪。用一个坚固的牛皮盾作掩护，执盾者差不多可得到充分的保护。标枪投掷的距离常可达到 70 码，真令人难以置信。部队中还有许多滑膛枪和来福枪，数量也许多达 1.5 万支，但是，命中精度较高的枪支不到 2000 支。他们的枪法很差。

每个团在盾牌或头饰上都有自己的识别标记，由首席酋长指挥，他手下有一名副指挥官，称之为第二酋长。每个团分成左右两翼，以下分成连队。他们没有什么公认的操课动作，但是却演练一些有用的队形。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战术很简单，但是却极其有效。在进攻中，武士部队分成两翼(或称“两角”)和一个“胸膛”。“两角”的任务是以巨大的钳形动作包围敌人的两侧。在这个机动动作完成的时候，由许多行列组成的“胸膛”便向前推进，杀伤敌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崎岖不平，但这些行动敏捷的祖鲁人跑得比马都快，而且他们在家乡那些山坡高地和悬崖峭壁上的隐蔽能力令人赞叹。他们轻装前进，事实上不需要什么给养供应部门。

沙卡专横跋扈，远近闻名，而且也很有威信。1823 年之前，他是现在被称之为纳塔尔的一大片土地的主人。但是，在 1828 年，他的兄弟丁冈把他杀了，自己当上了国王。丁冈与沙卡一样残忍，甚至更为刚愎自用。1837 年，他答应给布尔人一片土地作为其协助作战的报答。1838 年 2 月任务完成后，布尔人派一个代表团到王室村落去核批这项拓居条约时，丁冈却把整个代表团都给杀了。这种卑鄙的行为并没有逃脱惩罚。尽管布尔人后来又在祖鲁人的手中遭到惨败，但是布尔人在 1840 年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接着，他们就支持丁冈的同父异母兄弟姆潘德把丁冈赶过蓬戈拉河，赶到了斯威士兰境内。不久，丁冈就在那里被刺杀了，这大概是斯威士兰人干的；姆潘德从 1840 年至 1873 年在位执政，起初是布尔人

的封臣，后来在 1843 年英国人并吞了纳塔尔后，又臣服英国。他体弱多病，但是脾气很随和。1857 年，他的儿子塞奇瓦约接过了王国的统治权，他的有效统治从此便结束了。

塞奇瓦约在 1856 年与他的兄弟同室操戈，并把他杀了，此后不久他就被确立为姆潘德的王位继承人。他是祖鲁人的第四位国王，毫无疑问，他比前几任国王都能干。他聪明能干，治国有方，深受人民的爱戴，而且总的来说也很公正。但是，在他的身上，经常有光明和黑暗这两种力量在斗争，因为他在某些场合下可能不那么光明正大，而且极其残忍。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代表英国政府的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曾设法让他答应实施仁政，但是，塞奇瓦约却很难信守诺言。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扩充这支由其叔伯父创建的，已经很强大的军队，而且他发现他很难抗拒这台强大的军事机器向他施加的要其采取行动的压力。不过，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曾打算入侵纳塔尔。

但是，英国人的想法不一样，毫无疑问，白人殖民主义者不信任在其边界另一侧的这个强大的黑人邻国。此外，祖鲁兰是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很有占领的价值。英国人已于 1806 年占领了开普敦，不久又同在那里生活了 150 多年的荷裔布尔人发生了冲突。废除奴隶制(该举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以及其它一些措施，导致了 1835 年开始的大迁徙。不久布尔人遭到了巴苏陀人和马塔贝莱人的顽强抵抗。后者是同祖鲁人有血缘关系的民族，受沙卡手下的一位将军莫西利卡齐的统治，是特别难对付的敌人。但是，布尔人的突击队却擅长这种战斗，经过几场恶仗之后，他们把这些土著人赶到北面，并在后来称为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完全满足。他们翻过德雷肯斯山脉进入纳塔尔，寻找更大的地盘。在这里与丁冈发生了

前面提到的纠纷之后，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并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心意。因此，英国政府向德班派去了部队，布尔人便撤退了。根据 1852 年签订的一项条约，英国人承认布尔人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实行的独立，祖鲁王国的边界也因此而被确定下来。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在 1877 年，英国人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吞并了德兰士瓦。如果祖鲁人要扩大地盘，就势必损害英国人的利益。1877 年被任命为开普敦领地总督的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不久便相信，他们正是要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情况下扩大地盘。

弗里尔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聪明能干的殖民地总督。他曾经长期在印度任职，而且干得很出色。他在印度曾担任过孟买省省长和总督顾问班子成员。殖民大臣卡那封伯爵非常希望他推行某种形式的联邦，但是，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引起的敌视态度使这种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此，弗里尔把精力集中在土著人的事务上。他到达开普敦时，那里正好发生了一些乱子：第九次所谓卡菲尔人战争正在进行，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布尔领地上不止一次地爆发了土著人起义。弗里尔坚决主张英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张必须让土著人摆脱野蛮愚昧和腐败的统治，并同饥荒和疾病作斗争。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想法，但是，却很少得到土著人的响应，因为他们很保守而且非常重视独立性。不过，弗里尔当时更为关心的是，通过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制止一场想象中的，被他称之为塞奇瓦约的“禁欲的杀人机器”发动的入侵威胁。

1878 年这一年中，他不断向殖民大臣上书：为了保护纳塔尔的殖民主义者，为了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和祭神屠杀，必须迫使祖鲁人就范。不过，英国政府迫切希望避免战争，因此指示弗里尔要竭尽全力同塞奇瓦约达成一项和平友好的解

决办法。但是，南非远离伦敦，弗里尔因此认为，作为现场的主官，他最了解情况，而且局势也要求他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

祖鲁人和布尔人因祖鲁兰西北部的一大片领土发生过严重的争端，英国人吞并德兰士瓦之后，就把这个争执接过来了。弗里尔提议并经塞奇瓦约同意，把这起争端事件提交给由弗里尔指派的成员组成的一个边界委员会解决。使他大为懊恼的是，这个委员会竟在1878年年底作出了有利于祖鲁人的裁决，弗里尔必须把土地归还给祖鲁人。但是，他在当年12月11日交给塞奇瓦约的一项声明中，却给这项裁决附加了一些不能接受的限制条件，而且还发出了一份必须在20天内照办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求交出一些边境入侵者(主要指一位老年酋长西拉约的几个儿子，他们侵入了英国领地，抓走了他们父亲的那个与人通奸的妻子)；第二部分中有一个条款要求解散祖鲁人的军队。弗里尔知道，塞奇瓦约答应第一项要求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第二项要求，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这份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1879年1月2日，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知书，共11点，说明了他为什么必须入侵祖鲁领地的原因。在这份多少有点伪善的文件的结尾部分，有一句为人所熟悉的但显然是言不由衷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话："英国政府同祖鲁民族并没有什么不和……"。1月11日(确定的最后期限)，一支英国军队渡过了布法罗河和图盖拉河，发动了一场战争，要消灭"英国政府同其没有什么不和"的那个民族。

指挥这支部队进行这场许多人都认为没有必要的战争的，是勋爵切姆斯福德中将。那时他52岁，是19世纪中叶标准的英国将军。他讲究礼貌，有胆量，待人处事光明磊落，对上忠诚，对部下宽厚，确实是一个文明国家各种美德的体现

者；但不幸的是，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干的将军。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下级军官，在马格达拉战斗中担任内皮尔的参谋人员，都表现突出。但是，他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后尚未经过实战考验。尽管他勤奋刻苦，小心谨慎，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应有的才能。他有时优柔寡断，但这时却象弗里尔一样，毅然决然地认为必须入侵祖鲁兰，而且又和弗里尔一样，低估了敌人的作战技能和决心。

## 第 20 章、伊散德尔瓦纳之战(1879 年 1 月 22 日)

切姆斯福德的计划是用3支主力纵队在开阔的正面(200多英里)发起进攻，驱赶祖鲁人，并向塞奇瓦约的首都乌伦迪合围。他认为如果只用一支实力强大的纵队直取乌伦迪，则很可能冒让祖鲁军队或其一部分跑到他的背后袭击纳塔尔的危险。右翼(第 1)纵队由皮尔逊上校指挥，任务是在图盖拉河下游河口渡河，第一个目标是袭击埃绍韦。中央(第 3)纵队由格林上校率领，在罗克渡口渡河，向东推进，越过边境并同邻近的 2 个纵队保持联系。切姆斯福德勋爵及其参谋人员随该纵队前进。左翼(第 4)纵队由伍德上校率领，从乌得勒支方向向东南开进并渡过布拉德河。第四个(第 2)纵队由邓福德上校指挥，开始时在图盖拉河中游的克兰兹科普留守，保卫边境地区；与此同时，第五个纵队留守在蓬戈拉河的吕纳贝格。

前 4 个纵队的兵力分别为 4750 人，3871 人，4709 人和 2278 人，总共 15608 名官兵，756 名赶车工，110 匹马和 285 辆四轮货车。这几支纵队的编制情况大致都差不多，只是邓福德上校的第 2 纵队有些例外，它有一支火箭连，几乎全部是由土著人组成的。格林上校的第 3 纵队是主要参加伊散德尔瓦纳战斗的一支部队，它有 6 名参谋军官，辖皇家陆军第 5 旅纳塔尔炮兵(哈尼斯中校指挥)，第 24 步兵团第 1 营(普莱恩中校指挥)，第 24 步兵团第 2 营(德加彻中校指挥)，第 1 骑步兵中队(拉塞尔中校指挥)，纳塔尔骑警队(达特内尔少校指

挥，后来转属司令部），纳塔尔马枪骑兵队(谢普斯通上尉指挥)，纽卡斯尔骑兵步枪连(布雷兹特里特上尉指挥)，布法罗边防警卫队(史密斯上尉指挥)，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 3 团第 1 营和第 2 营(分别由汉密尔顿—布朗和朗斯代尔指挥)，还有纳塔尔土著人先锋团第 1 连。这个纵队中皇家和殖民地部队共 1747 人，土著人共有 2866 人，还有向导以及受雇负责 220 辆四轮货车和 82 辆二轮车的赶车工。

仅从数字看，切姆斯福德指挥的是一支强大的部队，其中大部分人极其英勇，但一些土著人部队却不够理想。邓福德的巴苏陀人表现很出色，但是，纳塔尔的祖鲁人在某些情况下却不可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不明智地强加给他们的严格的队形和训练很不习惯。切姆斯福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组织和管理这支部队，发布的规定几乎包括可能发生的每一种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支纵队始终如一地认真执行这些规定。切姆斯福德本人一直向布尔人指挥官了解祖鲁人的各种情况，但是对这些情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塞奇瓦约和他的伯父沙卡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武士，并没有亲自统率过部队。但是，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严格禁止自己的部队打第一枪。他动员了他的整个军队。各团都集结在王家村落。他并没有为他们制订什么计划。酋长们必须伺机而动，绝对不得擅自越过边界，但是要把入侵者赶出自己的家园，而且要尽可能采用突然袭击和伏击战的方法。当切姆斯福德的部队于 1879 年 1 月 11 日越过祖鲁边界的时候，塞奇瓦约的武士们就准备进行决战了。

关于第 1 和第 4 纵队的情况，本文将在以后作简要介绍。伊散德尔瓦纳战斗只涉及第 3 纵队及第 2 纵队的一部分。同敌人的第一场遭遇战发生在 1 月 12 日清晨，在河东约 6 英里的地方。当时，第 24 步兵团第 1 营加上一支土著人分队，同

一部分从附近峭壁上赶来保卫西拉约(他的儿子们引起了这场麻烦)的村落的祖鲁人进行了交战。此仗并没有打多久，祖鲁人就被赶走了，并损失了 30 人。然后，该营烧毁了村落，抢走了 500 头牲口。第 3 纵队在这里停留 7 天，把功夫花在修路上，以便让四轮货车通行。道路充其量也是很不平整的，由于暴风雨持续不断，排水和修路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当修路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切姆斯福德和他的参谋人员便向前行进，选择下一个宿营地。他们选择的宿营地紧挨着形状奇特的伊散德尔瓦纳山。这座山山体狭长，山顶平坦，山壁陡峭，比周围的平地高出 500 英尺，南北走向，山顶长约 300 码，有一个山口或隘口，同南边小一些的一座叫斯托尼的山丘相连接。唯一有可能通四轮货车的道路便经过这个山口，因为其他地方路面破损严重，高低不平。这座山丘的东面，地势平缓倾斜，下面是一条正好与高地平行的无水峡谷。再向前，是一片宽约 4 英里，东西长约 8 英里的平原。往南，便是一片相当宽的开阔地，延伸到马拉加塔山。但是在北边，这块平原却在恩古图山的山脚下突然消失。恩古图山同伊散德尔瓦纳山一样高，它们的最近距离只有 2000 码。

宿营地安排在伊散德尔瓦纳山最东面的高地上，这样，山就可以作为其后方防卫的依托。这座山形状奇特，第 24 团的官兵们感到它的形状象是作为他们团徽章的斯芬克斯。这场战斗的主要一幕不久将在这座雄伟的山岗附近和布满乱石的高地上展开。切姆斯福德因为选择了这里面受到指责：北面的山离他太近，肯定使人不舒服，却为敌人提供了充足的隐蔽藏身之处。但是，这里也有其优点，只要有恰当的保卫措施，其理想程度不此周围任何其他地方差。

大部分部队都是在 1 月 20 日中午到达宿营地的，尽管一些四轮货车由于牛疲劳不堪而不得不留在 1 英里以外的地方。宿营地从左到右依次为：纳塔尔土著人分队 2 个营，第 24 团

第2营，炮兵，骑兵和第24团第1营。没有人下令挖壕沟设防或用货车把宿营地围成车阵，尽管几天以前攻占西拉约的村落时，一位布尔人指挥官就曾认真地建议切姆斯福德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设立宿营地的时候，切姆斯福德同一个警卫向东南方向实施侦察，因为据报告那里有祖鲁人的一个据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便于下午6时30分返回。

不过，那天傍晚当他接到在东南方向出现一个祖鲁武士团队的进一步报告后，他便决定在第二天派出大批人员进行侦察。共出动了三支部队：由朗斯代尔指挥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2个营，凌晨4时30分离开宿营地，去马拉加塔山南侧执行任务；1小时之后，由达特内尔少校率领的150名骑警出发，任务是沿着切姆斯福德前一天走过的路线进行侦察；其后，一小队骑马步兵前往伊西佩西山进行了短促侦察。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切姆斯福德在宿营地收到一份报告，内容是达特内尔已同朗斯代尔取得联系，尽管他的部队遇到了几百名祖鲁人，但他们很快就被打跑了。但是在下午4时，正当切姆斯福德同格林骑马查看几个前沿骑哨时，达特内尔又送来报告说，在他正前方的山里出现了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因为当天时间太晚了，他无法采取行动，因此他打算先露营，到第二天再进行战斗。同时他询问，能否向朗斯代尔和他的部队运送食品和毯子？切姆斯福德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他自然非常生气，因为给达特内尔的命令是实施侦察后返回，而不是留在那里进行战斗。

22日凌晨1时30分，切姆斯福德被人叫醒，阅读了达特内尔的另一份报告，感到更为恼火。报告说祖鲁人的部队太强大，他对付不了，要求立即给予增援。尽管事实证明这个情报不正确，因为这些祖鲁人是前去同主力部队会师的一支小部队，但是，它的确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报告：乌姆西乔团准备在伊西佩西山附近集结。切姆斯福德下令增援部队作好

准备，天一亮就由格林上校率队出发。增援部队中有第 24 团第 2 营的 6 个连、骑马步兵中队、哈尼斯上校的 4 门火炮以及纳塔尔土著人轻工兵部队。切姆斯福德将随同前往，因为无论如何他都要侦察下一个宿营地。

这样，这个宿营地里只留下一支欧洲人和土著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包括 2 门火炮和 70 名炮手在内，共有 1200 余人，其中欧洲人为 800 余人，由普莱恩中校指挥。不过，切姆斯福德在离开宿营地之前，曾命令邓福德上校(他同他的第 2 纵队部分人马留在罗克渡口)率所属 5 支巴苏陀骑兵部队、火箭连、纳塔尔土著分队第 1 团的 2 个连队以及 10 辆四轮货车前往宿营地。这些部队于当天上午 9 时 46 分抵达伊散德尔瓦纳。当时，宿营地内一片平静。

格林的增援部队在切姆斯福德及其参媒人员的陪同下，于当天上午 6 时 30 分到达达特内尔的阵地上。接着发生的令人奇怪的一连串互相联系的事件，错误和误解，对这场不久将吞没伊散德尔瓦纳宿营地的灾难有着肯定的(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达特内尔和(指挥骑马步兵的)拉塞尔这两位校官带上 4 门火炮按命令向前开进，目的是查明前一天夜里所看见的祖鲁部队的配置和实力。他们打了一场追击战，因为祖鲁人的这支小部队似乎很想牵着他们跑。尽管他们打死了 80 余名祖鲁人，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

在切姆斯福德等人离开的时候，普莱恩于上午 8 时 5 分给他发了一份报告，切姆斯福德于上午 9 时收到了这一报告。普莱恩得到一个骑哨的报告说，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正从恩古图山方向向宿营地推进。切姆斯福德仍然认为他正面的才是敌人的主力武士部队，因此，他很难相信这个情况。但他派副官海军旅的米尔恩中尉到一块高地上进行观察；在那儿，他通过高倍望远镜可以看见宿营地。米尔恩报告说似乎一切都正常，帐篷仍然立在那里。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遇到

危险时是要拆除帐篷的。

普莱恩的报告并没有向他暗示情况的紧迫性，而且也是个二手情报。切姆斯福德刚派汉密尔顿—布朗率领他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一个营回去协助普莱恩拔营启程，不管怎么说，邓福德的人此时应该赶到伊散德尔瓦纳了。让部队返回宿营地至少要用 3 个小时，而且切姆斯福德并没有忘记他的主要目标是乌伦迪，他的直接目标是让这支纵队赶到下一个宿营地。因此，他决定继续前进。要是他返回的话，他本来是有可能及时赶到解救这个宿营地的。这样，也就不会发生罗克渡口之战了，许多英勇的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但是，这不能被看成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会象他那样做。

由于达特内尔和拉塞尔的部队无法迫使敌人进行决战，切姆斯福德便命令他们后撤；整个部队，除火炮外，均向打算在曼盖尼河源头处设立的新宿营地前进。现在的时间约为 12 时 30 分。人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从原宿营地方向传来的枪炮声。这时，切姆斯福德亲自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山梁上，他通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宿营地的帐篷依然立在那里。在枪炮声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必定是普莱恩击退了一小股武士部队，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大惊小怪了。但是，离宿营地比较近的部队不久就产生了另外的想法。

由于地形的原因，在赶往新的宿营地的途中，哈尼斯上校带着他的火炮往回走了 2 英里。正当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听到伊散德尔瓦纳方向传来枪炮声，看到在他们和原宿营地之间有一大队土著人。原来这些人来自汉密尔顿—布朗的部队，正在赶回宿营地去，他们要求哈尼斯同他们立即会合，因为他们相信宿营地已被包围了，而且即将被占领。切姆斯福德的高级副官戈塞特少校当时正和哈尼斯一起赶路，他强烈建议哈尼斯执行自己原来受领的命令去同切姆斯福德重新会

合，因为他认为汉密尔顿—布朗的报告是夸大其词。但是，哈尼斯却不听他的劝告。于是，戈塞特骑马回到了切姆斯福德的身边。他是否向切姆斯福德或者他的参谋克里洛克上校报告了汉密尔顿—布朗迫切请求援兵的情况，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不论怎么说，他给哈尼斯带回去的命令是让其调头赶往新的宿营地。

汉密尔顿—布朗在其部队被哈尼斯发现之前已经给切姆斯福德发了两份紧急报告，这两份报告差不多是在戈塞特可能轻描淡写地向切姆斯福德作汇报时送到他手里的。切姆斯福德仍然不相信宿营地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出现。但是，他仍决定骑马回去亲自查看真实情况。他是于下午 2 时左右出发的，带了拉塞尔的骑马步兵作警卫。过了 1 个半小时之后，他遇到了汉密尔顿—布朗的营，因为该营的土著人士兵在无援军的情况下，拒绝再往前走。因此，他命令他们整队跟在骑马步兵后面。几分钟以后，吓破了胆的朗斯代尔指挥官策马而来。他是在侦察马拉加塔山的时候脱离自己的部队的。他身体不舒服，由着他的马把他带回宿营地的饲料桶。他昏昏沉沉地打了一会盹儿，醒来才发现自己到了宿营地，周围竟是一片被杀害的黑人和白人的尸体，白人的尸体都被开膛破肚了。他立即拨转马头，只是由于他策赶那精疲力尽的马逃命，才免于一死。

对于部下九死一生的经历，切姆斯福德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一行差不多可以看见宿营地了。他简直不能相信，居然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他立即命令格林的部队返回，并同汉密尔顿—布朗的纳塔尔土著人分队一起成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到离宿营地 3 英里以内的地方，在那里等候格林的到达。当他到达这片被蹂躏的宿营地的时候，夜色已经把这片恐怖的情景遮盖起来了。

那么，伊散德尔瓦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邓福德

一到达便从普莱恩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凭的是资历，如果不是根据直接命令的话——人们对他是根据命令接过指挥权的说法有些怀疑)。邓福德 1848 年进入皇家工兵部队服役，在 30 年服役期中积累了许多同土著人部队交往的经验，他非常尊重土著人部队，土著人部队也很尊重他。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有能力而且特别勇敢，但是他喜欢自行其事，讨厌人家不让他参加战斗。他在克朗斯科普时曾率第 2 纵队独立行动，使那位通常很温和的切姆斯福德非常生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因此，有些人后来断言，邓福德在伊散德尔瓦纳的行动至少是这场灾难发生的部分原因。

当然，普莱恩是会问邓福德报告在他抵达前的 2 小时有人看见东北方向有祖鲁人的情况的，而且这可能促使他在宿营地前不远的地方派兵布防。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一支巴苏陀人部队回去保卫尚未到达的四轮货车，而且还派 2 支部队在左侧向恩古图山方向实施侦察。与此同时，他本人同余下的 2 支巴苏陀人部队、火箭连和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 1 团的 1 个连向平原推进。他曾要求普莱恩借给他 2 个英国连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但是，普莱恩没有同意，并提醒邓福德说，上级的命令是保卫宿营地，部队如此分散已经很危险了。邓福德并没有强求他。但是，在离开之前，他命令由卡瓦耶率领的第 24 团第 1 营的 1 个连前往宿营地以北的一座高约 1500 码的高地，而在上午 8 时警报之后做好战斗准备的其他部队却被解除了戒备状态。

邓福德率部队策马东行，来到一座叫科尼克尔山的南面。在此之前，他已经派了一些巴苏陀人爬上高地，进行侦察。他的部队起初看到的只是一群牛，就想把它们围捕起来。但是，在他们走上山梁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地发现，在下面的山谷里有一大群祖鲁人。这些人完全成战斗队形，正在休息，然而还有一大群人正在向北移动。这是祖鲁人的主力武

士部队，下属各团正在悄悄地，巧妙地进入阵地，准备在第二天发动进攻。既然已经暴露，他们就不可能实施突然袭击了，于是乌维团——几乎肯定没有接到命令——仓促进攻，其他团也跟着干起来了。

离宿营地约 4 英里处的邓福德此时位于正在巡逻的巴苏陀人的侧前方。然而他已经不需要他们向他报警了，因为此时他可以看见祖鲁武士部队“左角”的巨大人浪正在山梁上翻动。首先承受祖鲁人强烈攻击波的是那支被抛在后头的火箭连。他们很英勇，想方设法发射火箭。但是只发射了一枚火箭，一队祖鲁人就扑了上来，在肉搏战中，除 4 人外，火箭连连长拉塞尔少校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火箭炮也只得抛弃了。与始同时，邓福德及其部队夺路返回位于宿营地前 800 余码的无水峡谷。他们大约是在祖鲁人的各个团向宿营地合拢的时候(下午 12 时 30 分左右)到达那里的。

人们对邓福德的指责，是他从普莱恩手中接过指挥权的时候，就违背了普莱恩从切姆斯福德那里收到的命令，对于这个命令他本来应该自动服从的。他的做法分散了普莱恩掌握的兵力(普莱恩必须在前沿部队受到攻击时派 2 个连击保卫他们)。他离开宿营地以及后来的撤退，在防线的右侧，即在他的部队和波普中尉的部队之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而且他过早地同祖鲁人进行交战使他们的进攻时间提前了 12 个小时以上。

毫无疑问，邓福德犯有不服从命令的罪过，切姆斯福德也主要以此为自己进行辩解。这肯定使普莱恩的任务更难完成。但是，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它几乎是不可能影响到战斗的结局的。因为如果祖鲁人相信凶兆，确实是按预定的时间在 23 日凌晨发动进攻的话，他们的进攻会同样具有破坏力，而且很可能会结束得更快，因为切姆斯福德的部队在遭到进攻时正在拔营。

普莱恩首先是从顾问乔治·谢普斯通上尉那里得知发生了严重麻烦的，因为谢普斯通是随罗中尉的巴苏陀部队行动的。这支部队在离宿营地三四英里处的高地上进行侦察时追击了一队放牛的祖鲁人。结果他们同邓福德的部队一样，都发现自己几乎突然站在一大群正向宿营地径直前进的敌人的上面，而其他祖鲁人(“右角”)正在向后方迂回。罗和卡瓦耶两位中尉向后退却。但是，卡瓦耶的连队同敌人的“右角”进行了远距离的交战。就在切姆斯福德下命令拔营的同时，谢普斯通带回了这个使人惊恐的消息。很明显，切姆斯福德的命令不可能执行了。但是，普莱恩犹豫了一阵之后(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分散，处境非常危险)，同意从自己的营(第 24 团第 1 营)里抽出 2 个连队，分别由莫斯廷上尉和扬哈斯本上尉指挥去支援罗和卡瓦耶的部队。宿营地又一次非常仓促地进入了战斗准备，那些不担负警戒任务的部队奉命在离帐篷 500 码左右的地方构筑了一道面向东北和正东方向的防线。

祖鲁人采用了他们通常使用的战术，即以“胸膛”(主力)向前推进，“两角”同时包抄进攻，企图从伊散德尔瓦纳山路西面和南面两个方向包围宿营地。位于前沿的 2 个英军连队以及罗中尉指挥的土著人部队，以准确的齐射射击冲过来的祖鲁武士，暂时阻止了他们的攻势；但是，部队受到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有时弹药需要装填补充。因此，他们就在在其后面不远的阵地上进行防守的扬哈斯本连队的有力支援下撤了下来，同宿营地前的部队会合。

现在，宿营地形成了一道直角形防线。最北面从左到右，依次为扬哈斯本、莫斯廷和卡瓦耶等人的部队，在他们的右边形成支点的是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第 1 营(罗的部队刚刚撤到那儿去)。纳塔尔土著人分队的南面是炮兵，接着是第 24 团第 1 营沃德尔上尉和德加彻上尉的 2 个连以及第 24 团第 2 营波普中尉的连，他们都是面东排列。在邓福德的部队退守到

防线之前，右侧是由纳塔尔骑警防守的。帐篷和四轮货车就留在离这些部队后方不远的地方。这条防线长约 300 码，要用它来抵挡准备包围宿营地的那黑压压一片的祖鲁人，力量真是太单薄了。

就在普莱恩的部队准备迎战祖鲁部队以乌姆西乔团和诺肯克团为中央、以昂迪团和诺德温古团为左翼发起的第一个冲击波的时候，邓福德的部队正在那条陡壁峡谷里同恩戈巴马霍西团进行殊死搏斗。这里的地形特征使他的部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不久，峡谷前面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祖鲁人的尸体；但是邓福德部的弹药打光了(他们一再提出补充弹药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而且敌人的“左角”似乎要切断他部队的退路。他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因此把部队撤向伊散德尔瓦纳山和斯托尼山之间的高地上。到这个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土著人士兵感到支持不住，开始逃散；但是巴苏陀人却坚守阵地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守卫在防线的右侧，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邓福德的部队几乎是在祖鲁人开始雪崩似地突破防线的同时到达斯托尼山的。这些大无畏的祖鲁武士，满怀着民族的自尊心，个个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一队接着一队冒着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用 2 个队列轮流进行射击的可怕火力，沉着坚定、勇往直前地投入战斗。当这群祖鲁人离英军防线大约有 200 码的时候，走在前头的纵列顷刻间犹豫起来了，因为死伤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一是英军开始缺乏弹药。四轮货车停在后面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但英军没有组织起人力运送这些弹药。就在这火力的间歇期间，祖鲁人又鼓起了新的勇气。现在他们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一边前进到标枪投掷的距离以内。这种情况并不是纳塔尔土著人分队能够应付得了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而且他们自己就是祖鲁人的一支。

他们败了下来，四散而逃，这就成了两个致命的不幸事件中的第二个。

这条防线就在紧要关头被突破了。守卫者利用剩余的弹药继续射击，两门火炮发射了几发没起多大作用的炮弹；接着，短柄标枪代替了长柄标枪，刺刀代替了子弹。黑人通过两个突破口(一个在结合部，另一个在波普和邓福德的部队之间)涌了进去，黑人和白人很快便混成一团，投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战斗。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但是只有一小批英国人活下来向人们叙述这些故事。后来，还是祖鲁人自己对此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他们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遭到了惊人的还击，承认那些进行还击的人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勇敢精神。到下午 1 时 30 分，正好是这个武士部队下山后的 1 个半小时，左右两个“角”实际上已经会师了，这个宿营地便落入祖鲁人的手中。

此时作进一步的抵抗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一些人便设法突围，前往距布法罗河最近的渡口。但是，地形崎岖不平，祖鲁人却行动迅速。因此，在前往布法罗何的路上和实际渡河期间又出现了许多英勇行为。泰因穆斯·梅尔维尔中尉(第 24 团第 1 营副官)决心努力保住英军的团旗。他带着团旗策马奔向河边，跃入河中。他的马淹死了，他也被河水冲走了。后来，他得到希金森中尉的帮助时，手中仍抓住团旗不放。他是被石头卡住的，当时他已精疲力尽。科格希尔中尉当时已安全渡过布法罗河，到了纳塔尔一侧。但是，当他看见梅尔维尔的处境危险时，便立即骑马跳进湍急的河中。尽管他自己差不多因为受伤而支持不住，仍然设法把梅尔维尔救上了岸。不过，河水此时已经把梅尔维尔手中的团旗冲走了，他和科格希尔两人累得几乎不能动一步，不久都被祖鲁人杀害了。28 年以后，他们都因这种勇敢行动而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注：过了一两天，哈福德上尉(及另外两人)从上游冲

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到了这面团旗。该团(后来改名为南威尔士边民团)自豪地把这面团旗一直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这面旗就被珍藏起来了。]。第 24 团第 2 营的军旗在进攻时存放在帐篷里，后来也丢了。在那些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人中，有史密斯—多林中尉(即后来的霍勒斯爵士将军)，他是少有的几个幸运者之一。共有 1329 名士兵在战斗中或逃生时丧命。当然，有 2000 名，可能还要多一些的祖鲁人也战死在这片被鲜血浸透了的土地上，另有不计其数的祖鲁人惊恐万状地逃回了自己的村落。

那天夜里，已经走到前头的切姆斯福德勋爵及其部队在战场上露营。在他们的四周，到处都是一堆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对这些勉强逃脱其同伙命运的人来说，这必然是一个冷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充满着恐惧。天还没有放亮，切姆斯福德已经让这些人赶往罗克渡口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祖鲁人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进攻何时发起。这片平原成了一个大屠杀场，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死尸昧。但是至少在行军的时候，部队是不会感受到这种悲惨的恐怖气氛的。

实际上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就在他们赶到罗克渡口之前，英军历史上壮丽的插曲之一已经发生了。一支由 104 名官兵(另外 35 人正在住院)组成的小部队顶住了昂迪部队 4000 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医院和传教站里涌现了许多伟大的英雄行为。第二天，这支小部队便阻止了祖鲁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了回去。

昂迪部队是祖鲁人部署在伊散德尔瓦纳“右角”中的右翼团，他们的进攻方向使他们来到了伊散德尔瓦纳山的西侧。按估计，他们在这里是有可能截住逃跑的英军的。但是，大多数英军却走了通往布法罗河的近路，尽管道路崎岖不平。因此，昂迪团的指挥官达布拉曼齐决定改变计划，进攻罗克

渡口处的奥斯卡堡传教站[注：这违反了塞奇瓦约的命令。达布拉曼齐要不是国王的兄弟，很可能就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处死了。]。查德中尉是在其上级前往海尔普默卡尔的时候担任指挥的，他没有时间来临时加强这些建筑物的防御，因为他们在下午 4 时 30 分就发现了祖鲁人。战斗进行了 12 个小时，祖鲁人不止一次地突破了防线，但都被打退了。当切姆斯福德的部队上午 7 时到达的时候，院子前面躺着 350 多具祖鲁人的尸体；与此同时，守军中有 15 名士兵阵亡，另外 12 人受伤(其中 2 人后来也死了)。查德中尉以及这支由军人和老百姓组成的混合小部队，可能已挫败了祖鲁人对纳塔尔的一次重大进攻。在这场史诗般的保卫战中，他们作战勇猛顽强，因此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多达 11 人。

英军在伊散德尔瓦纳遭到溃败，他们对祖鲁兰的进攻因此也暂时停止。英军中土著人的士气严重涣散，有 4 个营已经自行解散，因此迫切需要部队增援，这也是英国政府终于承认的一个事实。第 3 纵队撤到海尔普默卡尔，并负责那里的防务。就在伊散德尔瓦纳战斗发生的同一天，皮尔逊上校的第 1 纵队在因耶泽恩同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在战斗中，他的部队战果出众，使祖鲁人遭受重创。第二天，他到达埃绍韦(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可是他的纵队却在这里被祖鲁人的一支大部队包围了，直到 4 月 3 日，切姆斯福德勋爵才把他们解救出来。

伍德上校的左路纵队(第 4 纵队)遭到了两次严重的失败，但在 3 月份却打了一场大胜仗。第 80 团的 1 个连负责护送一大队满载着给养的四轮货车，3 月 12 日在因通比河两岸被祖鲁人的 1 个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仅因为吕纳贝格的驻军(第 5 纵队)偶然赶到，才未被歼灭。结果，有 62 名英军和 17 名赶车工被杀。后来，切姆斯福德在去救援埃绍韦时曾命令伍德进行转移，但伍德的纵队却于 28 日捅了有 2 万左右祖鲁人

的“马蜂窝”(其中就有在伊散德尔瓦纳打了胜仗的几个团)。

他把部队一分为二，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因洛巴纳山。雷德弗斯·布勒上校(后来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率领的一队人马，在山顶几乎被切断退路，12 名军官和 8 名士兵被打死。如果不是布勒上校指挥若定。巧妙地让他的人下了山，这支 400 人的部队就有可能全部葬身于山顶。一支武士部队后来进攻伍德在坎布拉的宿营地，但是祖鲁人的一个逃兵及时把这个消息通知伍德，他便用四轮货车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阵地。尽管如此，祖鲁人仍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在整个战役中，这一仗打得最艰苦。不过，伍德取得的胜利也是最彻底的。

4 月份，大批增援部队赶到了，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法国的皇太子，但是，他在 6 月 1 日的一次巡逻中饮弹身亡，真是悲惨得很。切姆斯福德对这一战役的指挥起码说是不出色的，但他不失尊严地承担了这些不幸事件的责任。伊散德尔瓦纳之战以后，他提出辞职。当时他的辞呈并没有被接受。但这时，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将军正在前来接任的途中。不过，在他到达之前，切姆斯福德设法完成了重新整饬部队的任务，并在最后一次胜利中为他以前的过失作了一些弥补。

现在，他指挥着一支兵力达 17，528 人的部队，其中英国步兵 9，000 人以上，英国骑兵 1，190 人。他们分成两支主力纵队，6 月份开始向祖鲁兰挺进，一路行动谨慎。由克里洛克少将指挥的第 1 师向沿海地区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到达邓福德港；与此同时，由纽迪盖特少将指挥的第 2 师从敦提向东，直捣塞奇瓦约在乌伦迪的老窝。

7 月 4 日清晨，最后一仗开始了。纽迪盖特的部队组成了一个中空方阵向前推进，方阵由 4000 名英国步兵、1000 名土著人步兵和 12 门火炮组成，还有骑兵作掩护。布勒事先选好了最适合于作战的地形。因此，到了这个地方后，方阵停止前进，等候对方的攻击。大约 2 万名祖鲁人以惯有的勇气发

起了进攻，但是，他们遭到的还击火力使他们实在难以承受。战斗不到 1 个小时便结束了。武士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而逃，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英军只有 12 人阵亡，88 人受伤。

战争结束了。英国差不多损失了 1000 人，500 万英镑。战争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在祖鲁兰本土内以及在与布尔人的关系方面引起很多麻烦，同布尔人的纠纷直到 1901 年才结束。最后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塞奇瓦约的村落荒无一人，6 个星期之后，他就被抓住了。后来他又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里当了国王，但在一次内战中被赶走了，并于 1894 中死去。当年他手下那些杰出的武士——装备如此简陋而战斗得那么英勇——已不再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了。不过，许多人在一段时间内，仍让他们手中的长矛在激烈的自相残杀的争斗中染满了鲜血。

图 38、1879 年时的祖鲁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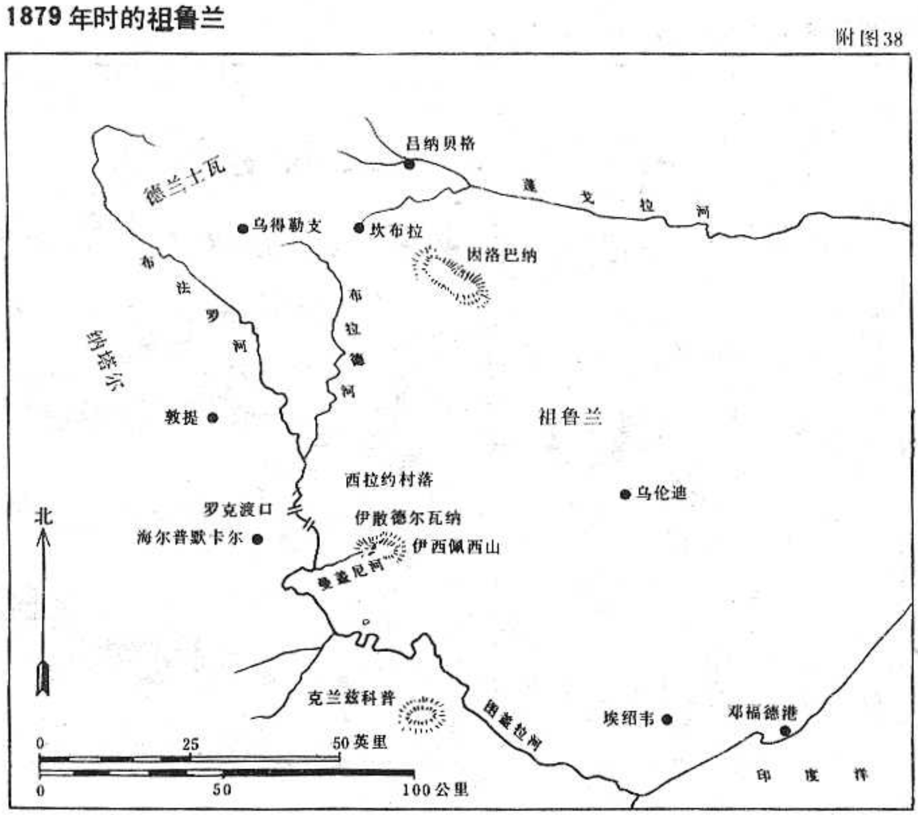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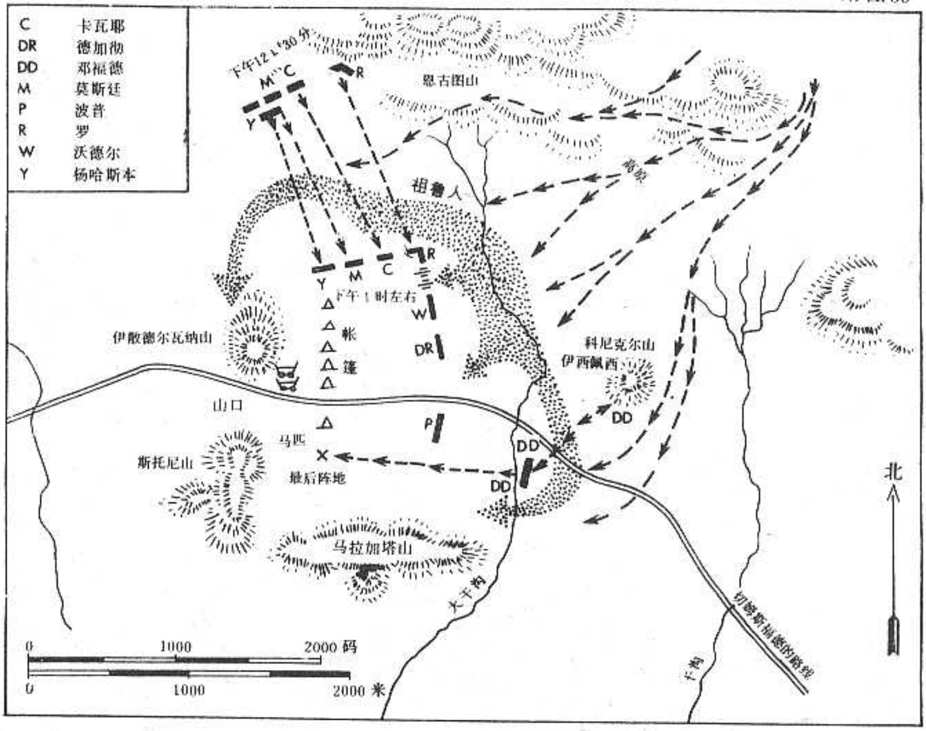



图 39、伊散德尔瓦纳之战(1879 年 1 月 22 日)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1879年1月22日

附图39




伊散德尔瓦纳悲剧发生后不久，切姆斯福德便下令组织一个调查法庭。但是，大多数证据都已在战场上消失，一些关键人员已阵亡，作战命令和笔记本都在战斗中被烧掉，有的也在后来发生的抢劫中丢失了。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找到一个笔记本，其中提到切姆斯福德命令邓福德负责宿营地的指挥；但是，这对战斗的结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切姆斯福德本人及其参谋人员和一些幸存者提供的证据，以及后来诺里斯·纽曼（《旗帜报》战地记者）和参加战斗的一些祖鲁人提供的补充情况，是我们研究这次战斗的唯一窗口。

从上述这些人员介绍的情况来看，很明显有两个严重的失误——宿营地未采取防护措施以及弹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这实际上就决定了这支英军部队肯定要被消灭。如果这

两个问题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祖鲁人的武士部队的进攻是完全有可能被阻止和打垮的。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未能为宿营地提供适当的防护。没有哪一支欧洲军队会象英国军队那样具有在一个敌对的土著人国家里作战的丰富经验。每一座营盘，不论其大小，也不论要驻扎多久，都必须有适当的防护，以免受到突然袭击，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切姆斯福德勋爵在作战开始之前对宿营地的防卫问题作过非常全面的指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没能设法使他的这些指示在伊散德尔瓦纳宿营地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此外，保罗・克鲁格以及另一位有经验的布尔人战士曾明确地提醒过他，需要用四轮货车围成临时防御阵地，需要设法构筑某种沟壕，而且需要向远处派出侦察巡逻兵，因为祖鲁人行动异常迅速而且擅长隐蔽。三个必要条件中的前两条都被置之不理，第三条也只是部分地办到。

用货车构筑适当的临时防御阵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四轮货车排成方形或圆形，车轮用铁链连接在一起，其中的间隙堆满树枝或任何可找到的其它东西。然后就把牛和马小心地拴在车阵内。当然，在伊散德尔瓦纳是不可能构筑这样完美的车阵的，因为四轮货车在白天得赶往罗克渡口拉给养，而第一天夜里到达的货车很少。但是，第二天夜里，宿营地里有大量的货车，而且在战斗打响的那天上午，让它们离开的命令也取消了。可是，谁也没有用它们围作哪怕是部分的防御阵地；货车停在那里，大多数车的牲口都没有卸套，杂乱无章地停在部队的后面。为了减轻这种疏忽大意的责任，一定会有人提出辩解说，用货车构筑一个有效的临时防御阵地，是一件既费时间又费劲的工作，而且切姆斯福德清楚地知道，用这些走得很慢的牛运给养，他的部队要用近 3 个月的时间才能赶到乌伦迪。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防卫手段也被忽略了，或者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

挖掘任何形式的堑壕工事都是困难的，而且要挖也只能挖得很浅；另外，即使有时间，也找不到充足的材料构筑十全十美的防线。但是，在没有伊散德尔瓦纳山作依托的山口一带的防线是可以加强的。可以肯定，警戒哨是设了，骑兵哨也派了，但巡逻距离却不够远；在夜间，除一个前哨外，其余的岗哨都被撤到离宿营地不远的地方。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通常都是首先把帐篷拆掉，因为支着账篷会严重妨碍防御。当普莱恩接到在恩古图山里发现敌人大部队的报告时，他却没有这样做。顺便说一句，这对切姆斯福德决定不回宿营地是有关系的。

当邓福德在上午 10 时赶到时，他不仅带着他的大部分部队策马离去，而且不顾有人报告说祖鲁人在集结兵力，竟然下令第 24 团第 1 营的 1 个连、2 个土著人连和一支巴苏陀骑兵出去执行侦察和警戒任务，这样就进一步分散了守军的兵力。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来保卫宿营地。但是，他至少还是派了一个土著人步兵哨到伊散德尔瓦纳山顶上去观察敌情。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也被忽略；很明显，这是一个最好的观察哨。

在调查法庭上以及后来的一些时间里，有人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诸如第一天部队太疲劳，无法构筑防御工事；宿营地本来只是暂时作为补给站；该死的是，没有想到附近会有祖鲁人的武士部队。这些借口中没有一个能为这种渎职行为开脱罪责。切姆斯福德、普莱恩和邓福德都应该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尤其是邓福德，人们总以为他非常了解祖鲁人，知道祖鲁人行动迅速，善于出其不意，因而一定会对他们高度警戒，采取全面的严密防范措施。

未能补充后备弹药，显然同未能形成严密防御有关系。伊散德尔瓦纳之战后，祖鲁酋长们曾谈到，英国士兵连续不断进行的有效齐射对他们的决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战线

曾一度动摇，有些领导人开始认为战斗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当英军火力因为缺少弹药而减弱的时候，他们又振作起精神来了。普莱恩的部队在四轮货车前几百码的地方进行战斗，如果组织得当，本来是不会影响弹药供应的，因为有许多搬运人员可运送弹药箱，尽管防线长达 300 码，运送补充弹药比较困难。但是，即使有充足的弹药，其结果可能同样是失败。因为，在持续不断的致命火力的打击之下，祖鲁人的“胸膛”(主力)即使有可能被压制住，但是，正在迂回过来的两个“角”也会把守军击溃的。

然而，如果普莱恩一发现有危险时就拆除帐篷，组成一道较短的防线，背后主要以山作依托来进行防守，并利用近在身边的四轮货车提供充足的弹药，那么，祖鲁人的进攻差不多肯定是会失败的。这就是切姆斯福德后来说的他曾希望普莱恩去做的事情；这也许是普莱恩本来能够做到的事情，如果他接到明确的命令而且不为困难(其中一些困难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所困扰的话。

但是，不管防守有多么严密，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弹药补充，防守也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当时负责宿营地指挥的普莱恩必须对这个失误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四轮货车上堆放着大量的成箱弹药。不过，弹药箱都被铜带和 6 只螺丝钉牢牢地封住。似乎只有两位军需官带着螺丝刀。本来已正式申请进一步补充弹药，但是，单据在纳塔尔时就出了偏差。从火线上派回去的士兵迅速地撬砸铜封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

在战斗进入自热化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一位军需官模范地“忠于职守”的事情：在史密斯·多林终于撬开了一个弹药箱并企图向非常吃紧的第 24 团第 1 营部队赶运弹药时，第 24 团第 2 营的军需官却强烈抗议他撬开了属于他们营的一个弹药箱，说这完全是违反规定的，因为他没有提交申请批准单！最后，所有这些弹药都被祖鲁人拿走了，连签名都不用签；

祖鲁人还拿走了许多能使用这些弹药的很好的步枪。

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情况判断错误、随第 3 纵队一起投入战斗的高级军官的误解以及未能向作战部队提供弹药，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 伊散德尔瓦纳发生的实际上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它是因人为的失误而造成的。在大英帝国鼎盛的那些日子里，英军中的一些军官总是坚定地认为，土著人的部队，无论多么强大，是不可能打败他们那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的。甚至连印度的兵变都未能把这种虚幻的翳影从他们的眼睛中除去。伊散德尔瓦纳进行的战斗是漫不经心的：命令正确地下达了，却没有认真地保证命令得到切实的执行。这个灾难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指挥官无法控制的行动，而是因为有人不服从命令，漫不经心，尤其是骄傲自满。这是指挥官失误的一个实例。

## 第 21 章、坦嫩贝格战役(1914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

1914 年 8 月 28 日，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发出了追击被打败的俄国第 2 集团军的命令。他在命令中将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弗罗根瑙的名字用作该战役行动的名称，因为他的司令部当时就设在该镇。但是，他的高级参谋马克斯·霍夫曼上校认为，使用附近的坦嫩贝格镇的名字可能更为合适。鲁登道夫表示同意，他后来也对这个绝妙的想法大加赞扬。这样，这场被证明是“此次战争中任何一方都从未遭受过如此惨败”的战役就以坦嫩贝格战役闻名于世了。1410 年，条顿骑士团在此几乎被立陶宛和斯拉夫的游牧部落全歼，而 500 年后的今天，德意志人给了俄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又赢回了荣誉。

在 1914 年的那场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中，欧洲大国为了

应付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已经制订、修改和批准了种种计划。在这些计划中，最有远见的当然是由伯爵冯·施利芬将军在他任德军总参谋长时制订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被接替他的负有盛名的冯·毛奇上将作了破坏性的修改，这对协约国来说是件幸事。施利芬的计划是一个两线作战的计划：首先在西线发动主攻，同时在东线进行牵制行动，直到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进攻取得全胜，才对俄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法俄联盟从 1892 年起就有了，从那时起到 1913 年最后一次会议召开，两国的总参谋部起草、交换和修改了一系列计划。法国人煞费苦心地想使眼睛紧紧盯着奥匈边境的俄国人相信，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德国人，打败了它，奥地利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首先在西线打败德国人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俄国人应该对德国构成足够的威胁，以便把德国军队牵制在东部边界上。俄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俄国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发布动员令后部队的组建问题。他们发现，要在动员后的 15 天之内就把部队集结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交通条件很差，而且部队最近刚刚经过整编；何况，这已经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 12 天。法军在动员后的第 11 天才能够出发，而德国人要快些，这样，对西线的法军来说，他们的动员时间与德军的动员时间存在着危险的差距。为了援助他们的盟国——这是他们当时和后来都很明确的事情——俄国人在动员后制订的计划中，同意用 2 个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对德军发动进攻。俄国人还同意组成 1 个新的集团军，该集团军将在适当的时候(8 月底之后才能准备就绪)调动到第 2 集团军的左侧，以便向柏林挺进。

这 2 个集团军将组成西北方面军，由日林斯基将军指挥，司令部设在比洛斯托克。第 1 集团军由伦南坎普夫将军指挥，

将在马祖里湖以北向前推进，迂回到敌人的左侧；第 2 集团军由萨姆索诺夫将军指挥，将在马祖里湖以南向前推进，切断并消灭马祖里湖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德国军队。

战役开始的时候，俄国第 1 集团军由 3 个军(第 3、4 和 20 军)组成，并得到 5 个骑兵师和第 5 步兵旅的支援。第 2 集团军由 6 个军(第 1、2、6、13、15 和 23 军，前 2 个军后来调到第 1 集团军)组成，并得到 3 个骑兵师和第 1 步兵旅的支援。这 2 个集团军的兵力分别是 20 万和 25 万，他们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了与他们对峙的德国第 8 集团军。但是，俄军在战前完全缺乏作战准备，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讨论。

除人数外，德国军队在各方面都要强于俄国军队。德军由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下辖 4 个军(第 11、17 和 20 军以及 1 个预备军)以及各种守备部队和第 1 骑兵师。艾恩赛德将军估计，他们与俄军的兵力对比是：步兵为 1：1.7，骑兵为 1：2.7，处于劣势。

这种数量上的劣势，因德军出色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而得到充分的弥补。

德国第 8 集团军有四位杰出的高级军官，他们在稳重的第二任司令兴登堡将军的领导下，共同夺取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参谋长鲁登道夫刚毅自信，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冯·格吕纳特将军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需部长；弗朗索瓦将军是位天才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军长，他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战术成果；总参谋部的麦克斯·霍夫曼上校既思路活跃，思维深邃，又喜欢享乐，自在逍遥。他也许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一位。

与高水平的德国将军相比，俄军指挥官的素质实在很低。日林斯基虽然指挥过 1 个骑兵师，但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搞的是参谋工作，因此并没有得到部属的信任。伦南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曾因在日俄战争中指挥出色而赢得很高的声誉，但

在那次战争中，他们曾互相吵了起来(据说是在一个火车站上)。有人认为这便是伦南坎普夫在这次战斗中与另一位集团军司令官缺乏合作的原因。据说他们俩人的关系在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就已经恶化了。自 1909 年以来，萨姆索诺夫一直在土耳其斯坦任职，已脱离军界多年，而且身体也不太好。伦南坎普夫对他的参谋人员态度粗暴，这使他成了一位不好共事的指挥官。他的拖拉作风是导致俄军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坦嫩贝格战役的战场可以分为 4 个地区。北边是坚固设防的柯尼希斯贝格，对任何进攻部队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而代价昂贵的作战地区。该城的防御工事从勃兰登堡延伸到塔皮奥，再向北到莱奥。这条防线的南面是长约 43 英里的因斯特堡山口，因斯特堡—阿伦施泰因铁路就从这里穿过。这里大部分地区地势开阔，只有罗明登森林算是个障碍。从安格堡到边境地区的约翰尼斯堡有一道马祖里湖湖区防线，其中的几个狭窄通路已被德军重兵把守。这条坚不可摧的湖区防线很容易地便把企图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进攻的俄军部队分割开来。最后，由于俄军为防止德军入侵，蓄意使紧邻南部边境的地区成为废墟，这便增加了他们进攻德军的困难。那片地区大都是些无人问津的森林和沼泽地，只有几条沙质小径可作道路。

日林斯基命令第 1 集团军于 8 月 17 日越过边境，向因斯特堡—安格堡一线进军。伦南坎普夫将动用他的大部分骑兵切断德军左翼与柯尼希斯贝格的联系。统帅部的总计划是要第 1 集团军在第 2 集团军之前向前推进，以便吸引德军，然后由第 2 集团军攻击德军侧翼和后方。因此，萨姆索诺夫定于 8 月 19 日越过边境，他的第一个目标即拉斯腾堡—塞堡一线，离边境大约 43 公里。

这是个很合理的计划，如能有效地付诸实施的话，它定会

使德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但该计划的实施全靠第 2 集团军不失时机地行动，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 2 个集团军都是在补给供应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奉命向前推进的。更糟糕的是，俄军缺乏足够的通信、运输和飞机等作战手段，而所有这些手段对于成功地进行一次集中作战都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这样认为，普里特维茨因集中进攻北面的俄第 1 集团军而落入俄军设下的陷阱。但是，鉴于他手中的兵力比较薄弱，他几乎别无选择。他希望在打败该集团军后能及时把力量投入到南面的进攻中去。他正确地判断出，伦南坎普夫将第一个进入战场，因为他的交通条件优于萨姆索诺夫，而且他知道马祖里湖将切断这 2 个俄军集团之间的联系。因此，他把他的主力集中在左翼，准备以第 1 军、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从北向南排列，向俄军发动进攻。他把第 2 后备旅部署在战线的最左侧，并派第 20 军开到奥特尔斯堡地区保卫德军的右翼。

伦南坎普夫按指定日期于 8 月 17 日越过边界，不久，他的第 3 军就与德军第 1 军接上了火。那天的战斗是在施塔卢波嫩附近进行的，双方均伤亡惨重，进展甚微。17—18 日夜里，德军向贡宾嫩撤退，俄军以缓慢的速度尾随其后，于 19 日傍晚也到达贡宾嫩。他们准备在这里停留一整天(20 日)。德军获悉了这一情报，因为他们最近发现，西北方面军同其 2 个集团军司令官之间的无线通信都是用一种容易破译的初级密码发送的。这一事实令他们难以置信。

指挥第 1 军的冯·弗朗索瓦将军违抗了集团军司令的命令(这种现象并不只是这一次)，在施塔卢波嫩向前推进过远。普里特维茨曾想把伦南坎普夫进一步引诱到西边，在安格拉普河一线与他交锋，但当时迫于弗朗索瓦的压力，并得知俄军止步不前，他极不情愿地决定命令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前进到第 1 军的右翼，并于 20 日发动攻击。

俄国人可能会说贡宾嫩之战是一次胜利，但是，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虽然德军是在当天午夜撤退的，但这是一种为了发动更好的进攻而进行的撤退。如果伦南坎普夫的骑兵部队参加作战，而不是在俄军右翼休息的话，俄军也许会打赢这场战役。俄军这 2 个集团军中的俄国骑兵主要是哥萨克人，由于管理不善，他们几乎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俄军的左右两翼德军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中部，马肯森的第 17 军所发动的进攻遇到了严重挫折，当天下午，该军已被迫后撤了一段距离。然而，只要德军能够重新调整部署——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机会在第二天打败伦南坎普夫。

但是，在 20 日晚，普里特维茨(以及他的参谋长冯·瓦尔德泽将军)却惊慌失措。他似乎对 17 军的失败比对其他 2 个军的胜利印象更为深刻。他还得到消息说，萨姆索诺夫已进一步向西推进，将于第二天越过边境，对德军右翼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他命令集团军脱离战斗，退到维斯瓦河背后。他不理睬格吕纳特和霍夫曼的反对意见，把他的决定用电话通知给毛奇。毛奇(顺便提一下，他原来的命令里也提到过撤到维斯瓦河彼岸的可能性)听了普里特维茨的电话谈话后大为震惊，以致于他未通知普里特维茨就采取行动，解除了他和他的参谋长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那些把战斗引向胜利的部下们的不断敦促下，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重新鼓起了勇气，尽管他们坚持认为应该中止在伦南坎普夫正面的作战，但还是同意了由霍夫曼提出的进攻俄国第 2 集团军的计划。对普里特维茨来说，不幸的是，他没有向最高司令部上报他已取消了向维斯瓦河撤退的计划，尽管这样做是否能够挽救他的命运还值得怀疑，因为毛奇本来就不想让他担任指挥。

霍夫曼提出的打败萨姆索诺夫的计划充满风险，它能否成

功主要取决于伦南坎普夫的行动是否迟缓。他觉得后者已受到严重挫伤，不可能立即恢复进攻；他还认为，萨姆索诺夫构成的威胁最为严重。因此，该计划将大批德军转移到南面和西面：第 20 军调到霍恩施泰因地区，第 1 军调到第 20 军南面的右翼，第 3 预备师、翁格尔的守备部队以及第 70 后备旅也移到第 20 军以南的地区。因此，那里几乎集中了 3 个军，准备投入即将来到的战斗。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都将开赴西线，他们的任务将取决于伦南坎普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结果，伦南坎普夫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甚至让德军从他正面脱身，让他们在距离前线有时仅 25 英里的区域内乘上火车完成了大规模的调动，而他却毫不知晓，更谈不上进行骚扰了。他似乎已确信，一支被打败的德军正在撤退，而他的骑兵部队也没有做任何事使他清醒过来。两天半之后，他以一种非常悠闲的方式开始前进。直到这时，他仍然一点都不知道敌人的去向。他在贡宾嫩战斗之后的所作所为，对坦嫩贝格战役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被解职后，毛奇挑选冯·兴登堡将军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分别任东线德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兴登堡 67 岁，退休已有 3 年左右，但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他身材魁梧，刚强沉着，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而且他最能发挥他的参谋长智慧过人和思路敏捷的优势。

鲁登道夫甚至未与兴登堡见面就被允许发布命令了，他绕过集团军司令部径直向各军下达命令，除了对部队下火车的安排作一些小变动以及选定马林堡而不是米尔豪森作集团军司令部以外，他的命令与霍夫曼发出的命令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下令让各军在新司令到来之前独立掌握部队并打乱了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程序，结果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的司令给他们的部队放了一天假。此时，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这 2 个军将来的行动取决于伦南坎普夫的动向，但

德军有必要尽量远离俄国第 1 集团军，以便向南推进。由于耽搁了宝贵的 1 天，德军不得不以强行军来弥补时间上的损失。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于 8 月 23 日下午到达马林堡。兴登堡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德军在一名被打死的俄国军官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记载着俄军发动集中攻势的详细计划。兴登堡并没有说明这一情报是什么时候到手的，但据推测大概是在他抵达之时得到的。很明显，这份情况的获得使德军司令部对伦南坎普夫的动向没有把握。直到 25 日，根据一份被截获的无线电报，德军司令部清楚地得知伦南坎普夫的行动非常缓慢，因此鲁登道夫决定在其正面只摆上 1 个骑兵师(欠 1 个旅)。

萨姆索诺夫的第 2 集团军最终于 8 月 21 日和 22 日拖拖沓沓地超过边境，这个日期大大落后于预定时间。在日林斯基的严令之下，他的部队未等动员完毕就出发了。由于运输设施不完备，供给体系杂乱无章，士兵缺少食品，而且要在拥挤的沙质小径上行军，部队的情况非常糟糕。集团军司令似乎一点不知敌人的去向；即使知道，他也没有把消息传下去，他的先头部队没有得到正规骑兵的支援。该集团军内部各单位之间几乎没什么配合，2 个集团军之间更谈不上配合了。萨姆索诺夫本应把部队的位置向很少到前沿的日林斯基汇报清楚，但他却没这样做。日林斯基在自己的军队达到较好的战备状态之前一般都拒绝让他们向前推进。

部队在大约 60 英里宽的正面上缓慢地向前推进，因为萨姆索诺夫已改变了日林斯基发来的命令——后者并没有采取行动纠正前者这种违背命令的行为——把部队向左延伸过远，以致只有第 6 军仍在按原计划向塞堡—拉斯滕堡一线推进。他以为姆瓦瓦—索尔道铁路可以缓解他的补给问题，并且抱有向敌侧后迂回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由于过分向左延

伸，他在自己的集团军内部制造了一些大的缺口，而且他同伦南坎普夫集团军之间的距离也拉得更远了。

8 月 23 日，第 6 军到达了奥特尔斯堡，第 13 军到达耶德瓦布诺，第 15 军靠近弗兰克瑙，第 23 军第 2 师到达索尔道东北部，第 23 军的其余部分则返回姆瓦瓦。与此同时，第 1 集团军已向佩莱宁肯—达凯明一线谨慎推进。第 2 集团军的首次重要战斗始于 8 月 23 日晚，并持续了两天。第 15 军的先头部队与德第 20 军在奥尔劳—米哈尔肯一线接触。俄军没有进行侦察，就匆忙与敌人在开阔地展开了战斗，结果整团整团的部队象镰刀下的麦子仆倒在德军的机枪火力之下。第二天，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俄军取得了部分进展。25 日，俄军第 13 军前来支援，对德军左翼构成威胁，德国后备部队打了一场令人佩服的阻击战后撤退了。艾恩赛德将军说，在这次战斗中，第 15 军 50 名军官、2000 名士兵阵亡，但却仅仅丢失了 2 门大炮，只有几个人被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在坦嫩贝格的战绩确实更加令人信服。

在完全缺乏情报的情况下，俄军最高指挥官的无能再一次充分暴露出来。经过这场战斗，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正在向他们的左翼后撤，为了便于追击，他请求日林斯基允许他再次把前进方向转向阿伦施泰因—奥斯特罗德一线。日林斯基犹豫一阵——因为他怀疑(他的怀疑是正确的)萨姆索诺夫是否确实完全了解情况——还是同意了，但要求萨姆索诺夫派 1 个军和 1 个骑兵师掩护俄军在湖区与阿伦施泰因之间的最右翼。日林斯基提出这一附加条件似乎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这一命令意味着把这些部队抽调到距离主力部队大约 30 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使德军可以将他们各个歼灭。因此到 8 月 26 日，第 2 集团军的防线从森斯堡(第 6 军)一直延伸到杰隆(第 6 骑兵师)，其间，第 13 军位于库尔肯附近，第 23 军在斯科陶，第 15 军在弗兰克瑙，第 1 军在乌斯道。第 23 军的 1

个师、2 个骑兵师和 1 个步兵旅归第 1 军指挥，保卫该集团军的左翼。俄军散布在长达 75 英里的战线上。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几乎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德军的集结按计划顺利进行，差不多快完成了。8 月 24 日，鲁登道夫命令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挥戈南进，以攻击俄第 2 集团军的右翼。这是一次经过慎重考虑的冒险行动，因为伦南坎普夫对德军仍是一个严重威胁。直到第二天德军截获俄军一份电报之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才得到证明。德军歼灭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构思简单，但实施的过程却很复杂，因为有许多天然屏障，各军必须各自为战。简而言之，鲁登道夫计划诱使萨姆索诺夫进攻力量稍微薄弱的德军中央(第 20 军的一半兵力)，同时，以第 1 军和第 20 军的另外一半猛攻俄军右翼，以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猛攻俄军左翼或北侧。一旦俄军两翼被清除，德军将以庞大的钳形攻势包围俄军中央。

由于倔强的弗朗索瓦强烈反对鲁登道夫发出的正面进攻乌斯道的命令，这些精心安排的计划在执行中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当时弗朗索瓦的炮兵部队尚未全部到位，因而他极力主张采用间接进攻的办法。然而，鲁登道夫驳回了他的意见。在这场关键的 5 天战斗的第一天，北侧和中央的战斗极为激烈。萨姆索诺夫仍然不知道敌人的行动与企图，他继续向奥斯特罗德—阿伦施泰因一线挺进。他根本不知道在 25 日晚上，德军截获了一份情报，对他要达成的目标了如指掌。在图劳，第 23 军的第 2 师赶走了德军，取得了初步战绩，但在遭到反击后该师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差不多退到奈登堡；第 15 军打得不错，到晚上，他们守住了格里斯利嫩—米伦一线，第 13 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因为电话线被切断，无线电台受干扰，他们得不到明确的命令，因而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回行军。

但是，萨姆索诺夫的灾难出现在北部，他的第 6 军在那里彻底败北，在第一天结束时实际上就已退出战斗。该军处于俄军右翼，十分孤立。一旦鲁登道夫在被截获的情报的鼓舞下集中起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来对付它，俄军第 6 军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即使德军经过长时间的强行军已疲惫不堪，但德军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然而，俄军打败仗更应归因于他们缺乏情报以及一位师级指挥官对情报错误的理解。由于出现这种情况，第 6 军军长发出命令后又收回成命，结果使得 2 个师在达代湖周围同德军的侧翼运动可怕地缠在一起，他们向比绍夫斯堡的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了向奥特尔斯堡的溃逃。在溃退时，俄军的队伍有时前后拉开 20 英里。

8 月 27 日和 28 日，德军与俄军的第 1 军在乌斯道周围交战，这是这场战役的最关键的时刻。从清晨时分起，双方的炮兵就开始了对攻，结果德军的炮火压住了俄军的炮火。到傍晚时分，德国步兵猛攻乌斯道，他们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因为那些在炮战中幸存下来的半饥半饱的俄国士兵已没有情绪作战了。到第 2 天上午 11 时，第 1 军被粉碎，通往奈登堡的道路已畅通无阻。然而，俄 23 军的第 1 步兵旅从索尔道南部意外地发动了反攻，并在海因里希斯多夫地区取得初步的成功。为此，弗朗索瓦不得不停止向奈登堡进军来恢复战场的态势。

到 27 日夜里，俄国第 1 军剩下的兵力——各个师来的大约 5 个团，外加 5 个炮兵连——占领了索尔道以北的阵地。28 日清晨，弗朗索瓦发布一系列命令，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赶到南面去并使其退出战斗，但是俄军没等德军采取行动就撤退了。这时俄军左翼已暴露，中央很容易被合围。然而；对德军第 20 军来说，中部的情况并不太好，鲁登道夫害怕防线被突围，竟一时慌了神，命令弗朗索瓦全军向北挺进，到拉纳去支援中部的战斗。但是弗朗索瓦意识到断敌退路的极端

重要性，出于对任何他不赞同的命令都满不在乎的性格，他继续按原定路线行军。到第二天，他所在的军已经切断了俄军南逃的路线。

8 月 27 日，中部的战斗仍然很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俄军第 15 军冲入了德国第 20 军的阵地——这促使鲁登道夫向弗朗索瓦下了增援的命令。但是到了晚上，第 15 军已被牵制在海登米尔—瓦尔斯多夫—米伦一线。当在他们左边作战的第 23 军第 2 师差不多被赶回到奈登堡的时候，第 15 军的左翼危险地暴露出来。

第二天，鲁登道夫命令第 17 军和第 1 预备军停止追击被打败的俄第 6 军。而转向西南进攻位于中央俄军右翼的第 13 军。该军军长克留耶夫将军正从阿伦施泰因向霍恩施泰因行军去支援第 15 军。整整一天，他的军受到来自北部和东北部敌军的攻击，到黄昏时，第 13 军还没有拿下霍恩施泰因，也无法同第 15 军取得联系。

俄国第 2 集团军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总的来说，该集团军的士兵在近乎断粮的恶劣条件下表现得非常英勇，但现在，他们再也挺不住了。一贯糟糕的通信联络实际上已经中断，各军指挥官之间失掉了联系，每个军都对自己正面和两翼的情况一无所知。

萨姆索诺夫曾前往第 15 军军长马尔托斯将军那里与之探讨形势，马尔托斯是他唯一真正出色的高级指挥官。马尔托斯极力主张他趁为时不算太晚时赶紧撤退．但萨姆索诺夫不同意，因为他觉得，如果能占领奈登堡，战局还是可以得到稳定的。但这是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他很快不得不改变这一想法。8 月 29 日和 30 日，德国 3 个军向俄军中央发动了强大攻势，毫不留情把他们赶到正等着他们的弗朗索瓦部队阵前。弗朗索瓦的军已封锁了俄军沿奈登堡—维伦贝格一线撤退的道路。

萨姆索诺夫终于明白了他的集团军正处于惊人的灾难之中，因此他在最后一道命令中指示第 13、第 15 和第 23 军夺路返回霍热莱和亚诺夫。他派马尔托斯侦察奈登堡周围的阵地(经过一番扣人心弦的冒险之后，他最终还是在那里被俘了)，并派克留耶夫将军统一指挥这 3 个军。第 15 军和第 23 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后卫战斗，试图突破米沙肯和维伦贝格之间的警戒线，但是，德军用机枪封锁了森林的所有通道。8 月 31 日，这些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士兵大部分都在雷特科文附近投降了。

俄第 13 军行军路线最长，经历的战斗也最艰苦。他们在人马没有任何粮秣可用，疲劳程度超出人们想象的情况下，花了 40 个小时在沙质小路上行走了 42 英里，直到精疲力竭之后，3 个纵队中的 2 个纵队来到了乌斯赞内克。他们在这里挖壕固守，在 8 月 30 日至 31 日的一整夜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他们终于在 8 月 31 日投降了。

该军的右路纵队要走运多了，因为在 30 日，俄国第 1 军的残部(德军以为该军已被他们全歼)从硝烟中爬起来对奈登堡进行了最后一次冲击。虽然他们占领该城的时间很短，并且不久就被弗朗索瓦派来的保卫森林通道的德军部队赶走了，但由于反攻引起的混乱，第 13 军右路纵队的几千名俄军却得以越过边界，化险为夷。他们和在维伦贝格附近突围的第 15 和第 23 军的两支领导有方，意志坚强的部队，差不多是仅存的从德军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俄军中央部队。

这样，俄国第 2 集团军在越过东普鲁士边界不到 10 天的时间内实际上已被歼灭，它那倒霉的司令官知道自己已被打败，并将名誉扫地，悄悄地溜到密林深处开枪自杀了。我们不知道俄军伤亡的详细情况，但俄军的伤亡确实非常惨重。德军声称他们抓了 9.2 万俘虏，打死了 7 万俄国士兵，缴获和破坏了俄军的所有大炮和运输工具，而他们自己仅伤亡了

1.5 万人。

伦南坎普夫并没有努力支援被打败的萨姆索诺夫，而是依然在韦劳—盖尔道恩—安格堡一线缓慢地，无精打采地行动。他的末日也即将到来。在后来的马祖里湖战役中，他被赶出了东普鲁士，并损失了大约 6 万名士兵和 150 门大炮。

坦嫩贝格战役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协约国曾对俄国这台“蒸汽压路机”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俄军第 2 集团军的迅速崩溃给协约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它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场大战将是一场持久的，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俄军入侵东普鲁士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它对西线战事的影响，它很可能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当普里特维茨感到恐慌的时候，毛奇决定大力增援东线德军，尽管鲁登道夫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必要。最后，德军统帅部从驻德国的右翼德军集团中抽出了 2 个军和 1 个骑兵师前往俄国参加马祖里湖战役。俄国人和法国人都说，这使德国人失去了在马恩河战役中取胜的机会，从而拯救了法国，甚至毛奇也承认，从重要的右翼抽出这些部队是个严重错误。我们很难确定德军削弱俄军的战争能力的计划是否拯救了西线的协约国军队，但是，德军在东线的胜利肯定助长了德军向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早日结束东线战事的野心，从而减轻了德军对西线协约国的压力。

图 40、坦嫩贝格战役(1914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

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26日至30日

附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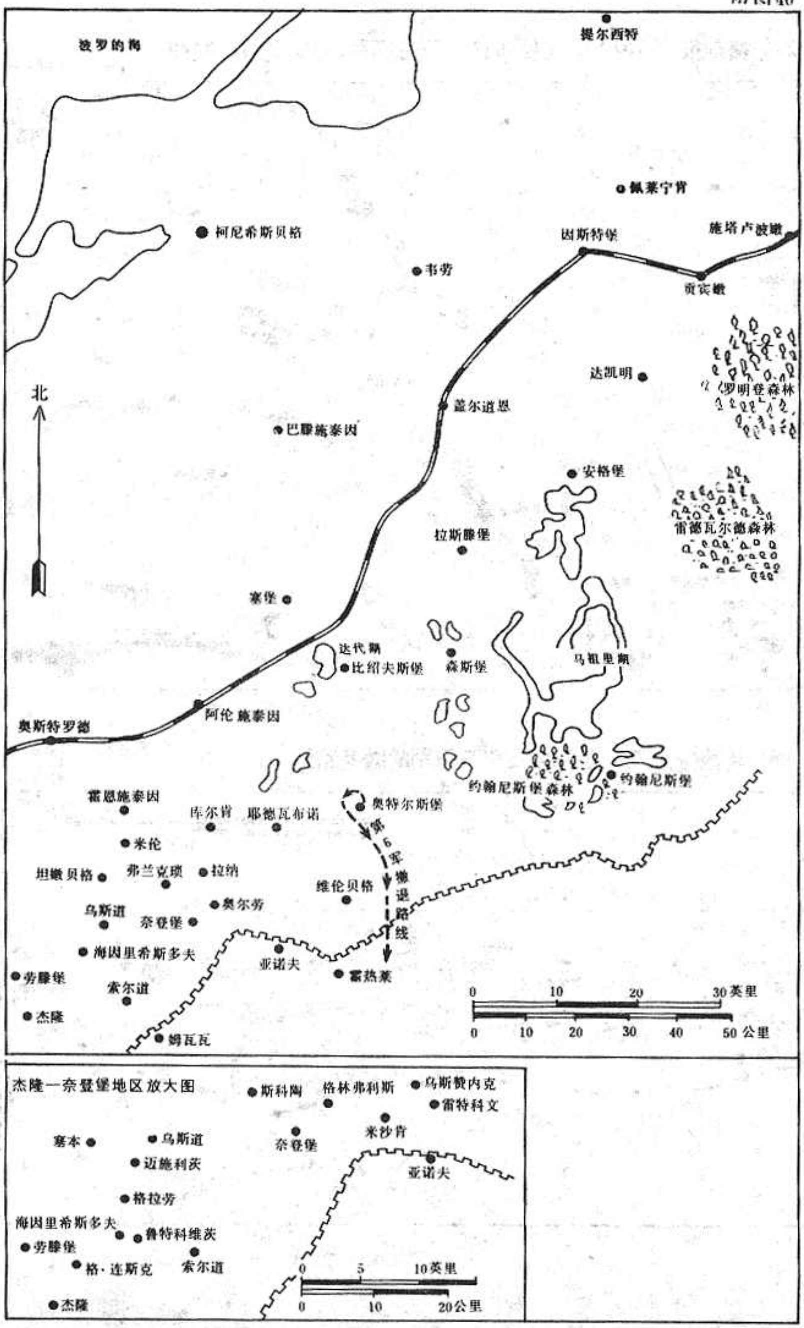


图 41、坦嫩贝格战役(1914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德军对俄军左翼的攻击)

坦嫩贝格战役：1914 年 8 月26日至28日德军对俄军左翼的攻击

附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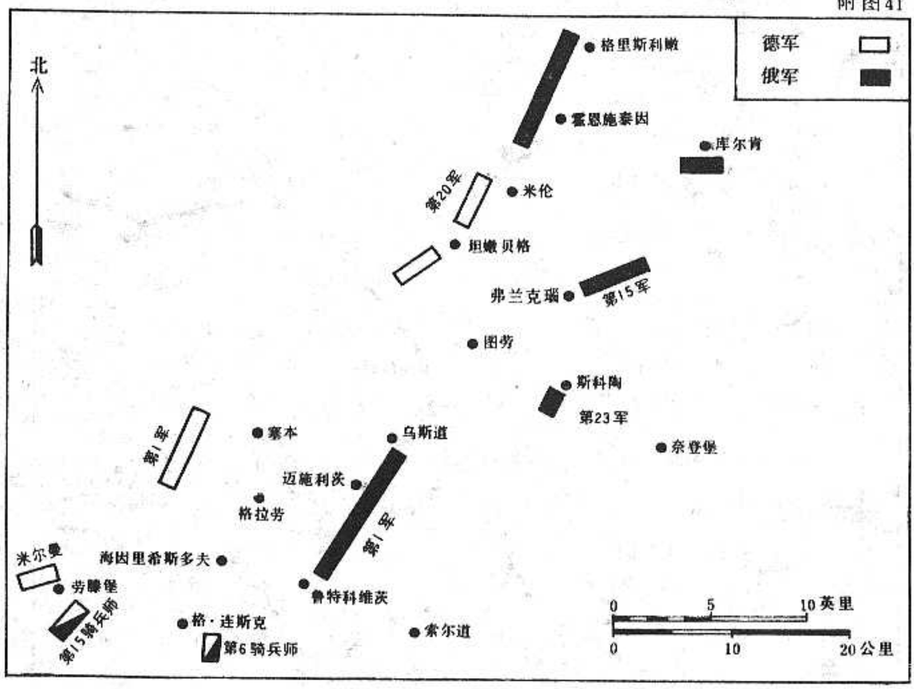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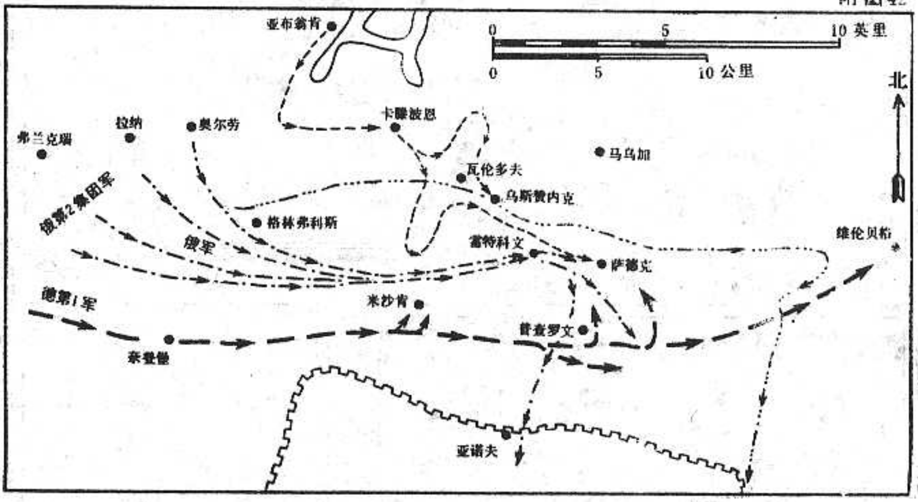



图 42、坦嫩贝格战役(冯·弗朗索瓦切断俄军的撤退路线)

坦嫩贝格战役：冯·弗朗索瓦切断俄军的撤退路线

附图42




导致俄国第2集团军在坦嫩贝格失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俄军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俄军指挥官无能；伦南坎普夫没有参战；弗朗索瓦所部在乌斯道之战及其之后实施了巧妙的战术机动。

从动员的那天(7月31日)起，俄国的时间安排就有问题。俄国几乎没有可能兑现其作出的在动员后15天之内向德国推进的承诺。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况从它那可怜的无法迅速发展的工业能力上就可反映出来。它的各个交通部门(公路、铁路、水路和车辆)的状况以及它的无线电通信能力都远远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军事大国的需要。

它的军队也远远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准。10年前发生的那扬灾难性的战争[扫校者注：指1905年日俄战争]已经暴露了俄军的很多弱点，而这些弱点也只是部分地得到了纠正。俄军士兵都是从不同民族招募来的农民，如果领导有方，他们作战会很勇猛，但他们几乎没受过教育，缺乏主动性。俄军缺乏足够的，长期服役的军士对服役3年的新兵进行适当的训练，而军官阶层(尽管最近已经在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的素

质也是很成问题的。团级军官的培训很不充分，因为他们充其量只在参谋学院培训过，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参谋部工作几年后便到了团级岗位上，这样，他们在人员管理上没有什么经验，更谈不上有什么领导能力了。在俄军许诺的动员后第 15 天就投入作战的 80 万人之中，有 30 万人是未接受过什么训练的后备役军人。

如果说俄国军队的条件总的来说就很差的话，那么，第 2 集团军的条件尤为悲惨。整个集团军的运输和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某些军的情况更为糟糕。比如第 23 军，他们在越过边界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运输工具，部队不得不依靠征用的车辆和农夫搬运弹药和军需品，或者向情况稍好的友邻部队借用。部队被调往前线时没有配备战地面包房，再加上铁路和公路的交通状况极为恶劣，集团军部不得不向这些部队发出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命令。

萨姆索诺夫的参谋部是由一群以前从未见过面，更谈不上共过事的军官匆匆组成的，包括参谋长在内的原司令部的许多人员已被调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大量的新兵都是刚刚报到，不但没有时间进行训练，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恰当的管理。该集团军几乎没有通信部门。就高层领导来说，萨姆索诺夫没有和伦南坎普夫建立起直接联系，整个战役期间，日林斯基也没有向萨姆索诺夫提供恰当的情报。即使有少得可怜的通信设备，操作员也大都缺乏训练。由于没有把密码传送到各军，俄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和情报不得不用明码电报发送，因而常常被敌截获。

下级军官曾向他们的军长，军长曾向集团军司令呼吁，把部队出发的日期推迟 6 天或至少 4 天，但萨姆索诺夫不理睬他们的呼声，因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在部队尚未作好准备，供给情况一团糟的情况下，萨姆索诺夫就让他的集团军投入了战斗。诚然，时间是实施计划的关键，而且第 2 集

团军肩负着给德军以决定性打击的重任，但是，如果让部队在缺少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进军，达成上述目标是不可能的。

日林斯基错误地估计了行军地区的条件和第2集团军的状况，而萨姆索诺夫既没有纠正他的想法，也没有设法修改进军时间表，结果，第 2 集团军没有按时越过边界，并且，他们在似乎从未到过前线的日林斯基的无理催促下吃尽了苦头。必须指出，推迟一个星期出发未必就能极大地减轻俄军的灾难程度，俄军的不足之处太多了，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全克服掉，不过，如果准备得充分一些，士兵就会有更多的生还机会。

有人认为，尽管俄军在除人数之外的各种条件上均不如德军，但俄军仍有可能打败德国第 8 集团军。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根据鲁登道夫的看法，伦南坎普夫就成了这场战役的关键人物。

第1集团军的参战基础要比第2集团军好得多。伦南坎普夫的参谋人员和部队大都是从维尔纳军区抽调来的，维尔纳军区是伦南坎普夫战前任司令官的军区，因此他们曾在一起共过事，共同制订过计划；该集团军的后勤系统虽然还不完备，但依靠萨姆索诺夫那里所没有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仍能正常运行。然而从一开始，伦南坎普夫的行动就非常拖拉，他花了9天时间才到达第一个目标(因斯特堡—安格堡一线)，而此地距边境只有38英里。

伦南坎普夫自认为他已赢得了贡宾嫩一战的胜利，从他的确已经阻止德军取得他们所指望的决定性胜利。并使他们撤退这一点上看，这是不错的。然而，德军并没有被打败，这点是毫无疑义的。就在应该趁机扩大战果的关键时刻，伦南坎普夫却在两天半时间里按兵不动。另外，他未采取行动查明敌军的去向，而是完全沉浸在德军正全线撤退的喜悦中。根据他的报告，日林斯基也相信了德军正在全线撤退。后来，

我们从他的一名参谋那里得知，由于深信第 2 集团军的前进时间已经推迟，他害怕把敌军赶得过远会打乱第 2 集团军断敌后路的计划。鉴于他从未与第 2 集团军取得联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不着边际。不管怎么说，这不能成为他与正面德军脱离接触，而且对此后的战役形势一无所知的理由。

8 月 26 日，第 1 集团军终于到达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区。此时，对于伦南坎普夫来说，事情并未由此变得简单一些，因为日林斯基(他在这场战役中从未对形势有过切合实际的理解)根据他对德军行动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日林斯基相信那些在贡宾嫩被“打败”但并未在柯尼希斯贝格要塞停下坚守的德军将撤往维斯瓦河，因此，他命令伦南坎普夫用 2 个军的兵力封锁柯尼希斯贝格，由该集团军的其余部队追击撤往维斯瓦河的德军。

直到 8 月 27 日，也就是在鲁登道夫冒了极大的风险在第 1 集团军的正面仅仅摆了两个骑兵旅后的两天，日林斯基和萨姆索诺夫仍然认为，伦南坎普夫仍同从贡宾嫩撤退下来的德第 8 集团军的一部分保持着接触，他们全然不知巨大的危险正在从北方向他们逼近。

同一天晚上，日林斯基命令伦南坎普夫将其左翼向巴腾施泰因靠拢，将他的骑兵向比绍夫斯堡运动，以便与第 2 集团军相配合。他似乎并不知道萨姆索诺夫已向西偏离到何种程度，认为他还在往北推进；他也不知道该集团军第 1 军和第 6 军的失败情况。但此刻他至少已意识到第 2 集团军需要第 1 集团军的支援，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或紧迫感。而伦南坎普夫却仍在从容不迫地往南推进，直到 8 月 29 日晚他仍未与敌人接触。

霍夫曼认为，尽管到这个时候伦南坎普夫已经来不及挽救萨姆索诺夫的厄运，但他仍有可能对战斗的进程施加某些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可能性，德军曾考虑把几个师调动到阿勒

河彼岸，但结果证明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有时人们认为鲁登道夫的包围行动事先没有计划好，但鉴于伦南坎普夫似乎甘愿做一个旁观者，这种包围行动便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冒险。德军整个作战行动能够成功皆因伦南坎普夫行动不积极。鲁登道夫在书中写道，“当战斗真正开始时……伦南坎普夫那气势汹汹的部队好象是一片即将来临的雷雨云，挂在东北方向的天空上。他只要逼近我们，我们就会被打败”。尽管这种说法同霍夫曼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它却清楚地指出了伦南坎普夫本来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有一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伦南坎普夫竟允许俄国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遭到覆灭而不去救援它呢？霍夫曼上校几年后在书中写道，他坚信伦南坎普夫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对萨姆索诺夫的敌意，尽管他没有料到他的不积极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伦南坎普夫与萨姆索诺夫在中国的满洲曾有过激烈争吵，两人最终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相互殴打起来。在弥留之际，霍夫曼还对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说，“如果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运动场上打胜的话，那么，坦嫩贝格战役则是在沈阳火车站的站台上打败的。”

说伦南坎普夫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即使是俄军将领)竟然不惜以民族灾难为代价来报 10 年前的私仇，这似乎有点太牵强了。更大可能性是，伦南坎普夫已不再胜任他的工作，他已老朽，过分自大，并且被日林斯基对他的不断干扰弄糊涂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霍夫曼说服鲁登道夫对俄军实施包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霍夫曼深信伦南坎普夫决不会支援萨姆索诺夫，因此，他告诉鲁登道夫，德军的包围行动将非常安全。

“8 月 27 日上午，西部地区的战斗因弗朗索瓦将军在乌斯道实施突破并扩大了战果而决定了胜负。”这是霍夫曼在谈论弗朗索瓦违背上级命令并成功地采取了一次关键性的行动时

所下的结论。当时，在俄军的左翼，阿尔塔莫诺夫将军的第1军从8月24日以来就已占据了乌斯道—迈施利茨—鲁特科维茨一线。第6骑兵师到了格连斯克，第15骑兵师监视着劳腾堡。阿尔塔莫诺夫在塞本和格拉劳向前沿调兵。他根本不知道德军即将发动进攻，因而从其右翼(此处特别易受攻击，因为这儿与第23军最邻近的部队之间有一个将近7英里宽的缺口)抽调兵力，以便向他唯一知道的，驻在劳腾堡的德军发起进攻。

25日，弗朗索瓦的第1军在离阿尔塔莫诺夫的主阵地仅一天路程的地方下了火车，而阿尔塔莫诺夫的50个骑兵中队竟没有1个中队知道这一情况。鲁登道夫给弗朗索瓦的命令是在26日清晨发动进攻，拿下乌斯道，但弗朗索瓦仍缺少炮兵部队，因而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就绪。然而，鲁登道夫仍坚持原来的命令。但是，弗朗索瓦是这样一位将军：如果他认为上级的命令不正确，便决不拿自己的部队去冒险。所以，尽管他在26日发动了进攻，但他并没有全力以赴；塞本于当天正午攻下。阿尔塔莫诺夫对驻守在劳腾堡的米尔曼第5后备旅发动的进攻完全是瞎胡闹，弗朗索瓦的部队很快就把它击退了。

经过这2次胜利之后，德军的防线已经推进到海因里希斯多夫—格拉劳一线。鉴于部队疲惫不堪，又缺少大炮，弗朗索瓦和他的先头师师长冯·康塔决定把对乌斯道的进攻推迟到第二天。霍夫曼非常肯定地认为，弗朗索瓦拒绝在26日发动进攻是俄国第2集团军全军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在炮兵未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弗朗索瓦的进攻很可能会失败，这样，萨姆索诺夫就有时间在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把他的集团军撤出来。

弗朗索瓦命令他的炮兵于27日上午4时开始炮击乌斯道，他的第1师和第2师将于1小时后发动围攻。但是，如前所

述，士气低落的俄国步兵尽管有极好的防御阵地，却没有坚持战斗，德军第 1 军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拿下乌斯道之后，弗朗索瓦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独立性，只是在他再次违令之后，中央俄军的命运才最后被决定了。

德第 20 军曾一度遇到俄军的猛烈进攻，鲁登道夫一时惊慌失措，命令第 1 军改变方向向北进军。但是，弗朗索瓦不顾第 20 军可能面临的危险，仍把眼睛中牢盯在奈登堡—维伦贝格公路以及通往森林的各条小路上。他知道切断俄军逃跑的必经之路将给俄军带来灾难性的结局。因此，他命令部队继续向东推进，封死合围圈的缺口，把萨姆索诺夫的残兵败将紧紧包围起来。

违抗命令，实难宽恕，但如果一位高级军官从不冒险，只顾保全名誉，那么他就可能坐失良机。弗朗索瓦就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出色战将，而且令他的上级无可奈何的是，他所坚持的东西往往都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鲁登道夫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完全是弗朗索瓦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两次拒不从命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弗朗索瓦的两次抗命，鲁登道夫是不会取得如此彻底的胜利的。

坦嫩贝格战役是一次由高级指挥官的性格和个人表现决定胜负的战役。毛奇撤换冯·普里特维茨几乎肯定没有做错，因为后者失去了主动权，失去了参谋人员的信任和争取胜利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队的士气要不了很久就会一蹶不振。上了年纪的兴登堡与比较年轻的鲁登道夫搭档，真是珠联壁合，令人鼓舞，前者发挥威信，后者表现职业特性。不仅如此，鲁登道夫、他的参谋军官霍夫曼以及他的第 1 军军长冯·弗朗索瓦，都是随时准备支持他们作出的判断并勇于承担风险的人物。

俄军将领们的表现则相形见拙。方面军司令日

林斯基既不能激发人们的信心，也很少出现在前线，两位集团军司令也不愿进行配合；总之，他们年事已高，力不胜任。诚然，由于体制落后，他们的后勤供应严重不足，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的事实，即他们在战略战术的应用上远远赶不上德军将领。

## 第22章、华沙之战(1920年8月)

华沙之战就其实际过程而言，并不是一次很大的战役，但对欧洲文明来说，它可能比本书所描述的任何战役都更为重要。在经历了4年可怕的战争浩劫之后，许多中欧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莫斯科的影响，正酝酿着一场革命。在过去的1683年，波兰人曾为拯救欧洲出过力，而现在，1920年8月，波兰人再次拯救了欧洲。

这次波兰的获救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的确，他本人的历史，概括来说，就是波兰人在遭受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等王朝100余年统治后争取复兴的历史。毕苏斯基1867年12月生于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父母均为立陶宛人。他的家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国家事务中世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毕苏斯基为了实现波兰独立这一强烈愿望，成了波兰社会党的杰出成员，而且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在沙皇监狱里被监禁了多年，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许曾涉猎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决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爆发时，毕苏斯基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他迅速率领一小股游击队越过了俄国边界。不久他就组建了一支波兰民族军队。最初他通过步兵俱乐部秘密地进行活动。被授予准将军衔后，他开始公开活动，在奥地利人的指挥下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战斗。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中，由于拒绝同德国人合作(因为他相信

德国对波兰始终另有所图)，他被监禁在马格德堡。1918 年 11 月，他回到华沙，成了唯一受军民共同尊敬的显赫人物。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摄政委员会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他。不久，他解散了摄政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府，并向全世界宣告了波兰的独立。

毕苏斯基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在这段时期里，他生命的主要动力就是波兰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可以使自己变得冷酷无情，粗鲁暴躁，行踪诡秘。他做好了冒可怕危险的充分准备，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战争上。他是战士，是一位勇敢非凡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守旧的指挥官。他的目标是将波兰的边界推回到 1772 年时的地方，即向东推进到基辅和第聂伯河。他非常清楚，一旦俄国内战结束，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打败布尔什维克红军。

因此，他在 1919 年 4 月率领部队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而且非常成功的攻势。到 4 月底，他已占领了维尔纳。5 月，他率领 5 万军队一路奋战通过了加利西亚，并于 7 月 17 日抵达兹布鲁奇河。8 月 10 日他攻占了明斯克。所有这些战绩都是由一支刚刚组建的军队取得的，因此更值得人们称赞。虽然发生了一些激烈战斗，但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人并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这就使毕苏斯基错误地相信，他的敌人不久将被赶跑。

在 1919 年岁末和 1920 年年初的几个月内，波兰和苏俄进行了和平谈判，但谈判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为波兰人的目标是恢复 1772 年的边界,而布尔什维克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1920 年 4 月，外交活动突然中断，原因是毕苏斯基在西南方向重新发动了攻势，使其部队到达了基辅。但是，此时他的战线已长达 1000 公里。由于普里佩特沼泽的阻隔，波军之间的横向联络已经中断。波军远离基地，缺少各种补给品，其中也包括马匹。俄国人准备全线反攻，因为此时苏联红军已

经击败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白俄军可能造成威胁的只剩下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了)，他们能够集中更多的部队到西部和西南部战场作战。

俄国军队的总司令是加米涅夫将军。他的意图是在被普里佩特河一分为二的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河北侧的俄西方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指挥，这些部队包括第3、第4、第15和第16集团军以及加伊·汗的第3骑兵军。普里佩特河南侧的俄西南方面军由叶戈罗夫将军指挥，这部分俄军包括第12和第14集团军以及由布琼尼将军指挥的一支加强的骑兵部队。在波兰方面，与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对峙的是波兰第1和第4集团军(其余部队正在维尔纳组建)。普里佩特河以南的三支波兰军队是波兰第2、第3和第6集团军。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为，俄军约18万人，波军约12万人。相比之下，毕苏斯基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河北岸更是如此)。波军没有骑兵，武器装备也差。

1920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洛杰奇诺方向发动进攻，但失败了。可是在南面(基辅附近的居民非常敌视波兰人)，布琼尼率领一支顽强的哥萨克骑兵大部队，在第12集团军的支援下，几乎将波兰第3集团军合围。波军虽然设法杀开了一条血路，但已被赶到兹布鲁奇河的另一侧，向利沃夫败退。在这种情况下，毕苏斯基将左翼部队撤出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乐意看到的。

俄国人在7月份的推进从任何角度来衡量都是一次杰出的表演。从一开始，他们就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华沙及其附近地区的波军士气被巧妙地瓦解了。俄军袭击败退的波军，侧翼包抄，涉水渡河，占领城镇。在30天的时间内，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向前推进了300英里，几乎到达了华沙的大门口。在这些得胜的士兵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力图与军队保持联系的运输补给队，他们由3.3万余辆农用手推车组成，驾

车人主要是当地人。

在8月的第一周，波兰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从华沙以北到登布林，他们的部队已被赶回到了维斯瓦河。俄军已把战线推进到从登布林沿维普日河到扎莫希奇和利沃夫一线。华沙桥头堡仍掌握在波军手中，守卫在这里的部队从左到右依次是第5、第1和第2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共有8.4万名士兵；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维斯瓦河正好在华沙以北折向西去，守卫莫德林、普沃茨克以及部署在弗克拉河沿线的波军左翼部队已被暴露，处境危险。第4集团军在登布林附近布防，第3集团军在登布林的南面和东面布防，第6集团军在利沃夫以南布防，而第7集团军则还在南方的加利西亚。8月初，包括毕苏斯基在内，几乎没有人相信华沙还有获救的希望。一旦堤坝决口，迅猛的洪水定将汇成滔天的巨澜。

然而，仍有光明之箭刺破这忧郁的夜幕。波兰人以艰苦的努力收容掉队的士兵，整饬部队的纪律。由于悬在人们心头的威胁越来越大，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士气也随之提高，内部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被暂时放在了一边。华沙桥头堡被精心部署并得到43个炮兵连的保护，普沃茨克、莫德林和登布林的要塞也能对图哈切夫斯基部队实施坚固防御。

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他的部队推进得太迅猛，已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意味着他要么继续前进，要么挨饿，他不可能等候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当波军的士气越来越高昂时，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他的部队中并不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许多人是被强征来的农民。由于不得不向西南方面军增援，西方面军的俄军力量已被削弱。布琼尼将军带领的西南方面军是一支不甚合作的部队。弗兰格尔的部队也从克里米亚打了过来。

还有一个因素无疑也起到了支持波兰人的作用(尽管波兰人并不总是这样认为)，这就是英法代表团在华沙的存在。1920 年 6 月底，波兰政府请求伦敦和巴黎在危急时刻给予积极的支持。劳埃德·乔治先生和米勒兰先生不久便同意派一个英法外交军事代表团赶赴华沙。该代表团的三项任务是：向各自政府报告和平谈判的有关事项；向波兰人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为波兰人安排军需品的供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拉德克利夫将军和魏刚将军。

8 月初，交战双方为了达成令人满意的媾和条件作了各种努力。波兰人与俄国人在一个叫巴拉诺维奇的地方进行了会晤，接着又于 8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明斯克进行了会晤。但是处于优势的俄国人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决心使整个世界改变意识形态。列宁认为这一目的可以在和平条件下实现，而托洛茨基(当时的军事部长)认为用布尔什维克的刺刀能更快地实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因为俄国人向波兰人提出了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

魏刚将军是代表团中的主要军事成员，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毕苏斯基对劝告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补给品的兴趣，而当时补给品并不容易搞到，因为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拒绝把援助波兰的军需品装上火车。但泽港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那里指挥部队的英国军官果断地分配了劳力，卸下了一些补给品发往波兰。

在军事代表团中工作的每一名成员都深深地体会到，容忍、耐心、持之以恒的美德是多么的必要。由于他们的东道主不愿提供详细的情报，甚至有时向他们提供错误的情报，他们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摸索。魏刚将军的建议常常得不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波军也不实际照办。后来他被授予参

谋长的职位，因而成了有职有权的人物。虽然毕苏斯基对他提出的在维斯瓦河一线保卫华沙并从该基地实施反攻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他那自信的神情和清晰的判断在精神上给了波军指挥官以极大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线的情况：波军正焦虑地等待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而图哈切夫斯基深信这次进攻将使华沙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在魏刚将军制定作战计划时，毕苏斯基并没有说什么。8 月 5 日晚上，他躲到了贝尔维德宫他的房间里。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在午夜两三点钟，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他考虑到，部署在华沙正面的波军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至少能遏制住俄军的进攻 3 至 4 天，这期间，他可以率领 5 个半师从维普日河向北对俄军第 16 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将是一次能引起连锁反应的攻击，因为他估计这次攻击能瓦解苏军士气，从而为其第 5、第 1 和第 2 集团军从华沙向前大规模进攻开辟道路。

8 月 12 日，毕苏斯基离开华沙，沿维斯瓦河左岸驱车南下，在普瓦维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他的翼侧攻击将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必须强调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他个人头脑里的产物。这项计划风险太大，以致不能向他的大多数将领透露。他们不久就叫嚷着要他回华沙，或者至少要把发起攻击随时间提前，因为在 8 月 13 日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让部队向华沙推进，执行他在 8 日签发的命令。

俄国人的攻击是分多路进行的。第 16 和第 3 集团军将分别在桥头堡的南北两侧进攻。第 15 集团军将以纳谢尔斯克为依托渡过弗克拉河进攻莫德林。与此同时，北侧的第 4 集团军将向西向南推进，威胁普沃茨克，与第 15 集团军协同攻击波军的翼侧和后方。拉济明在 13 日午夜至 14 日清晨失陷，这样，苏俄红军到达了离华沙仅 15 公里的地区内。此时波兰的第 5 集团军在弗克拉河上打得十分艰苦。魏刚和拉德克利

夫的镇静与自信(即使并不真正感到自信，但他俩至少装出了自信和镇静的样子)对波军总参谋部产生了一种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一些政界要员正在逃离首都，而且波军士气正在瓦解。不过，这些紧急情况已送到了毕苏斯基的手中，他因此同意把进攻时间提前到 16 日。

在这危急的关头，华沙的得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科尔斯基将军，因为他率领第 5 集团军在弗克拉河防线打得十分漂亮，击退了俄军的一次次攻击。即使这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虽然第 1 集团军仍然屹立在华沙面前，但是西科尔斯基的左翼已遭迂回，而且俄军第 4 集团军在 16 日已经开始在普通斯克地区攻击他的后方。然而，那天上午，毕苏斯基在维普日河一线发动了反攻，波军的形势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俄军的两个方面军本该由一个指挥官统一指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俄军的这两个方面军只是由莫济里集团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尽管这一集团的兵力不详，但是，他们很显然是俄军第 57 步兵师的一部分。这些人员和西方面军的第 16 集团军被毕苏斯基的反攻打得措手不及。假如俄军总参谋部不轻视几天前第 12 集团军缴获的波军作战命令而抓住战机的话，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结果，毕苏斯基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即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华沙公路，在两天的预定时间内就实现了。

实际上，毕苏斯基对敌军缺乏抵抗的现象非常耽心，生怕中了敌军的圈套。直到 18 日他的部队与敌军全面接触，他才放下心来。18 日这天，他的各师部队在左翼进攻新明斯克，在右翼沿布格河一线挺进。俄军第 16 集团军惊惶失措，在他们的进攻面前狼狈而逃。这次翼侧攻击非常成功，毕苏斯基不顾哥萨克巡逻队的威胁，决定返回华沙，以便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在华沙，他发现下级指挥官们仍处于深深的

绝望中，总担心被俄第 4 集团军包围。毕苏斯基不得不说服他们按他构想的作战计划发动进攻。

他的命令是：第 1 和第 2 集团军向前突击，与此同时，第 5 集团军向北直逼东普鲁士边境，以求切断图哈切夫斯基的第 4 集团军的退路。波兰第 4 集团军将全速向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上的马乌基尼亚推进，歼灭溃退的俄第 16 集团军。除了第 1 集团军因兵力过于分散未能按作战命令完成任务外，波军的其余各部队的作战行动均取得了迅速而全面的成功。起初，波军官兵曾满腹狐疑，而现在，他们怀着坚定面自信的目标向前推进，一切犹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另一方面，在遥远的后方指挥俄军的图哈切夫斯基此时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 18 日他才得到毕苏斯基发动翼侧进攻的消息，而此时他的第 16 集团军正在波军的痛击下狼狈而逃。然而，第 16 集团军司令官(他几乎耽搁了 24 小时才采取行动)竟然还向他报告说，他认为形势并不严重。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对战场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第 4 集团军司令官未能在弗克拉河一线围歼西科尔斯基的部队，而此时西科尔斯基的部队正给俄第 15 集团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俄军左翼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已多次向布琼尼发出紧急命令，要他率哥萨克骑兵向北进攻，但布琼尼拒不执行命令，而执意要首先攻下利沃夫(而他却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判断出战场情况异常严重，因此他命令立即撤退。

他下达的脱离接触的命令是简单明确的，但由于时间太迟，有些部队已难以执行这一命令。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其速度令人惊骇。

俄第 4 集团军应该在 8 月 20 日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一线集结。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除非它的前进受到严重的阻碍——它应给第 15 集团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第 15

集团军已接到命令要和第 3 集团军一起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便让第 4 集团军的后备部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结。第 16 集团军应该撤到利维茨河的东岸，莫济里集团负责掩护其左翼。第 12 集团军将攻击渡过维普日河的波兰军队。最后——希望似乎很渺茫——第 3 和第 16 集团军将分别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强行向德罗希琴—亚努夫地区推进，以便成为俄军的总预备队。

但是，这项计划的每一步都被波兰人挫败了。在俄军的右翼，第 4 集团军司令官(一位没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后来因没有击败西科尔斯基并占领华沙而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指责)暂时与总指挥部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并不知道撤退的命令，还以为总的形势对苏俄军队有利，因此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发动攻击。当他于 19 日终于重新与明斯克恢复联系时，他仍非常乐观，但他马上就收到了让他撤退的强制性命令。第 15 集团军在加伊·汗骑兵军的有力支援下，在切哈努夫地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企图在纳雷夫河与普鲁士边境之间打通一条狭窄的走廊，让第 4 集团军突围。但是，该集团军获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第 16 集团军在 20 日被打垮，节节败退。这就使士气高昂的波兰第 2 和第 4 集团军(一直远离苏俄第 12 集团军的攻击范围)能够从翼侧攻击俄第 3 和第 15 集团军，并迫使他们退到普扎斯内什—马库夫—奥斯特鲁夫—别尔斯克一线以后。两天后，波军又推进到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比亚韦斯托克。随着苏俄第 3 和第 15 集团军潮水般的败退，俄第 4 集团军已经无法赶到姆瓦瓦，加伊·汗将军所部的英勇抗击虽然使该地区的波军打得十分艰苦，但是他的努力并没能阻止他的骑兵军和第 4 集团军中的大部分人涌进德国边境。

8 月 25 日，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他的部队已经到了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布格河上的弗沃达瓦一线。

而俄国人在预备队的掩护下正设法在涅曼河东侧重新组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俄国军队，包括被俘和在普鲁士境内被缴械的人员，至少损失 15 万人，大约 230 门大炮，1000 余挺机枪和大量的弹药，波兰军队约损失 5 万人。

华沙之战结束了，但战斗并没有停止。9 月 12 日，趁俄军立足未稳，波军便恢复了攻势。到 9 月 28 日，西科尔斯基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平斯克以南到捷尔诺波尔一线的地区。与此同时，毕苏斯基在涅曼河上的格罗德诺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尔后又在什恰拉河一线把打了败仗的苏俄军队赶到明斯克。俄军的唯一攻势是由布琼尼将军在南部对扎莫希奇发动的，但也被击退。到 9 月 26 日，苏俄 4 个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5 万人被俘，160 门大炮被缴获。10 月，波兰和苏俄达成了停战协议，次年 3 月双方签定了里加条约。根据该条约，波兰人的东部边界线比华沙之战前俄国人所提出的边界线还要向东推进很多。

图 43、华沙战役(1919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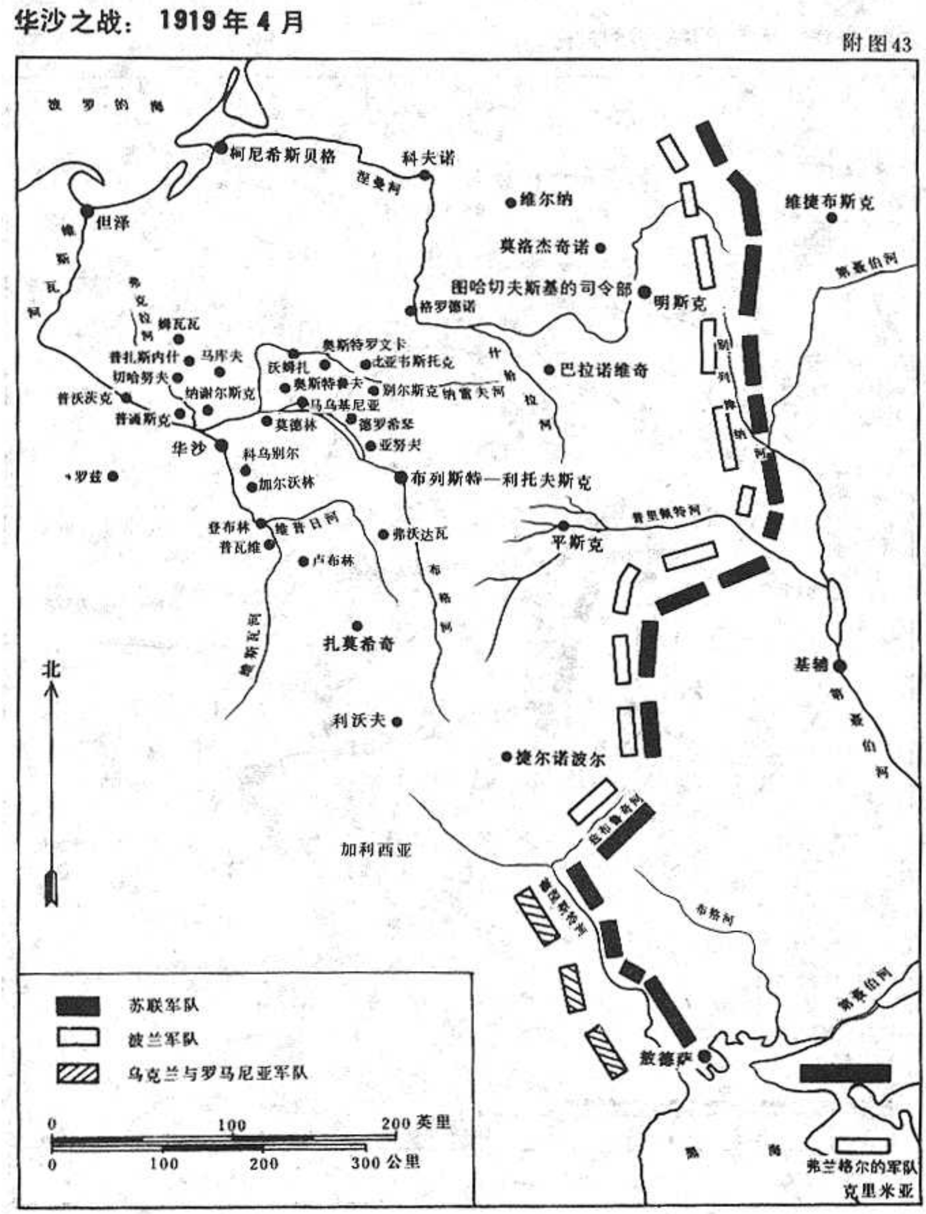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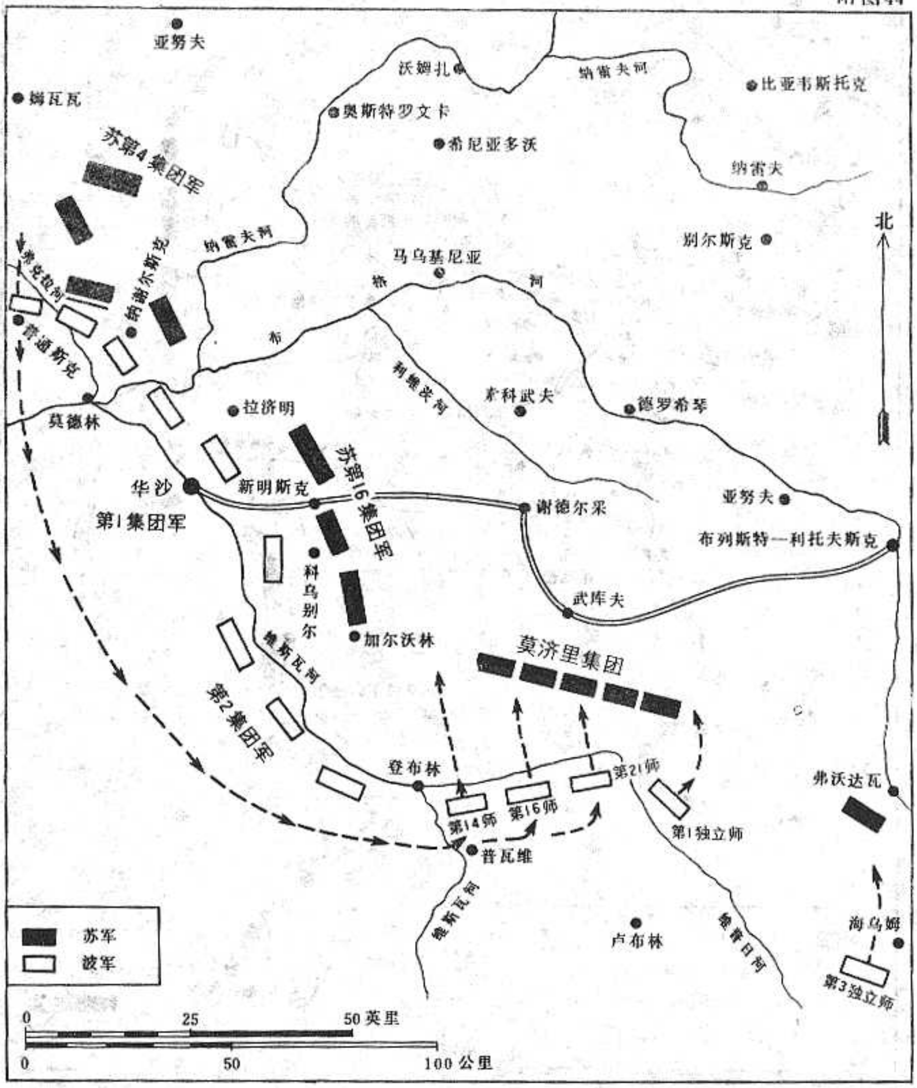



图 44、华沙之战(毕苏斯基的翼侧攻击)

华沙之战：毕苏斯基的翼侧攻击

附图44




图哈切夫斯基真能拿下华沙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真能实现饮马莱茵河的梦想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他能够”。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十分可能”。那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华抄？拯救了中欧呢？在这次战役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图

哈切夫斯基远离战场，他遇到的许多麻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毕苏斯基大胆发动翼侧攻击的杰出才能，因为正是这场翼侧进攻才使波兰打赢了这场战役，因而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行动。但是倘若图哈切夫斯基在毕苏斯基发动攻击之前就占领了华沙(这一点他本来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毕苏斯基的侧翼攻击即使能够发起，也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华沙之战时他年仅 27 岁。他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作为沙皇禁卫军谢苗诺夫斯基警卫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他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被捕入狱。1917 年秋获释出狱后几个月，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主要由于他的朋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举荐，他提升很快。1918 年至 1920 年间，他以极大的热忱多次率领第 1、第 5、第 8 和第 9 集团军投入了反对高尔察克元帅和邓尼金将军等白俄军队的战争。他因此先后担任了南方战区、高加索战区和西方战区的总司令。

在军事思想方面，图哈切夫斯基走在了他的同事们的前头。他非常聪明，具有极强的理解能力。他确信战争必须是总体战。他发表了许多学术演讲和论文专著，逐渐成了空战、装甲战和化学战方面公认的专家。他的勇敢精神是无人怀疑的，而且他具备指挥官的许多素质。然而在华沙之战中，他却想在距前线 300 英里之外的后方指挥他的部队，这与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这一仗使他失去了应得的胜利，但对欧洲来说这又是极为幸运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很可能成为把基督教的各种文化和欧洲文明扫进地狱之门的苏俄异教徒的军事魔王。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上的声望并没有因这次华沙之战而受到损害，他后来担任了苏军总参谋长。但在 1937 年，斯大林处决了他，并把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付之一炬。

现在看来，当图哈切夫斯基发现波军在他前面仓促溃逃时，他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认为华沙已成了他随时可取的囊中之物，他放弃了用 4 个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的计划，而是用 2 个集团军(第 4 和第 15 集团军)向西向南进攻维斯瓦河上的波军据点，并渡过该河。他的这一部署有三重目的：攻击波兰守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波军通过但泽走廊撤退的通道；以完成图哈切夫斯基向西进攻德国的革命抱负。

这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策。假如图哈切夫斯基深入前线，亲自掌握战斗的情况并了解部队的位置和处境，这种失策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他不仅没有攻下华沙，而且还使自己陷入了被动：让第 4 集团军背向德国边境。一旦情况出了偏差——事实果真如此——该集团军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1923 年，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作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在讲演中承认，他未能占领华沙是因为兵力配置不当，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向波军发动协调一致的向心突击或同时对波军两翼发动进攻的必要性。俄军两翼部队相距很远，同时发动进攻是要花时间的，而时间正是毕苏斯基所需要的。而且两翼进攻还要冒兵力分散的极大危险。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拥有 4 个集团军的情况下却未对波军发动全面的向心攻击，这的确使人难以理解。

集中兵力是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都犯了忽视这一原则的错误。加米涅夫本应将俄军的两个方面军交由一个人指挥，以利于协同动作。然而，华沙之战时，俄军两个方面军的两个指挥部却相距 200 英里。更糟糕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两人互不喜欢，这与 6 年前萨姆索诺夫与伦南坎普夫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8 月 10 日，叶戈罗夫接到了让他派布琼尼的骑兵去警卫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的命令，但布琼尼执意要首先拿下利沃夫，而叶戈

罗夫并没有制止他。倘若叶戈罗夫服从命令，他很可能会阻止毕苏斯基的翼侧进攻。不过即使没有布琼尼的支援，图哈切夫斯基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的战略获得成功：他亲临前线，发动一次正面进攻来控制和协调合围波军的行动。然而，他的指挥部却远在明斯克，通信情况又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成功地指挥这次复杂的作战行动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优秀的将军，他不会不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在从别列律纳河进军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十分重视包围敌人以及此举对敌军士气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他企图在波军后方渡过维斯瓦河的一个原因。然面，由于指挥不当，他使自己的部队远远脱离了后勤补给线。这样，他的部队竟一时陷入了要么取胜，要么饿死的困境。俄军本来就对自己的后勤系统不抱任何希望，遭到波军的反攻后，他们本来就不很高的士气自然会一落千丈。图哈切夫斯基远离前线仅仅是造成这种恶果的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运输计划不当，他没有意识到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就地解决给养问题的。如果一直在前线，他就有可能掌握部队的前进速度，使其同 3.3 万辆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弹药的摇摇晃晃的四轮车同步前进。

这一连串的失误——失去控制、失去支援、失去后勤补给——已足以使苏俄军队丧失取胜的机会。此外，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铺得太开，为敌人发动有胆量的反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而毕苏斯基恰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

在贝尔维德宫苦思冥想一夜(8 月 5 日至 6 日的那个夜晚)之后，毕苏斯基拟订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却得不到部下、国防委员会或英法代表团的赞同，因为这个计划要把北部战区的部队调到南部战区，以便攻击已经铺开却部署不当的俄第 16 集团军，而华沙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北部防区脆弱，应该从南部抽调部队来加强维斯瓦河的防御，并

在部队士气恢复后从维斯瓦河发动反攻。

毕苏斯基的参谋长罗兹瓦都斯基将军曾于8月6日上午向他的上司递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他在该计划中建议第 4 集团军在华沙东南方向 30 英里处的加尔沃林集结，然后北上直逼华沙。这一计划与毕苏斯基的设想非常接近，但它冒的风险更大，而且没有考虑到士气的因素，而士气恰恰是毕苏斯基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毕苏斯基以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对自己的判断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犹疑不决者相信，为了促成胜利的到来，必须铤而走险。8 月 6 日，毕苏斯基签发了命令，为参战部队作了战略部署。

尽管部队的最初集结既困难又危险，但毕苏斯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的目标是：在他把 5 个半师的兵力调到维普日河南岸对付比较脆弱的莫济里集团时，波军应在华沙前面的利沃夫附近把俄军牵制 2 至 3 天的时间。一旦击溃了莫济里集团，他将以最快的速度——他没有骑兵——率部队猛扑俄第 16 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预计这必将使敌人乱作一团。这种行动不仅可以防止该集团军突破华沙防线，而且还可为波军在中央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该计划的核心是对俄军实施双重反击，他本人负责实施较难的部分。

“震荡”部队(毕苏斯基的说法)是由第 4 集团军的第 14、第 16 和第 21 师以及正在南线作战的 2 个精锐师，即第 1 独立师和第 3 独立师组成的。这两部分部队在脱离战斗并随后进行集结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在与敌人交战。第 4 集团军当时正在布格河一线作战，这 3 个师不得不在敌人面前实施侧翼行军，其中正在亚努夫地区作战的第 14 师必须行军 40 英里以上才能到达集结地域。

从南部地区抽调部队困难更大。尽管这里的部队从士气和战斗力上讲都比北部地区的部队强一些，而且他们最近还阻止并打退了布琼尼的哥萨克骑兵的强烈攻击，但是，布琼尼

将军仍是个现实的威胁。如果从这里抽出 2 个精锐的独立师，波俄两军的兵力双比就会变得十分悬殊，波军的战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从这里抽调 2 个师的工作是由雷兹·希米格维将军负责的。他不顾有人预言会失败，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在一个骑兵旅的帮助下极其巧妙地使部队脱离了战斗。

波军“震荡”部队的集结地区选择在维普日河南岸，左侧以登布林为依托。时间是这次行动的关键，部队于 8 月 13 日之前全部调集完毕，这主要应归功于有关的指挥官。有很多问题可能导致这次计划失败，而且也差点导致了失败。当那些正与敌军紧张拼杀的战士不明不白地从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之后)，他们的士气很可能受到影响。但毕苏斯基到达普瓦维(他的新指挥部所在地)时，却惊喜地发现，尽管部队的被装和装备极为糟糕，但部队的士气总的看来还是很高的，而且部队似乎也能胜任他们面临的任务。南线部队撤下来时经过了残酷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携带发动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作战命令因此落入俄军手中。这一意外事件很可能使波军整个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可幸运的是，俄军总参谋部怀疑这一文件的可靠性，仍然根据从第 12 集团军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行事。

毕苏斯基原定于 8 月 17 日发起反攻。他觉得刚刚撤离战场的部队需要 3 至 4 天的时间休整、补充装备和领会作战意图。但是来自华沙方面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将攻击时间提前一天，定在 16 日凌晨，因为华沙桥头堡的处境异常紧张。他的第一个作战目标是占领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公路，其攻击部队的序列从左至右依次是第 14 师、第 16 师、第 21 师、第 1 独立师和第 3 独立师。进攻是在一个十分宽阔的正面实施的，第 14 师从登布林向北稍偏西方向推进，而第 3 独立师几乎是向正北方向并沿着布格河西岸向前推进。

俄军完全没有料到波军会从翼侧发起攻击，事实上，他们在 18 日之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图哈切夫斯基正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得知波军发动反攻的消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莫济里集团崩溃得太快，显然来不及上报情况。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把毕苏斯基的迅速推进归因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华沙正面的激战迫使他从交通线上撤走部队；二是他曾指望布琼尼对波军右翼采取行动，但布琼尼只顾自己在利沃夫前的作战。俄军第 12 集团军只是到 8 月 13 日才划归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虽然该部肯定对波军第 3 独立师造成了严重威胁，但它似乎并没有接到任何情报和命令。

8 月 17 日波军第 14 师到达加尔沃林及其郊外，第 21 师到达武库夫，这 2 个师均未遇到俄军抵抗。这天，毕苏斯基正同第 21 师指挥所的参谋共进午餐，有人报告，俄军的抵抗已遭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持各种农具的农民的坚决还击。那天夜里，第 14 师还占领了科乌别尔，翌日，第 14 师抵达新明斯克。同一天，第 21 师到达索科武夫，而第 1 独立师到达了布格河畔的德罗希琴附近。来自前线部队的战报都提到。波军伤亡很小，而俄第 16 集团军的左翼一片混乱，土崩瓦解。还有消息说，华沙卫戍区的波军第 15 师已经按照命令沿着华沙—明斯克公路向东发动攻击。该师现已奉命与第 4 集团军会师。

8 月 18 日，在前线长时间穿梭指挥和鼓励将士的毕苏斯基回到华沙。在他离开的那天，部队的热情受到了影响，翼侧攻击少有甚至没有进展，这足以说明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回到华沙，他发现将士们精神萎靡，总参谋部对前方战况知之甚少，还在担心遭敌合围。虽然毕苏斯基命令第 1、第 2 和第 5 集团军立即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的信心和勇气，但是直到 8 月 22 日第 15 师攻克希尼亚多沃的消息传来时，华沙居民才开始认识到不仅华沙已经获救，而且俄

军已经彻底失败。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胜利的全部意义。

华沙被解救了，东欧和中欧同华沙一样不再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了。这全靠波兰士兵的勇敢以及波兰国家元首制定的英明决策。但是，胜利也应该部分归功于英法代表团。在那些严峻而光荣的日日夜夜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外交战线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后勤补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道义上提供了虽不明显但却无法否认的支持。尤其是代表团的军事成员们，无论在战场内外，他们都发挥了稳定人心，提供建议和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的功绩都是不可抹煞的。

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但他的确是一名优秀的将军。那么为什么他在进攻华沙期间要从遥远的后方来指挥他的集团军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明白自己的通信条件差，从明斯克与叶戈罗夫的方面军取得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他应对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反击能力从而导致战役失利而感到内疚。几乎可以肯定，他对敌方统帅毕苏斯基的军事才能重视不够。无论图哈切夫斯基把指挥部设在遥远的后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指挥所远离战场毕竟是他在关键时刻与战场脱离联系的主要原因。华沙之战与坦嫩贝格战役一样，是一次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品格的战斗：毕苏斯基发起了英勇顽强并且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反击，西科尔斯基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防御，这使远在后方的图哈切夫斯基惊惶失措。图哈切夫斯基发现，他已丧失了主动权和士气，再也无法力挽狂澜。

华沙得救还应该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波兰民

族在危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团结。派系斗争和阴谋活动至少暂时被放在一边了。在那段严峻的时期里，波兰国内的任何背叛行为，哪怕是意见分歧，都有可能严重地损害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可能使战争归于失败。

## 第 23 章、奠边府围攻战(1954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

1945 年日本投降之际，战时在印度支那地区始终保持军事存在的法国，企图恢复战前格局，重新成为印度支那的殖民大国。但事与愿违，法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外交困之中，而且他们的企图使他们自己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1930 年，一位共产党革命家缔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他就是后来改名为胡志明的那个人。他被法国人逐出越南，后来在中国的广西省站住了脚，并在 1941 年组建了名为“越盟”的政党。胡志明在广西开始与武元甲共事。武元甲原是河内的一名教师，后来成为胡的副手，并逐步成长为胡的军队统帅。

1945 年 3 月日本人撤离了占领的印度支那，这对越盟帮助颇大。当年 8 月底，胡志明在河内建立政府，并任政府首脑。他手下有 5000 人的游击队，由武元甲指挥。该游击队控制了东京湾和北安南山脉。胡志明曾一度受到中国国民党有限度的保护。当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军于 11 月在西贡登陆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北纬 16 度线上封锁了他们北上的道路。但是中国人除了供给一些缴获的日造步枪外，无法提供其他物资援助。国民党军队于 1946 年 5 月撤离越南。

胡志明十分清楚，游击队虽然日渐壮大。但还不具备对付法军的能力。因此，他决定谈判，其结果是与法方达成了一项双方均不满意而且难以持久的协议。武元甲主张武装抵抗，他忙于在东京湾东北部大本营(越北)扩大游击武装，进行训

练。而胡志明则冷静、深沉、有耐心。他非常清楚：和平，即使不稳定的和平，只要伴有停火或休战，对他来讲都至关重要。因此，他继续出席会谈和进行谈判。

然而，1946 年秋法国人终于失去耐心，提出了胡志明认为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越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获得独立，当年 11 月底，它开始了长达 8 年的抗法战争。但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并非一无所获。胡、武两位越南领导人已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立即开始实施精心制定的游击战计划。这支武装力量已扩大到 3 万人，活动在若干个地区内，每个地区都有一独立的组织，但由武元甲统一指挥。

1949 年共产党中国成立，它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是越盟成长的“助长剂”。到 1950 年，武元甲已在越北地区建立一支含 4 个步兵师的正规部队，每个师下辖 4 个团，每个团下辖 3 个营，总兵力达 1 万人。其后勤供给主要依靠在当地征募的一支庞大的农民队伍。

1950 年秋，武元甲认为自己的力量已很强大，足以向法国远征军及新近成立的越南国民军发动进攻。作战初期，武元甲有选择地在某些地区巧妙地运用兵力优势。他极为成功地将法军从东京湾北部彻底赶走，并对河内及海防造成严重威胁。但当年 12 月，随着法国伟大的军事家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后成为元帅)的到来，法国人的命运大为好转。1951 年，越南人的日子极不好过。

1951 年 1 月，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战在红河三角洲打响，法军由德拉特·德塔西尼亲自指挥。此仗可谓艰苦卓绝，势均力敌。武元甲虽然占有 3：1 的兵力优势，但在 3 日苦战中伤亡 6000 人。同年，又经过两次更加惨重的失败之后，武元甲不得不转入游击战。德拉特·德塔西尼当年年底返回法国，后死于癌症，处世尤为谨慎的萨朗将军接替了他。法军调换指挥官，使武元甲得到喘息机会，重新获得了主动权。他不

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将部队扩编为 6 个师。这 6 个师包括第 351 重型师，该师辖 1 个工兵团，2 个炮兵团，1 个重武器团，1 个高炮团，后来又增加了 1 个野战火箭部队。

重型师的组建及其他收获是胡志明 1950 年 4 月访问北京后的间接成果。他在北京与红色中国达成协议，即由中国向他提供各类武器及军事教官。从此之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从云南边境运来大批野战火炮、高射炮、轻武器以及弹药。中国只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才短时期中断向越盟供应军火，而这一中断有利于越南，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可以向越南提供从美国人那里缴获的先进武器。中国在越南的参战情况不详，但有一支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以确保越军正确使用中国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中国肯定至少有一个高炮团参战。但从表面上看，武元甲这个被法国人蔑视的自学成才的军事天才，是所有主要战斗的指挥官。

1953 年 5 月，纳瓦尔将军接替了萨朗将军。他曾是骑兵部队军官，在参谋部担任过要职(主要在情报部门)，还任过装甲部队指挥官。他虽然富有自信心，但由于没有在高级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加之对印度支那一无所知，因此对能否担当此任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法国政客毫不理睬他的意见，将他派往越南，并令他将战局改善到使法国政府能够进行谈判的程度。

纳瓦尔抵达印度支那时，法军总兵力为 18.9 万人，其中法军 5.4 万人，外籍军团(其中许多是德国人)2 万人，北非部队(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3 万人，空军 1 万人，海军 5000 人和越南军队 7 万人。然而，这些部队的大部需在红河三角洲“德拉特防线”的一系列防御阵地上执行守备任务，或在法军管辖之下的其他地方执行同类任务。武元甲拥有 6 个师和 3 个独立团，其中至少有 8 万人是训练有素的一线部队；他还有强大的二线部队，可从事地方作战。此外，武元甲还

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后备队。越盟控制了东京湾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安南山脉“腰部”的制高点并在更南的区域设有少量据点。

局势对纳瓦尔并非有利，但他立即察觉到自己的指挥弱点，并且制定了一个长期计划。该计划以增强部队机动力、增加兵力、并得到美国的援助为基础。纳瓦尔将此计划带回巴黎，但并未得到批准。在他返回越南时，巴黎只答应给他增加 10 个营的兵力以及有条件地提供一些美援，并且命令他必须立即行动。他执行了命令，在北部打了一场胜仗，即在安南山脉“腰部”获得一次小胜，并成功地撤回了那商筑垒营地的法军。

建立那商营地曾是萨朗将军唯一的成功之举。3 个伞兵营准确地空降在敌占区，在那里修筑了一个堑壕纵横的营地。而越盟部队对它的一系列进攻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代价高昂的自我损耗(越盟的确这样做了)。成功地撤离那商，促使纳瓦尔认为在敌方领土上建立的据点并没有多大危险。基于这种认识，加上法军负有保护友好王国老挝的义务，纳瓦尔决定在奠边府设立规模更大的筑垒营地。控制由北方入侵老挝的唯一通道。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约 180 英里处。自 1952 年 11 月起，它一直在越盟控制之中，很有可能成为越南入侵老挝的前进基地。奠边府差不多正好位于一个大约 12 英里长，8 英里宽的肥沃、富庶的谷地中央。谷地周围是丛林覆盖，连绵起伏的山峦，有不少山峰高达 3000 多英尺。这里既不易防守，也不易实施空运补给。

纳瓦尔任命勒内·科尼少将为东京湾部队司令。负责从河内的基地指挥奠边府筑垒活动。科尼身材魁梧，精明强干，他跟着自己敬佩的德拉特·德塔西尼来到印度支那。科尼雄心勃勃，直言不讳，性情暴躁。如果对某一命令持有异议，

他就会提出不同意见。纳瓦尔选用科尼必定是由于他赏识科尼的才干，他们俩关系一般。然而，他们一致认定卡斯特里上校是守备部队司令官的最佳人选。卡斯特里是一位骑兵军官，与纳瓦尔相识。不久前他成功地指挥了红河三角洲的装甲部队。奠边府将被用作实施进攻或防御作战的基地，因为纳瓦尔预计在这一带要打一场运动战，而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当基地司令，的确很合适。

1953 年 11 月 20 日上午，10 点半刚过，第 6 殖民伞兵营和第 1 伞兵团的第 2 营抵达两个空降地域上空。“卡斯特行动”正式开始。奠边府谷地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宁静和平，农民在田间地头干活，越盟部队毫无准备。两个空降营降落在相距 3 英里的两个地域。第 1 伞兵团的士兵没有遇到抵抗，殖民伞兵营在奠边府西北着陆，遇到强烈抵抗并有一些伤亡。中午刚过，殖民伞兵部队第 1 营加上 2 个 75 毫米炮兵连，1 个迫击炮连和 1 个外科医疗小队空降着陆。越盟部队下午 4 时撤离该地区，留下 96 具尸体。

次日，包括一辆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装备空投到位，工兵们开始修复主要的简易机场，加固“堡垒”。奠边府谷地由若干个小村庄组成，地势平坦，只有几处小山包，楠云河从谷地中流过。法军以前占领该地时，曾修建了两个简易机场，较长的跑道为 1.6 万码，靠近奠边府；另一个比较小的机场位于奠边府以南 3 英里处。

整个防御体系由数个据点构成。每个据点以一女子名字命名，各据点由数个(理论上)相互可以支援的支撑点构成。北边是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由阿尔及利亚第 5 步兵团驻守。其东南面是比阿特丽斯据点，由外籍军团第 13 半旅的第 3 营驻守。由主要机场周围的工事构成的于盖特据点，由外籍军团第 2 团第 1 营和一支 155 毫米炮兵部队驻守。于盖特据点西面和北面是安妮·玛丽据点，由泰国人驻守。在安妮·玛

丽据点以南是克洛迪娜据点，由外籍军团第 13 半旅的第 1 营驻守。楠云河以东是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分别由阿尔及利亚第 3 步兵团第 3 营和第 4 摩洛哥步兵团驻守。再往南 3 英里便是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这一处境危险的据点由下列部队坚守：外籍军团第 3 团第 3 营、阿尔及利亚步兵第 4 团第 2 营、一支法国人指挥的摩洛哥部队、一个 105 毫米炮兵连和一支坦克部队。战地司令部和野战医院位于克洛迪娜据点正北的地下掩蔽部里。步兵的坦克和炮兵等机动部队也集中在此。当时，奠边府谷地的法军兵力近 5000 人。

以后的几周里，巴黎的军政高级官员乘坐飞机接踵而至，以便从纳瓦尔和科尼将军那里了解法军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命运与奠边府这片稻田息息相关。在奠边府，人们每天都在挖掘沟壕，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加固工事，给来访贵宾留下深刻印象。纳瓦尔将军估计敌方至少要用 3 个整师才能包围奠边府。牵制住这么多敌方部队将对法军计划于元月在安南进行的战斗(亚特南特之战)十分有利。万一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瓦尔确信其防守火力足以压制敌方进攻。奠边府尤如“发怒的刺猬”，将给越盟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如此乐观。纳瓦尔本人在表示自信的同时，也并未忽视让科尼准备一项秘密撤退计划，以防事态恶化。科尼对此乐于从命，因为他本来就对防守奠边府持保留意见。主要反对派是空军高级将领法伊将军，他指出，机场是守备部队的生命线，极易遭受敌人的打击，法军的赌注下错了地方。然而，炮兵司令官皮罗上校则盲目乐观，过分自信。他认为其反炮火计划会有效地摧毁敌人丛林中运来的任何火炮。当问及是否还需要更多的火炮时，他回答说现有火炮已超过所需数量。结果，法军炮兵的失利成为法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在占领奠边府谷地之后的 3 个月中，法军多次出击。12 月初，法军派出一支部队协助莱州的泰国守备部队撤离。另外，为了获取情报、骚扰敌人和破坏敌运输线，法军还使用各种武器对敌纵深实施猛烈袭击。但多数袭击和出击均无实质性结果。由于空中补给困难或遭敌人伏击，法军多次失败，损失惨重。派遣游击队潜入敌后也收效甚微。到 1 月份，奠边府显然已丧失了“进攻跳板”的作用。由于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显然企图以全面进攻吞掉这块“诱饵”，法军打算增派更多的部队、火炮以及坦克，企图增强防御力量，但这一切已为时过晚。

纳瓦尔和科尼不仅过份低估了武元甲可投入战场的一线部队的数量，而且还低估了武元甲在恶劣的地形上运输重型武器的能力，以及进行运动战的能力。武元甲于 1953—1954 年冬季采用运动战逃脱了法国人的包围。武元甲令所属师、团部队来回运动，避免任何正面激战。他的部队甚至可以在老挝进出自如。为免遭敌人的猛烈攻击，武元甲大部队昼夜兼程，夜间行程更远。蜿蜒的行军纵队逐步接近了法军营地。越盟的每个士兵除携带武器外，还带有水壶和 30 磅大米，此外还带有一把挖壕用的行军锹。

3 月 13 日做好进攻准备时，武元甲已在法军各据点附近集结了 4 个步兵师和 1 个重型师的兵力。武元甲总共投入 4.9 万人(战役过程中又投入 1 万人)对付法国守军。法军虽又增强了 12 个营的兵力，但总兵力仅为 1.32 万人，其中一线部队不足 7000 人。

最使法军震惊的是，越盟第 351 重型师操纵火力的精湛技术。越盟的重型武器比法军多 2 倍以上。此外，他们以惊人的能力将重武器施上陡峭的丛林小路，必要时以捆扎树梢的巧妙方式伪装武器，还用人力将火炮拖运到前沿的斜坡上。他们挖掩体把火炮隐蔽定位，使其可向法军营地的薄弱点，

尤其是法军的机构实施直瞄射击。伊莎贝尔据点的炮火打不到它们。中部的反击炮火也无法压制它们。假如法军夺取并固守高地，局势则可能完全不同。

3 月 13 日，奠边府谷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这一天，越盟的炮火持续不断，从未减弱，法军的回击不起作用。越盟的炮火集中打击比阿特丽斯据点，同时打击整个营地的中心。正在指挥外籍军团第 13 半旅第 3 营作战的佩戈少校由于指挥所中弹而丧命。紧接着，中心扇形防御阵地指挥官戈谢上校阵亡。但直到下午 5 时 30 分，勇敢顽强的越南人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比阿特丽斯据点发起攻击。他们勇猛地扑向铁丝网，死伤逾千，成营的援兵又蜂拥而至。到午夜时分，法方竭尽全力勇敢作战的外籍军团在比阿特丽斯据点全部被歼，该据点落入越盟手中。比阿特丽斯据点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薄弱据点，一攻即克。但它的失守意味着该营地的其它据点已处于越盟火力的直接打击之下。

次日傍晚，北边孤立的加布里埃尔据点遭到袭击。战斗进程十分类似比阿特丽斯据点，也是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皮罗上校受命消灭敌人的炮兵，但其炮手同样没能完成任务。又是大批越军蜂拥而来，许多人被打死在铁丝网上，大量援军照样往前冲。阿尔及利亚人虽顽强抵抗，但终于失败。

3 月 15 日，安妮·玛丽据点遭到猛烈攻击，而泰军第 3 营(驻守在第 1、第 2 支撑点)毫无作战兴趣。但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战。他们对越南人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在夜色中悄悄地溜走。消失在丛林中或投降敌方。最后只剩下一个支撑点仍然在固守，防守者被迫撤到于盖特据点。战斗打响后的 48 小时之内，法军就有 3 个据点落到敌人手中。更严重的是，法军失去了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夸下海口的皮罗幻想破灭，羞愧难忍，将一颗手榴弹放在自己胸前，拉响了导火索。

从初次突击之后直到3月底，没有激烈的战斗。然而筑垒营地的守卫者和进攻者依然活动频繁。武元甲需要喘息时间，以便补充新兵，补偿强攻法军 3 个据点时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他还需要时间让他缓慢但确有保障的后勤部门完成弹药储备。成千上万的民工[注：战役初期，武元甲有 3.15 万人提供近距离保障。此外，在其漫长的后勤运输线上还有相同数量的后勤保障大军。]和自行车蚂蚁般地在羊肠小道上忙碌着。与此同时，武元甲紧缩了对法军营地的钢铁包围圈，向敌方延伸堑壕，以便下次进攻时使用。

法国人处境困难，即使在战斗的间隙，法军高级指挥官也明白他们不会取胜，仅后勤供给困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便两个机场同时使用，现有飞机也不够用，许多飞机已无法使用。这给后来的伤员后送工作带来严重问题。偶尔抵达的救护飞机在3月底之前还能勉强着陆(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直升机在后来几周内仍然艰难地冒险着陆。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这样也不能运走野战医院的所有重伤员，医院已无法处理大量死伤人员。

在下一次激战开始之前，守备司令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皮罗上校已死，卡斯特里的参谋长负伤，需要后送。卡斯特里本人则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得不将朗格莱中校调到司令部协助指挥。科尼将军甚至考虑要亲临奠边府进行指挥，但有人说服了他不要去。奠边府已经没有指望，现在还不是东京湾武装力量总指挥官表现自己献身狂热的时刻，即使此举可使他名留千古。

双方摆好架势准备进入战役第二阶段时，法军依然士气高昂，尽管他们面临严峻局面。来自法军周围高地的敌军炮火越来越猛。即便如此，法军的后勤供给仍未间断(虽然某些物资由于空投高度过高而落人敌手)。此外，还有部分枪支和作战人员空投着陆。空降部队中包括比雅尔少校的第 6 殖民伞

兵营，该营与首批人员一同着陆，后被派至其它地方作战。

3 月 30 日至 4 月 4 日为战役第二阶段。朗格莱和卡斯特里竭尽全力利用所有物资加强防御，而且在各个重要支撑点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可靠部队。他们将重点放在楠云河以东的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据点。越盟的炮击和攻击目标正是这两个据点。越盟第 312 师的战士从多米尼克据点前方 200 码处的堑壕中跳出，蜂拥而上，将铁丝网和雷区置之度外。阿尔及利亚人被越军的猛攻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向后方逃遁。

后来被称为“五高地之战”的战斗是不祥的开端，多米尼克据点 6 个支撑点中的 3 个很快失守。外籍军团空降部队进行反攻，不久，2 个据点失而复得。但第二天战斗快结束时，越盟军队夺取了该据点东北部并准备向纵深突入。

当双方激烈争夺多米尼克据点之际，埃利亚娜据点遭到越盟第 316 师主力的猛烈进攻。此据点某个支撑点上的 2 个连的摩洛哥人步阿尔及利亚人的后尘，逃之夭夭。密集的炮火还削弱了这一重要据点的其他阵地。但守卫者坚守了一整夜。黎明时，战斗有所平息，法军采取果断措施试图夺回多米尼克据点阵地，但未能成功。

4 月 1 日夜，于盖特据点外围的一个支撑点遭到来自西北方向第 308 师 2 个团的攻击，该处简易机场部分失守。防守者不得不保存实力，因为现有的反攻部队必须用来营救多米尼克和埃利亚娜两据点。万一这两个据点失守，无论于盖特据点能否守住均没有实际意义了。4 月 2 日，伊莎贝尔据点遭到攻击，几天前奉命前来参加奠边府战役的外籍军团第 3 团第 3 营被击溃，只有他们的坦克幸免恶运。后来 3 天里。越盟第 304 师第 57 步兵团向守备部队发起一系列猛烈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4 月 2 日和 3 日，在所有遭到进攻的地区都发生了残酷的肉博战。4 月 4 日凌晨，越盟第 308 师企图对机场扩大战果，

但同样在遭到大量伤亡之后渐渐减弱了攻势。人员处于绝对劣势的守备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伤亡相当大，但毕竟幸存下来。武元甲企图攻破法军营地内部防线。但伤亡数千人，未达目的。越盟的损失能得到补偿，而法方则无法补偿。战斗初期，第 1 空降轻步兵团第 2 营及其装备投入法军营地，但在敌密集的高射炮火下，这只不过是绝望的一搏，无济于事。在这次空降之前，奠边府地区步兵已减至 4500 人以下(其中 1600 人在伊莎贝尔据点)：5 个伞兵营中只有 1 个营为 300 余人，坦克只剩 4 辆，火炮损失亦很惨重。

武元甲对“五高地”和于盖特据点北部阵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凶猛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并没获得他所希望的胜利。法军的防守如此顽强，出乎越盟的预料。但无论如何，越盟部队超人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并未付之东流。4 月初战斗平息下来时，他们已占领机场的一部分，多米尼克据点的 2 个支撑点和埃利亚娜的 1 个支撑点。多米尼克据点阵地的失守，对法军来说后果尤为严重，因为越盟军队可以扼守通往防御中心的东北入口，他们离中心阵地不足 1 英里。防御体系四周受制，形势险峻。这样一来，敌人炮火目标区缩小了，空投补给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

继续增援的决定不易落实，因为此仗败局已定，突围希望渺茫。然而，科尼认为：“五高地”之战造成的损失至少应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4 月 9 日至 12 日，主要援军空降着陆，但效果并不理想，因空投区域狭小，加上不久前雨季开始，空降困难重重。4 月 9 日夜晚，气候尤为恶劣，外籍军团第 2 伞兵营实施空降。比别的部队幸运的是，该营的 2 个连和营指挥所都在“筑垒”区内着陆。4 月 11 日至 12 日夜间，空降的 850 人中 40%落入越盟手中。这批空降兵中大多数来自外籍军团步兵营的志愿者，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的，难免伤亡的条件下跳伞。

战斗曾一度减弱，但气象条件则更加恶化。法国人希望雨季能够成为盟友，但实际上雨季成为法军的另一大敌。铅灰色的天空，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使干涸的泥土变成泥流。越南人完全适应这种条件，但被困的法国人在狭窄、污浊、无护墙的壕沟里挣扎着行走。大雨甚至穿透掩蔽体的单薄顶篷。伤员的处境正极度恶化，手术条件极端困难，伤口很快因感染而坏死。乌云和阴霾妨碍了空中补给，但对越盟的高射炮手毫无影响。防御区越来越小，但仍需食品供应，甚至战俘也离不开食品。前景一片黑暗，绝望的气氛笼罩着西贡和河内。法军决定组织救援部队。

武元甲利用4月中旬的几个星期稳步地把堑壕挖至卡斯特里的司令部和法军主要防线附近。处境孤立的伊莎贝尔据点虽然被四面包围，但仍在顽强坚守。越盟从老挝和其它地方调来了新部队，训练营地的后备队也被调来充实部队，为下一步大举进攻做准备。越盟要求中国提供 720 吨弹药和 1 个高射炮团。武元甲计划投入 3.5 万名步兵，1.2 万名炮兵、工兵、通信兵和其他小分队。奠边府防御部队掘壕固守，准备全力顶住即将来临的攻击。

4 月间，在对“五高地”的进攻大部受阻之后，越盟集中力量进攻于盖特据点北边的 3 个支撑点和仍在法国人手中的部分机场(主要空投区)。在“五高地之战”进行之时，这里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相对平息近 1 个月之后，战斗重新开始，并成为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法军寡不敌众，援军的数量远远不够。4 月 28 日于盖特据点的 3 个规模不大但很重要的支撑点失守，越南人又攻占了机场的一部分。法军伤亡 500 人，其中包括精锐的外籍军团伞兵。但越盟付出的代价更大，损失 3 个团的大部分兵力。对武元甲来讲，这只不过是暂时受挫，但他需要一周时间补充弹药和兵力，以便发动他所设想的决定性进攻。

酝酿已久的“孔多行动”计划，原来是为追击被奠边府积极顽强的防卫力量所击溃的越盟军队而制定的。但到 4 月份，该计划不得不改为竭尽全力营救奠边府守军的应急计划。老挝法军指挥官克雷佛克上校在纳瓦尔指挥下负责实施该项计划，但该计划很快由于高级军官的反对而陷入困境。

4 月初，如果部队行动迅速，科尼也会承认此计划的有用之处。但纳瓦尔耽搁了时间，因为他在增派更多部队去奠边府解围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时，科尼与纳瓦尔关系已经很僵。4 月 14 日，科尼告诉卡斯特里救援部队正在途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克雷佛克的部分部队已经出发，但纳瓦尔到 27 日才下达最后命令，而且还取消了空降部队。克雷佛克尽了最大努力加快行军速度，但其北非和老挝部队未受过丛林作战训练，无法及时突破越盟军队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武元甲急于速胜，这不仅因为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因为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形势。为此，5 月 1 日武元甲又一次组织部队向法军据点发动进攻。越盟不再采用蚕食战术，而是转为实施大规模进攻。其交通壕已挖到法军防御阵地边缘，进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视死如归的越南人携带可塑炸药炸毁铁丝网和堑壕。整个战线转入激烈的近战，整个战场枪炮声不断。5 月 2 日晚，越军在埃利亚娜和于盖特据点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伊莎贝尔据点的前哨阵地。但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法军把越军从刚失守的阵地上赶走。这表明法军仍有很强的战斗力。

法军的末日已快来临，这并非因为守军已丧失勇气和斗志——他们直到最后仍斗志昂扬，英勇奋战——而是因为他们已弹尽粮绝。后勤保障始终是战斗的关键。只要气候允许法军飞机起飞，它们就会用密集的机关炮、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打击越南人。但越盟的人海运输线坚不可摧，而法国人除狂

轰滥炸外别无办法。的确，5 月 2 日至 3 日夜晚，殖民伞兵某营部分人员空降着陆(他们是几天前从法国来到越南的)，可是为时太晚．毫无作用，只不过使奠边府行将失守的痛苦、牺牲和无效挣扎更加不堪忍受。有的指挥官比较明智，指挥该营余下人员赶快撤离。

战斗的最后几天，雨季气候恶劣到极点，乌云压顶，大雨倾盆。情况日趋严重，但法国空军继续空投物资(5 月 6 日空投 196 吨)。由于法军的地盘太小，大量的物资落入越盟手中，他们很快穿起法式军服或头戴美式钢盔，向法军进攻。

法军被迫一寸一寸地放弃于盖特和克洛迪娜据点的阵地。双方进行的凶猛肉搏战，简直象是回到了野蛮时代。一个越盟士兵倒下，另一个士兵带着以身殉职的狂热感情又冲上来。法军的防御圈越缩越小。最后 2 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埃利亚娜据点的主要支撑点上。5 月 7 日晨，又一群越盟士兵攻上来，最后一个据点终于崩溃。当日下午奠边府的法军防线开始土崩瓦解，只有一些孤立的阵地在进行零星战斗。为了避免又一个无谓的血腥战斗之夜，卡斯特里宣布下午 5 时 3 分停止战斗。当时，只有伊莎贝尔据点还没有完全大乱。

虽然伊莎贝尔据点遭到重炮袭击，但直至最后几天，该据点的主阵地还没有遭到越盟的猛烈攻击。然而，伊莎贝尔据点内的情况有许多方面不如其它据点。该据点的主要任务是用 11 门 105 毫米榴弹炮为主要防御阵地提供侧翼火力支援。为完成这一任务，1166 人加上大炮、坦克被部署在一个十分狭小、相当潮湿的环形防御地带内。战斗一打响，守军的小型简易机场即被摧毁，通往奠边府的道路被切断，越南人包围了该据点。据点守军甚至连光顾两个为提高士气而设的妓院的福分都没有，因为司令部故意把妓院放在比较靠北的地方。该据点守军的生存完全依靠空投物资。但由于伊莎贝尔据点的空投区很小，空投物资丢失的比例比奠边府主阵地大

得多。

从5月1日开始,越南人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伊莎贝尔据点。后来7天的战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轰击这个不大的据点的炮火非常猛烈。到5月7日下午，虽然部分支撑点被摧毁，但主阵地仍未失守。下午4时许，该据点指挥官拉朗德上校接到卡斯特里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说，战斗将于傍晚结束，拉朗德可以执行“信天翁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一个撤退计划，它要求主阵地的守军经由伊莎贝尔据点撤离，由伊莎贝尔守军断后。但前沿阵地已经失守，主阵地守军突围已不可能。拉朗德出于对士气的考虑，对此计划守口如瓶。现在，他只好在没经过演练的情况下就按计划撤退。晚上10时，2个连消失在夜幕中，但他们很快就被截断，淹没在强敌之中，变得四分五裂。有的士兵返回伊莎贝尔，小部分逃进丛林。战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意义。5月8日凌晨1时，拉朗德上校投降，奠边府围攻战结束。

毫无疑问，越盟取得奠边府围攻战的胜利，是因为武元甲指挥有方。的确，武元甲拥有一支兵力众多，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愿为自由而献身的军队。然而，他的激情和精神，与他快速多变的战术才能一样，激励着他的军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奋斗精神。武元甲为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据估计，越盟军队在此次围攻战中伤亡人数高达2.3万人，其中死亡8000人。兵力较弱的法军防御部队(其中外籍军团的7个营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也损失惨重，以整数计算，伤亡9000人，其中亡2000人，另外7000人在5月8日被作为俘虏押走。

奠边府围攻战不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结束，因为战争后来还持续了3个月之久。法国和越盟政府均已厌倦战争。但越方准备顽强坚持到底，以便在谈判前再占领一些地盘。武元甲当时已经拥有约9万可用来对付法国人的第一线部队。而

法军则在 6 月做出决定，更换总司令，由伊利少将接替纳瓦尔。伊利指挥了最后一次战斗——奥韦涅战斗。他派兵占领了河内至海防公路以南的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国中之国。伊利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非决定性战斗来攻打当地人的设防阵地。战斗很快平息下去。7 月 3 日，法越双方代表在中甲(在河内正北不远)举行会谈，其中讨论了交换战俘问题。这才是结束整个围攻战的开端。7 月 23 日，包括越盟政府代表在内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同意停火。因此，越盟获得北纬 16 度以北的地区。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也获得独立。印度支那进入相对和平与幸福的时期。但不久，这种和平和幸福又一次遭到破坏。

图 45、奠边府围攻战(1954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

奠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附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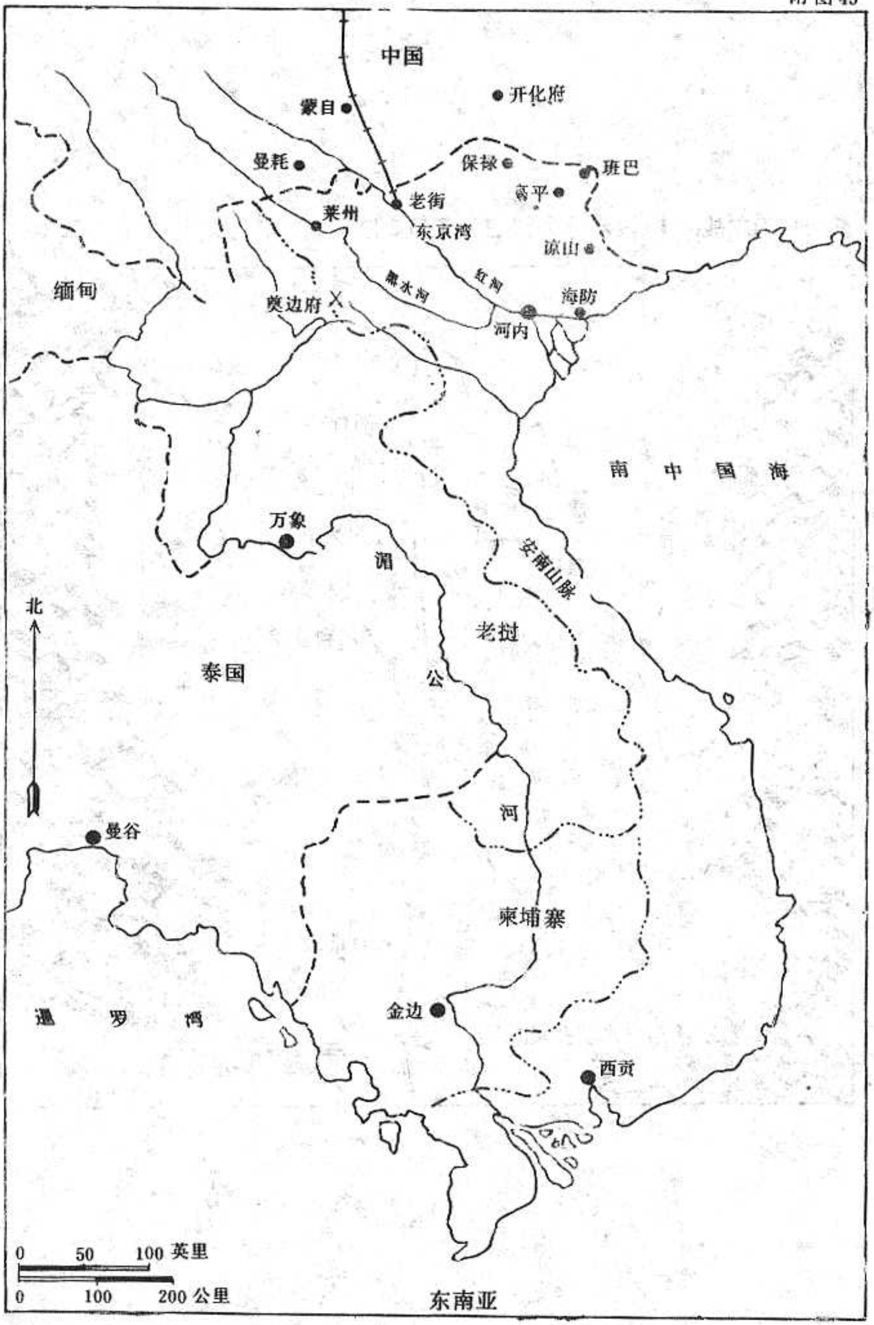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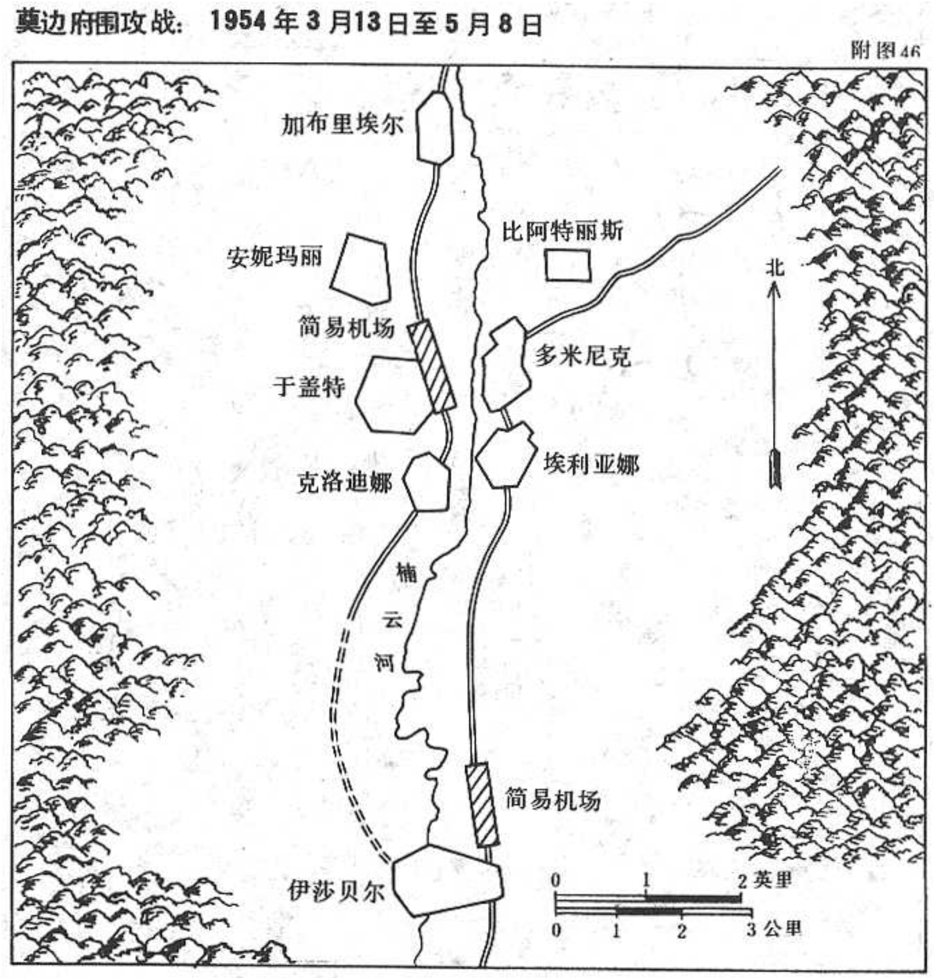


图 46、奠边府围攻战(1954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8 日)




现在看来，法军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失败的原因很多。参战人员缺乏勇气和持续作战能力决非原因之一。但是，深入敌占区建立孤立无援的攻防基地的方针可能是错误的，值得进一步研究。有许多判断错误，主要是法军总参谋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越南解放军的实力、机动能力、火力以及越盟指挥官的能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炮战能力。如果投入足够的空军力量，尽管不一定能打赢这次战役，但法军至少能守

住奠边府。

也许是作为北约成员国，对北约负有义务，法国很难向印度支那提供数量充足的飞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美国本来可以在不大规模卷入的条件下改变双方的军力对比，但它拒绝提供空中补给支援。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军在战役中没有总体指挥。纳瓦尔、科尼、法伊、卡斯特里和朗格莱都只注重战术问题。更糟糕的是，纳瓦尔和科尼关系很僵，已经达到相互仇视的程度。

以上是战役失败的大体原因。具体从战役本身来看，后勤保障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越盟显然占绝对优势。除了部分食品(越盟士兵靠大米、扁豆和干鱼度日)和后来法方空投落入越南人手中的物资之外，越盟在战役中所需要的物资均由中国提供。运送这些物资的路线很难确定，因为途径太多，太复杂。第二次越战以前，中国昆明有铁路通往印度支那的边城老街，但没有资料表明物资靠火车运往越南。物资很可能是经从蒙自到曼耗以及从凯华富(音译)到班巴的道路，从老街、高平甚至谅山地区进入越南境内，然后由土路运往奠边府。到 1954 年 3 月，越南人修筑了莱州至奠边府的初级公路，为运输来自老街方向的物资提供了方便。

通过这些国内和国外道路以及丛林小道，漫长的脚夫运输队艰难地将弹药给养运往战区，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也通过这些道路抵达前线。法国海空军飞行员直到围攻战结束前还冒险去破坏这一条条运输线，但很少成功。道路一旦遭到破坏，越方工兵就很快修复，或者绕道而行。红河上的桥梁和军需供应点均得到良好保护，要接近这些目标和主要道路，飞行员要冲过密集的高射炮火构成的“死亡走廊”。越盟的物资运输及部队机动尽可能在夜间进行。但即使在白天也难以对他们进行空袭。越南人在伪装方面不学自会，弹药库、行军纵队、火炮阵地被丛林掩蔽得滴水不漏，他们的无烟炉在

做饭时不会暴露目标。这些是阻碍法军成功地进行遮断袭击的因素。

武元甲后勤补给系统的主力是成千上万名承担接力运输任务的脚夫。他们是招募来的农民，往往自带粮食。靠手提肩挑来保障部队的供应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们采用经过改装的自行车。越盟从 1951 年起一直采用“标致牌”自行车。这种车车座被拆掉，车架用木制撑架加固，车龙头用竹杆加长，以便载重物时把握方向。改装后的自行车可运载重达 450 磅的零散物资（一般情况下每人只能携带 45 磅重的东西）。只要天气晴朗，这种车便可灵活地在丛林小路上运行。因此，如果武元甲拥有 5 万辆自行车，就等于他的运输队一次可以运送约 1 万吨左右的弹药、武器配件、汽油和食品。

战役的最后一个月里，雨季来临，自行车运输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可是，那时越南人已有了 600 辆 2.5 吨的俄式莫洛托夫卡车［扫校者注：即解放卡车］在土路或公路上行驶。负责公路保养的是一支庞大的苦力劳动大军。纳瓦尔曾指望这些道路雨季时无法使用，从而使越盟的后勤保障象他自己的那样发生困难，但事实与此相反。更糟的是，低云层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越盟运输队免遭法军飞机的袭击，同时也严重妨碍了法军准确地空投物资。

如上所述，越盟后勤系统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工。而法军的供给则完全依靠空中支援。越盟需要多少民工即可征用多少，而法军飞机的数量从未得到满足。简言之，这就是法军战败的原因。

如果纳瓦尔在战役前几周预储充足的给养，他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武元甲用高超的指挥才能迫使纳瓦尔违反他自己宣布的政策，使他耗尽人力物力为其机动小分队建立空降场，企图挫败越盟对老挝和湄公河流域地区的进攻。为完成此任务，法军运输指挥部耗尽了全部物资储备。

奠边府围攻战中，法军至多拥有 100 架运输机和 50 架轰炸机(B—26)，但机组人员缺编。然而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至结束的最后一天，法空军冒着37毫米高炮的准确炮火的袭击，共出动了 1629 架次，损伤相当严重。法军承认损失了 23 架飞机。法军也缺少地勤人员。如果飞机得不到维修，美国人就不愿提供更多的飞机。最后，美国确实提供了 1200 名地勤人员，从而改善了法军补给状况，但这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在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达科他”式飞机还能够着陆，守卫奠边府的部队每日 150 吨的最低食品需求量还可以得到满足。改为空投之后，情况变得异常严峻。4 月有两次空投的记录为 217 吨和 229 吨，但通常的记录都远低于最低需求量。行政参谋人员还有另外两个难题。其一，在安排药品、弹药、增援部队和食品的空投顺序时，食品往往置于最后一项。这意味着削弱战斗力，因为士兵有时的食品仅够维持生命。其二，食品本身也有问题，因为欧洲人能接受的营养食品，伊斯兰教徒不能容忍，非洲人和越南人也受不了。他们所需的食品品种不同。

法国海军飞行员出色地对付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的处境。直到战役的最后一刻，援兵和物资还不分昼夜地被空投到日渐缩小的防区内。宝贵的物资落入敌人手中不可避免，但这很少是飞行员的过失，而是冲突升级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这种使冲突升级的决策在战役初期即大错特错，它无疑是导致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在讨论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导致失败或胜利的许多因素都已分析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决定战役胜负的因素有三个，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补给问题，我们还从未在以前的各章中正式谈过，尽管在华沙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中，补给问题已成为虽不关键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法国人没有可

靠手段向其基地不断提供援军、弹药、食品和医疗保障。而越盟则相反，除医疗保障外(他们并没因此产生太多困难)，他们靠严密的组织和强壮的劳工，出色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不给后勤保障以应有的重视，肯定要打败仗。

另外，还有两个错误导致法国人的失败。正如英国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的情况一样，他们低估了反抗他们的当地军队的力量和能力，并且在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这两种错误都是致命的。但在奠边府围攻战中，这两个问题与防御部队得不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的严重失误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

## 第 24 章、战争的性质与战法

战争通常是由纷争引起的。纷争往往导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战斗。战斗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过去，打仗被认为是一种骑士般的浪漫行动，在近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仍然毁誉参半。然而，随着更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战争已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一种丝毫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甚至无助于消除罪恶的手段。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那也是十分草率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核威慑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完全可能再度爆发。对此，各国必须有所准备。

战争是研究战争的课堂。在军事领域也象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亲身经验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战役以及指挥这些战役的战争大师的作战方法中学到很多东西。笔者的四舅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他本人就是位战争大师——曾经给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军官写过这样一段话：“博览群书会使你出类拔萃……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为担任某种职务，特别是为担任更高的职务作准备。一旦担任

了某种职务，他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如果上任时他的头脑空空如也，再想充实自己就来不及了。”

自从有了战争以来，军事战略一直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迫敌作战的艺术，它决定着作战的时间、地点和人数。而战术则是迫敌交战后克敌制胜的方式和手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兵器毁伤力的提高，作战指挥者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攻防战法，以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战术和军事科学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然而，一些根本性的作战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这些原则都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通过研究战役的胜败之道，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战争的战法。在本书所论述的第一场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贯穿于后面各次战役的那些策略和原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出现了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实例。当时汉尼拔(他本人就是该战略的倡导者)转战意大利南部山区时，众多罗马将军显然对他无能为力。然而，曾运用间接路线战略对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给予致命打击的西庇阿此时又故计重演。他不顾政治上的强大阻力，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悄悄从西西里岛出发，把战争引向了迦太基，引向了汉尼拔的后方。

间接路线战略和战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且还把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史告诉我们，沿敌人预知的方向直接发动进攻往往是不会成功的，而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将帅却通过间接战略或战术赢得了胜利。不过，在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综合运用心理和生理因素，因为不采取某种形式的突然性和欺骗性行动，他们的机动就会被敌人阻止。可用很多方式实施间接路线，如战略的，战术的。除西庇阿出其不意地打到汉尼拔的老家之外，本书至少还有其他七个运用了间接路线战略的战例。

威廉公爵在佩文西登陆后，没有北进与哈罗德直接对抗，而是聪明地采取了一种他知道将诱使英王劳师远征的战略。英王在开战前不得不带领一支兵员不足的军队长途跋涉。萨拉丁在哈丁之战开始前亦获得了这种重要的心理优势。为将基督徒军队从萨富里雅的安全基地中诱出，他经过精心策划，率小部队夺取了太巴列。基督徒军队在赶往哈丁角与占有坚固阵地的萨拉丁的军队开战之前，不得不穿越一片炎热的沙漠。

在西里西亚碰巧处于内线作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也是位惯于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大师，洛伊腾战役便是他运用该战略的得意之笔。美国内战中，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在半岛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采取间接路线战略，利用海上力量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其手段与西庇阿在扎马之战中的做法如出一辙。坦嫩贝格战役中鲁登道夫进攻萨姆索诺夫左翼以及华沙之战中毕苏斯基的反击亦是采取这种战法的实例。

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以及他指导战役的技艺堪称高超战争艺术之最，它所提供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给后人以启发和教益。到达非洲后，西庇阿先狡猾地将汉诺的迦太基军队诱入伏击圈，然后又在兵力占优势的敌军面前转入了防御。第二年春天，他通过实施欺骗，以前来进攻的两支敌军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式，在一次夜战中捣毁了敌人的营地，歼灭了数以千计的敌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西庇阿得以向迦太基城发动直接进攻。然而，由于西法克斯仍未被彻底击败，而且汉尼拔定会在后方造成威胁，西庇阿不敢对迦太基城实施长期围困。因此，他决定用心理手段而不是物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转向西南，进入迦太基的产粮区，在那里击败了哈斯德鲁巴，彻底破坏了迦太基的粮食供应。此后，他又分兵两路，一路追捕西法克斯，一路直逼迦太基城。

迦太基军队的失败以及西庇阿施加的间接压力终于迫使

迦太基元老院与西庇阿进行和谈。然而，汉尼拔在小莱普提斯登陆后，和平协议被撕毁，战争的最后一幕即将开始。西庇阿再次作出惊人之举，他既没有向前进攻，也没有原地防御，而是率部离开迦太基城和汉尼拔，进入巴格拉达斯河谷地区，破坏了迦太基人的补给线，并靠近了他的重要盟友马西尼萨。这样做极为冒险，因为这会使西庇阿也将自己的交通线和退路暴露给敌人。然而，西庇阿赌赢了。迦太基元老院强迫汉尼拔追击他。于是，西庇阿在扎马取得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辉煌胜利。

这里之所以简要重述迦太基战争，是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普遍适用的作战原则和战法。突然性、机动能力、补给、通信、集中兵力、士气、政治干预以及指挥才能等各种因素均在这次非洲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达成突然性，就必须快速机动和实施欺骗。尽管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突然性均不容易，但在战略上则更难一些。指挥官无不力求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以智谋获取决定性的战术优势。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突然性的达成往往要靠运气。尽管达成突然性是采取“任何作战行动的出发点”，但是达成突然性的“特别成功”的战例却极为罕见。这就是说，最初达成的(特别是战略上的)突然性效果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抵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1815 年 6 月的那次战役，当时拿破仑以大胆的计划和隐蔽的行动(这是达成突然性的另一个因素)完全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然而，他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盟军在安齐奥[扫校者注：1944 年，二战意大利战场]的登陆无疑大大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之外，然而，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恐怕还是盟军没有充分利用这次达成突然性所取得的效果。

另一方面，战争史上靠突然性取得巨大战术成功的事例却

屡见不鲜。弗里德里希在洛伊腾战役中采用的新的进攻方式，马格鲁德在里士满城外采用的欺骗手段，祖鲁人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实施的高速、隐蔽的机动以及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发动的佯攻，均是靠出敌不意首先夺取战役优势的妙举。在上述的两个战役中，这种最初的优势导致了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

西庇阿通过逐步切断迦太基城的粮食补给线和实施灵活机动，各个歼敌的方法，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迫使他们媾和。士气的重要性无庸赘言。拿破仑有句名言："精神与物质是三比一的关系"。伟大的将领们都明白，士气低落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古往今来，作战士兵(因为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无不由于他们的士气而表现出一定的精神状态，或高昂、或沮丧。战争的正义性、将帅的才干、武器的效能、衣食的供应、士兵家属的安全和生活状况，均是与部队士气密切相关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士气在任何战斗中都至关重要，每位指挥官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己方部队的士气，钝挫敌军的士气。从扎马之战中的大象到奠边府战役中的妓女，人们为提高士兵的士气真可谓绞尽了脑汁。

建立高效的补给系统是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如哈丁之战和奠边府之战所示，后勤供应本身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很久以前军队可就地取给的时代里，交通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军队通常需要设立补给站。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就地取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方法也的确限制了能投入作战的士兵数量。尽管有许多饥寒交迫的军队战胜恶劣条件的例子，但不能长期地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否则，军队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比起强行掠夺牲畜、谷物等物资的行为来说，正常征用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古代，军队的后勤补给始终是一项令人头疼，很难做好的工作。这一工作的难度直到

道路得到改善(在牛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恶劣的路况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作战)和铁路出现以后才真正得到缓解。

交通线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它是连接后方基地、或在某些场合(如博罗季诺战役)连接后方补给站的纽带；第二，它又是退却的路线。袭击敌方交通线的行动最适于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或游击队实施。在上一次大战中，特别是在“西部沙漠”之战中，有许多这方面成功的战例。将大规模正面进攻变为侧翼进攻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把部队从正面阵地调到敌军翼侧。只有在时机绝对有利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能成功。通常，它是很难奏效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在突尼斯的战争中，西庇阿使自己的交通线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在博罗季诺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拿破仑和格兰特的处境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三人之中，西庇阿的处境最为危险，因为如果汉尼拔能够不受牵制地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西庇阿的退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只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投入交战。俄国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拿破仑的后方补给站造成威胁，这对拿破仑来说十分幸运。如果这些补给站梯次配置在多条后方交通线上，拿破仑的处境会更好些。格兰特采取的是就地取给的办法，他对敌人了如指掌，因此认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受到很大威胁。

与补给和交通线密切相关连的问题是要塞的出现。要塞在战争中始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讲到的许多战役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哈丁之战，甚至在更早的交战中，十字军能从“圣地”安全逃脱，全凭他们建造的位置适当的要塞。这些要塞不仅为十字军的后勤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保护了他们的交通线，而且还为他们的进攻作战提供了前进基地，为他们的退却提供了避难所。在英格兰内战中，要塞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们保护了坚固设防的城镇，封锁了敌人的交通线。

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要塞迟早要被攻陷，但它们能严重地迟滞敌人的作战行动。奠边府是另一种类型的要塞，它在许多方面起着类似城堡的作用。该要塞的作用本来是封锁入侵老挝的通路，并充当进攻作战的前进基地。这个要塞之所以未能起到第二个作用，是因为它太小，无法容纳足以发动进攻的部队。

西庇阿非常清楚机动的重要性。的确，在大多数战争中，部队都要靠机动制胜。指挥官都力求机动自己的部队，以便能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大军事家们几乎都把集中兵力视为惯例，而把分兵视为特例。在有些情况下，分兵是对的，西庇阿就曾派莱利乌斯击败了西法克斯。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必须使盟友马西尼萨重新掌权。然而，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将部队一分为二，彼此相隔 30 英里，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将自己的两翼伸展到 40 英里以上，就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了。如果布雷格及时发起攻击，联邦军定会一败涂地，因为当时他已巧妙地集中了兵力，并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合击或包围敌人，实施分兵是完全正确的。

在洛伊腾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著名的“斜击”战术狠击奥地利军队的左翼，不仅在战术上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而且还充分证明了他分兵的决策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四臂村和林尼之战中也采用了分兵的战法。这次分兵本来是可以象以往一样取得胜利的，然而，由于不幸的情况多次发生，法军没能为实施主攻集中足够的兵力，他终于失败了。这就引出了节约兵力的问题，节约兵力与集中兵力关系密切。

节约兵力是指充分利用交战地域及其附近的兵力。克劳塞维茨认为，宁可使用部队不当，也不要让部队无所事事。在本书谈及的 20 次战役中，指挥官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在博斯沃思之战中，理查就将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留作

了预备队。将部队留作预备队也是使用部队的一种方式，只是预备队的作用在战斗初期比较消极罢了。但是，有时根本就不需要留预备队，博斯沃思之战就属于这类情况。如果理查将多少有些靠不住的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放在前沿，他就可以抽出一支部队卷击亨利的左翼，从而对斯坦利兄弟以及整个战役施加决定性影响。实际情况是，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参加战斗，就象 330 年后戴尔隆的法军在林尼之战中没有参战一样。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有 7.7 万人和 30 门大炮闲置未用；在阿尔马河之战中，俄国骑兵没有投入战斗，失去了转败为胜的良机；在七天战役中，杰克逊的所有部队实际上都没有派上用场；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伦南坎普夫的部队也是如此。事后品头论足当然容易。在某些战役中，指挥官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也许自有道理。但节约兵力确实是一项重要作战原则。

要研究战争样式，还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军事将领们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在我们讲述的某些战役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汉尼拔是迦太基的伟大将领，他根本不同意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们制定的计划。如果不是迦太基元老院硬逼着他按他们的计划行事，迦太基人也许会在扎马之战中获胜。在内兹比之战中，“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百余年后，乔治三世的大臣所起的也是这种坏作用。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家们的干预严重地干扰了战地指挥官们的战役行动。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政治家竟然从 3000 英里之外进行干预，并用风帆传递命令。在美国内战中，林肯总统至少有一次(即半岛战役时)错误地干预了战场指挥官的行动，而且那次战役可能就是因此而失败的。戴维斯总统比林肯总统对军事懂得多些，但他给战场指择官们直接下达命令的做法也有损于南部同盟的最大利益。

战争是由政府发动并由政府控制的政治活动。在当今时

代，战争的火焰可能燃遍全球，这就要求战略大师们有能力处理好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战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政治家具有实战经验，并深入地研究过军事历史(如温斯顿·丘吉尔——尽管象他这样的人很少)，他们是有资格为指导战争全局制定战略计划的。然而，作战行动一旦开始，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就不应该再受到政治家们的干预了。

还有一种作战阶段值得提及，这就是追击。在叙述扎马之战时，我们没有必要提及追击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汉尼拔的骑兵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从本书的第二个战例，即黑斯廷斯战役，开始探讨追击问题。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的骑士们似乎在天黑前仅有的数小时里实施了一次多少有些失去控制的追击。据编年史学家记载，哈罗德的卫队曾集结起来，试图掩护已经溃退的撒克逊军队，在威廉下令收兵以前，许多骑士在所谓的“马尔福斯”地区丢掉了性命。

实施追击的要领是：迅速、无情、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追击一方才能充分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有利条件。追击的制约因素有三个：一是部队疲劳，即追击部队在实施追击以前很可能已经过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二是天然障碍(包括夜暗)；三是敌军的行动。

在骑兵主宰战场的年代里，骑兵部队在追击中能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但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骑兵的作用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身披沉重护甲的骑士和战马在快速追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随着长弓和火药的出现，战场上的骑士们演变成了步兵。然而，由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克伦威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等一批伟大将帅们的聪明才智，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又重新得到发挥。在内兹比战役中骑兵在夜幕降临前追杀了 11 英里，成了追击行动的主角。在通常情况下，追击在夜幕降临时就停止了，不过，在本书列举

的洛伊腾战役、滑铁卢战役和华沙战役中，追击行动并未因夜幕落下而中止。

然而，单一的骑兵只能对付士气低落、正在逃跑的敌军，而无法对付组织有序的撤退之敌。约米尼说，退却“无疑是战争中最困难的作战行动”。只有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并由强大后卫部队掩护的情况下，撤退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当敌人投入预备队时，追击行动都必须迅速有序地进行，而且三个兵种要联合行动。即使最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因在追击中蒙受损失而显得黯淡无光。据说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诺曼底人就是在一次小小的与敌后卫部队的交战中蒙受了很大损失。

战争中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敌人已被打败，但立即追歼逃敌却不可能。然而，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明明可以追击，却没有实施追击的战例，本书述及的博罗季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及奇克莫加战役中就有这类情况。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人虽遭重创，但却不急于撤离战场。如果拿破仑硬逼他们离开，他们肯定会进一步顽强抵抗，而这时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因疾病和伤亡而严重减员了。拿破仑把眼光投向了莫斯科，他想使部队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俄国首都。他后来尽管没有再损兵折将便如愿以偿，却未能达到战争目的。现在也许有人会说，拿破仑当初真应对库图佐夫穷追猛打，将其彻底歼灭。然而，要知道，当时在战场上作战的俄军除库图佐夫的部队之外还有其他部队，拿破仑的目标并不限于仅仅消灭其中的一支。

如果说拿破仑没有进行追击尚有情可原，米德和布雷格的所作所为就毫无道理了。当李的部队从塞米纳里岭有条不紊地撤退时，米德根本就没打算实施追击。直到一天半以后，联邦军才不慌不忙地向前开进。由于波托马克河水位上升，李在战役结束后 10 天内无法渡河南下，因而不得不背水占领

防御阵地。米德的部队虽然在兵力和士气方面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却让李兵不血刃地渡过了波托马克河，林肯对此怒不可遏。布雷格在奇克莫加获胜后没有乘胜追击罗斯克兰斯的部队，从而失去了一次类似的歼敌机会。当时托马斯将军的军已成强弩之末，如果布雷格行动迅速，很可能在罗斯维尔山口将整个联邦军队彻底击败，查塔努加也可能不会失守。布雷格辩解说，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过于疲劳。虽然这是事实，但他的部队士气高昂，他完全应该进行追击。

以上就是2000多年前扎马之战所孕育的作战原则和战法，其中许多原则在本书后来述及的战役中依然适用。诚然，这些原则和战法并不能囊括战争的所有原则和战法，但是，它们由于具有典型性，在未来战争中仍然不会过时。